

# 认同的力量

## THE POWER OF IDENTITY

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 第二卷

曼纽尔·卡斯特 著

CALLA  
ENC  
INTERGALACTICO  
POR LA Humnidad  
y contra el

OLIBERALS

27 Julio  
1996

San Andres  
Los Altos de  
Chiapas  
MEXICO

TES  
DO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当学识渊博的曼纽尔·卡斯特开始瞄准意义最重大的问题时，请注意：您的假想将会受到挑战，您的思想将会发生转变。《认同的力量》展示了一个现实的、令人震惊、困惑的、入木三分的“糟托邦”（乌托邦理想社会之对，指极其糟糕的社会——译注），它检验了在加速的信息与互联网冲击下以地域疆界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解体。如果对20世纪末全球政治文化的谜团有着比本书更深刻、更广泛的思考，我则一无所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和历史学教授  
伊拉·卡兹纳尔逊 (Ira Katznelson)

“卡斯特对重塑全世界国家、种族、意识形态、性别的信息化社会和全球化威力进行了全新的、具有挑战性的解释。本书代表着对新的世界无序的一种强有力的理论，透视了一种无法描述的后现代主义景象，这是对我们正在经历的转变所作的意义深广的、创新的论述。”

——汗特学院人类学教授、北美人类学协会主席  
伊达·苏瑟 (Ida Susser)

“曼纽尔·卡斯特以世界范围的文献和很大的分析深度说明当代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应理解为网络社会与集体认同之间斗争的行动因素，集体认同有时采取消极抵抗，有时采取积极抵抗。这本书将在即将到来的年头里成为所有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关心和讨论的中心议题。”

——社会学教授、法国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社会运动研究中心创始人  
阿兰·图尔纳 (Alain Touraine)

<http://www.ssdph.com.cn>

ISBN 7-80149-532-2



9 787801 495327



封面图片：墨西哥恰帕斯州的Oventic 村落街道上的壁画，1996

ISBN 7-80149-532-2/F·159  
定价（共三卷）：99.00元（每卷33.00元）



信息时代三部曲：  
经济、社会与文化

第二卷

# 认同的力量

**THE POWER OF IDENTITY**

曼纽尔·卡斯特 著 夏铸九 黄丽玲 等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同的力量/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黄丽玲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6  
(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  
ISBN 7-80149-532-2

I. ①认… II. ①曼…②夏…③黄… III. 国际化—研究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101273号

·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第二卷）

### 认同的力量



著 者：曼纽尔·卡斯特  
译 者：夏铸九 黄丽玲 等  
策 划：薛晓源  
责任编辑：许春山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晓市胡同10号 电话65147751 邮编100005）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北京增富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毫米 1/32开

印 张：15

字 数：343千字

版 次：2003年6月第1版 200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49-532-2/F·159

定 价（共三卷）：99.00元（每卷33.00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2-3839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Manuel Castells

THE POWER OF IDENTITY

© Manuel Castells 1997

---

英国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授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中文简体字独家专用权。本书根据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7 年版译出。

## 翻译分工说明

绪论和结论：夏铸九

第一章：黄肇新

第三章：黄丽玲

第四章：杨长苓、柏兰芝、吴金鏞

第五章：黄慧琦

第六章：刘昭吟、林德福

# 身 言

## 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

---

扬起你的脸，赶紧这样做，  
因为明亮的早晨即将为了你降临。  
历史，尽管有着扭曲的苦楚，  
没有办法不这样度日，然而  
如果以勇气面对，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来。

抬起你的双眸，  
这天为你们破晓。

梦想  
就要重生。

——玛雅·安吉罗《早晨的脉动》<sup>①</sup>

---

<sup>①</sup> 玛雅·安吉罗 (Maya Angelou)，《早晨的脉动》，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就职诗篇，1993年1月22日。





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与认同的冲突性趋势所塑造。信息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的重新构建，已经诱发了社会的新形式——网络社会。其特点是：战略决策性经济活动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的弹性与不稳定性以及劳动的个人化；普遍的、相互关连的与多样化的媒体系统建构起来的真实虚拟的文化（culture of real virtuality）；还有生活的物质基础——空间与时间，因为流动空间与永恒时间的特性而发生变化，成为支配性活动与控制精英的表现。这个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其普遍的全球性扩散至整个世界，一如20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及其孪生敌人——工业国家主义，摇撼制度，转化文化，创造财富和引发贫穷，刺激贪婪、创新以及希望，同时又加诸苦难与灌输绝望。不管是否美丽，但这确实是一个新世界。

然而这不是故事的全部。伴随着技术革命，资本主义转化，国家主义让位，我们在这世纪最后四分之一已经经历了集体认同强烈表现的漫天烽火。这些集体认同为了捍卫文化的特殊性，以人民对生活与环境的控制权对全球化与世界主义提出挑战。顺着每一个文化的形貌与每一个认同形成的历史来源，这些表现是多重的、高度丰富的。他们包括了追求性的、为了改变而动员的运动（proactive movements），朝向在最根本的层次转化人类的关系，像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但是他们也包括了各种反应性的、对抗的运动（reactive movements），为了神、民族、族群、家庭、地域而营造抵抗的战壕，而这些基本范畴已存在了千年，现在却处于技术—经济的力量与转化性的社会运动这两者相结合却又相矛盾所带来的攻击威胁之下。在这些相对抗的趋势夹峙之间，民族国家（nation - state）<sup>①</sup> 被质疑，而危机正在于民主政治这个概念本身，因为这个概念所预期的是一个主权的、议会代表制的

---

<sup>①</sup> 针对第二卷的主题及上下文需要，我们将 nation - state 译为国（民）族国家，在一、三卷中则译为民（国）族国家。

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更有甚者，新的、强有力的技术媒体，像世界性的、互动的电讯网络，以前所未有的高使用率为不同的奋战者所用，扩大并增强他们的斗争力。例如，国际网络（互联网）变成了国际环境主义者、墨西哥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美国民兵等的工具，也反映了金融市场与信息处理的电脑化了的全球化（computerized globalization）。

而这正是本书所要探索的世界。本卷的焦点在于社会运动与政治，它们起因于下列因素的互动——技术所导致的全球化、认同的力量（性别、宗教、民族的、族群的、领域的、社会—生物的）以及国家制度。为了引领读者经由当代社会斗争与政治冲突的景点共赴这知识之旅，我先由一些可能有助于这次航程的评论开始。

这不是一本书目介绍的书。因此，我不会讨论每一主题的现有理论，或是针对呈现此处的议题将每一可能的出处一一引证。实际上，即使是试着就本书表面上所涵盖主题领域建立学术记录，都是一种太自负的做法。在每一题旨确实引用的出处与作者是我特别选来做为建构每一主题假说的材料，以及针对网络社会中社会变迁的宽广理论的分析性意义。读者若对参考书目以及对这些书目的批判性评价有兴趣，可针对每一内容参考一些可得到的好教科书即可，而非本书。

我所采用的方法是依据在不同的文化与制度脉络中对社会运动连绵不断浪潮的观察，经由分析实践而传达理论为目的。因此，经验分析主要用来作为沟通的手段，以及作为规范我的理论论述的方法，这方法可使我比较不会（不能说完全不会）说出一些所观察的集体行动在实践中并没有做的事。然而，我已经试着在本卷空间的限制内提供一些经验元素，使我的诠释合理，以及让读者自己判断。

在本书中有一种对多重文化论（multiculturalism）刻意的执着，因此我扫描全球，审视其丰富多变的社会与政治言行。这个



取向源于我的这个看法：即塑造我们世界的技术—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正受到挑战，且最终将按照不同的文化、历史与地理条件的不同，自其来源的多重性被转化。因此，在本卷中我在美国、西欧、俄罗斯、墨西哥、玻利维亚、伊斯兰世界、中国或日本之间移动主题，如此做有特殊的目的，就是想利用相同的分析架构了解彼此迥异但意义上相关的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es）。当我们的社会已经变得全球相互连结与文化相互纠缠时，在作者明显的知识与经验的限制之内，我也愿意突破目前仍相当程度地支配着社会科学的种族中心主义取向。

关于理论，这里附带一提：本书所提供的社会学理论，为了读者的方便，稀释在每章的主题陈述之中，而理论也尽量与经验分析相融合。只有在不可避免时，我才会提供给读者一份简要的理论补充。因为对我而言，社会理论是了解社会的一种工具，而非一种知识上自我满足的目的。我将在本卷结论中试着收紧分析，以较正规、系统化的方式，将每章中所编织的不同线索收拢起来。然而，既然本书聚焦于社会运动，而在“社会运动”这个概念的意义上有许多的不同意见，那么我还是先提出我对社会运动的定义是：有目的的集体行动，它的结果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均在于转化社会的价值与制度。既然除了我们所感受的历史之外别无历史感（there is no sense of history other than the history we sense），从分析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好的”与“坏的”、进步的与倒退的社会运动。它们全都是“我们是谁”的特征，而且都是我们转变的大道，因为转变可能等于通往各种天堂、地狱或天堂般的地狱。这并非一种偶发的评论，由于在我们世界中社会变迁的过程经常采取狂热与暴力的形式，我们经常不会联想到正面的社会变迁。然而，这个是我们的世界，这个就是（在我们的矛盾的多元性中的）我们，而假如有必要去而对它、克服它的话，这也是我们必须了解的。而关系“这个”与“我们”的意义，那就请读者鼓起勇气阅读下去。



# 目 录

## CONTENTS

导言 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	1
<b>第一章 公杜天堂：网络社会的认同与意义 .....</b>	<b>1</b>
第一节 认同的建构.....	2
第二节 上帝的天堂：宗教原教旨主义与文化认同 .....	10
一 信徒团体与维希利亚（Jahiliya）：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	11
二 上帝拯救我！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 .....	21
第三节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意象化的 社群还是社区的意象？ .....	29
一 民族与国家：苏联的解体及“不可能国家联合体” .....	36
二 没有国家的民族（Nations Without A State） ——加泰隆尼亚 .....	47
三 信息化时代的民族 .....	57
第四节 种族解放：网络社会中的种族、阶级及身份认同 .....	59



第五节 区域认同：地方社群 .....	68
小结 信息时代的文化社区 .....	74

## 第二章 地球的另一面——对抗新全球秩序的社会运动..... 78

第一节 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社会运动 .....	79
-------------------------	----

第二节 墨西哥的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第一个 信息化的游击队运动 .....	83
一 谁是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 .....	85
二 札巴提斯塔解放军的价值结构：认同、敌人及 目标 .....	89

三 札巴提斯塔解放军的沟通策略：国际网络（互联 网）及媒体 .....	91
--	----

四 社会运动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 .....	94
--------------------------	----

第三节 拿起武器反抗新社会秩序：美国民兵及 20 世纪 90 年代的爱国运动 .....	97
---	----

一 民兵及爱国者：多主题的信息网络 .....	102
二 爱国者的旗帜 .....	107
三 谁是爱国者？ .....	110
四 民兵、爱国者及 20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社会 .....	111

第四节 天启的僧侣：日本奥姆真理教 .....	113
-------------------------	-----

一 麻原及奥姆真理教的发展 .....	114
二 奥姆的信念和方法论 .....	117
三 奥姆与日本社会 .....	118

第五节 对抗新全球秩序的反叛行动的意义 .....	121
---------------------------	-----

小结 全球化的挑战 .....	125
-----------------	-----

<b>第三章</b>	<b>自我的绿化：环境运动</b> .....	127
第一节	环境运动的创造性杂音：类型学 .....	129
第二节	绿化的意义：社会性议题以及生态 主义者的挑战 .....	140
第三节	行动中的环境主义：碰触人们的心灵、驯化资本、 向国家示好以及与媒体共舞 .....	148
第四节	环境正义：生态主义者的最新战线 .....	152
<b>第四章</b>	<b>父权制度的终结：信息时代的社会运动、 家庭与性</b> .....	155
第一节	父权家庭的危机 .....	159
第二节	职业妇女 .....	180
第三节	深具影响力的女性情谊：女性主义运动 .....	204
一	美国妇运：断裂的连续体 .....	207
二	全球女性主义？ .....	216
三	女性主义：引导性的多元声音 .....	227
第四节	爱的力量：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解放运动 .....	237
一	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和性解放运动在台北 .....	241
二	自由空间：旧金山的男同性恋社区 .....	247
三	综述：性认同与父权体制 .....	257
第五节	父权制危机下的家庭、性关系和人格 .....	258
一	急剧缩小的家庭 .....	258
二	非再生产的父权制所再生产的母职 .....	265
三	身体认同：性关系的（再）建构 .....	275
四	后父权世界的弹性人格 .....	278





第六节 父权制度的终结? .....	282
<b>第五章 权力衰落的国家? .....</b>	<b>283</b>
第一节 全球化与国家 .....	284
一 国家经济体的跨国核心 .....	285
二 全球经济中国家的新财政危机的统计估算 .....	287
三 全球化与福利国家 .....	293
四 全球通讯网络、地方受众、不确定的管制者 .....	294
五 法律失效的世界? .....	299
第二节 多边主义时代的民族国家 .....	301
第三节 全球治理与超民族国家 .....	307
第四节 认同、地方政府以及民族国家的瓦解 .....	310
第五节 国家的认同化 .....	315
第六节 民族国家的当代危机：20 世纪 90 年代的墨西哥 制度革命党政府和美国联邦政府 .....	318
一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恰帕斯 (Chiapas, 墨西哥的一个省份) 与提哇那 (Tijuana, 墨西哥 的一个省份) 与制度革命党政权的困境 .....	319
二 人民 vs. 国家：美国联邦政府合法性的衰落 .....	331
三 国家危机的过程与结构 .....	342
第七节 国家、暴力及监控：大哥大变成小妹妹 .....	345
第八节 民族国家和国家理论的危机 .....	349
小 结 宇宙之王、孙子兵法及民主危机 .....	354
<b>第六章 信息化政治与民主危机 .....</b>	<b>357</b>
导 论 社会的政治学 .....	357

---

第一节 信息化时代作为政治空间的媒体·····	361
一 政治与媒体：市民的连结·····	361
二 作秀政治与政治行销：美国模型·····	366
三 欧洲政治正在“美国化”？·····	374
四 玻利维亚的选举民粹主义：“男伙伴”巴林科与 洁卡·乌鲁的来临·····	379
第二节 行动中的信息化政治：丑闻的政治学·····	385
第三节 民主危机·····	396
小 结 重建民主？·····	404
结论 网络社会的社会变迁·····	409
参考文献·····	421

## 表 目 录

表 4-1	1971~1990 年各国粗估离婚率的改变率 .....	161
表 4-2	发达国家每百对婚姻中离婚率的变迁 .....	162
表 4-3	发展中国家 40~49 岁妇女第一次婚姻因为分居、 离婚、死亡而结束的比率 .....	168
表 4-4	20~24 岁尚未结婚的女性人数百分比 .....	168
表 4-5	各地区非婚生子女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率 (各国平均率) .....	169
表 4-6	发达国家中单亲家庭占全部家庭的比例趋势, 统计 对象的定义为未成年儿童和至少一位家长具有公民 身份 .....	171
表 4-7	由妇女当户主的家庭比例趋势 .....	172
表 4-8	1975~1990 年部分西欧国家中家庭与家户 组成近期变化的指标 .....	174
表 4-9	1990~1993 年样本国家单人家户与所有 家户的百分比 .....	175
表 4-10	世界各主要地区的总生育率 .....	177
表 4-11	性别区分的劳动参与率 .....	181
表 4-12	性别区分的总雇用数 (平均年增长率) .....	183
表 4-13	1970~1990 年经济活跃率 .....	186





表 4-14	1970~1990 年妇女经济活跃率的增长率·····	188
表 4-15	1973~1993 年妇女在服务业中的雇用率, 依据活 动与信息密集程度排序·····	192
表 4-16	1973~1993 年各类别妇女雇用率在总妇女 雇用率中的增长率·····	193
表 4-17	1980 年和 1989 年妇女雇用率在各行业 中的分布·····	193
表 4-18	1973~1994 年兼职工作的数量与组合·····	198
表 4-19	自我雇用占有所有雇用的比例, 依据性别与 活动划分·····	202
表 5-1	经济与公共财政的国际化: 1980~1993 年的 比率·····	288
表 5-2	经济与公共财政中的政府角色: 1980~1992 年的 变动率与 1992 年的比例·····	289
表 6-1	美国的新闻来源 (1959~1992)·····	362
表 6-2	玻利维亚科卡邦巴居民政治信息来源 (1996 年)·····	363
表 6-3	玻利维亚公民对于何种制度代表其利益的意见···	384
表 6-4	众议院选举的投票率: 近期与 20 世纪 70 年代、 80 年代的比较·····	400

## 图 目 录

图 2-1	1996 年美国爱国者组织数量及军事训练基地在各地的分布情况 .....	104
图 4-1	意大利、西德和瑞典于 1934~1938 年和 1949~1953 年出生的妇女婚姻维系率 .....	164
图 4-2	1960 年以来欧盟各国初婚状况的变化 .....	165
图 4-3	各国粗估离婚率 .....	166
图 4-4	美国 1960~1989 年在第一次婚姻前便已生下第一个孩子的比率（依种族、族群分类） .....	167
图 4-5	1960 年以来欧洲国家生育率综合指标 .....	178
图 4-6	1920~1990 年美国的总生育率与总出生人口数 .....	179
图 4-7	1980~1990 年服务业雇用女性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增长 .....	188
图 4-8a	女性劳动力在各种劳动类型中的百分比 .....	189
图 4-8b	美国在 1960~1990 年夫妻共组的家庭中家庭主妇的劳动参与率 .....	190
图 4-9	1991 年欧盟国家不同家庭状况的妇女兼职比例 .....	205
图 4-10	同性性关系不同向度之间的相互关联性 .....	242



图 4-11	旧金山男同性恋者居住区域 .....	252
图 4-12a	美国家户组成 (1960~1990 年) .....	259
图 4-12b	美国家户组成 (1970~1995 年) .....	260
图 4-13	1960~1990 年美国 18 岁以下小孩的居住情况 (以是否与父母亲同住分类) .....	266
图 4-14	男人与女人一生中口交发生比例: 以人群划分 .....	279
图 5-1	一般的政府总财政负债 (占 GDP%) .....	292
图 5-2	制造业劳动成本 (1994 年) .....	292
图 5-3	1984~1995 年美国人民对政府规模和服务的 意向和态度调查 .....	334
图 5-4	1995 年美国人民对联邦政府的政策措施和缩减 联邦政府预算赤字的看法 .....	339
图 6-1	1959~1991 年美国新闻来源的可信度 .....	363
图 6-2	1890~1992 年美国每个周期发生的 贪污事件的平均数字 .....	390
图 6-3	对于各个政府的赞同率 .....	398
图 6-4	全国选举中对于主流政党的支持程度 (1980~1994 年) .....	402

## 图表目录

---

图表 2-1 对抗全球化的反叛运动其价值观及信念的结构	123
图表 3-1 环境运动的类型	130
图表 4-1 妇女运动的分析类型学	229

## 图 目 录

---

图 2-1	1996 年美国爱国者组织数量及军事训练基地在各地的分布情况 .....	104
图 4-1	意大利、西德和瑞典于 1934~1938 年和 1949~1953 年出生的妇女婚姻维系率 .....	164
图 4-2	1960 年以来欧盟各国初婚状况的变化 .....	165
图 4-3	各国粗估离婚率 .....	166
图 4-4	美国 1960~1989 年在第一次婚姻前便已生下第一个孩子的比率（依种族、族群分类） .....	167
图 4-5	1960 年以来欧洲国家生育率综合指标 .....	178
图 4-6	1920~1990 年美国的总生育率与总出生人口数 .....	179
图 4-7	1980~1990 年服务业雇用女性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增长 .....	188
图 4-8a	女性劳动力在各种劳动类型中的百分比 .....	189
图 4-8b	美国在 1960~1990 年夫妻共组的家庭中家庭主妇的劳动参与率 .....	190
图 4-9	1991 年欧盟国家不同家庭状况的妇女兼职比例 .....	205
图 4-10	同性性关系不同向度之间的相互关联性 .....	242

# 第一章 公社天堂：网络社会的 认同与意义

京都钟埤 殿陛辉鲜 林苑芳菲 兰桂叠妍  
宫禁焕灿 楼阁百层 廷阙琼瑶 钟磬铿锵  
台凌霄汉 坛焚牲畜 荡涤洁修 斋戒沐浴  
礼拜敬虔 赞美雍肃 愿吁居歆 自求菲禄  
胡越贡朝 蛮夷率服 任多版图 总归隶属

——洪秀全

这是由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于1853年在南京建立了他的天朝之后所写的纲领预言——“御制千字诏”<sup>①</sup>（Imperially Written Tale of a Thousand Words）。太平道（大同之道）叛乱的目的，在于在中国建造一个公社性的（communal）<sup>②</sup>、新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国度。这个国度是根据洪秀全自称在接受了福音派宣教师的传教之后，从他的天兄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的圣经的启示，花了

① 引自史景迁（Spence, 1996: 190~191）。

“御制千字诏”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新刻（咸丰四年，1854年），凡四言句，数上帝创造万物，耶稣救世赎罪，洪秀全受命下凡起义，建都天京诸事。略似旧塾之千字文与三字经，为太平天国幼学启蒙读本。

② communal 译为公社的、社区的、自治体的、公共的。





超过 10 年的时间组织起来的。在 1845~1864 年，洪秀全的祷词、教训及军队因阻止了当时在中国逐渐扩张控制的外国势力而震撼了中国及世界。太平天国在火光与鲜血之中，兴起义灭亡，夺走了 2000 万中国人的性命。它企图经由对与占领中国的魔鬼的战斗来建立地上的乐园，让“所有的人能在永恒的快乐中生活在一起，直到最后大家都升天而与天父相会”。<sup>①</sup> 当时正是一个国家官僚及道德传统面临危机的时刻，也是一个贸易全球化的时代、贩卖毒品获利的时代、快速工业化散布全球的时代、传教士传教的时代、贫农的时代、家庭及社区动摇的时代、地方土匪与国际军队皆横行的时代、印刷品散布与大量文盲并存的时代、一个不确定及无望的时代、是一个认同危机的时代。就像现在一样，不是吗？

## 第一节 认同的建构

认同 (identity) 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如卡洪 (Calhoun) 所说：

每个人都有名字，所有的语言和文化都在其中有某种区别自己与别人、我们与他们的方式……对自我的知识——总是被“建构”的，虽然有时看来很像是被“发现”的——永远无法与他人独特的、用来了解我们的说法分开。<sup>②</sup>

关于认同，当它指涉的是社会行动者之时，我认为它是在文

<sup>①</sup> 史景迁 (Spence, 1996: 172)。

<sup>②</sup> 卡洪 (Calhoun, 1994: 9~10)。

化特质或相关的整套的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而这些文化特质是在诸意义的来源中占有优先位置的。对特定的个人或群体而言，可能有多重的认同。然而这种多元性对于个人的自我表现和整体社会行动而言，都可能是压力和矛盾的来源。因为认同必须与传统社会学家所说的角色或角色设定（role-sets）作一区别。角色（例如同时兼有以下身份：劳工、母亲、邻居、社会主义战士、工会成员、篮球选手、教会会友，以及吸烟人士）是由社会的组织与制度所架构的规范来界定，而它们影响人们行为的程度取决于个人与这些制度及组织的协调与安排。认同则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也是由行动者经由个别化的过程而建构的。<sup>①</sup>就如同我在下面会再讨论的那样，虽然认同也可以由支配的制度产生，但是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之内化，且将他们的意义环绕着这内化过程建构时，它才会成为认同。有些自我定义确实可能与社会角色恰好相符，例如从行动者的观点而言，“作为一个父亲”刚好是最重要的自我定义时。然而，比起角色，认同是更强烈的意义来源，因为认同涉及了自我建构及个别化的过程。简单地说，认同所建立的是意义，而角色所建立的是功能。我将“意义”定义为社会行动者为其行动的目的所做的象征的确认。为了一些我下面还要加以引伸的理由，我也提出，在网络社会里，对大部分的社会行动者而言，意义是环绕着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并自我维系的原初认同（primary identity）（亦即一个架构其他认同的认同）而建构的。虽然这与艾瑞克森（Erikson）对认同的说法很接近，我在此的焦点将集中于集体的、而非个人的认同。然而，如莱西（Lasch）的“自恋症的文化”（culture of narcissism）中所分析的那样，个人主义（不同于个人认同）也可能是“集体认同”的一种形式。<sup>②</sup>

① 吉登斯（Giddens, 1991）。

② 莱西（Lasch, 1980）。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很容易同意所有的认同都是建构这一事实。真正的课题是，认同是如何、从何处、由谁以及为什么而建构的。认同的建构所运用的材料来自历史、地理、生物、生产与再生产制度、集体记忆及个人的幻想、权力机器及宗教启示等。但是个人、社会群体及社会，根据源于其社会结构及其时间/空间架构所产生的社会意志及文化计划，处理了这些材料，并重新安排了它们的意义。我建议一个假设性的看法就是，一般而言，谁以及为了什么而建立集体认同，大致上便决定了这认同的象征性内容，以及它对接受或拒绝这个认同的人的意义。因为认同的社会建构通常发生在一个标示为权力关系的脉络里，我建议将打造认同的形式与起源区分为三种形式：

\* **合法性的认同** (legitimizing identity)：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 (institutions) 所引介，以拓展及合理化它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它是森涅特 (Sennett) 的权威与支配理论的核心主题，<sup>①</sup> 但是也符合各种不同的民族主义的理论。<sup>②</sup>

\* **拒斥性的认同** (resistance identity)：由那些在支配的逻辑下被贬抑或污名化的位置/处境的行动者所产生的。他们建立抵抗的战壕，并以不同或相反于既有社会体制的原则为基础而生存，如卡洪 (Calhoun) 在解释认同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的浮现时所说明的那样。<sup>③</sup>

\* **计划性的认同** (project identity)：指当社会行动者不管基于哪一种他们能获得的文化材料，建立一个新的认同以重新界定他们的社会位置，并藉此而寻求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例如当女性主义从女性身份及女权的抵抗战壕中出

① 森涅特 (Sennett, 1986)。

② 安德森 (Anderson, 1983)；盖那 (Gallner, 1983)。

③ 卡洪 (Calhoun, 1994: 17)。

来，挑战父权家庭、整个生产、再生产、性别及人格结构都长期依赖的父权主义时。

当然，从拒斥出发的认同可能会引起一些计划，并且顺着历史演进也可能在社会制度内发展变成是支配性的，更进一步变成理性化其支配的合法性认同。的确，从社会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个认同序列的动态说明了没有一种身份是本质性的，也没有一种认同本身可以不根据其历史脉络就具备进步或压迫性的价值。另一个与此不同但也相当重要的事情是，要看每一种认同为属于该认同的人们带来什么好处。

在我看来，在建构社会时，每一种认同建构的过程都会导致一个不同的结果。合法性的认同产生公民社会，也就是一套组织和制度，以及一系列被结构化和被组织化的社会行动者，它们再生产（虽然有时是以冲突的方式）合理化其结构性支配来源的认同。这样的描述对有些读者可能有点意外，因为公民社会通常带有民主式的社会变迁的正面含义。然而，这事实上是葛兰西（Gramsci）所说的公民社会的原创性概念，他是这个隐晦的概念的知识之父。事实上，在葛兰西的概念里，公民社会是由一连串的“机器/机关”（apparatuses）所组成，例如教会、工会、政党、公司、民间组织（civic associations）等等，它们一方面延续了国家动力，而另一方面是深深地根源于人民。<sup>①</sup>正因为公民社会具有这种双重特性，使它作为政治变动的特殊领域，所以存在无需经由直接的武力攻击便掌握国家的可能性。在公民社会里，要能利用变动的力量（在葛兰西的想法，则是社会主义的力量）征服国家，正是要倚靠公民社会的制度（institutions）与国家的权力机器（apparatuses）之间的关联。这关联是环绕着同一相似的认同而组织起来的（如公民身份、民主、社会变迁的政治化、

① 布希格蓝卡司曼（Buci-Glucksmann, 1978）。

国家的权力及其分派等等)。在这里，葛兰西和托克维尔 (de Tocqueville) 看到的是民主与公民性 (民间性) (civility)<sup>①</sup>，富柯 (Foucault) 或森涅特 (Sennett)，及他们之前的霍克海默 (Horkheimer) 或马尔库塞 (Marcuse) 看到的则是内化的支配及一个强制性的、无差异性的、具规范性的认同的正当化过程。

在艾瑞奥尼 (Etzioni) 的理论里，第二种类型的认同建构，拒斥的认同 (identity for resistance)，促成了公社 (commune) 或社区 (community) 的形成。<sup>②</sup> 这可能是我们的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认同建构。它建构集体的抵抗力量以对抗无法承受的压迫，通常，认同以从历史、地理或生物等面向能够清楚界定而划定抵抗的边界为基础。例如，谢夫 (Scheff) 所说的，“以族群为基础的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常常是因为异化感及厌恶被不公平政治、经济或社会的排除所引起的。”<sup>③</sup> 宗教的基本教义派，领域性的社区，民族主义者的自我确认，甚至翻转了压迫论述的字眼骄傲的自我污名 (如同性恋运动中某些“酷儿文化”的取向)，都是我所说的被排除者对于排除他的人们所进行的排除。也就是说以支配性的制度/意识形态的字眼来建立防卫性的认同，并在强化本身疆界时翻转了其原有的价值判断。在这种情形下，被排除的/排除性的认同之间的交互沟通的可能性成为必须讨论的议题。这个只能由经验及历史来回答的问题，决定了社会仍能维系为一个社会、或是破碎成为一些部落的集合——虽然有时候“部落” (tribes) 被比较委婉地说是社区。

认同建构的第三种过程是计划性的认同，产生阿兰·杜罕 (Alain Touraine) 所说的主体 (subjects)：

---

① civility 在此处译为市民性、民间性、相对于宗教的世俗性、以至于含有文明的谦恭有礼言行之意——译者注。

② 艾瑞奥尼 (Etzioni, 1993)。

③ 谢夫 (Scheff, 1994: 281)。

我称为主体的是指为作为一个个体，其创造个人历史、对个人生活经验的全部领域赋予意义的欲望……从个体转化成主体有赖于两种主张的必然性结合：一个是相对于社区的个人，另一个是相对于市场的个人。<sup>①</sup>

主体并非个体，即使它们是由个体所产生。个别的个体要经由“主体”这种集合性的社会行动者来获取他们的经验中的完整性的意义。<sup>②</sup> 在这种情况下，认同的建构是一个不同的生活的计划，可能是以被压迫者的认同为基础，但再由这个认同的计划延伸向社会的转化，如前所述的后父权社会的例子，透过妇女的认同的实现而解放女人、男人和小孩。或者，另一个非常不同的观点，是因为宗教的教化改变了无神的、反家庭的、物质化的社会，因此所有的人类要在上主——不管是阿拉还是耶稣——的律法引导之下，因宗教的皈依而和解成为信徒、兄弟姐妹，否则无法成全人类的需要及上帝的计划。

我们无法一般性地抽象地来讨论不同的认同是如何建构起来的、由谁建构起来的、以及它们的结果如何：因为它是与社会脉络有关的，正如柴列斯基（Zaretsky）所说的那样，“必须摆在历史情境之下”。<sup>③</sup>

因此，我们的讨论必须指涉到一个特别的脉络，也就是网络社会的崛起。在这个脉络下对照吉登斯（Giddens）的“晚期现代性”——一个我认为已经到了它终了的时代中——认同的特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认同的动力。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到了“历史的终结”，如同一些后现代狂言所标榜的那样。在吉登斯一些强而有力并且我也同意的论点里，他说，“自我认

① 杜罕（Touraine, 1995: 29 - 30）；作者的翻译。

② 杜罕（Touraine, 1992）。

③ 柴列斯基（Zaretsky, 1994: 198）。



同 (self-identity) 不是一个由个体所拥有的明确的特征。它是“一个人以其人生经历对自我所作的反思式的了解。”的确，“作为一个人就是要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以及为什么要做这事……在一个后传统秩序的脉络下，自我 (self) 变成一个反思性的计划 (reflexive project)。”<sup>①</sup>译注

“晚期现代主义”又是如何影响这个反思性的计划的呢？用吉登斯的话来说：

现代性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外向性及内向性这两端之间渐增的相互关联。一端是全球化的影响力，另一端是个人的性情……如果传统越来越失去它的控制力，那么日常生活在地地方与全球的辩证性互动下被重构的倾向就越来越强，而个人则越被迫使要在多样选项中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性进行交涉……具反思性、组织了的生活规划……成为结构自我认同的核心特征。<sup>②</sup>

我虽然同意吉登斯对“晚期现代性”的认同建构的理论特性，但是仍要指出——基于本书第一卷的分析——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得那个时期的认同建构遇到问题，因此引发了新的社会变迁的形式。这是因为对大部分个人及社会团体而言，网络社会是以地方及全球有系统的脱落 (disjunction) 为基础的。同时，我还要再补充一点，也是以权力与经验在不同时间-空间架构中的分离为基础的 (第一卷，第六、七章)。因此，除了那些身处在无时间的流动空间的全球网络及相辅的地域的精英们以外，反思性的生活规划 (reflexive life-planning) 成为不可能。而要建立以

① 吉登斯 (Giddens, 1991: 53, 35, 32)。

译注: reflexivity 可译为反身性、反思性, 一种深层的反省能力。

② 吉登斯 (Giddens, 1991: 1, 5)。

信任为基础的亲密性则需要对认同重新定义，这种认同是具有充分的自主性，而独立于支配性的机构与组织的网络逻辑之外。

在这种新条件之下，公民社会是萎缩且彼此失去连结的，因为在全球网络中权力产生的逻辑，以及特定社会文化中相互结合与再现的逻辑中，这两者之间不再是连续性的关系。于是意义的追寻便环绕着公社原则的重构防御性认同而产生。大部分的社会行动是在无法辨认的流动及隔绝的认同两者的对立之中被组织起来的。至于计划性认同，仍然会因为不同的社会状况而有可能浮现。但是，我所提的一个假设是，在社会变迁过程的核心主体的建构，它采取的是与在现代性与晚期现代性中不同的路径：也就是，一旦主体被建立的时候，它不再是以公民社会为基础，因为公民社会已经在解体之中，主体的建立是公社/公共/社区抵抗 (*communal resistance*) 的延长。在现代性之中（不管是早期还是晚期），计划性的认同是由公民社会所建构（如社会主义是以劳工运动为基础的例子），然而在网络社会中，如果计划性的认同终究能够发展起来，那么它就是从社区拒斥产生的。这就是在网络社会中认同政治新的要义。从拒斥转变为具备转化性的主体的过程、条件及结果正是信息时代里的社会变迁理论所处理的领域。

暂时性地交代了我的理论之后，如果又太快地继续作抽象理论的讨论而演变为书目式的评论的话，则是违反了本书的方法论原则。我将借着在网络社会中对于社会变迁过程有关的几个集体认同建构的关键过程，来准确地提出我的分析中的涵意。我将从回教和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出发，但这并不表示其他宗教（例如印度教、佛教、犹太教）比较不重要或比较没有原教旨主义的倾向。接着我要谈民族主义 (*nationalism*)，在对此议题有一点全览之后，将考虑两个非常不同但显著的过程：民族主义在苏联瓦解及后苏联的各共和国中的角色，以及卡泰隆民族主义 (*Catalan nationalism*) 的形成与再浮现。接





着我会回到族群认同 (ethnic identity), 以当前的非裔美国人 (African American) 的认同为焦点。且我将简短地以对领域认同 (territorial identity) 的思考, 基于我对全世界的都市运动及地方社区的观察来作为结束。我会对检验那些以社区拒斥为基础的当代各种认同 (再) 建构的主要探索路径进行整理。

## 第二节 上帝的天堂：宗教原教旨主义与文化认同

在宗教里找到慰藉及庇护是社会的基本属性, 而且我敢说是人类的本性, 如果有所谓的人类本性的话。害怕死亡, 生命的苦痛, 需要上帝及信仰上帝, 不管上帝所彰显的是什么, 都是为了让人们可以继续过下去。事实上, 如果没有我们, 上帝岂不无家可归。

宗教的基本教义派则是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我坚信, 这“不一样”是在网络社会里建构认同最重要的一个来源, 其理由希望下面的篇幅会渐渐清楚。至于其确实内容、经验、意见、历史及理论都是非常分散以致难以综合论述。幸运的是, 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了一个大型比较研究计划, 其目的在研究不同社会及制度脉络下的原教旨主义。<sup>①</sup> 从那里我们知道“基本教义派总是反应性的、反动的”,<sup>②</sup> 而且:

基本教义派是具选择性的。他们可能认为他们完全接受

① 玛第与爱波比 (Marty and Appleby, 1991)。

② 玛第 (Marty, 1988: 20)。

了纯粹的历史，但是他们会把能量用在那些能强化他们的认同、使他们的运动团结、在界限之外建立边界、并且把别人拒于千里之外……基本教义派为上帝而战——当他们是育神的宗教时——或者为一些超越性的符号而战。<sup>①</sup>

我相信，为了要更加精确，且为了与“原教旨主义观察”计划中收集的文献一致，我以自己的了解将原教旨主义定义为：由一个介于上帝及人类之间的特定权威所诠释的，按照上帝的律法准则，对个人行为和社会制度进行识别的集体认同的构建。因此，如玛第（Marty）所写的那样，“基本教义派不可能与任何信服不同权威的人讨论和解任何事，不论是圣经无误论或是教宗无谬说，还是伊斯兰教里的伊斯兰教法的（Shari'a）<sup>译注1</sup>规条或是犹太教的哈拉卡（halacha）<sup>译注2</sup>”。<sup>②</sup>

宗教的原教旨主义的存在当然有着与人类一般长的历史，但在千禧年结束之际，它作为认同的来源，其强大及具有的影响力则令人惊讶。为什么如此？我在本节对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的分析，将尝试提出一些线索，来理解形成我们这一时代最具有决定性的这些趋势。<sup>③</sup>

## 一 信徒团体与维希利亚（Jahiliya）：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加入现代性的唯一道路是经由我们的宗教、我们的历史

① 玛第与爱波比（Marty and Appleby, 1991: ix-x）。

译者注1：伊斯兰教法是涉及穆斯林生活一切方面的伊斯兰宗教法律。伊斯兰教法有四个来源：可兰经、圣训或圣行（即先知穆罕默德创教实践、会议或公议与舆论意见）以及类比。

译者注2：哈拉卡是犹太教塔木德和拉比著作中所包含的论题。讨论的内容是有关犹太社区中的宗教习俗及民事的律法。哈拉卡与哈加达（Haggadah）不同，后者与宗教律法无关。哈拉卡包含寓言、比喻、传奇和箴词。

② 玛第（Marty, 1988: 22）。

③ 另参考麦兹多及沙贝（Misztal and Shupe, 1992a）。



及我们的文明所为我们探索出来的途径。

——拉契·甘劳齐 (Rached Gannouchi)<sup>①</sup>

20 世纪 70 年代是硅谷信息科技革命诞生的日子及全球资本主义重构的起始点，而它对伊斯兰世界具有不同的意义：它标示了夏格利亚 (Hagia) 第 14 世纪的开始，一个伊斯兰复兴、纯化及强化的时代，如同其每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一样。事实上，从那时起的 20 年间一个真正的文化/宗教革命在伊斯兰的土地扩展开来，有时候获胜，例如在伊朗；有时候挫败，例如在埃及；有时候引发内战，例如在阿尔及利亚；有时候在全国的体制上得到承认，例如苏丹或孟加拉；大部分时候则是与既有的伊斯兰国家建立一个不安定的共存状态，完全整合进全球资本主义，例如沙特阿拉伯、印尼或摩洛哥。整体来说，大约 10 亿人口的文化认同及政治命运是在伊斯兰教城市的清真寺及行政区内被积极追求的，而这些地方目前却因急速的都市化而过度拥挤，以及因失败的现代化而解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一个被重构的认同以及同时作为一个政治计划，正处在一个最具决定性的过程的核心，而大规模地影响了世界的未来。<sup>②</sup>

但是，什么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呢？伊斯兰在阿拉伯文里意思是“顺服的国家”，而伊斯兰信徒意为“顺服阿拉”。因此，根据我上面所说的原教旨主义的定义的话，那么所有的伊斯兰教徒都是原教旨主义的：社会及其国家制度必须根据不打折的宗教原则来组织。然而，有一些知名的学者<sup>③</sup> 宣称虽然可兰经所说的

① 拉契·甘劳齐 (Rached gannouchi) 访问约拿·阿法拉齐 (Jenus Afrique), 1990 年 7 月。甘劳齐是突尼西亚伊斯兰运动的一位领导知识分子。

② 希洛 (Hiro, 1989); 巴塔 (Balta, 1991); 席斯克 (Sisk, 1992); 邱尔利 (Choucri, 1993); 约拿斯麦尔 (Juergensmayer, 1993); 戴卡麦洋 (Dekmejian, 1995)。

③ 例如，巴珊·提比 (Bassam Tibi, 1988, 1992a); 阿兹·阿兹曼 (Aziz Al-Azmeh, 1993); 可斯洛卡伐 (Farhad Khosrokhavar, 1995) 及其他人。

宗教原则适用于所有的伊斯兰教徒，但伊斯兰社会及制度也同时可以多样的脉络的诠释为基础。更进一步地，在大部分传统伊斯兰社会里所谓的宗教原则超越政治权威，仅仅是形式上的意义。事实上，伊斯兰教法（由可兰经和圣训 Hadiths）<sup>①</sup> 所组成的神圣律法）在古典阿拉伯文中是与动词伊斯兰教法（走向来源）相关联的。因此，对于大部分伊斯兰教教徒而言，伊斯兰教法不是一个死板不能改变的命令，而是在每一个历史与社会情境所必要的调适中如何走向真主的指引。<sup>②</sup> 相对于伊斯兰的开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意味着伊斯兰教法与对可兰经的阐述（fiqh）的融合或在伊斯兰教法的绝对支配之下，律法家与掌权者的诠释及应用。自然地，真正的意义取决于诠释的过程及谁来诠释。因此，在沙特国会（House of Saud）所代表的保守的原教旨主义及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马度迪（al - Mawdudi）或萨伊·奇多比（Sayyid Qutub）所宣扬的激进的原教旨主义之间有很大的差异。<sup>③</sup> 启发霍梅尼（Khomeini）的什叶派（Shia）传统及组成伊斯兰教大约 85% 的信仰的逊尼派（Sunni）<sup>④</sup> 传统，包括革命运动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解放阵线（Front Islamique de Salvation, FIS）或埃及的驱逐不信教者运动（Takfir wal - Hijrah），之间也有相当大的差异。然而在那些形成本世纪伊斯兰思想的作家，例如埃及的哈珊·巴那（Hassan al Banna）及萨伊·奇多比（Sayyid Qutub），印度的阿里·那达维（Ali al - Nadawi）或巴基斯坦的萨伊·阿布尔·马度迪（Sayyid Abul al - Mawdudi）的眼光里，伊斯

① 圣训，伊斯兰教源于先知穆罕默德或他的一位同伴关于各种问题的传述。这些言行录指导穆斯林生活的各个方面，训是由他们传下来并加以确认的。——译者注。

② 葛拉地（Garaudy, 1990）。

③ 卡利（Carre, 1984）；邱尔利（Choucri, 1993）。

④ 伊斯兰教一派，代表伊斯兰教的正统。——译者注。



兰的历史正是表现了国家长期对宗教的屈从。<sup>①</sup> 对一位伊斯兰教徒而言，最基本的根基不是故乡（watan），而是信徒团体（umma），所有的人都因为对阿拉的顺服而平等。这种宇宙性的四海一家情谊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制度，而民族国家被视为是信徒之间分裂的根源。<sup>②</sup> 为了让信徒团体长存、扩张直到充满全人类，有一个属神的使命必须完成：必须承担且不断更新对维希利亚（Jahiliya）的战斗（所谓的维希利亚是一种无视上主或对上主的教诲不加注意的状态），而目前社会又再度陷入维希利亚。为了人性的再生，必须先伊斯兰教社会里将世俗化及脱离对上主律法的严格遵守予以伊斯兰化，然后再及于全世界。这个过程必须从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组织了团体以后而模式化的（正直的道路）（al-sirat al-mustaqin）的灵性重生来开始。但是，为了胜过不敬虔的势力，或许需要经由为伊斯兰而战（Jihad）来对抗异教徒，其中极端的情况可能包括重开圣战。在什叶的传统，殉教仿效公元681年艾曼·阿里（Imam Ali）的牺牲是宗教敬虔的核心。但整个伊斯兰都赞扬因上主的呼召（al-da'wah）所必要的牺牲。例如1949年被刺身亡的伊斯兰教兄弟盟（Muslim Brotherhood）的创始者及领导者哈珊·巴那（Hassan al Banna）曾经说过：“可兰经是我们的宪法，先知（穆罕默德）是我们的导师；为了阿拉的荣耀而死是我们最大的企图。”<sup>③</sup> 所有人类行动的目标必须是在全人类中建立上主的律法，终结当前伊斯兰教世界与非伊斯兰教世界之间的对立。

在这个文化/宗教/政治架构中，伊斯兰认同的建构是建基于社会行动者及社会制度的双重建构。

---

① 希洛（Hiro, 1989）；阿兹曼（Al-Azmeh, 1993）；邱尔利（Choueri, 1993）；戴卡麦洋（Dekmejian, 1995）。

② 奥姆里（Oumlil, 1992）。

③ 引自希洛（Hiro, 1989: 63）。

社会行动者必须将自己的主体性解构，不管是个人，还是一个种族团体的成员，亦或是一个国家的公民。除此之外，妇女必须顺服于守护他们的男人，因为她们被鼓励将自我实现只限定于家庭的范围内：“男人是女人的保护者及维护者，因为真主只给男人比女人更多（的力量），而且他们会为了她们的福祉来支持她们。”<sup>①</sup> 比如巴珊·提比（Bassam Tibi）写道：“哈伯玛斯的主体性原则对伊斯兰基本教义派而言是异端”。<sup>②</sup> 只有在信徒团体（umma）中，作为信徒盟友的一份子，在这个基本上平等的体制中提供每个人相互支持、团结及分享的意义，个人才可以完全地成为自己。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必须否定自己的认同；建基于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al-dawla islamiyya）优先于民族国家（al-dawla qawmiyya），这个命题在中东国家特别有效，正如提比所说的那样：“这个地区中，民族国家是外来的而且事实上是强加的……世俗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在中东不仅是新奇的事物，而且一直都只在这些社会的表面层次。”<sup>③</sup>

然而，很重要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不是传统主义者的运动。伊斯兰主义者所追求的、为了社会抵抗及政治反叛而将伊斯兰认同的释义根植于历史与经典，进而重建文化认同的种种努力，事实上是高度现代性的（hypermodern）。<sup>④</sup> 如同阿尔兹曼（Al-Azme）所写的那样：“将神圣者政治化，将政治神圣化，以及将伊斯兰的伪立法性的制度转化为社会奉献，都是为了实现真实自我、一种认同政治的方法，因此也是作为形成、开创这个

① 可兰经，第四章第三十四卷（由阿布拉·约色夫·阿里 Abdullah Yusuf Ali 翻译，1988）。参见希洛（Hero, 1989: 202）；戴可洛伊斯（Delcroix, 1995）；盖拉米（Gerami, 1996）。

② 提比（Tibi, 1992b: 8）

③ 提比（Tibi, 1992b: 5）

④ 高尔（Gole, 1995）。



认同的工具。<sup>①</sup>

但是如果伊斯兰主义 [虽然根据 19 世纪伊斯兰改革者及复兴者如阿发甘尼 (al-Afgani) 的作品所说] 只是一个暂时的认同, 那么为什么在此时发生? 为什么在后殖民地时代反复地被国家主义压制之后, 如埃及与叙利亚对伊斯兰教兄弟 (Muslim Brothers) (包括对奇多比的行刑), 印尼苏加诺 (Sukarno) 的兴起及阿尔及利亚的国家解放前线 (Front de Liberation Nationale), 在过去 20 年又出现爆炸性的发展?<sup>②</sup>

对提比而言, “中东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出现与伊斯兰世界这块区域的展露是相关的。伊斯兰在此视自己为一个集体性的实体, 以面对全球化的过程、面对国家主义以及民族国家作为全球性的组织原则”。<sup>③</sup>

的确, 伊斯兰运动的爆发似乎与传统社会的毁坏 (包括教阶传统权力的瓦解) 相关, 又与国家主义运动者所创造的民族国家无法实现现代化, 如发展经济及/或分配经济增长的利益给普遍的人民这一点相关。因此, 伊斯兰认同是由基本教义派所建 (重) 构, 用以对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阿拉伯或其他事物, 在他们的眼中, 这些都是后殖民时代里失败的意识形态。

一个重要的相关事例是伊朗。<sup>④</sup> 1963 年由当时的国王沙 (Shah) 所发动的白色革命是一个受美国支持、并有意要与新全球资本主义联结、将经济及社会加以现代化的最具有企图心的计

① 阿尔兹曼 (Al-Azmeh, 1993: 31)。

② 比司卡洛里 (Piscatori, 1986); 摩恩与高斯塔夫森 (Moen and Gustafson, 1992); 提比 (Tibi, 1992a); 包嘉特与杜威尔 (Bugat and Dowell, 1993); 杰根思迈尔 (Juergensmayer, 1993); 达可曼纪安 (Dekmejian, 1995)。

③ 提比 (Tibi, 1992b: 7)。

④ 希洛 (Hiro, 1969); 巴哈什 (Bakhash, 1990); 爱思波西多 (Esposito, 1991); 科索洛哈维 (Khorstokhavar, 1995)。

划。然而此计划的进行瓦解了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从农业到历法。事实上，沙与当时的宗教领袖之间主要的冲突就是关于时间的控制。在1976年4月24日沙将伊斯兰历法改为前伊斯兰的阿基米亚（Achemenian）朝代的历法。当霍梅尼于1979年2月1日到达德黑兰领导革命时，他是以太玛那克斯多（Imam Necostc），也就是时间之主（wali al-zaman）的代表身份来强调宗教原则的重要。伊斯兰革命同时反对王朝制度（霍梅尼：“伊斯兰根本地反对王朝制度”）；<sup>①</sup> 民族国家（新伊朗宪法第十条：“所有的伊斯兰教徒组成一个国家”）；及代表西方化的现代化（伊朗宪法第43条强调：“禁止任何与经济有关的浮滥浪费，包括消费、投资、生产分配及服务”）。限制宗教领袖的权力成为沙的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这可以解释为是在伊斯兰教法与社会之间作一些折衷。1980年伊拉克的进攻及随后凶残的战争以后，伊斯兰政权的激进化导致了社会的肃清及设立一些宗教法庭来压迫不敬虔的行为，例如“淫乱、同性恋、赌博、对无神论者及伪善者同情以及背叛等。”<sup>②</sup> 这导致了不同情况下的成千人的下狱、鞭刑及行刑。一个个的恐怖行动，特别是针对左派批评家及马克思主义游击队，成为伊朗的原教旨主义的结果。

原教旨主义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呢？在伊朗，当其他革命武力参与长期、艰苦的动员以对抗巴勒维的血腥独裁时，神职人员是领导者，而寺庙是组织群众反叛的革命委员会的根据地。至于社会行动者，尤其是学生、知识分子、小商家及工匠们，运动的力量在德黑兰及其他大城市里。当运动转向街头时，则有农业现代化之后被驱离自己的村落、聚居于德黑兰外围蔓延的城镇中的大批城乡移民加入。

根据一些零散的文件，在阿尔及利亚及突尼斯的伊斯兰教徒

① 希洛（Hiro, 1989: 161）。

② 媒体报道的官方文件，引自希洛（Hiro, 1989: 190）。





似乎有类似的社会轮廓：对伊斯兰解放阵线（FIS）的支持源于一群异质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和低级公仆以及一些小商人和工匠。然而，这些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运动也有同样的农村移民的社会根源。例如，一个突尼斯的调查发现：战斗分子中有48%的父亲是文盲，他们在70年代从贫穷的农村地区移民到城市。战斗分子本身则很年轻：在突尼斯，1987年72位受审判死刑的战斗分子的平均年龄是32岁。<sup>①</sup>在埃及，伊斯兰主义在大学生中占重要位置（大部分学生会自80年代中期起就接受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领导），并且受到政府雇员（特别是教师）的支持，在军警部门的影响力渐增。<sup>②</sup>

激进的原教旨主义的根源似乎是源自以下两者的结合：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政府领导的现代化的成功，及70年代、80年代大部分伊斯兰教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失败，因为它们的经济无法适应后来新的全球竞争及科技革命。于是一群在第一波现代化下产生的高教育程度及都市化的年轻人，当经济衰退且新的文化依赖形成时，对于原有的期望落空而感到挫折。这些不满的年轻人结合了因农业不平衡的现代化而被逐出乡村的穷困群众。这个社会混合体因为民族国家的危机——公务员及军人生活水平下降且对民族主义的计划失去信心——而变得具有爆炸性。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是因为其广泛的腐败、无效率、依赖外国势力及在中东不断地受以色列军事的侮辱及后来的锡安主义敌人的落脚。当代伊斯兰认同的建构是因反对那达不到的现代化（管它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全球化的邪恶结果及后殖民时代的民族主义方案的崩溃。这就是为什么在伊斯兰教世界原教旨主义的发展要视个别民族国家的能量而定的原因，这些能量指的是或是经由经济福利而将都市大众、或是在国家的支持之下经由宗教力量将神职

① 资料根据波盖特与杜威尔的报告（Burgat and Dowell, 1993）。

② 希洛（Hiro, 1989）；戴卡麦洋（Dekmejian, 1995）。

人员整合进入它的计划之中，如同当时的乌玛雅（Ummayyad）国王和奥图曼帝国。<sup>①</sup> 因此，当沙特阿拉伯是形式上的伊斯兰王国，宗教领袖领的是沙特国会（the House of Saud）的薪水，却很成功地同时守卫着宗教神圣的一面及西方的油源。印尼与马来西亚似乎能借着确保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其属民一些正面的展望，而在威权式的民族国家中将伊斯兰主义者的压力整合进来，虽然在印尼的城市中有一些社会紧张正在升高着。在另一方面，埃及、阿尔及利亚及突尼斯这些最西方化的伊斯兰教国家的民族主义计划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大部分崩溃，因而引发了由温和的伊斯兰兄弟盟（Muslim Brotherhood）、激进派（Jama' ah al-Islamiyya），或民主-激进派（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解放阵线，FIS）<sup>②</sup> 等不同路线的伊斯兰主义者所带动的社会紧张。在 20 世纪 90 年代，哈马斯组织挑战阿拉法特所领导与以色列合作的巴勒斯坦国家原型，可能建构出一个阿拉伯国家主义（巴勒斯坦运动为其缩影）与激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间最严重的分裂。

当伊斯兰主义者的选举胜利被军事镇压所否定，例如 1991 年 12 月的阿尔及利亚，广泛的暴动和内战就爆发了。<sup>③</sup> 即使在最西方化的伊斯兰教国家土耳其，当 1995 年的选举伊斯兰主义者靠着激进的知识分子及都市贫民的选票成为国家的第一大政治力量、并在 1996 年组织政府时，基马尔·阿图特客（Kemal Ataturk）的世俗的、民族主义的传承也遭到历史性的挑战。

政治性的伊斯兰主义及伊斯兰基本教义派认同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各种社会及制度脉络下，似乎都正在扩张之中，且总是与社会排除及/或者与民族国家的危机有所关联。因此，在法国有

① 贝他（Balta, 1991）。

② 西司克（Sisk, 1992）。

③ 耐尔（Nair, 1996）。



莫瑞比亚背景的青年、在德国出生的土耳其青年、英国的巴基斯坦人或者非裔美国人，这些抱着不满的年轻人所遭遇的社会隔离、歧视及失业引发了他们的新伊斯兰认同，而以一种激进伊斯兰主义的激进转化进入这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受排除的地区里。<sup>①</sup> 另一方面，苏联国家的瓦解触发了高加索及中亚地区的伊斯兰运动的浮现，甚至在俄罗斯有伊斯兰复兴党的组成，威胁要将以前在阿富汗和伊朗所害怕的伊斯兰革命的扩散实现在前苏联诸共和国之中。<sup>②</sup>

按照各国的国情及其经济与全球连结的情形，一个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计划已经经由不同的政治过程在所有的伊斯兰教社会中及非伊斯兰教社会里的伊斯兰教少数族群中浮现。一个新的认同已经被建构，它不是靠着回到传统，而是靠着运用传统的材料形成一个新的属于神的、共同体的世界，在那里被剥削的大众及不满的知识分子可以在一个全球性的替选案中重新建构一个不同于排除性的全球计划。<sup>③</sup> 更进一步，如同柯斯洛卡瓦尔（Khosrokhavar）所写的那样：

当将每一个人纳入以便完全参与现代的计划，在每天生活的实际经验中显示出它的荒谬性之后，暴力成为这些新主体惟一藉以自我肯定的形式……新的社区成为死的社区。被现代性排除采取了一个宗教性的意义：因此，自我牺牲成为排除战斗的方法<sup>④</sup>。

经由对排除的否定，甚至以极端的自我牺牲的形式，一个新

---

① 刘克（Luecke, 1993）；开倍尔（Kepel, 1995）。

② 米高斯基（Mikulsky, 1992）。

③ 提比（Tibi, 1992a, b）；高尔（Gole, 1995）。

④ 柯斯洛卡瓦尔（Khosrokhavar, 1995: 249-250）。

的伊斯兰认同在建构信徒社区的历史过程中浮现，即为真正信徒所预备的公社天堂。

## 二 上帝拯救我！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

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电子的黑暗时期，新的异教徒在其中成群游荡，他们具备着操控科技的所有权力，濒临要毁去文明人性的最后据点。死亡的景象摆在我们面前。当我们离开西方基督教的岸边，在面前的就是黑暗与汹涌无边的绝望之海……除非我们战斗！

——法兰克斯西·谢夫（Francis Schaeffer）《愤怒之声（Time for Anger）》<sup>①</sup>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是美国历史中长期的现象，从革命后的联邦主义者提玛斯·戴特（Timothy Dwight）和耶迪达·莫斯（Jedidiah Morse）的思想，经过1900年的复兴派如提玛斯·慕迪（Timothy Moody）及70年代由卢骚·罗西杜尼（Rousass J. Rushdoony）所激发的重建派，到前千禧年终末派的派特·罗伯森（Pat Robertson）等。<sup>②</sup> 一个社会处于残酷地社会变迁及个人流动的最前线的时候必然会常常怀疑现代化及世俗化的价值，渴望根源于上帝的永恒真理的传统价值与体制。的确，“原教旨主义”这个源于美国而现在被全世界广泛使用的名词，原是指在本世纪（20世纪）初，由两位生意人基督教弟兄私下在1910~1914年5年之间所印行、收录了由保守的福音派神学家编辑、并命名为《基本》（The Fundamentals）的10册圣经文摘。虽然基本教义派

① 谢夫（Schaeffer, 1982: 122）。法兰西斯·谢夫是当代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主要精神领袖之一。他的基督教宣言（Christian Manifesto）在1981年他死后不久出版，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反堕胎运动最有影响力的小册子。

② 马斯丹（Marsden, 1980）；阿玛曼（Ammernan, 1987）；麦兹多与沙贝（Miztal and Shupe, 1992b）；威尔可斯（Wilcox, 1992）



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不同，它倒是从来没有完全褪去。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它显然是汹涌而起了。当法威尔 (Jerry Falwell) 的“道德的多数人” (Moral Majority) 在 1989 年解散，使得有些观察家认为原教旨主义衰退了 [与这现象同时产生的是，原教旨主义的主要对抗对象——共产主义撒旦 (Communist Satan) 的结束，与后者的对立是原教旨主义者主要的合法性及募款来源]，结果很快地就清楚了，它其实是一个组织及政治计划的危机，而不是原教旨主义认同的危机。<sup>①</sup> 在 90 年代，克林顿 1992 年总统选举胜利之初，原教旨主义站到政治舞台的台前，这次是以派特·罗伯森的基督教联盟 (Christian Coalition) 为名，号称有 150 万名成员，在共和党的选民中产生了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并且，原教旨主义思想和世界观似乎在世纪末的美国得到很大回响。例如，根据盖洛普 1979 年的一个全国样本的调查，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声称他们有过宗教皈依的经验；其中将近一半的人认为圣经是无谬误的；且超过 80% 的人认为耶稣基督是具神性的。<sup>②</sup>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美国一向是而且将会一直是非常宗教性的社会，更甚于西欧或日本。但这种宗教心态似乎越来越有复兴主义的味道，走向强劲的基本教义派潮流。根据辛普森 (Simpson) 的说法：

原教旨主义在起初是一套基督教的信仰与经验，包括了：(1) 接受圣经字义完全的启示及其无误；(2) 靠着基督的死与复活的赎罪功效，个人可以因为接受基督作为个人的救主 (得到重生)；(3) 期望基督在千禧年到来之前会从天而降回到地上；(4) 认同基督新教的正统教义，如童贞女生

① 洛顿 (Lawton, 1989)；矛恩 (Moen, 1992)；威尔克斯 (Wilcox, 1992)。

② 来恩纳西 (Lienesch, 1993: 1)。

子及三位一体等。<sup>①</sup>

但是，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是一个广泛且多样的潮流，所以无法以简单的定义就区分如五旬节教派或灵恩福音派、前千禧年或后千禧年、敬虔派与行动派等。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倚靠麦可·来恩纳西（Michael Lienesch）对美国基本教义派的作品所作的杰出、记录完整又具有学术性的整理。根据他的资料及其他的肯定及支持他的论点的资料来源，我将尝试重新建构基督教基本教义认同的特征。<sup>②</sup>

如同来恩纳西所写的那样，“基督教保守派思想的中心是皈依的概念，就是靠信仰及赦免，让罪人从罪中进入永远的救赎的动作。”<sup>③</sup> 经由这个个人重生的经验，整个人就被重新建构，那么它就变成一个“不仅是建构自主性与认同，同时也是社会秩序与政治目的的起始点。”<sup>④</sup> 个人意义及社会之间的联结是经由家庭——这个社会的中心制度——的重建，家庭曾经是人们在与艰困、敌意的世界对抗中的避难所，如今却在我们的社会中面临瓦解。这个“基督徒生活的城堡”必须经由强化父权思想而重构，也就是婚姻的神圣化（排除离婚及不贞），并且最重要的，主张男人高于女人的权威（如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及以弗所书五章22～23节所记载）及小孩子必须对大人绝对顺服，必要的话可施巴掌以使其就范。因为小孩是生来就有罪的：“父母亲如果认识到他的孩子天生就会趋向邪恶，会对为人父母的比较有帮助。”<sup>⑤</sup>

① 辛普森（Simpson, 1992: 26）。

② 柴斯金（Zeskind, 1986）；耶伦（Jelen, 1989, 1991）；拜洛与谢普（Barron and Shupe, 1992）；来恩纳西（Lienesch, 1993）；理斯布洛德（Riesebrodt, 1993）；西科司（Hecks, 1994）。

③ 来恩纳西（Lienesch, 1993: 23）。

④ 来恩纳西（Lienesch, 1993: 23）。

⑤ 贝维利·黑（Beverly Hayle），引自来恩纳西（Lienesch, 1993: 78）。



因此，家庭必须要教育孩子敬畏上帝及尊重父母亲的权威，并且要全力支持在学校里的基督教教育。在这种看法之下，顺理成章地，公立学校就成为正与邪、基督教家庭及世俗体制交战的场所。

对于那些敢于为这些原则站出来并选择上帝的计划、放弃个人不完美的计划的人，会有丰富的世俗的报酬等着他们。首先，在婚姻里会有很好的性生活。畅销书作者提姆（Tim）及贝维利·黑（Beverly La Haye）宣称他们的性生活手册是“完全合乎圣经且非常实用的，”<sup>①</sup> 并且利用图示说明，所有性行为的乐趣只要是经过生殖的圣化，与生殖有关的，就完全合乎基督教教义。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可以再度成为男人：男人应该看起来且行动像个男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这是另一个基督教传统：“耶稣不是被女性化的。”<sup>②</sup> 的确，将男性具侵略性的性特质导入在完满的婚姻中对子社会是必要的，这同时是为了控制暴力，以及为了它是“新教工作伦理”，即经济生产力的来源。在这个观点下，性的升华是文明的基础。对于女性而言，她们是在生理上就被决定为当母亲的，且以其感性作为理性的男人的补充 [如菲礼斯·谢勒福来（Phyllis Schlafly）所言]。她们的奉献会帮助她们达到自我满足。女人确认自己独立于男人的身份是经由她们的牺牲。因此，就如贝维利·黑写的那样，“不要害怕付出、付出、再付出。”<sup>③</sup> 其结果会是家庭得到拯救，家庭是“所有社会立足的基础，也就是小小的利益共同体。”<sup>④</sup>

只要基督徒严谨地研读圣经，且以稳定的父权家庭作为生活的基础，就会有得救的确信。而他的事业也会良好，只要政府不

① 引自来恩纳西（Lienesch, 1993: 56）。

② 来恩纳西（Lienesch, 1993: 77）。

③ 贝维利·黑（Beverly Hayle），引自来恩纳西（Lienesch, 1993: 63）。

④ 来恩纳西（Lienesch, 1993: 77）。

介入经济、不要去管那些不值得管的穷人，并将税率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约收入的10%）。事实上，基督教基本教义派似乎不会被道德上的神治及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两者之间的冲突所困扰。<sup>①</sup>更甚者，上帝会帮助虔诚的基督徒的事业：因为他毕竟要供给家庭之所需。派特·罗伯森这一位基督徒联盟的领导者、著名的电视布道家，以自己的例子提供了活生生的见证。在他皈依之后，凭着重生的自信，他开始了他的事业：“上帝派我来买下你的电视台，”他同时根据“上帝的估算”提出了一个数字：“上帝说：‘不可以超过250万美元’。”<sup>②</sup>结果这是一笔非常不错的交易，派特·罗伯森每周在他的“700俱乐部”电视节目感谢上帝。

但是基督教的道理没有办法单独地实现，因为社会制度特别是政府、媒体及公立学校系统是被不同来历的人文主义者所控制。不同的版本的原教旨主义者，总认为这些人文主义者是与共产党、银行家、异教徒或犹太人有着关联的。最奸诈危险的是女性主义者和同性恋者，因为他们会瓦解家庭，而家庭是社会安定、基督徒生活及个人实现的主要来源（菲礼斯·谢勒福来称之为“疾病招来了女性的解放”）。<sup>③</sup>对抗堕胎的战争将所有保存家庭、生命、基督教义以及连结其他的基督教信念的战斗加以象征化了。这就是为什么支持生命（pro-life）运动在美国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最具战斗气息且最有影响力的表现。

战斗必须加紧，且与政治体制必要的政治妥协必须尽早达成，因为时间短促。“终结的时代”正在逼近，我们必须悔改，清洁我们的社会，为耶稣基督的再临作准备。他的再临将带来新的纪元，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的千禧年。但是还有一

① 西克斯（Hicks, 1994）。

② 派特·罗伯森（Pat Robertson）所言，引自来恩纳西（Lienesch, 1993: 40）。

③ 引自来恩纳西（Lienesch, 1993: 71）。





场险恶的审判日的战争（Armageddon）要打，这一战争从中东起延伸到全世界。以色列及新以色列（美国）将终于胜过他们的敌人，但是代价惊人，最后仅倚靠我们社会的再生能力。这是为什么社会的转换（经由基层基督徒政治）及个人的重生（经由敬虔的、家庭生活）是必要的而且互补的。

谁是当代的美国基本教义派？克来地·威尔克斯（Clyde Wilcox）提供了1988年一些福音派相对于全体人口的人口统计上有趣的数据。<sup>①</sup>以教条式的福音派而言，看来他们似乎是教育程度较低、较穷、对家庭主妇比较有影响力，较多居住在南方，明显地更富宗教性，且100%地认为圣经无谬误（相对于全体人口仅有27%的人口认为如此）。根据其他的资料来源，<sup>②</sup>最近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在新南方、西南部及南加州的城郊地区，在新移民到这些快速扩张的都会城郊的中低阶级，服务业劳工之中发展得特别强盛。这使得来恩纳西假定他们可能是代表了“第一代现代化了的传统人民，他们是在俗世都市社会中保有乡村价值的新城乡移民。”<sup>③</sup>然而，显然的，为何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会如此昌盛，价值、信仰及政治立场要比人口、职业以及居住地的特色要来得重要，在检视过这件事上所能得到的基本证据之后，威尔克斯得出如下结论：“资料显示，预测基督教右派的最佳指标是宗教认同、教义、行为、往来团体及政治信仰等”。<sup>④</sup>原教旨主义看起来不是一个阶级利益的理性化过程或是地域性的立场。它比较是为了守护道德及基督教价值的政治过程而发挥作用的。<sup>⑤</sup>它如同历史中大部分的原教旨主义一样，是一个反动的运动，目的是以昔日的意象为基础，并将它们投射到乌托邦式的未来，以建

---

① 威尔克斯（Wilcox, 1992）。

② 引自来恩纳西（Lienesch, 1993）。

③ 来恩纳西（Lienesch 1993: 10）。

④ 威尔克斯（Wilcox, 1992: 223）。

⑤ 耶伦（Jelen 1991）。

构社会及个人的认同，为的是克服难以承受的当前时代。

但是，是对什么的反动呢？难以承受的是什么东西呢？有两件事物似乎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最直接的根源：即是全球化的威胁及父权主义的危机。

如同米兹多（Misztal）及苏普（Shupe）所写的那样，“全球化的动力辩证地提升了原教旨主义的动力”。<sup>①</sup> 来恩纳西更进一步地具体论证了这种辩证性的原因：

在全球化过程中，作为全球性的事实是，各社会已经更加制度化。社会作为组织，他们以世俗的方式运作；它们之间的关系依循的是世俗的规则；几乎没有任何宗教传统对于这些世界上各种社会的当前形式还有任何明显的影响……从更宗教性的传统的标准来看，制度化的结社主义（societalism）等于是偶像崇拜。但这也意味着社会中的生活成为传统宗教的挑战……正因为全球秩序是一个制度化了的规范性秩序，因此想要寻找一个“终极”的基础、一种超越这个世界的真实，靠着与它的关系，世界可以更清楚地被界定，这种想法似乎是可以理解的。<sup>②</sup>

更进一步，相较于过去共产主义的威胁提供了将“美国政府的利益”、“基督教”及“美国作为被捡选的国度”三者之间相互等同的基础，苏联的瓦解及全球新秩序的浮现便产生了对于美国命运控制之不确定的威胁。20世纪90年代美国基督教基本教义派重新浮现的主题是反对国家由一个取代了美国联邦政府的“世界政府”的控制。这个世界政府是由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所推动。在一些末世论的作品

① 米兹多与苏普（Misztal and Shupe, 1992a: 8）。

② 来恩纳西（Lechner, 1991: 276-277）。



里，这个新的“世界政府”被指为反基督的，而其象征，包括微晶片是宣告“时代的末了”的恶兽的印记。基督教基本教义派认同的建构似乎是在尝试重新控制生活及国家，以因应那在经济及媒体中感受到无法控制的全球化的过程。

然而，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基督教基本教义派最主要的来源可能是对父权主义面临的挑战的反应，包括从60年代起的反叛，以及妇女的、与男女同性恋者运动中所表达出的。<sup>①</sup>而且，这场战役不只是意识形态的。根据各种指标如离婚、分居、家庭暴力、非婚生子女、晚婚、母职范围的缩小、单身生活、同性配偶以及对父权的普遍排除等，美国的父权家庭的确处于危机之中（见第四章）。男性为了保卫其特权而有明显的反动，这种特权在他们作为惟一的养家者的角色衰退，而瓦解了父权主义的物质及意识形态的基础之后，只能诉诸于神授的正当性。但是还有一些男人、女人及小孩所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对于不可知事物的深刻恐惧，特别是当那不可知是涉及个人每天生活的基础时，恐惧尤为厉害。无法在世俗的父权主义下生活，但又惧于疯狂竞争的个人主义社会中的孤寂以及不确定感，那么家庭同时作为神话也是真实，便成为惟一安全的天堂，许多男女与小孩祈求上帝带他们回到纯真的状态，让他们可以在上帝的治理之下满足于恩宠的父权主义。而且他们因为在一起祷告，所以可以再生活在一起。这是为什么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是特别带有美国文化的印记，包括以其家庭式的个人主义、务实主义，个人与上帝及上帝的计划的关系作为解决个人在越来越无法预测及控制的生活中的问题的方法。仿佛基本教义派的祈求者要以罪人的悔改和基督徒的见证来求得上帝的怜悯，以重建那失落了的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

<sup>①</sup> 蓝白德·班德洛斯 (Lambert - Bendroth, 1993)。

### 第三节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意象化的社群还是社区的意象？

只有当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恢复记忆，我们才能够、我们和他们才能不再作为民族主义者。

——罗伯·迪·维多 (Roubert de Ventos) 《民族主义》  
(Nacionalismos)<sup>①</sup>

全球化时代也是民族主义者复苏的时代，表现在对既有的民族国家的挑战及各地以民族性为基础的认同（重）建构，它总是声称反对外来者。在民族主义已经因为三重的死亡而消寂时，这个历史潮流出乎许多观察者的意料之外。这个三重的死亡指的是：经济的全球化及政治体制的国际化；由电子媒体、教育、文字、都市化及现代化所扩散的文化的寰宇主义；学者对民族这个概念的攻击，温和的反民族主义理论称其为“想像的共同体”<sup>②</sup>，盖那 (Gellner) 的强力批判则称其为精英在他们所主宰的民族主义运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所兴起的“粗暴的历史发明”。<sup>③</sup>的确，对盖那而言，“民族主义仅仅就是一些部落主义的集合，或者是任何那一类性质的团体，经由运气、努力或环境在现代的环境下成功地成为一个有效率的力量团体。”<sup>④</sup> 成功对盖那及霍布斯邦 (Hobsbawm) 而言指的是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政权。

① 罗伯·迪·维多 (Roubert de Ventos, 1994: 241)。

② 安德森 (Anderson, 1983)。

③ 盖那 (Gellner, 1983: 56)。

④ 盖那 (Gellner, 1983: 87)。



因此，在这个观点之下，民族主义运动作为一些精英分子合理化其利益的工具，发明了民族认同，如果成功的话是被民族国家所供奉并经由对其子民的宣导来扩散，直到“民族主义者”随时可以为他们的民族赴死的地步。霍布斯邦的确接受由下而上浮现的民族主义的历史证据（从共同的语言、领域、种族、宗教及历史政治的属性），但他将其标示为“民族主义原型”，因为只有民族国家（nation-state）建立起来了，民族（nations）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才存在，不管是作为这种民族国家的表现或者是为了未来的民族而对其挑战。民族主义在这个世代末期的爆发与现有民族国家的弱化有紧密关联，然而它与法国大革命以后大多数国家作为一种建国方式所操作的——吸收了民族与民族主义而促成并强化了民族国家——的理论模式并不能完全相合。不过，对霍布斯邦而言，这个明显的复兴事实上是1918~1921年之间欧洲领土重构时<sup>①</sup>，国家未解决的问题的历史性结果。<sup>②</sup>然而，如同大卫·胡森（David Hooson）在他所编的全球性调查《地理学及民族认同》（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中所写的那样：

20世纪的后半段将会成为民族主义高涨及扩散的时代。它有着比同样是这个世纪的特色、那些可怕的、但现在已经被罢黜的暴政还要更持久的本质……这种要表达自己的认同且被别人确切地加以认可的急迫感有着越来越强的感染力。我们必须认知到它是20世纪末距离缩短、看起来越来越同质的高科技世界中的基本驱动力。<sup>③</sup>

---

① 霍布斯邦（Hobsbawm, 1992）。

② 霍布斯邦（Hobsbawm, 1992: 173-202）。

③ 胡森（Hooson, 1994b: 2-3）。

同时，如艾理（Eley）与珊尼（Suny）在他们最有启发性的读本《成为国家》（Becoming National）一书的导论中所写的那样：

强调主体性和意识是否排除了民族性存在的“客观”基础？显然，如此激进的主体主义者的观点是荒谬的。大部分成功的民族主义假设了先前一些领土性、语言的或文化的社区，为知识分子的民族计划提供了原料。但是这些先前的社区不能被“自然化”，好像它们一直都是基本的存在，或者说它们预先框架了未来的历史……文化更常不是人们所已经共享的，而是他们选择要为之奋战的。<sup>①</sup>

从我的观点来看，有些社会理论和当前的实践之不一致的原因在于民族主义和民族都有其自主的生命，虽然它们根源于文化建构及政治计划，但他们是独立于国家职能（statehood）的。不管那有影响力的“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的说法有多么诱人，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太过表象，就是从经验的观点来说是不足的。说它太过表象，指的是比如如果你对一个社会学家说，所有的感情归属感、所有的图像崇拜都是文化的建构。对这种状况而言，民族不是例外。“真实的”与“想像的”共同体之间的对立，除了将米歇雷（Michelet）的本质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解神秘化这一点值得称许之外，并没有什么分析性的用途。但是如果这一个陈述的意思是如盖那的理论所显示的，民族纯粹是意识形态的构造物，被知识分子为了社会及经济精英的利益而任意操弄历史的迷思所建构出来的，则历史的纪录似乎又与这样过度

<sup>①</sup> 艾理与珊尼（Eley and Suny, 1996: 9）。



的解构主义不一致。<sup>①</sup> 要知道，种族、宗教、语言及领土，这些事物本身并不足以建立民族以及引致民族主义。共享的经验则可以：例如美国和日本的民族认同都很强，而且它们大部分的国民都感受到而且表达了很强烈的爱国情操。但是日本是地球上种族同质性最高的国家之一，而美国则是种族异质性最高的国家之一。但这两国之内都有共享的历史和共享的方案，他们的历史编写虽然是建立在一个社会、种族、领土及性别都不同的经验之上，但两国的人民却在其他许多方面都有共通的经验。其他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没有达到现代民族国家的程度（例如苏格兰、加泰隆尼亚、魁北克、库德斯坦、巴勒斯坦等），但它们展现出——有的已有几世纪之久——强烈的文化/领域认同，这种认同的表现是一个民族的特征。

因此，当我们从民族主义的社会理论来讨论当代民族主义时，必须强调四个主要的分析观点。第一，当代民族主义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被导向建立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因此，民族（nations）在历史上及分析上都是与国家（state）不同的实体。<sup>②</sup> 其次，民族与民族国家并不限于法国大革命以后 200 年内在欧洲所建立的那种现代民族国家。当前的政治经验似乎否定了以民族主义只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那个年代有联结的想法，亦即认为它在 19 世纪达到高潮，在 20 世纪中叶非殖民化过程中借着将西方民族国家进口到第三世界而复制。<sup>③</sup> 强调这个现在很流行的观

---

① 摩斯尔（Moser, 1985）；史密斯（Smith, 1986）；强森等（Johnston et al., 1988）；杜罕（Touraine, 1988）；普来斯·阿果特（Perez - Argote, 1989）；察特吉（Chatterjee, 1993）；布来斯·盖列罗（Blas Guerrero, 1994）；胡森（Hooson, 1994b）；罗伯迪·维多（Rubert de Ventos, 1994）；艾理与珊尼（Eley and Suny, 1996）。

② 奇登（Kearing 1995）。

③ 巴弟（Badie, 1992）。

点，只是如察特吉（Chatterjee）所说的欧洲中心主义罢了。<sup>①</sup> 如潘那林（Panarin）所写：

这个世纪的误解是将人民的自决和民族的自决混淆。将西欧的原则机械地移植到非欧洲的土地常常产生出各种怪兽。怪兽之一是被移植到非欧洲土地的民族治理的概念……欧洲国家政治语汇里的民族概念的融合性使得欧洲人无法分辨极重要的“人民的主权”、“民族的主权”及“种族的权利”等概念。<sup>②</sup>

事实上，持续到20世纪末，世界各地随着各种文化取向及政治计划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证实了潘那林的分析。

第三，民族主义不必然是一个精英现象，并且事实上民族主义在当前更常是对抗全球精英的反应。当然，如同所有的社会运动那样，在民族主义者的运动中，领导者比一般群众是受过较好的教育的（或者在我们的时代就是计算机高手），但这并不能将民族主义的诉求及重要性化约为这些精英分子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操弄群众。如同史密斯（Smith）显然很后悔写道的那样：

经由一个历史和命运的共同体，记忆可以被保存鲜活且行动可以保持他们的光荣。因为只有具有共享历史与准家庭般的联系所形成的世代相连中，个人才能有希望在此一纯粹地球经验的时代中获得不朽的感觉。因此，民族的形成及种族的民族主义看起来更像是“代理的宗教”，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也因此而比我们愿承认的还要耐久而有力。<sup>③</sup>

① 察特吉（Chatterjee, 1993）。

② 潘那林（Panarin, 1994/1996: 37）。

③ 史密斯（Smith, 1989/1996: 125）。





第四，因为当代的民族主义是比较多反动性的而较少主动性的，它比较多是文化的而较少政治性，也因此而较多以防卫已经制度化的文化为取向而非以建构或防卫一个国家为取向。当新政治体制被创造或再创造之际，它们是认同的防卫壕沟而不是政治治权的发射基地。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比较恰当地了解当代民族主义的出发点是吉野（Kosaku Yoshino）对日本文化的民族主义的研究：

文化的民族主义目的是在当觉得其缺乏文化认同或认同受到威胁的时候，经由创造、保存或强化人民的文化认同，以再生民族共同体。文化民族主义者视民族为独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且视其为具有独特属性的团结体。简言之，文化民族主义所强调的是以文化共同体的特殊性来作为一个民族的基底。<sup>①</sup>

所以，民族主义是被精英及大众两者共同的社会行动与反动所建构，如同霍布斯帮反驳盖那所强调只有“高等文化”才是民族主义的源起的说法。但与霍布斯帮或安德森的观点不同的是，民族主义作为认同的根源不能被化约说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段或是现代民族国家独具的作用。将民族与民族主义化约为建构民族国家的过程将会无法解释后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现代国家衰退同时发生的现象。

罗伯·迪·维多在他最近的、修改过的德意志式的古典观点中，<sup>②</sup> 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理论，视民族认同的浮现是经由四套因素的历史的互动，包括：原初因素（primary factors），例如种族、领域、语言、宗教等等；衍生性因素（generative factors），

① 吉野（Yoshino, 1992: 1）。

② 戴西（Deutsch, 1953）；罗伯·迪·维多（Rubert de Ventos, 1994）。

例如交通与科技的发展、城市的形成、现代军队的浮现，以及中央集权的王朝；**被引发的因素**（induced factors），例如官定文法对语言的编成、官僚体制的成长，以及国家教育系统的建立；**反动性因素**（reactive factors），即保卫受压迫的认同及保卫在支配的社会团体或制度化机器所牺牲的利益，引发了人们在集体记忆中寻求替选的认同。<sup>①</sup> 在每个国家的各个民族主义形成的过程中，哪一项因素扮演什么角色，取决于其历史脉络、其集体记忆的素材及冲突性的权力策略之间的互动情形。因此，民族主义的确是在文化及政治环境下形成的。但关于认同，在理论及实践上真正重要的是，它是如何、从何、由谁以及为什么建构起来的。

在这个民族主义爆发的世纪末，其中有些将多民族国家解构，另有些建构了多元民族的政体，它们是与典型的有治理权的现代国家之形构无关的。反而民族主义是许多准国家，也就是建构具有分享性主权的政治体其背后的主要力量。不管它们是逐步上升的联邦主义（federalism）（如加拿大正进行中的“重新”制宪，或在1978年西班牙宪法所宣示而在20世纪90年代广为实践的“民族性的民族”）；或是国际性的多边主义（例如欧盟、独立国家联合体或是前苏联共和国）。抗拒这种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央集权民族国家，想要以准国家（quasi-states）来因应新的历史实况（例如印尼、尼日利亚、斯里兰卡、甚至印度）将很可能成为这种将民族套入国家的错误命运。就如同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强国在孟加拉脱离后之终于了解到的状况。

为了探讨在我们的历史脉络（重）建构民族认同的复杂度，我将对两个案例略作申论，它们正好作为我所提议的当代辩证式特色的两个极端案例：第一个是中央集权、多民族国家的前苏联的解体，及接下来我认为是准民族的国家（quasi-nation states）之成形；以及在通过西班牙的联邦主义到欧盟的联邦主义之间囁

① 罗伯·迪·维多（Robert de Ventos, 1994: 139-200）。

起于加泰隆尼亚 (Catalonia) 民族式的准国家 (national quasi-state)。在对这两个个案研究的分析作一些阐释之后, 我将对“新的民族主义作为更新的集体认同之来源”作一些提示。

### 一 民族与国家: 苏联的解体及“不可能国家联合体” (Commonwealth of Impossible State) (Sojuz Nevozmozhnykh Gosudarstv)

俄罗斯城市及乡村中的人民, 是半开化的野兽, 愚笨而几乎会吓倒人, 它们将会留下空间给新的人类。

——高尔基 (Maxim Gorki), 《论俄罗斯贫农》<sup>①</sup>

许多学者, 包括艾高斯 (Helene Carrere d' Encausse) 及珊尼 (Ronald Grigor Suny)<sup>②</sup>, 认为各组成民族对苏联政权的反叛是其瓦解的主要的——虽然不是惟一的——原因。我在第三卷中将会分析其中复杂的经济、科技、政治国家认同交织因素来一并解释俄罗斯如何开启也关闭了 20 世纪政治的历程, 这一个历史上最特殊的进展之一。而且, 在讨论民族认同的形成及其 20 世纪 90 年代的轮廓时, 参考苏联的经验及其后来的发展是必要的, 因为它便于观察民族 (nations) 与国家 (states) 的互动, 这两者在我看来在历史上及分析上都是不同的实体。的确, 民族主义者对苏联的反叛特别显得重要是因为它是现代国家中少数明显地以多民族建构的国家, 其个别国籍在个人身份上被肯定 (每一位苏联公民在其护照上均分别记载国籍), 也在苏联的行政领域中被认可。苏联国家是以复杂的十五个共和国的联邦体制, 联邦的共和国中有自治共和国、边区 (krai) 及自治区 (okrag), 每一

① 1992, SSR vnutrennie protivorechiia, Tchalidze Publications, 1987: 128, 引自艾高斯 (Carrere d' Encausse, 1993: 173)。

② 艾高斯 (Carrere d' Encausse, 1993); 珊尼 (Suny, 1993)。

个共和国又包含数个省 (oblasti)。每一个联邦的共和国及联邦共和国中的自治共和国都是基于地域性民族的原则。这个制度性的建构不是一个简单的神话。当然，自治民族主义的主张与苏联共产党相违背的会遭到无情的镇压，尤其是在斯大林时代，数百万的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伏尔加日耳曼人 (Volga Germans)、克里米亚鞑靼人 (Crimean Tatars)、车臣人、孟什克提人 (Mesketyans)、殷古什人 (Inqushi)、巴克尔人 (Balkars)、格鲁吉亚人 (Karachai) 以及卡尔梅克人 (Kalmyks) 被迁徙到西伯利亚及中亚，以免他们与德国入侵者或其他可能的敌人合作，或者就是为了国家的某个战略计划而清除他们。但是同样的也有数以百万的俄罗斯人因为各种理由被派遣流放。然而，以民族为基础政府并不只是酬庸式地指派各国精英担任一些职位，更是让他们居于各共和国的领导地位。<sup>①</sup> 本土化政策到 20 世纪 30 年代还一直为列宁与斯大林所支持，且在 20 世纪 60 年代再更新该政策。这些政策鼓励母语及本地风俗，实施了支持本土化的方案，在政府、党及教育体系之中鼓励吸收非俄罗斯国籍者，并培育各民族的文化精英，当然，这一切都在他们顺服苏联的前提下。如珊尼所写：

民族主义强有力的措辞中，所没有说出来的是在共产党漫长辛苦的统治期间，它其实相当程度地延续了革命以前的“民族塑造”……因此增强了那些非俄罗斯共和国种族的团结及民族意识，虽然它们因为被要求顺从强加的政治命令而无法完全伸张其民族的主张。<sup>②</sup>

这么明显的对民族自决的开放（记载在苏联宪法的是各共和

① 史列斯金 (Slezkine, 1994)。

② 珊尼 (Suny, 1993: 101, 130)。



国有权脱离苏联) 在苏联有其深远的历史及策略上的理由。<sup>①</sup> 苏联的多民族联邦主义是革命期间激烈的政治及意识形态辩论下妥协的产物。本来, 布尔什维克的主张, 本于古典马克思思想, 否认民族可以作为建立新国家的主要判准: 普罗阶级的国际主义本来是要取代那被帝国主义及各种利益所操弄的“人为的”、“次级的”民族差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它(民族)被操弄来分化工人阶级更造成种族之间的血腥冲突。但 1918 年元月, 因为在内战中需要军事联盟以及对抗外国人的入侵, 在见识到民族意识的厉害之后, 列宁承认需要俄罗斯以外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乌克兰——的支持。苏联的第三全俄罗斯国会通过了《工人及受剥削者权利宣言》, 将俄罗斯帝国的遗骸转化为“友爱的俄罗斯诸苏联共和国联盟, 自由地在联盟中相遇。”布尔什维克四月时在这俄罗斯“联盟内”又加上了“联盟外”的各国, 点名以下各国的人民: 波兰、乌克兰、克里米亚、外高加索、土耳其、吉尔吉斯, “以及其他各国”。<sup>②</sup> 主要的争议在于新的联邦国家将接受怎样的民族认同原则。联邦主义者及其他社会主义倾向者认为, 既然革命的目的是要基于新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寰宇主义来超越种族及地域的家系束缚, 则整个国家的结构都应以民族文化来作身份认同的条件而不要以地域来区辨。根据这个观点, 列宁及斯大林反对以地域作为民族身份的原则。结果形成了苏联国家的多层次民族结构: 民族认同在治理体系中被承认。但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施行之时, 这些地域性的主体们必须在苏联国家的苏联共产党机器的控制之下。因此, 苏联是在两种认同之下建构起来的: 一方面是种族/民族认同(包括俄罗斯); 另一方面, 苏联是新社会认同的基础: *sovetskii narod* (苏联人民) 是共产党建构的历史

① 派普斯 (Pipes, 1954); 康贵斯特 (Conquest, 1967); 艾高斯 (Carrere d'Encausse, 1987); 珊尼 (Suny, 1993); 史列斯金 (Slezkine, 1994)。

② 赛恩 (Singh, 1982: 61)。

过程中要达成的一个新的文化认同。

将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转化为地域性的民族主义其中亦有其战略上的道理。沙敏 (A. M. Salmin) 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模式来解释潜藏在苏联联邦主义之下的列宁 - 斯大林战略。<sup>①</sup> 苏联是一个中央集权但是有弹性的制度体系。它的结构必须保持开放及调适性以便接受新的民族成为联盟的成员, 因为共产主义要发展到全世界。他画了五个同心圆来表示苏联革命的扩张及护卫体系。最内圈是俄罗斯及其卫星共和国组成俄罗斯共和国 (RSFSR)。矛盾地, 俄罗斯及俄罗斯联邦是惟一没有自主共产党的共和国, 没有共和国里的最高领袖, 而且其共和体制最不发达: 由苏联共产党独裁。为了使这个城堡更稳固, 俄罗斯与可能攻击它的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交界。因此, 在俄罗斯的周围环绕的是由诸共和国组成的苏联, 这样它们同时保护了苏联的政权及他们的民族独立。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以种族为根本的地区 (如阿塞拜疆) 是苏联共和国, 因为它与外面世界相接, 而有同样种族特色的车臣则被收编为俄罗斯联邦, 因为它在地理上比较接近核心; 苏联地理政治的第三环是由其军事力量控制下的人民民主政体所构成: 例如霍庐珊 (Khorosm)、布哈拉 (Bukhara)、蒙古以及塔弩 - 度拉 (Tannu - Tura), 它们后来成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东欧之前身; 第四环是由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后来的古巴、朝鲜或越南。它从来不把中国放在这个范畴, 因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力量抱有不信任; 最后, 第五环是由全世界的进步政府及革命运动, 它们的发展可能性要看其如何保持国际主义 (也就是拥苏的立场) 及其国家代表性之间的平衡。因为在联盟之间恒常存在着基于阶级的普世主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与基于种族/民族的地理政治利益之间的张力, 造成了苏联在处理其民族问题时的精神分裂症。

① 史列斯金 (Salmin, 1992)。



苏联这种苦恼的历史性矛盾之结果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不完整的人民、民族及国家体制。<sup>①</sup> 苏联超过 100 个民族及种族团体，在其广大的地理范围内四处穿插，或者基于地缘政治的策略，或者基于集体的惩罚或奖赏，或者因为个人的好恶。因此，住着亚美尼亚人的纳哥诺 - 卡拉巴克 (Nagorno - Karabaj) 被置于世敌阿塞拜疆之内，因为斯大林要讨好土耳其 (阿塞拜疆人其实是土耳其人)；伏尔加日耳曼人被包含在哈萨克斯坦 (Kazakhstan) 内，它们现在位于国境北边，靠着德国的补贴过日子，德国补贴他们是为了避免他们入境影响国内；哥萨克 (Cossack) 部落在西伯利亚及远东急速的增长；奥塞梯亚人 (Ossetians) 分散在俄罗斯 (北) 及乔治亚 (南)，而印古什人 (Ingushis) 则分布在车臣、北奥塞梯亚及乔治亚；1783 年被俄罗斯从鞑靼人那里攫取过去的克里米亚，这里的人民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斯大林迁移，到了 1954 年的时候，据说是在一夜大醉之后被赫鲁晓夫 (他本身是个乌克兰人) 迁移到乌克兰以纪念俄罗斯与乌克兰 300 年的友谊。还有，俄罗斯人则被送到苏联的所有地区，大部分是作为技术工人或自愿的开拓者，有时候是地方官，有时候则是流亡者。因此，当苏联瓦解的时候，以地域性的国籍原则困住了上千万人，在新的独立国度里他们都成为“外国人”。这个问题对于居住在新俄罗斯边界之外的 2500 万俄罗斯人来说更为尖锐。

苏联联邦主义最大的一个谬论是俄罗斯可能是所有国家中最受歧视的。俄罗斯联邦是苏联各共和国中拥有最少自主权的。从区域的经济学家分析看来，一般而言俄罗斯对邻近共和国在财富、资源及技术方面都有净输出 (西伯利亚是俄罗斯联邦里最多俄罗斯人种的地区，也是出口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因此也是苏联

---

<sup>①</sup> 高兹洛夫 (Kozlov, 1988)；珊尼 (Suny, 1993)；史列斯金 (Slezkine, 1994)。

最重要的外汇来源)。<sup>①</sup> 在国家认同上,俄罗斯的历史、宗教及传统认同成为苏联主要的文化打压目标,如同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作家及知识分子如利哈契夫(Likhachev)、贝洛夫(Belov)、阿斯塔夫耶夫(Astafiev)、拉斯普丁(Rasputin)、索罗金(Solukhin)或札里金(Zalygin)所记录的那样。<sup>②</sup> 然而,新的苏联认同必须建构在俄罗斯认同的废墟之上,除了二次大战期间因战略考量而成为例外,那时斯大林需要动员一切甚至包括亚历山大二世的回忆,来对抗德国。虽然整个苏联在文化上实施俄罗斯化的政策(事实上这是与本土化的策略相矛盾的),而且血统上的俄罗斯人也掌控党、军及国家安全委员会(KGB)(但斯大林是乔治亚人,而赫鲁晓夫是乌克兰人),然而俄罗斯作为国家认同被压抑的程度却比其他共和国来得大,而这些国家当中有些国家的象征性复兴则是由于多国联邦主义之故。

这个矛盾的苏联国家体系在反抗苏联的运动,利用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glasnost)所提供的空间时就表现出来了。1940年首先是波罗的海各共和国被强迫兼并,而这是违反国际公法的。紧接着的是强大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运动,这个运动事实上是对抗苏联国家最有力的一股动力。而民主的斗争和1989~1991年间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民族认同运动的出现,则创造了苏联共产党灭亡和苏联瓦解的条件。<sup>③</sup> 事实上,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的民主的领袖选举,在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当选标志了新俄罗斯的开始及苏联的结束。正是俄罗斯的传统旗帜在1991年8月领导了对共党政变的抵抗。叶利钦瓦解苏联国家的策略是将力量及资源都集中在共和国体制中,与各共和国达成协议,最先于1991年12月与乌克兰及白俄罗斯达成协议,终致结束苏

① 葛兰宝与史非尔(Granberg and Spehl, 1989); 葛兰宝(Granberg, 1993)。

② 艾高斯(Carrere d'Encausse, 1993: 第九章)。

③ 卡斯特(Castells, 1992b); 艾高斯(Carrere d'Encausse, 1993)。





联，并将前苏联各共和国转化成为具有主权的国家，松散地结合于独立国家联合体。对苏联国家的攻击不只是来自于民族主义运动：它还联系上对民主的要求以及在几个共和国中将崩塌的帝国各自划定版图的政治精英的利益。但它采取了民族主义的形式，而且因为国家之故而得到普遍的支持。有趣的是，民族主义在种族性最为显著的国家中（如中亚），远不如在巴尔干国家及俄罗斯来得活跃。<sup>①</sup>

这个由新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阵营的存在，在第一年就显示了它的组成的脆弱性，同时也显示出以跨越了解体后的苏联国界、以及植基于历史根源的民族之持久性是不稳固的。<sup>②</sup> 俄罗斯最大的麻烦是车臣战争。波罗的海共和国对于对境内俄罗斯人口施以歧视，导致新的种族内部的冲突。在乌克兰，则见到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的大多数人口和平地反对乌克兰人的统治，同时也不断地感受到西乌克兰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及东乌克兰泛斯拉夫心态之间的紧张。摩尔多瓦则分裂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对罗马尼亚的认同以及东部具有俄罗斯特性而试图建立一个涅斯特（Dniester）共和国的两方。乔治亚则爆发了多种族（格鲁吉亚、阿布哈兹、亚美尼亚、奥塞梯亚、阿札尔、孟什克提、俄罗斯等）的血腥冲突。阿塞拜疆持续不断地为了纳哥诺—卡拉巴克与亚美尼亚斗争，并且在巴库（Baku）引发了对抗亚美尼亚的屠杀。在中亚的伊斯兰教共和国，正处在与俄罗斯的建立历史联结及期望加入由伊朗及阿富汗引起的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风暴国家这两者之间。结果，塔吉克斯坦爆发了全面内战，其他共和国则将其政治体制与教育伊斯兰化，以整合激进的伊斯兰教，以免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历史记录似乎显示若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

① 艾高斯（Carrere d' Encausse, 1993）；史代洛瓦多瓦（Starovoytova, 1994）。

② 胡森（Hooson, 1994）；史代布斯基（Stebelsky, 1994）；卡沙诺夫（Khazanov, 1995）。

的民族问题，仅具虚伪的、假意的认知的话，那么不但没有解决历史冲突，反而更搅乱了它们。<sup>①</sup> 反思这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及它于20世纪90年代所造成的影响，我认为有几个重要的理论性议题值得拿出来讨论。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竟于74年之后无法创造国家认同。不论艾高斯怎么说<sup>②</sup>，苏联国家并不是一种迷思，对在苏联统治下成长的数代人来说，在这些人们的心中以及生活中，它的确具有几分真实性。其真实性在于人们是在苏联的整个领土之内，与其他国籍的人们共同组成家庭、生活与工作。对纳粹的反抗也是在苏联旗帜下被号召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斯大林的恐怖政治被消灭，以及在60年代物质状况有所改变时，的确在人们心中产生了身为超级强国一份子的骄傲。尽管仍有广泛的犬儒与消极态度，但对平等与人类的大结合的理想观念在苏联公民整体中开始扎根，因而，一个新的苏联认同感逐渐形成。尽管如此，此认同感太脆弱也太依赖于人们对自身国家及外面世界信息的缺乏，因此当经济停滞的冲击来临，人们开始了解事实真相时，认同感便瓦解了。20世纪80年代，如果有任何俄罗斯人胆敢称自己为“苏联公民”（Soviet citizens），他就免不了被他的爱国同志嘲笑为“Sovoks”。虽然苏联人民（sovetskii narod, the soviet people）不是一个失败的认同方案，但它在苏联人心目中及生活中扎根之前就被摧毁了。苏联的经验是根据“国家可以自行建构国家认同”的理论概念。但世上最强大的国家，动用了历史上最周全的意识体系，共历经70多年，仍无法以历史材料及想像的神话共同组成一个新的国家认同。人们或许梦想过共产主义，但不见得真正相信它。

① 顿宁（Twining, 1993）；帕那林（Paranin, 1994）；卡沙诺夫（Khazanov, 1995）。

② 艾高斯（Carrère d'Encausse, 1993: 234）。

第二点：在苏联国家的统治领域下，正式承认民族认同，并推行所谓“本土化”（nativization）的政策，但都没有成功地将这些不同的民族性融入苏联体系。只有一个例外：即是中亚的伊斯兰教的各共和国，正因为它们是非常不同于支配性的斯拉夫文化。这些共和国极端依赖中央政权才能平安度过，因此也只有在苏联瓦解的最后时刻，他们的精英分子才敢领导人民走向独立。而在苏联的其他民族，则无法在人为建构的苏联联邦体制中找到国家的认同。乔治亚即是一例，它是以一历史王国为基础所建造的多民族的拼图。在 550 万人口当中，乔治亚人即占 70%。他们大部分属乔治亚正教，但他们必须和属于俄罗斯正教的奥塞梯亚人相处。奥塞梯亚人分为北奥塞梯亚自治共和国（在俄罗斯）及南奥塞梯亚自治省（在乔治亚）。在乔治亚的西北方，有一群信奉逊尼回教的突厥人，叫做阿布哈兹人，人口大约 8 万，但他们占阿布哈兹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的 17%。在乔治亚，与乔治亚民族主义相对抗。20 世纪 90 年代阿布哈兹人在俄罗斯的支持下，成功地在他们的领域抗争而获得半独立的状态，尽管他们属于少数民族。乔治亚的第二个自治共和国阿札尔（Adzharia）虽然是逊尼回教，但同属是乔治亚族，他们因此支持乔治亚寻求自治。在乔治亚、奥塞梯亚及车臣 - 印古什的边界区，回教的印古什人和奥塞梯亚人争战。此外一度被斯大林驱走的孟什提克的土耳其人返回到乔治亚，土耳其表示要保护他们，却引起乔治亚境内亚美尼亚人的不信任。这种错综复杂的领域所造成的结果是：1990 ~ 1991 年当甘萨古迪尔（Gamsakhurdia）带领激进的乔治亚民族运动宣布独立、忽略了乔治亚的少数民族且没有尊重国人的民权的状况下，他最后开启了内战（他本人则死于其战役）。这场战役的一方是他的势力和乔治亚民主派，而另一方是乔治亚、阿布哈兹和奥塞梯亚的势力。俄罗斯以及作为拯救国家的最后一招而在 1991 年被选举为国务委员会主席以扮演和事佬角色的谢瓦尔德纳泽（Shervernadze），这两者的介入为

这个地区带来的和平仍是不稳定的，只要看邻近的车臣爆发痛苦漫长的游击战争就可明了。由此可见民族认同无法成功地融入苏联的认同原因不在于他们是否愿意承认事实。失败的真正原因为依循着官僚及地域政治的表面上的制度化过程，它并没有真正地注意到各民族个别的历史、文化/宗教认同以及地理上的特殊性。珊尼因此提到“历史的复仇”，<sup>①</sup> 大卫·胡生（David Hoosen）也写道：

（在前苏联）长期的冻结之后，最常浮现的问题明显的就是认同的问题。但它不能仅是以纯粹的种族或文化问题来对待，实际上它是地区的居民对他们居住地方的文化、经济及环境的重新摸索，这意味着居民要重新使自己获得某些（在某些例子中是全面的）生活条件。这些地区要突破硬划分出来而问题严重的“共和国”今日的领域，而重新确定其领域的过程虽然漫长、痛苦，但这个方向是不可避免也是完全正确的<sup>②</sup>。

第三点：向群众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失败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空白，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可以自由表达思想时，便由人们的共同记忆中所保有的惟一认同来源“民族认同”所取代。这就是为什么包括民主运动的反苏联活动是以个别民族的旗帜进行号召的原因所在。如许多人也包括我所主张的，俄罗斯及其他联邦共和国中的政治精英是拿民族主义作为反对失势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武器，以此来打击苏联政府，以便在各共和国内的机构进行夺权。<sup>③</sup> 精英分子之所以用这种策略是因为它产生出的效

① 珊尼（Suny, 1993）。

② 胡森（Hoosen, 1994a: 140）。

③ 卡斯特（Castells, 1992b）；霍布斯邦（Hobsbawm, 1994）。



应高，而且比起民主或市场优点的抽象诉求，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能够被人们个人的经验所吸收而产生想像，更能引起共鸣。因此，民族主义的复苏不能只解释为被政治所利用：而应该说，它之所以被精英分子所利用，正是民族认同作为一种动员原则，仍保有其弹性及活力的最好证明。74年以来，官方不断地重复社会主义意识，但到头来，人们发现其实国王的新衣是谎言，真正要建构新的认同的东西需依赖他们集合记忆中的基本组织：如家庭、社区、乡村的历史、甚或宗教，而最重要的，则是民族。然而此民族不同于“国家”或“官方”，而是作为在混乱世界中个人的自我认同：我是乌克兰人、我是俄罗斯人、我是亚美尼亚人，这些变成人们一致的吁求及集体地建构生活的永久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经验可以作为民族超越国家，进而具有永续性的证言的理由。

最矛盾的一件事是：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新的民族国家涌现并声称他们被压抑的认同之后，他们却似乎不能真正地发挥作为一个具有充分主权国家的功能。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目前的独立国的疆界之内，存在着多种民族、多种历史认同的问题。<sup>①</sup> 最明显的例子是人口有2500万的俄罗斯人，却生活在不同的旗帜下。而俄罗斯联邦（目前有82%的俄罗斯人）由60个不同的种族/民族群体构成。其中有些民族/种族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及丰富的矿产资源：如萨赫-雅库特（Sakha - Yakutia）及鞑靼斯坦。至于其他的共和国，除了之前提到过的乔治亚之外，在哈萨克斯坦，哈萨克人只占少数。在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塔吉克人（Tajiks）占有62%人口，乌兹别克人占有24%人口；吉尔吉斯斯坦（Kyrgyzstan）有52%是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有72%是乌兹别克人。摩尔多瓦（Moldua）的居民有14%是乌克兰人，13%是俄罗斯人。乌克兰内只有73%为乌克兰人。立陶宛有

<sup>①</sup> 赖宁（Twinning, 1993）；胡森（Hooson, 1994b）。

52%立陶宛人、爱沙尼亚有62%爱沙尼亚人。因此，如果要以制度上占主导性的种族来严格地定义民族利益，将会导致整个欧亚大陆冲突。谢瓦尔德纳泽起初与俄罗斯敌对，但后来也不得不妥协，并表示同俄罗斯合作的意愿。进一步来说，这些国家因为经济的相互渗透及水、电等各方面建设系统密切结合关系，如果要前苏联的地域完全瓦解，将会付出高度成本，这也是为什么相互合作是十分重要的原因。尤其在目前多边合作的全球经济的过程，更需要在区域之间的互相联结下才能够有效地运作。因此，人们对俄罗斯帝国主义新型态的深深恐惧，将对这些新国家将来的发展投下很大的阴影。这就是为何在俄罗斯不论谁掌权，都不会重新建构苏联的原因。但是这些完全独立的新国家之所以无法表现出对于民族认同的完全认可，正是因为跨越国家边界的认同的力量。这也是为何我提议一个最有可能的、在未来可行的、关于“不可分国家联合体”（Sojuz Nerazdelimyykh Gosudarstv）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指一个在全球经济中，具有充分的弹性与动力以联结民族认同的自主性并共同进行政治运作的组织网络。否则，如果只想在历史认同分裂的版图上强调纯粹的国家权力，其结果一定会像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结局：它会导致“不可能国家联合体”（Sojuz Nevozmoznykh Gosudustv）。

## 二 没有国家的民族（Nations Without A State）——加泰隆尼亚

国家（State）基本上必须和民族（Nation）不同，因为国家（State）是一政治组织，外部是独立的权力，内部是最高权力。并以人力、金钱的物质力量维持其独立的权威。通常，我们不能把两个混为一谈，即使连加泰隆爱国者，当他们以独立加泰隆国家的意义谈论或写作有关加泰隆民族时，也将国家与民族加以区别……就算数世纪失去了治权，加泰隆尼亚仍是加泰隆尼亚，因此我们对民族获得了很清楚明确的概



念：民族这个概念，它是最主要、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注定生存于世界社会中，在至高人性中它是文明社会中人存在的意义。

——派得里巴 (Emric Prat de la Riba), 《加泰隆的民族主义者》<sup>①</sup>

分析苏联问题的结果显示了：不论国家多强大，仍有着无法产生民族的可能性；加泰隆的经验则让我们可以反思在没有民族国家以及没有寻求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情况下，民族得以存在并(再)根据既有的历史来建立<sup>②</sup>。民族，事实上，就如现职总统，也就是加泰隆尼亚 25 年来的民族领袖乔弟·普遮 (Jordi Pujol) 所宣称的“加泰隆尼亚是没有国家的民族，我们属于西班牙政府，但我们没有主张脱离者的野心，我一定要强调这一点，加泰隆尼亚的情况非常特殊：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文化，我们是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sup>③</sup> 为了使他这句话更为清楚，也为了将其更广的意义及分析性的意涵说得更具体，在这里提供简短的历史背景是必要的。因为并非每一个读者都熟悉加泰隆尼亚的历史，我在这里需要事先简短地介绍它的历史背景，以说明它何以能够维持其语言、能够突破种种困难而使其语言广泛散播使用，而成为一活生生独特的民族。<sup>④</sup>

① 最早的版本是 1906 年出版；我用的则是 1978 年的版本 (1978, 49-50)。

② 奇丁 (Keating, 1995)。

③ 1986；引自毕 (Pi, 1996: 254)。

④ 有关历史的资料请参考维拉所写的加泰隆历史大要 (Vilar, 1987-1990)；以及重访历史 (L'Avenc: Revista d'Historia, 1996) 的专刊。也可参考威夫斯与罗伦斯 (Vicens Vives and Llorens, 1958)；威夫斯 (Vicens Vives, 1959)；威拉 (Vilar, 1964)；吉哥拉 (Jitglar, 1966)；所度拉 (Sole-Tura, 1967)；麦多诺 (McDonogh, 1986)；伟吉利 (Rovira I Vugili, 1988)；阿则维多 (Azevedo, 1991)；贾西亚拉盟以及诺方 (Garcia Ramon and Nogue - Font, 1994)；奇丁 (Keating, 1995)；沙拉其 (Salrach, 1996)。

加泰隆尼亚民族的诞生日正式记录为公元988年，在这一年柏瑞尔（Borrell）伯爵断绝了与卡罗林王朝（Caroling Empire）的残余关系。大约从公元800年起，卡罗林王朝将位于帝国南方边界的加泰隆尼亚纳入帝国版图并加以保护，以对抗阿拉伯人侵略西欧的威胁。九世纪末，裴洛司（Guifre el Pelos）伯爵推翻阿拉伯的统治，并从法国国王那里得来了巴塞隆纳（Barcelona）、乌格尔（Urgell）、赛达尼亚-康福兰特（Cerdanya - Conflent）等郡。他的继承人往后不需要法王的任命而可自任伯爵之位，因此确立了巴塞隆纳在边疆领域的领导权，此地区从12世纪起就被称为加泰隆尼亚。因此，在大部分西班牙基督徒8个世纪以来与阿拉伯人作“再占领”抗争，以建立卡斯提尔（Castile）及莱昂（Leon）王国为目标之际，加泰隆尼亚则在第8、第9个世纪为阿拉伯人统治一段时日后，于13世纪初期至15世纪中期，逐渐由卡罗林王朝时的渊源发展为一地中海王国。此王国逐渐延伸至莫洛加（Mallorca）（1229年）、瓦伦西亚（Valencia）（1238年）、西西里（1282年）、包括雅典的一部分希腊（1303年）、萨丁尼亚（Sardinia）（1323年）及拿坡里（Naples）（1442年），还包括庇里牛斯山（Pyrenes）以外的法国领土，特别是卢沙隆（Roussillon）及色当（Cerdagne）。虽然加泰隆尼亚有着广大的农村为腹地，它主要是一个商业帝国，如北意大利的商业共和国一般，加泰隆尼亚的商业是由贵族和都市商业精英分子联合统治，由于卡斯提尔的军事力量，精打细算的加泰隆尼亚于1137年与占地理位置优势的小国阿拉贡（Aragon）王国合并。到了15世纪末，为实现协约（1412年），身为加泰隆尼亚、瓦伦西亚及阿拉贡的国王的腓南度，与卡斯提尔的女王伊莎贝（Isabel）联姻，至此，加泰隆尼亚已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体。而民族的联姻，原则是尊重彼此的语言、习俗、文化及分享财富。尽管如此，西班牙国王有领地、贵族的权势及财富，加上建立在反改革的原教旨主义教会的影响，历史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其结果是





居住于欧洲、伊比利（Iberian）半岛及美洲的非卡斯提尔人均被压迫，与欧洲其他地区一样，加泰隆尼亚无法再和西班牙王国财富主要来源地的美洲殖民地做生意，在这种情况下，加泰隆尼亚只好自行开发货品产业与地方之间互通买卖，由此于16世纪后半期奠定了初期产业及资本积累的基础。卡斯提尔则在1520~1523年灭亡之后，一群工匠阶级及原初布尔乔亚（proto-bourgeoisie）于自由的卡斯提尔城市（Comunidades）兴起。他们建立了一种以搜括美洲殖民地、课人民重税来金援军人—神权国家的坐食经济（rentier economy）。到了17世纪腓力四世需要额外的国家税收而加强中央集权，因此加剧了对文化与制度的冲击，导致的1640年葡萄牙及加泰隆尼亚（即“收割者革命”发生之处）的反抗，葡萄牙得到英国的支持而重获独立。加泰隆尼亚则被打败而失去了大部分自由。1705~1714年，加泰隆尼亚再次起而抗争，追求独立，他们在西班牙继承之战（Spanish War of Succession）中，支持奥国人抵抗波旁（Bourbon）王朝的腓力五世，加泰隆尼亚人将1714年9月11日，也就是他们战败后腓力五世军队进入巴塞罗纳的那一天当做国庆日。由此可见特殊的民族性。加泰隆尼亚丧失了所有自中世纪以来所建立的政治架构及自治权。包括以民主的议会、国会及加泰隆自治政府为基础的城市政府。腓力五世的新政权则施行紧急计划（Decret de nurve planta），他们将权力集中在军事统领或加泰隆尼亚总司令手中。根据历史学家的文献，中央政权开始进行长时期的文化压制，目的是要逐渐消除加泰隆语言。首先他们禁止在行政体系使用加泰隆语，继而在商业买卖中也禁止使用，最后连学校也完全禁止，因此加泰隆语只限于家庭及教会。<sup>①</sup> 根据记载，这一次加泰隆人一样地采取联合不理睬国家事务的态度，在巴塞罗纳被占领两天后，他们马上回到工作岗位工作。加泰隆人因此于18世纪末开

<sup>①</sup> 纪拉尼（Ferrer i Gironeis, 1985）。

始工业化，而且在长达 1 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西班牙地区惟一真正工业化的地方。

19 世纪时，加泰隆布尔乔亚的经济势力、在社会中平均较高的教会文化水平与他们在政治上的边缘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 19 世纪末马德里的贸易政策威胁到仍然脆弱且必须保护的加泰隆产业时，加泰隆民族运动开始萌芽、茁壮。此次民族运动，由能言善辩的思想家所启蒙，如务实的民族主义者派德里巴（Enric Prat de la Riba）、联邦主义者阿米罗（Valenti Almirall）及米拉哥（Francesc Pi i Maragall）；由民族诗人所歌颂，如马拉格（Joan Maragall）；由历史学家所记录，如维吉里（Rovira i Virgili）；被语言学家所支持，如法布拉（Pompeu Fabra，他于 20 世纪编纂了现代加泰隆语言）。然而，马德里的政治阶级从未真正接受与加泰隆民族主义者的联盟。连明显保守的、并也许是西班牙第一个现代政党区域主义联盟（Lliga Regionalista），他们也不能接受。区域主义联盟是 1901 年抵制地方权势人物（caciques）为了支持中央政府而控制选举而成立的。另一方面，加泰隆尼亚于 20 世纪的最初 30 年间，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所把持的工人阶级运动激烈的展开，此运动促使以保守派为多数的加泰隆民族主义者倒向马德里政权，以求保护以免受到工人的需求及社会改革的威胁，<sup>①</sup> 当 1931 年共和国在西班牙成立后，左派的共和派（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得以在加泰隆工人阶级、小布尔乔亚阶级和民族理想主义者之间搭成桥梁，并成为加泰隆民族主义的最大势力，在坎布尼斯（Lluís Companys）———工会律师，被选为复辟的加泰隆尼亚自治政府（Generalitat）的总统一——的领导之下，左派共和党在全西班牙与西班牙共和党、社会党、共产党及工联（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联合。1932 年经公民投票复决，在民众的压力下，西班牙政府通过了加泰隆尼亚的自主法令（Statute of Au-

<sup>①</sup> 所度拉（Sole-Tura, 1967）。



tonomy), 同意恢复其自由、自主及文化/语言的自主性。西班牙共和党在加泰隆尼亚及巴斯克 (Basque) 的民族主义的要求获得满足是引发1936~1939年内战的军事叛乱的主要原因。内战后佛朗哥独裁政权的明显的标志便是有计划地压制加泰隆组织、语言、文化、认同及政治领袖 (开始于1940年, 坎布尼斯由纳粹的秘密警察递交到佛朗哥手中, 佛朗哥将他处以死刑), 例如: 他们故意将说加泰隆语的老师革除让学校不可能教加泰隆语。因此, 反佛朗哥的势力, 不论是在加泰隆尼亚还是在巴斯克, 都是以民族主义的名义号召的。所有的民主政治团体、后基督民主党、自由党到社会党及共产党, 都拥护加泰隆民族主义。我们可以说反佛朗哥抗争时期, 以及1977年以来西班牙民主制度的建立期, 所有的加泰隆尼亚政党在维持独立, 同时也在西班牙同与其相似的党联合的情况下, 以前是加泰隆人, 现在也是加泰隆人, 而不是西班牙人 (例如: 加泰隆社会党与西班牙PSOE联合、加泰隆尼亚联合社会党和共和党等……), 1979年加泰隆尼亚自治法规让加泰隆尼亚在西班牙的体制下获得自治基本架构, 其中包括正式认可的双语制度, 加泰隆语因此被尊为“加泰隆人自己的语言”。在加泰隆尼亚地区选举中, 乔弟·普遮 (Jordi Pujol) 这位具有小康背景、受过良好教育、有世界观的医生所领导的加泰隆民族主义联盟及其领袖连续五次获得大多数选票, 至今于1996年仍在掌权。因为在各议题的最前线追求自主政策, 包括国际舞台, 加泰隆尼亚自治政府变成壮大有活力的机构。20世纪90年代, 乔弟·普遮成为欧洲区域协会 (the Association of European Region) 的总理。巴塞罗纳也自我动员, 由另一位富有魅力的政治人物巴斯郭·马拉格 (Pasqual Maragall) 市长领导。巴斯郭·马拉格属于加泰隆社会党, 他是都市经济学的教授, 也是加泰隆尼亚国民诗人之外。巴塞罗纳很巧妙地于1992年夏季奥林匹克将自己曝现在世人面前, 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为一个既有历史传承、又具现代化气息的重要大都会。20世纪90年代, 加泰隆民族主义党在西

班牙政治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在西班牙大选当中社会党（1993年）及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ido Popular）（1996年）都无法得到大多数席位，因此乔弟·普遮成了他们在国会执政联盟中必要的搭档。乔弟·普遮首先支持社会党，后来又支持保守党。保守党获得乔弟·普遮是付出了代价的，加泰隆尼亚得以支配其所得税的30%，并在教育（已在各层次使用加泰隆语）、健康、环境、通讯、旅游、文化、社会服务及警察系统中获得独立的管辖权。虽然是缓慢地，但却是肯定地，加泰隆尼亚和巴斯克已经一步一步地迫使西班牙转变为非中央集权的联邦国，因为其他地区也要求像加泰隆和巴斯克郡一样的自治主权和资源。除了一个由年轻知识分子所支持的民主、和平的小型独立运动以外，加泰隆人及加泰隆国主义联盟都反对分离主义，他们宣称他们只需要一个政治机构来维护他们的民族，而并不需要变成一个完全独立的民族国家。<sup>①</sup>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加泰隆民族数百年来在困境中得以生存，却并没有进入与另一个国家——即是已经成为加泰隆尼亚认同的一部分的西班牙——相对抗，而打造国家的循环？对于加泰隆民族主义形成期间，属于保守的民族主义者阵营的明智思想家——派得里巴认为，这是因为：“加泰隆尼亚是以加泰隆语言及传统所结合的世世代代居住在此地的人民”<sup>②</sup>，乔弟·普遮（Jordi Pujol）也强调语言是加泰隆族认同的基本要件，其他的观察家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大体来说，加泰隆尼亚的认同来自语言及文化，加泰隆尼亚并没有声称其种族或宗教的特殊性，也没有坚持特定的地理领域或政治目的。我们的认同是由许多因素组成的，然而语言及文化才是它最根本的主干。”<sup>③</sup>事实上加泰隆尼亚两

① 奇丁（Keating, 1995）。

② 派得里巴（Prat de la Riba, 1894），引自所度拉（Sole Tura, 1967: 187）。

③ 普遮（Pujol, 1995），引自毕（Pi, 1996: 176）。



千多年以来是许多不同的欧洲及地中海民族所经过或移民的土地。多种的文化互动逐渐形成具主权的体系。在12世纪初它的文化明显的和其他地方不同，加泰隆尼亚的名字也第一次出现。<sup>①</sup> 根据法国最重要的加泰隆尼亚史学家皮耶·维拉（Pierre Vilar）的看法，加泰隆人自早期（早至13~14世纪）形成了独特的语言，它和西班牙或法语不同，而且在13世纪时就发展了文学，例如雷蒙·鲁尔（Raimon Llull）（1235~1315年）的作品就是以拉丁文（当时与普罗旺斯语及西班牙语并行）演化而来的加泰隆语写成。语言成为认同的事实在20世纪后半叶变得更为明显，在现代化时代传统上生育率低的加泰隆人，加上加泰隆尼亚特殊的产业化造成了贫穷的南西班牙人的大量迁人。当时的加泰隆语仍被禁止使用，当一批一批的操西班牙语的工人开始在加泰隆尼亚——特别是巴塞罗纳近郊——建立生活与家庭时，加泰隆语便被埋没了。1978年当加泰隆尼亚在西班牙宪法下重新获得自治权时，加泰隆国会一致通过一项《语言正常化法案》，通过所有的公立学校及大学教加泰隆语，同时在行政、机构、公共场所、街道及公共电视中推行使用加泰隆语，<sup>②</sup> 此项政策明显的是要让非加泰隆语人口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完全融入加泰隆文化，以避免将来产生文化贫民区而分化社会为不同的阶级而造成社会的分裂。在这项策略中在没有向西班牙国要求主权的情况下，国家是被用来做为强化/生产民族的。

在加泰隆认同的定义中，为什么语言是如此的重要呢？一个答案是属历史性的：也就是，数百年以来，语言以及自治政府的民主政治制度（当没有被压抑时）就是作为加泰隆人的认同化的象征。虽然加泰隆民族主义者将加泰隆人定义为“任何在加泰隆尼亚居住及工作的人”，他们还加上“想要成为”加泰隆尼亚人

① 萨拉奇（Salrach, 1996）。

② 普吉里拉等（Puiggené i Riera et al., 1991）。

的人。“想要成为”的表现就是讲加泰隆语或“试着说”加泰隆语（事实上“试着说”的定义更恰当，因为它是真正表现个人意愿的证明）。另一个答案是属于政治性的：在不恢复领域主权的标准以避免和西班牙的领域权冲突的情况下，语言是扩充、再生产加泰隆人口最容易的方法。还有另一个答案，也是最基本的答案：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可以将历史及文化的形构加以明确化，让人们可以在没有崇拜符码（除了每天沟通时所出现的）情形下也可以进行象征性的分享。虽然共同语言不见得可以构成一个民族，但我相信没有国家的民族极可能是环绕着语言所构成的社区组成的，这一点我会在后面详细说明。拉丁美洲国家以及英国、美国肯定会反对我的这种说法，但请读者暂时和我停留在加泰隆尼亚这个话题上。

我希望加泰隆尼亚的历史可以让我们至少同意加泰隆尼亚并不是一个想像的认同。因为加泰隆尼亚在过去 1000 多年以来，以其语言，以其领域的持续性以及民主、自治体制组织成为一个民族，曾在不同的情况，抵御各种困难，曾经成为不同国家的一部分，曾经自成一个国家，在不与西班牙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追求自主权，也曾融合移民、忍受侮辱（实际上他们每一年纪念它），但加泰隆尼亚仍为加泰隆尼亚。有些分析家企图将加泰隆主义解释为工业时代的布尔乔亚因被前资本时代官僚作风的西班牙王朝压迫所生的挫折所造成的历史性的意愿。<sup>①</sup> 这的确是 19 世纪末加泰隆民族运动以及促进“联盟”（Lliga）形成的主要因素。<sup>②</sup> 但阶级分析无法说明的是：尽管西班牙的中央集权主义想尽办法消灭它，加泰隆的认同在长远的历史中仍继续的存在。派得里巴（Prat de la Ribà）反对加泰隆尼亚被简化为阶级的利益。尽管他

① 贾格拉（Jutjar, 1966）。

② 所度拉（Sole-Tura, 1967）。



的“联盟”主要是布尔乔亚政党，但他的说法很正确。<sup>①</sup> 加泰隆主义经常和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联在一起。但它和本世纪（20 世纪）之交时的现代主义也有关联，它倾向欧洲及国际思想运动，不同于传统的西班牙再生主义（regenerationism）在 1898 年帝国残余毁灭后所追求的一个新的超越性价值的来源。作为一个基于语言及共同的历史组成的文化社群，即使民族主义运动以特定的历史脉络或相对的政治计划的符码建构或再建构了他们自我认同化的崇拜物，加泰隆尼亚并非是一个被人们想像出来的实体（imagined entity），而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历史产物。

加泰隆民族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sup>②</sup> 加泰隆民族主义者不但自称加泰隆人，也自认是欧洲人、地中海人或西班牙人，它反对西班牙国分离，但同时也在追求成为一种新型态的国家，加泰隆尼亚就像是一个可变几何式的国家：它结合了西班牙国的历史传承的尊崇、在管理公共事务逐渐具有自主性的加泰隆的制度，以及在欧洲这个较大的实体下，西班牙与加泰隆尼亚的整合。在脆弱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外壳下，加泰隆尼亚不但成为欧洲联盟的一员，而且通过各种地方与都会政府机构以及市民团体，展开了多重横向的网络关系，这不单纯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聪明策略，它的渊源其实来自数百年来加泰隆精英分子“亲欧洲”的立场和卡斯提尔精英分子在最具历史性的几个阶段所采取的文化孤立政策造成强烈的对比。加泰隆民族主义的特色在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或哲学家的思想中表现出来，例如莫拉（Josep Ferrater Mora），可能是在 1960 年，他写道：“加泰隆尼亚的‘加泰隆化’可能是使加泰隆人成为‘良好的西班牙人’，使西班牙人成为‘良好的欧洲人’的最后一次历史性的机

① 派得里巴（Prat de le Riba, 1906）。

② 奇丁（Keating, 1995）；蔡拉斯（Trias, 1996）。

会”。<sup>①</sup>其原因在于西班牙只有在能够接受多重身份及认同——其中加泰隆尼亚是最突出的一例——之后，才能够朝向民主的、融合的欧洲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先使加泰隆人在西班牙国家的领域内感觉自在，并能够以加泰隆语思考、说话，以便能够和较广大的网络保持联系。相对于大多数在动荡的土壤上打造民族国家的过程，加泰隆尼亚对于文化认同与国家权力、国家机器的绝对权力及分享权力的组织之间的网络，这之间的区别，成为一种历史的创新。与其成为传统的主权国，他们宁愿拥有一个有弹性及适应性的社会，全球性的经济、多网络、媒体及多元融合的文化。加泰隆人奋斗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而是要保存他们的民族，他们好像绕了一圈走向他们最原先的生活方式：无疆域的贸易、文化/语言的认同、有弹性的政府组织。而这些似乎正是目前“信息时代”的特征。

### 三 信息化时代的民族

在两个欧洲国家极端相反的例子中，我们了解到民族及民族主义在信息化时代作为一种意义的来源的新的的重要性。为了更清楚地表达我的看法，与之前所呈现的分析及案例相一致，我将“民族”定义为：民族是借由共同的历史及政治目标，以人民的心智及集体记忆所建构的文化共同体。到底要有多少的共同历史才能成为一个民族乃因个别的脉络及时期而有所不同，就如同决定共同体能否形成的元素也各自不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加泰隆的民族性是一千多年以来人们共享历史的结晶物，相反的，美国只在两百年间以多种族融合而形成强大的民族。重要的一点是：传统上民族与国家的分别，到了现代，虽非百分之百，但许多已融合在一起了。从千禧年末的角度来回顾，我们可以看到：有没有国家的民族（如：加泰隆尼亚、巴斯克、苏格兰、魁北克），

① 斐瑞特·莫拉等（Ferrater Mora, 1960: 120）。



以及没有民族的国家（如：新加坡、南非），还有多民族国家（如：前苏联、比利时、西班牙、英国），有单一民族国家（如：日本），有共同民族的国家（如：朝鲜、韩国），有共同国家的民族（如：瑞典及芬兰的瑞典人、爱尔兰及英国的爱尔兰人，或者也包括了未来的波士尼亚中共存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及波士尼亚伊斯兰教徒）。由此可见公民权不见得与民族相等同，特别是排除性的民族。就像虽然加泰隆首先觉得自己是加泰隆人，但同时也自称为西班牙人，甚至是“欧洲人”。想要在一个既定的历史脉络之外，将民族和国家同化而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综合体的想法和长时间、全球性的角度观察所得的记录实相违背。理性主义者（如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在反对德国唯心论者（如赫尔德 Herder，费希特 Fichte）及法国的民族圣徒行传作家（hagiography）（如米歇尔 Michelet 及雷纳 Renan）时，似乎也将“民族问题”的真正意义弄模糊了，这就是导致在 20 世纪末面对民族主义的权力及影响力时，令人困惑的原因。

如在这一章所描绘的，现今的历史阶段有两种特殊的现象：首先，多民族国家不论是想要保持其完全的自主权，还是否认自己国家构成的多元性，都面临崩溃瓦解的命运。例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前埃塞俄比亚、捷克，或许未来的斯里兰卡、印度、印克、尼日利亚及其他国家。崩溃的结果形成了“准民族国家”（quasi-nation-states），它们之所以称为“民族国家”是因为它们在由历史所建构的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拥有了主权国家的特性（例如：乌克兰）。而之所以称为“准”，其原因在于这些由历史的各种势力所组成的国家错综复杂的关系，使他们非要和之前的国家或更大的组织（如：独联体国家、欧洲共同体、东欧共和国）分享主权。第二个现象是：有些民族虽在形成国家的门槛前驻足不前，却迫使它们的母国对它们改变或割让治权，如：加泰隆尼亚、巴斯克、法兰德斯（Flanders）、比法交界的瓦罗（Walloie）、苏格兰、魁北克；也有可能的，如：库德斯坦（Kurdistan）、克什米尔（Kashmir）、旁遮普（Punjab）

或东帝汶 (East Timor)，我之所以称它们为“民族的准国家” (national - quasi - states)，因为它们不是完全形成的国家，它们只是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获得一部分政治主权。

在现今的历史阶段，民族认同所构成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种。所有的例子预设共同的历史是其必要条件，然而，我想要提出一个假说，那就是：语言，特别是发展完成的语言，才是民族自我认知以及建立一个看不见的民族边界的基本特征。而这个国家的边界比起地域性来说，是比较不粗暴的；比起种族性来说，则是比较不具排除性的。由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语言是个人及公众、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不论国家制度承不承认有这样的文化共同体的存在。我们不可因为费希特 (Fichte) 利用这个借口建立了泛德国民族主义而背弃历史的记录。然而，社会上之所以兴起以语言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还有一个更有力的原因。如果说民族主义最常作为是自主性的认同受到威胁时的一种反抗，那么当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及强势的全球化媒体的力量，使得全世界都臣服于一种文化同质性的状况下，语言，作为文化的最直接表现，也就成为文化抗拒的战壕、自我控制的最后堡垒，以及可以确认意义的避难所。因此，民族并非是为了服务权力机器而建构出来的“想像中的社区”。它们是人们共同历史的产物，以共同的语言所说出的第一个字是 we (我们)，第二个字是 us (作为受词的“我们”)，而不幸的，第三个字则是 them (他们)。

#### 第四节 种族解放：网络社会中的 种族、阶级及身份认同

看到你，一百个黑人……看到你坐牢，看到你关进笼子里，  
看到你变顺服，看到你痛苦，看到你反抗，看到你领悟，看

到你渴望，看到你需要，看到你不满，看到你流血，看到你成残；看到你兄弟，看到你冷静，看到你被爱，看到你平静，看到你回家，看到你倾听，看到你去爱，看到你执著，看到你充满信念，看到你被愚弄，看到你被挑衅，看到你改变，看到你，看到你，看到你……我绝对希望变成你。

——彼得·哈理斯 (Peter J. Harris) 《对无名兄弟的赞颂》<sup>①</sup>

“你”也如此希望吗？真的？种族在人类历史中一直是人们追求意义与认可的基本来源。在许多现代社会里，从包括美国到亚撒哈拉的非洲，它都是作为社会分化、社会认可以及歧视的最根本的架构。它作为为社会正义而叛变的基础，如1994年墨西哥印地安人民在恰帕斯省 (Chiapas) 的动乱；它也是为种族肃清而拿出来的非理性的借口，如1994年波士尼亚伊斯兰教徒的所为。广义来说，它也是现代商业世界里人脉网络及基于信任的生意来往的文化基础，例如中国的生意网络 (见第一册第三章)，及全球经济中决定成功的种族“部落”。诚如康乃尔·卫斯特 (Cornel West) 所写的：“此全球化的时代，当信息、通讯及应用生物学达到惊人的科技创新之际，继续讨论种族主义挥之不去的影响，似乎有点落伍、过时……但是种族——在社会福利改革、移民政策、犯罪惩罚、少数民族保障法及市郊私人化等议题中的符码化语言——仍然是政治辩论时最主要的语言意符”。<sup>②</sup> 不过，如果对美国或其他社会动力而言，种族与族群 (race and ethnicity) 是核心问题，那么，它们的表达方式似乎被目前的社会趋势所影响而深深地被改变。<sup>③</sup> 我认为种族 (race) 是重要的，因为

① 伟德曼与普列新登 (Wideman and Preston, 1995: xxi)。

② 卫斯特 (West, 1996: 107~108)。

③ 爱必雅与盖兹 (Appiah and Gates, 1995)。

它可能比起以前来更是一个压迫及歧视的根源。然而族群 (ethnicity) 却是更特定的作为在如宗教、民族、性别的文化自我定义中的广泛原则下，获得意义与认同的基础，以与其他族群区分<sup>①</sup>。为了支持我的这个论点，我将简要地讨论非洲裔美国人的认同的演进。

过去 30 年来，非洲裔美国人的处境被一个基本的现象所改变：就是阶级的明显的区别出现了，就如威廉·威尔森 (William Julius Wilson) 的先驱性作品中提到的，<sup>②</sup> 而它的意涵改变了美国人之前对非洲裔人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非洲裔美国人对自己的看法。依据 10 年来所做的许多研究，威尔森的论文指出非裔美国人中急遽的两极化。一方面，这是由于 20 世纪 60 年代人权运动所激发的，特别是弱势族权平权方案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 的施行，产生了一大群受过良好教育且生活相对而言较为舒适的中产阶级非洲裔美国人。他们开始进入政治权力机构 (如市长或联合主席之职) 甚至大型企业。结果，目前已有三分之一的非洲裔美国人属于美国中产阶级，虽然与白人不同的是，他们的男人比起白人男人的收入仍有很大的差距。在这同时，三分之一的非洲裔美国人，其中 45% 是由非洲裔美国人的儿童以及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所组成的，他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却比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情况更惨。威尔森以及其他研究者，如布列克雷与高史密斯 (Blakely and Goldsmith)，或者是甘斯 (Gans)，认为贫穷阶级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不平衡的信息经济、空间的隔离以及错误的公共策略等因素共同造成的。信息经济的发展强调教育，却减少了稳定的制造业的工作机会，使得处在就业市场中初级的黑人变得劣势了。中产阶级黑人则脱离内城，留下了身陷在其中的庞大的一群都市贫民。为了不再恶性循环，新的

① 维伟涅可 (Wiesiorka, 1993)

② 威尔森 (Wilson, 1987)

黑人政治精英获得都市贫民选民的支持。只不过他们必须保证社会福利方案的实行，而这则要视多数白人在道德上或政治上对于都市贫民的忧心的作用到何种程度。因此，新的黑人政治的领导权的基础将是视他们在企业界、政治机构以及位居贫民区且不可预期的穷人之间进行斡旋的能力而定。这两种黑人之外还有剩下的三分之一非洲裔黑人，他们努力工作以脱离贫穷，他们进入服务业，或以不成比例的方式在政府机构工作，或在接受教育训练计划中获得一技之长以期在工业化的新经济体系中求得生存。<sup>①</sup>如果没有成功，结果会变得很凄惨。根据1992年的调查，居住在内城、受教育程度低的黑人男性只有三分之一有全职工作，即使有工作的男性，其中15%也在贫困线以下。1995年最贫穷人口中的5%黑人的平均财产正好是零。三分之一的贫穷黑人家庭居住在水准以下的房子，所谓的水准以下所根据的指标之一是“有明显的老鼠出没的痕迹”。1973~1992年，城市犯罪率高于市郊犯罪率，其相对指数从1.2上升为1.6，而城市居民是这些犯罪案的最的受害者，再加上许多贫穷黑人男性被囚禁或等待刑罚（如等待上法庭或保释中）。20世纪90年代，黑人虽然只占全美国人口的12%，但他们却占监狱囚犯人口的50%。<sup>②</sup>根据1990年统计，每10万个黑人中就有1860个囚犯，比起白人就高出6.4倍。与以前相比，非洲裔美国人受教育程度的确有所提高，但根据1993年统计，总共有23000个黑人获得了大学文凭，但有230万黑人在牢中。<sup>③</sup>如果我们把所有在牢中服刑或牢外被监管的人加在一起，1996年的人数总共是540万。在1991

---

① 威尔森 (Wilson, 1987); 布列克雷与高史密斯 (Blakely and Goldsmith, 1993); 卡诺伊 (Carnoy, 1994); 韦宽特 (Wacquant, 1994); 甘斯 (Gans, 1995); 赫斯乔德 (Hochschild, 1995); 盖兹 (Gates, 1996)。

② 东里 (Tonry, 1995: 59)。

③ 盖兹 (Gates, 1996: 25)。

年黑人牢犯占全部牢犯的53%。<sup>①</sup> 受监禁或监管的比例在贫穷的黑人男性中更高出很多，且分布在黑人的年轻男性。以华盛顿这样的城市来说，大多数18~30岁之间的黑人男性不是坐牢，就是在受监管中。女性及家人必须适应这样的处境。贫穷的非洲裔美国家庭之所以没有男性存在，主要是因为很多男人长期的在监狱中服刑，因此女性必须准备自己养育子女，生小孩更只是自己的责任。

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将在第三册中分析它在新科技及经济背景中的社会根源。然而目前我所分析的论点中，我所关心的是在非洲裔美国人的认同转化中如此深刻的阶级区分所带来的后果。

要完全了解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这种演变，我们必须先了解黑人认同的历史根源：如康乃尔·卫斯特（Cornel West）所言，在美国的黑人正是兼具非洲人及美国人的两种特性。他们的认同是在一个在当时最为自由的社会中，作被绑架、奴役的人们而构造成的。美国为了协调在自由的理想以及以奴隶为基础的高效率经济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必须要否定黑人的人权，因为在一个由“所有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而构成的社会中，只有非人类才能被杜绝享有自由。正如康乃尔·卫斯特所写的那样：“黑人人权的残酷攻击产生了黑人文化的最根本的状态——那就是黑人的不可见性和无名性。”<sup>②</sup> 顺着康乃尔·威斯特的分析，黑人的文化因此变成是学习如何在不落入自我否认下，面对来自他人的否定。黑人文化做到了这一点。由歌曲到艺术，由社区教堂到兄弟情感，黑人社会带着一种强烈的集体意义崛起。在大量走出乡村，移居北部贫民区期间，这种集体意义没有失去，反而将转向对艺术、音乐、文学方面超越的创作，转向强大的、多面的政治运

① 见本书第三册第二章。

② 卫斯特（West, 1996: 80）。



动。20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开始成为他们的梦及潜力的化身。

然而，人权运动的部分成功，开始使黑人之间产生区别，而改变了文化的样貌。这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初步看来，黑人中产阶级似乎将会和意大利裔美国人或华裔美国人一样，借由经济富裕及政治影响就可以融入社会主流，创造一个崭新的身份认同。毕竟华裔美国人在加州历史中曾极端受到歧视，但近年来他们获得了很受尊敬的社会地位。因此，以此角度来看，非洲裔美国人将会是另一个例子，成为美国多种族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贫穷阶级（Underclass）则将会比黑人更贫穷。

不过，根据目前的资料分析，这种双文化发展理论不成立。珍妮佛·郝斯乔德（Jennifer Hochschild）的研究有力地指出：黑人与白人的文化转变相对于“美国梦”所主张的机会均等、个人流动的理想是正好相反的景象。<sup>①</sup> 中产阶级黑人对美国梦感到失望，且认为自己是种族歧视最大的受害者，同样的，白人大多数觉得“弱势族群平权方案”使黑人不恰当地占到优势，它还抱怨黑人对白人的反歧视。相反的，黑人贫民虽然也充分意识到种族歧视的存在，他们似乎比中产阶级黑人更相信“美国梦”，也比中产阶级黑人相信他们的命运是注定的、是个人的（事情一直是这样的），虽然黑人贫民在先后几次所作的意见调查中，显示出他们对社会制度曾有的信心逐渐在流失中。根据郝斯乔德的大量的实证资料分析中可以清楚看出一个事实是：大部分的富裕的非洲裔美国人不觉得他们在主流社会中受到欢迎。他们确实不受欢迎。马丁·卡诺伊（Martin Carnoy）指出，在白人之间还是广泛存有对黑人的种族敌意，而且中产阶级黑人在教育、职业、收

---

① 郝斯乔德（Hochschild, 1995）。

入上远比白人为低。<sup>①</sup>

所以说，种族是很重要的因素。<sup>②</sup> 不过，因为黑人之间的阶级差别，造成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情况，贫穷的黑人便对逐渐遗弃他们的旧兄弟产生了敌意<sup>③</sup>，大部分中产阶级黑人不但努力地在实际上脱离贫民区，同时也要将深深刻印在他们皮肤里的贫民形象摆脱掉。他们的做法是将子女由贫穷的黑人社区隔离（搬到市郊，转到白人为多数的私立学校），同时以强调过去为主轴的方式重新创造非洲裔美国人的认同形象，并对目前的命运保持缄默。

世纪末的贫民区黑人则基于他们的苦难、愤怒及个人对集体排除的回应开始发展出另一种文化。身为黑人而被排除的情况使他们产生一种团结感，地方流氓就是起源于街头而在狱中凝结力量的一例<sup>④</sup>。由此文化便产生了饶舌（Rap）音乐，而不是爵士。这种新文化也表达了他们自己的认同，也是同样根源于黑人历史及美国过去以来的种族歧视及种族压迫，但贫民区的文化还包涵了其他新因素：他们把警察及刑事制度变成了主要权力机构；犯罪经济变成了购物市场；学校变成了竞赛区；教会变成了安抚之地；母亲为中心的家庭，残破的环境，黑社会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以及暴力变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就是从新的贫穷区经验中发展出来的黑人新艺术及文学。<sup>⑤</sup>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和中产阶级非裔美国人所刻意再造的种族形象与认同完全不一样。

即便有这样的文化分歧，这两种认同都在建构时面临了无法

① 卡诺伊（Carnoy, 1994）。

② 贝斯特（West, 1996）。

③ 郝斯乔德（Hochschild, 1995）；盖兹（Gates, 1996）。

④ 珍高斯基（Sanchez Jankowske, 1991, 1996）。

⑤ 卫德曼与普列斯登（Wideman and Preston, 1995）；盖拉兹（Giroux, 1996）。





逾越的障碍。富有的非裔美国人所面临的矛盾是<sup>①</sup>：由于他们感受到制度上的种族歧视的排拒，他们只好在美国主流社会中扮演他们族人的领导人物的角色。就如同本世纪初的黑人知识分子都·波雅斯 (Du Bois) 所认为的“有才能的十分之一” (Talented Tenth) 是黑人以及其他种族必要的救赎者<sup>②</sup>。但是“有才能的十分之一”及占大多数的人口比例继续增加的黑人之间，不论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区隔是如此的明显，因此为了要扮演这个角色，他们自己以及子女不得不拒绝成为进步的社会变迁中多阶级、多种族联盟的一部分。在盖兹与卫斯特合著的优秀的小书中有此方面的辩论：他们似乎认为黑人别无选择，但他们也同时怀疑这种选择的可行性。盖兹写道：“黑人领导的真正危机就是黑人的领导权正处于危机中这样的想法”。<sup>③</sup> 卫斯特写道：

为了达成激进民主以重新分配资源、财富、重建经济、政治，并为所有的人类谋福利，惟有将先进的中产阶级、大公司精英分子中的自由思想人士以及低收入阶层的反叛势力，结合成为进步中间分子的多种族联盟才能实现。在 21 世纪如果只靠有才能的十分之一精英分子做孤军奋斗是不够的，也必将遭遇惨败的结果。<sup>④</sup>

事实上，都·波雅斯本人于 1961 年离开美国移居盖那 (Ghana)，诚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乃是因为“不能再忍受此国对待我们的方式……抬起下巴来，继续战斗啰！但别忘了美国黑人终究是赢不了的”。<sup>⑤</sup>

① 郝斯乔德 (Hochschild, 1995)。

② 盖兹与卫斯特 (Gates and West, 1996: 133)。

③ 盖兹 (Gates, 1996: 38)。

④ 卫斯特 (West, 1996: 110)。

⑤ 盖兹与卫斯特 (Gates and West, 1996: 111)。

与白人完全融合的失败是否将导致美国黑人分离主义的复兴？这能够作为新认同的基础，就像以黑豹党（Black Panthers）为典范的激进的 20 世纪 60 年代的运动一样？如果我们注意富有战斗精神的年轻人，看到对马尔孔·X.（Malcom X.）的新一波的崇拜，法拉克汗的（Farrakhan）伊斯兰教国影响的扩大，以及以赎罪、道德及黑人男性骄傲为主题的 1995 年华盛顿“百万人游行”所造成的庞大冲击，那么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然而，这些新的文化—政治认同的宣示反而更进一步造成非裔美国人之间的分歧，这些运动事实上是建立于自我认同化的原则上，它们是属于宗教性（伊斯兰教、黑人教堂）而非种族性，并有明显性别倾向（男性骄傲、男性责任、女性从属地位）。“百万人游行”所造成的冲击及其可见的未来发展强调了社会阶级的区分，但也模糊了非裔美国人的男女性别认同以及宗教、种族和阶级中的自我认同。也就是说，它不是以认同作为基础，而是对于消失的认同所作的回应。当社会无时无刻不在提醒黑人，他们是黑人（来自遥远的非人性存在，是带有耻辱标记的特殊人类）时，黑人本身内部有着非常不同的生活型态，是不是因为这样他们不但不能分享，而且对彼此越来越多使用暴力？20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黑人开始渴望找回失去的社区，因为过去 10 年当中，对非裔美国人造成最大的伤害也许就是集体认同逐渐消失，导致个人在背负集体的耻辱标记，同时一个人在茫茫社会中浮沉。

这并非是必要的过程。许多社会政治运动，诸如杰西·杰克森（Jessie Jackson）的“彩虹联盟”便是引导黑人教会、少数民族、社区、工会、女性结合在同一个旗帜下，并持续地为促进政治、社会的公正及种族平等而努力。但黑人如果要在克服种族歧视的同时仍能保留历史及文化的差异，那么只有在长时间成功地建构政治认同的条件下才能够创造一个集体的、对黑人或白人皆是全新的文化的认同。卫斯特虽然承认“不是无望（hopeless）的希望，而是不能期望（Unhopeful）的希望”，他仍然呼吁以



“激进的民主”超越种族的分裂及黑人的民族主义。<sup>①</sup> 但是不论在贫民区的战壕里，还是在大公司的理事会议厅中，非裔美国人的认同在尚未融入多种族的开放社会之前就被分割、个人化了。

因此，依我的假设，在网络社会中，种族并没有为社区天堂提供基地，因为如果种族所依靠的是原初的连系，而这一旦与其历史脉络切断，它依赖的主要根基便失去了意义。因为在流动的网络的世界中，历史传承才是重新建构意义、重新组合形象及重新赋予意义的基础。种族的元素是被融入比种族更强大、更广义的文化社群，例如宗教或民族主义，而以此作为在充满符号的世界中的文化自主性的表现。否则种族便成为自我防卫的基础，它在各个社区间造成小圈圈，甚至形成帮派，以保护自己的地盘。在文化社群与自我防卫的地域单位两极之间，种族的根源被扭曲、分割、重新发展，并根据文化、经济的信息化及全球化的新逻辑被区别性地给予污名或加以奖赏，而这只能从模糊的认同中拼凑出象征的集合。种族虽然很重要，但它却很难再建构出意义。

## 第五节 区域认同：地方社群

都市社会学中有一个最古老的辩论，就是认为社群的消失首先是因为都市化，后来是因为郊区化所造成的。若干年以前所作的经验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克劳蒂·费雪（Claude Fischer）及拜利·威尔曼（Barry Wellman）<sup>②</sup>，认为空间及文化之间有系统的共变性是一个过于单纯的想法。人们在他们所属的环境中与他

<sup>①</sup> 卫斯特（West, 1996: 112）。

<sup>②</sup> 威尔曼（Wellman, 1979）；费雪（Fischer, 1982）。

人来往，不论是村庄、城市，还是城郊，他们都会与邻居建立起社会网络，另一方面来说，地方性的认同混杂着其他的意义及社会认知，其模式极为不同，因此地方性认同可以有不一样的诠释。艾瑞奥尼（Etzioni）观察到社群的再兴大部分属于地方性的，帕特南（Putnam）却注意到在美国，托克维尔式的（Tocquevillian）、紧密的公民社会的原景正在瓦解，20世纪80年代许多义工组织的成员人数及活动都急速下降。<sup>①</sup> 世界其他地区的报道也同样呈现出此种矛盾的现象。然而我认为以下的说法是不会有误的，也就是，我认为地方环境本身并不能导致某种特定的行为，因此也不能产生某种特别的认同。但是，根据社群主义作者的看法，以及我个人在多个文化所获得的观察，人们抗拒个人化及社会原子化的过程，他们喜欢聚集在社群组织中，经过一段时间后，逐渐产生归属感，最后，变成社区及文化的认同。我的假设是：要达到如此的结果则必须经历社会动员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参与都市运动（urban movements）（并非具有强烈革命性）并在其过程中发现彼此共同的利益，人们以某种方式分享彼此的生活，新意义也就有可能产生。

由于花了10年的时间研究世界上的都市社会运动，我对此方面的议题了解一些。<sup>②</sup> 就我的研究报告，加上其他相关的文献的支持，我主张都市运动（在一个既定领域，为达成都市相关的目标而产生的社会动员）有三个主要目标：对生活状况及集体消费的都市需求、对地方文化认同的主张以及关注地方政治自主性及市民参与。这三组目标在不同运动中占有不同的比重，其结果也有相当多的差异。但在很多例子中，不论运动是否达成明显的成果，对参与者或对社区来说，“运动”本身的存在即产生意义。这种意义不只存在于运动期间（通常是短期的），并且存在于地

① 艾瑞奥尼（Etzioni, 1993）；普南（Putnam, 1995）。

② 卡斯特尔（Castells, 1983）。



方的集体记忆中。事实上，我曾说过，我现在更重申，这个意义的生产，是城市不可或缺的元素，而整个历史，建成的环境及意义的意义，则是在利益与价值相对立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冲突过程中建构的。

另外，根据我对历史重要时刻的观察（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初期）同时也是我对未来的观点：都市运动是抵抗资本主义、国家主义、信息化主义之单向逻辑思考极有效的方式，之所以如此，基本上是因为当为了改变而做的（proactive）运动及政治（如劳工运动、政党）在对抗经济剥削、文化支配、政治压迫上遭遇失败，使得人们别无选择地，要不是放弃，就是以构成自我肯定与自治组织最直接的来源的——地域性（locality）为基础进行反抗。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在被越来越强化的全球化过程所结构的世界中，却有着越来越强化的地方政治这种谬论出现的原因。人们找到了意义与认同：我的邻居、我的社区、我的城市、我的学校、我的树、我的河、我的海滩、我的教堂、我的平静、我的环境。但这是一个防卫性的认同；是一种对于已知事物的紧缩化的认同，以用来对抗未知及不可控制事物的不可预测性。突然地未加防卫地面对全球化的风暴，人们不知所措，他们只能紧靠在一起；而他们过去所拥有的，他们过去的作为，变成了他们的认同，我在1983年写道：

虽然都市运动不论在局面大小还是条件上均称不足，但它的确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议题。而且也别无选择，因为都市运动是对支配性力量以及增强的剥削所能够采取的最后反抗。但它并不仅止于作为最后的象征性的表态或绝望的呼喊：它是我们自身矛盾的征兆，因此它也潜在地具有超越这些矛盾的可能性……它确实可以制造新的历史意义，在地方社区的围墙内假装建构一个他们知道不能达成的新社会。为了绝不向野蛮主义投降，它们在都市运动所建构的地

方乌托邦中孕育着未来的社会运动的胎儿<sup>①</sup>。

那之后发生些什么事呢？特别是如果我们进行跨地域及文化的观察的话，经验性的答案当然是极端多样的。<sup>②</sup> 为了分析起见，我特别将 20 世纪 80 年代及 90 年代的都市运动的主要轨迹分成四大类。

第一，在很多案例中，都市运动及它们的论述，行动者及组织，通过市民参与、社群发展等多元体制，直接或间接地融入了地方政府的结构及实践当中。这种趋向，虽然杜绝了都市运动作为另类社会变动的来源，但它也大大地强化了地方政府，并引入了将地方政府作为政治控制及社会意义重构的重要例子的可能性，在第五章当我分析国家整体的转化时，我会再一次回到此部分的重要发展上面来。

第二，地方社群及组织确实培育了广泛并具影响力的环保运动，尤其在中产阶级邻里、城郊、城市远郊以及都市化的乡村（见第三章）。然而，这些运动经常是防卫性的和反应性的，他们只管自己空间及邻近环境的极端保存，例如在美国，有所谓的“不要在我的后院就好”（NIMBY, not in my back yard）的态度。不论对有毒废弃物、核电厂、公共住宅计划、监狱及拖车型流动房屋聚落等问题，他们都采取同样的态度。我在第三章分析环保运动时，会将“寻求控制空间”（一种防卫式的反应）与“寻求控制时间”（即为了长时间保护大自然及地球，为了后代，而选择宇宙观的时间，拒绝工具性发展主义的立即时间观）这两者之间作出一个明显的区分。由此两者不同的观点所发展出来的认同

① 卡斯特（Castells, 1983: 331）。

② 马索罗（Massolo, 1992）；费雪与金（Fisher and King, 1993）；开德隆（Calderon, 1995）；加吉等（Judge et al., 1995）；田中（Tanaka, 1995）；波札与卡斯特（Borja and Castells, 1996）；夏（Hsia, 1996）；矢泽（Yazawa, 即将出版）。



差别很大——“保存空间”派导致集体的个人主义；“攻击时间”派则在文化与大自然之间找到折衷之路，由此而开启了一种新的整体的人生哲学。

第三，世界上有庞大数目的贫穷社区，展开了集体生存之道，例如 20 世纪 80 年代在智利的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hile）及秘鲁的利马（Lima）涌现出很多社区厨房。不论在拉丁美洲的违建区、美国的内城贫民区，还是在亚洲城市的劳工阶级邻里，社群以团结及互惠的网络为基础，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福利国家”（因缺乏负责任的公共政策）。这些组织通常环绕教会，或被国际基金组织援助的非政府组织（NGOs）所支持；有时候则是在左派知识分子的协助下成立。这些组织化的地方社群不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扮演着协助庞大都市人口面对饥荒及传染病的重要角色。我们可以从 20 世纪 80 年代圣保罗（Sao Paulo）的天主教会所组织的社群联盟<sup>①</sup>或由 20 世纪 90 年代在波哥大（Bogota）由国际赞助的非政府组织可看出这种趋势。<sup>②</sup>在这些案例中，大部分都产生社区的认同。但它经常被融入宗教信仰中，因此我可以大胆地假定社区主义（communalism）其实根本上是宗教性的社区，它和被剥削或被排除的意识有极大关联。通过宗教的救助，人们在贫穷社区的地方社群中组织起来也许会感到重新注入了活力，也感到自己有了人的尊严。

第四，不久前我预见了一个新的趋势：都市运动，尤其是在隔离化的城市地区，产生了其黑暗的一面：

如果没人理会都市运动的诉求，如果没有新的政治渠道，如果新的主要的社会运动（女性主义、新劳工、自我管理、另类沟通）没有被充分发展，那么都市运动——试着照亮这些他

<sup>①</sup> 卡多索第李特（Cardoso de Leite, 1983）；高恩（Gohn, 1991）。

<sup>②</sup> 艾毕诺莎与巫塞奇（Espinosa and Useche, 1992）。

们不能行走的乌托邦——将会再起，但这次是以破坏俘虏他们的城市（captive city）之高墙的都市黑暗面的姿态出现。<sup>①</sup>

所幸的是，都市运动并非全然的失败。尽管缺少了可以连结上过去 20 年浮现了新社会变革的主要的社会运动，地方社群组织各种形态表达的确带来改革、生存及自我确认之道。然而在贫穷的地方社群中，他们的社会生活及组织被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严苛的经济调整政策、政权合法性的广泛危机以及“流动空间”排除“地方空间”（参考第一册）等问题所破坏。在美国的城市中，数十万年轻人以帮派为他们的联盟、工作及认同，珍高斯基（Sanchez Jankowski）在他针对帮派全面的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中指出，<sup>②</sup> 在许多地区，帮派扮演了组织的角色，或者也可以解释为何地方居民对帮派拥有模棱两可的感觉——一部分是惧怕，但另一部分来说他们觉得帮派社会比起主流社会更与自己有关联，主流社会对他们而言只有压迫。帮派或类似的组织绝不是美国的“涂鸦”作品。在拉丁美洲的贫穷社区中，pandillas 此字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在雅加达、曼谷、马尼拉及巴黎和马德里，此字代表同样的意义。在许多社会中帮派已经有长远的历史，尤其在美国（记得威廉·怀特 William White 写的《街角社会》吗？）。然而 20 世纪 90 年代的帮派有着新的特征：即在信息文化扭曲镜面中建构认同。珍高斯基与普卓吉尼（Magaly Sanchez 及 Yves Pedrazzini）在研究加拉卡斯（Caracas）的坏男孩（malandros）的结论中，称此现象为“紧急文化”。<sup>③</sup> 它是生命即将结束时所产生的文化，是庆祝生命的结束而不是否定。因为没有明天，所以就要把握好现在，尝试、感觉、实验及完成所有的事。这和消费自恋狂有什么太大的

① 卡斯特（Castells, 1983: 327）。

② 珍高斯基（Sanchez Jankowski, 1991）。

③ 珍高斯基与普卓吉尼（Sanchez and Pedrazzini, 1996）。





差别呢？加拉卡斯或其他地方的“坏男孩”比其他人更了解所谓的新社会是怎么回事吗？新的帮派认同是不是集体的极端个人主义文化呢？之所以称为“个人主义”，乃是因为在及时行乐观当中，只有个人才是适当的计算单位。之所以称为“社区主义”乃是因为极端个人主义必须依赖他人的赞赏与相互支持——成为一个社区——它才能社会化成为一种价值，而不只是无意义的消费。它是一个社区，如同怀特时代的一般。但它和怀特时代的社区不同的是它会随时爆发，它是时间终点的社区，是无限时间的社区，它代表网络社会的特征，它是区域性地存在、爆发。地方的紧急文化是全球无限时间的逆向表现方式。

地方社区由集体行动建构，由集体记忆保存，因此它是认同的特定来源。然而在大部分的案例中，这些认同是为抗拒世界的无序、无法掌握及快速节奏的变迁而产生的自我防卫反应。它们建立的是避风港，但不是天堂。

## 小结 信息时代的文化社区

我们文化及社会的转化必须来自数个不同的层面，如果它只在个体的心中发生（某种程度上已是如此），那是没有力量的。如果它只来自国家的，那将是专制的。在庞大的人群中的个人转化是很重要的，它不仅是包含个体意识的转化，也必须要有个体的行动。不过个人必须要有道德传统的群体的养育才能强化他们的抱负。

——罗伯特·贝拉等（Robert Bellah et al），《人心的习性》<sup>①</sup>

<sup>①</sup> 贝拉等（Bellah et al., 1985: 286）。

社区各种图像的知识之旅对我本章最前面提到的“如何在网络社会建构认同”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基本的答案。

对那些被排除或抵抗依附于全球网络的权力与财富的个人主义认同的社会行动者来说，宗教、民族、地域性基础的文化社区似乎提供了我们社会中建构意义的另类选择。这些文化社区有三个主要特点：他们表现了对于社会盛行趋势的反动，这种抗拒是为了保护意义的自主性来源。他们的防卫性认同是以避难及团结的方式来运作，以对抗有敌意的外在世界。它们被文化所构造，为一套特殊价值观所组织，而这些价值观的意义及共同处由一套特殊的自我确认的符码来表示特征：亦即具有共同信念的人形成的社群、民族主义的图像以及地域性的地理学。

虽然群族性是我们社会基本的特色，特别当它是歧视及刻板的印象的来源时，但族群并不必然会导致社区的存在。相反的，却更像是为宗教、民族、地域性所加工处理，族群性倾向于强化了这些特殊性。

这些文化社区的构成却非任意的。它们是在历史、地理、语言及环境等原料上慢慢作用。因此，它们是被建构的，但是是以历史/地理上已决定的反应及计划，物质地建构起来的。

宗教上的基本教义派、文化民族主义及地域性社区，大体来说是防卫性的反应。它们是为对抗本世纪人类社会最大的三个威胁而产生的行动：它们对抗全球化，因为全球化瓦解了人类生活中的机构、组织及沟通系统的自主性；他们对抗网络化及弹性，因为它模糊了成员以及参与的边界，将社会的生产关系个体化了，而且引入了工作、空间及时间的不稳定；它们也对抗父权式家庭的危机，因为父权式家庭原本是打造安全感、社会化、性欲特质及人格系统转化机制的根基。当世界变得太大让人无法控制时，社会行动者便想要将它缩回到可以掌握的大小。当网络系统将时间和空间瓦解时，人们便想要自己固定在某一个地方，回想他们自己的历史记忆。当家长式的人格制度崩溃时，人们便想要



强调家庭及社会的超越性价值，将之视为上帝的旨意。

通过由历史材料产生的新的文化符码，这些防卫性的行动成了意义及认同的来源。因为人们所对抗的新的支配性过程是依附于信息流动之中，所以自主性的打造也必须倚赖相反的信息的流动。神、民族、家庭及社区将提供坚实、永恒的符码，它将对抗攻击，抗拒真实的虚拟文化。永恒的真理不能被虚拟化，它具体化存在于我们之中。所以，身体在抗拒文化的信息化的同时，它本身便被信息化了。也就是说，个人在他们心目中供奉着神。他们不求理性，他们只是相信。他们是神永恒价值的身体显示，因此，他们就不会被消解，流失在信息之流及跨组织之网络的漩涡中。这就是为何语言及社区意象对重建自主的个体之间的沟通时是如此的重要，它可以逃避无历史性流动的支配，但也同时可以重新在信徒间建立新的有意义的沟通模式。

这种形式的认同建构主要是建立在“抵抗性的认同”的原则下，我在本章最前面已经对此作了定义。“正当性的认同”似乎已进入危机阶段，原因是工业时代市民社会的急速瓦解，以及作为合法性根据的民族—国家的消逝（参考第五章）。事实上，组成新抗争的文化社区在建构认同时脱离了他们的根源，即公民社会及国家机构。例如，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脱离了经济现代化（伊朗）及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同样的，民族主义运动向它们所在的民族国家及社会的国家制度挑战。文化社区这种对公民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否定造成社区边界的关闭。和多元、分化的公民社会相反，文化社区在内部呈现很小的差异性。事实上，它们的力量及他们的提供庇护、安慰、稳定与保护的能力正是来自它们共同的特性、集体的责任及取消个体计划。因此，在反应的第一个阶段中，由防卫性认同（再）建构意义的过程是借着脱离社会制度，许诺由底层重建，缩回到社区天堂中。

通过如此的社区或许有可能产生新的主体——亦即社会转化的集体代理人（collective agents）——并可能环绕着“计划性认

同”建构新的意义。事实上，我会认为，在公民社会及民族国家已面临结构性危机的状况下，这或许是存在于网络社会中最主要的且是潜在性社会变革的根源，至于这些反抗的文化社区为何及如何可以形成新的为了改变而动员的主体，这种网络社会中的社会运动就是我在本册书中要分析的主要议题。

不过，根据本章的观察和讨论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各种计划性认同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必然。文化的抵抗可能局限在社区的界限之内。无论在何时何地，如果此种情况发生，社区主义将会使其潜在的基本教义派捆绑在其自身上，最后可能导致社区天堂变成天堂中的地狱。

## 第二章 地球的另一面

### ——对抗新全球秩序的社会运动

你的问题与许多人一样。这跟所谓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社会与经济学说有关。这是一个后设理论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是从“新自由主义”是一项学说的假设出发。而且不仅是你，其他一些思想僵硬与头脑简单的人也一样。你们认为新自由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学误，能够对抗资本主义所指控的由“民粹主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然而，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并非是一种能够解释危机或处理危机的理论。是危机本身产生了理论及经济学说！就是说，“新自由主义”一点都不具有一致性，更没有蓝图或是历史的视野。我的意思是，它纯粹就是理论的狗屎！

——杜利朵（Durito）1994年在蓝开登森林（Lacandon Forest）与副总指挥马可士（Marcos）的谈话<sup>①</sup>

---

<sup>①</sup> 杜利朵在札巴提斯塔的发言人副总指挥马可士的写作中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角色。他是一只甲虫，不过却是一只聪明的甲虫。事实上，他是马可士的智囊。问题是杜利朵经常害怕被马可士身边为数过多的游击队给挤扁，因此他恳求马可士尽量把动作保持在小的规模。这段杜利朵文字引自“札巴提斯塔国家解放军/副总指挥马可士”（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Subcomandante Marcos）（1995：58-59），由我做的翻译。

## 第一节 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社会运动<sup>①</sup>

由财富、科技及权力的网络所发动的全球化及信息化，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它们提升了我们的生产力、文化创造力及传播潜能。同时，它们也削弱了社会组织的权威。当国家制度及公民社会的组织是以文化、历史与地理为基础时，历史节奏突然地加速以及计算机网络中权力的抽象化，正将原有的社会控制及政治再现加以解组。除了几个全球政体（一半已经产生，另一半还在生成之中）的少数精英，世界上的人们都厌恶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工作、经济、政府、国家甚至最后是对整个地球的命运失去控制的状况。于是，根据社会演化的古老定律，支配引发了对抗，无力感导致对授权的要求，而另类的计划则挑战了植根于全球新秩序中的逻辑，这些逐渐被世界上的人们感受为失序状态。然而，这些反应及动员，就像历史中所出现的一些案例，它总是以不寻常的形式展现，所进行的方式也是无法预期的。本章及下一章，就是要探讨这些路径。

为了在保持分析焦点的同时，也能够扩展调查的经验范围，我将对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反对新全球秩序的三种运动进行比较。它们产生于非常不同的文化、经济及制度的脉络，意识形态上也有鲜明的差别：它们分别是墨西哥恰帕斯的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Zapatistas in Chiapas）、美国的民兵（American militia）以及日本的教派奥姆真理教（Aum Shinrikyo）。

<sup>①</sup> 这篇文章受益于 1996 年 4 月 16~19 日于加州圣塔克鲁斯所举办的由“国际社会学学会社会运动研究委员会”组织的“全球化及社会运动的国际座谈”中许多具有价值的知识交流。我感谢这个座谈的组织者芭芭拉·艾普斯丹（Barbara Epstein）以及路易·马胡（Louis Maheu）对我的热情邀请。

下一章我将对环境运动进行分析，它可被称为是当代最具全面性、最有影响力的运动。透过它多元发声中创造性的杂音，环境主义以自己的方式挑战了全球生态失序。而事实上，这样的生态失序，其实是由未加控制的全球发展，以及前所未有的科技力量的释放在未察觉对社会及环境的永续性所造成的影响之下所带来的一种生态自杀的冒险。但环境运动，其社会运动的文化及政治的特殊性以及作为一个推动而非反动的角色，暗示了对于环境运动必须要有一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因为环境运动不同于立足于个别认同的战壕式的防御性运动。

在进入核心的讨论之前，容我介绍三个简短的方法论的摘要，这会有助于理解接下来几页的分析。<sup>①</sup>

首先，**社会运动**必须要从它自身的用语来理解：也就是说，它们就是它们所声称的（they are what they say they are）。其实践（尤其是论述实践）就是其自我定义。这个取向将我们带离诠释运动的“真正”意识的危险任务——这种说法认为像只有在显示了“真正的”结构性矛盾时，社会运动才存在。仿佛为了要真正存在，社会运动必须要如身藏武器、挥舞大旗一般地包含了这些矛盾。另一种不同的、必要的研究操作则是在许多运动之间发展出这样的关系，因为社会运动是被其实践、价值、论述以及这些运动都相互结合于其中的社会过程所定义的。举例来说这些社会过程包括全球化、信息化与代议民主的危机以及媒体领域在符号政治所进行的控制。在我的分析中，我将会试着同时尝试这两种操作：一方面是从每种运动自身独特的动力来刻画其特征；另

---

① 对于在此处与社会运动相关的理论讨论，参见卡斯特（Castells, 1983）、达顿及克斯乐（Dalton and Kuechler, 1990）、艾普斯丹（Epstein, 1991）、利启曼及波昂（Reichmann and Fernandez, 1994）、克德任（Calderon, 1995）、戴比及维加（Dubet and Wiewiorka, 1995）、马胡（Maheu, 1995）、梅卢西（Melucci, 1995）、杜罕（Touraine, 1995）、杜罕等（Touraine et al., 1996）、矢泽（Yazawa, 即将出版）。

一方面是它与引发其存在并被其存在加以修正的整个广大过程的两者的互动。我赋予社会运动的重要性会反映在我的写作中。在呈现及分析运动的时候，我会紧紧地追随他们自身的用字 (words)，而不只是我的工作资料上所记录的想法 (ideas)。然而，为了免于读者困扰于引用资料的琐碎细节，我采取了将形塑我的论述的原有引述资料加以呈现的方式，而让有兴趣的读者在这些材料中去找寻我写作中所报道的一些精确的字眼。

其次，社会运动有可能在社会面上是保守的，也有可能在社会面上是革命的，可能两者皆是，也可能两者皆非。最后，我们现已得到的结论（我希望是这样）是：社会的演化并没有一个预先决定的方向，惟一的历史感是我们所感知的历史。因此从一个分析的角度而言，并不存在着所谓“好的”或者“坏的”社会运动。它们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症候，也都对社会结构造成冲击，而这些冲击的程度及结果有待研究加以掌握。因此，我喜欢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我不喜欢美国民兵，而我对奥姆真理教则感到震惊。然而，就像我将要阐明的那样，它们都是有意义的新社会冲突的符号，也是社会抵抗、甚至在某些例子中是社会变迁的胚胎。只有以一种开放的心智来扫描这些新的历史地景，我们才能辨明光明路径或幽暗深渊，踽踽迈向从当今危机中浮现的新社会。

第三，在下面的几章为了要从社会运动大量零散的材料中整理出一个秩序，我发现阿兰·杜罕 (Alain Touraine) 用来定义社会运动的古典类型学的三个原则有助于我进行一些分类。这三个原则是：运动的认同、运动的对立面以及我称为社会性目标 (societal goal) 的运动的视野或社会模型<sup>①</sup>。在我自己所作的修

<sup>①</sup> 杜罕 (Touraine, 1965, 1966)。杜罕的用语其实采用了稍微不同的用词。用法语来表示，是认同原则、对立原则及整体原则 (principe d'identité, principe d'opposition, principe de totalité)。我认为对于国际性的读者来说，使用较为朴实的用字来说同样的事情会比较清楚的，虽然这样做可能会失去法语原来的一些韵味。





改中（我认为仍然和杜罕的理论相一致），认同所指涉的是运动对于它是什么以及如何行动的自我定义，对立面所指的是运动中明确指出的主要敌人。社会性目标指的是运动对于某种社会秩序或社会组织的视野，它希望能在集体行动中所达到的历史高度。

在弄清这个出发点之后，让我们开始航向地球的另一面，在这里，拒绝了为助长资本所进行的全球化，以及为助长科技所进行的信息化。在这里，对于过往的梦想以及未来的惊魇，寄居在一个充满了激情、慷慨、偏见、恐惧、幻想、暴力、有瑕疵的策略以及幸运的出击之中。总归而言，是人性。

这三个我挑选用来理解对全球化展开反叛的运动，在认同、目标、意识形态以及它们与社会的关系这几个面向上，有着极端的差异。<sup>①</sup>这正是比较的有趣之处，因为三者的相似点是对新的全球秩序的反叛，并在论述中及实践上将它指明为敌人。而三者不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都同样对于他们的社会造成明显的冲击。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已经转化了墨西哥，使墨西哥盛行的腐败政治及不公平的经济产生危机，此外也进一步地为在墨西哥及全世界引起热烈讨论的民主重建提出方案。美国民兵，它是一个更广泛的自我定义为“爱国者”（或者被它的批评者称为“错误的爱国者”）的社会政治运动中最为好斗的成员。在美国社会，它有着比一般人认知到的还要更深的起源，因此有可能在美国紧绷的政治情境中引发无法预测的、重要的结果，我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而奥姆真理教，虽然在日本社会只是一个教派，却左右了媒体与公共辩论的焦点长达一年之久（1995~1996年），它像是一种征兆，预告了在日本和平的面貌之下所隐藏的伤痕以及正在展开的戏幕。我将这些具有差异性的、强大的反叛事件放在一起，

---

<sup>①</sup> 这个比较性的分析是以在1995年与矢泽一郎以及艾玛姬斯尤娃所进行的研究为基础的。参考卡斯特编（1996）。

所要说明的正是对抗新全球秩序的不同根源。同时也要提醒，在几个具有历史独特性的社会开始对全球流动的控制体制展开报复时，新自由主义关于历史终结的幻觉可以说已经结束了。

## 第二节 墨西哥的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 第一个信息化的游击队运动<sup>①</sup>

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的人民运动，是一个反对以金钱及政府的权力进行组织性犯罪的社会整体结构的社会运动，  
——《札巴提斯塔人民运动宣言》，1995年8月

① 就像这本书中常出现的那样，在这里对于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的分析要深深地感谢两位女士的贡献。塔斯卡诺（Alejandra Moreno Toscano）教授，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杰出的都市史学者、墨西哥市社会福利部的前任秘书。在1994年墨西哥政府与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展开交涉的前几个月，她是总统的代表曼威·克马楚（Manuel Camacho）的副手。她提供资料给我，同时也给我提出意见及洞见，同时很重要地帮助了我对墨西哥1994--1996年的政治进行了解。她的分析（是我曾经读过的最具深度的一个取向），参见塔斯卡诺（Moreno Toscano, 1996）。第二位女性是特洛斯（María Elena Martínez Torres），她是我在柏克莱的博士班学生，她对于恰帕斯州的农民有十分透彻的观察。在我们知性的互动中，她给我提供了许多的分析（Martínez Torres, 1994, 1996）。当然，我自己对这本书的结论中所包含的这些诠释以及可能的错误负完全的责任。其他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运动的资料来源包括：里昂加西亚（García de León 1985）、阿奎拉及罗丹斐得（Arquilla and Rondfeldt, 1993）、柯里尔及克里地欧（Collier and Lowery Quaratiello, 1994）、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1994, 1995）、地拉布莱（Trejo Delarbre, 1994a, b）、克里尔（Collier, 1995）、那瓦罗（Hernández, 1995）、那西等（Nash et al., 1995）、罗浩斯（Rojas, 1995）、罗丹斐得（Rondfeldt, 1995）、泰罗代尔斯（Tello Díaz, 1995）、华敦伯格（Woldenberg, 1995）。



墨西哥政治历史的独特之处在于以另类沟通为基础反转了当权者的控制过程……而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的政治战争的新奇之处在于出现了各种的信息传送者以相当不同的方式对事件进行诠释。

公共信息经由媒体以及新科技工具向社会传送的流动方式，远超过传统沟通策略所能控制的程度。马可士 (Marcos) 发表了他的意见，教堂方面也提出了意见，同样的，公正客观的记者、非政府组织、知识分子等，从森林、从墨西哥市、世界的金融及政治首都，都发表了各自的意见。这些另类的观点，不管是来自于开放性媒体，还是由于封闭性媒体感受到开放性媒体的压力才产生，它们质疑了所谓“真相”建构的形式，并且引发了包括来自于政权内部的各式各样的意见。权力的观点变得分歧。

——马兰诺·塔斯卡诺 (Moreno, Toscano)，《政治动荡》(Turbulencia politica)，第 82 页。

墨西哥，这个曾作为 20 世纪社会革命原型的国家，现在的景象却是 21 世纪跨国社会网络战争的原型。

——隆非德 (Rondfeldt)，《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1995)。

在 1994 年 1 月，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NAFTA) 的第一天，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 (Eje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on Nacional) 组织了大约 3000 名男女，以简单的武装控制了邻近蓝开登 (Lacandon) 森林以及位于南墨西哥州的恰帕斯的几个主要城镇：圣克里斯堡 (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阿他米拉诺 (Altamirano)、欧卡西果 (Ocosingo) 以及拉司马格利特司 (Las Margaritas)。虽然解放军成员同是白人与印地安人的混血，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却是来自

于不同族群团体的印地安人。而他们之中的一些领导人，特别是发言人副总指挥马可士，则是都市中的知识分子。这些领导人将脸孔隐藏在滑雪帽之后。当墨西哥军队调派援军时，这些游击队成员便以良好的秩序撤退到森林中。然而，最后有数十名的游击队员与平民、一些军人及警察，在同军队作战中死亡或是在事后被立即处死。墨西哥暴动所引起的冲击以及在这个国家及全世界对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所立即引发的普遍同情，说服了墨西哥总统萨立南（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展开交涉。在1月12日，萨立南宣告了单方面的停火，并且指定他的“和平代表”克马楚（Manual Camacho）——一个受到敬重的墨西哥政治人物，他一度被认为是萨立南可能的接班人，但是在他的总统梦受挫于萨立南之后，已经从政府中辞职（参照我在第五章对于墨西哥政治危机的分析）。克马楚以及他所信任的智囊托斯卡诺（Alejandra Moreno Toscano），跋涉到恰帕斯州，与具有影响力的天主教的主教路兹（Samuel Ruiz）会晤，并终能与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进行数场和平谈判。虽然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仍然对于可能的压制以及/或是操弄仍保持适度的警觉，但他们随后承认了这个对话的诚意。克马楚以索纪尔语（tzotzil）对反叛者宣读了一个文件，同时以索纪尔语以及裘尔语（chol）加以广播，这是墨西哥官方领导人有史以来首度承认印地安语言。在1月27日，一项协议被签署了，商议停火、双方释放囚犯以及开始在一个更广的政治改革、印地安人的权利及社会要求等议程上进行谈判。

### 一 谁是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

这些反叛者是谁？他们虽然在恰帕斯州以及瓦哈卡州（Oaxaca）的社区中进行过将近20年的农民动员，但在这之前，世界的其他角落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他们都是农民，其中多数人为印地安人，是印地安人之中的柴图（tzeltales）、索纪尔以及



裘尔部族，他们大多数来自于 20 世纪 40 年代在与瓜地马拉边境上的蓝开登雨林所建立的社区。政府当时支持这些社区的设立，认为这样能够解决被主要属于白印混血的地主逐出农场以及牧场的佃农所产生的社会危机。几个世纪以来，印地安人及农民被殖民者、官僚以及拓垦者所奴役。而数十年来，因为配合着政府及地主的利益，造成他们居住地的位阶经常改变，而使得他们经常处于一种无保障的情境。在 1972 年，艾切维利尔（Echeverria）总统决定要创造一项艾祖尔山（Montes Azul）的“物种保存”（“bioreserve”），以及将大部分的森林归还给源于蓝开登部落的 66 个家庭，于是下令那些从原来的社区中被驱逐、然后定居在这个区域中的 4000 个家庭再度迁居。在蓝开登部落及对大自然突然的关爱的背后，隐藏的是获得了原木开采权的政府开发法人“国营金融机构”（NAFINSA）所支持的可伐洛沙（Cofolasa）林业公司的利益。大多数的居民拒绝搬迁，而为了他们的土地权力展开了长达 20 年的斗争，一直到萨立南在 1988 年就任总统时，还仍然持续着。萨立南最后认可了某些殖民者的权力，但将他的慷慨局限于支持执政的革命制宪党（PRI, 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的少数人。1992 年新法令取消了为了二度安置而进驻此地的印地安人的法定权利。这一次的理由是里约环境会议以及保护雨林的需要。这个地区的养牛业也被保护，以便使恰帕斯的畜牧业能够与从瓜地马拉走私牛只两者相互竞争。对于农业社群脆弱的经济施予最后一击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为了准备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而实施的墨西哥式的自由化政策，它取消了对进口玉米的限制以及废除对咖啡价格的保护。以林业、养牛、咖啡以及玉米为基础的本地经济于是解体。更有甚者，在萨立南对于墨西哥宪法具有历史意义的 27 条进行修正之后，共有土地的地位也变得不确定了。为了要将个人土地完全商业化，它终止村民对于农业土地的共有权。这是为了顺应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墨西哥另一项朝私人化归队的行动。在 1992~1993 年，农民被

和平地动员起来反对这些政策。但是在来自巴列奇 (Palenque) 及墨西哥市等地的数千名的农民进行名为“希尼” (Xi' Nich) 的盛大游行而仍然没有得到答案之后, 他们改变了战术。在 1993 年中的时候, 蓝开登大部分社区, 玉米没人种、咖啡也被遗留在灌木丛中, 孩子们不再上学, 牛被卖掉来买武器。反叛者在 1994 年 1 月 1 日所发出的头条写着: “今天, 我们说‘够了’!”。

这些农民团体, 大部分是印地安人, 联合了其他从洛斯阿图司 (Los Altos) 地区来开垦的农民,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进行社会斗争以来就不孤单。他们在圣克里斯托堡 (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s) 的主教路兹 (Samuel Ruiz) 以有点是结合了解放神学的倡议之下, 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 某个程度也可说是由后者所组织。这些神职人员不只支持而且合法化了印地安人的吁求, 他们也促使了几百个农民组合的成型。这些组织同时是教会及农民组合的成员。有几百个神职人员助理以及几千个传教士为以农民同盟为形式的运动提供了架构, 而他们每一个人都以社区为基础。教育、信息以及来自于教会的支持, 进一步强化了印地安农民之间强烈的宗教感情, 使得地方教会一方与恰帕斯农场主及 PRI 机构所形成的另一方两者之间发生了持续性的冲突。然而, 虽然教会对于教育、组织及动员农民等方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与农场主的指控相反的, 路兹以及他的副手却反对武装斗争, 也没有加入反叛者的队伍。这些组织武装叛乱的干部们, 大多数出身于印地安社群, 特别是在经济萧条以及社会斗争的新思潮中长大的年轻男女。其他干部则来自于 20 世纪 70 年代, 在 1968 年的学生运动在提拉达罗卡 (Tlatelolco) 屠杀中被粉碎后, 在墨西哥都市地区产生的毛主义的群体 (特别是墨西哥市以及蒙特利市)。札巴提斯塔解放军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活跃在这个地区, 虽然这一说法在记载上相当分歧。不过在每个案例中, 不管根源为何, 似乎在都市地区一连串的反挫之后, 有一些革命分子, 男



男女女，通过耐心的工作及分享每日的辛劳及战斗，进行了长期的战斗，在这个国家遭到最高度压迫的这些领域之上，建立了人们对他们的信任。根据政府的消息，马可士似乎是民兵的成员之一，他在墨西哥及巴黎完成了社会学及传播的学业，以及在墨西哥市最好的学校之一执教社会学之后，在80年代早期来到这个区域。<sup>①</sup>显然地，他是一个十分博学的知识分子，能说数国语言，书写流利，还独具想像力，同时拥有高度的幽默感，并与媒体有着良好的关系。这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诚恳以及奉献，受到神职人员的欢迎，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虽然意识形态上有着差异，但是仍然可以一起合作、组织农民群体并支持他们的斗争。但到1992年之后，当改革的承诺一直没有兑现，以及蓝开登社区的情势因为墨西哥经济现代化的全面过程变得更加危急，使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结构重组，而展开了游击队战事的准备行动。在1993年5月，爆发了首度与军队的零星冲突，但墨西哥政府将它低调处理，以避免美国国会对它在北美贸易协议的批准产生问题。然而，要强调的是札巴提斯塔解放军的领导权原本是农民，而且主要是印地安人。马可士以及其他的都市民兵无法独自行动<sup>②</sup>。解放的过程以及与政府谈判的交涉过程，其基础是社区的充分参与以及耗时的程序。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一旦决定被作成，整个社区必须要遵守共同的决定，面在一些情况中，还必须将拒绝参与反叛的村民逐出。然而，在历时两年半的公开反叛的过程中，蓝开登社区压倒性的大多数，以及大多数印地安及恰帕斯的成员，都展现了他们对叛军的支持，当1995年2月军队接收了他们的村落之后，便追随他们到森林中。

① 墨西哥政府声称他们已经掌握了副总指挥马可士以及札巴提斯塔解放军其他主要领导人的资料，而且这些说法听起来蛮可信的，媒体也据此大肆加以报导。然而，因为札巴提斯塔解放军在我写作的当时还是一个反叛组织，我不觉得接受这些讲法作为事实是一件合适的事。

② 马兰诺·塔斯卡诺 (Mereno Toscano, 1996)。

## 二 札巴提斯塔解放军的价值结构：认同、敌人及目标

反叛的深层理由非常明显。但叛军的要求、目标及价值如何呢？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指明敌人？一方面，他们将自身摆在500年反抗殖民及压迫的历史连续体中。的确，农民运动的转折点是在1992年10月12日在圣克里斯堡的群众示威，当时摧毁了恰帕斯的征服者马查理哥斯（Diego de Mazariegos）的塑像，以抗议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进入第五个百年。但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新全球秩序的新形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总统萨立南所采取的改革形式是这种压迫的轮回，因为它们无法涵括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以及印地安人。墨西哥宪法的历史性第27条文的修订，是在形式上满足了由札巴塔（Emiliano Zapata）所领导的平等主义革命分子的要求，但它变成了自由贸易的新秩序排拒了农民的象征。这是整体运动都共同分享的批判观点，而马可士以及其他人士则据此对新的全球秩序提出了挑战：在中美洲历经共产主义的死亡及游击队运动的衰退之后，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之梦的计划。正如马可士用嘲讽的语调所写的那样：

不再有什么值得战斗的。社会主义已死，而顺从主义、改革、现代化、资本主义以及其他残酷的种种却长命百岁。头脑清醒点。城市、乡村天下太平，万事不变。社会主义已死，资本主义长命百岁。收音机、报纸以及电视复诵着。一些社会主义者，现在变成理性的悔改者，也同样复诵着。<sup>①</sup>

于是札巴提斯塔解放军对新全球秩序的反叛有两重意义：他们反对经济现代化所造成的排挤结果；但他们同时也对资本主义被普遍接受的情境下所造成的新地缘政治秩序的宿命提出挑

<sup>①</sup> 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EZLN，1994：61）；我的翻译。





战。

这些叛军肯定了他们作为印地安人的骄傲，并且为了墨西哥宪法承认印地安人的权力而奋战。然而，在运动中捍卫族群认同却似乎不是主导的元素。事实上，蓝开登社群的产生来自于强迫迁居，原有不同社群的认同已经被打破，农民身份使他们成为一体。并且，如开立尔（Collier）所写，似乎是：

在恰帕斯中央高地，族群认同曾经分裂了原住民社群。最近的事件却彰显了一种转化：现在，在札巴提斯塔解放军的反叛出现后，不同族群背景的人们强调他们彼此处在相同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剥削的情境。<sup>①</sup>

于是通过斗争，他们建构出新的包括了不同族群的印地安认同。“我们共同之处在于土地赐给我们生命及斗争”。<sup>②</sup>

札巴提斯塔解放军并非是叛国分子，而是具有正当性的反叛。他们是墨西哥爱国主义者，反对美国帝国的外力主导。他们是民主派人士，为了墨西哥宪法第39条提出请愿要求“人民有改变或修正他们的政府形式的权力”。所以，他们期望墨西哥人支持民主政权，结束目前以选举骗术为基础的一党统治。这个呼

---

① 克里尔（Collier, 1995: 1）；马丁尼·托洛斯（Martinez Torres, 1994）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论点。在1995年11月札巴提斯塔解放军在网络上所刊载的宣言中，除了要纪念组织创设12周年，再捍卫印地安的认同之外，他们特别地强调自身做墨西哥的正义及民主运动的特点：“我们所要的一个国家是要作为所有墨西哥人的国家，而不是只属于印地安人。我们所要的民主、公平及正义是要为所有的墨西哥人所有，而非印地安人独有。我们不想要从墨西哥民族中分裂出来，我们想要继续作为其一部分，我们想要被公平地对待，像一个有尊严的人……我们是兄弟，就如以往。正在面临死亡，但这次要活下去（《札巴提斯塔解放军：网络上的宣言》，1995年11月17日）。

② 《札巴提斯塔解放军宣言》，1994年2月，是我从马兰诺·塔斯卡诺（Moreno Toscano, 1996: 92）所引用过来的。

吁来自于恰帕斯——墨西哥各州中执政党候选人支持度最高、传统上是被地方土豪所强制的地方，却引发了墨西哥社会渴求自由、厌恶制度腐败的都市中产阶级的回响。整个反叛行动选择在总统选举这一年发动，而且是一次被认为执政党对于国家的控制将要松绑的选举，这是札巴提斯塔解放军战术能力的一种展现，也是保护他们免于强力镇压的一个因素。总统萨立南想要建立政绩，作为墨西哥经济现代化及政治民主化的奠基者，不只是为了他在历史中的地位，而且为了他的下一份工作：竞选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的首任秘书长。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一个哈佛出身的经济学家，很难对一个农民及印地安人出身、反对社会排挤的运动，进行军事性镇压。

### 三 札巴提斯塔解放军的沟通策略：国际网络（互联网）及媒体

札巴提斯塔解放军的成功主要可归功于其沟通策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可被称为是“第一个信息化的游击队运动”。在极力避免引起血腥战争的同时，他们创造了一个媒体的事件以散播信息。当然，也有真实的死亡、真实的武器，并且马可士及他的同志们随时准备赴死。然而，这些真实的战事并非他们的策略。札巴提斯塔解放军用武装备战作为声明，然后在世界媒体的面前以他们的牺牲的可能性作为筹码，迫使谈判以及提出一连串合理的要求。这样的做法大致上来说似乎获得了墨西哥社会普遍的支持，民意调查的结果似乎也是如此。<sup>①</sup>对札巴提斯塔解放军来说，自动地沟通是一个重要的目标：

<sup>①</sup> 1994年12月8-9日所进行的一份民调显示：59%的墨西哥市民对于札巴提斯塔解放军有正面的看法，而78%认为他们的诉求是具有正当性的（1994年12月11日改革报所刊载）。



当炸弹掉在圣克里斯托堡南方的山丘上，当我们正在进行抵抗联军的战役时，当空中一直弥漫着硝烟及血腥时，札巴提斯塔解放军的“原住民革命决策小组”打电话告诉我，大概说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说话，而且让我们的声音能被听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别人会假借我们的声音，而从我们的嘴巴说出我们不想听到的谎言。我们必须找到说自己的话的方式，说给这些想要听我们话的人。<sup>①</sup>

札巴提斯塔解放军与世界、与墨西哥社会的沟通以及掌握人们及知识分子的想像的能力，将一个当地的、力量弱小的反叛团体推到了世界政治的前线。从这个意义而言，马可士是非常重要的。他对于这个根植于印地安社区的运动并没有组织化的控制，他也没有展现作为一位伟大的军事策略家的任何迹象，虽然当军队交战时，他总是很明智地指挥撤退。但他特别能够跟媒体搭起一种沟通的桥梁，无论是通过他的写作，还是他的精心布置（包括面罩、烟斗以及访问的场景）。有时候也有意外的收获，例如，面罩在将革命的印象加以大众化的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世界的每个角落、每个人都可以借着戴面罩而变成札巴提斯塔解放军。而且（虽然这也许过度理论化了），面罩是前哥伦比亚时期的墨西哥印地安文化中经常出现的仪式，因此反叛、面貌的均一化以及历史的闪光在具有创意的革命场景中彼此互动。在这个策略中，最基本的是札巴提斯塔解放军对于电讯、录像带以及计算机界面的通讯媒介的使用，同时可以将讯息从恰帕斯州传到全世界（虽然也许不是从森林中所传送出来的），并且也以此组织了世界性的连带团体的网络，而这事实上也就包围了墨西哥政府的镇压意图：举例来说，1995年2月9日军队对于反叛地区的

---

<sup>①</sup> 马可士 (Marcos)，1994年2月11日。这是我从马兰诺·塔斯卡诺 (Moreno Toscano, 1996: 92) 那里引用过来的。

入侵行动。在这里要指出很有趣的一点是，札巴提斯塔解放军使用网络的来源与90年代的两个发展有关。首先是“网络”（La Neta）<sup>①</sup>的诞生，其次它作为一个另类的计算机沟通网络以及被妇女团体使用，将恰帕斯的非政府组织（NGO）连结上其他墨西哥妇女以及美国的妇女网络。“网络”是被天主教教会所支持的墨西哥非政府组织之一，从1989年开始到1993年之间进行网络连结。另一个进行支援的是位于旧金山的“全球沟通中心”，这个组织则是由愿意为善良的目标奉献时间及专业的计算机技术人员所组成。在1994年，藉由福特基金会的资金协助，“网络”得以在墨西哥设立一个节点，而联系上私人的网络供应商。在1993年“网络”已经在恰帕斯州设立，它的目的是要帮助当地的非政府组织上线。这些非政府组织包括人权中心以及其他许多在札巴提斯塔解放军进行反叛时将讯息散播到世界范围内的众多团体。广泛地利用网络使札巴提斯塔解放军能够将它们的讯息以及诉求快速地散播到世界各处，而创造了一个支持团体的网络，以有助于产生一个国际公众意见运动。这确实使墨西哥政府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围绕着札巴提斯塔解放军的意象及讯息，对墨西哥的经济及政治产生了有力的作用，就如同特洛斯（Martinez Torres）所写的那样：

前总统萨立南创造了一个泡沫经济，在这数年间允诺了一个幻觉的荣景。它的基础是对于高利息的政府债券的大规模流进的炒作资金。因此经由一种循环性的贸易赤字及债务，而使得中产阶级及工人阶级能够在一段期间内享受大规模的进口的消费商品。然而就如同要吸引投资者进场那样简单一

<sup>①</sup> 在这里似乎有必要为非墨西哥的读者进一步厘清 La Neta 的多重语义。除了作为西班牙语的阴性用词的“网络”之外，在墨西哥话中，它的另一个意义是“真实的故事”。



般，一旦投资者的信心失去而潜在的恶性循环引来恐慌，并且影响到墨西哥的债券时，就有可能引起整个系统的崩溃。事实上（在1994年）墨西哥的经济是一场巨大的信心游戏，因为信心基本上是由对于信息的操控所创造的，它也完全能够被这样的方式所摧毁。在新的世界中信息是最有价值的商品。而与这同样真实的是讯息可以比子弹更有力。<sup>①</sup>

这对札巴提斯塔解放军来说是关键，它们的原意并非是要破坏经济。但是它们被不具同情心的媒体连结所保护。而借着它们以网络为基础的世界性联盟，从彻底的镇压、迫使协商，到提出社会排斥以及政治腐败的议题，为世界性的公众的意见提供了听闻。

事实上兰德（Rand）公司已经预测到像1993年发生的札巴提斯塔解放军类型的网络战争，而有这样的分析：<sup>②</sup> 未来的革命势力也许会逐渐结合了广泛的、没有特定国家认同的多重组织网络，并且声称是来自于民间社会，而且包含了充分适应于使用先进的沟通技术、甚至是军火的侵略性组织及个人。<sup>③</sup> 札巴提斯塔解放军似乎已经将这些新全球秩序专家们的最可怕的噩梦加以实现了。

#### 四 社会运动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

然而，当札巴提斯塔解放军的要求撼动了墨西哥的政治体系、甚至墨西哥的经济之时，它们也被自身与政治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给束缚了。一方面札巴提斯塔解放军借着强化墨西哥社会中类似的诉求，而要求政治体系的民主化，但是它们除了谴责选举中的骗术外，却没有办法对于自身的政治计划赋予准确的意义。在

① 马丁尼司·特洛斯（Martinez Tortes, 1996: 5）。

② 罗丹斐得（Rondfeldt, 1995）。

③ 阿奎拉及罗丹斐得（Arguilla and Rondfeldt, 1993）。

这同时，执政党已经是不可逆转地被动摇、并分裂成为许多彼此蓄意厮杀的小团体。1994年的总统选举变成相当地纯净，而将以一种意外的情势将奇迪罗（Zedillo）这个隐性的革命制宪党候选人带到镁光灯之下。这是由一种对未知的恐惧所凝聚起来的胜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札巴提斯塔解放军所给的压力，1994年2月27日总统候选人间的各项协议之后，选举过程中的政治改革却有助于选举的正当性。1994年8月札巴提斯塔解放军在蓝开登森林中一个名为阿瓜斯卡连特斯（Aguascalientes）的地方召开了一个全国民主会议。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地点，1915年革命的领导人维拉、扎巴塔、欧拉兹克（Villa, Zapata, Orozco）就是在此一起召开革命会议的。虽然有着本土组织左派政党、知识分子以及媒体的广泛参与，阿瓜斯卡连特斯会议却只是在这个事件中消耗掉自己，而没有能够在这个短暂性的集会中将新的札巴提斯塔语言转换成传统的左派政治的语言。因此在1995年的5月于圣安德斯（San Andres Larrainzar）与政府进行的延长性谈判中，札巴提斯塔解放军就成为一个平民的政治势力的可能性而筹办了对大众开放的会议。虽然有着明显的困难（它们仍然是一个反叛团体），在全墨西哥却有几乎200万的人参与了这个会议，而大多数人都赞成这样的提议。

因此，在1996年1月，为了纪念其崛起二周年，札巴提斯塔决定将自身转换为一个政党，寻求在政治过程中的全程参与。然而他们也决定在政府就所有的协商要点达成协议之前仍然保持武装。在1996年2月一项在未来将对于印地安人的权利给予宪法承认的重要协定终于达成了，不过在我写作时（1996年10月）关于政治及经济改革的其他协商仍在进行之中。一项困难的议题似乎是关于印地安人社区所声称的土地的所有权以及包括地底下的资源。这项要求被墨西哥政府坚决地拒绝了。因为大众普遍相信恰帕斯的地层中富有碳氢化合物资源。至于政治改革，因为革命制宪党所执政的政府并无意愿释放它所掌控的权力而使得



协商十分地困难。

札巴提斯塔解放军作为一个政党的潜力仍然是不确定的。一方面马可士在1996年年底前仍是墨西哥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一，但是另一方面，他受欢迎的大部分的因素却联系上他作为政治迷思中的地位。马可士若成为一位有前景的政客也许会让他的吸引力衰退，他本人似乎也警觉到这一点。因此，在我写到此部分的时候，马可士以及他的同志们仍然犹豫着是否要将他们的政治立场充分地加以制度化。虽然在墨西哥政治系统的转化尚未确定的脉络中，这似乎是这个反叛的一个可能的结果。

然而不管札巴提斯塔解放军的命运，他们的反叛的确改变了墨西哥，挑战了现代化以新全球秩序为特征的单向逻辑。借由锁定执政党阵营中现代化主义者以及腐败的党机器两者之间的强力冲突，札巴提斯塔解放军相当程度地有助于打破执政党在墨西哥的掌控。1993年呈现出繁荣景象的墨西哥经济，其弱点完全暴露了出来，促使美国对于北美贸易协定的批评者要求解释。而在晚近的拉丁美洲现代化过程中一直缺席的角色——印地安农民（大约占墨西哥人口的十分之一）突然活生生地出现了。在1996年11月，一项宪改也正在进行中，承认墨西哥多元文化的特色，给印地安人新的权利，包括公立学校所用的教科书以30种印地安语言出版。在许多印地安社区，教育及健康的服务也改善了，有限度的自治政府也正在具体化的阶段。

虽然是以一种重构的方式，印地安文化认同的肯定却连接上他们反对暴行的反叛。除了墨西哥马克思主义左派的背后力量的支持外，宗教情感决定性地支持帮助他们争取尊严的战斗。这是拉丁美洲民粹主义式的天主教主义的深层思潮。以普通大众拿起枪为社会主义战斗的意念为基础的左派，被转化成为通过网络和大众媒体，为民主、宪法权利面战斗的印地安、农民运动，它展现了拉丁美洲迈向解放道路的曲折之路。它也说明了，新的全球秩序引发了具有历史根基的抵抗资源，对全球资本流动逻辑进

行对抗，而产生了多重的地方失序。恰帕斯印地安人与昔日的毛主义军人及解放神学家，借由结盟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求旧日的社会正义的重要表现。

### 第三节 拿起武器反抗新社会秩序： 美国民兵及 20 世纪 90 年代的 爱国运动<sup>①</sup>

简言之，新世界秩序是一个乌托邦系统，在其中，美国

- ① 关于美国民兵以及爱国者的信息来源主要是总部位于阿拉巴马州的蒙特哥马利的南方贫穷法律中心。从 1979 年设立以来，这个优秀的组织展现了不凡的勇气以及效率来保护市民抵抗美国仇恨组织。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它设置了三 K 党/民兵研究小组，提供了准确的信息及分析来了解及反制新的及旧有的、反政府以及反人民的极端组织。若要了解我的分析中所使用的最新的信息，请参考三 K 党/民兵研究小组 (Klanwatch/ Minutia Task Force, 1996, 以下称为 KMTF)。另一个对于美国民兵提供资料丰富的分析的是史登 (Stern, 1996)。我也使用了我杰出的博上班学生马修·祖克 (Matthew Zook) 在 1996 年对于网络以及民兵的分析 (Zook, 1996)。另外本章中特别使用到的资料来源包括：库波 (J. Cooper, 1995)、反毁谤联盟 (Anti-Defamation League, 1994, 1995)、阿蒙德 (Armond, 1995)、阿姆斯壮 (Armstrong, 1995)、班耐特 (Bennet, 1995)、巴列特及里昂 (Berlet and Lyons, 1995)、《广播及有线电视》 (Broadcasting and Cable, 1995)、商业周刊 (Business Week, 1995d)、人类尊严联盟 (Coalition for Human Dignity, 1995)、库波 (Cooper, 1995)、赫德 (Herd, 1995)、贺尔维加 (Helvig, 1995)、乔登 (Jordan, 1995)、艾为斯 (Ivins, 1995)、麦斯威尔及太皮亚 (Maxwell and Tapia, 1995)、谢普斯 (Sheps, 1995)、《国家》 (The Nation, 1995)、欧尔 (Orr, 1995)、波理斯 (Pollith, 1995)、罗丝 (Ross, 1995)、盖洛普每月民调 (The Gallup Poll Monthly, 1995)、《新共和》 (The New Public, 1995)、《纽约日报周日版》 (The New York Time Sunday, 1995a, b)、《进步》 (The Progressive, 1995)、《时代》 (Time, 1995)、WEPIN 店 (WEPIN Store, 1995)、迪斯及克罗兰 (Dees and Corcoran, 1996)、温那理普 (Winerup, 1996)





的经济（与其他每一个国家一起）将会全球化；全美国与全欧洲的工资水准将会降低，而相当于第三世界的工人的工资水准；为了一些实际的目的，国家的界线消失了；第三世界流向美国及欧洲的移民流动将会上升，使非白人口成为世界上原本是白人的地区中的强势；跨国金融家、大众媒体的掌控人以及多国企业的经理所组成的精英将发动这场战争，而美国和平武力会用来保护每个人避免被这个系统所排除。

——威廉·皮尔斯（William Pierce），《国家前卫》（National Vanguard）<sup>①</sup>

网络是使民兵运动比史上其他仇恨团体扩展得更为快速的主要理由之一。民兵缺乏组织化中心的缺点被这种新媒体的快速沟通及传播谣言的潜力所弥补。在遥远的蒙大拿的任何民兵成员只要有一台计算机及数据机，就能够成为全世界网络的一分子，与他人分享他的思想、潜能、组织化策略以及恐惧，就像是一个全球的家庭。

——史登（Kenneth Stern），《平原上的武力》（A Force Upon the Plain），第 228 页。

1995 年 4 月 19 日在俄克拉荷马市，一辆满载着以肥料为原料所做的炸药的货车爆炸了，炸掉的不只是一栋联邦政府的建筑物以及 169 条人命，它更暴露出美国社会的一股强大暗流，在这之前，人们一直将这股力量归为传统的仇恨团体以及政治的边缘性。这场爆炸中的涉嫌爆破联邦政府建筑物的嫌疑犯蒂马斯·麦

---

① 引自白人至上主义者威廉·皮尔斯（William Pierce）1994 年 3 月在他的期刊《国家前卫》（National Vanguard）上面为 KMTF 引用的文章（1996:37）。皮尔斯是全国联盟的领导人，也是畅销书《透纳日记》（The Turner Diaries）的作者。

克文 (Timothy McVeigh), 曾经随身带着皮尔斯所写的关于名为《爱国者》的地下组织爆破联邦建筑物的小说。据报道, 麦克文在进行真正的俄克拉荷马的爆炸案之前几个小时, 曾经打过皮尔斯的私人电话。麦克文以及他的军中兄弟泰利·尼可拉斯 (Terry Nichols) (这两个人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在面临审判) 被发现与密西根的民兵保持着松散的关系。这个爆炸案发生在大卫教派的大部分成员以及他们的小孩在联邦干员的攻坚行动中丧生的渥克 (Waco) 攻击案届满两周年之际, 它就像是一个被全美的民兵组织的集体呼声所宣告的事件<sup>①</sup>。

民兵组织并非恐怖分子, 不过其中的部分成员有这种倾向。民兵是一种组织方式不同于恐怖分子, 但意识形态却相关的运动形式, 可称为是“地下爱国者”。他们以自发的、秘密的各个组织为基础, 分享整个运动的共同看法, 但是各自设定行动目标。这些团体已经承认在 1994~1996 年间所犯下的一连串的爆破事件、银行抢劫、铁路破坏以及其他的暴力行动, 而且他们行动的频率及威胁性也在持续上升中。数以吨计的炸药被从工业基地窃取出来, 而包括黄蜂便携式导弹以及成堆的军事武器也从军事基地中消失。同时也发现他们有要发展细菌武器的意图。而全美数以万计的“爱国者”正身怀武器, 并接受游击战术的正规训练<sup>②</sup>。

民兵是整个更广泛的、自我宣称为“爱国运动”<sup>③</sup> 中最为强悍并且有组织的一翼。它的意识形态光谱包含了如约翰·本西团体 (John Birch Society) 之类建制化的、极端保守的组织; 传统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以及包括了三 K 党 (Ku - Klux -

① 德州的民兵在渥克事件二周年, 也就是 1995 年 4 月 19 日之前几天, 发表了下列的诉求: “所有身体健全的国民们都要拿起武器集合起来庆祝他们武装的权利, 并且为了防卫共和国而战 (引自 The Nation 的编辑台)。”

② 三 K 党/民兵研究小组 (KMTF, 1996)。

③ 三 K 党/民兵研究小组 (KMTF, 1996); 史登 (Stern, 1996)。



Klan) 以及波西·卡米塔特斯 (Posse Comitatus) 反闪族民团; 以及如基督教认同 (Christian Identity), 一个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开始散布的英国以色列主义, 一种反闪族的狂热的宗教团体; 反联邦政府的运动, 如郡权利运动 (Counties's Right Movement)、"明智使用反环境联盟"、国家纳税人联合会, 以及"共同法法庭"的捍卫者。爱国者的光谱也以一种松散的形式延伸至强大的"基督教联盟", 以及许多强悍的"生命权利"组织, 同时也倚赖全国来福枪枝协会以及枪枝的拥护者的同情心。也许可以说有多少爱国者, 就有多少种类的诉求。虽然这个运动边界模糊, 也缺乏有组织的会员, 使得数目尚难以精确的估计, 但根据可靠资料的估计, 他们在全美有将近 500 万成员<sup>①</sup>。同时, 他们支持者所具有的影响力也不只是寥寥数千, 而是以百万计。这些迥然不同、之前没有关联的组织, 在 1990 年却能够分享以及扩展诉求的原因是他们所声明的共同的敌人: 新社会秩序的代表、反对美国人民意志的美国联邦政府。这个爱国运动中盛行的观点是: 目标锁定摧毁美国主权的"新世界秩序", 因为它是掌握了联邦政府的全球金融利益团体与官僚的阴谋。这个新系统的核心是世界贸易组织、三边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最重要的联合国。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peacekeeping forces) 被认为是以香港警察及廓尔克族 (Gurkha) 部队为先锋的跨国佣兵, 准备要压制人民的主权。对爱国者来说, 四个事件似乎证实了这样的阴谋: 1993 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通过; 克林顿在 1994 年通过了《布蓝迪法案》, 对于某些自动武器的买卖设下某种程度的控制; 1992 年白人至上主义者蓝迪·伟沃 (Randy Weaver) 围攻爱达荷 (Idaho), 他的太太最后死于联邦调查局手中; 以及 1993 年在渥克的悲剧进攻行动, 造成了大卫·科来西以及其信徒的死

<sup>①</sup> 巴列特及里昂 (Berlet and Lyons, 1995); 三 K 党/民兵研究小组 (KMTF, 1996); 温尼普 (Winerip, 1996)。

亡。对于这些事件的恐慌性解读使他们产生了一种信念：政府将使人民缴械，随后进行压制，以隐藏性摄影机、黑色直升机以及将新生儿植入芯片使美国人民屈服。因为这个对工作、隐私、自由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全球性威胁，于是他们反对圣经以及原始的美国宪法，除了它的增修条文之外，与这些条文相互一致地，两者都是从上帝而来，他们确信人民的主权及其在郡政府的表现，而不承认联邦政府在法律、法庭的权威以及联邦储备银行的有效性。这个选择非常具有戏剧性。以1994年2月所创立的蒙大拿民兵的字眼以及整个运动的组织性的激励用语来说：“加入军队服务联合国，否则就加入美国，在民兵中服役”（蒙大拿民兵在国际网络首页的座右铭）。联邦公务员，特别是掌管烟酒、军火的部门被视为是维护浮现中的世界政府的利益，而压制美国人的最前线。从民兵的观点来说这更正当化他们将联邦公务员视为运动的潜在标靶。因此，就像受欢迎的广播人乔顿·李迪（Gordon Liddy）在他的一次脱口秀中所说的那样：“（在他们的胸前）有一个大箭靶：ATF。别对准它开枪，因为底下穿着防弹背心。瞄准头、瞄准头。干掉这些母狗的儿子！”<sup>①</sup> 在这些高度异质的爱国运动中，有某些分支相信来自末日论的世界观以及末日预言的具有影响力的神话（参见第一章）。追随着启示录第13章，一些布道家，如兼为基督教联盟领导人与电视福音布道家的派特·罗柏森，提醒基督教徒，也许他们会被要求要作撒旦般的“野兽注记”，就像纸钞上面的新号码、超级市场的条形码以及芯片科技这类事物一样<sup>②</sup>。而抵抗在世界末日之际来临的新的、无神的全球秩序，是一种基督教徒的义务及美国公民的权利。然而，这些运动的神话其凶兆的色彩有时候反而模糊了自身的图像，实际上降低了其政治及社会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何在强调其

① 史登（Stern, 1996: 221）。

② 巴列特及里昂（Berlet and Lyons, 1995）。



潜在的共同性之际，注意到运动中的异质性仍是一件重要的事。

### 一 民兵及爱国者：多主题的信息网络

民兵是一群为了防卫他们的国家、宗教以及自由而进行自我组织的公民。民兵组织在美国存在之后的第一个世纪中曾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sup>①</sup> 在 1900 年，各州的民兵被国家的防卫队取代。然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从蒙大拿民兵开始，右翼民粹团体开始利用联邦法律中的一些模糊性，僭越了不准在政府以外形成军事团体的禁令，形成非组织化的民兵。民兵团体最醒目的特征是：他们拥有军事武装，有时还拥有作战武器，并且具有军事化形态的命令传递结构。在 1995 年之前三 K 党/民兵研究小组在 50 个州中，能够确认有 441 个积极的民兵团体，并且至少有 23 个州设有类似军事训练基地（参见图 2-1）。民兵成员的数目难以估计。在 1995 年巴列特（Berlet）及里昂（Lyon）大胆估计的结果是 15000~40000 人之间<sup>②</sup>。根据所有的估计，它们的数目都在快速增加中。然而并不存在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每州的民兵组织都各自独立，有时在同一个州中存在着几个不相关的民兵组织。根据警方资料显示，在俄亥俄州，就有 33 个，大概共有 1000 个成员，以及几十万的支持者<sup>③</sup>。蒙大拿民兵是最早的案例，不过密西根民兵组织却是最大的，它拥有数以千计的积极成员。他们的意识形态，除了反对新世界秩序以及联邦政府的共同立场之外，呈现高度分歧。其成员绝大多数是白人、基督教徒以及男性。当然各种身份中，种族主义者、反闪族主义者以及性别主义者都占重要的比例。然而，大部分的民兵团体却不自我定义为种族主义者或性别主义者，甚至其中有一些（举例来说，密西根的

① 辉斯克（Whisker, 1992）；库波（J. Cooper, 1995）。

② 巴列特及里昂（Berlet and Lyons, 1995）。

③ 温理普（Winerip, 1996）。

民兵组织)还在宣传中作出明确的反种族主义的声明。祖克(Zook)以11个最受欢迎的民兵组织为对象,对其国际网络网页所作的分析,显示其中7个首页有着反种族主义的声明,有4个没有提到种族,而没有1个内容有明显的种族主义<sup>①</sup>。有2个网页采取反性别主义的立场,有2个欢迎女性的加入,而其他则没有提到性别。实际上,密西根的民兵组织在“蒙大拿自由人”于1995年占领农场的行动中,拒绝给予支持,因为他们是种族主义者。而民兵的首页之一“E Pluribus Unum”,为俄亥俄州民兵的一部分,是由非裔美国人的基督教基本教义派成员主持。当然,这些声明可能是作假的,不过考虑到以网络布告的方式来接触新成员的重要性,在吸引新成员时错误地呈现意识形态是一种矛盾的做法。似乎民兵及爱国者虽然包括了传统的种族主义者、反闪族主义者以及仇恨团体,却包括了更广泛的意识形态组合,这正是他们可以获取新胜利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他们向外扩张的能力横跨了意识形态的光谱,而结合了对联邦政府抱有不满情绪的各种资源。如三K党/民兵研究小组的报告所说的那样:

与他们好兴党派、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的前辈们不同的是,爱国者已经能够为了达到反政府目标所需的更大的整体性,而连结次要的意识形态的差距。因此,他们创造了在近来的历史中,最具有邀请性的反叛势力,变成了各式各样、组织性角色也许极端不同的反政府组织的大基地。<sup>②</sup>

爱国者运动中两个快速扩张的小团体是“郡权力运动”以及“共同法法庭”。前者是在西部各州影响力正在上升之中的“明智使用联盟”(Wise Use Coalition)的好战派的一支。这个联盟反

① 祖克(Zook, 1996)。

② 三K党/民兵研究小组(KMTF, 1996: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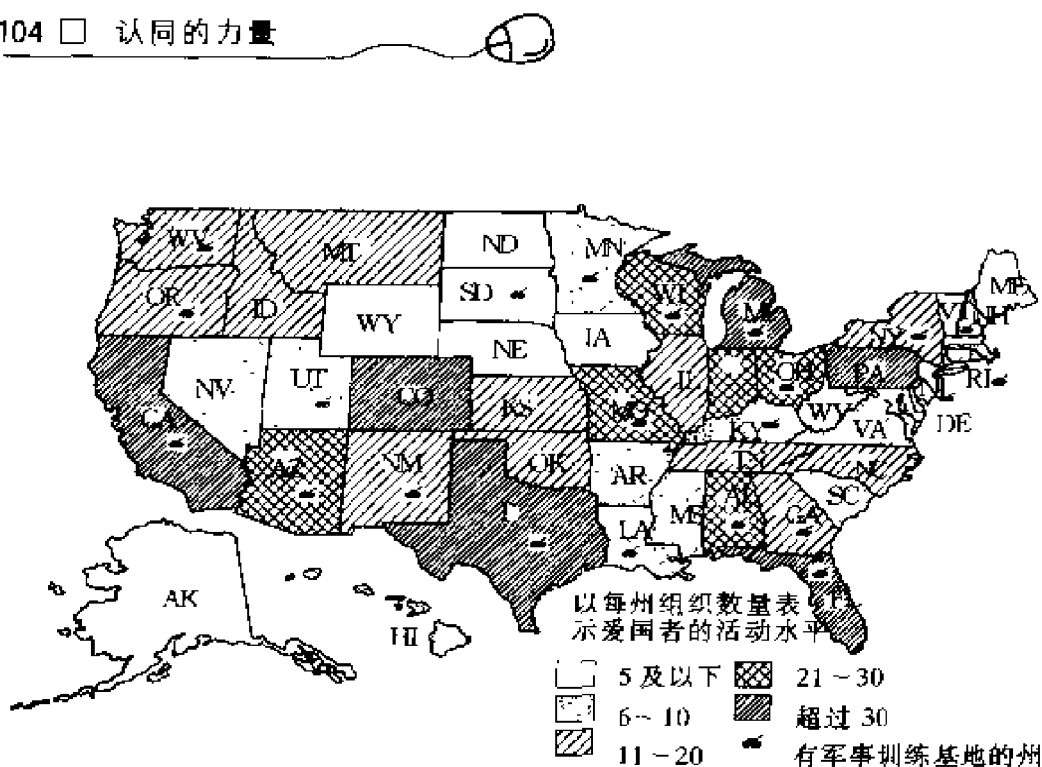


图 2-1 1996 年美国爱国者组织数量及军事训练基地在各地的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 Klanwatch/ Militia Task Force, Montgomery, Alabama, 1996.

对联邦政府实施的环境管制，并且呼吁对于伐木、采矿以及在公共土地上的游牧活动必须考量“习俗及文化”。土地使用管制被等同于社会主义，以及对生态系统的管理被认为是新全球秩序一部分<sup>①</sup>。因此，这个运动声称郡的警力有逮捕联邦的土地管理人员的权力，而引发了许多暴力事件。人们及各社区都迫切地对他们在市及郡的层级所选举出来的官员的权威进行其专属的认可，而拒绝联邦政府对于他们的财产进行立法权利。70 个郡通过了明智使用的法令，要求对于公共土地的地方控制权，而暴力行动则使得从新墨西哥州及内华达州到北部的爱达荷州及华盛顿州的环境主义者及联邦土地管理员感到胁迫。共同法法庭已经在

<sup>①</sup> 哈瓦格 (Helvarg, 1995)。

40个州成立。有一些宣称为拒绝司法系统的人们提供法律基础的书籍及录像带，支持着这些行动，设立了他们自己的“法官”、“审判”以及“陪审团”。他们甚至设立了1个有23个法官以圣经及他们自己对法律的解释为基础的全国“共同法最高法庭”。共同法的信徒自称为“至尊”(sovereign)，也就是自由人，拒绝服从于支付税捐以及社会安全费用，拒绝驾照规范，以及拒绝服从最初美国法律体系所规划的范围之外的其他政府控制手段。为了要保护他们的主权以及回敬公共官员，他们会不断地对锁定目标的公共官员及法官进行商业的假扣押，而在许多郡的法庭中形成梦魇般的混乱。作为共同法运动的一个延伸，从蒙大拿到加州，有一群人形成快速扩张的网络，他们拒绝联邦储备银行有印钞的公权力，他们发行了自己银行文件，包括现金支票，虽然其再制的技术精良，但仍因为常常被提领，而引发多起因伪造及欺诈而被逮捕的案件。这些运作方式使共同法运动成为爱国团体中最具抵抗性的组织，而他们也是造成了1996年联邦政府在蒙大拿州佐敦的农场与“自由人”进行了3个月对峙的根源。

这样一个分歧的、几乎是混乱的运动无法有一个稳定的组织，甚至相互协调的情形。然而，其共同的世界观，特别是它所指认的共同敌人却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是因为团体及个人之间的连结的确存在，但是却是经由媒体（主要是收音机）、书籍、传单、解说、旅游以及以传真或最主要地通过网络进行的另类出版形式。<sup>①</sup> 根据三K党/民兵研究小组的研究，“计算机是爱国者运动的军火库中的主要配备”。<sup>②</sup> 在网络中，有许多的电子布告栏系统、首页以及聊天团体；举例来说，在1995年设立叫做MAM的使用者讨论群。有许多理由被提出来用以解释为何民兵

① 三K党/民兵研究小组 (KMTF, 1996); 史登 (Stern, 1996); 祖克 (Zook, 1996)。

② 三K党/民兵研究小组 (KMTF, 1996: 16)





成员广泛地使用网络。其中之一，如史登（Stern）所写的那样：“网络是一种能够滋生阴谋论病毒的完美文化。讯息在屏幕上出现，不易分辨何者为可信的而何者则属于垃圾……对于像民兵成员这样的阴谋狂热者而言，网络空间中未经证实的言词，借着提供无尽的‘附带证据’更加确定了他们的既有结论”<sup>①</sup>。同时，网络的拓荒者精神的特征也与表达自我、在未经媒介转译或摆脱政府控制的情形下而发言的自由人相当搭调。更重要的，国际网络的结构，正好符合了没有边界、没有特定计划，却分享一个目标、一种感受及对多数而言——同一个敌人——的特征，再生产了民兵团体及大部分的爱国者的自动自发的加入网络的性格。所以主要是国际网络（背后有传真以及直接邮件投递的支持）使运动强大及进行自我组织。就是通过由印第安纳波里斯的汤普逊所组织的电子网络新闻，散播阴谋理论，说俄克拉荷马的爆破行动是被联邦政府所煽动，就像是希特勒为了要袭击民兵而在莱新登（Reichstag）纵火一样。其他如保罗·卢维尔网（Paul Revere Net），连结起全国各地的团体，传播信息、散布谣言以及整合行动。举例来说，保密性的报告通知浏览者，在一场在加州的演讲中说“我们正进入新世界秩序”之后，戈尔巴乔夫就隐匿在南加州的军事基地，来监督为了准备迎接新世界秩序的军队的来临而解散的美国武力。事实上，他是在1996年5月才抵达，而且是为了与美国空军合作，训练德国飞行员，而在新墨西哥州设立永久基地。而千百名的网友则认为是因为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在报道了这个基地开放后而使得五角大楼没有转圜余地。

收音机的脱口秀也很重要。罗希·林伯（Rush Limbaugh）在全国600个电台拥有200万个听众，它是一个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工具，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所向披靡。虽然他本人不是一个民兵的支持者，但是他的主题（例如狂热行动）却回应着这个

<sup>①</sup> 史登（Stern，1996：228）。

运动。其他受到欢迎的广播节目则直接与爱国者合作：如乔登·林迪（Gordon Liddy）的广播秀（callin show），或者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马克·寇克（Mark Koernke）所主持的“知性报道”（Intelligence Report）。另类的有线频道对类似的听众广播类似的题材，包括全国自强电视、琼斯有线频道，以及在佛罗里达州时代华纳公司所拥有的五角大厦有线电视台，它所播放的“种族及理性”（Race & Reason）是一个反闪族的种族主义节目。在另类媒体的高度去中心化延伸的网络之外，还有数量难以估计的报纸或小刊物，例如华盛顿特区的“镁光灯”（Spotlight），或者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小册子《透纳日记》（The Turner Dairies）。这些网络散布锁定目标的信息、传送人们的仇恨、出版右翼的极端主义的想法、传递阴谋式的谣言，并供应末世的神话学而变成千禧年终结的右翼民粹主义的文化背景。于是，当联邦调查局无法找到以组织化阴谋及武力颠覆政府的证据时，真正的阴谋以没有姓名（或是许多的姓名）、没有组织（或数百个组织）的形式，在信息网络中流动，喂养着偏执，连结起愤怒，甚至也许溅起血花。

## 二 爱国者的旗帜

虽然有着差异性，但是爱国运动以民兵为先锋，的确分享了一些共同的目标、信念以及仇敌。是这样的价值及目的建构了一个世界观，并且以此定义了运动自身。

在爱国者运动的不同形式中表达了一个潜在的、简单但有力的对世界及社会的观点。根据这样的看法，美国可以两种人作划分：生产者及寄生者。生产者，也就是工作的人们，被双重的寄生者所压迫：在上层是腐败的政府官员、有钱的公司精英以及银行家，在下层则是愚笨及懒惰的人们，他们不配享有从社会得到的福利。这个情势因被最近以联合国及跨国的金融机构掌舵、照顾公司精英及政府官僚利益的全球化过程而恶化，这迫使一般人的生活面临改变，变成世界殖民经济之下的奴隶。上帝终将战



胜，不过国民必须拿起枪，为“美国自身的未来”<sup>①</sup>而奋斗。在这样的世界观中，出现了一组运动的特定目标，以此组织了自身的运作。

首先，民兵以及大部分的爱国者，是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式的运动（而且，从这个角度而言，非常不同于传统的纳粹或者是要求强大国家法西斯主义者）。他们的敌人是联邦政府。他们认为，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个人、家庭以及所在地的社区。在面对面熟识的层级之外，政府只有在当它是公民的意志的直接表现的情况下，才能够被容忍；例如郡政府，其经由选举而产生的基层公职人员，在个人的基础上是尚能够被了解及控制的。较高层级的政府则令人质疑，而联邦政府则是彻底地被声称为不具合法性的，认为它剥夺了公民的权利、操弄了宪法、践踏了美国开国元老们的最初训令。对民兵成员来说，托马斯·杰佛逊以及派翠克·亨利是英雄，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显然是一个坏蛋。它用非常具体而有力的态度及行动来表现对于联邦政府合法性的拒绝：拒绝联邦政府的征税、拒绝环境的管制及土地使用计划、共同法法庭的主权、取消陪审团，郡政府相对于其他更高权力机关的优越性、以及仇恨执行联邦法律的官员。这个运动游走在极限之上，呼吁进行反对政府的公民不服从行动，如果情况需要，还以荷着枪、遵从着“自然法”的公民来给予背后支持。

由于一方而联邦政府以及其执法官员是直接敌人，并且是爱国者动员的直接原因，另一个更隐约出现在远处的凶恶威胁则是：新世界秩序。新世界秩序是一个因电视福音教派的派特·罗柏森的倡导而声名大噪的概念，它延伸了布什的后冷战的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暗示着联邦政府正为了与苏俄（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他被认为是这个阴谋中关键的策略家）共同形成一个世界政府的目标而积极工作着。这个计划预定将由具中介性质的跨国组

<sup>①</sup> 库波 (M. Cooper, 1995)。

织——联合国和新的世界贸易组织来推动，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则被认为是跨向这个往往与信息世纪的来临相结合的新秩序的第一步而已。他们也认为美国人民所受到的实际冲击，只要看为了跨国公司及银行的利益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为了全球政治官僚的缘故而造成的政治权力的受损，就能够理解。

与这些地方主义的、自由主义式的线索在一起的，还有第三个主轴贯穿了整个运动：对于女性主义者（不是反对女人，只是要女人恪守传统的角色）、同性恋者以及少数族裔（作为受政府保障的受益者）的反动。在爱国者运动中有一个相当清楚的首要特征：成员中的大部分都是白种的、异性恋的男性。“愤怒的白种男人”（这实际上是一个爱国者团体的名字）似乎已经因为经济的剥夺感所引起的混合反应而聚在一起，重申传统的价值、特权以及文化的反动。传统的国家及家庭的价值（也就是父权主义）被重申，用来反对社会给性别、文化以及种族的弱势群体过多的特权，就像是弱势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以及反歧视的立法所显示的那样。当这样的主题与更早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以及反移民联盟所提出的反对种族平等相互连结时，它有一种新的涵盖力，特别是因为明显地排斥了女人的权利，以及对主流传媒所传播的自由主义价值怀着敌意。

这个运动中最常出现的第四个主题是以非宽容的态度，重申基督教价值的优越性，所以它紧密地连结上第一章中所分析的基督教基本教义派运动。大部分爱国者似乎同意一种说词：认为基督教价值以及仪式，就如同他们的辩护者所说的那样，应该要在社会的各个机构中普遍被实施，举例来说在公立学校应该有强制性的祷告、筛选图书馆藏书以及检查传媒中是否有反对基督教以及反对家庭价值的情形。影响力广及各地的反堕胎运动，在其外围有着狂热的暗杀者，是它最恶名昭彰的组织工具，基督教基本教义派似乎在运动中非常盛行。似乎自相矛盾的是它连结的双方，一边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运动，例如民兵；另一边却是以神



权政治为目标、寻求政府对其公民灌输道德及宗教价值的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运动。然而，这只是一-种历史视野的矛盾，因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美国基本教义者与自由派在解构联邦政府的议题上产生聚合，因为联邦政府被认为是背弃了神以及人民。

枪枝以及圣经可以说是这个运动的座右铭。<sup>①</sup> 枪枝成为游行的诉求点，1994年民兵为了回应布莱迪法案而集结起来。因为反对布莱迪法案而形成的一个强大的结盟，其目标是要反对枪枝管制。来福枪协会在国会中控制许多选票，以它强大的游说能力为中心，集结了全国许多的乡村居民、枪枝商店店主、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以及民兵，要捍卫宪法中所赋予的武装的权力。枪枝就等于自由。狂野的西部（the Wild West）在洛杉矶大街上骑上了马，就像是在密西根农场那样。美国文化中，最为深刻的、也是吸引了许多移民逃离到美国来的两个特征：它的粗犷的个人主义以及对于专制政府的不信任，提供了一种最固有、最原始的本质，来抵抗拒绝被社会的信息化、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政治的专业化所带来的威胁。

### 三 谁是爱国者？

这个运动的组成分子当然有一些是中西部以及西部的心生不满的农民，他们背后有着一些小规模的乡镇组织的支持，例如咖啡店老板或是传统的农场主。但是如果认为这个运动的诉求只限于被现代化科技所淘汰的乡村世界，那么就不对了。虽然没有这个运动组成的人口资料，不过从民兵的地理分布所呈现的初步状况（见图2-1）可以看出这个运动在地域上的分布是多样化的，因此它的社会因素也是多样化的。在各州中，民兵活动最为频繁的包括宾西法尼亚州、密西根州、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科

<sup>①</sup> 麦斯维尔及塔皮亚（Maxwell and Tapia, 1995）。

罗拉多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等差异性相当高的各州，差不多就是人口最多的几个州（比纽约州少，比科罗拉多州多），但这就是重点：有人的地方几乎就有民兵，这是遍及全国的现象，而不是只有在蒙大拿州而已。如果我们把基督教联盟看成是运动的一部分，那么爱国者就是出现在大部分都会区域的郊区（基督教联盟大概有 1500 万人）。一些民兵团体，例如在新罕布什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似乎是在计算机专业者之中招募成员。因此，爱国者似乎并不是一个特别以阶级或地域为基础的运动。应该说，他们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及政治的运动，他们反对全球通用的价值而要捍卫国家的传统；反对全球秩序的强制力量，而要求地方居民的自我管理。然而，如果说阶级与这个运动的组成是不相关的，它却与这个运动如何定义它的敌人有关。企业精英、银行家、有钱人、有势者、傲慢的大企业主以及他们的律师、科学家及研究者等等，都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并非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一个非美国的世界秩序的代表。事实上，这个意识形态并非反资本主义的，相反的，是一种捍卫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拒绝一种看起来接近于社会主义的组合式的国家主义。因此，对爱国者的阶级分析似乎并没有说中这个运动的本质。它事实上是一种跨越阶级及宗教差别的政治反叛行动。而且与美国社会大致上所产生的社会及政治演变相关。

#### 四 民兵、爱国者及 20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社会

在美国，右翼民粹主义不能说是一件新鲜事，事实上从美国开国以来，这个现象在整个政治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sup>①</sup>。而且，对于经济衰退感到愤怒的群众反应，在美国与欧洲都曾经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出现，例如从古典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仇外主义以及到最近几年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除了国际网络外，

<sup>①</sup> 理普赛及来普（Lipset and Raab, 1978）。



另一个可以用来解释民兵快速扩散现象的原因是，美国渐增的经济困境以及社会不平等。在过去 20 年，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男性的平均收入明显地恶化。家庭要有两个工作者才能够维持 25 年前靠一个工作者所带来的生活水准。从另一方面来说，家户收入中最高的 1%，其平均收入从 1963 年的 327000 美元增加到 1993 年的 567000 美元，然而平均的家户收入仍然保持在 31000 美元。高科技公司总裁的薪水是其工人平均所得的 190 倍<sup>①</sup>。对美国的受薪者以及小企业来讲，全球化以及信息化的世纪是一个生活水准相对地、而且通常是绝对地下降的年代，这反转了过去几代物质生活条件持续进步的历史发展趋势。有时候，新的全球富人文化除了带来伤害之外还带来侮辱。举例来说，在蒙大拿州，这个新兵兵的温床，它同时也是新的百万富翁最喜欢的目的地，他们买下数以千计英亩未开发的土地，将其辟为农场来操作他们的全球网络。这个地方的农场主对于这样的行径则感到厌恶<sup>②</sup>。

更有甚者，在传统的家庭已经变成在财务上以及心理上都不可或缺的工具之际，却由于女人对于父权主义的抵抗而燃起了性别觉醒的战争，使得家庭也正面临解体之中（见第四章）。对于性别主义以及异性恋正统性的文化挑战模糊了男性特质的定义。除此之外，在这时刻从拉丁美洲与亚洲而来的移民潮以及美国渐增的种族多样性，虽然这一直是美国历史中持续的现象，却增添了一种失去控制的感觉。从农业及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移，以及从商品处理到信息处理使既有的技术以及工作文化也遭受挑战。冷战的结束伴着共产主义的垮台，使得外部敌人不再那样容易地被界定，这也妨碍了将美国以共同原因凝聚在一起的机会。信息的世纪变成为混乱的世纪，也因此成为对传统价值以及不可折衷的权力进行基要主义式要求的世纪。执法机构对于不同形式的抗

①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1995b)。

② 史蒂芬斯 (Stevens, 1995)。

议所作的官僚式的、有时甚至是暴力的回应，加深了愤怒更使这种感觉尖锐化，而且似乎反而正当化了民兵要求武装的诉求。它将新美国民兵推向了与浮现中的全球秩序的直接对抗。

## 第四节 天启的僧侣： 日本奥姆真理教<sup>①</sup>

奥姆试着要以瑜伽及修行来发展的最终的身体技巧是一种不需要借着媒介就能沟通的方式。借着与他人的身体产生共振获得沟通，而不需仰赖作为自我认同的意识，也不需要使用语言作为媒介。

——小泽 (Masachi, Osawa), 《现代》，1995 年 10 月。

1995 年 3 月 20 日，东京地铁三个车厢中的沙林毒气攻击事件造成了 12 人死亡以及 5000 多人受伤，也动摇了表面上看起来安定的日本社会的基础。警方使用 1994 年 6 月在松本发生的类似事件的信息，而认为这次事件是由奥姆真理教的成员所发动的，这个教派，在一个由商业活动、政治组织以及地下军事团体

① 在这里对于奥姆真理教的分析主要来自于我和矢泽一郎 (Yazawa Shu-jiro) 的共同研究以及所做的论文。对于奥姆的研究主要是由矢泽进行的，虽然 1995 年在东京我也与矢泽合作而对运动进行了研究。在分析中直接引用的资料，除了报纸与杂志之外，还包括了：青山 (Aoyama, 1991)、麻原 (Asahara, 1994, 1995)、沙卡 (Vajrayana Sarca, 1994)、祖 (Drew, 1995)、藤田 (Fujita, 1995)、《每日新闻》(Mainichi Shimbun, 1995)、宫台 (Miyadai, 1995)、小滨 (Ohama, 1995)、小泽 (Osawa, 1995)、中泽等 (Nakazawa et al., 1995)、岛野 (Shimazono, 1995)、矢泽 (Yazawa, 即将出版)。

② 矢泽 (Yazawa) 的翻译。





所形成的网络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根据奥姆真理教它自身的论述，它的目标是要在将要来临的天启中解救日本、甚至解救世界，使他们可免于被日本企业及美国帝国主义所建立的新世界秩序以及联合世界政府所引发的战争之下。为了要克服世界末日善恶决战，奥姆要储备一种透过冥想及训练而以灵性及自我改进为根基的新人类。然而，为了要面对世界性权力的侵略，奥姆必须要以面对新的毁灭性武器的挑战来进行自我防御。这个挑战实际上来得很快。真理教的创始者麻原彰晃与组织的其他重要人物正面临审判（也许会被判处死刑）。教派虽然已经没有那样具有组织性，但是仍然继续存在着。

对于奥姆真理教的缘起、发展以及目标的讨论在日本的媒体上持续了数月之久，而在我写作的时候，虽然已是事情发生一年半以后，但是这种讨论仍未停止。它对于日本社会真正的状态提出了根本的问题。在最富有的、贫富差距最小的、最安全的、最具种族同质性的以及文化整合性最高的社会中，为何会发生这种事情？对大众来说，最为震惊的是，这个教派从日本最优秀的大学中招募了科学家以及工程人员。这个事件发生时正值政治不稳定的期间，也就是自民党执政几乎 50 年之后的危机，这个外表看来不相干的事件被认为是一个征兆。但是，是何种征兆呢？这个相当复杂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虽然不是外表看来一目了然，然而却有其重要性。为了深入了解，我们必须要对这个教派的演进进行重构。让我们从这个教派的创始者的经历开始，因为他在整个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一 麻原及奥姆真理教的发展

麻原出生在熊本县的一个贫穷家庭中，出生时就已经全盲。他曾经在盲人学校就读，在完成那边的学业之后，准备东京大学的入学考试。他所表现出的企图是要成为首相。考试失利之后，他开了一家药店，专门販售汉方。这些药中有某些是有问

题的，而他不具执照最后成为遭到逮捕的原因。在结婚及生了一个小孩之后，在 1977 年他的兴趣转移到宗教上。他用选徒的方式来教育自己，并试着要以道教为基础发展出一套精神健康的照护之道。他生命中的决定性转变发生在他加入阿含宗 (Agon) 教派，这是一个通过苦行的锻炼来宣扬至善的一个教派。<sup>①</sup> 冥想、身体的锻炼、瑜伽以及密宗佛教是这个团体的基本作法。麻原将他自己的想法与阿含宗的教诲相结合，创造了一个新的宗教世界。1984 年他在东京的涩谷开了一家瑜伽学校。同一时间，他也设立了一个叫奥姆的组织（奥姆在梵文中的字义为深奥的智慧）。借着在媒体上宣称他超自然的力量，例如在空中漂浮的能力（他用展示这些行动的照片来支持他的说法，这是特别的视觉效果的首度尝试，标志了奥姆日后对媒体技术的强调），麻原的瑜伽学校的名声逐渐传开。宣称上帝命令他与一选民共同建造一个乌托邦，在 1985 年这个瑜伽老师变成了宗教导师，并且在学校传授借由苦行追求至善。在 1986 年麻原与大约 350 人创造了奥姆真苑教派。其中大部分成员都被任命为教士，不像其他教派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将自我完全地奉献于苦行及冥想。高比例的教士对奥姆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必须为此庞大数目的教士寻找实质的财务资助的方法。因此，奥姆要求他的成员必须奉献所有资产（有时还使用强迫手段）、收取教导及训练费用，并投资各种企业。在这些企业活动当中，它创造了一种相当具利润的商业连锁店 (Mahaposha)，以折扣价贩售个人计算机，并专门经销盗版软件。以计算机店所赚取的利润，奥姆又投资了一些餐饮店，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企业。在 1987 年，名称改为奥姆真理教（日文“真理”之义）。一年后，在富士山脚下的一个村庄中，奥姆兴建了它的总部，作为

① 苦行意味着对身体进行艰苦的训练，并且对作为一般存在形式的食物及身体的享受进行限制。



迈向乌托邦的第一步 虽然有关当局有些阻挠，但它最终仍得到认可，成为非营利的、租税减免的宗教团体。在巩固了奥姆的位置，并得到1万名成员的支持之后，麻原决定要进军政坛以改造社会。在1990年，他以及奥姆其他的25名成员竞选国会议员，但几乎没有得到任何选票。他们声称他们的选票遭窃了。对政治的不满是奥姆在意识形态的转折点，使他们放弃了参与政治过程的企图，接下来的发展就被导向与政府对抗。之后不久，在波野村要为教派兴建一座新建筑的企图遭到当地居民的激烈反对，在一些突发事件之后，奥姆的成员被逮捕。媒体也呼应着前教派成员进行绑架及勒索的谣言。当这些奥姆的受害者形成组织时，他们的律师不见了。教派遂陷入了偏执的疯狂状态中，觉得受到警察、政府以及媒体的骚扰。

在这样的脉络中，麻原开始强调在教派发轫之初既存的主题中，也就是其末世学的思想。麻原引用了法国星象学家诺斯特拉丹姆斯（Nostradamus），预测在公元2000年左右，美国与苏联之间将会爆发核子战争，造成将近九成的城市居民的死亡。因此，最好的人种要为能在大难中得以幸存早作准备。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对身体进行艰苦的锻炼、苦修、冥想以及遵从麻原的教诲，都是创造超人种所必须的工作。奥姆的冥想大楼将是在世界末日善恶决战之后新文明的诞生地。然而，精神上的完美仍不足够。敌人还将使用核子、化学以及细菌等方式的新武器。因此，奥姆作为人类生存的最后机会，必须为末日的可怕战事进行准备。结论是：奥姆设立了数个公司以购买及处理发展化学及生物武器所需的材料。它从俄国的黑市进口了一架直升机以及武装的交通工具，开始学习如何设计及生产高科技的武器，包括镭射枪<sup>①</sup>。

按照逻辑的发展，1994年，奥姆决定变成一个反抗的国家。

<sup>①</sup> 祖（Drew, 1995）。

它仿照日本的国家结构，设立了部会官僚，并指定了每个部会及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影子政府，而麻原则位居整个神圣的反国家的顶端。组织的角色则是领导整个教派以及在对抗邪恶势力的战役中的少数幸存者。所谓的邪恶势力则是（被跨国公司所掌控的）整个世界政府，以及其直接代理人：美国帝国主义及日本警察。1994年6月，在松本进行了第一次神经瓦斯实验造成了7人死亡，警方对教派的调查以及媒体的报道，促使教派的成员感受到对抗已是无可避免，而且预言中一开始的种种情节正在发生。几个月之后在东京地铁的攻击行动，将这个教派、日本甚至是全世界，推向了一个以大众毁灭的武器作为潜在支持的弥赛亚式的批判中。

## 二 奥姆的信念和方法论

奥姆真理教有着复杂的信念与教义，并随着教派本身的演变而产生一些改变。不过仍可能以可得文献及报道为基础，对它的理想及实践的本质进行重构。奥姆最基本的目的及方法强调的是解脱（gedatsu）的概念，根据奥姆的最佳观察者之一小泽（Osawa）的说法，这指的是：

将身体的整合性加以分解，使个人能克服身体的地域性。信众必须要借由对身体进行无尽的分解以超越身体与外在世界之间的疆界。不断地加以练习，就有可能抵达到一种境界，使身体感觉起来像是流体、瓦斯或是能源的波动。作为一个个体，因为在整个身体的内在面有着自我的意识，所以身体会尝试着对自身进行整合。就是身体的内在组织着自我。因此，将身体分解到我们感觉它已成为流体或气体的这种程度，也就意味着自身的解组。这就是解脱<sup>①</sup>。

① 小泽（Osawa, 1995）。



解脱意味着真正的自由及幸福。事实上，人们已经丧失自我而变得不再纯粹。真正的世界其实仅是幻觉，一般人所过的日子则充满了负担及痛苦。能够了解及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人们就能在真理中面对死亡。为了要达到这种真理，通过解脱，奥姆发展了一种冥想以及苦行的技术，而每个信徒在不同阶段都有精准的指标来指出这个阶段的成果。

然而，对于大部分的追随者来说，解脱仍是不确定的。因此，又加上其他两个元素来加强奥姆的方法及目标的一致性：一方面，对教祖的超能力、以及经过某种锤炼阶段之后就会得到救赎的保证抱有信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灾难性的文明危机即将到来所产生的迫切感。奥姆认为，世界末日与经由获得超自然能力而准备天启的信徒得到救赎，这两者之间有一直接关联。因为这一层意义，奥姆同时是一个神秘教派，又是一个讲求实际的组织，并提供公元2000年审判日的求生训练——但必须付费。

### 三 奥姆与日本社会

大部分的奥姆传教士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在1995年，45%的传教士是二十几岁，28%为三十几岁；而40%的比例是女性。事实上，奥姆的一个明确的目标是要借着改变“性别的内在世界”来“解决性别差异”。（目前为止）在“强大的女性主义运动”缺席的日本，奥姆对那些对极端父权的社会感到失望的大学毕业女性来说，具有某些影响力。而其中，又有高度比例的男性是毕业于著名大学的自然科学学系<sup>①</sup>。奥姆对于高学历青年的吸引力震惊了日本大众。根据矢泽的分析<sup>②</sup>，这样的吸引力可以解释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强大的日本社会运动退潮之后，日本年轻一代的异化。社会运动之后，社会价值并没有产生转化，相

① 《每日新闻》(Mainichi Shinbun, 1995)。

② 卡斯特等 (Castells et al. 1996); 矢泽 (Yazawa, forthcoming)。

反的却是带来了“信息社会”。但是这样的转变缺乏文化的创新及精神的满足。在一个社会的挑战者没有被动员、也缺乏文化转化的价值的社会中，新的一代成长于物质丰裕中却没有精神性意义的 20 世纪 70 年代，同时被科技及秘教所诱惑。许多奥姆信徒是无法在学校、行政系统及公司的官僚机构中为自己的追求改变及意义的欲望找到着力点的人，但同时他们又反叛传统的、威权的家庭结构。他们的生活没有目标，在拥挤的连锁形都市化的日本城市中，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实质空间来表达自我。他们所拥有的惟一的東西就是他们自己的身体。对他们当中的许多年轻人而言，他们的愿望是要借助科学和技术的力量使身体超越自然及社会的限制，而能活在一个不同的社会中。在小泽的概念中，他们的愿望的基础是“身体的信息化”，也就是说借由意念、信仰及冥思的力量转化人类的物理潜能。这正十分切合奥姆的解脱的方法论。解脱的允诺指的是人能够同时感觉到他们自己以及他人。共同体及归属感被重拾，不过它是一种通过对身体本身的极限达到至善及控制的自我表现，而不是外在灌输的结果，它使得沟通不需中介，就能够直接连结其他的身体。这种沟通只有在已经克服地点限制的身体中才有可能。麻原的身体，已经脱离了身体所在地，能够成为引发他人传息的触媒。因此，以麻原作为共同体的惟一中心，一个沟通身体的真正共同体逐渐形成<sup>①</sup>。

这些想法及操作方式，有一部分从瑜伽及西藏密宗的角度来说，并无出奇之处。同样是通过瑜伽及冥想进行去形体化沟通，奥姆的特殊之处一方面在于它运用科技作为工具（举例来说，通过训练录像带及电子刺激设备的广泛使用），另一方面则是它的政治手段。在一些情况下，信徒戴上电子头盔而进行实验，借此使他们能够接收到直接从宗师脑中发出的沟通电波（这是去形体沟通理论电子化的一小步）。麻原的意念最后发展成他的自我或

① 小泽 (Osaawa, 1995)。



者说是“真正的自我”的认同，而所有的信徒的种种自我最后都消失不见了。与外界沟通的管道封闭了，因为外在世界是走向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而被认为是敌人。而内在的网络在以一种层级化的组织加以结构。这种沟通是从最上层而来，而信徒之间并没有水平式的沟通管道。在这个观点中，外在的世界是非真实的，而结合了科技及瑜伽的技术的虚拟实境才是真实的世界。外在的、非真实的世界朝着启示录而演进。而内部的、虚拟实境的内部沟通的世界才是最终的真实，是为了救赎而作准备。

在奥姆的论述中的最后一个阶段，有一个较为精确的社会预言：经济衰退的循环将会引起未来的社会变迁，然后将是战争及死亡所带来的溃败。自然灾害及经济衰退在千禧年的最后十年中将会袭击日本。理由是：将来到的竞争，也就是亚洲其他国家低成本劳工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为了要回应这个挑战，日本将会发展其军事工业，并试着将其意志施行于亚洲，并本着日本企业的利益而努力创造在跨国公司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相应于此，美国为了保护其亚洲臣国，以及提升它自身的世界政府的计划，将会参与反对日本的战争。这个战争会持续许久，而所有的高科技武器也将会被动用。那将是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它将导致人类的毁灭。从这样的说法来看，奥姆的版本是以一种扭曲的、概要性的方式来反映了日本社会对于在世界经济中丧失了比较性优势、与美国的潜在冲突以及对未经控制的新科技的种种恐惧。

然而奥姆特殊的是它对于这些威胁的反应。为了要备战，并且要存活下来（就像90年代一些科幻小说所写的那样），那么就同时需要一种再生的灵性，以及对于特别是生化以及辐射性的武器等先进科技的掌握。就像上述所提的，奥姆真的试图得到这些武器并且雇用了能够在美国、以色列以及苏联来发展这些武器的科学家。在追求灵性的至善以及将他的成员以一种集体的、灵性的身体统一起来的同时，奥姆也从事自身的武装以进行生存之战，并且对在四周浮现的政府的支持者先行宣战。

奥姆的恐惧以及想法，以一种扭曲的方式类同于日本的青少年次文化。根据宫台（Miyadai）的说法，我们可以在其中发现两个对于世界的感知对象：<sup>①</sup>一个是没有目的也没有快乐的“无止境的日常生活”；另一个是只有在核子战争中才会被迫产生的由生存者联合起来的共同性。建立在这两个想法上——也就是，借着由内部的自我来发现幸福以及为后核战的共同体所准备——奥姆将一个因为过度组织化而导致青年异化的社会，联系上了文化绝望的表现。就这层意义而言，奥姆并非是一个集体疯狂的行动，而是由受过教育的反叛者所提出的过度的、强化的宣言。这些反叛者是被弥赛亚的教主所操控的，他混合使用了冥想与科技、商业与灵性、信息化政治以及高科技的战略。奥姆已经成为日本的信息化社会的恐怖反讽，反映了它的政府结构、它的公司行为，以及结合了对于传统灵性与先进科技的崇拜。也许日本被奥姆所迷惑的原因，正是因为奥姆认知到这个特写式的末世图像是多么地接近真实的日本。

## 第五节 对抗新全球秩序的反叛行动的意义

在从实践、论述以及其脉络，对三个对抗全球化的运动进行分析之后，我进一步将其作比较，试图从对网络社会的更广泛的社会变迁分析中引出结论。我将修改杜罕的分类法作为相同分析范畴中这些运动间关系的解读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三个运动有一个巧合，就是它们都指出的共同敌人：也就是新的全球秩序，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将它定义为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

① 宫台（Miyadai, 1995）。





美国帝国主义与腐败的、非法的制度改革党政府的联手，在美国民兵的眼中则是化身为国际组织，最为明显的是联合国以及美国联邦政府；而对奥姆真理教而言，全球性的威胁则来自于代表了跨国企业、美国帝国主义以及日本警察利益的联合世界政府。因此，这三个运动主要是围绕着可以说是大致相同的敌人而组织自身的。这个敌人就是试图成立世界政府而将削弱所有国家及人民主权的新全球秩序的代理人。

而对这样的敌人，每个运动各自反对了特定的认同原则，这反映了它们所在的三个社会中的明显差异。在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的案例中，他们将自己视为是印地安人以及被压迫的墨西哥人，而为了自身的尊严、权利、土地以及墨西哥民族而战；在民兵的例子中，美国公民为了最本质与神圣的美国宪法中所表现的公民主权及自由而战；奥姆真理教的认同原则比较复杂：事实上是表达在他们的身体上的个人认同，虽然这些身体是通过教主的身体而进行彼此分享——它是实质的个体性以及被重构的精神共同体的结合。这三个案例中都有寻求认同原则本质的一种倾向，但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一个具有历史根源的、广大的共同体（作为墨西哥人的一份子的墨西哥印地安人）；处于在地/郡之中的自由公民；以及从身体中独立出来的个人的精神共同体。这些认同的基础是文化特殊性以及对于控制自身命运的欲求。然而他们都为了一个更高的社会性目标而反对全球性的敌人。在这三个案例中这个社会性目标引导他们将自身特殊的认同与普遍社会的福祉作一整合：墨西哥、美国以及末日后残存的人类。然而，这个整合的尝试有赖于每个运动不同的价值的实现：所有墨西哥人的社会正义及民主；所有美国公民免于政府宰制的个人自由；在奥姆的例子当中则是通过灵性解放而超越物质性。然而，在三个运动当中，这些社会目标却是最为微弱的元素：对抗着具有清楚定义的敌人，他们自身却是仅具雏形的、以认同为基础的动员。他们是反动的、防御性的而不是社会性计划的提案者，即便他们确实提出了另类的社

会视野。图表 2-1 列出一些定义了每个运动的元素。

图表 2-1 对抗全球化的反叛运动其价值观及信念的结构

运动	认同	敌人	目标
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	被压制、排斥的印地安/墨西哥人	全球资本主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具合法性的执政者	尊严、民主、土地
美国民兵	真正的美国公民	新世界秩序、美国联邦政府	公民及所在地社区的自由、主权
奥姆真理教	信徒们能够传递信息的灵性社区	联合性的世界政府、日本警察	启示录的存活

某个程度上，这三个运动之所以会有强大的冲击性来自于它们对于信息科技的有效使用。试图寻求或发掘媒体的注意，而表现出法国无政府主义中所固有的、并在 1968 年 5 月的“行动展示”（l'action exemplaire）曾短暂地复兴的传统：促成了对于他们的呼吁的辩论并且吸引了人们的参与。借着奇观式的行动，以强大的诉求、甚至通过牺牲，将人们的吸引力导向运动的诉求，而最后的目标是要唤醒被宣传宰制以及对压制臣服的群众。这些运动希望能够对政府及制度产生压力，扭转逐渐走向新世界秩序的趋势。

这是为什么武器对于三个运动而言都是必要的原因。它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自由的象征以及造成事件的装备，借此引起媒体的注意。在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的案例中，由于它小心地尝试要将暴力极小化并通过媒体及网络来接触外界，这个着重媒体的策略特别明显，执行上也特别有技巧；但是民兵案例中的好战情绪以及对于暴力战略的蓄意采用，或者是以此为威吓手段吸引媒体注意也是“美国爱国者”的基本组成；甚至奥姆，虽然不信任媒体，也相当注意电视上的讨论及媒体的报道，而派遣其中最为杰出的成员来负责此事。而奥姆的毒气攻击似乎有着证实末日预言以及通过媒体向世界散布警语的双重目的。似乎是：这些



新的抗议行动是以信息化社会的象征政治的特征来传递其信息以及投射其诉求（见第六章）。他们的媒体技巧是基本的对抗工具，而宣言及武器则是一些手段，用来创造值得报道的事件。

新的沟通技术对这些运动的存在来说是很基本的：事实上，那是他们形成组织所需的基础设施。如果没有网络、传真以及另类媒体，“爱国者”就不会成为具有影响力的网络，而只会是孤立的、微弱的一连串反动行动而已；如果没有促使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在关键时刻，能够向外接触到墨西哥的城市社会以及世界的沟通能量的话，他们可能还是孤立的、地方性的游击势力，就像现今在拉丁美洲还在持续战斗的那些状况；奥姆则并未大量运用网络，因为网络在90年代初期在日本仍不普遍。但他们广泛地使用传真、录像机及计算机，作为打造高度控制然而却去中心的组织化网络的重要工具。此外，借着发展由电子驱动的、大脑间直接的沟通，他们也尝试进行科技的突破（被认为是秘密地进行）。信息化时代的革命细胞就在电子间的流动中被打造出来。

虽然有这样的相似性，但是这三个运动也展现了相当的差异性，这与它们的历史/文化根源，以及每个社会科技发展的程度有关。在这里必须要区别出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所联系上的政治计划、大多数民兵团体的混乱与恐慌以及奥姆的启示录式逻辑三者之间的不同。这关系着民兵及奥姆都具有末世教派的成分，而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却并没有世界末日的观点。因此，特定的社会脉络、文化、历史过程以及政治自觉的程度都决定了这些反叛过程的实质差异，虽然他们有着相似的成因。

这三个运动与他们所发生的社会都有紧密的互动。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在经过仔细的考量后在墨西哥总统大选的那年发动了攻势，而他们也扮演了强化改革制宪党的内部矛盾的重要角色，并迫使了墨西哥的政治系统的开放（见第五章）。奥姆则是在1993年，当日本的政治体系解组时而进行反叛行动。借由震动视听的行动来说出新一代的专业人员及科学人才的异化，奥姆

扩大且激化了日本对于已达到物质丰裕、并超越了外国宰制的“后高度成长”阶段的社会模型的辩论。在经历了数十年由政府干预及国家动员的力量带动了现代化之后，日本必须要面对自身作为一个社会、社会大众所经历到的异化、暴力以及恐怖主义有可能是来自于日本人与日本人相互对抗的这个事实。

美国民兵也是诞生在美国的普遍的政治不满及反政府情绪的脉络中，在共和党采用了“新保守革命”的选举政治中同样也反映了这种情绪（参见第五章）。这个新保守主义的选民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基督教基本教义派以及其他与爱国者运动持类似意见的团体。因此，它在1994年共和党在国会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时刻，以及1996年布坎南（Buchanan）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发表了自身宣言。在美国的生活条件恶化、传统政党政治败坏、右翼自由主义以及主流政治中民粹主义的崛起、反对社会变迁及家庭解组而传统价值展开反攻等新情境之中，与爱国者的运动兴起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些关联。对于了解美国社会及其政治系统的新关系而言，这些联系是相当关键的<sup>①</sup>。

因此，新的社会运动，虽然有着差异性，但是它们共同对抗着全球化及其政治代理人，它借由在新的社会制度的根基上改变文化编码的方式来对抗持续进行中的信息化过程。就这个意义而言，它们是从历史上已经穷尽的社会形式的深处窜起，但却以复杂的模式，对于正在形成中的社会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 小结 全球化的挑战

我在这一章中所分析的几种社会运动有着相当的差异性。然而，

① 巴尔兹及布朗史登（Balz and Brownstein, 1996）



虽然以不同的形式反映着相异的社会及文化的根源，但是它们都对现今全球化的过程提出了挑战以捍卫它们所建构的文化认同，某些案例更声称了自己代表其国家、或是同时也代表了人类的利益。

在本章或本书其他章节我所研究的社会运动，并不是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环境的结果进行反对的少数案例。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举例来说，在欧洲，以劳工运动为基础而出现了类似的对抗资本主义再结构的挑战，它并且反对以新的全球化竞争之名强制进行新的规定。举例来说，1995年12月的法国罢工，以工会领导人及学生上街捍卫国家这样最古典的法国仪式，具体展现了强硬的对抗姿态。虽然因为公共交通的瘫痪而引起了日常生活的不便，但民意调查还是显示了大多数人对于这次罢工的支持。然而，由于对于这个运动已有一个很杰出的分析<sup>①</sup>，我建议读者参考这个分析，而甚至能够进一步使拒绝全球化过程的图像更加多样化。这些，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运动正在终结新自由主义认为能够借着使用计算机建筑创造出一个独立于社会的新全球化经济的幻想。这个将信息、生产以及市场集中于少数的特殊人口，而根据每个社会的性质，以加减的人道方式处置其余人口的这个巨大的排斥性的计划（不管是明显的还是潜藏的）已经启动，用杜罕的话来说，正引起一阵“大拒绝”（grand refus）。然而，如果将这个拒绝加以转化而建构出能够对资本主义新形式——全球化与信息化进行社会控制的新形式的话，就必须要有国家的政治系统或是机构来处理社会运动的要求。而国家有无能力来处理全球资本主义、以认同为基础的社会运动以及来自工人及消费者防卫性的运动之间的冲突性逻辑，将会大致决定在21世纪这个社会的未来。然而，在检验国家在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动力之前，我们必须分析不同形式的社会运动的新近发展中具有行动取向的而非反动的部分：例如环境运动以及妇女运动。

<sup>①</sup> 杜罕等（Touraine et al., 1996）。

## 第三章 自我的绿化： 环境运动

绿色的政治取向是值得庆贺的。我们认识到每个人虽然是世界的问题的一部分，但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复原的危险及可能性不假外求。我们开始就地行动，而不需要等到理想的状况出现。我们可以简化生活并且依照符合生态及人类价值的方式过日子。因为我们已经开始，状况将只会越来越好……因此我们可以说绿色政治的主要目标是一种内在革命，也就是“自我的绿化”。

——派翠·凯利 (Petra Kelly), 《绿色思考》<sup>①</sup>

如果我们要以历史性的生产力，也就是对文化价值及社会制度的冲击来评价社会运动的话，那么过去 25 年以来的环境运动已经在人类经历的地景上得到了一个显著的地位。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有 80% 的美国人及三分之二的欧洲人自认为是环境主义者；政党或候选人如果不将自己的政见加以“绿化”的话，几乎很难当选；政府及国际组织有各种的方案、特别小组以及立法来

---

<sup>①</sup> 引自派翠·凯利 (Petra Kelly, 1947 - 1992) 的文章, (Kelly, 1994: 39 - 40)。在这段引言中, 她提到了琼安·梅西 (Joanna Macy) 的“自我的绿化” (Macy, 1991)。



保护自然、改进生活品质，最后长期的目标希望能够拯救地球，而短期的目标则是要拯救我们人类。一些企业，包括一些恶名昭著的污染者，已经将环境主义纳入他们的公关议程以及最被看好的新市场的内容。而在全球，为了穷人的开发或为了富人的保存这样旧式的、简单的对立，也已经转化为关于个别国家、城市以及区域的持续发展的实际内容的多层次辩论。当然，由于环境的基本问题的解决所需要的是一种生活及消费模式的转化，因此就跟我们的社会组织及个人生活一样，种种问题仍然存在。全球的暖化隐约带来一种致命威胁，雨林仍在燃烧着、有毒物质进入食物链中、严重的贫穷问题扼杀着生命，而政府仍在拿人民的健康开玩笑，事例之一如梅杰在处理英国疯牛病中所显示出来的愚蠢。然而，上述这些议题以及许多其他的议题都进入公共辩论的这个事实，以及各事件中所出现的相互依赖、全球性的特点，已创造了解决这些事务的基础，而且或许会将制度及政策调整为一个对于环境较为负责的社会经济体系。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在大多数国家中，特别是在美国以及北欧，环境运动所浮现的多种面貌，在相当的程度上成为一种根基，对于我们所思考的经济、社会以及自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剧烈的反转。<sup>①</sup>

然而，要谈论环境运动，多少还是会失之于武断，因为它的组成十分多样化，而且根据国家及文化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因此，在评估转化的潜力之前，我将会尝试将环境主义的各种不同的组成以类型加以区别，然后在不同类型中以例子将分析具体化。然后，我会对环境主义的主题以及从哪几个方面可看出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结构性的转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一个较广泛的

---

① 对于环境运动的概观，可以参照以下（还有其他）的各种文献：如赫理门（Holliman, 1990）；高得理（Gottlieb, 1993）；卡曼尼基（Kaminiecki, 1993）；谢毕可夫（Shabecoff, 1993）；达敦（Dalton, 1994）；爱理等（Ailey, 1995）；布鲁尔（Brolle, 1996）；戴安妮（Diani, 1995）；华尼（Wapner, 1996）。

诠释，我所谓的社会的结构性转化包括如对于科学及科技角色、对于时间及空间的控制、对于新的认同的建构等所展开的抗争。在指出环境运动其社会多样性及文化对象的特性之后，我会概要地分析它们影响社会的工具及方式，进而探讨环境运动体制化的问题以及它们与国家的关系。最后，我关心的焦点会沿着越来越引人注目的环境正义的视角，进而讨论从本土与全球的两个层次上环境运动与社会斗争之间的联结关系。

## 第一节 环境运动的创造性杂音： 类型学

以环境主义为名而组织起来的集体行动、政治以及论述多样化的程度足以对运动的概念构成挑战。然而，我还是要说正是这种理论及实践上的杂音成为环境运动作为一种新形式的分散的、多重形式的、以网络为主的、颠覆性的社会运动的特征。此外，就像下面我会加以说明的，在多数（就算不是全部）与环境相关的集体运动中，有一些共同的主题。然而，为了要使说明清晰，我还是以一种区别以及一项行动为基础来对运动展开分析，这样会比较有帮助。

这个区别是关于环境主义以及生态学的不同。环境主义一词，我所指的是从论述以及实践上，反对盛行的结构性及制度性的逻辑、而要矫正人类以及自然环境之间的摧毁性关系形式的各种集体行动。而生态学一词，从我的社会学的取向来说，我将它了解为考虑到人类作为一个较广的生态系统的组成而想要以动态的、演化的视角来期望维持生态平衡的一组信念、理论以及计划。

至于类型学，我要再度运用第二章中所提到的杜罕关于社会运动有用的定义，以这些运动在过去 20 年中在跨国的层级上，



从可以观察到的实践中所声称的来区分环境运动的五个主要的类型。这边的一些案例几乎都是来自北美及德国的经验，因为它们是世界上环境运动最为先进的国家，也因为我要取得这些信息最为容易。虽然有着这层原因，我仍然认为这个类型有着普遍的价值。但也请接受其中难以避免的简化，我以希望所有的类型能够补偿于我把有血有肉的具体运动的案例作了某种抽象化的这点。

为了要展开以所提议的类型学工具来涵盖环境运动的万花筒的这个短暂旅程，你需要一张地图。图表 3-1 提供这个信息，但还需要一些解释。每种类型是根据定义社会运动的三个特征：认同、对立面以及目标来加以界定的。每个类型，我从观察、使用各种资料而界定分析对象在这三个特征上的精确内容。据此，我给每个类型一个名称，并且为最符合于每一类型的运动提供一个范式。自然地，每个给定的运动及组织中，会有各种特征相互重叠的状况，然而为了分析的目的，我选择了在具体实践及论述层次与理想的类型看来较为接近的案例。在阅读过图表 3-1 之后，你将会看到说明五个类型的每个案例的简短描述，这样我们就可以听见运动混杂在杂音中的独特声音。

图表 3-1 环境运动的类型

类型（范式）	认同	对立面	目标
自然的保存（美国，十之团体）	自然的爱好者	未加控制的开发	野生价值
保卫自身的空间（不要在我家后院）	当地社区	污染者	生命/健康的品质
反文化的深度生态学（地球第一！生态女性主义）	绿色的自我	工业主义、科技以及父权主义	生态乌托邦
拯救地球（绿色和平）	国际主义的生态战士	不受限制的全球性开发	永续性
绿色政治（绿党）	关心的市民	政治建制	制衡的权力

对于自然的保存虽然有不同的形态，它却是美国环境主义运动的起源，如山脉学社（Sierra Club，1891年由约翰·缪尔在旧金山所创立的）、奥杜邦学会（Audubon Society）或者是野生协会（Wilderness Society）所进行的行动。<sup>①</sup>在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旧的以及新的主流的环境组织，以十之团体（Group of Ten）形成了联盟，除了上述的组织之外，它还包括了国家公园及保存协会、全国野生动物联邦、自然资源防卫委员会、伊查克·华尔顿联盟（Izaak Walton League）、野生生物捍卫者、环境防卫基金会以及环境政策中心。虽然它们各自有不同的取向也有特定的介入领域，将这些组织凝聚在一起的、以及沿着相同路线创造出其他许多组织的，则是通过建制的系统为了保存目标所进行的务实的捍卫行动。用山脉学社的主席麦可·克罗司（Michael McCloskey）的话来说，这个取向的特点是“混乱地前进”（muddling through）：“我们所秉持的是一种登山的传统，这种传统是：你先决定要登山。你对一般的登山途径有点概念，但实际上在行进当中你会发现手脚的落点还是要随时调整及改变”<sup>②</sup>。他们所要攀登的高峰是野生动植物的保存，虽然形式各有不同，却都是在现有的经济及制度体系之中，加入合理的参数就可以被达成的。他们的对手是不受控制的开发以及没反应的官僚体系，例如像不关心保护自然资源的美国填海局（US Bureau of Reclamation）。这些运动者界定自己为自然的爱好者，并且无视公众的社会差异来诉求这种共同感情。他们通过各种制度进行工作，包括具有高度技巧以及政治角力的游说工作。他们仰赖普遍大众的支持，同时也依靠来自善意而富有的精英以及企业的捐献。有些团体如山脉学社是十分庞大的组织（有60万会员），且是按照各

① 艾伦（Allen，1987）；史可思（Scarce，1990）；高地林柏（Gottlieb，1993）；谢毕可夫（Shabecoff，1993）。

② 引自史可思（Scarce，1990：15）。



个地方不同的章程所组织的，它的行动及意识形态因此有相当程度的差异，而不一定都是符合“主流的环境主义”的意象。许多其他团体，例如环境捍卫基金会，它的工作集中在游说、分析以及散布信息。他们也常操作联盟政治，然而很小心地避免因为脱离了与环境有关的焦点而使得激进的意识形态不被公众所信任，或是进行一些只是很炫却与大多数的公众意见脱节的行动。然而如果把真正激进的环境主义者与主流的保存主义者两者对立来看的话，那就会是一种错误了。举例来说，山脉学社中历史性的领导人之一大卫·布朗尼 (David Browner) 已经成为激进环境主义者的思想来源之一。而互惠的另一个例子是从“地球第一!” (Earth First!) 出身的大卫·傅莱曼 (Dave Foreman)，也在 1996 年成为山脉学社 (Sierra Club) 的部门主管之一。因此，虽然在多样化的运动之间有着尖锐的矛盾与冲突，然而在保存主义者以及激进的生态主义者两个阵营却有很大程度的彼此渗透。对他们来说，对环境的无情的多重形式的摧毁才是共同关心的课题，而意识形态则是次要的。

反对不想要的使用方式的人侵，为了保卫自身空间的本地社区动员，已成为环境行动最快速成长的形式，而且或许也最能连结上人们对更大的环境恶化的议题的直接关注。<sup>①</sup> 它通常被有点不怀好意地贴上“不要在我家后院”运动的标签。在美国，它最早是以反对毒物运动的形式发展出来的。它的根源是 1978 年不是太出名的、把工业有毒废弃物倾倒在纽约州尼加拉瀑布的爱河 (Love Canal) 事件。罗丝·吉布司 (Lois Gibbs) 这个持家者因为捍卫她儿子的健康并且捍卫家园价值而斗争，因而得到恶名。她在 1981 年创立了“市民清理有毒废弃物之家” (Citizen's Clearinghouse for Hazardous Wastes)。根据清理之家的统计，在 1984

<sup>①</sup> 高地林柏 (Gottlieb, 1993); 史赛恩 (Szasz, 1994); 艾普斯丹 (Epstein, 1995)。

年，全美国总共有 600 个地方团体反对倾倒有毒废弃物，而在 1988 年，则增加为 4687 个。在这个时间里，社区同时也动员反抗高速公路的兴建、过度的开发以及在邻近区域设置有害设施。虽然这些运动是地方性的，然而它们却不一定是地方主义的，因为它所诉求的是与企业或官僚的利益对立的住民权利以及生活品质。当然，社会生活是由作为住民、工作者、消费者、通勤者以及旅游者等各种不同的人之间的利益折衷才能组成的。不过这些运动所质疑的一方面是人们不想要的物质或是活动集中于低收入社区以及弱势者居住区域的这种歧视，另一方面则是空间使用的决策过程中所缺乏的透明性及参与。因此，除了拒绝被毒物倾倒以及有毒设施包围，市民更将地域的民主加以延伸，而要求一个负责的城市规划，以及分担都市/工业发展的负面因素的公平性。就如同艾普斯丹 (Epstein) 对于运动所作的分析：

有毒物质的/环境的正义运动要求国家有更大的权力来规范企业，以及国家对于公众而非企业具有问责性 (accountable)。这些要求看起来都是合宜的，而且可以作为一种基础来要求国家应该重申并扩张对于企业的权力，要求国家的权力应该是要为公众利益以及特别是为了最为弱势的人们的福祉而运作的。<sup>1)</sup>

在其他的案例中，中产阶级郊区的住民动员通常是针对保存现有状态，而反对不想要的开发。然而不管其阶级内容如何，所有的抗议目标都是为了地方社区而要求建立对于居住环境的控制，而从这个意义而言，防御性的地方动员当然是更大的环境运动的一个主要组成。

环境运动也对从 20 世纪 60~70 年代所衍生出来的反文化

1) 艾普斯丹 (Epstein, 1995: 20)。



(counter culture) 运动提供了滋养。所谓的反文化，我的概念指的是一种特意要过着与被社会以建制力量所强化的主流规范不同的、甚至某个程度相矛盾的生活的企图。它们以另类的原则及信念为基础来反对这些建制。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些最强大的反文化潮流表达自己的形式是只遵守自然法则，并且宣称尊重自然的优先性是胜过任何人类制度的。这是为何我认为将例如动物解放运动以及生态女性主义等具有这个概念的反文化环境主义的表现纳入明确的激进的环境主义者（如“地球第一！”或是“海洋守卫者”）是可以成立的<sup>①</sup>。事实上，虽然意识形态各有分歧、彼此之间也缺乏协调，大部分的运动仍然分享了诸如挪威作家安·那斯（Arne Naess）所表达的“深度生态学”（Deep Ecology）的思维。根据安·那斯以及乔治·赛桑（George Sessions）的定义，“深度生态学”的原则如下：

(1) 人类及非人类生命的福祉及昌盛有其本身的价值。这些价值与非人类世界在人类目的上的利用价值无关；(2) 生命形式的丰富与多样性有助于这些价值的实现，同时它们本身也是价值所在；(3) 除了维生所需，人类没有减低这些丰富性以及多样性的权利；(4) 人类生命以及文化的兴荣与人口的实质缩减是兼容的。非人类生命的兴盛则需要这种缩减；(5) 现今人对于非人类世界已经过度干预，而且这种情势还在恶化当中；(6) 政策必须要改变，这些政策将影响经济、技术以及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各种事务的状况将会与现今十分不同；(7) 意识形态的改变主要指的是注重生活品质（身处于内在价值的状态中），而不是一味地要求生活渐

---

<sup>①</sup> 资料可参考艾德勒（Adler, 1979）；史普内克（Spretnak, 1982）；曼尼斯（Manes, 1990）；史可思（Scarce, 1990）；戴卫思（Davis, 1991）；杜布森（Dobson, 1991）；艾普斯丹（Epstein, 1991）；穆格（Moog, 1995）。

增的高标准。对于大的以及好的两者的差别将会有发自内心的觉醒；(8) 认同于上述几点的人应该有一种义务来直接或间接地试着实践这些必要的转变。<sup>①</sup>

为了要回应这样的义务，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许多激进生态主义者在一位前海军陆战队退役的生态战士——大卫·傅曼的领导下在亚利桑那州及新墨西哥州创立了“地球第一！”。它是一个以公民不服从、甚至以生态恐怖主义(ecotage)的方式，进行反对兴建水坝、伐木以及其他侵略自然的不妥协的运动。因此这些运动成员甚至还面临被起诉或坐牢的处境。这个运动以及其他一些面临诉讼的小组织，处于完全的分散状态，他们由独立小部落所形成，按照美国印地安人的仪式及行事方式不定期地聚会并决定行动。深度生态学是这个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而它主要的形貌则可由所出版的《地球第一读本》中看出梗概，大卫·傅曼并为这本书写了序言。<sup>②</sup> 但具有同样的（如果不是更多的）影响力的是艾贝(Abbey)关于一个生态游击队的反文化群体的小说《活动扳手帮》(The Monkey Wrench Gang)，而生态游击队也成为许多激进生态主义者的角色模范。事实上“活动扳手”(monkeywrenching)已经成为生态恐怖主义的同义字。

生态女性主义很清楚地与这些运动之中的某些“雄性策略”有所不同。然而，生态女性主义同样分享尊重自然作为从父权主义及工业主义解放的基础的这个原则。他们将女人视为同样是加害于自然的父权暴力之下的牺牲者。因此，回复自然的权利与女人的解放是分不开的。用茱地斯·潘莱特(Judith Plant)的话来说：

① 纳司与赛森斯(Naess and Sessions, 1984)；戴卫斯(Davis, 1991: 157-158)再改写。

② 戴卫斯(Davis, 1991)。

从历史上来看，女人对于外在世界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权力，也没有决策的空间。知性的生活、心灵的工作，传统上就不对女人开放。女人跟自然一样，从来就是被动的。然而，今天生态学要为地球、为人类/环境关系中的“他者”说话了。而生态女性主义者，借着为一些最根本的他者说话，试图了解所有支配形式相互连结的根源以及抵抗变迁的方式。<sup>①</sup>

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也被卡洛琳·麦陈特 (Carolyn Merchant) 具有争议性的历史性建构所启发，而回归到史前的自然社会。那是一个没有男性支配、崇尚母权的黄金时期。在那时自然及文化之间有着和谐，男人女人都以敬神的方式来对待自然。<sup>②</sup> 在环境主义、灵性的女性主义以及新异教派之间一直有一种有趣的连结，特别是在 70 年代。有时候它是以生态女性主义以及非暴力的直接行动来表达，而由拥有这样手法的女巫来执行。<sup>③</sup>

因此，通过深度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以及以生态游击队到灵性主义的各种形式，激进的生态主义者将环境运动与文化的革命连结起来，扩展了这个无所不包的运动的视野，而建构了生态乌托邦 (ecotopia)。

“绿色和平” (Greenpeace) 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态组织，而借着它的媒体取向及非暴力的直接行动方向，它所针对的环境议题大概也是最为普遍的。<sup>④</sup> 它是因为反对在阿拉斯加海岸设立核电

① 布南特 (Plant, 1999: 101)。

② 麦陈特 (Merchant, 1980)；也参见史宾纳克 (Spretnak, 1982)、穆格 (Moog, 1995)。

③ 艾德勒 (Adler, 1979)；艾普斯丹 (Epstien, 1991)。

④ 韩特 (Hunter, 1979)；艾维曼及杰穆森 (Eyerman and Jamison, 1989)；迪曼 (DeMont, 1991)；豪顿 (Horton, 1991)；欧斯特坦格 (Ostertag, 1991)；麦谢特 (Melchett, 1995)；华普纳 (Wapner, 1995, 1996)。

厂的议题而于1971年在温哥华成立的。随后它将总部设于阿姆斯特丹。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跨国的、网络化的组织。1994年在全世界拥有600万个会员，而每年的收入则超过1亿美元。作为环境运动，它独特的重要之处来自于三个组成元素：首先，是一种对于地球生命毁灭的危机感，它得自于美国印地安人的传说的启发：“当地球生病了，而动物都消失了，那么就会有来自于各种信条、肤色及文化的人们出现、形成一个族群。他们相信行动胜过语言，他们将会重寻地球昔日的美丽。这个族群就被称为‘彩虹战士’（Rainbow Warriors）”；<sup>①</sup>其次，是得自桂格教派、一种同时作为行动原则也是沟通策略的将自身作为见证的态度；第三，是一种商业般的、务实的态度。这大部分是受到绿色和平的历史性领导人并作为董事会主席的麦坦格（McTaggart）所说的“目标就是要成事”的影响。没时间讲哲学式的讨论：地球上最重要的议题要用知识及调查方法加以定义；特别的造势要针对可见的目标加以组织；紧接着要有吸引媒体注意的炫日活动，这样才能在公众的眼中强化一个既定的议题，进而迫使公司、政府以及跨国机构采取行动或是更进一步去面对他们不敢保证的公开性。绿色和平同时既是一个高度中心化的组织，也是一个全球的分散的网络。它是由各个国家代表们所组成的议会，一个小规模的执委会，以及由北美、拉丁美洲、欧洲以及大洋洲的区域理事所共同控制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部分的造势行动是关于有毒物质、能源及大气层、核能议题以及海洋/陆地生态。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的分部，针对地方及全国的层次来协调全球性的活动、募款及寻求支持，但是大部分的行动是针对全球性的冲击，因为主要的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绿色和平认为它所反对的是一种对地球的生命存续缺乏关注的发展模式。据此，它进

① 绿色和平基金会（Greenpeace Environmental Fund），引自艾雅曼及杰穆森（Eyerman and Jamison, 1989: 110）





行动员来强化环境的永续性原则，并且将此作为所有的其他政策及活动所必须要服从的最高原则。因为这个使命的重要性，“彩虹战士”并不打算涉入与其他环保团体的争辩，也不沉溺于反文化，它也不管因为重要会员的态度所带来的个别差异。它们全然是国际主义的，而将民族国家视为要对目前失序的、摧毁式的发展加以控制的主要障碍。它们对于生态自杀式的发展主义宣战，它们的目标是要在每一个行动的前线就见到立即成果，例如转化德国的冷冻工业变成为“绿色冷冻”，以有利于臭氧层，或是经由在南极圈设置鲸鱼庇护所而对限制捕鲸产生影响。“彩虹战士”站在生命科学、全球网络化、沟通技术以及跨世代的团结等事物的交汇点上。

绿色政治从第一眼看来，似乎本身并不是一种运动类型，而比较像是为了环境主义而进入选举政治领域的特别策略。然而，更进一步观看绿色政治的重要案例绿党，清楚地可以看出它并非寻常的政治。<sup>①</sup> 1980年1月13日成立的德国绿党，以基层运动联盟为基础，并不只限于提出环境运动，虽然在德国提出环境主义的诉求要比其他的欧洲国家来得较为有效。它的形成背后主要的动力是20世纪70年代的公民创制（Citizen Initiatives），它主要是围绕着和平以及反核动员而形成的。它特别还带入了曾参与60年代运动、却发现60年代的革命中清楚地具有性别偏见，而在这种状况下发现自我的女性主义者，它的成员同时有着关注和平、核能、环境（森林的疾病）、世界政府、个人自由以及基层民主的年轻人及具有高教育程度的中产阶级。

绿党的快速成功（1983年他们进入了国会），发轫于非常不寻常的状况。首先，在德国一直是三个主要政党轮流执政的状

---

<sup>①</sup> 在许多关于绿党的资料中，请参见兰固思（Langguth, 1984）；豪斯伯格（Hulsberg, 1988）；威森思尔（Wiesenthal, 1993）；史可夫（Scharf, 1994）；以及波固基（Poguntke, 1993）；及法兰克兰德（Frankland, 1995）。

况，他们甚至还在 60 年代形成联盟，而在三个政党之外，并没有真正的社会抗议的政治表达的情况。在 1976 年，三个政党（基督教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囊括了 99% 的选票。因此，有一些潜在的不满选票，特别在年轻人当中，等着一些可以表达意见的可能性。金融政治的丑闻 [例如富立克 (Flick) 绯闻]，已经动摇了所有政党的声誉，并且暗示了他们与企业捐献之间的关系。甚至，政治学家所称的“政治机会结构”支持了形成政党的策略并且将个别分子组成整体：除其他因素之外，政府提供了运动获得大笔资金的途径，而德国的选举法令规定必须要有至少 5% 的选票才能够进入国会，而这对绿党产生了限制。大部分的绿党成员是年轻人、学生、教师以及其他来自不直接与产业有关的领域，他们不是未受雇（但被政府资助），就是在政府部门工作。他们的议程包括：生态、和平、捍卫自由、保护弱势及移民、女性主义以及参与民主。在 20 世纪 80 年代，绿党领导者中有三分之二是各种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事实上，用派翠·凯利的话来说，绿党正是将自身表达为“反对政党的政党”，并以对权力的新的了解为基础的政治。这种“反权力”是很自然的，对所有的人同等对待、也是被所有人分享，以及被所有人所使用的。<sup>①</sup> 因此，他们的公职是轮流担任的、以集体方式产生决议，他们所追寻的是无政府主义的传统，虽然后者对他们来说，所给的启发要比绿党真正能够接受的来得多。

然而在几年之后，现实政治的严峻考验，特别是 1990 年的选举粉碎了这一个实验。主要是因为绿党对于德国统一与现实的相关程度作了错误的判断，这个态度是与他们反对民族主义的立场相一致的。在务实派（试着要通过体制来提升绿党议程的务实的领导者）与基本教义派（基层民主及生态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死忠分子）之间的潜在冲突在 1991 年初终于爆发出来，只剩下中

<sup>①</sup> 凯利 (Kelly, 1994: 37)。



心主义者以及务实主义者掌控政党。重新调整方向及重组之后，德国绿党在 20 世纪 90 年代重寻活力而再度进入国会，并且在区域及地方政府如柏林、法兰克福、布列曼以及汉堡，赢得有力的地位，有时并与社会民主党形成联盟。然而它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政党。这是说，它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政党了。除此之外，这个政党也不再垄断环境议题的议程，因为社会党以及甚至如自由党，已经对社会运动所提出的各种想法更为开放。而且 20 世纪 90 年代的德国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国家，不再有战争的威胁，但是经济却在衰退。年轻人普遍失业以及福利国家的解组使绿党争取中年的选民要比提反文化的议题更为重要。派翠·凯利在 1992 年被谋杀，这件事可能是她的男伴所为，而这名男子随后自杀，使得事情十分扑朔迷离。这个事件显现了逃避日常生活的社会而不理会经济、政治以及心理等基本问题，是有其局限性的。然而，通过绿色政治，绿党已经强化了自身作为一个在 20 世纪末的德国普遍的左翼思想，而 20 世纪 70 年代的反叛时代还保有这些思维，并且在年纪增长的同时通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将这些想法传递给下一代。因此，从文化上或政治上而言，一个非常不同的德国已经从绿色政治的实验中浮现出来了。然而，要整合政党及运动而不会导致极权主义（列宁主义）或者以运动作为代价的改良主义（社会民主）是不可能的。这个社会变迁的铁律又在此得到另一个历史的证明。

## 第二节 绿化的意义：社会性议题 以及生态主义者的挑战

---

保护自然、对环境质量的追求以及对生命的生态取向是 19 世纪才有的想法。在出现这些明确的表现的国家中，很长时间

以来这些诉求只限于受到启蒙的精英<sup>①</sup>。通常他们是一群对于工业化感到不安的上流社会人士的专利，就像在美国的奥杜邦学会。在其他的案例中，公社式的乌托邦的成分是早期的政治生态主义者的温床，如克鲁泡特金的例子中所展现的把生态与无政府主义连结起来的传统。而在当今对此表达最为深刻的就是莫瑞·布清（Murray Bookchin）。不过在每个案例中，以及过去将近一百年来，它都维持在仅限于知识分子的传统中。目标主要在对有权力的个人的意识产生影响，使这些人能够推动保存立法或者是将其财富捐献给对自然有益的诉求。甚至当社会联盟形成的时候（举例来说 30 年代的美国罗伯·马歇尔与凯萨琳·布尔形成联盟），这些政策结果都是被包装成会带来重要的经济及社会的福祉。<sup>②</sup> 虽然有着一些具有影响力以及有勇气的先驱者，然而却只有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在基层以及公众意见两个层面才开始出现大众运动，并从美国、德国及西欧以及很快传递散布到全世界。为何如此？为何生态的概念突然如火如荼地兴起？我的假设是环境运动提出的主题与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即将浮现的新社会结构 - 网络社会的基本面向有直接呼应，也就是科学及技术作为经济及社会的基本工具及目标、空间的转型、时间的转型，以及被财富、权力以及通过媒体网络建构虚拟实境的信息化等此类抽象的、全球的流动所主导的文化认同。当然，在环境主义者混乱的世界中，我们可以发现各类主题，但同时没有任何一个案例可以说是个案。然而我承认有个隐约一致的环境论述跨越了这个运动中不同的政治取向及社会根源，而且提供了一个架构使不同主题可以在不同时刻、

---

① 布莱威尔（Bramwell, 1989, 1994）。

② 高地林白（Gottlieb, 1993）。



为了不同目的被加以强调。<sup>①</sup>很自然地在环境运动的不同成分中，当然也有一些尖锐的冲突及强烈的异议。然而这些不同的意见主要是与战略、优先性以及语言相关的问题，而不是关于将捍卫特定的环境联结上新的人类价值这样的核心主题。虽然也许有过度简化的危险，我将以四个重要的主题来综合在环境运动中主要的论述线索。

首先是在科学与技术之间一种暧昧的、然而却是深刻的相关性。就像布莱威尔所写的那样：“绿色思想的发展是一种对科学的反叛。它反对了从19世纪末期开始从欧洲及北美所产生的科学”。<sup>②</sup>这个反叛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强化及散布，它几乎与信息技术的革命同时，之后更是经由计算机的模式化而在生物知识上卓越发展。一方面对于先进技术的好处有着普遍的不信任，导致如克派翠克（Kirpatrick）所代表的新路代克（Neo-Luddite）意识形态的极端宣称。另一方面，运动大部分仰赖了人造物与环境两者互动的科学信息的收集、分析、诠释及散布，有时候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主要的环境组织通常有科学家作为他的幕僚，而且在大部分的国家，科学家、学院中的研究者以及环境的积极分子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连结。

环境主义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运动。有时候，假装知道对自然及人类将会造成什么后果的糟糕科学反面暴露出产业主义、资本主义、科技以及官僚的既得利益。生态主义者一方面抗议科学对于生活的宰制，但为了捍卫生命，同时却运用科学来反对科

---

① 关于一些国家的环境运动主题呈现及相关性的证据，参照狄更斯（Dickens, 1990）；多布森（Dobson, 1990）；史可思（Scarce, 1990）；艾普斯丹（Epstein, 1991）；柴克（Zisk, 1992）；可曼及可曼（Coleman and Coleman, 1993）；高地林白（Gortlieb, 1993）；谢毕可夫（Shabecoff, 1993）；布莱威尔（Bramwell, 1994）；伯理特（Porritt, 1994）；理契曼及包伊（Riechmann and Fernandez Euey, 1994）；穆格（Moog, 1995）。

② 布莱威尔（Bramwell, 1994: vii）。

学。他们所提倡的原则并非是对知识的否定，而是一种更优越的知识：具有整体视野的知识，它超越了只锁定本能的满足所带来的琐碎取向以及短视策略。从这个层面看来，环境主义的目标是要在科学与技术使用最终会把自身意志强加于我们及自然之上的一些机器来掌控生命（一种人类长久的恐惧）之前，夺回对于人类心智产物的社会控制。

对于结构性转化的斗争等同于对于社会两个基本物质性的表现——空间与时间——进行历史性的再定义。事实上对于空间的控制以及对于本土的强调是环境运动的不同成分中另一个主要的反复出现的主题。我在第一卷的第六章曾提出从网络社会中产生的两个空间逻辑：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及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这两者的基本对立。流动空间借着远距通讯以及信息化系统而在一定的距离之外组织了社会实践的同时性。而地方空间则擅长于以实质的聚合为基础的社会互动及制度化的组织。

新的社会结构：网络社会的特征是大部分的控制过程、中心化的权力、财富及信息都是以流动空间的形式组织而成的，但大部分的人类经验及意义却仍以本土为基础的。这两个空间逻辑之间的脱节是我们社会的主要宰制机制，因为它将核心的经济、象征以及政治过程从社会意义能够被建构而政治控制能够被执行的领域中转移出来。因此，生态主义者对于地域以及对于人们掌控生活空间的强调对于这种新政治体系形成了一种挑战。甚至在一些最具有防御性的行动中，例如被贴标签为“不要在我家后院”的行动中，声称对于既定的空间，本土的生活相对于如倾倒入毒物的公司或者延伸跑道的机场等类的“外在利益”具有优先性，也具有拒绝承认技术或经济利益的抽象重要性胜过具体人们的具体使用以及具体经验的此一深层意义。环境地方主义（Localism）所挑战的是，在被不负责任的科技官僚以及不被控制的商业利益所执行的抽象技术理性所代表的原则之下，不同的功能及利益之间所丧失的相互关连性。因此，这个主张的逻辑发展为要

求小规模政府，鼓励本地社区及公民参与：基层民主是隐含在大部分生态运动中的政治范型。在最具体的替代方案中，对于空间的掌控、对于空间权利作为意义之源的维护，以及对于地方政府的强调都与无政府主义传统的自我管理理想联系在一起，包括小规模的生产以及对于自给自足的强调。这些概念将会带来节约、对于炫耀性消费的批判以及生命的使用价值取代了金钱的交换价值。当然，抗议自己的邻里被倾倒有毒废弃物的人们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之中也不会有太多的人真的准备好改变他们目前生活中的整体形貌。但是这个主张的内在逻辑，在为了反对流动空间的必要性而保卫个人的空间、强化地方性的经济及政治基础，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使得在某个象征性的事件发生时（例如兴建核能电厂），为公众意识提供了一个突然间认同这些连结的机会。所以它创造了日常生活问题与另类社会的计划两者相遇的条件，而后者正是社会运动诞生之处。

不仅是空间，网络社会也控制了时间，而环境运动大概是保卫一种新的、革命性的时间感的最主要的活动者。这一点很重要，但也很复杂，而需要慢慢地加以解释。在第一卷第七章，我区分了三种形式的时间感 [以目前的社会学及历史学的辩论为基础，同时加入莱布尼兹 (Leibniz) 以及因尼斯 (Innis) 的时空哲学]：分别为钟摆时间、永恒时间以及冰河时期的时间。钟摆时间，是工业主义的特征，它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的。在过去与现在，它的特征是事件发生的时序，以及已经被以制度化手段制造出经验性匮乏的既定时间表加以驯化的人类行为；永恒时间，它指出了我们社会一些主要过程的特征。它发生于在特定脉络——也就是信息化典范及网络社会——的性质对于脉络中的现象进行时序性的干扰。为了要达到瞬息性（如同“瞬息战争”或是瞬间的金融交易），这个干扰可能采取一种对于现象的出现加以压缩的形式，或是其他如在顺序中引入随机乱数的方式（如整合性的、电子媒体通讯的超文本）。消除了顺序创造了未加

分化的时间，也因此摧毁了时间。在我们的社会中，最具强制性的、核心的过程是建构在无时间性的时间中，然而大部分人还是被钟摆时间所主导的。

还有另一种时间形式，也就是社会实践中所感知及提议的：冰河时期的时间。在纳西以及尤瑞（Lash and Urry）最初的定义中，冰河时期时间的概念指的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非常长久并具有演化性的。它可以往前回溯至人类的历史，往后则指向混沌的未来”。<sup>①</sup>我进一步将他们的概念加以演绎而提出如下的概念：环境运动的特征正是它从意识及政策两者的角度为我们的时间感提出一个“冰河时期的时间观”的方案。生态学的思考以一种演化的观点来看待所有形式的事物之间的互动。从“改变地球以及宇宙的基本平衡，也许最后会破坏细致的生态平衡而带来灾难的后果”这样的想法，可以准确推出从限制资源的使用到资源再生、从中心到环境主义的概念。人类与自然相结合的整体式的思考，就如深度生态学的作家所呈现的，并不是指那些对于纯粹的自然景观的天真崇拜，而是认为“经验的相关单位并非是个个体，而是历史性存在的人类共同体”这样的基本观念。为了要将我们与在宇宙中的自我相结合，我们首先必须要改变对于时间的观念，感受留在我们的生活中奔流的冰河时期的时间，感受到流过我们血液中如星子般的能量，以及假设我们的思想之河无尽地汇聚于吸纳了多重生命形式存在的广阔海洋。用非常直接而人性化的词语来说，冰河时期的时间意味着以我们的小孩、以及其后世代代的生命来衡量我们现在的生命。因此，为了他们以及同样地为了我们，管理我们的生活及体制并非是一种新世纪的教派，而是照顾我们的后代，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血肉——这是一种老式的想法。提出永续发展作为跨世代的团结，是把健康的自利主义以及从演化观点的系统性思考两者相互结合。环境运动最有

<sup>①</sup> 纳西及尤瑞（Lash and Urry, 1994: 242）。





活力的议题之一反核运动，除了立即的安全性问题之外，它对核电的批评的基础是放射性废料的长期影响。它的目标是要我们之后数千年的世代仍然享有安全。从某个程度而言，保存以及尊敬原住民文化的原因，是为了要将关注往后延伸到不同时代中人类存在的不同形式，以及宣称我们就是他们、他们就是我们。环境运动暗指的、而深度的生态主义者及生态女性主义者所清楚标举出的，正是**人类整体、所有生命以及其时间与空间的演化这三个主题**。<sup>①</sup> 将环境主义的不同声称及主题连结在一起的具体表现是它们另类的**时间感**，要求社会体制认可在其环境之中的人类的缓慢的演化速度，而只要在人类还继续从它的初始存在开始不断向外扩张，就不能不想到我们的宇宙性质般的存在。在世界上大多数人们所经历到的要求服从的钟摆时间的界线以外，计算机网络中由反复流动所产生的时间摧毁、以及在我们的宇宙般自我的意识假设中实践了冰河时期的时间，这两者之中正进行着对于时间感的历史性斗争。

通过对于占用科学、空间及时间的斗争，生态主义者引出了**新认同的创造**，一种生物**的认同感**，也就是人类作为自然组成的一部份的文化。社会性的生物认同不意味着否认历史性的文化。生态主义者对于常住民文化抱持着敬意，而且享受着来自不同传统的文化原味。然而，他们的实际敌人是国家的民族主义。这是因为从定义上来说，民族国家注定就要宣称它对于某特定领域的权力。因此，它分裂了人类的一体性以及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也将有害于全球生态体系的共同分享。用绿色和平国际组织的历史性领导人大卫·麦塔格（David McTaggart）的话来说，“我们必须指出的最大威胁就是民族主义。在下一个世纪，我们要面对的问题不再是简单地能够从个别国家的基础来讨论的。”

---

① 戴麻纳德与奥瑞恩汀（Diamond and Orenstein, 1990）；麦克劳尼（McLaughlin, 1993）。

我们要尝试的是，抛弃几个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的偏见而进行国际性的合作”。<sup>①</sup> 从一种表面上冲突的角度来看，生态主义者同时既是本土主义者，也是全球主义者。演化式的思考以及政策要求一个全球的观点。人们与环境的和谐则从本地的社区开始。

这个作为一个物种的新认同，一个新的社会性的生物认同，能够轻易地连结上多种面向的历史传统、语言以及文化象征当中，然而却很难与国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混合。因此某种程度上，环境主义超越了在财富与权力的全球流动之下所产生的虚拟文化与原教旨主义的文化或宗教认同表现相对立。只有一个为了所有人类的全球认同，这无涉于独特的社会、历史以及性别的归属，或是宗教信仰。然而，因为大多数人并不是过着一种从宇宙的角度来思考的生活，而我们与蚊子有着共同本质的假设也仍有着许多策略性的问题，因此生态学的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关键，仍是它将单一的文化与其他从历史的差异性 & 生物的共同性所产生的人类的超文本加以结合的能力。我称这种文化为绿色文化 (green culture) (当数以百计的人们都这样地称呼它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发明别的字眼)，而我以派翠·凯利的词汇来定义它：“我们必须学习从心开始行动与思考，承认所有生物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尊敬这个生命的巨网中每一条细微丝线的价值。这是一个灵性的观点，也是所有绿色政治的基础……绿色政治要求我们同时又反叛又温柔”。<sup>②</sup> 反叛的温柔性，温柔的反叛性：我们已经远离了工业世纪中盛行的、以资本主义及国家主义的版本所呈现的工具主义的观点。而我们不同于构成了网络社会中无面貌的权力流动所带来的意义崩解。被多重面貌的环境运动所提出的绿色文化，正是对我们社会中的主导过程的特征——虚拟真实的文化——的一帖解药。

<sup>①</sup> 奥斯特坦格所做的访问 (Ostertag, 1991: 33)。

<sup>②</sup> 凯利 (Kelly, 1994: 37)。



因此，生命的科学对照于被科学掌控的生命；空间的地方控制对照于不受控制的流动空间；冰河时间的实现对照于摧毁时间以及继续做钟摆时间的奴隶；绿色文化对照于虚拟实境。这些是环境运动对于网络社会的支配结构所提出的根本挑战。这也是为何它要提出这些人们感知模糊的议题的原因所在。人们的感知虽然模糊，但从自身却可以创造出新生命。在狂热的绿色火焰延伸到人们的壁炉的路途中，仍然高筑着许多的社会租界，而这迫使环境运动要通过制度进行长征。而与所有的社会运动相同的是，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完全没有坏处的。

### 第三节 行动中的环境主义： 碰触人们的心灵、驯化资本、 向国家示好以及与媒体共舞

大部分环境运动的成功来自于以下的事实：与其他的社会力量作比较，它最能够适应于在新科技典范中的沟通及动员的条件。<sup>①</sup> 虽然许多的运动依靠地方组织，环境主义的行动却是针对媒体事件为基础的。借着创造出吸引媒体注意的事件，环境主义者能够在自身的组成分子之外接触到更加广泛的受众。而且环境主题在媒体上的持续出现已经使它们比起其他诉求更具有正当性的位置。全球性的环境运动中的一些案例都有明显的媒体取向，如绿色和平，它的整体逻辑就是面向创造事件，而对特定议题动员公众意见，对于相关的有权者施压。不过对于地方层面的环境

<sup>①</sup> 参照艾普斯丹 (Epstein, 1991); 豪顿 (Horton, 1991); 欧斯特塔格 (Ostertag, 1991); 高士丹与高士丹 (Costain and Costain, 1992); 高地林白 (Gottlieb, 1993); 卡纳基等 (Kanagy, 1994)。

抗争这也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地方的电视新闻、收音机以及报纸都是环境主义者的发言台，甚至于企业及政客往往抱怨进行环境主义动员的是媒体而非环境主义者。媒体与环境主义之间的象征关系有以下几个源头。首先是运动从70年代开始就接受的非暴力取向的行动策略，它提供了很好的报道题材，特别适逢新闻需要新鲜的形象时。许多环境运动的活跃者很有想象力地操作传统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策略“典范行动”（l'action exemplaire），它是一种能够震撼心灵、引起辩论以及促进动员的炫目行动。自我牺牲，例如遭受逮捕及入狱、在海洋中冒着丢命的危险、把自己拴到树上、使用身体来阻挠可恶的工程或是为邪恶力量所进行的护航、在官方仪式上闹场，这些与其他许多结合了自我约制以及非暴力宣称的直接行动带来了一种自我见证的态度，而在这个普遍沦为犬儒的世纪中，它重拾了信任并强化了伦理的价值。其次，环境主义者所提出的这些议题的合法性，直接联系上被许多人们所重视的人文价值，他们通常与党派政治保持距离，而提供媒体寻求一个为人民说话、并同时增加自身的合法性的绝佳机会，而这使得媒体工作者也喜欢这样。甚且，在地方新闻中，有关于危害健康或是环境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报道，这些讨论系统性的问题要比任何传统的意识形态论述更具有影响力。通常，环境主义者会给媒体提供宝贵的画面，而这比起厚厚的报告更能够说明事情。因此，从康乃迪克州到亚马逊平原，美国的环境团体将摄影机送往全世界的当地团体，让他们能够拍摄到明确违反环境法令的行为，然后使用这些团体的基本技术，设备来处理、散布这些控诉的画面。

环境主义者同时还在组织及使用工具上掌握了先进的沟通技术，特别是网络的使用。<sup>①</sup> 举例来说，在美国、加拿大以及智利，以山脉俱乐部、绿色和平、野生生命捍卫者、加拿大环境法协会

<sup>①</sup> 拜兹（Bartz, 1996）。



以及其他组织为中心形成的环境团体联盟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通过，因为这个协定当中缺乏足够的环境管制。他们使用网络来整合行动及信息，并且设置了一个永久性的网络而将战场延伸到90年代美洲的跨国环境行动。在1996年当保存国际学会以及雨林行动网络为了捍卫雨林中的原住民而开设网页之后，全球网页就变成是全世界环境主义者的集结点。于是通过网页他们与一个以泰国为基地的组织“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得以协调彼此的行动，而后者也以新进工业化的亚洲国家的角度提供了他们的环境主义的视角。通过这些网络，全球的当地组织突然能够在全球的层次，也就是问题产生的层次上，共同行动。似乎一群精通电脑的精英正在浮现，而成为全世界各地的地方性环境行动团体需要协调的核心。而这类似于在工人运动出现的早期，工匠式的印刷员以及新闻记者所扮演的角色。在当时通过他们对于信息的掌握，引导了早期工业化劳工阶级这一群文盲大众的教育。

环境主义不只是一种意识觉醒运动而已，从一开始它的目标就是要改变立法与管制。事实上环境组织的核心也将力气用在立法的游说上，据此来对于政治人物的立场加以支持或反对。甚至非传统的行动取向的组织如绿色和平，已经逐渐将他们的焦点转移到对政府以及国际组织施压，来确保对于特定议题的立法、决策以及决策的执行。同样的，在地方以及区域的层级，环境主义者已经为了公众的健康措施，以及管制过度的发展而进行提倡新型态的城市及区域规划的行动。是这种务实主义以及议题取向的态度使环境主义不同于传统的政治。人们觉得他们此时此地就能够改变事物，不需要空想或等待，而且也不存在手段及目标的区别。

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环境主义者已经进入了政治竞争，他们竞选公职并取得了或多或少的胜利。<sup>①</sup> 证据显示绿色

---

<sup>①</sup> 波固基（Poguntke, 1993）；达顿（Dalton, 1994）；戴安尼（Diani, 1995）；理查森及鲁兹（Richardson and Rootes, 1995）。

政党在地方层有较好的表现，因为在这里运动以及政治的代表性之间有比较紧密的连结，在跨国的层级中他们也有相对良好的表现。举例来说，在欧洲，议会因为是一个只具有象征权力的机构，市民会觉得在不会失去什么对于决策的影响力的状况下，能够有代表来表达环境主义的原则是一件好事。在全国政治的层次，政治学者已经指出绿色政党的机会最主要是决定于建立政治竞争机会的特定的制度性结构，而不是人们对于环境主义的信念。<sup>①</sup> 简言之，环境主义的议题以及/或是抗议的选票若是与主流政党的距离越接近，绿色政党的机会也就越低；而不带有获得公职的象征性选票的机会越大，绿色候选人的表现也越好。事实上，德国似乎是个例外，而不符合我上面所说的绿色政治发展的规律。整体来说，有一个主流政治普遍迈向绿化的潮流，虽然这种绿是带有黯淡的绿色，它对环境运动的自主性所寄予的支持也是这样。

对于这个运动本身来说，它与政治的关系逐渐与游说相结合，目标设定为支持或反对候选人的造势活动，以及通过议题取向的动员来影响选民。通过这些多样化的战术，在许多国家中环境主义已经变成候选人不容忽视的主要的公众意见的力量。另一方面，大部分环境组织已经变成建制性的，这是说他们承认在既有体制的架构内行动的需要、生产主义的规律，以及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于是，与大公司的合作变成规则而不是例外。公司通常以资金支持各项的环境主义的行动，而且也极度地注意到绿化自我的形象，甚至现在环境的主题已经成为企业广告的标准形象。但这也不完全是一种操控。全球的企业已经受到环境主义的影响，并且尝试将生产过程以及产品调整为符合新法令、新品味以及新的价值，当然同时也试着从中获利。然而，因为在我们的经济中，实际的生产单位不再是单一的企业，而是由不同单位所组

<sup>①</sup> 理查森及鲁兹 (Richardson and Rootes, 1995)。



成的跨国生产网络（参考第一卷第三章），对于环境的破坏已经分散为小企业以及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而这也调整了近年来环境行动的地理学及地形学。

总体来说，有着环境意识、影响力、组织化的高度发展，运动在其社会性以及主题方面已经越来越多样化，它不仅影响了企业的董事会也连结上反文化的小巷，更进入市政府及国会。在这些过程中，主题或许会被扭曲，或者在一些案例中还被加以操控。然而这是任何主要的社会运动都会出现的状况。环境主义事实上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社会运动，因为它在整体的环境正义的旗帜下，碰触了多样化的社会诉求。

#### 第四节 环境正义：生态主义者的最新战线

---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环境主义就已经不再只是关心赏鸟、拯救雨林以及洁净空气等这些主题。关于反对倾倒有毒废弃物的活动、主张消费者权利、反对核能的抗议、和平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其他许多的主题已经随着捍卫自然而出现，而将运动植基于权利及主张的政治背景中。甚至反文化的潮流如新时代（New Age）冥想及新异教派也混合了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的环境运动的其他成分。

在90年代，当一些主要的议题如和平以及反核抗议，部分由于抗议的成功、部分由于冷战结束而退却成为背景时，各种社会议题变成为越来越多样化的运动的一部分。<sup>①</sup> 贫穷社区以及弱

---

<sup>①</sup> 高地林白（Gottlieb, 1993: 207-320）；史赛思（Szasz, 1994）；艾普斯丹（Epstein, 1995）；布鲁尔（Brulle, 1996）。

势族群已经动员起来反对成为环境歧视下的标的物。他们要比一般人口较容易遭受到有毒物质、污染、健康危害以及生活区域恶化的威胁。而工人则对职业伤害的来源进行反叛，不管这些伤害是旧的还是新的形态、是因为化学中毒还是计算机所引起的压力。女人的组织则显示了：或多或少作为每日家庭生活的管理者，她们是污染的结果、恶化的公共设施以及未加控制的发展的最直接受害者。无家可归是都市生活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且在全世界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贫穷是环境质量降低的主要原因，无论是燃烧森林、污染河流、湖泊及海洋，还是严重的传染病。事实上，在许多工业化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工业化国家，环境组织十分兴盛，而且已经连结上人权组织、女性团体、非政府组织等，形成在体制之外但却非无视于体制的有力联盟。<sup>①</sup>

因此，环境正义作为一个反对财富、权力及科技的利益，而肯定所有形式的生命的使用价值这样一个涵括了全部的概念，当环境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之际，逐渐吸引了人心并影响了政策。

从第一眼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投机主义的策略。既然有了环境主义已经有了成功及合法性的标签，却较少将大众的诉求以意识形态加以包装来赢取支持及吸引力。而且事实上也有一些保守的环境运动的自然组织越来越提防过度涵括了广泛的议题会使运动的焦点模糊。毕竟工会从工业化的起始便已经为职业健康及立法而战斗。而贫穷则是，或者说过去就是一个有关于自身权利的问题，而不需要把自己罪恶般的黑暗涂上绿色。然而，环境主义中所发生的远远超过战术问题。对于生命、经济以及社会制度的生态取向强调事物所有的形式以及所有的信息处理的整体的特征。因此，我们知道的越多，也就越了解科技的可能性。而我们

<sup>①</sup> 阿西纳苏 (Athanasiou, 1996); 波札及卡斯特 (Borja and Castells, 1996)。





也会更清楚在提高生产能量，与我们旧有的、无意识到的以及最终将会解构的社会组织这两者之间有着危险的鸿沟。而这正是将围绕着环境运动以及周边的客观线索，在全球的与本土的、防御的与攻击的、议题取向及价值取向等各社会反叛行动间，编织起了它们日益紧密的连结关系。然而这并不是说一个新的由具有良善美意又慷慨的跨国群体已经浮现了。就像是这一本书所显现的，阶级、性别、种族、宗教以及地域等新旧裂缝，都对界定及细分议题、冲突以及方案产生了作用。这说明了在本土运动以及为了环境正义的象征取向的动员这两者已具雏形的连结标志着另类计划的产生。这个计划暗示着我们放弃已经耗尽能量的社会运动，而以贴近当今历史的形式，重新接续在支配与抵抗、真实政治与乌托邦以及犬儒及希望之间的旧有对话。

## 第四章 父权制度的终结： 信息时代的社会运动、 家庭与性

若那些曾向我求援的，  
所有圣洁的无辜者，  
跛行者与衰弱的妻子，  
被囚禁与自杀的人们——  
每位都给我一枚小额硬币，  
我就会变得富可敌国。  
但他们却只与我分享他们的勇气，  
因而，我成为世界最强的勇者，  
可以承受一切，  
包括这样的情境。

——安娜·阿赫玛托娃 (Anna Akhmatova), 《诗选》<sup>①</sup>

父权制度 (patriarchalism) 是所有当代社会中的基础结构，其特征是在家庭单位中制度性地强化男性对女性与孩童的权威。为了实践权威，父权制度必须渗入社会的整体组织，从生产、消

---

<sup>①</sup> 阿赫玛托娃 (Akhmatova, 1985: 84)。



费到政治、法律与文化。同时，源自父权制度与文化的支配性和暴力也在个人人格与人际关系中留下痕迹。然而，无论是分析或考量政治，我们都不可忘记：存在于家庭结构以及人类的社会生物性再生产（social - biological reproduction）的父权根源，其实是历史地（文化地）架构的。失去父权家庭，父权制度便会暴露其纯然的支配性；而在历史中被迫屈从的女人终究会群起叛乱，进而将它击溃。

父权家庭，此一父权制度的基石，正面临千禧年末妇女工作改变以及妇女意识改变这两个相关过程的挑战。这些改变过程背后的驱力，是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的三个发展趋势：它们是信息与全球经济的兴起、人类生殖科技的变革、妇女斗争与多面向的妇女运动的发展。妇女大量从事受薪劳动增加了与男人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动摇了男人作为家庭生计供给者其支配的正当性。但出外工作、家事、照顾小孩以及夜班（伺候丈夫）的四种工作，也增加了妇女生活的沉重负担。虽然早年的避孕技术、晚近的人工受精与基因工程技术，均使妇女与社会更可以控制养育小孩的时间与频率，但是妇女在千禧年之前就已经展开了她们的战斗。妇女的斗争是人类整体经验中极其独特的一部分，虽然它们以分歧的形式出现，并且常为史书史料所遗漏。<sup>①</sup>我曾指出，<sup>②</sup>许多都市斗争（包括历史的以及当代的），都是处理日常生活需求和管理的妇女运动。这种女性主义如同美国的妇女参政运动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然而，直到近25年，我们才亲眼目睹女性对抗压迫的世界性的抗暴运动。虽然这场抗争随着不同的国家与文化而有不同的强度，但都深深影响了社会制度，并且更根本地影响了妇女意识。在先进工业国，绝大多数的妇女认为她们和男性是平等的：妇女不仅有公民权，更有掌控自己身体与生命的权

① 罗玻南（Rowbotham, 1974）。

② 卡斯特（Castells, 1983）。

力。当这样的意识迅速扩及全球时，便是重大的革命，因为它触及了社会的根源，以及关于“我们是谁”这样的核心问题。<sup>①</sup>而这场革命也是不可逆转的，但这并非意味着妇女受到的歧视、压迫、受虐或妇女与孩童的各种问题都已经减轻或消失。事实上，虽然法律的歧视已经被禁止，劳动市场上也因妇女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出现较平等的趋势，但是男性个人与集体地失去权力的怒气，却使个人层次的暴力和精神虐待较以往更为普遍。这绝非柔弱的革命：妇女的解放斗争与男性保卫自身特权的战争，在人类场景中留下遍地尸骸，如同真实的革命。尖锐的冲突之外，30年来妇女意识与多数社会中社会价值的转变，也非常惊人。而这些转变对于整体的人类经验，从政治权力到人格结构，都具有显著的影响。

总结和浓缩这个转变的过程，我认为关键是父权家庭的解体。当父权家庭崩溃，整个父权制度的系统以及人类整体的生活，将逐渐地但肯定地被转化。这是惊人的远景，而且并非只是针对男性。而这正说明了为什么对父权制度的挑战，是导致恢复父权秩序的基本教义运动和其他在本书前面章节中讲述的运动的的关键的要素之一。他们的反挫有可能扭转目前文化变迁的过程，因为没有任何历史是注定的。然而，目前许多指标正指向传统父权家庭形式的衰退。我的分析将始于点出这些指标。这些指标本身并不能说出父权制度的危机的故事。但当一些改变是如此普遍地反映在国家的以及国际的统计资料的时候，我们似可较放心地假设这些变迁的深度和速度。

然后，我们也应说明这些转变发生的时机。为什么是现在？女性主义观念，虽然有其历史的转译过程，至今已经出现了至少一个世纪了，但是为什么到最近才引爆成运动？我假设其原因是四个元素的组合。第一，是与妇女教育机会的增加紧密联系的

<sup>①</sup> 米榭 (Mitchell, 1966)。

经济和劳动市场的转化。<sup>①</sup> 我将提出一些资料说明这个转化，并将之与信息、全球经济以及我在第一卷提出过的网络企业（network enterprise）联系起来；第二，是在生物学和药学上的技术转化。这些技术增加了对生育小孩以及对人类物种再生产的控制能力（如我在第一卷第七章的论证）；第三，相对于经济和技术转化的背景，父权制度已被在 60 年代社会运动后兴起的妇女运动所冲击。这不是说女性主义是独立于那些社会运动外发展的。事实上，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女性主义的发展始于那些曾参加社会运动的女性对她们在运动中承受的性别歧视甚至侵害的反抗（见下文）。社会运动形成的脉络，对“个人议题即政治议题”强调，以及多面向的主题，使女性主义可从男性主导的社会运动（如工运、革命政治）的工具性路线解放，从而迈向较为实验性的取向——在尚未被理性的论述驯服之前，强调真实的、反抗压迫的感觉；第四个导致对父权的挑战的元素是思想在全球文化的快速扩散。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中，人和经验不断地穿梭、融合，快速地将全球各地妇女的声音编织成一张超时空的百纳被（hyperquilt）。因此，在概括说明妇女工作的转化之后，我将分析此高度多样化的妇女运动的形成，以及在建构/重构女性认同之集体经验中萌生的辩论。

社会运动，尤其女性主义对性别关系的冲击，催动了一个强有力的浪潮：去质疑作为一种规范的异性恋。对于将男性支配视为女人困境之源的女同性恋者而言，脱离作为压迫主体的男人，如果不是惟一那么至少也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对于男同性恋者而言，对传统家庭以及男女之间冲突关系的质疑，提供了开展其他形式的人际关系的可能性，包括新的家庭形式、同性恋家庭。对于所有人而言，没有了制度性的限制，性解放是自我表现的新领域。但并非如恐同性恋者刻板印象中那种无

<sup>①</sup> 莎兹曼-恰弗兹（Saltzman - Chafetz, 1995）。

止境性的巡游，而是自我肯定，以及对性和爱的实验。同性恋运动对父权制度毫无疑问地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人和人之间的支配关系并未终止。支配，就如同剥削，总是在历史中不断更新。然而，自人类文明初始即已存在的父权制度（虽然卡洛琳·墨钦 Carolyn Merchant 有不同的说法），的确已在我们对异性恋体制的摧毁中动摇了。我将从旧金山和台北的经验说明同性恋运动的起源和发展，以强调这些运动中日益成长的文化和地理多样性。

最后，我将提出在我们的社会中个人人格因家庭结构和性规范的改变而转化的议题。我认为家庭构成了基本的社会机制，而性欲特质（sexuality）与人格是相关的。这就是结构变迁和社会运动的互动（即网络社会和认同的力量的互动）如何转变了我们的所在。

## 第一节 父权家庭的危机

父权家庭的危机，指的是家庭模式的弱化，此种模式建基在家庭中成年男性户长对其他成员的威权和支配的行使。20世纪90年代，在大部分的社会，尤其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很容易发现父权家庭正在衰微的指标。使用粗略的统计指标并不能清楚地显示父权制度其政治的、文化的和心理学的特质。然而，因为人口的行为和结构的演化通常非常缓慢，在国际统计资料的比较中观察到的影响父权家庭结构和动力的大趋势，对我而言，仍是我所论证的前阶段稳定的父权制度模式已发生危机这个变迁的有力象征。在进行统计检视前，我将论点摘要如下：

因离婚或分居造成的已婚夫妇家庭的解体，是叛离依赖长期家庭成员之间承诺的家庭模型的第一个指标。父权制度仍可能由



不同的搭档再生产相同的家庭模型而继续延续下去（事实上这是常态）。然而，支配的结构（和信任的机制）已被经验所摧毁，特别是对身陷于矛盾性的忠实之间的女人和小孩来说，更是如此。甚而，已婚家庭解体频率的增加，导致了单身户和/或单亲户的形成，以终止家庭内的父权威权——即使支配的结构在精神层次上仍在新的家户中再生产。

其次，婚姻危机频率的增加，以及建立兼容的婚姻、工作和生活的困难度，与另外两个有力的趋势相关：晚婚和建立没有婚姻的伴侣关系。在此，法律约束的缺乏再次在制度上及心理上弱化了父权威权。

第三，以上的趋势，加上人口学的因素——如人口老化、死亡率的性别差异等，导致越来越多样的家户结构的萌生，使传统核心家庭模式（初次结婚的夫妇及其子女）的普遍性减低，并破坏了此模式的社会再生产。单身家庭和单亲家庭激增。

第四，在家庭不稳定以及妇女拥有对生育行为更多自主性的情况下，父权家庭的危机延伸成为人口更替的社会模式的危机。<sup>①</sup> 越来越多的小孩为非婚生子女，且由其母亲照顾（虽然统计数字显示有部分未婚父母共同照顾子女）。因此，生物的再生产虽得以确保，但却发生在传统家庭结构之外。妇女因更高的自觉及更多的困境而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并推迟第一次生产的时间。而最终，在一些数量似乎正在扩大的小圈子中，女人为她们自己生小孩或领养小孩。

总之，这些互相强化的趋势，质疑了父权家庭的结构和价值。这未必是家庭的结束，因为其他种家庭组成正被实验着，并可能终将以更不同或更好的方法重构我们与他人的共同生活，以

---

<sup>①</sup> 1995年是欧盟在20世纪和平时期出生率最低的一年：出生人数仅比死亡人数多29万，德国与意大利的死亡人数甚至多于出生人数，而东欧人口下降也甚于以往，特别是苏联（《经济学人》，1996年11月19日）。

及教养子女的方式 (Stacey, 1990)。<sup>①</sup> 我所说的指向家庭终结的趋势, 并非仅指核心家庭 (此一现代产品), 而是指千年以来以父权支配为基础的家庭。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一些基本的统计资料。在此, 我要强调比较。但是因美国的发展过程较为先进, 所以我在此章后半部分保留了对美国父权家庭危机的系统性概括。<sup>②</sup> 虽然这些趋势在发达国家较为明显, 但是相同的变迁趋势也在世界多数社会中发生。我将引用一部分 1995 年由“人口会议” (Population Council) 所发表的关于全世界家庭变迁的报告,<sup>③</sup> 并佐以其他来源的资料。而基于本章已叙述过的理由, 焦点将放在 1970~1995 年这个时期。

表 4-1 显示, 许多国家的粗估离婚率显著上升 (只有埃及

表 4-1 1971~1990 年各国粗估离婚率的改变率

国家	1971	1990	1971~1990 年改变率	
			比率	%
加拿大	1.38	2.94	1.56	113
法国	0.93	1.86	0.93	100
意大利	0.32	0.48	0.16	50
日本	0.99	1.27	0.28	28
英国	1.41	2.88	1.47	104
美国	3.72	4.70	0.98	26
苏联	2.63	3.39	0.76	29

① 史黛西 (Stacey, 1990)。

② 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1970~1995, 1995); 莎柏林与泰芙 (Saboulin and Thave, 1993); 弗迪斯与葛玛里兹 (Valces and Gomariz, 1993); 赵及矢田 (Cho and Yada, 1994);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OECD, 1994b); 阿伯迪 (Alberdi, 1995); 布鲁斯等 (Bruce et al., 1995); 德弗斯 (De Vos, 1995); 梅生与杰生 (Mason and Jensen, 1995)。

③ 布鲁斯等 (Bruce et al., 1995)。



续表 4-1

国家	1971	1990	1971~1990 年改变率	
			比率	%
墨西哥	0.21	0.54	0.33	157
埃及	2.09	1.42	-0.67	-32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统计年报（1970~1995）

表 4-2 发达国家每百对婚姻中离婚率的变迁

国家	1970	1980	1990
加拿大	18.6	32.8	38.3
捷克斯洛伐克	21.8	26.6	32.0 <sup>a</sup>
丹麦	25.1	39.3	44.0
英国	16.2	39.3	41.7 <sup>a</sup>
法国	12.0	22.2	31.5 <sup>a</sup>
希腊	5.0	10.0	12.0
匈牙利	25.0	29.4	31.0
意大利	5.0	3.2	8.0
荷兰	11.0	25.7	28.1
瑞典	23.4	42.2	44.1
美国	42.3	58.9	54.8 <sup>b</sup>
(前) 西德	12.2	22.7	29.2

注：统计数字来自综合计算每年特别时期的离婚率（原始资料误认为是每 1000 对婚姻中的离婚率）。

a. 1989

b. 1985

资料来源：Monnier, Alian and de Guibert - Lantoin, Catherine (1993) "La conjoncture démographique: l'Europe et les pays Développés d'outre-mer", *population* 48 (4): 1043~1067

由 Bruce 等人整理分析 (1995)

例外): 1971~1990年英、法、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粗估离婚率都增加了一倍以上。美国(26%)和前苏联(29%)在此期间增加率较低,这是因为1971年它们就已经达到粗估离婚率的高峰。有趣的是,我选来作为比较用的回教国家(埃及),粗估离婚率是下降的(或许反映了社会回教化的趋势),但其1990年的粗估离婚率仍高于意大利、墨西哥和日本。

表4-2显示某些高度工业化国家中每100件婚姻的离婚率。各个国家离婚的程度虽有所差异,但一般而言,在1970~1980年,以及1980~1990年这两个时期呈现上升的趋势。在此美国又是一个例外,或许部分原因是在1990年已有将近55%的婚姻以离婚告终。分居和同居的结束并未出现在这些统计中。然而,我们从研究中了解到:同居状态的结束比婚姻的离异更为容易,<sup>①</sup>而分居和离婚率是相关的,因而增加了家户终结的整体数量。<sup>②</sup>由全球规模的关于离婚模式的调查发现,有小孩的夫妇的离婚率正在增加,因而婚姻的解散导致的是单亲亲子关系的出现。<sup>③</sup>图4-1表现出在意大利、西德和瑞典,年轻的妇女比年长的妇女有较低的婚姻维持率。<sup>④</sup>这个趋势并不限于工业先进国家。表4-3是发展中国家40~49岁妇女因各种因素结束初次婚姻的比例。除了突尼斯的比例较低以外,其他国家的比例多在22.8%~49.5%之间,最高的是加纳,达到60.8%。

① 布鲁斯等(Bruce et al., 1995)。

② 阿伯迪(Alberdi, 1995)。

③ 古迪(Goode, 1993)。

④ 柏斯菲德(Bolssfeld, 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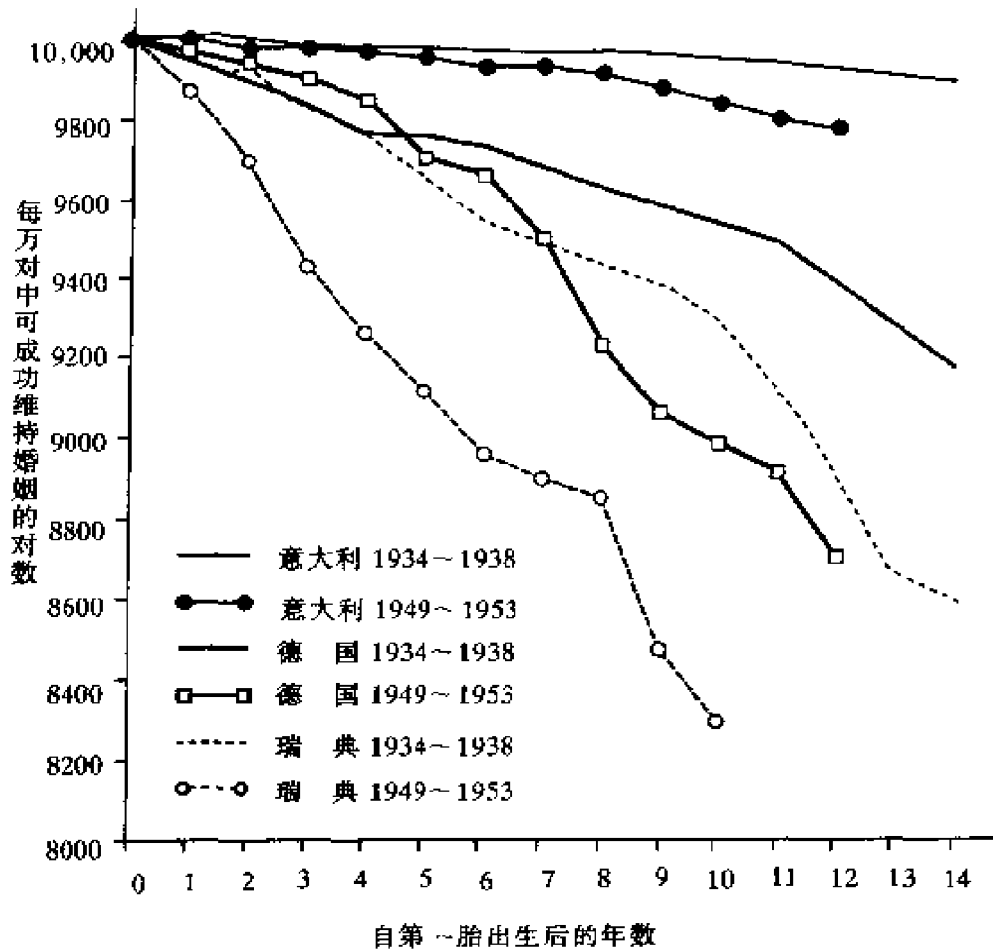


图 4-1 意大利、西德和瑞典于 1934~1938 年和 1949~1953 年出生的妇女婚姻维系率

资料来源: Blossfeld 等(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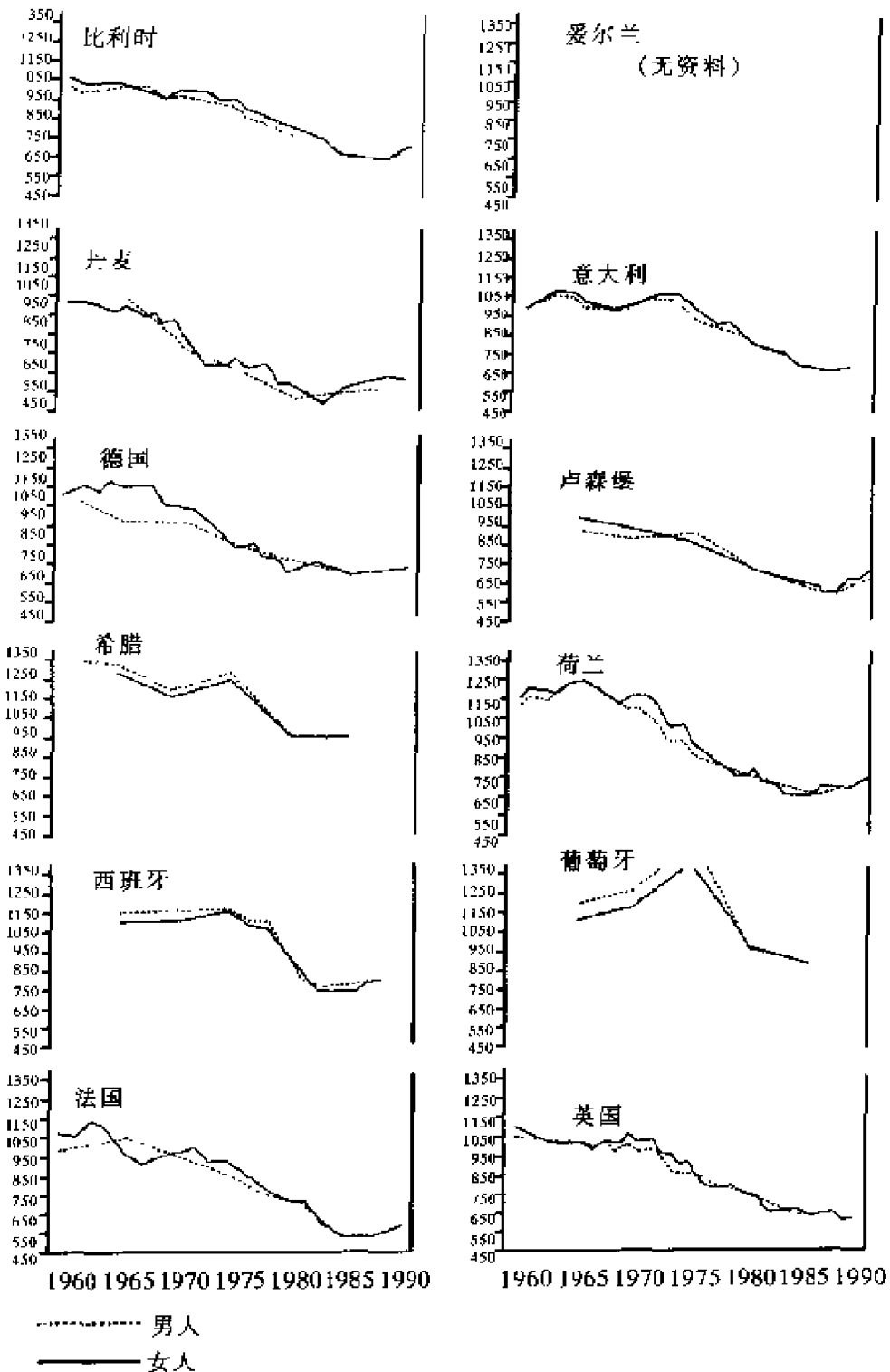


图 4-2 1960 年以来欧盟各国初婚状况的变化  
资料来源：A'berd(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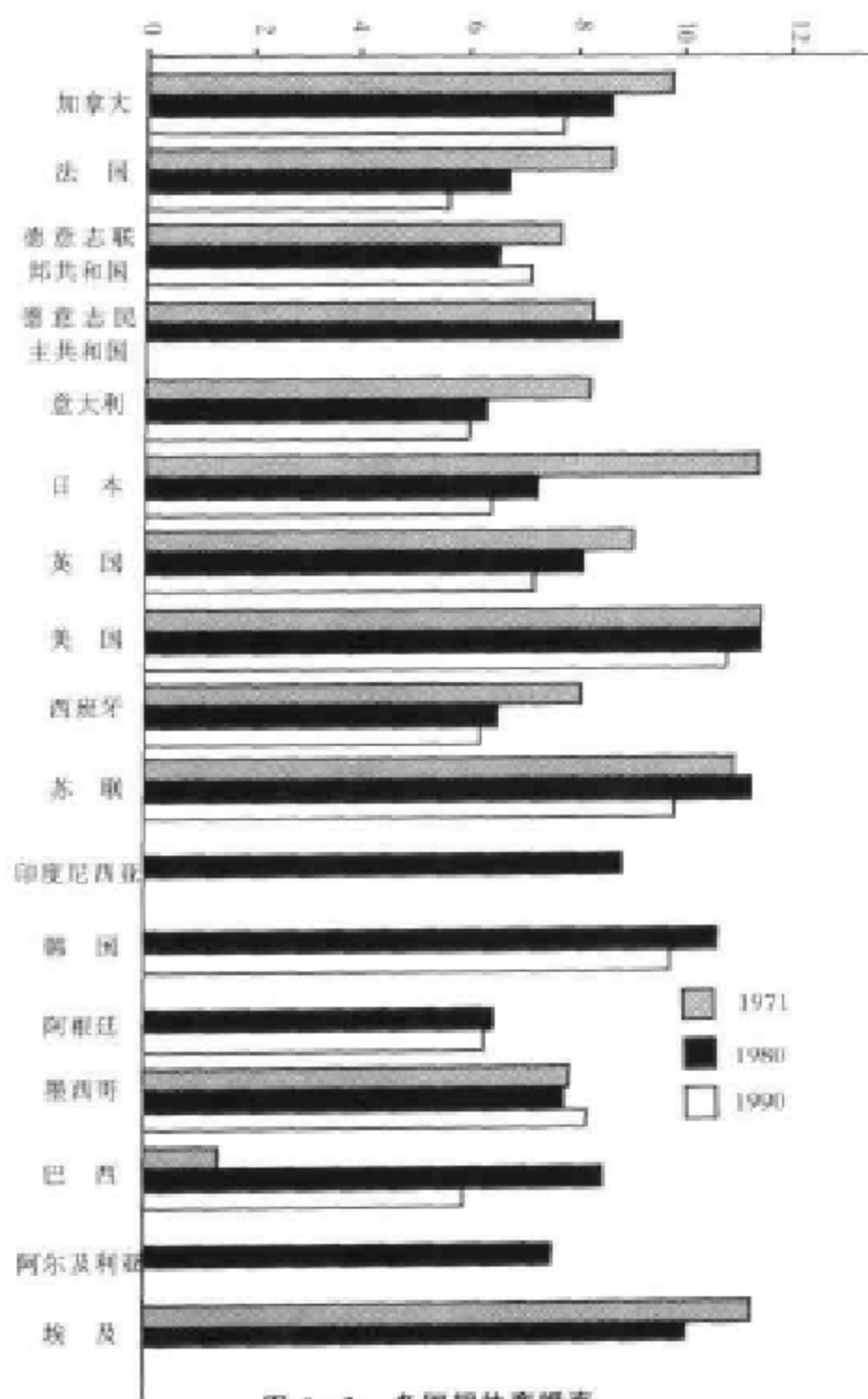


图 4-3 各国相估离婚率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统计年报(1970-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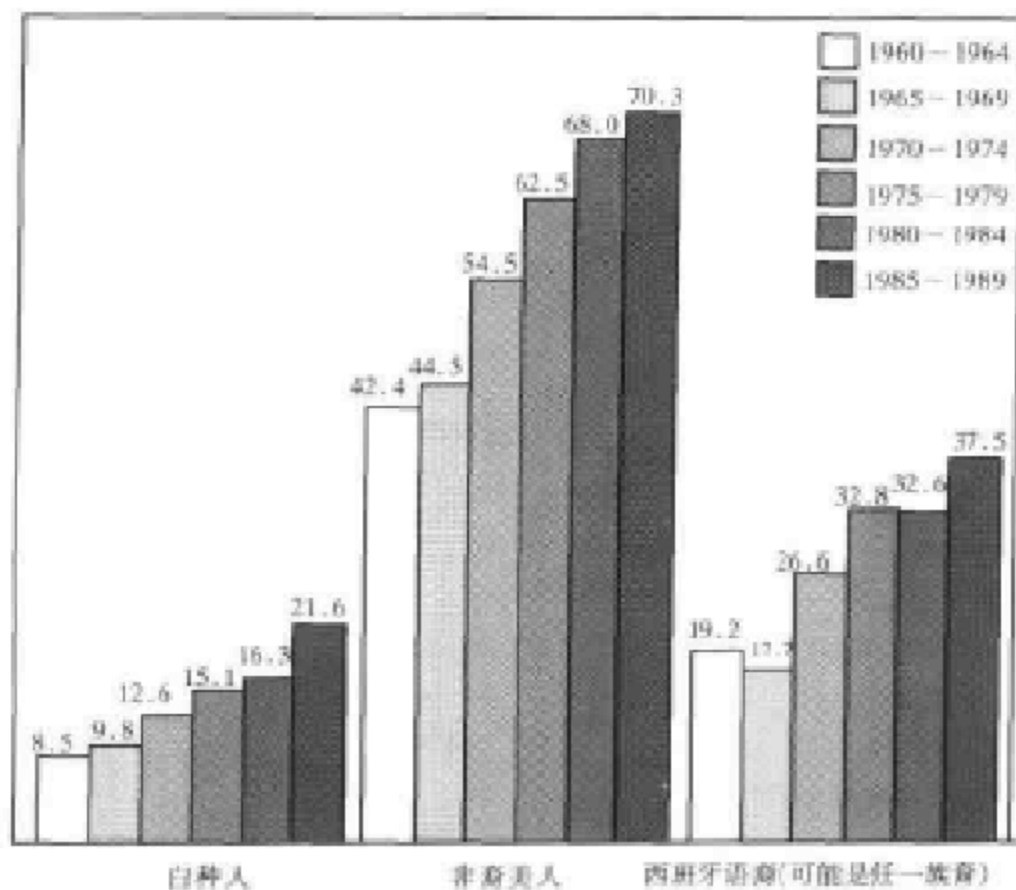


图 4-4 美国 1960~1989 年在第一次婚姻前便已生下第一个孩子的比率(依种族、族群分类)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调查局(1992a)。

表 4-3 发展中国家 40~49 岁妇女第一次婚姻  
因为分居、离婚、死亡而结束的比率

地域/国家	日期	比率%
亚洲		
印度尼西亚	1987	37.3
斯里兰卡	1987	25.6
泰国	1987	24.8
拉丁美洲/中美洲		
哥伦比亚	1986	32.5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86	49.5
厄瓜多尔	1987	28.9
墨西哥	1987	25.5
秘鲁	1986	26.1
中东/北非		
埃及	1989	22.8
摩洛哥	1987	31.2
突尼斯	1988	11.1
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		
加纳	1988	60.8
肯尼亚	1989	24.2
塞内加尔	1986	42.3
苏丹	1989/1990	28.2

资料来源：联合国（1987），发展脉络下的生育行为：世界生育调查（表 47）  
（New York: United Nations），表格内容则来自人口和健康调查，由  
Bruce 等人（1995）整理分析。

表 4-4 20~24 岁尚未结婚的女性人数百分比

地域/国家	前期	比率%	后期	比率%
发展中国家				
亚洲				
印尼	1976	20	1987	36
巴基斯坦	1975	22	1990/1991	39

续表 4-4

地域/国家	前期	比率%	后期	比率%
斯里兰卡	1975	61	1987	58
泰国	1975	42	1987	48
拉丁美洲/中美洲				
哥伦比亚	1976	44	1986	39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75	27	1986	39
厄瓜多尔	1979	43	1987	41
墨西哥	1976	34	1987	42
秘鲁	1978	49	1986	56
中东/北非				
埃及	1980	36	1989	40
摩洛哥	1980	36	1987	56
突尼斯	1978	57	1988	64
非洲撒哈拉以南				
加纳	1980	15	1988	23
肯尼亚	1978	21	1989	32
塞内加尔	1978	14	1986	23
发达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	1970	35	1980	33
奥地利	1971	45	1980	57
法国	1970	46	1980	52
西班牙	1970	68	1981	59
美国	1970	36	1980	51

资料来源：联合国（1987）开发中国家：发展脉络下的生育行为（表43）；世界生育调查。

表 4-5 各地区非婚生子女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率（各国平均率）

地域/国家（国家的数目）	1970	1980	1990
发达国家			
加拿大	n.a.	13.2	21.1*
东欧（6）	7.1	9.0	12.9
北欧（6）	8.8	19.5	33.3
南欧（5）	4.1	5.4	8.7
西欧（6）	5.6	8.3	16.3



续表 4-5

地域/国家 (国家的数目)	1970	1980	1990
日本	1.0 <sup>b</sup>	1.0 <sup>e</sup>	1.0 <sup>d</sup>
大洋洲 (2)	9.0 <sup>b</sup>	13.4 <sup>c</sup>	20.2 <sup>e</sup>
美国	5.4 <sup>b</sup>	14.2 <sup>c</sup>	28.0
(前) 苏联 (14)	8.2	8.8	11.2
开发中的国家			
非洲 (12)	n.a.	4.8 <sup>f</sup>	n.a.
亚洲 (13)	n.a.	0.9 <sup>f</sup>	n.a.
拉丁美洲 (13)	n.a.	6.5 <sup>f</sup>	n.a.

n.a. = 没有资料

a. 1989

c. 1975

e. 1985

b. 1965

d. 1988

f. 1975-1980 (平均)

资料来源：东欧、北欧、南欧、西欧、前苏联以及加拿大：欧洲会议（1993），《欧洲及北美最近的人口发展》，1992（史特拉堡：欧洲议会出版社）；美国、大洋洲及日本：美国（1992）“在育率低中的生育环境”（纽约：联合国）以及美国健康之人类服务局（1993）“每月重要统计报告”42（3）补充；发展中国家：美国（1987）“发展中国家的生育行为”（纽约：联合国），由 Bruce 等人（1995）所编算及推算。

20 世纪 90 年代的欧洲，离婚与结婚的比例已呈稳定状态，但这主要归因于 60 年代后结婚比例的下降。因此，整体而言，双亲已婚的家户（dual parent married households）数量和比例都显著地减少了<sup>①</sup>。图 4-2 是欧盟国家中初次结婚比例的下降趋势，图 4-3 则是世界各地原始的结婚率的演变情形。除了墨西哥与德国，近 20 年来大部分国家的原始的结婚率都在下降，尤其是日本，其粗估结婚率更是下降得厉害。

年轻妇女结婚年龄的推迟也是近乎全球化的现象。表 4-4

<sup>①</sup> 阿伯迪（Alberdi, 1995）。

是 20~24 岁未婚妇女的比例，但由于统计资料日期互异，因此很难作跨国比较。70 年代后，20~24 岁的妇女已婚比例都在下降，加纳和塞内加尔甚至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年轻妇女未婚，但西班牙与斯里兰卡例外。普遍而言，15 岁以上妇女的已婚比例，从 1970 年的 61% 下降至 1985 年的 56%。<sup>①</sup>

发达国家则有越来越多的非婚生子女（表 4-5），而这也是父权家庭危机的最重要现象之一：在美国，非婚生子女占总出生率的比例，从 1970 年的 5.4% 跳到了 1990 年的 28%。这个现象有种族差异：对 15~34 岁的非裔妇女而言，非婚生子女的比例达到 70.3%（图 4-4）。20 世纪 90 年代，北欧国家的非婚生子女在所有生育子女的行为中占了近一半的比例。<sup>②</sup>

表 4-6 发达国家中单亲家庭占全部家庭的比例趋势，统计对象的定义为未成年儿童和至少一位家长具有公民身份

国家	70 年代早期	80 年代早期
澳大利亚	9.2	14.9
法国	9.5	10.2
日本	3.6	4.1
瑞典	15.0	17.0
英国	8.0	14.3
美国	13.0	23.9
(前) 苏联	10.0	20.0
(前) 西德	8.0	11.4

注：单亲家庭是有未成年儿童和一位父、母亲的家户

资料来源：Burns, Ailsa (1992) 以母亲为家长的家庭：一个国际的观点以及澳洲的例子，社会政策报告 6 (1)，由 Bruce 等 (1995) 所编纂及推算。

① 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1991)。

② 阿伯迪 (Alberdi, 1995)；布鲁斯等 (Bruce et al, 1995)。

表 4-7 由妇女当户主的家庭比例趋势

地域/国家	前期日期	%	后期日期	%
人口统计调查资料				
亚洲				
印度尼西亚	1976	15.5	1987	13.6
斯里兰卡	1975	15.7	1987	17.8
泰国	1975	12.5	1987	20.8
拉丁美洲				
哥伦比亚	1976	17.5	1986	18.4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75	20.7	1986	25.7
厄瓜多尔	1979	15.0	1987	14.6
墨西哥	1976	13.5	1987	13.3
秘鲁	1977/1978	14.7	1986	19.5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977	22.6	1987	28.6
中东/北非				
摩洛哥	1979/1980	11.5	1987	17.3
非洲撒哈拉以南				
加纳	1960	22.0	1987	29.0
苏丹	1978/1979	16.7	1989/1990	12.6
亚洲				
中国香港	1971	23.5	1991	25.7
印度尼西亚	1971	16.3	1980	14.2
日本	1980	15.2	1990	17.0
韩国	1980	14.7	1990	15.7
菲律宾	1970	10.8	1990	11.3
拉丁美洲				
巴西	1980	14.4	1989	20.1
哥斯达黎加	1984	17.5	1992	20.0

续表 4-7

地域/国家	前期日期	%	后期日期	%
人口统计调查资料				
巴拿马	1980	21.5	1990	22.3
秘鲁	1981	22.1	1991	17.3
乌拉圭	1975	21.0	1985	23.0
委内瑞拉	1981	21.8	1990	21.3
非洲撒哈拉以南				
布基纳法索	1975	5.1	1985	9.7
喀麦隆	1976	13.8	1987	18.5
马利	1976	15.1	1987	14.0

注：de jure = “日常”家庭领导权。

a de facto = 访谈日的领导权。

资料来源：人口调查加纳的部分来自：Lloyd, Cynthia B 以及 Gage - Brandon Anastasia J. (1993), 《女人在维系家庭中的角色：加纳的福利及性别不平等》，收于《人口研究》47 (1) :115-131。

发达国家中，由于分居与单亲妈妈的未婚生子女，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造成单亲（通常是母亲）与未成年子女家庭比例的大幅上升（表4-6）；此上升趋势在美国一直持续至90年代（见下文）。若以单亲（母亲）家庭的统计为例，发展中国家也有相同趋势，表4-7便是70年代中至80年代中/后期间，女性户长家庭的上升趋势（除了少数例外，如印尼）。巴西的女性户长家庭甚至从1980年的14%增长为1989年的20%。

列丝吉（Lesthaeghe）综合家庭组成的不同指标为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各个国家，绘制出表4-8。此表将传统家庭结构较顽强的南欧与北欧和北美的资料作对比，但即便如此，80年代中期的单亲家庭（除瑞士和爱尔兰外）仍占有所有家庭11%~32%的比例。

表 4-8 1975~1990 年部分西欧国家中家庭与家户组成近期变化的指标

地域与国家	20~24岁妇女同居的比率 (1985~1990年)(%)	婚外生育率(1988年)(%)	婚外生育率的升高 (1975~1988年)(%)	有未成年儿童的单亲家庭 (1985年)(%)
<b>斯堪的纳维亚半岛</b>				
冰岛	-	52	19	-
瑞典	44	52	19	32
丹麦	43	45	23	26
挪威	28	34	23	23
芬兰	26	19	9	15
<b>北欧</b>				
荷兰	23	11	8	19
英国	24	25	16	14
法国	24	26	18	10
西德	18	10	4	13
奥地利	-	23	8	15
瑞士	-	6	2	9
卢森堡	-	12	8	18
比利时	18	10	7	15
爱尔兰	4	13	8	7
<b>南欧</b>				
葡萄牙	7	14	7	-
西班牙	3	8	6	11
意大利	3	6	3	16
希腊	1	2	1	-
马耳他	-	2	1	-
塞浦路斯	-	1	0	-
<b>北美</b>				
美国	8	26	12	28
加拿大	15	21	14	26
<b>大洋洲</b>				
澳大利亚	6	19	7	15
新西兰	12	25	9	-

资料来源：《欧洲会议》(不同期数)；《欧洲价值研究》(1990)，Moors及Van Nimwegen(1990)；联合国(各年；1990)；个人与Larry Bumpass(联合国)、Peter McDonald与Lincoln Day(澳洲)、Thomas Bruch(加拿大)、Lan Pool(新西兰)等人的联系。由Lesthaeghe(1995)所编纂。

表 4-9 1990~1993 年样本国家单人家户与所有家户的百分比

国家	年份	全部家户 (每千户)	单人家户 (每千户)	%
德国	1993	36230	12379	34.2
比利时	1992	3969	1050	26.5
丹麦	1993	2324	820	35.3
法国	1992	22230	6230	28.0
希腊	1992	3567	692	19.4
英国	1992	23097	6219	26.9
爱尔兰	1991	1029	208	20.2
意大利	1992	19862	4305	21.7
卢森堡	1992	144	34	23.6
荷兰	1992	6206	1867	30.1
葡萄牙	1992	3186	399	12.5
西班牙	1992	11708	1396	11.9
估计数值				
芬兰	1993	2120	716	33.8
奥地利	1993	3058	852	27.9
瑞典	1990	3830	1515	39.6
美国	1993	96391	23642	24.5
日本	1993	41826	9320	22.3

a. 资料来源：小型人口普查，1993 年 4 月

b. 不包含 Faeroe 与格林兰

c. 资料来源：Statistisches Bundesamt (1995),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1995), Statistisches Jahrbuch 1995 fuer Aus Land (Wiesbaden; Metzner and Poeschel)

表 4-9 是 90 年代早期某些国家的单身家庭比例。仔细观察，可发现除南欧之外，单身家庭的比例都在 20%~39.6% 之间：英国 26.9%，美国 24.5%，日本 22.3%，法国 28.0%，而德国是 34.2%。很明显，这些家庭大多为年老的单身者所组成，因此人口老化也是此一现象的主因。然而，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单身户，却可以让我们质疑父权家庭生活方式的普遍性。附带一提，意大利与西班牙虽有顽强的父权家庭存活，但妇女拒绝生



育小孩是维持父权家庭的惨痛代价，使得这两个国家的出生率为全球最低，甚至低于人口更迭率（意大利 1.2，西班牙 1.3）。<sup>①</sup>此外，西班牙子女脱离家庭的年纪也居全欧之冠：女孩 27 岁，男孩 29 岁。青年普遍失业与住宅危机，虽然可以维系传统家庭，其代价却是较少新的家庭的产生以及再生产西班牙人。<sup>②</sup>

事实上这是父权家庭危机最明显的结果：在许多发达国家，生育率急速下降，低于人口更迭率（见图 4-5 欧洲国家的情形）。日本自 1975 年后生育率已低于人口更迭率，并于 1990 年下降至 1.54。<sup>③</sup>美国的生育率在这 30 年来剧烈下跌：从 50 年代末的历史高峰，70 年代与 80 年代低于人口更迭率，到 90 年代初相当于人口更迭率的 2.1 的稳定数据。生育率的回升其实是因为婴儿潮世代已届生育年龄（图 4-6）。表 4-10 便显示世界主要地区之生育率，以及到 90 年代中期的预估。整体而言，近 20 年来各个区域的生育率都在下跌，开发程度较高的国家跌至人口更迭率之下，然后维持该水平。但这未必是人口发展的铁律。安娜·卡伯利（Anna Cabre）<sup>④</sup>就指出了 80 年代北欧国家生育率的回升、优惠的社会政策以及社会容忍度较高三者之间的关联，这足以说明为何半数以上的小孩是在婚姻关系之外出生的。拥有物质与心理的充分支持，且不被社会歧视或惩罚，北欧妇女又开始生养小孩，而使她们国家在 80 年代的欧洲拥有最高的生育率。不过，情况也非如此美好：90 年代初期北欧福利国家削减社会福利，便使生育率趋于平稳，维持在人口更迭率的水平。<sup>⑤</sup>同时，某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生育率为移民人口推高，而诱发了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的发展。工业化国家中最重要的社会文化

① 阿伯迪（Alberdi, 1995）。

② 李尔（Leal, 1996）。

③ 津屋（Tsuya and Mason, 1995）。

④ 卡伯利（Cabre, 1990）；卡伯利与多明哥（Cabre and Domingo, 1992）。

⑤ 阿伯迪（Alberdi, 1995）。

差异，可能就是少数族裔移民社区竭力维护父权制度与主要族群（黑人和白人）传统家庭的瓦解。这个趋势不仅可以说明少数族裔移民改善其社经、教育条件后生育率的下降，同时也绝对是自我再生产。

表 4-10 世界各主要地区的总生育率

	1970~1975	1980~1985	1990~1995 <sup>a</sup>
世界	4.4	3.5	3.3
发达地区	2.2	2.0	1.9
发展中国家	5.4	4.1	3.6
非洲	6.5	6.3	6.0
亚洲	5.1	3.5	3.2
欧洲	2.2	1.9	1.7
美洲	3.6	3.1	-
拉丁美洲	-	-	3.1
北美洲	-	-	2.0
大洋洲	3.2	2.7	2.5
苏联	2.4	2.4	2.3

a. 1990~1995年推算结果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从1984年的计算加以推计；

联合国，《世纪交替中的人口》（1989）第9页；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世界人口的状况：选择与责任》（1994）

总体而言，日本与西班牙之外的发达国家中，父权家庭正成为人们生活的次要形式。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只有四分之一的家庭符合一对已婚夫妇加上小孩的理想型态（详见下文）。假如我们把“有婚姻关系的两人所生的小孩”视为必要条件，则比例又会下降。当然这些现象并非全与妇女解放有关，毕竟人口结构的改变也是重要的一环：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家庭是单身户，且多是老人，尤其是比丈夫活得长的老年妇女。然而，安东尼娜·皮内妮（Antonella Pinelli）在一项关于欧洲人口统计的研究中总结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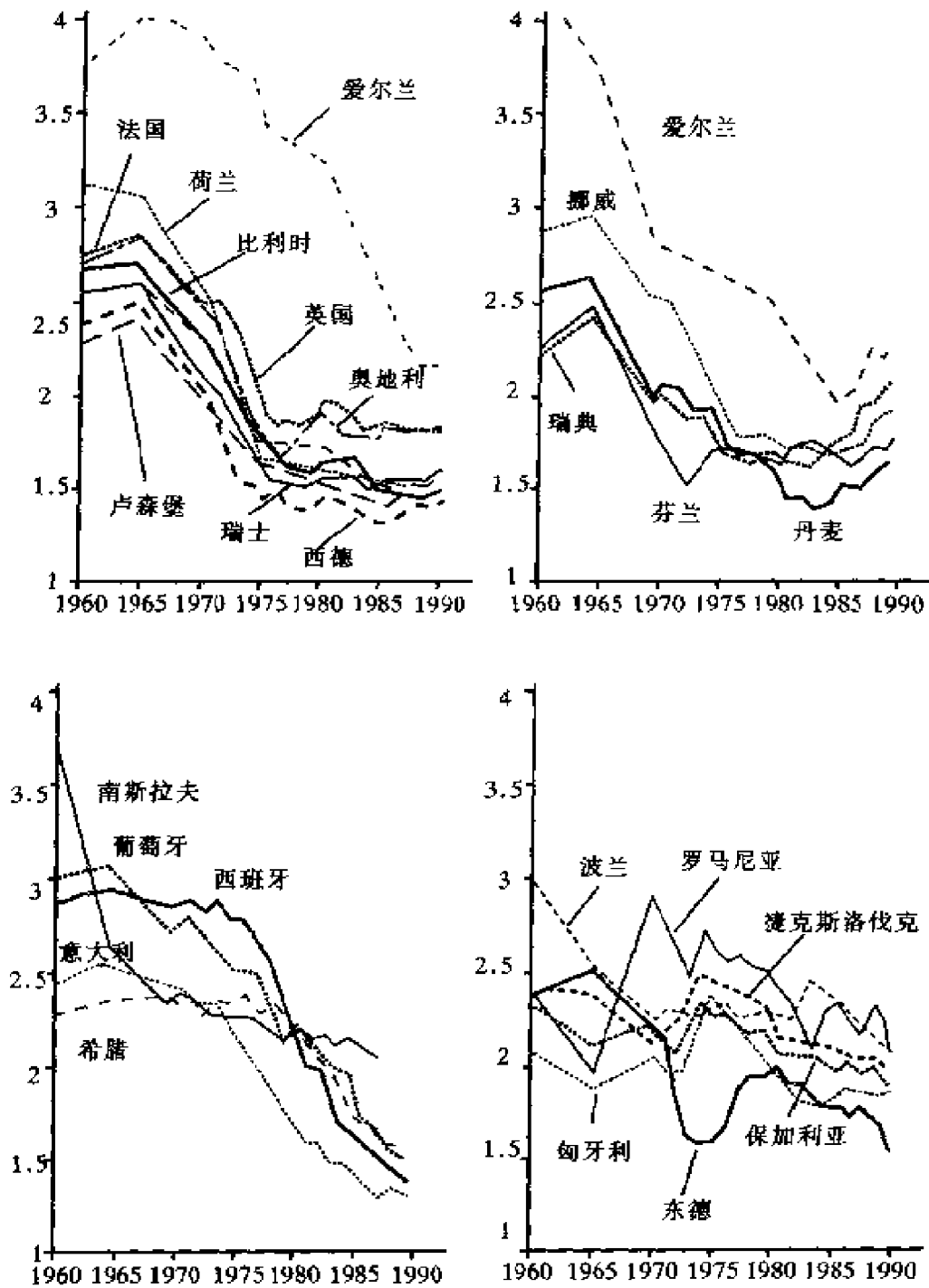


图 4-5 1960 年以来欧洲国家生育率综合指标

资料来源：阿伯迪 (Alberdi, 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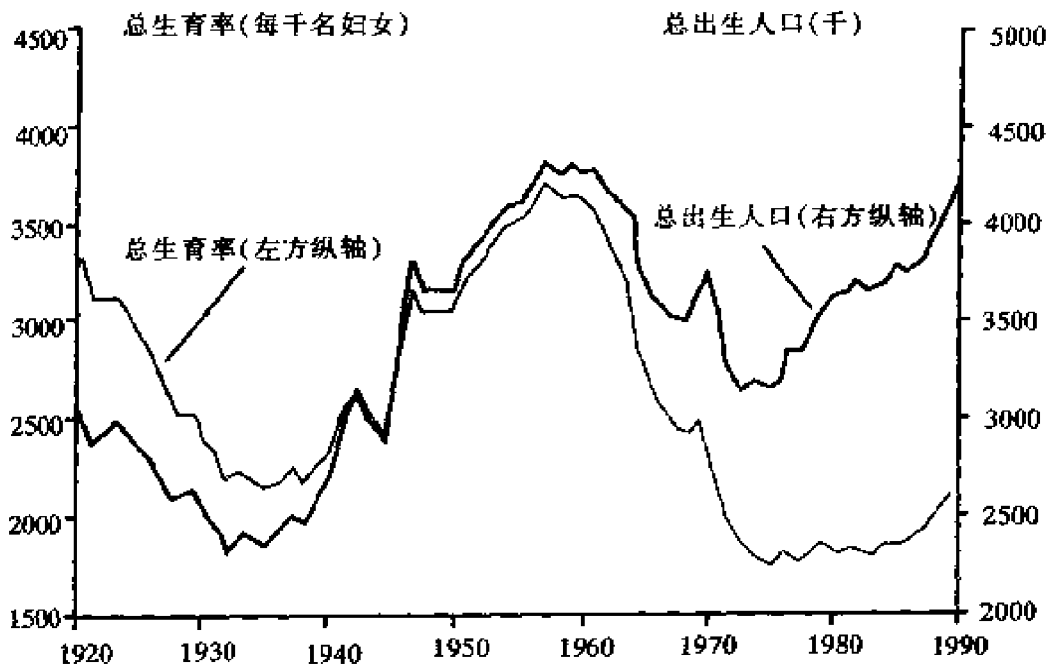


图 4-6 1920~1990 年美国的总生育率与总出生人口数  
(总生育率为每名妇女在停经前所生产的儿童数目,  
计算基准为每年各个年龄的生产比率)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1992a)。

高度颂扬非婚生活品质的地区正流行同居、非婚生子女与不稳定的婚姻，而这些地方的妇女不仅经济独立，而且也拥有较高的政治权力。我们应该强调妇女的处境：离婚、同居和非婚生子女流行的地方，就是妇女享有经济独立并且不因身为单亲妈妈而沦落至社会底层的地方。<sup>①</sup>

然而，我们应该稍微修正她的结论：美国的例子说明了她的论点只是半个故事。因为，美国的非婚生子女并不只是源于妇女的自我肯定，却更是贫穷与缺乏教育的结果。

<sup>①</sup> 皮内妮 (Pinelli, 1995: 88)。



无论如何，统计资料正显示的一般性趋势是：传统家庭形式中未经挑战的父权支配，妻和子女对丈夫和父亲的依从的关系，都在弱化或瓦解中。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也有相同的趋势，但全国性统计资料因为涵盖太多乡村地区的资料（尤其是非洲和亚洲）而掩盖了这个现象。虽然如此，我们仍能发现线索：譬如西班牙是由于青年失业与大都会区严重的住房短缺相互联系而阻碍了新家庭成立。<sup>①</sup> 虽然日本文化对非婚生子女不齿而巩固了父权家庭，但父权制度的意识形态与妇女从属次级劳动市场的概念，<sup>②</sup> 也逐渐受到挑战。我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维持父权结构，恐怕是与他们缺乏显著的妇女运动相关，但由于 90 年代妇女运动兴起，日本的独特性就可能被时间冲刷殆尽。不过，无论日本文化有多么特殊，工作的力量在社会结构与女性心中都够强大，使得日本也必须面对来自日本劳动妇女的对父权体制的挑战。<sup>③</sup>

我认为这个趋势将会蔓延全球，使我们的生活纹理经历痛苦的转型，并使传统家庭成为历史遗迹。但我们仍要回头分析这危机的根源，以及如何将危机转化为妇女、孩童、宠物甚至是男人的共同希望。

## 第二节 职业妇女

最近这 25 年，由于妇女大量从事受薪工作<sup>④</sup>，而深刻转化了家庭、工作与劳动市场，同时，大部分的工作都不是在家庭内

① 李尔 (Leal, 1996)。

② 津屋与梅生 (Tsuya and Mason, 1995)。

③ 盖柏与李芙-巴蕾 (Gelb and Lief-Palley, 1994)。

④ 康妮与盖尔 (Kahne and Giele, 1992)，梅生与杰生 (Mason and Jensen, 1995)。

的工作。1990年，全世界共有85400万妇女具有经济活动能力，这占了全球劳动人口的32.1%。15岁以上的妇女中有41%是具有经济活动能力的。<sup>①</sup>

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国家中，妇女参与劳动市场的平均比率由1973年的48.3%上升至1993年的61.6%，但同期男性参与劳动市场的比率则由88.2%下降至81.3%（参见表4-11）。在美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1973年至51.1%上升到1994年的70.5%。1973~1993年，妇女的雇佣率也有普遍上升的趋势（但在90年代，某些欧洲国家的妇女雇佣率却有下滑的趋势），相对于男性，这显然是正面的讯号（参见表4-12）。同时这也是全球皆然的趋势。依据联合国“经济活动比率”的统计类别（经济活动比率比起劳动参与率要更低些），我们可以看出，在表4-13与表4-14中，除苏联已在1970年达到了妇女经济活动的高峰之外，其余国家所展现的女性经济活动比率都有相同的上升趋势。

表4-11 性别区分的劳动参与率

单位：%

	男性					
	1973	1979	1983	1992	1993	1994*
澳大利亚	91.1	87.6	85.9	85.3	85.0	84.9
奥地利	83.0	81.6	82.2	80.7	80.8	..
比利时	83.2	79.3	76.8	72.6	..	..
加拿大	86.1	86.3	84.7	78.9	78.3	..
丹麦	89.6	89.6	87.6	88.0	86.0	..
芬兰	80.0	82.2	82.0	78.5	77.6	77.1
法国	85.2	82.6	78.4	74.7	74.5	..
德国	89.6	84.9	82.6	79.0	78.6	..
希腊	83.2	79.0	80.0	73.0	73.7	..

① 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1995)。

续表 4-11

	女性					
	1973	1979	1983	1992	1993	1994 <sup>a</sup>
爱尔兰 <sup>b</sup>	92.3	88.7	87.1	81.9	..	..
意大利	85.1	82.6	80.7	79.1	74.8	..
日本	90.1	89.2	89.0	89.7	80.2	90.1
卢森堡 <sup>b</sup>	93.1	88.9	85.1	77.7	..	..
荷兰	85.6	79.0	77.3	80.8	..	..
新西兰	89.2	87.3	84.7	83.0	83.3	..
挪威	86.5	89.2	87.2	82.6	82.0	82.3
葡萄牙 <sup>c</sup>	..	90.9	86.9	82.3	82.5	82.8
西班牙	92.9	83.1	80.2	75.1	74.5	73.9
瑞典	88.1	87.9	85.9	81.8	79.3	78.1
瑞士	100.0	94.6	93.5	93.7	92.5	91.0
英国	93.0	90.5	87.5	84.5	83.3	81.8
美国	86.2	85.7	84.6	85.3	84.9	85.4
北美	86.2	85.8	84.6	84.6	84.2	..
欧洲国家经济 合作暨开发组织 <sup>d</sup>	88.7	84.8	82.3	79.2	80.1	..
全部之经济合 作暨开发组织 <sup>d</sup>	88.2	85.9	84.3	82.9	81.3	..
	女性					
	1973	1979	1983	1992	1993	1994 <sup>a</sup>
澳大利亚	47.7	50.3	52.1	62.3	62.3	63.2
奥地利	48.5	49.1	49.7	58.0	58.9	..
比利时	41.3	46.3	48.7	54.1	..	..
加拿大	47.2	55.5	60.0	65.1	65.3	..
丹麦	61.9	69.9	74.2	79.0	78.3	..
芬兰	63.6	68.9	72.7	70.7	70.0	69.8
法国	50.1	54.2	54.3	58.8	59.0	..
德国	50.3	52.2	52.5	61.3	61.4	..
希腊	32.1	32.8	40.4	42.7	43.6	..
爱尔兰 <sup>b</sup>	34.1	35.2	37.8	39.9	..	..
意大利	33.7	38.7	40.3	46.5	43.3	..

续表 4-11

	女性					
	1973	1979	1983	1992	1993	1994 <sup>a</sup>
日本	54.0	54.7	57.2	62.0	61.8	61.8
卢森堡 <sup>b</sup>	35.9	39.8	41.7	44.8	..	..
荷兰	29.2	33.4	40.3	55.5	..	..
新西兰	39.2	45.0	45.7	63.2	63.2	..
挪威	50.6	61.7	65.5	70.9	70.8	71.3
葡萄牙 <sup>c</sup>	..	57.3	56.7	60.6	61.3	62.2
西班牙	33.4	32.6	33.2	42.0	42.8	43.9
瑞典	62.6	72.8	76.6	77.7	75.7	74.6
瑞士	54.1	53.0	55.2	58.5	57.9	56.9
英国	53.2	58.0	57.2	64.8	64.7	64.5
美国	51.1	58.9	61.8	69.0	69.0	70.5
北美	50.7	58.6	61.6	68.6	68.7	..
欧洲国家经济 合作暨开发组织 <sup>d</sup>	44.7	48.6	49.8	56.9	60.6	..
全部之经济合 作暨开发组织 <sup>d</sup>	48.3	53.1	55.1	61.9	61.6	..

a. 秘书处估计值 b. 爱尔兰与卢森堡以 1991 年的资料代替 1992 年的资料 c. 包括相当数量 15 岁以下的劳动力 d. 只包含以上国家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就业展望（1995）

表 4-12 性别区分的总雇用数（平均年增长率）

	男性					
	1973~1975	1975~1979	1979~1983	1983~1991	1992	1993
澳大利亚	-0.3	0.6	-0.1	1.5 <sup>a</sup>	-0.3	0.0
奥地利	-1.1	0.8	0.9	0.7	0.8	..
比利时	-0.4	-0.4	-1.8	0.0	-1.1	..
加拿大	1.9	1.8	-0.6	1.1	-1.2	1.2

续表 4-12

	男性					
	1973~1975	1975~1979	1979~1983	1983~1991	1992	1993
丹麦	-1.8	0.7 <sup>b</sup>	-1.7	0.9	..	..
芬兰	0.7	-0.6 <sup>b</sup>	0.9	-0.5	-7.6	-5.9
法国	-0.4	-0.2	-0.7	-0.1	-1.2	..
德国	-2.5	0.3	-0.5	0.8 <sup>e</sup>	-0.3	..
希腊	-0.5	0.8	0.6	0.1	..	..
爱尔兰	-0.2	1.5	-1.4	-0.5	..	..
意大利	0.6	-0.1	0.0	0.1	-1.1	.. <sup>h</sup>
日本	0.5	0.7	0.8	1.1	1.1	0.6
卢森堡	1.0	-0.7	-0.7	2.3 <sup>f</sup>	..	..
荷兰	-1.5	0.3	-0.8	2.1	1.3	..
新西兰	2.1	0.2	-0.3	-1.0 <sup>d</sup>	0.4	..
挪威	0.9	1.1	-0.2	-0.4	-0.5	-0.5
葡萄牙	-1.3 <sup>a</sup>	0.3	0.4 <sup>c</sup>	1.0	.. <sup>g</sup>	-2.8
西班牙	-0.2	-1.7 <sup>b</sup>	-1.8	0.8	-3.2	-5.4
瑞典	1.0	-0.3	-0.6	0.1 <sup>e</sup>	-5.1	-7.9
瑞士	-2.8	-0.5	0.8	0.8	-2.1	-2.5
英国	-1.0	-0.2	-2.3	0.4	-3.3	-2.8
美国	-0.6	2.5	-0.3	1.3	0.3	1.3
北美	-0.4	2.4	-0.4	1.2	0.2	1.3
欧洲国家经济合作暨开发组织 <sup>i</sup>	-0.8	-0.2	-0.8	0.4	-2.0	..
全部之经济合作暨开发组织 <sup>i</sup>	-0.4	0.9	-0.3	0.9	-1.4	..
	女性					
	1973~1975	1975~1979	1979~1983	1983~1991	1992	1993
澳大利亚	2.0	1.7	2.0	3.9 <sup>d</sup>	0.6	0.8
奥地利	-1.2	1.0	0.8	2.1	3.3	..
比利时	0.8	0.9	0.2	2.0	0.5	..
加拿大	4.7	4.5	2.6	2.8	-0.4	1.1

续表 4-12

	女性					
	1973~1975	1975~1979	1979~1983	1983~1991	1992	1993
丹麦	-0.5	3.6 <sup>b</sup>	0.9	1.4	..	..
芬兰	2.0	-0.0 <sup>b</sup>	1.9	-0.1	-6.5	-6.3
法国	0.8	1.6	0.7	1.4	0.5	..
德国	-1.0	0.9	-0.0	2.0 <sup>c</sup>	1.7	..
希腊	1.6	1.1	4.1	0.7	..	..
爱尔兰	1.6	2.0	1.9	1.1	..	..
意大利	2.4	2.7	1.3	1.6	0.3	.. <sup>h</sup>
日本	-1.7	2.0	1.7	1.7	1.0	-0.3
卢森堡	4.6	1.5	1.8	3.3 <sup>f</sup>	..	..
荷兰	2.9	2.7	4.0	5.3	3.2	..
新西兰	5.2	2.7	0.8	1.3 <sup>d</sup>	0.6	..
挪威	2.9	4.4	1.8	1.40	-0.1	0.5
葡萄牙	-1.5 <sup>a</sup>	0.9	1.1 <sup>e</sup>	3.0	.. <sup>g</sup>	-1.2
西班牙	-1.5	-1.3 <sup>h</sup>	-1.7	3.0	0.3	-2.4
瑞典	4.2	2.0	1.3	0.9 <sup>e</sup>	-3.5	-6.2
瑞士	-1.9	0.6	2.0	1.6	-2.4	-2.5
英国	1.5	1.2	-1.0	2.3	-1.0	-1.3
美国	2.0	5.0	1.7	2.4	0.9	1.5
北美	2.2	4.9	1.8	2.4	0.8	1.5
欧洲国家经济合作暨开发组织 <sup>1</sup>	1.2	1.4	0.5	2.0	-0.3	..
全部之经济合作暨开发组织 <sup>1</sup>	1.0	2.8	1.2	2.2	-0.1	..

a. 只有 1973~1974 年的资料

b. 只有 1975~1976 年的资料

c. 只有 1982~1983 年的资料

d. 只有 1985~1986 年的资料

e. 只有 1986~1987 年的资料

f. 资料为 1983~1990 年

g. 只有 1991~1992 年的资料



h. 只有 1992-1993 年的资料

i. 仅包含上述国家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就业展望（1995）

表 4-13 1970~1990 年经济活跃率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经济合作暨开发组织							
加拿大	(15+)	总数	40.9 (71)	44.6 (76)			
		男性	53.3	55.6			
		女性	28.4	33.8			
法国	(15+)	总数	42.0 (71)	42.6	43.3	43.4 (86)	44.8
		男性	55.2	55.1	54.4	52.6	51.6
		女性	29.4	30.5	32.7	34.6	38.2
德国	(14+)	总数	43.9	43.4	44.9		49.6
		男性	59.2	57.1	58.4		60.8
		女性	30.0	30.9	32.6		39.2
意大利	(14+)	总数	36.6	35.4	40.2	41.1	42.0
		男性	54.7	52.2	55.2	54.6	54.3
		女性	19.3	19.4	26.0	28.2	30.3
日本	(15+)	总数	51.0	48.6	48.4	51.5	51.7
		男性	63.4	62.3	60.2	63.6	62.4
		女性	39.1	35.2	36.8	39.8	41.3
英国	(16+)	总数	42.5		47.3 (81)		50.3
		男性	51.7		59.4		58.4
		女性	33.0		35.8		42.6
美国	(16+)	总数	41.8	44.5	49.1		
		男性	53.9	55.6	56.8		
		女性	30.2	33.9	41.8		44.4 (92)
俄罗斯	(16+)	总数	48.4		51.7 (79)	50.2	
		男性	52.1		55.7	55.0	
		女性	45.3		48.1	45.8	
经济合作暨开发组织亚洲							

续表 4-13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中国	(15+)	总数			52.3 (82)		
		男性			57.3		
		女性	44.25		47.0		
印度	(15+)	总数	32.9 (71)			37.5 (91)	
		男性	52.5			51.6	
		女性	11.9			22.3	
印度尼西亚	(15+)	总数	34.9 (71)		35.5		
		男性	47.3		48.1		
		女性	22.8		23.5		
韩国	(15+)	总数	33.0	38.5	37.9		
		男性	42.8	46.9	46.3		
		女性	23.2	30.0	29.3		
拉丁美洲 阿根廷	(14+)	总数	38.5		38.5	37.5	38.1
		男性	57.9		55.1	55.3	55.4
		女性	19.4		22.0	19.9	21.0
墨西哥	(12+)	总数	26.9	27.6	33.0		29.6
		男性	43.6	42.9	48.2		46.2
		女性	10.2	12.0	18.2		13.6
巴西	(10+)	总数	31.7		36.3		41.9
		男性	40.5		53.1		56.3
		女性	13.1		19.8		27.9
非洲 阿尔及利亚	(6+)	总数	21.7 (66)				23.6
		男性	42.2				42.4
		女性	1.8				4.4
尼日利亚	(14+)	总数					30.3
		男性					40.7
		女性					19.7
中东 埃及	(6+)	总数	27.9 (71)	30.2 (76)			31.6
		男性	51.2	54.1			49.3
		女性	4.2	5.5			13.5

注：经济活跃率为经济上活跃的人口/全数人口

资料来源：ILO，劳动统计年鉴（1970~1994）

表 4-14 1970~1990 年妇女经济活跃率的增长率

	1970	1990	增长率 (%)
法国	29.4	38.2	29.9
德国	30.0	39.2	30.7
意大利	19.3	30.3	57.0
日本	39.1	41.3	5.6
英国	33.0	42.6	29.1
美国	30.2	44.4	47.0
俄罗斯	45.3	45.8	1.1
印度	11.9	22.3	87.4
阿根廷	19.4	21.0	8.2
墨西哥	10.2	13.6	33.3
巴西	13.1	27.9	113.0
阿尔及利亚	1.8	4.4	144.4
埃及	4.2	13.5	221.4

注：经济活跃率为经济活跃人口占全数人口的比例

资料来源：ILO，劳动统计年鉴（1970-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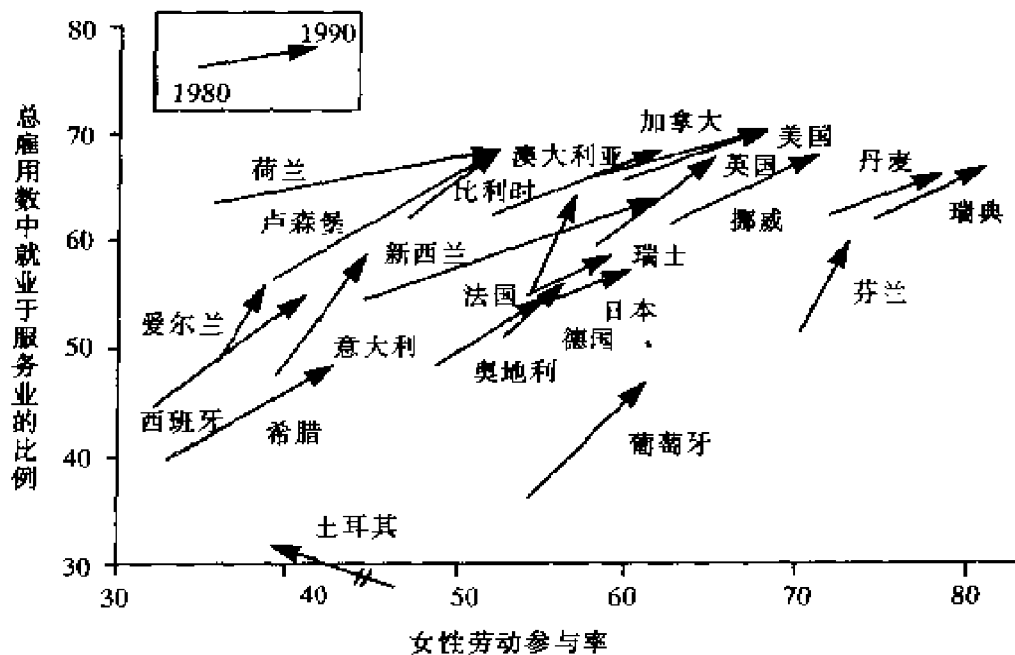


图 4-7 1980~1990 年服务业雇用女性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增长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暨开发组织(OECD, 1994b), 纳入 A 表及 D 表所作的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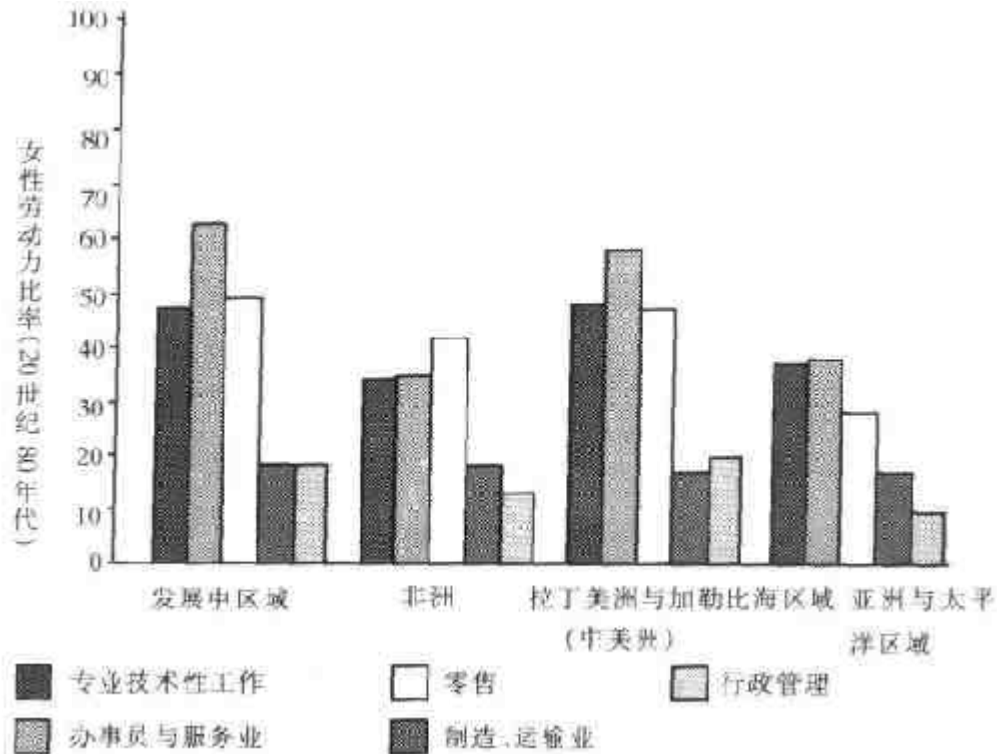


图 4-8a 女性劳动力在各种劳动类型中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秘书室(1991)所准备的资料，摘自国际劳动局《劳动统计年鉴》。

而妇女大量进入受薪的劳动市场，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经济的信息化、网络化与全球化使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劳动市场利用妇女特殊的社会状况所形成的性别区隔，同时增加其本身的生产力、管理控制与最终利益。<sup>①</sup> 我们可以经由统计数据证明。<sup>②</sup>

① 康妮与盖尔 (Kahne and Giele, 1992); 罗宾与瑞奈 (Rubin and Riney, 1994)。

② 参见布伦斯坦与史华兹 (Blumstein and Schwartz, 1983);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OECD, 1993-1995, 1994a, b, 1995); 梅生与杰生 (Mason and Jensen, 1995); 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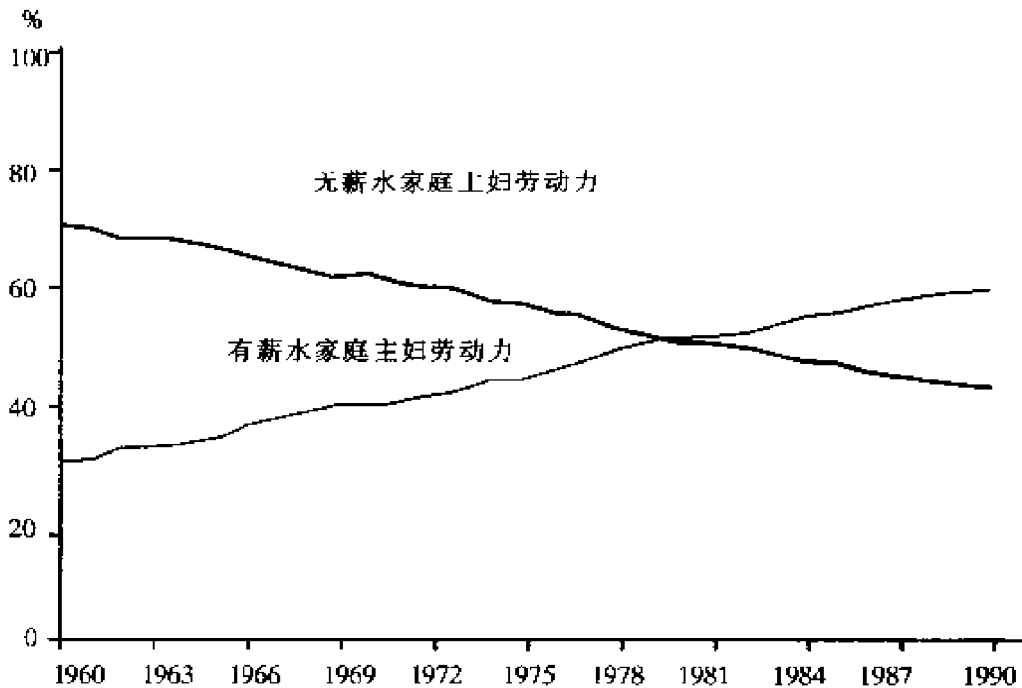


图 4-8b 美国在 1960~1990 年夫妻共组的家庭中  
家庭主妇的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1992a)

我曾指出，在分析信息化劳动经济结构的转型时（第一卷第四章），服务性劳动力的增长，以及服务业中两种不同的战略角色：企业服务与社会服务，其在信息化经济中的特征，正符合后工业主义理论家的预测。图 4-7 便展现了服务性事业与女性劳动人口在 1980~1990 年共同增长的趋势。

图 4-8a 是全球各地从事服务业的妇女人数百分比。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多数地方劳动仍以务农为大宗（但是这情况应当不会持续太久），因此，大多数妇女仍然从事耕作：南亚有 60% 具备经济活动能力的妇女操持耕作，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更是高

达 80%。<sup>①</sup> 但是半数左右具有经济活动能力的妇女在服务业中工作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多数发达国家中该比例更高，而且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的趋势；英国与美国的妇女劳动力就达到了 85%。然而，女性人口从事的劳动种类却更为集中：表 4-15 显示，大多数发达国家中的就业妇女多半集中于社会服务与个人性服务的行业，表 4-16 则是 1992~1993 年间各服务业的妇女雇用增加率。妇女受雇率在企业服务中显著增加，而在社会与个人性服务类别中位居第二。但这些国家的贸易与餐饮雇佣中的妇女劳动力却几乎没有动力性的变化。因此，在经济的信息化之下，服务性事业的种类直接对应到了先进国家中妇女雇用比例的增加。

1980~1989 年间部分经济合作暨开发国家中的妇女雇用率，的确在职业类别的演变上反映了上述结果（见表 4-17）。虽然仍有多数妇女劳工从事书记、秘书等工作，但整体增长最快的却是专业性/技术性以及管理性/协调性的工作类别。女性不再被放逐到毫无技术的服务工作中：妇女在各技术层级中都可以找到工作，甚至在最专业、最需技术的工作中，妇女人数也在增长。而这正可以显现性别歧视的存在：因为在相同的工作中，女性只能获得较低的工资、较高的工作风险以及不易升迁的窘境。

另一个将妇女劳动整合进世界市场的主要因素则是全球化：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当亚洲电子产业开始国际化时，工厂最主要的招募对象便是年轻的、无特殊技术的妇女。<sup>②</sup> 而美国设于北墨西哥的加工出口区，也非常仰赖女性劳工。妇女受雇于新工业经济的各行各业，但支领较低的薪资。<sup>③</sup> 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妇女仍然在非正式部门实际地参与都市劳动，特别是为都会民众提

① 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1991)。

② 莎拉芙 (Salaff, 1981, 1988)。

③ 史丹汀 (Standing, 1990)。

### 供餐点与服务。<sup>①</sup>

表 4-15 1973~1993 年妇女在服务业中的雇用率，  
依据活动与信息密集程度排序

单位：%

		1. 金融、 保险、 地产、 商业服务	2. 社区、 社会与 个人服务	2. 运输、 仓储与 通讯	(信息密集程度排序)		总数
					3. 批发、 零售、餐 饮与旅馆	无法恰 当定义 的活动	
加拿大	1975	11.2	40.2	4.0	25.8		81.2
	1983	12.1	40.9	4.2	25.4		82.6
	1993	13.6	43.9	3.7	24.8		86.0
美国	1973	9.1	41.5	3.5	23.9		78.0
	1983	11.9	41.9	3.3	24.5		81.6
	1993	12.6	46.6	3.5	22.7		85.3
日本	1973	3.4	22.0	2.0	24.7	0.2	52.3
	1983	6.9	24.1	1.9	27.1	0.2	60.3
	1993	9.4	26.9	2.5	27.5	0.4	66.7
德国	1973						
	1983	8.2	34.2	3.3	22.5		68.2
	1993	10.3	38.4	3.6	22.4		74.6
意大利	1977	1.7	31.0	1.8	18.8		53.3
	1983	3.1	34.6	2.0	21.0		60.6
	1993	8.1	36.4	2.7	22.6		69.8
英国	1973	7.4	36.0	2.8	24.7		70.1
	1983	9.8	42.2	2.8	25.0	0.1	79.9
	1993						84.9
西班牙	1977	2.1	28.2	1.5	24.4		56.3
	1983	3.0	35.8	1.7	24.4		64.9
	1993	6.3	41.8	2.2	26.9		77.2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劳动统计（1995）。

① 波提斯等 (Portes et al, 1989)。

表 4-16 1973~1993 年各类别妇女雇用率在总妇女雇用率中的增长率<sup>a</sup>

国家	商业服务 (%)	社会与个人服务 (%)	运输、仓储与通讯 (%)	贸易、旅馆与餐饮 (%)
美国	38.5	12.2	0	-5.0
日本	176.5	22.2	25	1.3
德国 (1983~1993)	25.6	12.3	9	-0.4
意大利 (1977~1993)	376.5	17.4	50	-3.9
英国	32.4	17.2	0	1.2
西班牙 (1977~1993)	200.0	48.2	47	10.2

<sup>a</sup>资料如非来自 1973~1993 会在表中另外标明

资料来源：从表 4-15 的资料推计

表 4-17 1980 年和 1989 年妇女雇用率在各行业中的分布<sup>a</sup>

单位：%

国家 <sup>b,c</sup>	专业技术及其相关	行政管理	办事员及其相关	销售员	服务生	农业及其相关	生产及其相关
比利时							
1983	25.9	1.4	24.4	13.7	18.6	2.8	13.2
1988	28.2	1.4	27.3	14.6	14.4	2.1	11.6
指标 (1983=100)	118.0	113.0	122.0	116.0	84.0	86.0	95.0
加拿大							
1980	19.1	5.4	34.5	10.0	18.3	2.8	9.9
1989	20.9	10.7	30.5	9.9	17.0	2.2	8.9
指标 (1980=100)	143.0	185.0	114.0	123.0	122.0	98.0	113.0



续表 4-17

国家 <sup>b,c</sup>	专业、技术 及其相关	行政管理	办事员 及其相关	销售员	服务生	农业及与 其相关	生产及 与其相关
芬兰							
1980	19.8	1.4	21.8	8.6	22.3	10.5	15.5
1989	31.2	1.9	22.7	11.5	16.2	6.5	10.0
指标 (1980 = 100)	172.0	147.0	113.0	145.0	79.0	66.0	70.0
德国							
1980	14.1	1.3	30.7	12.9	16.3	6.9	15.9
1986	16.2	1.5	29.8	12.8	16.1	5.5	13.3
指标 (1980 = 100)	118.0	115.0	99.0	102.0	102.0	83.0	86.0
希腊							
1981	10.7	0.7	12.9	9.0	9.7	41.6	15.5
1989	14.4	0.8	14.6	10.8	11.5	34.0	13.9
指标 (1981 = 100)	156.0	130.0	131.0	138.0	137.0	95.0	104.0
日本							
1980	9.6	0.5	23.1	14.3	12.7	13.1	26.5
1989	11.4	0.8	26.4	14.4	11.4	88	26.5
指标 (1980 = 100)	173.0	132.0	116.0	104.0	77.0	116.0	250.0
挪威							
1980	23.6	2.2	19.2	12.8	24.9	5.9	11.2
1989	28.3	3.5	19.8	12.4	22.3	3.9	9.4
指标 (1980 = 100)	141.0	188.0	121.0	114.0	106.0	78.0	99.0
西班牙							
1980	8.7	0.2	13.2	15.4	25.6	18.2	18.7
1989	15.2	0.4	18.2	15.4	25.2	11.1	14.4
指标 (1980 = 100)	202.0	280.0	160.0	116.0	114.0	70.0	89.0

续表 4-17

国家 <sup>b,c</sup>	专业、技术 及其相关的	行政管理	办事员 及其相关	销售员	服务生	农业及与 其相关	生产及 与其相关
瑞典							
1980	30.6	0.8	21.6	8.7	22.8	3.0	12.4
1989	42.0	n.a.	21.9	9.3	13.2	1.8	11.7
指标 (1980=100)	134.0	n.a.	114.0	120.0	65.0	66.0	106.0
美国							
1980	16.8	6.9	35.1	6.8	19.5	1.2	13.8
1989	18.1	11.1	27.8	13.1	17.7	1.1	11.1
指标 (1980=100)	136.0	202.0	99.0	243.0	115.0	115.0	101.0

a. 主要分类来自国际标准的职业分类 (ISCO)

b. 并非所有国家均依 ISCO 的标准公布资料, 在相关期间内改变职业分类系统的国家并未收录

c. 指标意味着 10 年间各职业类别中雇员数目的增长

资料来源: ILO, 劳动统计年鉴 (各年)

为什么是妇女呢? 第一, 虽然大众传媒指称工作机会不足, 但过去 30 年来, 除欧洲之外, 全球都有足够的工作机会 (我曾在第一卷第四章中提过)。而就算是欧洲, 在男性劳动人口下降时, 女性劳动人口仍在攀升。因此, 女性进入劳动市场的原因并不单纯来自市场对于劳动人口的需求。同样的, 女性失业人口也不比男性高: 1994 年, 美国与加拿大的女性失业率就低于男性 (美国女性失业率为 6%, 男性为 6.2%; 加拿大则是女性为 9.8%, 男性为 10%), 1993 年英国的女性失业人口更是远低于男性 (女性 7.5%, 男性 12.4%)。日本、西班牙的女性失业人口稍多, 而法国与意大利则是明显的超过男性。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女性劳动人口的增加率, 与市场劳动力需求以及失业率之间毫不相关。

若劳力需求在数量上无法解释女性劳工为何增加, 那么, 女性就业必有其他原因。过去的研究早已说明, 正是因为女性的工作被



社会性别化，而使得女性成为广受欢迎的劳动人口。<sup>①</sup>当然这与生理特征无关：女性早已证明她们可以从事各种职务。而年轻女性受雇于电子产业的真正原因当然也不是因为她们拥有灵巧的双手，而是社会并不介意女性在长期组装芯片上的微小零件时，对视力造成的伤害。在研究东南亚电子产业雇用女性劳工的缘起后，人类学家指出，父权家庭的威权模式正由家庭延伸入工厂，而厂方与男性家长之间也有某种程度的协议。<sup>②</sup>

雇用女性的理由也不是因为她们缺乏工会组织。妇女之所以没有工会多半是因为她们从事的行业几乎没有工会存在的部门，譬如私人企业、电子制造业。但即使如此，美国工会中女性劳工仍然占了37%，加拿大的这一数字为39%，瑞典为51%，非洲为30%<sup>③</sup>。美国与西班牙的成衣工人、墨西哥加工出口区的女性、世界上所有的教师与护理人员，都已经动员起来捍卫自己的需求，甚至比钢铁业或化工业中由男性主导的工会更为热情。认为女性劳工是逆来顺受的人，终究要为这个迷思付出代价。<sup>④</sup>所以，女性雇用率究竟为何提升？

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男女之间同工不同酬的情况所致。人们可以用较低廉的工资雇用劳工，包括大学在内的教育普及使妇女（尤其是发达国家）逐渐成为具备技术的劳动人口，但男女之间同工不同酬的行情仍然遍及全球。以美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妇女的收入是男性收入的60%~65%，1991年虽上升到男性的72%，但却是由于男性实际工资的减少。<sup>⑤</sup>英国在80年代中期，女性薪资约为男性的69.5%；德国在1980年女性

---

① 史毕兹 (Spitz, 1988); 康妮与盖尔 (Kahre and Giele, 1992);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OECD, 1994b)。

② 莎拉芙 (Salaff, 1981)。

③ 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1991)。

④ 柯伯 (Cobble, 1993)。

⑤ 金 (Kim, 1993)。

工资是男性工资的 72%，但是到了 1991 年则成为 73.6%；法国由 1980 年的 79% 上升到 1991 年的 80.8%。在日本，女性薪资只有男性的 43%，韩国是 51%，新加坡是 56%，香港是 70%，拉丁美洲介于 44%~77% 之间。<sup>①</sup>

值得强调的是，大多数状况中女性并非从事杂役或文书工作，相反的，她们多半被提升至需要多重技术的工作职位上。新的技术要求劳动力的自主，能够适应和重新编组劳动任务，正如我在第一卷第四章中提到的银行业与保险业。而这正是雇用女性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她们擅长的人际关系处理技巧，是信息化经济所特别需要的，因为信息化经济往往可能面对的状况是决策与执行分属两个不同的地点。这样一来，在父权制度下属于男性的生产将与属于女性的手工，与社会性的生产之间以性别区隔的劳动会扩大。因为，新经济需要这些技巧；也就是以往用于私人领域的关系性劳动，而现在可以在处理信息与人群时进入管理与支配的前线。

而我认为，造成 20 世纪 90 年代女性劳动人口扩大的最关键因素应该是：女性劳工所展现的弹性。<sup>②</sup> 实际上，妇女正是那一大群兼职与临时劳动的来源。同时，在家工作的女性苏活族的人数也微幅上升（表 4-18 与表 4-19）。依照第一卷第三、第四章中共同考量经济活动的网络以及作为信息化经济主要特征的工作弹性时，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在女性弹性的工作计划中，时间、进出劳动市场以及新经济的基本需求中有某种契合关系。<sup>③</sup> 而这种契合也是性别相关的条件。由于妇女仍然负有持家与育儿的责任，因此，弹性的工作恰好是可以同时维持两种濒临崩溃的世界的策略。<sup>④</sup> 实际上，欧盟（如同世界各地）中，使妇女担任

① 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1995)。

② 苏瑟 (Susser, 即将出版)。

③ 瑟曼与崔 (Thurman and Trah, 1990)；达飞与波布 (Duffy and Pupo, 1992)。

④ 麦可森 (Michelson, 1985)。



兼职工作（图 4-9）的最主要的因素便是婚姻与小孩。而信息化、网络化的经济所需要的劳工型态正好符合了父权制度下的妇女的生存利益，也成为当她们无法从丈夫那儿得到协助时，可以在家庭与工作之间求得平衡的方式。

表 4-18 1973~1994 年兼职工作的数量与组合

	兼职雇用占雇用的比例					
	男性					
	1973	1979	1983	1992	1993	1994
澳大利亚	3.7	5.2	6.2	10.6	10.3	10.9
奥地利	1.4	1.5	1.5	1.6	1.7	..
比利时	1.0	1.0	2.0	2.1	2.3	2.5
加拿大	4.7	5.7	7.6	9.3	9.8	9.5
丹麦	..	5.2	6.6	10.1	11.0	..
芬兰	..	3.2	4.5	5.5	6.2	6.0
法国	1.7	2.4	2.5	3.6	4.1	4.6
德国 <sup>a</sup>	1.8	1.5	1.7	2.6	2.9	..
希腊	..	..	3.7	2.8	2.6	3.1
冰岛	..	..	..	9.2	9.9	..
爱尔兰	..	2.1	2.7	3.9	4.8	..
意大利	3.7	3.0	2.4	2.8	2.5	2.8
日本	6.8	7.5	7.3	10.6	11.4	11.7
卢森堡	1.0	1.0	1.0	1.2	1.0	..
墨西哥 <sup>b</sup>	..	..	..	18.7	19.6	..
荷兰 <sup>c</sup>	..	5.5	7.2	13.3	13.6	14.7
新西兰	4.6	4.9	5.0	10.3	9.7	9.7
挪威 <sup>d</sup>	8.6	10.6	11.5	9.8	9.8	9.5
葡萄牙	..	2.5	..	4.1	4.5	4.7
西班牙	..	..	..	2.0	2.4	2.6
瑞典 <sup>e</sup>	..	5.4	6.3	8.4	9.1	9.7
瑞士	..	..	..	8.3	8.6	8.8
土耳其	..	..	..	11.3	17.9	..
英国	2.3	1.9	3.3	6.2	6.6	7.1
美国 <sup>f</sup>	8.6	9.0	10.8	10.8	10.9	11.5

续表 4-18

	兼职雇用占雇用的比例					
	女性					
	1973	1979	1983	1992	1993	1994
澳大利亚	28.2	35.2	36.4	43.3	42.3	42.6
奥地利	15.6	18.0	20.0	20.5	22.8	..
比利时	10.2	16.5	19.7	28.1	28.5	28.3
加拿大	19.4	23.2	26.1	25.8	26.2	26.1
丹麦	..	46.3	44.7	36.7	37.3	..
芬兰	..	10.6	12.5	10.4	11.1	11.2
法国	12.9	17.0	20.1	24.5	26.3	27.8
德国 <sup>a</sup>	24.4	27.6	30.0	30.7	32.0	..
希腊	..	..	12.1	8.4	7.6	8.0
冰岛	..	..	..	49.8	47.5	..
爱尔兰	..	13.1	15.5	18.6	21.3	..
意大利	14.0	10.6	9.4	11.5	11.0	12.4
日本	25.1	27.8	29.8	34.8	35.2	35.7
卢森堡	18.4	17.1	17.0	16.5	18.3	..
墨西哥 <sup>b</sup>	..	..	..	36.1	36.6	..
荷兰 <sup>c</sup>	..	44.0	50.1	62.1	63.0	64.8
新西兰	24.6	29.1	31.4	35.9	35.7	36.6
挪威 <sup>d</sup>	47.8	51.7	54.9	47.1	47.6	46.5
葡萄牙	..	16.5	..	11.3	11.1	12.1
西班牙	..	..	..	13.7	14.8	15.2
瑞典 <sup>e</sup>	..	46.0	45.9	41.3	41.4	41.0
瑞士	..	..	..	53.7	54.1	55.4
土耳其	..	..	..	37.0	40.4	..
英国	39.1	39.0	42.4	43.5	43.8	44.3
美国 <sup>f</sup>	26.8	26.7	28.1	25.4	25.3	27.7

续表 4-18

	兼职雇用占总雇用的比例					
	1973	1979	1983	1992	1993	1994
澳大利亚	11.9	15.9	17.5	24.5	23.9	24.4
奥地利	6.4	7.6	8.4	9.0	10.1	..
比利时	3.8	6.0	8.1	12.4	12.8	12.8
加拿大	9.7	12.5	15.4	16.7	17.2	17.0
丹麦	..	22.7	23.8	22.5	23.3	..
芬兰	..	6.7	8.3	7.9	8.6	8.5
法国	5.9	8.1	9.6	12.5	13.7	14.9
德国 <sup>a</sup>	10.1	11.4	12.6	14.4	15.1	..
希腊	..	..	6.5	4.8	4.3	4.8
冰岛	..	..	..	27.8	27.3	..
爱尔兰	..	5.1	6.6	9.1	10.8	..
意大利	6.4	5.3	4.6	5.8	5.4	6.2
日本	13.9	15.4	16.2	20.5	21.1	21.4
卢森堡	5.8	5.8	6.3	6.9	7.3	..
墨西哥 <sup>b</sup>	..	..	..	24.0	24.9	..
荷兰 <sup>c</sup>	..	16.6	21.4	32.5	33.4	35.0
新西兰	11.2	13.9	15.3	21.6	21.2	21.6
挪威 <sup>d</sup>	23.0	27.3	29.6	26.9	27.1	26.5
葡萄牙	..	7.8	..	7.3	7.4	8.0
西班牙	..	..	..	5.8	6.6	6.9
瑞典 <sup>e</sup>	..	23.6	24.8	24.3	24.9	24.9
瑞士	..	..	..	27.8	28.1	28.9
土耳其	..	..	..	19.3	24.8	..
英国	16.0	16.4	19.4	22.8	23.3	23.8
美国 <sup>f</sup>	15.6	16.4	18.4	17.5	17.5	18.9

续表 4-18

	女性兼职的比例					
	1973	1979	1983	1992	1993	1994
澳大利亚	79.4	78.7	78.0	75.0	75.3	74.2
奥地利	85.8	87.8	88.4	89.6	89.7	..
比利时	82.4	88.9	84.0	89.7	89.3	88.1
加拿大	68.4	72.1	71.3	69.7	68.9	69.4
丹麦	..	86.9	84.7	75.8	74.9	..
芬兰	..	74.7	71.7	64.3	63.1	63.6
法国	82.3	82.1	84.3	83.7	83.3	82.7
德国 <sup>a</sup>	89.0	91.6	91.9	89.3	88.6	..
希腊	..	..	61.2	61.3	61.6	58.9
冰岛	..	..	..	82.1	80.4	..
爱尔兰	..	71.2	71.6	72.5	71.7	..
意大利	58.3	61.4	64.8	68.8	70.5	71.1
日本	70.0	70.1	72.9	69.3	67.7	67.5
卢森堡	87.5	87.5	88.9	88.9	91.2	..
墨西哥 <sup>b</sup>	..	..	..	46.3	46.1	..
荷兰 <sup>c</sup>	..	76.4	77.3	75.2	75.7	75.1
新西兰	72.3	77.7	79.8	73.3	74.2	74.9
挪威 <sup>d</sup>	76.4	77.0	77.3	80.1	80.5	80.6
葡萄牙	..	80.4	..	68.2	66.3	67.1
西班牙	..	..	..	77.0	75.6	74.9
瑞典 <sup>e</sup>	..	87.5	86.6	82.3	81.3	80.1
瑞士	..	..	..	83.1	82.5	82.7
土耳其	..	..	..	59.3	50.2	..
英国	90.9	92.8	89.8	84.9	84.5	83.6
美国 <sup>f</sup>	66.0	68.0	66.8	66.4	66.2	67.3

a. 1990年之前的资料来自西德，之后的资料则来自东德和西德

b. 是1991年的资料而非1992年的资料

c. 1985年之后资料不全

d. 1987年之后资料不全

e. 1986年之后及1992年之后资料不全

f. 1993年之后资料不全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就业展望》（1995）



表 4-19 自我雇用占有所有雇用的比例，依据性别与活动划分

单位：%

	所有的非农业活动			
	妇女受雇率		男性受雇率	
	1979	1990	1979	1990
澳大利亚	10.0	9.6	13.9	14.4
奥地利	..	..	..	..
比利时	8.8	10.3	12.6	16.7
加拿大	6.0	6.4	7.2	8.3
丹麦	..	2.8	..	10.4
芬兰	4.2	5.6	7.9	11.5
法国	..	5.5	..	11.9
德国	4.8	5.4	9.4	9.7
希腊	25.7	15.4	34.0	32.7
爱尔兰	..	6.1	..	16.8
意大利	12.8	15.1	21.7	25.8
日本	12.9	9.3	14.6	12.1
卢森堡	..	5.8	..	7.9
荷兰	..	7.3	..	9.6
新西兰	..	11.8	..	24.0
挪威	3.4	3.6	8.9	8.8
葡萄牙	..	12.3	..	18.3
西班牙	12.5	13.9	17.1	19.2
瑞典	6.2	3.9	2.5	10.1
英国	3.2	7.0	9.0	16.6
美国	4.9	5.9	8.7	8.7

续表 4-19

	男性与女性的服务性活动 (1990)			
	批发与零售业以 及餐饮与旅馆	运输、仓 储及通讯	金融、保险、地 产与商业服务	社区、社 会及个人 服务
澳大利亚	15.5	14.5	14.0	6.6
奥地利	13.7	3.6	10.0	5.0
比利时	36.0	5.5	21.7	8.2
加拿大	7.2	6.4	10.4	8.5
丹麦	13.3	6.9	9.6	3.2
芬兰	16.0	11.2	10.5	4.0
法国	19.2	4.8	9.2	5.3
德国	15.7	6.6	17.1	5.5
希腊	48.0	25.5	35.9	9.4
爱尔兰	24.4	13.7	13.6	6.8
意大利	45.8	14.1	8.9	15.5
日本	15.0	4.8	8.1	12.0
卢森堡	17.5	3.8	7.0	3.7
荷兰	13.4	3.3	11.9	7.8
新西兰	18.2	11.1	19.2	9.6
挪威	7.5	9.3	6.7	4.4
葡萄牙	38.3	8.6	13.7	4.6
西班牙	34.0	26.8	13.7	6.0
瑞典	13.6	8.8	11.6	3.7
英国	15.9	10.5	14.2	7.8
美国	8.5	4.6	11.4	7.3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就业展望》（1991），表 2-12；（1992）表 4.A.2 与 4.A.8



将妇女整合进受薪工作与劳动市场，对家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是妇女的经济收入对家户预算而言显得重要，因此，女性在家中的地位显著提高。在严格的父权制度下，操持家务不仅是生命重任，也是男性支配女性的开始。因此，反抗父权制度的权威不仅激烈，同时也可能将妇女推向边缘位置。但男性工资下降，且发现女性竟然带着薪水回家时，父权制度便无法阻挡双方在不同的意见下进行沟通。更重要的是，由于家庭的经济来源与维持一向是父权体制合理性支配的基础，一旦有所改变，也会冲击父权制度与支配的意识形态。当夫妻二人长时间在外奔波劳累，负担相同的经济支出，为何先生不用负担家务？对于必须工作赚钱、操持家务分工、育儿、还被先生约束的妇女而言，困境更为迫切，因为社会还以为女性只是全时的家庭主妇。不健全的托育制度，无法联系住宅、工作与服务性活动的差劲的空间规划，以及更糟的社会福利，<sup>①</sup> 女性必须对抗现实处境：她们深爱的父亲与先生，正自她们身上获取好处。由于在外工作可以拓展妇女的生命经验与社会网络，她们开始询问自己并教导女儿。此时，寻找女性意识的土壤已经备妥，并在同一时刻，在文化社会的场域中发芽。

### 第三节 深具影响力的女性情谊： 女性主义运动

---

诚如其实践与论述所揭示的那样，妇女运动是相当歧异多样的。而女性主义史学家与理论学者所挖掘出的、以往不为人知的

---

<sup>①</sup> 瑟凡与卡斯特 (Servon and Castells, 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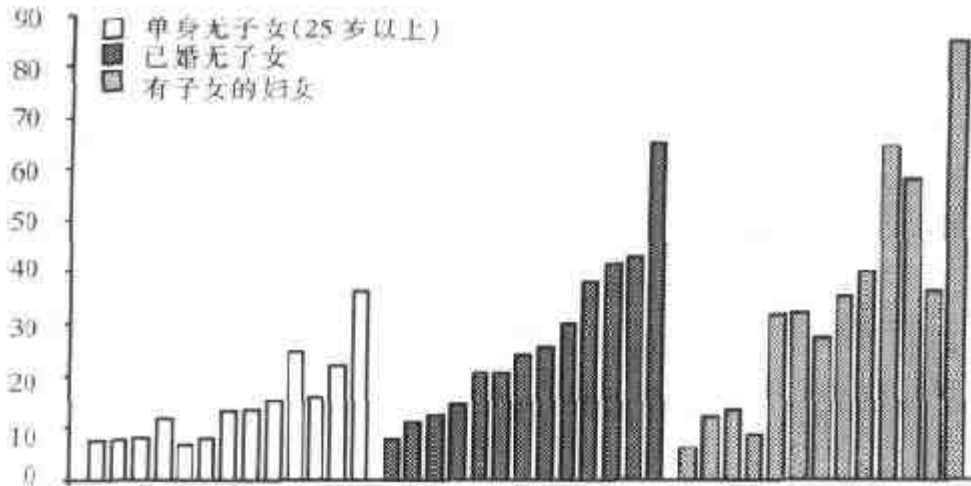


图 4-9 1991 年欧盟国家不同家庭状况的妇女兼职比例

GR 为希腊，I 为意大利；E 为西班牙，P 为葡萄牙，IRL 为爱尔兰，L 为卢森堡；F 为法国，B 为比利时，E12 为 12 个会员的平均，UK 为英国，D 为德国，DK 为丹麦，NL 为荷兰

资料来源：欧洲委员会，《欧洲的就业状况》（1993）

女性抗争与女性主义思潮的纪录，<sup>①</sup> 以及置放在全球性的比较视野下的整体轮廓，均可展现妇女运动的丰富性与深刻程度。这里，我将聚焦分析当代妇女运动：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于美国发起，继之在 70 年代初期盛行于欧洲，并在随后的 20 年间扩散至全球。我关注妇运的共同特征，它造成了挑战父权主义的有转化能力的社会运动特征，说明了妇女斗争的多样性以及她们表现的多重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我将援引珍·曼丝布瑞吉（Jane Mansbridge）对女性主义的宽广定义作为其初步的操作型定义：“献身于终结男性支配”；<sup>②</sup> 并接受她视女性主义为“论述

① 罗玻南（Rowbotham, 1974, 1992）；柯龙尼（Kolodny, 1984）；斯毕伐克（Spivak, 1990）；玛苏洛（Massolo, 1992）。

② 曼丝布瑞吉（Mansbridge, 1995: 29）。

地创造的运动” (discursively created movement)。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主义仅停格于各种论述，或者是来自不同阵线的女性学者与理论家在文章中产生的论战，反而是女性主义本质作为实践与叙事，都是女性认同的（再）定义：<sup>①</sup> 有时候是论证男女平等以去除生物或文化差异造成的性别化；另些时刻则要论证女性基本的特殊性，以连结女性实践人生的优越性；或是强调离开男性世界的必要性，并在姐妹情谊中重创造性欲特质与生活。也就是，通过要求平等、点明差异或者是彻底分离，在各种事件上否定由男性定义或由父权家庭铭刻的女性认同。曼丝布瑞吉这样写道：

这种论述地创造的运动是一种实体，它激励运动的积极分子，而积极分子也在实体中感到责任。这种责任是经由认同而来的责任，这不仅需要将集体视为有价值的，也需要认同个人是这个认同的一部分。女性主义的认同不是被给予的，而要去完成的。现今关于女性主义的诸多认同，是在女性主义者团结一致、共同行动、与阅读其他女性主义者的作品中而形成、增长的。述说与行动不仅创造了街头理论，而且也赋予了这些理论以意义。至于个人转变与持续互动的双重经验，则使女性主义创造出对妇运的内在责任。<sup>②</sup>

因此，女性主义在歧异多样性之外仍有其基本共通性，也就是：不管是以个人与集体的，还是正式与非正式的，这些历史的努力，都是去重新定义女性情谊以直接对抗父权主义。

以下我将简单地回顾过去 30 年来妇女运动的轨迹，一方面评估她们的努力，一方面提出可能的妇运的类型。为了简洁论证，我将重点主要放在妇运新生地美国；同时我也借着对世界其

① 巴特勒 (Butler, 1990); 卓多诺 (Chodorow, 1994); 会特 (Whitter, 1995)。

② 曼丝布瑞吉 (Mansbridge, 1995: 29)。

他地区的观察来矫正这研究取径的暗存族群中心主义；最后并以比较视角讨论当代的妇女运动。

### 一 美国妇运：断裂的连续体<sup>①</sup>

在美国短暂的历史中，女性主义却有长远的历史背景。1848年，具备组织性格的妇女运动正式诞生于纽约圣尼卡瀑布（Seneca Falls）的村庄教会，接着，美国女性主义者便接受漫长的挑战以保卫女性受教、工作、政治等权力，而1920年女性获得投票权可以说是达到了政治权力的顶峰。然而，接下来近半个世纪，妇运又走向后台。但是这并非女性停止了战斗，<sup>②</sup> 因为1955年发生于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巴士抵制事件，正是这个最著名的女性抗争事件不仅为南方带来了民权运动，而且也进而改写了美国的历史，而这个抵制事件主要是由一群女性非裔美人由社区组织开始策动的。<sup>③</sup> 然而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便是妇运大量兴盛之时，妇运与社运同样要求人民的基本权利，也同时要求对抗性文化的、革命性的倾向。<sup>④</sup> 一方面，由于1963年召开的肯尼迪总统妇女的处境委员会会议（John F. Kennedy's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的呼吁，以及1964年《民权法案》中关于妇女的第七条款的通过，使得在1996年10月29日由贝蒂·傅利丹（Betty Friedan）领导的一群著名的女性共同创建了全国女性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an, NOW）。虽然不断发生意识形态之争与组织危机，但是

① 过去30年来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演化与转换请见会特（Whitter, 1995）的精辟分析；美国女性主义组织的概观请见傅雷与马丁（Ferree and Martin, 1995）；兼具组织性与评论性的60年代美国妇运论述选集请见史耐儿（Schneir, 1994）。其他引用资料，在文中会特别标注。

② 罗普与泰勒（Rupp and Taylor, 1987）。

③ 巴雷特（Barnett, 1995）。

④ 艾文斯（Evans, 1979）。



全国妇女组织不仅是在近 30 年来不断展现出惊人的政治技巧与持久性的组织，同时也是关心议题最广泛的、捍卫妇女权力的全国性组织。全国妇女组织可以说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缩影。而她们关注社会、经济与各个组织机构中的妇女的平等权利。

约在同一个时刻，参与各种激进社会运动的妇女，尤其是参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运动的妇女，开始独立组织，以对抗革命组织中长久以来的性别歧视与男性支配的状况。这种状况不仅在个人层面上虐待妇女，而且也嘲讽女性地位是布尔乔亚与反革命的。1965 年 12 月“运动里的女性（Women in the Movement）”工作坊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大会之下开始运作，并接合了 1967 年密西根安娜堡（Ann Arbor）的妇女解放运动大会，大会吸引了自主的妇女群体，而她们也多半是从男性支配的政治群体中脱离出来的，这便是激进女性主义的前身。在这草创阶段，妇女运动就已经有了意识形态的断裂：自由主义的以及激进的。在全国妇女组织的成立宣言中，她们直陈：“我们，男人和女人，创建了妇女国家组织，并相信：追求不同性别之间自然平等的合作关系的新运动已经到来，普世皆然的人权革命现在已经在国内外发生”。<sup>①</sup> 而 1969 年在纽约催生了激进的女性主义的《红袜宣言》（Redstockings Manifesto）宣告：“我们确信，男人是压迫的来源，是最古老、最基本的支配的形式。其他形式的剥削与压迫（包括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都是源自于男性霸权。男人支配女人，少数的男人则支配全部的人”。<sup>②</sup>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将她的中心目标放在争取女性主义权利上，包括建议宪法修正案，但此案虽经国会核准，投票时却未达三分之二的同意底线，而在 1982 年宣告无效，虽然这个法案的

① 引自史耐尔（Schneir, 1994: 96）。

② 引自史耐尔（Schneir, 1994: 127）。

象征性意义远大于其他成效，但各州与联邦、法院仍然不断传来妇女平等的捷报，从同工同酬到生育权、到妇女有权进入各种职业与机构。在有技巧的政治游说、媒体广告、对女性候选人或是亲女性候选人的支持与推动下，使得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些卓越的成就。最重要的要算是由女性主义或支持女性主义的专栏作家在媒体上呈现的女性形象，许多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商业刊物，如 1972 年创刊、颇富盛名的《女士》杂志（MS Magazine），让正式组织女性群体外的女性也能理解妇运并进而帮助她们。

而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虽然积极地参加平权法案的示威活动，并特别努力地推动生育权的争取与防御，但她们的重点其实是经由只限女性参加的觉醒群体，唤起妇女的意识觉醒（consciousness raising, CR），同时致力打造女性自主的文化制度。在对抗男性施加在女性身上的暴力（包括反强暴的诉求、自我防御课程的提供、为受虐妇女提供保护、为受创妇女提供心理咨询）时，则企图对妇女现下的处境与父权机制之间提出意识形态的质疑。置身于激进派之中，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她们的第一个公开的政治示威乃是 1970 年 5 月在纽约出现的女人联合第二国会（Second Congress to Unite Women）的“紫色威胁（Lavender Menace）”，迅速地成为理论革新、文化创造与力行人不懈的行动的来源。在女性主义运动之中不断成长并散播其影响力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即是妇运的主要动力，也是妇运的主要挑战。因为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迫使妇运群体面对她们自身内部对不同性欲认同的歧视，以及必须面对是否或要在那里划下妇女解放运动的界限。

有一段时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试图将激进女性主义者的抗争联结至反对资本主义的宽广议题，并在有需要的时刻与左翼联结，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丰富论战。有一部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投身于工会之中。1972 年妇女工会联盟（Coalition of Labor Union）正式成立。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马克思主





义逐渐式微，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历史参考点，社会主义组织也日渐凋零，都降低了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影响力，但她们仍然对学术界有影响。<sup>①</sup>

不过，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与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之前，不论是在个人的意识形态上还是在运动的实践上，其实都相距不远。在克服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打造出女性主义运动的多元面貌以及召唤各种论战却也同时进行沟通与联系的过程中，下列因素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sup>②</sup> 第一，如同齐拉·爱森斯坦 (Zillah Eisenstein) 所提出的那样：<sup>③</sup>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关注的议题如男女平权与社会分类去性别化，其实它已包含了质疑父权的社会制度的转化，甚至是要要求性别平等这样有节制的策略，这是不同派别的一致目标；第二，80 年代政治上对女性主义的反挫，由 1980~1992 年间执政的共和党所主张，也促使了不同的运动派别在各自的生活形态与政治信仰下携手合作，并在捍卫女性生育权与建造为女性提供服务及文化独立的机构而努力；第三，由于个人的耗竭与日常生活中永无止境地对抗“真实存在的父权”，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大部分激进派女性主义团体逐渐消失。但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绝不放弃她们的基本价值，她们在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已建立的组织中找到了藏身处，就是女性主义者在主流机构，尤其是学院（的妇女研究学程）、非营利基金会、专业协会的妇女干部委员会中建立了一小块飞地。<sup>④</sup>

面对日益困难的工作，这些组织与机构确实需要一些强悍的

---

① 最具动力与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组织妇女工会联盟 (CWLU) 的起落分析，见卓贝尔 (Strobel, 1995)。

② 傅蕾与蒂斯 (Ferree and Hess, 1994)；傅蕾与马丁 (Ferree and Martin, 1995)；曼斯布瑞吉 (Mansbridge, 1995)；史派特-罗斯与史耐柏尔 (Spalter-Roth, and Schreiber, 1995)；会特 (Whittier, 1995)。

③ 艾森斯坦 (Eisenstein, 1981/1993)。

④ 指被父权主义或其他领土包围的一块激进女性主义领土。——译注

支援，尤其是当他们的诉求从最明显而无疑义的要求人权，逐渐涉足更具争议性的领域如生育选择、性解放以及女性攻进一个男性的不同的城堡。当然我们也可以讨论，是否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组织确实协助了激进派女性主义者，毕竟，20世纪60年代发韧的各种以男性为基础的、反抗文化的运动，到了80年代，除了生态主义之外，不论是运动还是意识形态，几乎都已经销声匿迹了。在这多层次的过程中，分属不同派别与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与其激进派女性主义，终于在实践中相互交织，也在各个支持女性主义的价值或成因的女人心中共同存在，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也在运动中被认同，即便是主流的女性主义阵营为了策略而有某种程度的反对（贝蒂·傅利丹便持反对态度），譬如80年代晚期，当全国妇女组织的总裁派翠西亚·爱尔兰（Patricia Ireland）坦承双性恋倾向后在全国妇女组织内部所引起的张力对抗。

而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多变、延伸并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的大多数美国女性产生了影响，也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的区隔。一方面，不同的女性主义有组织上的差别；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运动的内部也有南西·会特（Nacy Whittier）所称的“政治世代”的实质差异<sup>①</sup>。

就组织而论，史派特·罗斯（Spalter - Roth）与史耐柏尔（Schreiber）<sup>②</sup>提出了立基于经验的、有用的型态学来区分：

①要求平等权的全国性会员组织，例如全国妇女组织或1972年成立的妇女工会联盟（Coalition of Labor Union Woman, CLUW）。但却极力避免使用女性主义的语言，因此，他们也牺牲了一些有用的原则，虽然他们试图提出女性在社会的全部境遇的问题所在并提升妇女的地位，史派特·罗斯认为：“虽然这些组织的领导者希望可以同时召唤自由派的人士与其激进派人士，但

① 会特（Whittier, 1995）。

② 史派特 - 罗斯与史耐柏尔（Spalter - Roth, and Schreiber, 1995: 106~108）。

他们所使用的政治语言却模糊了支配与从属的关系，因为她们难以召起那群她们希望代表或赋权（empower）的女性的意识”。<sup>①</sup>

②直接提供服务与援助，譬如流离失所的持家者的网络（Displaced Homemakers Network）、全国反家庭暴力国家联盟（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这些本地群体撰写计划，获得了政府与企业的支持，而成为具有优势的网络。但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在支持协助妇女与妇女赋权上的冲突：通常比起长期的目标如意识觉醒或政治上的自我组织，紧急的状况总是需要优先处理。

③由专职人员维持，以专家为基础的亲女性组织，譬如妇女法律防御基金会（Women's Legal Defense Fund）、妇女政策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Women Policy）、女性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Woman Policy Studies）、女性主义多数基金会（the Fund for Feminist Majority）（支持政治机构中的妇女）、全国有色妇女协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Women of Color）、同酬国家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Pay Equity）。这类组织所要面对的挑战则是当越来越多女性受到影响而进入运动领域，以及在族群、社会、文化的多重影响下，女性主义议题愈来愈多样化时，要如何对应她们所关心的议题，以切合人们的需求。

当然，除了主流的妇运组织，妇女仍有无数的本地组织，它们有些是与激进派女性主义同根生长，却逐渐演变出不同的轨道：另类的女性健康诊所、存款互助会<sup>译注</sup>、训练中心、书店、餐厅、育儿中心、受虐妇女保护中心、剧团、乐团、写作俱乐部、艺术家工作室以及各种文化表达群体，他们在历史进程中起起落落，但得以延续的总是那些以降低自身意识形态的特点而整合入更大的社会之中。广义说来，它们都是女性主义组织，不论

<sup>①</sup> 史派特-罗斯与史耐柏尔（Spalter-Roth, and Schreiber, 1995: 119）。

译注：信用合作社的一种。

它们的多样性与弹性，它们都为女性文化的浮现提供了支持网络、经验与论述材料，并在最有力量的所在——妇女的心灵，对父权制度进行破坏。

意图理解美国妇女运动的演变时，会特（Whittier）认为“政治世代”（political generations）与“小团体”（micro-cohorts）也是一个主要的区隔概念。在会特充满智慧的社会学研究中，针对美国激进女性主义的演变，她讨论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80年代、90年代30年来女性主义的连续性与女性主义的风格的不连续性：

政治世代对社会运动连续性的重要性有三个方面。第一，政治世代的集体认同有历时性的一致性，从20世纪70年代参与妇运直至现在；第二，就算反对运动愈来愈少，若身经百战的运动老手不断将他们最主要的关怀带入社会相关机构与其他社会运动时，社会运动会持续不断地产生影响，由行动者创建的机构、制度与创新，不仅是改变的代理人，反而更是来来动员可以再生的资源；第三，当新的参与者投入社会运动并重新定义集体认同时，社会运动就改变了。小团体不断地加入也会发生改变。每一个小团体都会有由自己的脉络塑造集体认同，因此，在运动起始、成长、高峰与衰退等不同阶段进入运动的人也会不同，除了在社会运动中持续而缓慢的变化之外，某些特殊的时刻甚至会有极为巨大的变化。巨变的时刻让各种不同时刻加入的小群体，整合成一个政治世代，比起另外加入却绝对不同的小群体——也就是第二代世代而言，他们的相似性比差异性来得多……从一个政治世代到另一个政治世代的社会运动的过渡，便是社会运动长存的关键。<sup>①</sup>

① 会特（Whittier, 1995: 254 - 256）。

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个案研究以及种种二手资料综合的结果以及无数众多的资料，<sup>①</sup> 会特向我们展示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 30 多年以来的包含激进派女性主义者在内的女性主义运动的持续与新生。这也显示了媒体过分强调的“后女性主义时代”一词所蕴涵的女性主义的断代，似乎是短时间的特性而带有偏见的表达。<sup>②</sup> 会特也不忘强调，除了女性主义运动的历时性之外，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深刻的转变在不同世代之间的确也有彼此理解上的鸿沟与困难，“新加入女性主义阵营的人往往在运动目标上与长期投入运动的老手有些差异，新手有时甚至会认为前辈的某些努力是方向错误或是不具政治意识的，所以新人会自行建构一种她们认为的女性主义的模式。”<sup>③</sup> 而这种巨大的差异造成了以下的结果：

对长期投注心力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前辈而言，看到后进者在运动中驳斥那些自己深信不疑的价值，并改变他们奋力争取而形成的组织，总会觉得伤痛。而近期在女性主义阵营中发生的论战也伤害了某些女性的感情，尤其在“性战争”上，相对于异性恋女性与其他人，女同性恋中施虐与受虐的实践者便宣称女性应该在性欲上拥有绝对自由的权利，并指责反对性爱的人士为“香草”、“禁欲道德清教派”。<sup>④</sup>

女性主义政治世代的差异与早期的自由派或激进派并不相关，因为早期的区分，在会特的观察中，当面对来自父权的强力反挫时，两者在运动的集体活动中的意识形态的定义也是很模糊的。然而，在激进派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后进与前辈的沟通上，的确有三个重要且相互关联的议题发生干扰。第一个分裂是在女性

① 布宜克勒 (Buechler, 1990); 史泰钦伯 (Staggenborg, 1991); 傅蕾与希斯 (Ferree and Hess, 1994); 傅蕾与马丁 (Ferree and Martin, 1995)。

② 法绿蒂 (Faludi, 1991); 史耐尔 (Schneir, 1994)。

③ 会特 (Whittier, 1995: 243)。

④ 会特 (Whittier, 1995: 239)。

主义运动中女同性恋主义的重要性越来越高。这之所以会形成困扰，并不是因为在早期的激进派女性运动中女同性恋是缺席的，也不是因为激进派女性主义者反对这种趋势。而是女同性恋本身的生活形态，她们所强调的摧毁异性恋家庭的特质，还有从女同性恋的眼光出发以接近主流女性的策略性问题，都会使激进女性主义派别中的非女同性恋对于女同性恋的发声感到焦虑；第二个则是女性主义后进者所强调的，给予所有性的表达全然自由，这个制造了更尖锐的分离，因为它甚至打破了“古典”的女性主义的要求，也就是要求妇女逃出女性特质的牢笼，而强调在女性的自我表演中表达性魅力与自我表达。这当然也包括了对各种女性性欲的接受，包括：双性恋与实验性；第三个分裂则可看做是前两项的结果，年轻的激进派女性主义者，特别是女同性恋，有着更多的自信，在政治与文化价值上有更强的分离主义，却比她们的前辈更乐意与男性的社会运动合作，也愿意与男性组织结盟，通常是因为经由分离主义的阶段，她们早已建立了自主性而不会受到这些盟友的威胁。最主要的结盟是发生在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身上（譬如酷儿国，Queer Nation），他们同样受到恐同者的质疑，也同样为了捍卫性欲解放，而对异性恋与父权家庭提出质疑。即便有这些分裂，会特仍说明了新旧两股不同的女性主义仍有共享的价值，也有相同的斗争。

女性运动中的另一些内部张力则源自于女性运动正在美国打开格局，想扩大她们的议题至各个族群与阶级中。<sup>①</sup> 由于60年代的运动先锋已发现女性主义运动几乎都是白种中产阶级、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因此随后的30年间，女性主义的议题便试图串连起非裔、拉丁裔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妇女，不论是通过工会还是通过自主的女性劳工组织，女工开始捍卫自身的要求。接踵而

1. 摩根 (Morgen, 1988); 马太 (Matthews, 1989); 布鲁姆 (Blum, 1991); 巴雷特 (Barnett, 1995); 帕多 (Pardo, 1995)。



至的则是形形色色的妇女运动与朦胧不清的女性自我认同。然而根据 80 年代中期迄今的意见调查却发现，女性主义的议题广受大多数妇女的肯定也正是因为它非立基于特殊的意识形态上。<sup>①</sup>对于各个单独的或集体的女人而言，在个人或集体的诉求上，女性主义成为普遍接受的东西。

受到相同的压迫的、通过各种不同的自我认同和实践过程来自不同背景拥有相异目标的女性，开始打造新的、集体的认同：这正是将妇女斗争转化成妇女运动的关联因素。诚如会特所言：“与其说妇女运动是奠立在正式组织上，不如说妇运是来自于集体认同。正是因为集体认同提供了共享的忠诚，以至于系列的价值信仰、实践、个人的自我认同，个人、网络、组织才可能被整合进社会运动，并发展出女性主义的集体认同。”<sup>②</sup>

通过美国经验所引发的问题与答案，是否与其他国家、其他文化中的女性主义相互关联？而妇女奋斗、妇女议题是否真与女性主义息息相关？而当我们把妇女放入全球脉络时，这集体认同又将形成怎样的“集体”？

## 二 全球女性主义？

想要暂时性地回答这一基本的问题，即使是很表面地，我们都必须区分世界各个不同的区域。在西欧、加拿大、澳洲的案例中，即使有不同的强度和性格，在 20 世纪 90 年代清楚浮现出一个宽广、多样、多面向的女性主义运动正在积极成长。例如在英国，经过了 80 年代的低潮，在撒切尔主义的新保守主义的刺激下，女性主义的想法以及女性的呼声传遍了整个社会。<sup>③</sup>在美

① 史黛西 (Stacey, 1990); 会特 (Whittier, 1995)。

② 会特 (Whittier, 1995: 23-24)。

③ 布朗 (Brown, 1992); 坎贝尔 (Campbell, 1992); 葛瑞芬 (Griffin, 1995); 鹤斯特等 (Hester et al, 1995)。

国，一方面女性争取平等权，而且不断在工作、社会服务、法律和政治各方面充实壮大自己；另一方面，文化的女性主义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则强调女性的特殊性，而建立另类的女性组织。对个别认同的强调让运动有片断化的印象。但就像嘉柏瑞莉·葛瑞芬（Gabriele Griffin）所写的那样：

许多妇女团体为自己冠上特殊的名称以彰显她们明确且特殊的认同……而这也是她们积极活动的动力来源。在某种层次上，奠基于政治认同的女性主义积极实践，有着分裂片断化的倾向。在现今的政治氛围中，片断化不仅被视为具有政治象征意义，同时更是与所谓的“妇女解放运动”所倡议的同质性、共同目标以及群众动员，有着直接对立的表现。对我而言，所谓的妇运的共同目标、同质特征……等等，其实是个迷思，是个属于根本不存在的女性主义黄金时代的怀念的乡愁。90年代极为普遍的，以单一议题或单一认同结合的女性组织，或许有其局限性，然而它们所强调的独特性却更能在特别的论战与角力场上提供最多、最清楚的冲突与成果。通过个人的自我认同、生命实践、以至于整个价值信仰系列，以及与他人共享的忠诚，个人、人际网络与组织群体才可能被整合进社会运动，并发展出女性主义的集体认同。<sup>①</sup>

而单一议题诉求的妇运组织既可以致力于多重议题，而个别接受也可以同时参与各种不同诉求的组织。也正是这种个人、组织、运动战役之间的网络化（networking）交织运作，使得妇女运动充满活力、弹性与多样性。

女性主义的身影遍及欧洲各处，不论是社会机构，还是女性群体、妇女组织、创始社团等等，她们相濡以沫，为了妇女的文

<sup>①</sup> 葛瑞芬（Griffin, 1995: 4）。



化、生活处境，不懈地抗争要求，对相关事件施压。正如同美国的女性主义一般，多数的英国女性主义也极为片断化，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组织或机构假设自己可以代表全部的妇女。相反的，社会中有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关怀妇女利益的妇女的价值，从专业的政治决策到文化的表达，到政治的政党，许多都已经在妇女之间得到了起码的支持（标准通常是 25% 的领导人 and 议员，但很少达到这个数字，这也说明了女性只有不到一半的代表）。

前集权国家的社会则是另一番情况。<sup>①</sup> 虽然避孕与堕胎并不合法，有时也没有合适的渠道，但国家的确协助（强迫）妇女接受教育，进入受薪的劳动市场，并提供各种社会服务与儿童托育。在共产党严密的控制下，妇女组织遍及社会。但是另一方面，男性至上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父权制度也同样在各种机构、社会与政治领域享有尊荣。结果便是那些强悍的妇女在理解自己能力的同时逐渐成长，却也必须为了实现某些可能面必须天天与现实对抗。直到苏联共产党解体，组织性的妇运仍然非常微弱，并自限在一群西化的知识分子中间。然而现在，这些过气的组织逐渐消失，90 年代妇女投身公共领域的数量多得令人称奇。以俄罗斯为例，定位与党团成员数都略为保守的妇女党，在 1995 年议会选举中便获得了 8% 的支持率，许多妇女更是成为政治名人，而俄罗斯国内也多半相信妇女是改变政治现况的关键。1996 年，俄罗斯产生了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州长，管理科利维拉雅（Koryalaya）领地。而在平权思想中成长并有自由的空间表达个人自主性或政治性意见的新生女性，也已准备好要将个人的独立自主具体化，打造出集体认同与集体行动。因而，我们可以预见，东欧将以妇女独有的文化与政治表现形式，来达到妇运的重大发展。

工业化的亚洲则维持着不受挑战的父权制度。尤其是日本，

<sup>①</sup> 方克及穆勒（Funk and Mueller, 1993）。

虽然日本女性就业率很高，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口也很多，60年代也曾有过一连串有力的社会运动。当然，来自妇女团体与社会党的压力，使得1986年立法禁止职场中对妇女的性别歧视，<sup>①</sup>但整体说来，女性主义仍局限在学术圈内，各种专业妇女仍备受歧视，虽然结构上已经可以点燃女性主义的强力战火，但迄今仍未见可以发动社会大格局的质疑出现，这正好清楚地说明了社会的特殊性往往会决定运动的实际发展，但是却和不满的结构性的根源无关（在日本的状况中就是指其父权家庭的强度，以及男人以父权的方式行事之类）。韩国妇女甚至比日本妇女更顺从，不过现在也有妇运的萌生。<sup>②</sup>80年代晚期中国台湾强有力的妇女运动的发展，却违背了儒家思想的父权传统教导的女人顺从的必要性。<sup>③</sup>

而遍及所谓的发展中世界的情况亦是异常复杂，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矛盾<sup>④</sup>。虽然女性主义者在媒体上拥有大于她们人数的声势，但不论是政治表现还是独立自主的意识形态，女性主义总是在一小群女性知识分子之间相互流传。而在为数众多的国家中（尤其是亚洲），女性领袖不仅是该国优秀的政治人物（譬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菲律宾、缅甸以及不久后的印尼），甚至已经成为民主与发展的共同象征。虽然女性本身未必就保证会有女性情谊，或者绝大多数女性从政者仍是在父权政治的架构中从事政治活动，但是，作为女性的模范样板，她们对社会禁忌的破除与对年轻女性的冲击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都市扩张、经济危机与紧缩政策，使得人，特别是女人，面

① 盖柏及李夫-派乐 (Gelb and Lief-Palley, 1994)。

② 柏 (Po, 1996)。

③ 柏 (Po, 1996)。

④ 康妮及盖尔 (Kahne and Giele, 1992); 玛苏洛 (Massolo, 1992); 开拉普妇女团体 (Caipora Women's Group, 1993); 雅克 (Jaquette, 1994); 库柏 (Kuppers, 1994); 布鲁柏格等 (Blumberg et al., 1995)。



临了斗争或衰亡的两难处境，因而刺激了基层组织的发展。1980年迄今，由女性领导或参与的各种都会基层组织，算是发展中世界最重要的事件。而新工业与都市非正式经济中女性雇用率的升高，也确实转化了妇女意识、妇女组织与妇女处境。许多研究都已经证实了上述论点，如罗斯·卡多索·迪·雷梯（Ruth Cardoso de Leite）、巴西的玛莉亚·达·葛利亚·葛（Maria da Gloria Gohn）、墨西哥的阿历罕卓·玛苏洛（Alejandra Massolo）与芝加哥的海伦娜·尤谢琪（Helena Useche）。<sup>①</sup> 而集体的努力不仅发展起草根组织，而且也影响了政策与体制，甚而赋权女性的新集体认同也出现了。因此，阿历罕卓·玛苏洛在分析墨西哥市以女性为主的都市社会运动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历经抗争的女性主体不仅显示了经由都市冲突所召唤的新集体意识，也显现了其所打造的社会建构过程。70年代与80年代的都市运动，既显现也区隔了社会大众断裂且特殊的集体认同。由日常生活领域转战至集体行动基础的新的集体认同中，妇女是其社会生产的一部分。在建构集体认同的过程中，由都市运动发掘的女性社会性别，其复杂多义赋予了这个过程多元的动机、意义与期盼。即便当时运动成员的身份非常复杂、性别议题并不明确，而男性也占据了领导的位置。<sup>②</sup>

在大量参与全球基层运动的集体行动时，女性意识并不那么深刻明白。但作为集体行动者，她们却以明确的自我认同改变了妇女意识与社会角色。

① 卡多索·迪·雷梯（Cardoso de Leite, 1983）；葛（Gohn, 1991）；艾思皮罗莎与尤谢琪（Espinosa and Useche, 1992）；玛苏洛（Massolo, 1992）。

② 玛苏洛（Massolo, 1992: 338），卡斯特的翻译。

虽然女性主义在各国不断出现，妇女的抗争、妇女的组织也在全球蓬勃发展，但是不同的文化、机构与政治脉络仍然影响了女性主义运动所能展现的形状与方向。譬如，60年代晚期发动的英国妇女运动，便因其与工会、工党、社会主义左派、福利国家的紧密关系而备受阻挠。<sup>①</sup> 由于英国妇运比美国妇运更直接处理劳动妇女的日常处境，因此，其与国家的联系有更明确的政治性。但也由于趋近左翼政治与劳工运动，妇运便在70年代各种不同流派的社会党员与激进女性主义者共同（或彼此）的内斗下逐渐没落了。譬如，1973年便有某些女性主义者批判当时著名的“家务有给制”的抗议活动。她们认为，家务有给制隐含着接受女性在家庭中的服从性角色，甚至可能诱使妇女驻足家务领域。因此，这种企图联结劳工与社会政治的矛盾便影响了运动自身。诚如罗波南（Rowbotham）所说的那样：

相较于全球妇女解放运动，不列颠妇运与工会的关系更为紧密。但在强调工会支持将影响人们对堕胎的看法时，我们仍须进一步检验。虽然古老的工会协商室并不见得合适女性的多元欲望，但妇女解放运动也可能利用工会作为借口。虽然妇运企图避免与异性恋或女同性恋运动对立，但在妇运过程中，不仅是性的自我定义不断窄化，连与异性恋欢愉相关的讨论也只是具有防卫性质的避难所罢了。<sup>②</sup>

由于时时面对多样性以及在传统政治的策略性的理性游移，英国妇运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权时衰微。但当女性主义新生代脱离与政党或劳工联盟之间的陈旧联系时，妇运又于90年代重生。这不仅是文化女性主义或女同性恋运动，而且包

① 罗波南（Rowbotham, 1989）。

② 罗波南（Rowbotham, 1989: 81）。



含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制度化了的的女性主义，但却不是以一种领导权（霸权）地位，而是多重性表性。

西班牙妇运的政治脉络更为清楚，70年代中期，妇运兴起于反对佛朗哥独裁政治的民主运动。<sup>①</sup> 大多数妇女组织与半地下化的反佛朗哥组织相互串连，如受共产党影响的民主妇女协会（Asociation de Mujeres Democratras）、一个政治社团、主妇联盟（Asociaciones de Amas de Casa，家庭主妇协会，以地方为单位而组织起来）等等。每种政治倾向都有“各自”的妇女“群众组织”，尤其是强调革命的左派。女性主义者与妇女团体，在巴斯克郡与加泰隆尼亚（Catalunya）拥有不同的活动组织，这反映了西班牙政治分歧的现实。而在1974~1977年佛朗哥政权末期时，置身于西班牙70年代自由的政治与文化下，女性主义者也自主地集结起来。其中，最年轻创新、影响最大的，首推以马德里为基础的妇女解放阵线（Frente de Liberacion de la Mujer），虽然这个组织有极为严格的成员限制（不到百名妇女），但她们善于利用记者网络，不断冲击媒体，而使妇女要求与妇女论述普及于大众。她们不只关注堕胎权与离婚权（在当时的西班牙为违法行为），也在包括女同性恋运动的妇女性欲上进行自由表达。而这主要是受文化女性主义者以及法国、意大利着重女性差异（feminisme de la difference）思潮的影响。同时，她们也在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女性组织中争取政治上的民主。然而，就在1977

---

① 我对西班牙妇运的理解一方面来自个人直接的经验与观察，一方面来自与运动中重要女性的会谈。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几位女性，从她们身上我学到了许多东西。玛丽娜·苏毕拉（Marina Subirats）、弗兰索瓦兹·沙芭（Francoise Sabbah）、玛丽沙·葛妮（Marisa Goni）、玛蒂德法兰德兹（Matilde Fernandez）、卡洛塔芭斯特罗（Carlota Bustelo）、卡门·马丁尼兹·田（Carmen Martinez-Ten）、克里斯汀娜·阿伯蒂（Christina Alberdi）、卡门·罗蜜洛（Carmen Romero）。当然，此处呈现的资料与分析如有任何疏漏，都是我的责任。

年西班牙采取民主政治以及 1982 年社会党掌权之后，自发的妇运竟全数消失了。很明显的，这是因为她们已经获得了政治与制度层次上的成功。1981 年离婚合法化，1984 年有条件堕胎合法化。社会主义政党也创设了一个妇女机构（Instituto de la Mujer），作为一个对政府本身的游说机构。许多女性主义活跃分子，特别是出身自马德里妇女解放阵线的女性主义活跃分子，都参加了社会党，并在国会、行政院或内阁担任要职。出身自工运的社会女性主义领导者玛蒂德·法兰德兹（Matilde Fernandez）出任社会福利局局长，并以其影响力与坚强意志，加强了社会党政权中的女性目标。1993 年，克丽斯汀娜·阿伯特（Cristina Alberdi）取代法兰德兹接任了社会福利局局长，阿伯特本身也是妇运战将，不仅长期关注妇运，而且还是一位为人敬重的法学专家。第一夫人卡曼·罗蜜洛（Carmen Romero）则是社会党的强硬派，她与丈夫并肩作战，也在当选国会议员后戮力改变政党中由来已久的性别歧视。譬如，成功通过政党领袖席次的 25% 作为妇女保障名额（虽然担任公职或领导政党的妇女人数的确有所增加，但是这个承诺却未能实现）。因此，女性主义促进了西班牙妇女的法律、社会与经济状况，也加速了妇女在政治、商业与社会中担当重任，甚至在新时代彻底摧毁了传统的男性气概。<sup>①</sup>但另一方面，自主性的妇运却消失了：核心组织被掏空，只关注体制内的改革。女同性恋运动与各种不同的性关系，几乎没有说话的空间。幸而 90 年代西班牙社会的新包容势力增长，使得更新、更有文化取向以及与英国、法国女性主义者更相近的妇女运动得以兴起。同时，这个妇运也与传统政治拉开了距离，只剩巴斯克郡的妇运组织仍与当地分离运动有着自我摧毁的联系。因此，西班牙妇运显示了利用政治与制度改善妇女处境的潜力，以及成功地进入了体制、体制化之后要维持自主性社会运动的重重

<sup>①</sup> 阿隆索·查迪瓦与卡斯特（Alonso Zaldivar and Castells, 1992）。



困难。

根据妇运发展的社会脉络，我们对各类妇女运动的探索将指向意大利，在这个地方有着广受争议的 20 世纪 70 年代全欧最有影响力和最创新的妇女运动。<sup>①</sup> 毕安卡·比卡利 (Bianca Beccali) 写道：“在意大利女性主义的历史调查中，有两个清楚的主题：妇运与左派之间的紧密联合；以及平等与分化之间纠结的特殊意义”。<sup>②</sup> 事实上，就像西方绝大多数的妇女运动一样，当代意大利女性主义来自于 60 年代晚期和 70 年代早期震撼意大利的、强而有力的社会运动。但是，不同于同时的其他运动，意大利女性主义运动不仅涵括了意大利工会中举足轻重的流派，而且也获得了意大利共产党的支持与认同。意大利共产党是共产世界外最大的共产党，也是意大利拥有最多党员的政党。于是，意大利女性主义在 70 年代成功地在广大妇女（包括劳动阶级女性在内）中间推广她们的论点。经济的要求与平等权的要求则与女性解放、对父权制度的批判、在家庭以及社会中对威权的颠覆紧密结合在一起。然而，女性主义与左翼的关系，特别是与革命的左派的关系是不易维持的。事实上，在 1975 年 12 月，最庞大也是最激进的极端左翼组织——“持续战斗” (Lotta Continua) 的自治警备队 (the Servizio d'ordine) 坚持要保护“持续战斗”中的妇女在罗马的示威，而当女人拒绝了他们的保护时，他们便动手打了这些女性，这个事件导致了女性从这个组织中分离以及“持续战斗”本身则在几个月后的解散。相对于共产党，受共产党启发的

---

① 在一个广大的尺度上，我对意大利女性运动的了解来自于我的朋友以及劳拉·芭布 (Laura Balbo) 的谈话，还有在整个 70 年代中米兰、杜灵、威尼斯、罗马和那不勒斯对社会运动的个人观察。毕安卡·比卡利 (Bianca Beccali, 1994) 则对这个运动的最新分析，提供了极好的概说。关于运动的形成期以及在 70 年代中的发展，则可参考厄卡司 (Ergas, 1985) 和波本 (Birbaum, 1986)。

② 比卡利 (Beccali, 1994: 109)。

组织“意大利女性工会”（Unione delle Donne Italiane, UDI）日渐增加的自主性，最后在1978年导致“意大利女性工会”的自我解体。然而，整体来看，在女性组织、工会和左翼政党（除了社会主义者之外）之间，还有政党与工会领袖对女性议题，甚至对女性主义论述的大量接受度，有许多的连结。从整个欧洲来讲，这种密切的合作产生了（1974年由公民投票决定）离婚以及堕胎的合法化。在70年代，有好长一段时间，这种政治的合作共同推动了女性团体的增加，它提出了女性自主、女性在文化上的差异、性关系和女同性恋议题，并形成另一个趋势，同时也与政治及阶级斗争的世界互动。而且，

（在70年代）最后10年间，女性主义开始走下坡路，而在80年代初期，作为运动的女性主义实质上消失了。无论是在个人还是社区共同体的本质上，在女性主义鼓吹者不断地把她们的精力投入个人工作和经验的同时，女性主义在政治斗争中失去了可见性，而且变得越来越片断和失去联系。然后，在追随70年代另一个“新社会运动”的范例之后，“新”女性主义运动变成了只是另一种生活方式政治的形式。<sup>①</sup>

为什么会这样？虽然我并不反对她的观点，但我也不会用我的话来硬套她的说法。一方面，意大利女性达成了实质法律与经济的改革，大举投身于劳动与教育机构，削减性别歧视。而且更重要地，削减控制生活的天主教教会所运使的传统权力。于是，由左翼分子、工会和女人所组织的公开、透明的战争终能轻松获胜。诚如意大利平权法案不如英国一般，比卡利便认为没有最终的胜利。同时，妇女运动和左翼之间的密切连结，却因左翼本身

① 比卡利（Beccalli, 1994: 86）。





的危机，引发了女性主义的政治危机。活在马克思幻想（用惊人的天才和想像力建构出来，于是建构了一个更为不自然的人造天堂）之中的革命左派在 70 年代后期分裂。劳工运动并未面临像在英国和美国那样的新保守主义的反挫，而是 80 年代面临全球化与科技变革的新现实，且必须接受意大利资本主义国际相互依赖的限制。在实际上以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 Romagna）为模型的网络化经济，以严重削弱大工厂和公共部门中工会的协商力量作为代价，使得意大利的小工厂更灵活和更具竞争力。共产党在其权力的角逐中被由社会党所领导的反共产党阵线以细微的差距超越。社会党利用权力的杠杆非法地资助自己来达成他们的夺权（*sorpasso*）的梦想（即在公众投票中击败共产党）；而法律系统在他们超越共产党之前就逮到他们，但同时，共产党已经不再是共产党了，加入了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在她们的政治态度上，意大利的女性主义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地回到家庭。然而，并不是回到她们丈夫、父亲的家，而是女性之家（*House of Women*），回到多元而充满活力的女性文化。这是 80 年代晚期前就已重构的女性主义，强调不同也怀抱平等。露西·艾瑞加蕾（*Luce Irigaray*）和安德瑞莉·瑞奇（*Adrienne Rich*）取代了毛泽东和亚历山大·克隆台（*Alexandra Kollontai*），成为知识上的参考点。但 90 年代，特别在由左翼控制的地方政府之中，新女性主义团体仍然连结着女性主义论述和妇女的需求持续发展。在最具创意、也最积极的选举中，关切时间的再组织化，从上班时间到店铺和公共服务的开放时间，制定弹性的时间表来配合妇女的多重生活。在 60 年代，来自贝鲁·奇康尼（*Berlusconi*）和新法西斯主义者的政治威胁，要求重建传统家庭价值下，包括了目前的社会党、1996 年时仍为共产主义的左翼民主党（*Partito Democratico di Sinistra*）的中间左翼政治联盟权力的出现，开启了制度变革的创新之路。这一次，在分散的、自主的妇女运动的基础上（妇女）已学到如何“与狼共舞”的教训。

因此，女性主义及妇女的斗争，长久以来总是在人类经验的整个背景下起伏不定，新的形式、新的表现，增加与各种反抗支配的抗争的相互连结，同时也要维持政治制度化与文化自主性之间的张力。而女性主义发展的脉络，在不同的论述与形式间也塑造了运动。因此，我深信，建构各种认同的目标与价值的（基本）必要核心，便是渗透在女性主义中的文化上的多声音乐。

### 三 女性主义：引导性的多元声音<sup>①</sup>

女性主义运动的力量与生命力，在于其多样性，以及它对于不同的文化及年龄的适应性。我们必须先承认此多样性，方能试着找出各种运动之间分享的基本对抗对象以及本质转换等核心。为求通过此多样性而读出一些意义，我提出了女性主义运动的一种分类法。此分类乃根据观察各引证资料，配合第二章提过的杜罕（Touraine）社会运动分类而得。此分类的运用是分析性，而非描述性的。并未能尽述 90 年代女性主义在不同国家及文化之间的各种面向，且一如所有的分类，是简化所得；着重于女性在艰难处境下的作为。因为女性已正当地反击她们在历史上长期被分类、被标示成物体而分主体的处境。更有甚者，特定的女性主义运动及运动里的各个女性，在其经验与抗争中常纵横于各式类别，混杂了各种认同、抗争的对象以及自我认同的目标。此外，有些分类可能代表着女性主义的隔阂，不过我认为它们在分析上仍有相关性。总而言之，我相信研究图表 4-1 中列出的差异是有意义的，即以女性主义运动多样性为必要的起点，探索女性主

<sup>①</sup> 评价女性主义运动的主调时，我无意对女性主义者中间辩论的丰富性扮演裁判的角色；亦无能度量理论与地位的全境，经由这些理论与地位，现已可深入了解压迫女性的来源，以及自由解放的康庄大道。此处我的分析整合乃为了本书的理论意图：阐述社会运动——宣告着认同的绝对，与网络社会——当今信息时代新的支配结构，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若要说我这一段的率先声明听起来具防卫性，那么它的确是没错的。



义运动的共同性。

在列出的类型中，我同时列举了集体行动与女性主义中辩论过的个别论述。这是因为，如上所述，女性主义并不在好战的抗争中消耗己身。女性主义同时是——且往往基本上是——一个颠覆着女性在男性历史中地位的论述，从而转化了时间与空间在历史主流中的关系，如同艾瑞加蕾（Irigaray）所言：

神祇，首先创造了空间……神祇本身即是时间，在空间与地方的行动中外化他自己……什么会被转化成性别差异？当女性经历着通常意味深渊与黑暗的空间……男性则经历着时间。向新时代的过渡要求我们对空间与时间、地方的栖息以及容器或说是认同的外皮等种种知觉与概念进行改变。<sup>①</sup>

由女性揭竿起义，引出了这些过渡与改变。其中一些列于图表4-1。我将以我的诠释试着阐明其内容。

**捍卫女性的权利**乃女性主义的底线。的确，任何形式的女性主义都包含此基本宣言，以标准女性主义的论述来说，意味着女性是人类，而非玩偶、物体、东西或者动物。就此概念而言，女性主义确实是人权运动的延伸。此运动以两个面向出发：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然而其中包括的变形转换形式可能令人惊诧地在思想上尖锐对立。的确两者并不相同，但就认同的部分而言，两者皆主张女性的权利与男性均等。两者对父权根源的分析迥异；对于重新塑造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以及在自由民主的规则下运作，以求成就平等的终极目标，两者的信念亦不相同。两者在女性权利的论述部分，两者皆包括经济权及生育权。两者皆把赢得这些权利当成运动的目标，但其强调的策略与运用的语言可能有严重的分歧。社会女性主义者认为对父权的抗争乃消除资本主义的必

<sup>①</sup> 艾瑞加蕾（Irigaray, 1984/1993: 7）。

图表 4-1 妇女运动的分析类型学

类型	认同	对手	目标
女性权利 (自由、社会主义)	女性身而为人	父权国家以及/或 父权资本主义	两性平权 (包括生殖权)
文化女性主义	女性社群	父权制度与价值	文化自主性
本质主义女性 主义者(唯心论者、 生态女性主义者)	女性存在的价值	男性存在的价值	母系自由
女同志女性主义	性/文化上的姊妹情谊	父权的异性恋	经由分离主义 来消除性别
女性的特殊认同 (种族、民族、自我 定义的:例如黑人 女同性恋女性主 义者)	自我建构的认同	文化支配	去性别的多 元文化论
实践取向女性主 义(劳工、社区自 我防卫、母亲)	被剥削/虐待的妇女/ 家庭主妇	父权资本主义	生存/尊严

要连结；而自由女性主义对于社会经济的转变抱持较怀疑的态度，着重于由其他的目标推广女性独立。

文化女性主义(culture feminism)试图在体制与价值观皆属对抗目标的父权社会中，建立另类的女性体制、自由的空间。文化女性主义常与“求差异的女性主义”连在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本质论。其论述起始于重申女性是不同的，主要源于她们各异的历史；且唯有通过建构自己的社区，方能重建认同以及找到己身的道路。许多情况下它意指与男性区隔，或者至少是与男性支配的体制区隔。但不一定会延伸成女同性恋，或与男性决裂。文化女性主义着重于建立文化自主，作为反抗的基础，从而激发女性对于独特价值观的需求，例如非竞争性、反暴力、合作以及人类经验的多元面向；以导引新的女性认同及女性文化，诱导出社会文化广泛地变化。



在激进女性主义的源头，“意识觉醒”运动与文化女性主义连结，促成女性组织与体制的整体网络，并成为女性间自由、保护、支援且不受束缚的交流，例如女性书店、医疗机构、女性合作社等。当这些组织为女性提供服务，且为女性权益动员的多样性提供组织工具，它们也同时制造、散布了另类文化，建立起独特的女性价值观。

本质女性主义 (essentialist feminism) 更进一步，同时宣告女性本质上就与男性不同，此差异根植于生物性、并/或存于历史；且女性情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道德与文化上均较优越。在弗丝 (Fuss) 的陈述中，“本质论可落于彰显纯净或原始的女性气质、女性的本质；超越了世俗的界限，因之未被（也许是通过被压抑）父权规则污染。”<sup>①</sup> 以露西·艾瑞加蕾 (Luce Irigaray) ——本质女性主义中清晰且有影响力的发言——为例，在《靠我们的言说，我们是女人 (by our lips we are women.)》<sup>②</sup> 中她写道：

要我怎么说？我们一开始就是女人。我们无须靠他们转成女人，无须让他们贴标签，无须被他们神圣化或加以褻渎。不靠他们的努力，一切总在发生。而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故事，构成了我们错置的轨迹……他们的财产是我们的放逐；他们的钳制使我们的爱死亡；他们的语言阻挡我们无法发声……让我们快点创造自己的语汇，如此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能永恒相系……我们的力量寄托于我们特别的抵抗力。长久下来，如今他们已经了解到我们的顺从早应得到他们的回报和赞赏。何不让自己快乐呢？而不是让自己顺从于他们的烙印，而不是被限制、被定型、被僵化。分离……我们能

① 弗丝 (Fuss, 1989: 2)。

② 艾瑞加蕾 (Irigaray, 1977/1985: 210)。

不靠模式、标准或规范而行事，让我们永远不要规范、命令或限制自己，让动员一起行动成为我们惟一的律令。永远别给彼此制订规则，也别道德化，甚或引发战争。<sup>①</sup>

解放意指“让每个女性都‘意识’到一个事实，她在她个人经验中所感受的，乃所有女性共享的情境，如此使得此个人经验政治化。”<sup>②</sup> 接受身体的独特性之后，女性不再受生物学束缚，相反地，得以脱离男性忽略真性的定义。在男性的秩序里，女性将被永久歼灭，因为她们被定义于她们原始的、身体的经历之外：她们的身体被重新诠释，而她们的经历被男性重新诠释。<sup>③</sup> 惟有在她们生物学与文化独特性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其认同，女性才能成为自己。

以意大利女性主义在 80 年代早期的复兴为例，其标志部分为主张女性的差异性，以及首要的重点在女性生物与文化的独特性基础上重建女性的认同。一如由米兰的女性书店出版、广为流传的手册《女人比男人更多》（“Piu donne che uomini”）中所表达的。手册试图陈述女性在公共领域中行动的无力，强调女性致力其个人化的必要性，而其个人化主要是由生物特性所决定的。此手册在意大利女性中间获得了广泛的回响。<sup>④</sup>

另一个本质论的支流将女性情谊连结至历史与文化，并且宣扬母系社会黄金时代的神话，在黄金时代里，女性的价值观以及对美德的崇尚，确立了社会的和谐。<sup>⑤</sup> 精神主义与生态女性主义也是本质女性主义中最璀璨的一群。结合生物与历史、自然与文化，宣告着建构于围绕女性价值以及与自然合一的新

① 艾瑞加蕾 (Irigaray, 1977/1985: 215 - 217)。

② 艾瑞加蕾 (Irigaray, 1977/1985: 164)。

③ 弗斯 (Fuss, 1989)。

④ 比卡利 (Beccalli, 1994)。

⑤ 墨坎 (Merchant, 1980)。

时代<sup>①</sup>。

本质主义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已受精神上的攻击，包括政治领域，以及相对的知识层面。政治领域的争论在于<sup>②</sup>，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本质化，会陷入父权制度的传统价值；且合理地将妇女留在她们的私领域，而该处必然是在低下的位置。知识层面部分，唯物论的女性主义者，例如克丽丝汀·戴尔斐（Christine Delphy）与摩莉克·魏庭格（Monique Wittig），认为解剖上的性别乃社会建构出的。<sup>③</sup>在她们看来，压迫并非由生理性别造成，反之，是压迫创造了生理性别。女性情谊乃男性的分类，且自由惟存于无性别化、消弭了男性/女性二分法的社会。

无论如何，宣示女性无可替代的独特性，以及以女性价值观重建社会的意图，在女性及女性主义者中间确是无可否认的诉求，提供了连结供以通往精神主义的强大趋势以及信息时代激进生态主义特征。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lesbian feminism）曾是过去几十年间在发达国家（且不只在美国）成长的最迅速且最强悍的女性主义运动，由许多团体组织和存于众多的女性主义运动内的核心小组及志同道合者组成。绝不可将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归化为特定的性别方针。安菊恩·瑞奇（Adrienne Rich）提出“女同性恋延续性”（lesbian continuum）此一注记，以涵括女性经验的广阔光谱，光谱上标志着女性所受父权与强迫性异性恋不可分割的体制压迫，以及她们对此的反抗。<sup>④</sup>的确，1970年的美国激进女同性恋宣言中，开启了下述宣言：“女同性恋为何？女同性恋乃所有女性凝聚至爆发点的怒涛狂流”。<sup>⑤</sup>就此而论，女同性恋主义激进地、

① 史普利纳克（Spretnak, 1982）；易普斯坦（Epstein, 1991）。

② 比卡利（Beccalli, 1994）。

③ 戴尔斐（Delphy, 1984）；魏庭格（Wittig, 1992）。

④ 瑞奇（Rich, 1980/1993）。

⑤ 引自史耐尔（Schneir, 1994: 162）。

自觉地与男性（压迫的来源）区隔，是自由解放的论述与实践。这解释了许多女性选择女同性恋主义，成功地以不妥协的方式面对男性的世界，表达她们的自主性。摩莉克·魏庭格说：

无论是有意地还是无意识地，拒绝成为（或继续保持）异性恋者永远意味着拒绝成为一个男人或是女人。对女同性恋来说，这比拒绝“女性”的角色要更进一步。代表着对男性经济、思想及政治权力的抗拒……如同美国脱逃的奴隶挣脱了奴隶制，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挣脱了阶级，变得自由。这对我们而言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的生存全靠我们竭力解构男性配置给女性的阶级。惟有伴随着异性恋社会体制的瓦解，才能达成此目标；而异性恋社会体制根源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制造出性别差异的教条，更将压迫合理化。<sup>①</sup>

由于异性恋是首要的对抗目标，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在男同性恋运动中发现了潜在的——即便是两极的——联盟（如后所述）。

女性主义运动正逐渐地划分成女性主义认同的多样性，构成许多女性主义的基础定义。就像我之前讨论过的，在社会矛盾与力量角力的动态中，社会的特征是有弹性的网络与易变的联盟组织；故在此种社会里，女性主义认同的多样性是力量，而非软弱的源头。这些认同乃自我建构而成，通常以族群、甚或国别筑出壁垒。黑人女性主义，美裔墨西哥人女性主义，日本女性主义，黑人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虐/被虐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或者以地域/族群定义自我，例如英国的南厅黑人姊妹团（the Southall Black Sisters in England），<sup>②</sup> 都是有着无尽自我定义认同可能的

① 魏庭格（Wittig, 1992: 13~20）。斜体为作者所加。

② 葛立芬（Griffin, 1995: 79）。





佐证。经由这些，女性在运动中看见自己。<sup>①</sup>如是，她们反对将女性主义标准化，视此为文化支配的新形式，无异于父权逻辑，在女性经验确切多元性上过分强调形式主义。有些例子中，自我认同始于运用笔名，好比黑人女性主义作家贝尔·胡克（bell hooks）所阐发的那样：“我选用 bell hooks 这个名字，因为它是一个家族名，因为它铿锵有力。童年期间，这名字被用以诉说一位坚强女性的记忆，一位说出了自己心声的女性……自称此名，使我的声音得以连结至祖先的遗产，女性发声以及女性的力量”。<sup>②</sup>因此，自我建构认同并非本质的表达，而是穿透女性的力量，使她们能如所向往地被动员。宣示认同即是制造力量。

我刻意挑选一个具争议性的词汇——实践的女性主义者（practical feminist），这个词汇代表了今日世界里女性斗争的宽广洪流，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以及工业化国家中的工作妇女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状况。当然，所有的女性主义者都是实践家，每天以不同形式颠覆父权制度的基础，捍卫妇女的权利，或揭穿父权论述的神秘。但亦有许多女性实践却不见得标榜着女性主义，甚或未有对抗父权制度的意识。因而引出疑问：女性主义能否自外于女性主义意识而存在？难道全世界妇女为了她们的家庭（主要意指她们的小孩）、生活、工作、居所、尊严所作的抗争及组织，不是实践女性主义？对这议题我颇为踌躇；对拉丁美洲本地人民的研究，以及对世上其他地区状况的研读，更加深了我的矛盾，故只能将之转达。<sup>③</sup>

另方而看来，我倾向于阶级的古典判准，即“没有阶级意识就无所谓阶级”；以及以价值观与欲达成的目标来界定社会

① 会特（Whittier, 1995）；捷瑞特·马克利（Jarrett-Macauley, 1996）。

② 胡克（hooks, 1989: 161）。

③ 这议题曾有几位女性主义历史家讨论过。我对“实践女性主义”的分类趋近于她们所称的“社会女性主义”；详见欧芬（Offen, 1988），以及寇蒂（Cott, 1989）。

运动，作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就此观点而言，发展中及未发展国家中的女性抗争与组织，其论述或运动的目标绝大多数缺乏女性主义意识；且更重要地，并未明确地反抗父权制度与男性支配。其女性运动中普遍缺乏文化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或性解放等的话语；不过也并非完全没有，好比台湾女同性恋运动揭示的经验（如后所述）。迄今，总的来说，显然地发展中国家女性主义仍然多仅只于精英分子。如此带给我们女性主义与女性抗争之间更根本的分裂，亦含北/南差异的隐意。的确，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妇女论坛显现了此分裂的征兆，且由某些利益团体、名为“半月圣战（Crusade of the Half Moon）”者扩大、强化，该团体由教廷与伊斯兰教徒组成，联手反击女性主义与女性的生育权。

反之，通过集体行动，全世界的女性将她们的斗争与压迫连结至日常生活，她们把家庭中处境的转变与她们介入公共领域二者连结起来。在海伦娜·乌塞奇（Helena Useche）报道自社会研究积极分子陈列中的女性故事中，让我们听听由她录制的波哥大（Bogota）贫民区里一位妇女的访谈：

近年来，女性使自己被注意到，而且现在男人尊敬我们。只因为同伴（阴性）（companero）的意思并不只把女性当成在家里煮饭、清扫、烫衣服，也把她当成个同伴（阳性）（companera），对财务有所贡献。因为现在很少看到丈夫告诉太太：我出外工作，你待在家里。我们解决自己问题的方法，例如建造花园、帮助其他女性、让她们了解人们的处境。从前女性对这个完全不感兴趣。如今我们不仅关心身为母亲，也在意要知道如何適切地去做。<sup>①</sup>

① 艾丝皮诺莎与乌塞奇（Espinosa and Useche, 1992: 48）、卡斯特译。



这是女性主义吗？这也许是存于文化转译，并非介于不同语言或大陆之间，而是在不同的经验之间的议题。也许女性斗争与组织，以及女性主义论述与辩论的平行发展，仅是运动历史性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且借着两个组件之间的相互配合与交替作用转化，或将完满发展，遍布全球。

如果女性主义如此丰富多样，甚至可能包括在运动中并不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甚或反对此名称的女性，那有必要继续保留这个词汇 [ 毕竟这个词是由一个男性查理·傅利叶 (Charles Fourier) 发明的 ]，或者宣称女性主义运动的存在吗？尽管如此，我相信是的。主要理论原因是：在图表 4-1 中所提及的各式女性主义中，经由斗争与论述，运动的基本任务乃是借着去除社会的性别体制，以解构/重新建构女性的认同。女性的权利揭示于女性是自主的主体 (subjects)，既不同于男性，也不同于父权体制指派的角色。文化女性主义打造女性社区共同体以激起意识，并重建人格。本质女性主义确认女性不可剥夺的特殊性，而且宣示女性自主的、优越的价值。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借由反对异性恋，使现存构成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性别分界不再有意义。无论是真实还是虚幻，在女性实际的经验基础上，女性的多重认同重新定义了事物存在的方式。女性的求生存与尊严的斗争激励着女性，从而颠覆了父权化的女性——顺从是她们的显著特征。以不同的形式，经历不同的路径之后，女性主义模糊了根植于社会体制与社会实践中的父权制的男/女二分法。如此，女性主义建构了不仅只是单一一种的认同，每种认同借由其自主性存在 (autonomous existence)，在个人生命经验的全球国际网络中攫取了微观权力 (micropower)。

## 第四节 爱的力量：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解放运动<sup>①</sup>

任何文化或政治的论述建构中，若将女同性恋的存在看成边缘或较不“自然”的现象，仅将其视为“性偏好”，或是当成异性恋或男同性恋关系的镜像，那么都由此深深地削弱了……对于强迫女性为异性恋的女性主义的批判，缺席已久。

——安莉恩·瑞奇，《强迫性的异性恋与女同性恋的存在》（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第229页。

① 此处呈现的分析并不包括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研究的议题（issues）和价值（values），也不包括他们与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而只聚焦在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的运动，以及通过性解放运动对父权制度造成的影响。每个运动我都选用一个个案来表达其特殊性。一方面我将讨论90年代崛起于台北且深具影响的女同性恋运动，以及女同性恋运动与妇运、男同性恋运动之间的交互作用。我以谨慎的态度将女同性恋性解放的场景由北美与西欧挪出，并强调女同性恋运动在中国如此父权的文化中逐渐增加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将分析旧金山男同性恋社群的发展与成形，无疑地，这是全球最有影响力、也是曝光率最高的男同性恋社群/运动。台北女同性恋运动的资料，主要来自于我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优秀的博士生柏兰芝（Po, 1996），她也是台北女性主义运动中活跃的战将。我也将来自个人知识与台北渠道所形成的对台北的理解，书写在论文中，而这我要特别感谢那幼田和夏铸儿。旧金山的部分我大多仰赖80年代与凯伦·墨菲（Karen Murphy）共同执行的田野研究（Castells and Murphy, 1982; Castells, 1983: 138-172），也加上对于近期发展的观察。本文并没有对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议题进行详尽的回顾，若想参考英语书写的学术研究书目，见阿比拉芙等（Abelove et al., 1993）《女同性恋、男同性恋研究读本》。



我们的运动刚开始也许仅是少数人的抗争，但如今我们试着“解放”的是整个人类的个人生活状况——性表达。

——约翰·迪艾米利欧 (John D' Emilio), 《资本主义与男同性恋认同》(Capitalism and gay identity) 第 474 页。

父权主义需要强迫的异性恋，而文明则奠基于性的压抑与禁忌。诚如福柯所论述的那样：性，是社会的建构。<sup>①</sup> 欲望的调节，构成了社会制度的基础，因此也通往逾越与组织的支配。若从人们潜藏的经验去观察人类的史诗，将发现欲望、压抑、服从、逾越与惩罚所形成的无尽循环，算计着人类的热情、成就与失败。父职与母职虽在支配的系统下连结共生，但家庭只与异性恋假设单薄地串连，一旦异性恋假设受到挑战，家庭将会全盘崩毁：若我们质疑受控制的性与物种繁衍间的连结，破坏与分裂女人的性劳动的性别分工，那么姊妹情谊与女性叛乱便有机会出现；而当男性结合损坏了男性情谊，我们便可破坏男性支配的制度的文化一致性。男同性恋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中偶被允许（如古希腊），<sup>②</sup> 女同性恋却在绝大多数的人类经验中持续受到压迫，因为，她们抵抗异性恋。诚如安菊恩·瑞奇所言：

放眼历史情境的各种文化，女性总是在各自的脉络中担起独立、非异性恋、以女性为中心的存在，因为她们相信自己是应当要这样做的“唯一人选”。虽然，经济状况让绝大多数女性无法脱离婚姻；而未婚女性也会受到诽谤、嘲讽等社会制裁：成千上万的寡妇与老处女被焚烧与拷问，如同欧

① 福柯 (Foucault, 1976, 1984a, b)。

② 哈普林等 (Halperin et al., 1990)。

洲 15 世纪至 17 世纪的猎杀女巫时期。<sup>①</sup>

男性同性恋情欲被限制在某个特殊的时空中，譬如对青少年冲动的“佯装不知 (knowingly ignoring)”，以及特殊情境的暗喻（譬如，歌德教堂的宗教秩序）。由于男性意图维持他们的性别、阶级与种族特权优势，所以只得用高度的社会选择去压抑同性情欲。由于父权制度的基本规范以及现在是环绕异性恋家庭组织起来的生活，因此，男性对同性的欲望只有保持在社会后巷、不被知晓的状况下才能维系。

虽然各个历史文化都曾反抗强迫异性恋，但只有最近 30 年才出现性自由的呼喊以及捍卫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权力的社会运动。这个运动始自 1969~1970 年的美国，继而盛行于欧洲，最后终于漫烧全球。为什么发生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一些共同因素、甚至是特殊缘由来解释这两个运动发展的时机与环境。

虽然女同性恋总与男同性恋结盟以对抗异性恋女人的文化宰制，但女同性恋运动却也是妇女运动的组成要素。当女性主义对性别化制度的批判瓦解了正统的父权制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性规范的批判。尤其是对那些置身妇女运动却希望拥有全方位认同的女性而言，这样的发展非常正常。此外，将男性指称为女性受压迫的源头，也使女性难以与其“阶级敌人”分享感性的和性的伙伴关系。因此，许多妇女便会倾向女同性恋运动的论述表达。

对于男同性恋而言，他们愿意参与运动则与三个一致的因素相关：60 年代强调自我表达与质疑威权的社会运动风气，让大家有机会对平常未曾思索的议题去思考行动，譬如“站出来亮相”；而妇女运动对父权制度的冲击，则使得大家质疑女性以及男性，因为他们只能存在于这个二元对立却彼此支持的社会分类

<sup>①</sup> 瑞奇 (Rich, 1980/1993: 230)。



中；最后则是恐同社会对于同性爱恋的残暴压制，即使男同性恋只是想要一间简单的睡房。<sup>①</sup>

在我的观点里，还有三个原因诱使同性恋运动在美国与全球蓬勃地发展。第一个原因是结构性的：大都会地区中，先进信息化经济的形成引导出多样创新的劳动市场与弹性的企业网络，以至于可以在各种技术阶级中创造新工作，并使个体自大型组织中独立出来；第二个原因则是性解放运动作为60年代运动的主题自有其普遍的接受度。譬如，1968年5月，巴黎发生社会运动。身为近距离观察者（当时我在发起运动的南特 Nanterre 校园担任社会系的助理教授），我认为当时激进的学生运动其主要诉求便是性解放与自我表现两项。实际上，这个运动起源于男女联合要求校方让他们自由进出宿舍。为了维系士气，在布条上面写着性解放的字眼，对法国与美国而言，要求欲望自由，便是策动60年代社会运动的趋力，而整个新的时代都在呐喊中感受新的生命。然而真正的性解放是有限制的。因此，性行为的解放不仅质疑异性性行为，也打开了探索逾矩的性活动的大门：譬如成长迅速的、为清楚意识形态接合的性虐/受虐运动。

而引发男同性恋运动与女同性恋运动的第三个因素，则有一点矛盾：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挑战，造成男性与女性在物质与心理上的分离。我的意思并不是男女与自己的异性恋伴侣感到不耐烦，而使得男性成为男同性恋，女性成为女同性恋。实际上同性性行为有着完全独立于异性性行为的发展模式与存在。女性主义的挑战，以及多数男性无能面对失去特权的情境，共同强化了同性友谊与支持网络的重要性，从而开展了一个适于各种欲望表现的氛围。

最后，虽然同志运动的核心是性解放运动，但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不仅仅是情欲偏好而已，相反的，他们更是根本的认同。甚至，他们是两种完全相异的认同：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诚如

<sup>①</sup> 迪艾米利欧 (D' Emilio, 1983)。

各种认同，同志情欲并非既定的，也不是来自于生物决定论。虽然生理素质倾向的确存在，但大多数同性性关系仍混杂着各种感情与冲动（见图4-10）。因此，文化行为、自我认同与社会互动的界线，都是文化地、社会地以及政治地建构。由于建构认同是这么特殊的政治性过程，我将仔细讨论台北的女同性恋运动与旧金山的男同性恋社区。

### 一 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和性解放运动在台北<sup>①</sup>

20世纪90年代台北的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解放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基本上，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一样，台北的女同性恋运动是在妇女运动中成长的。在（半）强权政治的脉络以及深刻的父权文化中，这个对台北年轻女性影响深远的运动，展现了全球认同政治对传统的穿透力。

台湾的妇女运动始于1972年。创始人吕秀莲，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当时正从美国念完硕士回台。她筹组妇女团体，设立保护你专线，并成立拓荒者出版社出版女性议题的书籍。吕秀莲的新女性主义呼应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主题，亦即妇女应参与劳动市场，反对性别歧视以及对女性角色的限制。“先做人，再做女人”、“女人要走出厨房”、“反对性别歧视，发展妇女潜能”是这段时期重要的口号。同时，她强调她的新女性主义的本土性，反对有些西方女性主义“消除性别之分”的主张。她强调“是什么，像什么”、“女人不能忘了自己永远是女人”。70年代末，吕秀莲加入了当时党外的政治反对运动。美丽岛事件后，吕被捕入狱。新女性运动虽在镇压下被迫沉寂，但运动所组织起来

<sup>①</sup> 我对台北女性主义的分析，主要根据柏兰芝（1996）的研究。除了她自己的观察之外，她部分亦根据1996年4月20号在台北市国立台湾大学的研讨会“欲望新地图：文学、文化与性导览”中的论文（中文），以及《妇女新知》杂志（1995；no. 158-161）对于女性主义与同志主义关连的特别专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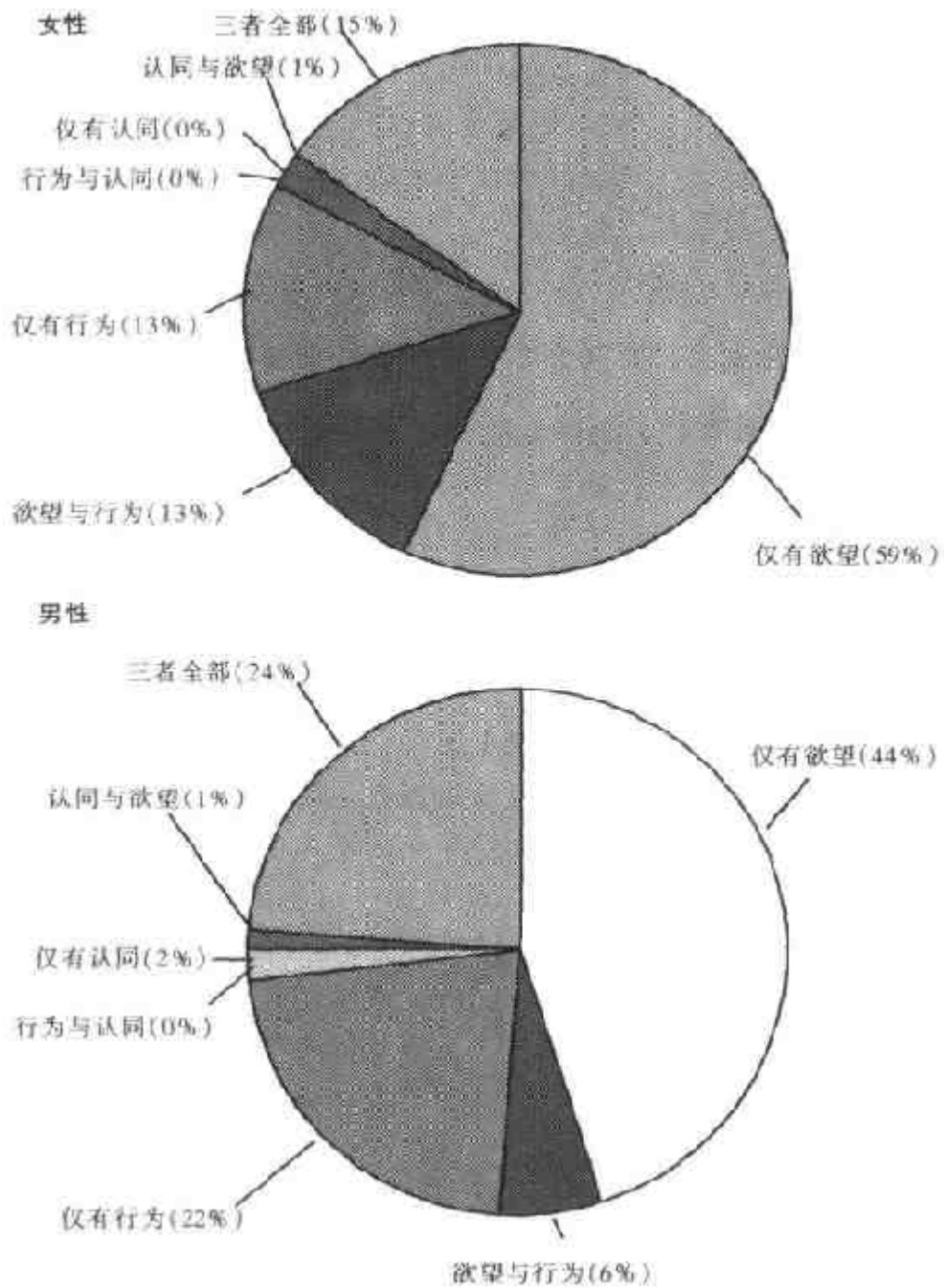


图 4-10 同性性关系不同向度之间的相互关联性

访问了 150 位女性(占 1749 人之中的 8.6%)关于成人的同性性关系；访问了 143 位男性(占 1410 人之中的 10.1%)关于成人的同性性关系  
资料来源：Laumann 等人(1994)。

的网络仍然存在，使第二个妇女运动得以在 80 年代成长。1982 年，一个小团体创办了《妇女新知》杂志，以表达女性意见、争取妇女权益为宗旨。1987 年 1 月，数百位群众参与的华西街游行是女性首次占领街道、抗议台北的色情产业。而在压制台湾社会数十年的戒严令在七月解除后，《妇女新知》杂志正式成立为基金会。它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台湾妇女斗争的实例：混杂自由主义的主题、激进的动机以及支持所有女人自发性的主张。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一波波自发性的运动风潮下，各种不同议题的妇女团体相继出现。离婚妇女、家庭主妇各自有了自己的团体，专司救援雏妓的组织也成立了。媒体开始报道这些团体的活动，增加了它们的能见度，并吸引了众多女性的注意，尤其是台北的知识妇女或专业者。

随着 90 年代民主政治生活的登场（事实上，反对党赢得了台北市长的选举），一个多元的文化倾向的社会运动也在台北萌芽。妇女运动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逐日增长，其内部也开始分化。关于争取女性权益、支持妇女劳工以及表现新的女人认同（包括女同性恋），开始有了不同的讨论和实践。大学校园已被女性主义者占领。1995 年 5 月，台大女性研究社社长击败国民党以及进步学生阵营的候选人当上学生会会长。而在校园外，已婚妇女们也在台湾新的社会脉络中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包括“家庭”的观念、民法亲属编的修正等。

在这种激越的文化气氛以及女性主义理念走势上扬的脉络下，一些年轻激进女性主义者开始引介女同性恋论述。“歪角度”散播并译介激进女性主义及女同性恋理论，如欧黛瑞·罗德（Audre Lorde）、安菊恩·瑞奇、盖儿·鲁彬（Gayle Rubin）、克莉丝汀·黛尔斐（Christine Delphy）等的作品。追随罗德的理念：情欲就是力量（*erotic as power*），一种环绕女性身体和性的新认同政治浮现了。伴随着校园内女学生团体的兴起，第一个女同性恋团体“我们之间”也于 1990 年在台北诞生。



1994年5月22日，女性主义者发起了一个反性骚扰大游行。大约800~1000个女人参与了游行，大部分是女学生，从台大门口一路游行到市中心的立法院。在行进中，何春蕤，一个鼓吹性解放论述的女性主义学者，即兴发明了一个口号：“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游行参与者兴奋地把这个口号喊了又喊，回响在大街上的呼声震荡了父权的台北市，该口号并且成为许多报纸次日的头条新闻。这个意外引爆却快速蔓延的话题引发了妇女运动内部的辩论。当妇女运动正逐渐得到合法性和社会的接受，正在致力改善妇女的处境促进两性平权的时刻，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让大众理解妇女运动为一种性解放运动不但令人难堪并对运动具有潜在的毁灭性。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西方的性解放运动对女人是个陷阱，到头来只便宜了男人。她们因此发明了“身体自主权运动”来取代性解放论述。另一方面，何春蕤以及其他女性主义者则声明女性主义取向的性解放之必要，女人的解放和女人的性的解放必须被同时处理。她们认为，性解放运动展现女人对其身体的自由掌控，是挑战父权文化的激进途径。而在女人的性解放运动的行动中，也包含了坚强的女同性恋运动。1995年，台大女研社在进行该社长参选学生会长的动员时，发起了在女生宿舍放A片的活动。而同时，“情欲拓荒节”也在数个校园中展开。大部分的行动都由非常年轻的学生所组织，而这些活动在媒体的高曝光率，不但震撼了社会，更引爆了女性主义阵营内部尖锐的对话。

在这种女性主义觉醒以及性解放的背景下，男女同性恋团体快速的增生繁衍，打破了中国社会深层的禁忌。90年代，传统上同性恋的边缘位置在艾滋病的烙印下更被强化。但自从女同性恋团体“我们之间”成立后，许多男/女同性恋团体相继冒出头来，其中校园内的学生团体占了多数。女同性恋团体诸如“我们之间”、爱报、台大的Lambda等。男同性恋团体如NCA、Speak Out、台大的Gay Chat等。另也有一些混和男女同性恋的

团体，如同志工作坊、清华的 We Can、世新的 DV8、中原的 Quest 等等。这些团体共同开创了同性恋社区，他们集体“亮相”，重新发现“个人即政治”，连结性、享乐和政治。Gay Bar 是信息流通、建立网络、教育以及建立男女同性恋文化的重要据点。柏兰芝便指出，如同酒吧（pub）在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样，台北的 Gay Bar 在同性恋社区建立的过程中也位居关键位置。<sup>①</sup>

然而，在这个信息年代，同性恋者的网络并不局限在酒吧中。他们大量使用国际网络或电子布告栏联系、沟通及互动。他们也积极利用非主流电台发声。1996 年一个同性恋节目“台北同话”更首度上了市府所属的台北电台（译注：该节目已因市议会删减预算而停播）。

女同性恋运动除了内部沟通、建立网络与自我表现外，也与男同性恋运动联盟推出了许多重要的社会抗议和政治行动，特别让人注目的是关于艾滋政策的动员。女性主义者、女同性恋、男同性恋一同走上街头，抗议政府政策暗示男同性恋者应为艾滋病的蔓延负责。另一方面，由于异性恋妇女已成为亚洲国家中艾滋带员增长率最高的族群，女性主义团体如“妇女新知”也开始将艾滋议题视为女人的一个生存问题。事实上，台湾的女性带原者中，家庭主妇占大多数。他们成为丈夫嫖妓行为中最无防卫能力的牺牲者。妇女团体挑战艾滋防制政策的矛盾：假如女人没有能力掌控自己的性生活，她们如何能逃过来自丈夫的感染呢？这个由女性主义者、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建立的反艾滋运动，将性解放议题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凸显女人所面对的致命的性压迫，对父权结构中性宰制带来了最根本的挑战。

第二，在极度父权的社会中，同性恋运动另一个重要战场是对抗大众形象中传统的污名和隐形（invisibility）。男同性恋必须

<sup>①</sup> 柏 (Po, 1996: 20)。



去对抗所谓不正常 (abnormality) 的污名。女同性恋则必须去对抗社会对她们的视而不见。在公共领域现身成为宣示社会存在的主要目标。文化活动则是达成此目的的重要方法。1992 年的电影节是同性恋社群建立公共、集体的自我肯定的一个起点。成群的同性恋观众占据了电影院。而所谓“酷儿理论” (queer theory) 也随着电影被引介到台北。香港的运动者将原意怪胎的“queer”一词翻译成“同志”介绍给同性恋社群 (香港文化人林亦华在演讲中创造了“同志”一词)。“同志”不再只指涉共产党或其他政治中的兄弟情感, 而指向了一种新的同性恋认同。电影展以及其他的文化活动以集体和欢庆的方式改变了同志文化的面貌。1996 年, 同志运动足以有力量在情人节推出十大同志梦中情人票选活动。演艺界明星、社会名流和政治人物都上了排行榜。这个活动以流行文化惯用的方式迫使社会面对同性恋爱欲的存在。

第三, 同志运动也开始要求掌握公共空间。“夺回新公园”是一个代表性的运动。邻近总统府的台北新公园一向是一个“同志空间” (queer space), 它是男同性恋社群重要的集会和找伴的基地。1996 年, 新掌权的民进党台北市政府着手进行新公园及邻近地区空间改造的计划。同性恋者们担心这些新计划会使他们失去这个解放的空间 (liberated space)。作为公园重要的使用者, 他们要求参与计划的决策。他们组织成“同志空间行动阵线”, 要求自由使用空间的权力。同志要求的是一个在阳光下自由行走的权力, 他们不再只是一个黑暗中的社群 (the community in the darkness)。

随着女同性恋们影响力和战斗力的增长, 她们与妇女运动的分歧也逐渐浮现。歧见之一是民法亲属编的修正。女同性恋们批评妇运团体提出的方案事实上仍然建立在异性恋家庭的规范上而忽视同性恋者的权利。因此, 同志团体也动员发出了要求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声音。这事实上也是全世界同志运动所关切的根本议题, 我会在以下的章节再作阐释。这些冲突刺激其与妇女运动阵

营的思考和辩论。例如在《妇女新知》杂志出现的论战中，女同性恋者们批评妇运团体对同志议题的伪善。女同性恋者们认为，妇运惯用例如“女人爱女人”之类的口号来强调女人之间的团结，但却无法面对女人之间的性和爱情。1996年，女同性恋者们积极地要求她们的特定权利能作为妇女运动的一部分被合理的认可以及捍卫。

在对台北女同性恋运动的描述中，有几个重点必须被强调。它动摇了儒家文化中父权制度和异性恋体制的联盟。女同性恋在与男同性恋结盟捍卫所有形式的性爱权利，而这同时也拉长了妇女运动的战线。妇运加入了对抗艾滋病的运动，将女性无辜被传染的情况联系上家庭主妇对性的没有自主权<sup>①</sup>。90年代的女同性恋运动也将女性主义和女同性恋主义（lesbianism）之间激烈的理论辩论具体联系到台湾社会特定的制度和他文化。它使用了不同层次的文化表现方式“集体出柜”（come out collectively）以面对公众。它并且广泛使用计算机网络以及其他另类传播媒体，如地下电台。它在地方的层次上联结都市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它也介入关于同性婚姻以及非异性恋家庭的法律和文化之战，深化了对父权家庭的批判。我将在总结同性恋运动对父权制度的挑战时再阐述这个论点。

## 二 自由空间：旧金山的男同性恋社区<sup>②</sup>

一般认为，美国的男同性恋解放运动开始于1969年6月27日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石墙事件（Stonewall Revolt），由于州警对石墙男同性恋酒吧严厉的搜索逮捕，以至于数以百计的男同性恋对抗警察达3天之久。从此之后，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扩大，特别集中在大都会地区，同时伴随着男同性恋个别或集体的

① 在台湾，大部分的女性带原者是被丈夫传染的

② 关于旧金山男同性恋社群的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见卡斯特（Castells, 1983），或特别参考方法学附录355-362页。



“挺身而出”行动。在 1969 年，有 50 个全国性的组织，到了 1973 年急增至 800 个。当时由于纽约与洛杉矶的大都会规模，成就了男同性恋人口最多的家园，而旧金山则形成醒目的、组织化的、政治的男同性恋社群基地，在后续的 20 年间持续转化这个城市的空间、文化以及政治。根据我的计算（这必然是暂时的，因为目前很幸运地仍然没有关于性倾向的统计记录），在 1980 年，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人口可能占城市中成年人口的 17%（其中三分之二是男同性恋），而且因为他们的高投票率，在重要的地方选举中，他们可以占有三成选票。即使在 80 年代中期因爱滋病的传播而使人口缩减，但 90 年代旧金山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人口仍不断增加。我认为大部分是因为女同性恋人口的增加、男同性恋不断的移民以及同性伴侣关系的巩固。更重要的是，男同性恋在城市的某些地区占有优势地位，形成真正的自治村：居民、商业、房地产、酒吧、餐厅、电影院、文化中心，在社区组织、街道上的聚集和庆典编织出社会生活和文化自主的网络：一个自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的基础上，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对旧金山地方政府形成举足轻重的影响，包括了警察局对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强制征雇配额，至少要达到警力的 10%。男同性恋人口在空间上的集居，其实是大多数城市中男同性恋文化的重要指标，虽然在 90 年代，社会的容忍度增大，越来越开放的男同性恋人口，但相对于恐惧同性恋保守派的惊惧，男同性恋已散居在大多数的美国城市地理之中。在男同性恋文化的形成阶段，这个地理上的集中的原因是双重加倍的：可见性和保护。多年之前，旧金山男同性恋领袖哈瑞·布瑞特（Harry Britt）在访谈中告诉我：“当男同志四散分居时，他们并不是男同性恋，因为他们是隐形的”。对男同性恋而言，基本的解放运动过去是、现在也是“站出来”这件事，公开地表达他们的认同和性关系，然后再社会化他们自己。但是，在男性气魄和父权制度的基本价值不断受

到威胁、充满敌意和暴力的社会当中，如何可能成为开放的男同性恋？而在认为性欲是每个人自我表达中隐晦的部分，对性欲的一般假设是异性恋的世界之中，要如何能学习到新的行为、新的规范和新的文化？为了要表现他们自己，在现代男同性恋他们在深夜酒吧和秘密的地点总是聚集在一起，当他们有了足够的觉醒和力量能够集体“站出来”时，他们把可以安全地聚在一起和发明新生活的地方标示出来。他们所选定地点的领域界限成为自主机构建造和文化自主性创造的基础。李维宁 (Levine)<sup>①</sup> 曾在分析 70 年代美国都市中男同性恋的空间集中系统产生模式时指出，这种空间便是“少数族群集聚地” (ghetto)，但男同性恋战士却称其为“自由区” (liberated zones)。这两者非常不同，因为自由区是男同性恋在广大的都市社会中有意地自力创建属于自己的都市。

但为什么会选定旧金山呢？作为速成城市 (instant city)，冒险者被金矿与自由吸引而在此定居，旧金山向来是道德标准宽容的城市。水手、旅游者、过客，无赖、叛徒、变态者；梦想家、经纪人，全都鱼龙混杂地聚集在巴尔贝瑞海滩 (Barbary Coast)。此地是各种偶然、缺乏社会秩序、正常与变异模糊的疆界所在。然而，旧金山市政府在 20 世纪 20 年代决定将此处建设为西岸令人称道的文化首都；30 年代，改革运动触及市政府与警察局，当局禁止与压制各种越轨的事物。若以旧金山作为自由之城的先驱者性格来解释男同性恋解放运动于此生根落地，其实并不足够。我认为最重要的转折点其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旧金山扮演的角色：160 万的年轻男女经过这个太平洋阵线的主要港口，这群人寂寞地生活在死亡与痛楚的边缘，并与同性别的人共度多数时光，许多人因而发现或选择了他们的同性性关系。海军命令同性恋退役，他们则在旧金山上岸。与其背负污名回乡遭人

① 李维宁 (Levine, 1979)。





指点，不如留在这里，与几千名男同性恋为伴。于是男同性恋在酒吧相遇，建立相互支持与分享的群体网络。

40年代晚期，男同性恋文化萌生，但从酒吧走上街头还要多费10年。当“失落的一代”（beatnik generation）<sup>①</sup>与另类生活文化在旧金山绽放，围绕着“城市之光”（City Lights）书店的文艺圈网络也建构了知识分子的社群，如金斯堡（Ginsberg）、凯鲁克（Kerouac）以及黑山诗人（Black Mountain Poets）等。<sup>②</sup>这种空间上接近旧意大利人的北滩区（North Beach），以及观光区红灯户的百老汇街。男同性恋在这种宽容、实验的氛围中完全被接受。但当大众传播关注失落时代文化时，他们却强调随处可见的同性恋正是偏差与越轨的证据，而旧金山被标定为男同性恋的麦加圣地，这更吸引了全美各地的男同性恋。1964年，市政府开始压制男同性恋，但这却造成人权会社的形成。保障男同性

① “失落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指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一群作家，他们拒绝接受传统社会及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并根据个人认为可靠的经验写作。根据金斯堡在1957年的说法，这种可靠的经验就是“上帝、性、毒品和荒诞”。此外，小说家凯鲁亚克、诗人科索（G. Corso）、弗林格蒂（Ferlinghetti）也都是失落一代的主要作家。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反战运动与学生运动中所孕育的反文化运动与嬉皮士在某种层次上也就是延续他们那种“脱俗”的生活方式。——译注

② 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美国诗人。他的第一本诗集《嚎》（Howl, 1957），是失落诗派的典型诗作。他20世纪60年代四处旅行之后，又写出《空镜》（Empty, Mirror, 1961）、《吴哥窟》（Angkor Wat, 1968）、散文《原封不动的艾伦》（Allen Verbatim, 1974）和《日记》（Journal, 1977）。金斯堡诗集出版于1987年。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美国作家，原名尚·路易（Jean Louis），1950年发表的第一部小说《镇与城》（Town and City）是以传统的风格写作，后放弃转以自然流露的手法写成《路途上》（On the Road, 1957），发表属于“失落的一代”的年轻人的不满情绪。至于黑山诗派（Black Mountain Poetry），20世纪50年代由曾担任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黑山学院院长的奥尔森（C. Olson）所创。黑山诗人包括克里利（R. Creeley）、邓肯（R. Duncan）等。黑山诗派的宗旨是实现《黑山评论》（1954—1957）中所阐释的那种较强的肉体性与直接亲密的写作方式。——译注

恋的人权会社并与酒店同业公会串联，后者是男同性恋、波希米亚酒吧店主为了抵抗警力骚扰而组织的工会。

60年代晚期，嬉皮文化、社会运动（特别是发生在柏克莱/奥克兰、旧金山湾区）以及遍及全美的男同性恋解放运动，三者共同塑造了旧金山男同性恋社区发展的质变，而使男同性恋社区在历史建构的网络上存在着。

1971年，加州男同性恋运动首次强大到可以组织支持男同性恋权利的游行队伍，游行地点在加州首都沙加缅度。20世纪70年代，旧金山男同性恋社区在许多特定的邻里中茁壮成长，特别是卡斯特罗区，他们从传统的工人阶级手中或租或买，将各式各样的同志居家与职业集中到此，男同性恋开设的店家也聚集于此。在70年代之前，男同性恋跟随酒吧和反文化地区的脚步，可以从分散的据点集中在一个可以称为自己的社区。根据我的田野研究（图4-11），1950~1980年旧金山男同性恋住宅区是在扩张的。

但是，男同性恋社区并非全然自发地打造而成，它同时也是有意的政治行动的成果，特别是深受旧金山男同性恋社群的历史性的领袖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的影响。哈维·米尔克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奥巴尼尔（Albany）分校，但由于身为男同性恋，他既被海军退役，也无法任教。如同其他男同性恋一样，他在1969年迁移至旧金山。起初从事财务分析而后从事摄影，并在卡斯特罗街上开设了“卡斯特罗相馆”。他构思了一个计划，使男同性恋可以自社区朝向企业或权力发展，那就是买下卡斯特罗。他劝服男同性恋买下卡斯特罗，因为这样卡斯特罗区便不再只是一个观光的地方，而是真正为男同性恋所拥有、所生活、所享受愉悦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男同性恋以男同性恋的方式消费购买这社区，并且以男同性恋的方法生活着，那么，他们当然也可以用男同性恋的方式去投票。1973年，米尔克以男同性恋代表的身份竞选旧金山市议员，可惜他虽然做得很好，却仍然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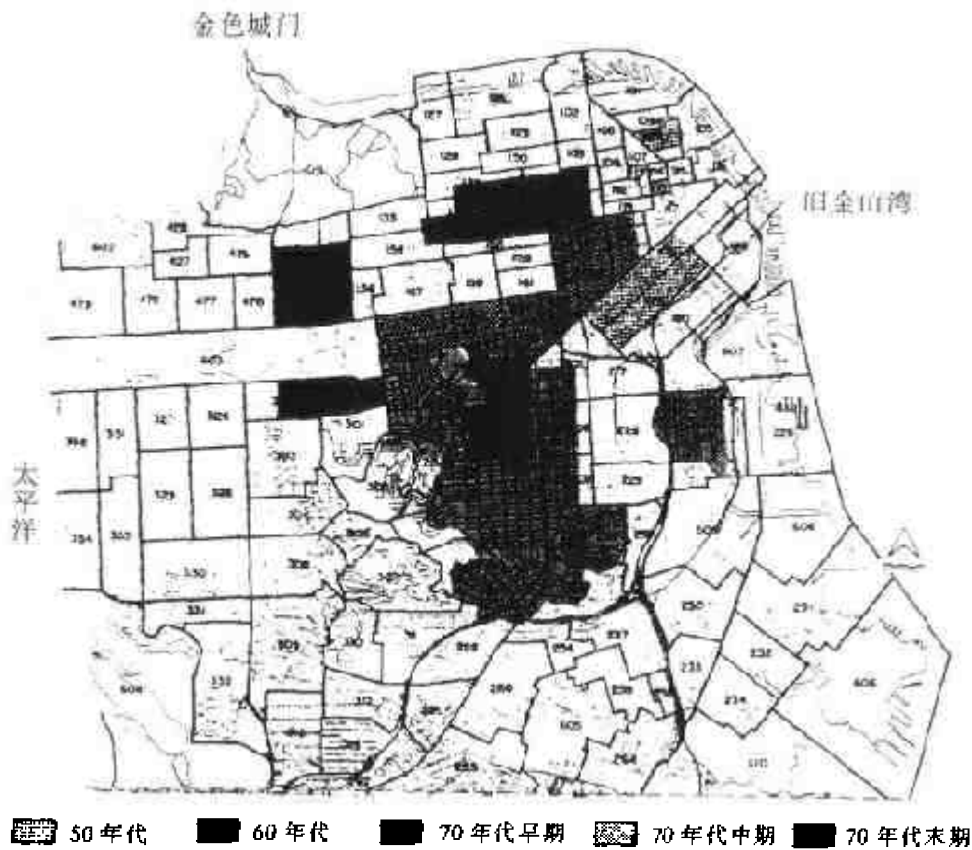


图 4-11 旧金山男同性恋者居住区域

资料来源：Castells(1983)

选了。但他继续打造政治基础，强化男同性恋政治社群，并与民主党串联，以拓展、强调本地都市政策相关议题，譬如控制地产业的投机买卖。但政治事件彻底改变了米尔克的命运。1975年，乔治·马斯孔尼（George Moscone）这位加州自由派参议员以极小的差距当选旧金山市长。为了获得当时已然强大的男同性恋社群的支持，马斯孔尼任命米尔克担任当地行政机关的重要职务：这是已公开性欲身份的男同性恋首次担任市府公职。与此同时，旧金山风起云涌的邻里运动，也推动了选举法的改革，使得市议

会行政官委员会的选举得由当地的行政区各自选举，而非以更大尺度的都市进行共同选举。由于卡斯特罗是一独立选区，借由领域性的选举，男同性恋社区征服了卡斯特罗，米尔克也在1977年正式当选为议员。在新的舞台上，他更努力地为男同性恋争取权力。1978年，加州政府企图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表决一项非常保守的提案：同性恋人士不得在公立学校任教。米尔克不仅以非常巧妙的表演攻陷媒体，而且还成为抗议该案的意见领袖。最终，有58%的加州选民与75%的旧金山选民反对该案。1978年4月，市议会通过了极为自由的《男同性恋权法令》；同时两位任公职的女同性恋领袖——戴儿·马丁（Del Martin）与菲莉·莱恩（Phyllis Lyon），获得了旧金山市的荣誉市民的称号，不仅因为她们长期为民服务（包括支持女同性恋），而且还因为她们相互扶持了25年之久。这些事件就如同其他男同性恋的创见一般，是不可能在恐同社会中存在的。1978年11月27日，保守成性的市议员丹·怀特（Dan White）——丹·怀特在身为警察时便对“性偏差行为”无法忍耐，在市议会办公室内枪杀了市长马思孔尼和议员哈维·米尔克，接着便向警局同僚投案。

米尔克与马思孔尼的丧礼可以说是旧金山最令人动容的政治示威运动之一：演讲者召唤群众追随米尔克的脚步继续为同志运动奋斗，接着更有两万名群众在暗夜里秉烛静游。示威运动果然收效了。新市长戴安娜·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任命社会党男同性恋领袖哈瑞·布瑞特（Harry Britt）替代米尔克的位置，而布瑞特不久后也当选了议员。随后10年，同志领导人在市议会11席次中所占的席位日益增加，只有1992年选举失利，选出了保守派的议长。但同志仍相互串连，组成主要的反对联盟，并于1996年顺利选出黑人民主运动资深领袖威利·布朗（Willie Brown）为市长。从一件1996年的选后轶闻中可以看出该市对同志文化的珍视：在选举连任中陷人苦战的前警长市长，为讨好同志选民而犯下大错：在沐浴时裸身接受电台记者的采访及摄



影，希望借此吸引同志选票。这种对同志文化的揣测与误解，不仅是政治禁忌，而且招致了相反的效果——同志选民与异性恋选民联手封杀他的机会。而新任市长则重新订定了市府对同志文化与权益的尊重与保障，同志也因而一年举办数次游行与庆典来庆祝。

受到80年代初期艾滋病（AIDS）的冲击，90年代同志社区的形态与70年代并不相同。<sup>①</sup>在20世纪80年代后15年间，旧金山市约有15万人因感染艾滋病而丧生，另有数千人遭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但旧金山同志社群不仅有完善的自我组织，而且是全球防治艾滋病毒传染的典范。我确信，防治艾滋病的运动是80年代、90年代同志运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针对艾滋病的防治，旧金山同志运动第一批成效便是协助病患与防治病毒扩散，之后则是进行社区性的大规模教育，如宣导安全性行为。几年来已有可观的成效。90年代的旧金山及加州，一般人因吸毒、召妓以及被粗心男士传染的女性等艾滋病新增患者数量明显下降；而同志成为艾滋病患者的数量也因较好的教育宣导及组织而明显减少。旧金山总医院首先设立永久性的艾滋病处理部，继而将对病患的照护推广至各阶层，志工团体也协助家中与医院的病患。在沉重的压力下，实验研发新药产生显著的效果；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附设医院成为先进的艾滋病与相关研究中心，而1996年于温哥华举行的世界艾滋病会议更宣布未来可对艾滋病进行控制，甚至降低它的致命性。

但或许旧金山或所有同志社区的最大的成果，要算是解开了艾滋病的迷思，并向全球澄清了艾滋病并非肇因于“同性恋”或“同性恋性行为”，毫无保护意识地接触高危险群或进行各种性接

---

① 关于与同志运动、对抗艾滋病以及社会反应等问题相关的讨论，可参见寇蒂斯等（Coates et al., 1988）；麻斯（Mass, 1990）；希勒（Heller, 1992）；普莱斯与徐（Price and Hsu, 1992）；贺瑞克与格林（Herek and Greene, 1995）；莱特与柯斯勒维兹（Lloyd and Kuselewickz, 1995）。

触才真正危险，致命使者并非同性恋。<sup>①</sup> 经由公众健康机构及民众意识来提供教育组织与个人责任感，隔离高危险群与控制疫情也非难事。因此，发源于旧金山的同志社区在这场对全人类有重大贡献的战争中再次获胜。他们不仅成功地对抗了那些要求隔离或监禁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带原者的声浪，而避免了新的侵害人权的犯行；更有意义的是，他们让世人正视且面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而非视之为噩梦。世界虽大，但我们却紧密相连，如果将艾滋病视为源于男人性交所应得的天谴而不采取必要行动去预防疫情扩散，那么当我们想要控制病情时也可能为时已晚。借着起于旧金山的抗艾滋病团体（有些先驱正步向死亡）的理念，社会大众已经知道艾滋病并非同志社群特有的疾病，但我们仍须探究其根源及散布方式以彻底防治。

90年代旧金山同志社区内另一个与艾滋病病理相关的趋势，则是性互动模式越发稳定。稳定的性模式一部分缘于社群民众的年纪与成熟度，另一部分则是因为性欲望导向安全的爱的模式。由于对男同性恋（甚至是女同性恋）最具影响力的文化趋势之一便是渴望组成同性家庭，而中年的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更是以一对一的、持久、稳定、令人舒适的关系为最具支配性的相处模式。因此，为了争取体制内对这种家庭般的稳定关系的认同，男同性恋社区又孕育了新一波的运动，他们向当地政府与州政府寻求亲职的确认，而这种确认不仅确定了亲权，亦同时承认同志家庭可享有一般配偶的法定权利。这波运动的诉求，除了要求同志家庭合法化，同时也以保守者所称的促进家庭价值，引伸为将家庭的价值推广至非传统、非异性恋形式的爱、分享与育儿的家庭上。而性解放运动将持续地借着攻击异性恋根源与掠夺传统家庭特有权利去破坏父权制度家庭。

由于行动总是相互引发的连锁反应，新兴的男同性恋与女同

① 卡斯特 (Castells, 1992c)。



性恋家中较为温和的性欲，也诱发了性少数文化的发展（同性恋与异性恋皆然），譬如施/受虐狂运动、自愿的性奴隶网络。性少数文化的发展不仅是旧金山而且是 90 年代市场街以南的特殊景致，而我也在 15 年前的田野研究中指出过这种文化/个人判断的重要性。施/受虐主义者（包含非常有力的知识分子）批判主流的男同性恋企图定义新的、可被社会接受的规范，而这会再生产曾在历史中压迫了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的支配性逻辑。因此，被控制的暴行、可接受的被虐、感受苦痛的欢愉、奴隶拍卖、皮衣扮装、纳粹纹章、铁链与鞭子，都不只是性的刺激物，而是需要的文化的表现，这需要是企图表达破坏单一狭窄社会（strait society）所有道德标准（也就是传统上进行同志污名与压迫性欲的价值）。对多数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而言，这群文化少数所形成的困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企图表达的，是重要却艰难的议题征兆。但对施/受虐者而言，抗争的路途仍旧漫长。

若同性恋社区只是独自放逐在文化的小社区中，那么他们便没有完成运动暗含的目标——性革命和颠覆父权家庭制度。由于正在成长的男同性恋精英区段（segment）宁愿消费也不愿生产同志运动，因此，在运动策略上联盟女同性恋与广义的妇女运动，似乎是实践男同性恋解放的必要条件。然而男同性恋不仅是男人，而且他们社会化地成为男人，也享有男人特权，尤其当他们是中产阶级的白种男性时更是如此，这些都限制了男同性恋与反父权家庭的联盟之间全力合作，也是 90 年代旧金山激进男同性恋群体与女同性恋联盟之间分裂逐渐扩大的原因。一位受人尊敬的男同性恋精英便将自已定位成利益团体，准备在父权家庭机制内，以可被容忍的方式捍卫男同性恋权利。然而，若我们可以在宽广的运动论述中表达多样性，并视其与异性恋规范相对，而允许人们自由地择其所爱，这必是因为米尔克及其他先行者曾在西岸建造了自由的自治村的缘故。

### 三 综述：性认同与父权体制

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的运动不仅要争取选择恋爱对象与恋爱方式的基本人权，他们同时也是性认同、并且是性解放的有力表现。这就是为何他们要挑战社会中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基础：性压抑与理所当然的异性恋。

当女同性恋能够在—一个如同台北那般有着中国文化压迫和父权的制度性环境中，开放地表达她们的性欲、并且要求承认同性婚姻在民法中的地位之时，那用控制欲望所构筑起来的制度性围墙就出现了一个大裂缝。如果男同性恋社区能够克服无知的污名，帮助阻止艾滋病的传播，即意味社会能够从黑暗中把自己释放出来，不再带着偏见和暴力来看待人类经验的多样化。而如果此刻在美国的总统大选，必须不情愿地面对同志权利议题时，表示了社会运动对父权制的挑战不可忽略，或再也无法镇压了。尽管如此，由性别认同解放出的转化，鲜能受到人权方面的基本宽容与尊重。他们在性别常规与父权家庭中导入了腐蚀性的批评。其挑战对父权制而言尤其震惊，因为他们的出现适逢历史时机，当生物研究与医学科技让异性恋、父权制与物种繁衍之间的关系得以分离。同性别构成的家庭并不放弃养育孩童，即是此可能性最开放的表达。

就另一方面而言，混淆性欲的界限，解散了家庭、性欲特质别、爱、性别以及权力，在我们熟知的世界中引入了基本的文化批评。这就是为什么性解放的未来发展并不容易。从捍卫基本人权到重构性关系、家庭与人格，他们碰触到压抑与文明的核心中枢，并回应其本质。有一阵狂风暴雨朝着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运动而来，艾滋病绝非反性欲黑幕里惟一可憎的面孔。然而，若说在前25年里，此经验有任何指标性的价值可言，那么当认同的力量与爱的力量相碰撞时，似可成就奇迹。





## 第五节 父权制危机下的家庭、性关系和人格<sup>①</sup>

在分居和离婚的社会中，核心家庭产生了多样的新亲族关系，例如组成所谓的重组家庭（recombinant families）。然而，比起以前，这种亲族连结的本质却更容易因妥协而改变。亲族关系通常需要在信任的基础上来取得，而现在信任则必须通过协商和协议来达成，而承诺就像是在性关系中的议题一样。

——安东尼·纪登斯（Anthony Giddens），《亲密关系的转变》（*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第96页。

### 一 急剧缩小的家庭

父权制的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女性主义和性认同社会运动的相互作用所引发；明显地在人们分享生活和抚养小孩上有了角色上的变化。我将会运用美国的一些数据来说明这个观点，以简化其中的一些争议。我并非暗指其他不同的国家、文化也会走上这条路；然而，如果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趋势是父权制危机的基础，相信大部分的社会也将重新建构或取代原本根植于他们文化、历史下的父权制。以下的讨论以美国的趋势为经验基础，目

<sup>①</sup> 若非特别说明，本节所用的资料均出自于《世界现况年鉴》（*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6）。其中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出版品包括美国商业、经济及统计部人口普查局（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the Census, 1989, 1991, 1992a-d）。

标在指出社会机制和父权家庭的危机、社会认同的转换以及社会对于家庭生活，甚至人格系统的重新定义之间的关联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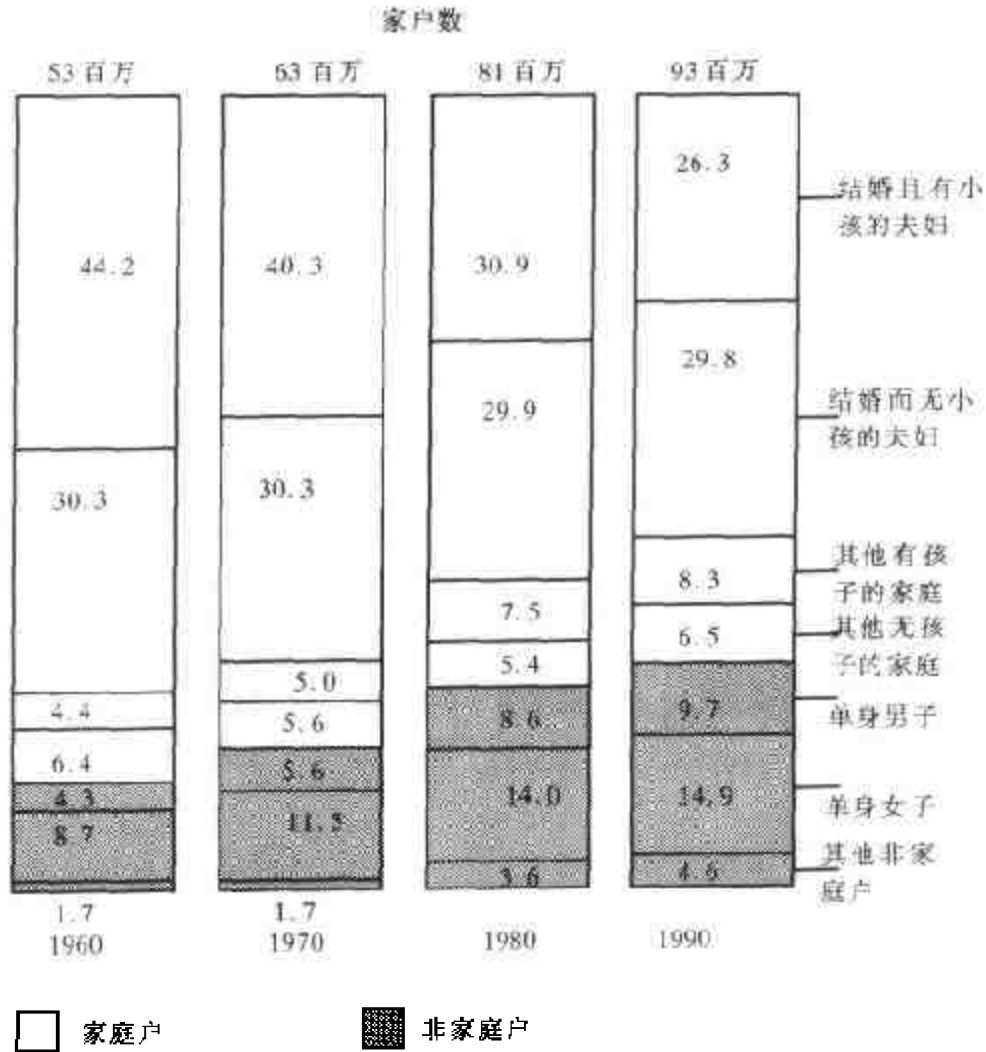


图 4-12a 美国家户组成(1960~1990年)

这里的小孩是指 18 岁以下的孩子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1992a)

问题不在于家庭的消失，而在于其巨变和权力系统的改变。确实，大部分人还是会走入婚姻；90%的美国人都会结婚；60%的女性和75%的男性平均在离婚的3年内会再婚。男同性恋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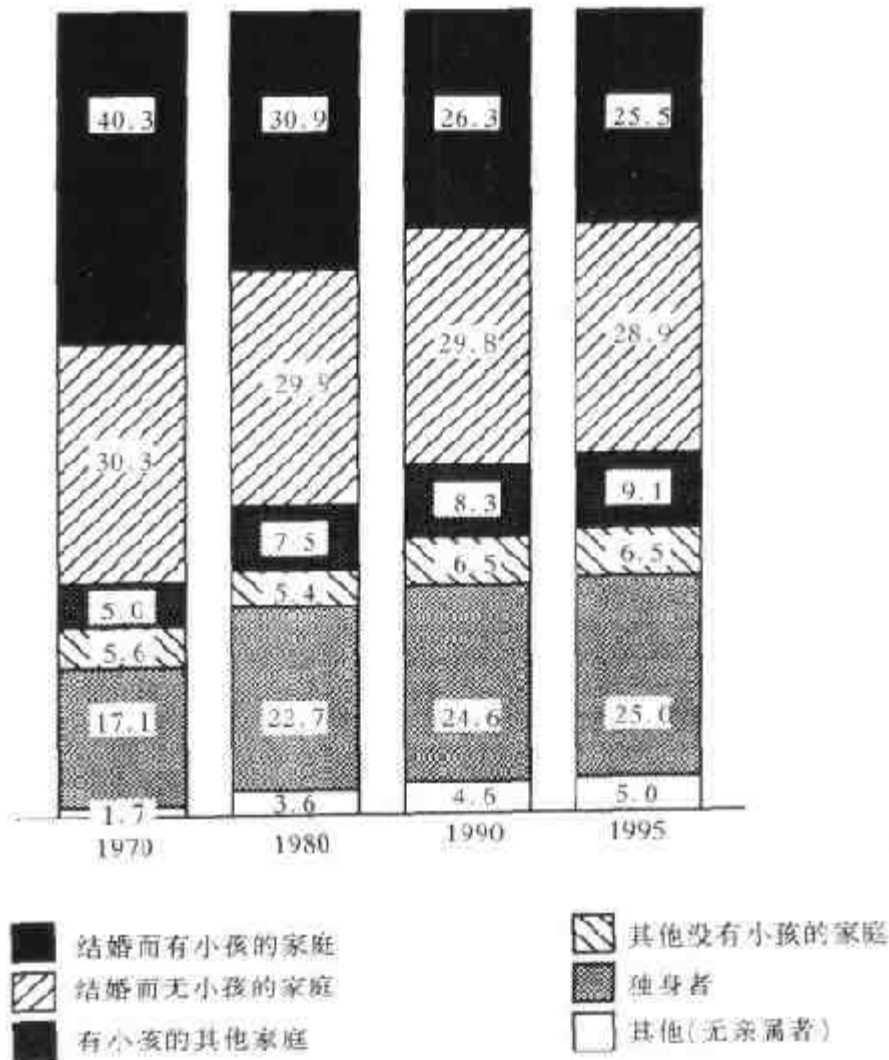


图 4-12b 美国家户组成(1970~1995 年)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1996)

女同性恋也正在为合法的婚姻奋斗。但是，晚婚、同居、高离婚率（统计上约占婚姻总数的一半）、高分居率等因素联手产生，且丰富了家庭/非家庭生活的种种面貌（图 4-12a 和图 4-12b 总结了从 1960~1990 年及 1970~1995 年的趋势）。1960~1995 年，所谓的“非家庭家户”增长了 2 倍，从占全部家户的 15%

增加到29%，其中当然包括高龄单身者，这反映出人口统计学上的趋势和文化上的改变。而女性有三分之二是单身家户。更明显的，典型的“有子女婚姻”从1960年占全部家户的44.2%降到1995年的25.5%。而“原型”的户长核心家庭大概只占全美家户的四分之一。史黛西（Stacey）指出：资料来源显示如果我们考虑传统的父权制——就是有子女、完全靠男性维持家计且女性是全职家庭主妇的家庭——其所占比率已经降到占全部家户的7%。<sup>①</sup>

儿童的生活也已经改变。如图4-13显示，1990年超过四分之一的儿童未和双亲一起居住；相反的，在1960年此比例低于13%。更进一步，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研究，1991年儿童和亲生父母同住的比率只有50.8%。<sup>②</sup>其他资料来源也估计“近50%的儿童没有和亲生父母住在一起”<sup>③</sup>。近20年来领养孩子日渐增加，超过2万个婴儿即由人工受孕的方式出生。<sup>④</sup>这些趋势都指出一个相同的方向，那就是父权核心家庭正在衰退之中。重要的是，和单亲居住的儿童在1970~1990年间增长了2倍，达到全部儿童人口的25%。在这些儿童当中，和未婚妈妈居住的比率，从1970年的7%增加到1990年的31%。有子女单亲母系家户在20世纪70年代增加了90.5%，在80年代又增加了另外的21.2%。有子女单亲父系家户在1990年只占全部家户的3.1%，但正在迅速的增加中：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80.6%，80年代为87.2%。没有丈夫的母系家庭也呈现增长势态，从1970年占全部家庭的11%，到1994年的18%。只和母亲居住的儿童在1970~1994年增加了2倍，从11%增加到22%，而只和父亲居住的儿

① 史黛西（Stacey, 1990: 28）。

② 美国人口普查局，1994

③ 巴斯（Buss, 1994: 168）。

④ 雷古奥特与史毕娜（Regiot and Spina, 1996: 238）。



童，在同时间内，增长了3倍，从1%增加到3%。

新的生活安排显得多元化。<sup>①</sup> 在1980年有400万的重组家庭（包括前婚生子女），1990年有500万。到了1992年，四分之一的18岁以上单身女性有小孩；1993年，350万未婚情侣中35%有小孩；带小孩未婚父亲的数目，1980~1992年增加了2倍；在1990年100万的儿童仅与祖父母同住（比1960年增加了10%），而350万的儿童其家庭中有祖父或祖母同住。婚前同居的数目，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8%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49%，有一半的同居情侣有小孩。<sup>②</sup> 随着妇女大规模进入劳动市场，以及她们对家庭经济不可或缺的贡献，只有少数儿童可以得到母亲或父亲的全职照顾。在1990年，有70%的婚姻家庭，丈夫和妻子都外出工作，58%有幼童的母亲外出工作。儿童照护成了家庭的主要问题，三分之二的儿童由亲戚或是邻居照顾，<sup>③</sup> 为此我们要增加未注册的家庭帮手。可怜的女人，不能照顾孩子，而面临和孩子分离或放弃工作的抉择，然后掉入了会使她们失去孩子的福利陷阱。<sup>④</sup>

以下是一些可靠的同性家户和家庭的统计数字，其中一个统计数字是由冈丝奥瑞克与韦瑞奇（Gonsioreck and Weinrich）所做的，根据他们的数据，10%的美国男性是同性恋，6%~7%的女性是女同性恋。<sup>⑤</sup> 他们估计，有20%的男同性恋曾经结过一次

① 雷吉奥特与史毕娜（Regiot and Spina, 1996）。

② 考莉曼与甘农（Coleman and Ganong, 1993: 113）。

③ 法恩斯华兹·雷契（Farnsworth Riche, 1996）。

④ 莎赛儿（Susser, 1991）。

⑤ 冈丝奥瑞克与韦瑞奇（Gonsioreck and Weinrich, 1991）。同志占人口数至多10%的这个上限值，是由半世纪前肤浅的全美报告引发的迷思（此报告的样本事实上只有美国白种男性）。如同劳曼（Laumann）等人（1994）所言，以强烈的实证基础，同志并无明确的界线可被追迹至明显地生物冲击。同志行为的延伸以其不同的姿态，依着文化规范与社会脉络绽放。关于此议题的讨论可参见劳曼等（Laumann et al., 1994: 283~320）。

婚，当中的 20%~50% 有小孩。女同性恋常常也会成为母亲，许多源于她们之前的异性恋婚姻。根据非常大范围的评估，大概有 150 万~330 万的儿童和女同性恋妈妈一起居住。根据估计，和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父母一起居住的儿童，大约有 400 万~600 万之间。<sup>①</sup> 在非家庭家户中，增长最多的是“其他非家庭家户”，它从 1970 年占全部家户的 1.7%，增长到 1995 年的 5%。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说法，这个族群由室友、朋友和一些不相关的个人组成。事实上，这个族群应该包括没有孩子的异性恋与同性恋同居者。

以哈佛大学对 2000 年家户组成的估计，预测不久的将来，对全部家户而言，有小孩的婚姻家庭将会减少，从 1980 年的 31.5% 降到 2000 年的 23.4%，单人家户可能会从 22.6% 增加到 2000 年的 26.6%，在统计上甚至超过有小孩的婚姻家庭。<sup>②</sup> 孤单的父母将略为增加，从 7.7% 增加到 8.7%。没小孩的婚姻变成多数，大概仍占全部家户的 29.5%，但并非优势的家户形式；影响让此种配偶更长久的因素，是以各式各样的家户形式，一起照顾和前一任配偶所生的孩子。所谓的“其他家户”包含了不同性质的生活安排；根据预测将由 1980 年的 8.8% 增加到 2000 年的 11.8%。大体而言，根据哈佛大学的估计和预测，在 1960 年全美家户有四分之三是由婚姻家庭组成，非家庭家户只有 15%，在 2000 年，婚姻家庭约占 53%，非家庭家户则会增加到 38%。从统计数字可以预见，人们关系的界限将会游移、多元化；同时多数且比例不断增加的孩子们，将在边缘、甚或 30 年前觉得不可思议的家庭形式中社会化（此类家庭以当时的标准而言，可谓

① 蕾吉奥特与史毕娜 (Reigot and Spina, 1996: 116)。

② 马斯尼克与阿尔德 (Masnick and Ardle, 1994)；马斯尼克与金 (Masnick and Kim, 1995)。



是速成家庭)。<sup>①</sup>

所谓的新组合是什么呢？人们在家庭内外，是如何在父权制度的边缘生活的呢？在史黛西 (Stacey)、雷格特 (Reigot)、史毕娜 (Spina)、莎赛儿 (Susser) 和其他先驱的研究之后，我们知道了一些事。<sup>②</sup> 如史黛西写道的那样：

在过去后工业革命的 30 年中，女人和男人重新创造了美国的家庭。在现代家庭的灰烬中，他们描绘了一个多样的以及在文化、政治、观念上不协调的安排，以一种新的性别、亲属策略形式来对抗后工业的挑战、负担和机会。<sup>③</sup>

雷格特与史毕娜在新家庭形式的质化研究中有相似的结论。<sup>④</sup> 不再有新的流行的家庭形式，多元化是其规则。但是有些因素似乎是新组合的关键：支持网络、逐渐以女性为中心以及终其一生伴侣与典范的传递。支持网络，主要存于离婚家庭成员之间，算是新的、对于社会能力和分摊负担极为重要的形式，当孩子必须被分别组成新家庭的父母分享及抚养时更是如此。因此，对旧金山市郊的中产阶级离婚家庭所作的研究发现，三分之一的

---

① 根据厄雷克 (Ehrenreich 1983: 20) 在 1957 年所引述的数据，53% 的美国人认为不结婚的人“恶心”、“不道德”或者“神经有问题”；仅 37% 的民众认为不结婚是“自然的”。到了 1976 年，33% 的民众仍对不结婚抱持负面态度，15% 的民众赞许保持单身的人。

② 史黛西 (Stacey, 1990)；莎赛儿 (Susser, 1991, 1996)；雷格特与史毕娜 (Reigot and Spina, 1996)；另见巴赛列特 (Bartholet, 1990)；冈丝奥瑞克与韦瑞奇 (Gonstoreck and Wenrich, 1991)；布鲁贝克 (Brubaker, 1993)；鲁宾与雷奈 (Rubin and Riney, 1994)；费治派翠克与蔚吉利斯提 (Fitzpatrick and Vangelisti, 1995)。

③ 史黛西 (Stacey, 1990: 16)。

④ 雷吉奥特与史毕娜 (Reigot and Spina, 1996)。

人和前任配偶及其亲戚仍维持着亲属关系。<sup>①</sup> 根据雷格特与史毕娜、莎赛儿以及卡尔曼与甘农 (Ganong)<sup>②</sup> 的个案报告，单亲妈妈和全职职业妇女妈妈的支持系统是很薄弱的。如同史黛西所言：“如果这是家庭危机，那么这是男性家庭的危机。”<sup>③</sup> 更进一步说来，由于多数人都会试着维系家庭——不管家中是否有人缺席或不适任——继父母家庭与伴侣关系的延续遂成为常态。由于此种家户的生命经验与复杂性，家庭角色与责任的分配将不同于以往，必须重新协商。卡尔曼与甘农看到广泛的家庭瓦解，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是不是家庭的终结？并不是。这表示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将生活在更新、更复杂的家庭中。在新的家庭中，角色、规则和责任可能要协商，不像以往传统家庭中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sup>④</sup>

所以父权制度在成长中的母系家户中全然消失，在其他多数家庭中也接受严酷的挑战，因为家户中的妇女和儿童会要求协商和调整。此外相对于非婚姻家庭户将增长到 40% 的婚姻家庭户，虽然它强烈地表现了权力的神话，但是父权家庭在社会现实中慢慢地被虚位化。

在这些情况下，会发生在儿童社会化上的，是在社会中的性别区分翻版，抑或是父权制的再现？

## 二 非再生产的父权制所再生产的母职

由于某些限制，本章无法详尽地讨论新的家庭环境所经历的家庭社会化的过程及其复杂多变、相互矛盾的经验资料，而这类资料多半妥善保存于儿童心理医师的临床档案中。但是我想，在

① 引自史黛西 (Stacey, 1990: 254)。

② 卡尔曼及甘农 (Coleman and Ganong, 1993)；雷格特与史毕娜 (Reigot and Spina, 1996)；莎赛儿 (Susser, 1996)。

③ 史黛西 (Stacey, 1990: 269)。

④ 卡尔曼与甘农 (Coleman and Ganong, 1993: 127)。





女性主义心理学家南西·卓多罗 (Nancy Chodorow) 经典成就的基础上, 很多假设可以再进一步发展。在《母性的再生产 (繁衍)》这本著作中, 对于性别的生产/再生产, 她提出了一项简单、漂亮而有力的心理分析模型, 并且在她稍后的著作中进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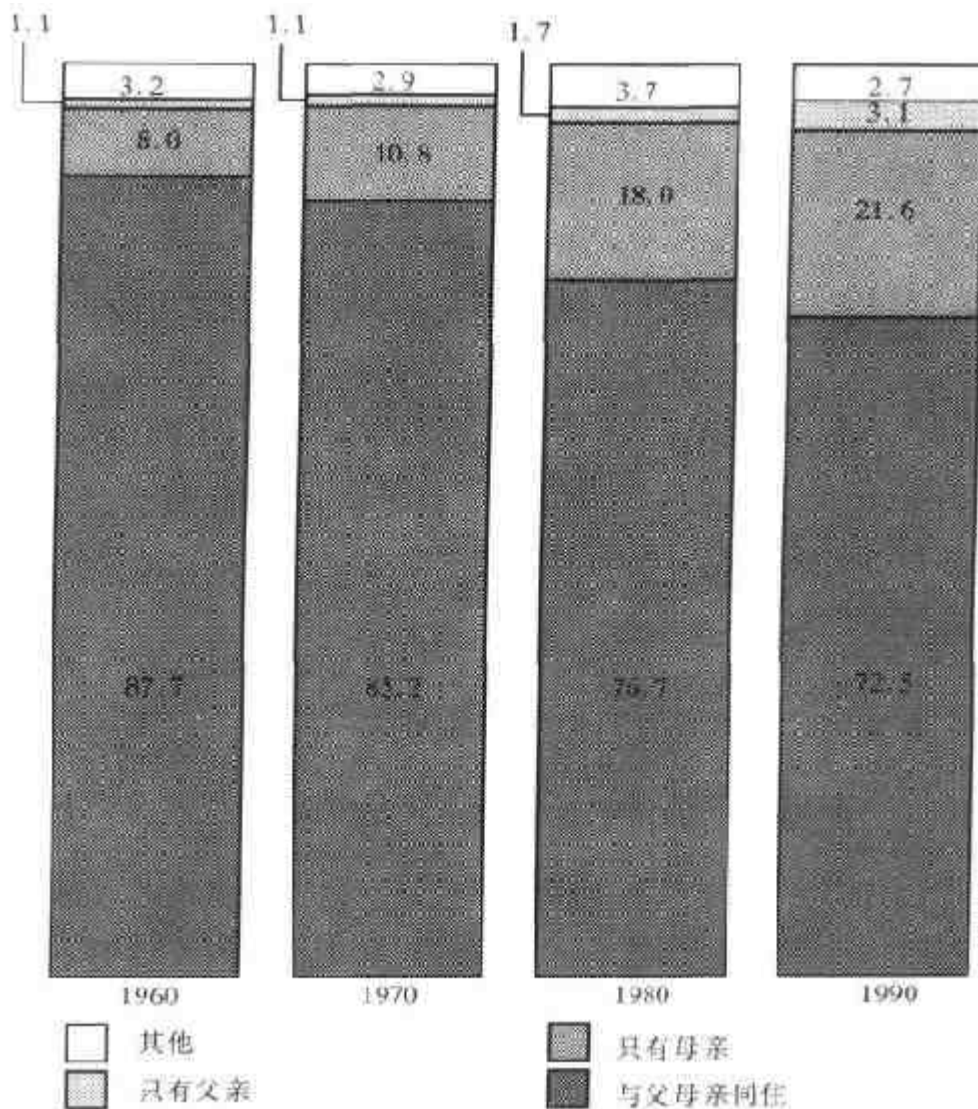


图 4-13 1960~1990 年美国 18 岁以下小孩的居住情况 (以是否与父母亲同住分类)

资料来源: 美国人口普查局 (1992a)

修饰与补充。<sup>①</sup> 虽然她的理论惹人争议，而且欲了解父权制度危机中的人格变迁时，心理分析当然并非唯一的可能方向，但是在我看来，它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起点来分析这些变迁。我将先按照卓多罗的说法总结她的分析模型，然后在父权制度危机的前提下，进一步阐释此人格与性别模型的涵义。根据卓多罗的说法，母性的再生产是性别再生产的核心。这个再生产经由社会结构引起的心理过程，并不是生物的产物，也不是制度性的角色训练。卓多罗说：

女性作为母亲，在母性的能力与想要成为母亲的意念下生了女儿。这些能力与需求，构成且加强了母亲—女儿关系的本身；另一方面，女性作为母亲（而男性作为非母亲）生了儿子，母亲育儿的能力和 demand 则被系统性地缩短与压抑；让男性准备成为将来家庭中情感上的角色，以及主要参与在工作与公共生活中，即客观的、家庭之外的世界。女性母亲在劳动的性别与家庭的区分，以及比起男性来要更进一步参与人际、情感上的关系，造成了女儿与儿子在心理能力上的分别，这使得他们再生产了性与家庭的分工……在家庭内外，女性负起主要的育儿责任；女性以母亲为名，而且集体想成为母亲，并且从成为母亲之中得到报酬；即使在这些冲突与矛盾之中，女性仍成功地实践母性。<sup>②</sup>

这个再生产的模型对性欲——当然也包括了个人与家庭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因为女性母亲，男性与女性在异性客体选择上有着不同的发展。”<sup>③</sup> 男孩在童年时代把母亲当成主

① 卓多罗 (Chodorow, 1989, 1994)。

② 卓多罗 (Chodorow, 1978: 7)。

③ 卓多罗 (Chodorow, 1978: 191)。



要的爱欲对象，而且因为这个基本的禁忌，男孩得以经历分离的典型过程，以及借着压抑男孩对母亲的依附来解决他们的伊底帕斯情结。当男孩长成男人，他们已准备好要找一个像他们母亲的对象（卓多罗的强调）。但女孩就不一样了：

因为女孩的首度爱欲对象是个女人，为了得到正确的异性恋指导，<sup>①</sup> 女孩必须把她们的的主要客体选择转移到她的父亲或男人身上……对女孩来讲，母亲是主要的爱欲对象，男孩也是一样。结果是，女性异性恋的结构性内在对象设定与男性是不同的。当女孩的父亲终于成为重要的首要人选，则是在双性的三角关系脉络中……于是，对女孩来说，在对象上既没有绝对的改变，对父亲也没有完全的依附……这代表了两道转折：第一，对男孩和女孩而言，异性恋关系的本质是不同的。大部分的女性起源于她们的俄狄浦斯情结，然后转向到父亲和男人作为主要的性欲对象；但对男人来讲，很清楚地，相较于男孩对他母亲和女人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主要性和排他性，男人对父亲则大多维持情绪上的次要，最多在情绪上是相等的；第二……根据多伊奇（Deutsch）的说法，女性在三角关系的脉络中感觉到异性恋关系，对她们而言在这三角关系之中，男性并非惟一的对象。多伊奇说法的意涵可以经由跨文化的家庭结构检验以及两性之间的关系中得到

---

① 安菊恩·瑞奇（Adrenne Rich, 1980）批评卓多罗没有在她的理论中强调许多女性的女同性恋倾向。在我看来，这个批评是不公平的，因为瑞奇的“女同性恋连续体（lesbian continuum）”是发生在制度化了的异性恋的脉络之中，而卓多罗所解释的是，那未经说明的母女关连（mother/daughter link）是如何被整合进入异性恋婚姻制度之内，同时也成为异性恋婚姻的源头。在分析与鼓吹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对心理分析学者与社会学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证实，这说明了夫妻的亲密关系并非常态也并非规则<sup>①</sup>。

事实上，根据巴斯（Buss）对配对策略的跨文化研究，<sup>②</sup> 男性容易浪漫地坠入情网；而女性，相对于男性，因为经济上的依赖和女性倾向的情感系统，牵涉更多复杂的考量，其中最重要的是获取资源。<sup>③</sup> 但是让我们继续卓多罗的推论：

（女性）当她们想要成为以及维持性欲方面的异性恋（卡斯特按：即使有越来越多的例外），女性会这样做是因为男性难以处理爱情；以及女性对她们自己母亲的情感历史，而到别处去寻求爱情和情感满足。女性满足这些需求的方法之一就是创造和维持与其他女性的重要个人关系……然而对许多女性而言，与女性的深度情感关系很难奠基于在例行、日常、持续的基础上。女同性恋的关系确实倾向于维持母亲与女儿的关系，但大多数的女性是异性恋……第二个选择是……在三角的关系下，以及她自己父母关系的情感对称下，在心理结构的层次，女性对男性的关系需要第三个男性，因这关系最初就立基于三角关系……于是，对女性而言儿童填补了这三角关系。<sup>④</sup>

事实上，“女性想要而且需要与儿童的关系”<sup>⑤</sup>。对男性而言，这又不同，因为他们对母亲原始的依附，以及稍后对于类似

① 卓多罗（Chodorow, 1978: 192-193）。

② 巴斯（Buss, 1994）。

③ 当然，就我们个人的经验世上的文学充满女性放弃一切追求浪漫爱情的例子。然而我会说，这是父权制度模型的意识形态支配的表现，而很少诉诸真实情感关系的经验，这就是何以成为小说的好材料。

④ 卓多罗（Chodorow, 1978: 201）。

⑤ 卓多罗（Chodorow, 1978: 203）。



母亲形象的依附：“相对地，对男性而言，异性恋关系本身创造了早期对母亲的结合；儿童打断这项结合。再进一步说，男性并不在情感关系中定义他们自己，且压抑情感和减低情感的需求。这使得男性准备投入异化工作的去情感世界，而并没有满足女性对于亲密和主要关系的需求。”<sup>①</sup> 于是，最终“男性缺乏情绪的不可及性，以及女性比较没有独占的异性恋承诺协同建立了女性的母性。”

家庭结构的制度性特征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再生产了他们自身。心理分析的调查显示出女性的母性身份和承诺，而一般心理学上的身份和期望则是母亲情感工作的基础，因为女性本身由女性来育养，女性集体形成相关联的身份与需求，以及自我（self-in）关系心理学上的定义，使得女性承诺成为母亲。相对于男性，因为由女性来养育，所以并不会像女性这样承诺成为母亲。当她们长大成为女性母亲，女性养育女儿。<sup>②</sup>

卓多罗的模型遭受到攻击。最著名的批评来自女同性恋理论家和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被不公平地批评为贬低同性恋、强化父权体制和支配个人的行为。事实上，并非如此。卓多罗已经把她的观点说得很清楚：“我说——反对一般化——男女恋爱的对象有许多，包括了男性和女性。”<sup>③</sup> 而且她修正她的分析，强调“分化并不等于划分和分离，而是一种与他人相联系的特殊方式”。<sup>④</sup> 我同意她对女性问题的论点，并不是去宣称她们的女性

① 卓多罗（Chodorow, 1978: 207）。

② 卓多罗（Chodorow, 1978: 209）。

③ 卓多罗（Chodorow, 1994: 71）。

④ 卓多罗（Chodorow, 1989: 107）。

认同，而是她们的认同是伴随着在父权体制下被社会贬抑的认同。这一点卓多罗一再反复澄清，她所分析的并不是永恒的、生物的男女分辨过程，而是在父权体制和异性恋的前提下性别再生产的基础机制，而且也是认同、性欲和人格的再生产。

所以，我的问题是：是否这个制度的/心理分析的模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父权体制的家庭解体之时会怎么样？让我试着把我对新家庭形式与生活的安排的观察和卓多罗理论<sup>①</sup>联系起来。在古典的、现已退潮的父权体制/异性恋的前提下，异性恋女性主要相关于四种客体：作为她们哺育对象的儿童，作为她们主要情绪支持的女性网络，作为情欲对象的男性，以及作为家庭提供者的男性。在目前的条件下，对绝大多数的家庭和女性而言，第四者已不再是惟一的提供者。女性的确为了经济独立，或为了成为提供家庭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工作时间上、贫穷上付出不少代价；但一般来说，父权体制的经济基础已经被侵蚀了，因为大多数的男性也需要女性的收入来得到像样的生活标准。当男性在情感支持的必要性上已经降成次要，使得男性作为主要情欲对象的角色上，女性逐渐失去了兴趣；于是，伴随着女性支持网络（包括了在“女同性恋连续体（lesbian continuum）”中影响的表现）的扩大发展，使得女性专注于结合她们的养育和工作生活。

所以，在父权体制的危机和卓多罗模型的逻辑下，第一个生活的安排是母亲/儿童家庭的形成，仰赖女性网络的支持。对异性恋女性而言，这些“女性/儿童的自治体”有时会有男性加入，在成功的父母关系模式下，把额外的儿童放在一边，成为分离主义的进一步原因。当父母亲年纪大了，女儿变成母亲，再生产这

---

<sup>①</sup> 我应该提醒读者，卓多罗主要是为心理分析学者，专注在临床证据的基础上发展理论。所以，用她小心谨慎的心理分析的取向来建构我概括的、社会学式的通则，是超过她的一般界线，自然，这都应完全是我的责任。



个系统。而母亲成为祖母，对于她们的女儿和孙子，对于女儿和网络连结家户的儿童，则强化了这一个支持网络。这并非分离主义的模型，而是一个能够自足的女性中心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男人只是来来去去。就像巴巴拉·厄雷克（Barbara Ehrenreich）数年前所指出的那样，<sup>①</sup> 这个女性中心模型的问题是其薄弱的经济基础。要在社会的尺度上，成为一个广泛的自足的女性自治村，这个模型所欠缺的是：儿童照顾、社会服务、女性教育以及工作机会。

对于男人个人来讲，当变得越来越社会性地拥有特权，情况是越来越复杂的。<sup>②</sup> 伴随着他们经济优势的能力下降，他们通常没办法再借着掌握资源，来强化家庭中的纪律。除非男人肯力行平等主义的双亲关系，否则男人无法改变此基本机制：他们的女儿是为了成为母亲而制造的，男人则是为了他们自己而产生女人/母亲的欲望。于是，不只是在情欲上而且是在情绪上，男人一直在追求那个女人，来做为他们爱欲的对象，这就像他们的安全摇篮，而且当然不会忘了这是他们有用的家用工人。而如果有着较少的儿童，女性出外工作，男性赚的钱比较少而且工作比较没有保障的时候，如果这样的分析是正确的话，这时伴随着女性主义的想法扩散，男性而对一些选择，但没有一个会是父权体制的再生产。

第一个选择是分离，“从承诺中逃离”，<sup>③</sup> 而且从统计上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趋势。消费主义者的自恋情结可能特别有助于解释早期的情况。然而，在卓多罗的理论中早就解释清楚一个特点：男人还是没有办法在形成网络、团结一致以及人际关系的技

① 厄雷克（Ehrenreich, 1983）。

② 厄雷克（Ehrenreich, 1983）；阿斯卓勒（Astrachan, 1986）；基恩（Keen, 1991）。

③ 厄雷克（Ehrenreich, 1983）。

巧上做得很好。在父权体制的社会中，男性情谊固然经常是一项练习。但是从我的西班牙经验中（不管是以前或者是最近），“男人专有”的社交聚会是立基于假设总是有家庭/女性支持和在家里等候。男性可以在一起玩乐、聊天、相互夸耀和向女性炫耀，只能植基于一个支配的稳定结构，来满足基本的情绪上的需要。在男性俱乐部（penas）<sup>①</sup>中，当女性离开之后，就会变得死寂和没有生气，在忽然之间变成男性权力的饮酒太平间。事实上，在大部分的社会中，单身的男性比起已婚的男性来，健康比较差，寿命较短，有较高的自杀率和易于沮丧。然而，对离婚或者分居的女性而言则是恰好相反，即使在刚离婚时会经常有短暂的沮丧期。

第二个替代方案是男同性恋化。男同性恋化似乎在生理上具有双性征形式的男人之间逐渐扩大，但是这些人在父权体制占优势的情况下，会选择隐瞒同性恋的特征。男同性恋化可增加支持网络的机会，这正是男性所欠缺的。既然社会的常规并没有指定伴侣中支配的角色，男同性恋化同时也使得平等主义比较容易一点，也比较容易协商父母关系。于是，男同性恋的家庭也许是日常生活中平等主义的实验性环境。

然而对于大多数的男性而言，最容易接受、最稳定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再协商异性恋家庭的契约。包括了家事的分担、经济平等、性的平等以及全面分担养育的双亲责任。最后一项条件对男人来讲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卓多罗效应才会被扭转，女性才不仅被生为母亲，而且是作为一个为男性所追

---

① 男性俱乐部（penas）是一个中世纪的西班牙机构，原先是男人专有，而且现在也还是由男性控制，这个机构在村子的年度宗教/民俗节庆前后的准备期中，把村子里的或邻里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它是每年一起饮酒和玩乐的社会化网络，就像在最著名的男性俱乐部中，潘普洛纳（Pamplona）（按：西班牙东北部城市）的圣法明斯（San Fermín）的年轻人一样，penas 这个字指的是坚实的岩石，penas 是男性情谊的基石。





求的女性，男性不仅会成为女性的爱人，而且是儿童的父亲。事实上，除非这个机制可以被反转，对男人而言，在家庭中，经济与权力调整的简单改革，并不能持续成为令人满意的条件，在此同时男人仍会渴望那个女人成为他们独有的爱欲对象，但女人却越来越不需要男人，男人对改革后的核心家庭有条件地投降则是结构地充满着愤恨。于是，就像卓多罗一开始所建议的那样，超越个人对改革后家庭的让步，在未来，对于重构可被接受的异性恋家庭的可能性，则是仰赖于双亲革命中性别的颠覆。不用参照其他统计数字的细节，我认为即使在这一个方向上已有显著的进步，平等主义的双亲关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对于男性和女性双方，平等主义的成长比分离主义的兴起要慢。<sup>①</sup>

这个文化转换的主要受害者是儿童，他们在当今的家庭危机的情况下越来越被忽略。儿童的情况可能甚至会更糟，不管是因为女性带着她们的孩子过着贫乏的物质生活，还是为了追求独立自主与个人的生活，女性像男性一样忽略她们的儿童。自从来自福利国家的辅助不断下降，就在男人和女人对他们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之时，使得男人和女人还必须自己去处理他们儿童的问题。在许多的社会中，特别是在美国境内，急剧升高的虐待儿童事件，可以看成是人们对家庭生活失去控制的表现。我会这样说，并不是赞成新保守主义的论点，以儿童的困境来责怪女性主义或性欲解放。我想指出的是在我们社会中一个基本的议题，而且必须不带意识形态偏见地提出来：就如社会学家和新闻记者<sup>②</sup>所记录到的，儿童正严重地被忽略。答案不会是回到陈旧的、压迫的父权体制家庭。可能的答案是在平等的关系下重构家庭、公共机构负起保障儿童物质与心理的责任。从当前数以万计儿童未受保障的生活看来，非常明显地，这是扭转人类精神状态集体解

① 莎毕诺等 (Shapiro et al., 1995)。

② 莎赛儿 (Susser, 1996)。

体的可能之道。

### 三 身体认同：性关系的（再）建构

虽然 20 世纪 60 年代或者 70 年代社会运动确实是诱发今日性革命的重要因素，但是目前仍在打造的性革命，却不是当时社会运动所宣称、想像的样貌。性革命的特质，在于彻底去除婚姻、家庭、异性恋情欲、与性（欲望）表达之间的联系。过去 200 年来，现代父权制度将这四个因子紧密地联系起来，但由本书列举的观察报告中却可得知，这四项目因子终将各自独立存在。诚如吉登斯所言：

表面上，异性恋婚姻在社会秩序中仍然占有核心位置，但是实际上，纯粹的精神关系与弹性的性欲特质却已经彻底破坏了异性恋婚姻。大众尚无法将正统的婚姻视为诸多生活形态中的一种，而是视其为仅有的一种，部分是由性别发展的心理过程中，我性与他性之间引力与抗力复杂交织的结果……有些婚姻仍旧坚实恒久，主要是因为婚姻确保了传宗接代、抚育幼儿的过程。然而……不属于精神爱恋的、绝大多数的异性恋婚姻（以及同志关系），在相互依赖的过程中往往会朝着两种方向发展。其一是友伴式婚姻：配偶之间性活动次数较低，但是双方会在关系中专注某种程度的平等与互谅；另一种婚姻则是双方均将婚姻视为家庭的基础，但是彼此仅投入极少的情感。<sup>①</sup>

上述两种关系中，性欲与婚姻都是相互分离的，这也是大部分妇女在历史上所要面对的生活处境<sup>②</sup>。虽然，肯定妇女情欲、

<sup>①</sup> 吉登斯 (Giddens, 1992: 154 ~ 155)。

<sup>②</sup> 巴斯 (Buss, 1994)。



同志情欲以及自由挑逗的情欲，正在扩大欲望与家庭之间的鸿沟。但这仍然无法转型成性解放运动，因为，多数人对不贞的恐惧（男人也要付出代价），以及80年代、90年代艾滋病流行的结果，反而为社会带来了性的黯淡与匮乏。若根据1992年劳曼以极具代表性的样本、针对全美性行为所做的实证研究报告，<sup>①</sup>我们至少得知：全美有35.5%的男性在一个月中拥有的性行为次数极少，27.4%的男性更是一年仅有一次性行为或者根本没有。同样的状况下，女性的比例则为37.2%与27.9%。而每周性行为次数不少于4次的男性为7.7%，女性为6.7%。甚至，在性活动最旺盛的18~24岁的群体中，男性与女性一周性行为不少于4次的比例也仅有12.4%。已婚族群拥有（一周4次以上）高比例的性活动比例比起一般人要更低些，男性为7.3%，女性为6.6%。回报“性高潮”的研究数据证实性别差异的存在：男性75%，女性29%；但回报“愉悦”<sup>②</sup>的部分，双方则相差无几。针对过去12个月以来的性伴侣人数的调查，更显示大多数人拥有固定的性伴侣关系，其中66.7%的男性、74.7%的女性仅有一个性伴侣，9.9%的男性与13.6%的女性则没有任何性伴侣。所以，我们可以说，90年代的美国根本就没有广泛的性革命。

然而，芝加哥大学以丰富的研究资料显示了：在性欲沉寂的数据背后，性表达的自主仍有升高的趋势，例如：即便有艾滋病的威胁，过去40年，初次性体验的年纪仍旧稳定下降；青少年性活动也比以往更为频繁。再者，婚前同居已不再是社会异端而成为常态；成人拥有婚外性伴侣的情形也增多。同居关系中，有半数在一年内结束彼此的关系，40%则走向婚姻，但结婚的人口口中又有50%以离婚收场。三分之二的离婚人口拥有第二春，但

① 劳曼等 (Laumann et al., 1994)。

② 劳曼等 (Laumann et al., 1994: 116)。

这群人的离婚率也居所有婚姻状况之冠。这种连续不断将其联系上生活安排的努力，榨光了欲望，也成为 90 年代美国的特征。

另一方面，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消费性的情欲也在逐渐增加。在劳曼等人的研究中，援引古典的性论，以人性规范的观点分析：传统的性（生殖）、关系（友谊）、娱乐（朝向性欢愉），他同时将“自由意志享乐”型独立分析，指出这种形式的性比较接近庸俗的性解放，以纪登斯的术语来说，就是“可塑的性关系”（plastic sexuality）。以美国主要区域进行样本分析时，他们发现，新英格兰人口的 25.5% 与环太平洋人口的 22.2% 可归类至自由意志享乐之下，也就是，美国境内最有文化涵养的地区，其享乐性爱的人约占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

逐渐上升的性自主活动（也就是享乐导向），其意义指标便是口交。然而容我提醒诸位，迄今美国仍有 24 个州将口交列为变态性爱而明令禁止，虽然执行的可能性令人怀疑。图 4-14 显示了同年代者的口交比例。也就是以出生组别来区分所显示曾经有吹箫或品玉经验的男性及女性的百分比。根据以上发现，劳曼指出：

整体趋势显示，人们的性技巧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几乎就像一场性革命。而 1933-1942 年之间出生的受访者，与 1943 年后出生的受访者，有明显不同的口交的经验。1933-1937 年之间出生的男性，其经历口交的比例为 60%，而出生于 1948-1952 年之间的男性，其经验口腔性爱的比例则上升至 90%。性技巧出现的时机，恰好与 50 年代晚期的文化变迁相互呼应。而这变迁在 60 年代晚期到达高峰，人口比例亦非常稳定。口交资料中最年幼族群的较低比例不必然显示出口交正在降低的趋势，更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个族群尚未进入就算不必然，也是较容易产生口交的性关



系中。<sup>①</sup>

附带一提，在最年轻的族群中，女性经历口交的比例仍然高达75%~80%，且高于同族群的男性，劳曼同样提出解释：即使有固定性伴侣的比例相当高，自慰仍非常普遍，约占三分之二的男性与四成以上的女性。

因此，解读性行为时，若摒弃异性恋式、重复维持固定性伴侣的规范，而用比较“错置”的观点去阅读，将会看到与研究资料所提供的完全不同的世界：消费性、试验性、性欲地抛弃了婚配关系，持续寻求新的表达模式，同时防范艾滋病。在年轻族群与趋势城市中，这些新的行为模式格外常见。因此，作出以下的预测并不为过：一旦我们可以控制艾滋病，将会出现许多败德之城。在父权的崩化之下，众人享受丰美的自由，并在自恋文化中欢唱。这种情形，正如吉登斯所言，性欲与性别身份，成为众人的财产。<sup>②</sup> 福柯曾经指出，权力机器延伸到性欲建构/分析的主体，吉登斯则认为，这正是权力与认同在身体这个战场上永无止境的战争。<sup>③</sup> 这不必然是解放式的争斗，因为欲望往往来自逾矩的快感，所以“性解放的社会”成为个人幻想中的超级市场，人们在其中进行的是消费，而非生产。不过，无论如何，借着把身体视为认同的基地，而非父权制度规训的场所，性表达的多重面向的确帮助个人在困难险峻的人格中（再）建构。<sup>④</sup>

#### 四 后父权世界的弹性人格

新生代逐渐在父权家庭传统模式外进行社会化过程，孩童在

---

① 劳曼等 (Laumann et al., 1994: 103~104); 我的斜体强调。

② 吉登斯 (Giddens, 1992: 175)。

③ 吉登斯 (Giddens, 1992: 31)。

④ 克罗兹 (Grosz, 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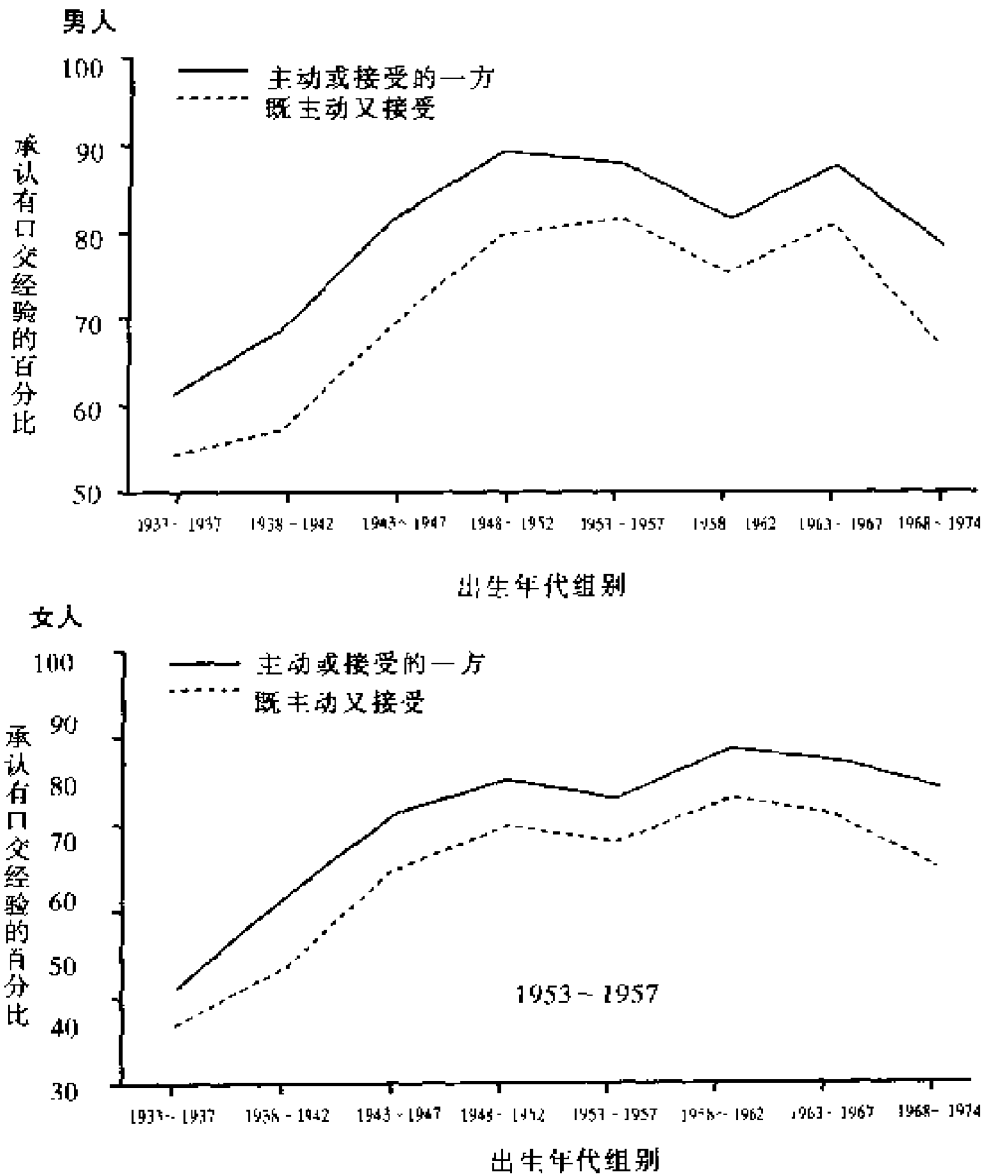


图 4-14 男人与女人一生中口交发生比例,以人群划分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1994)

年纪尚小时便学着应付各种不同的行为环境、族群以及族群之间的成人角色。以社会学术语来说就是,新的社会化过程不仅贬低了父权家庭的传统规范,也多元化地呈现家庭中的各种角色。黑格(Hage)与包尔斯(Powers)以深刻的洞察力指出,新的社会化过程将带来新的人格特质,不安、多变、复杂,却更能适应社会



脉络中不断变更的角色，就像极早便被新奇经验诱发的适应机制。<sup>①</sup> 倾向强调个人需求的重要而非制度或体制的角色，使家庭内的关系更加个人化。因而，在社会价值的层级上，性欲成为毋须指导规范、也毋须借由家庭使之制度化的个人需求。多数成人与三分之一的儿童在传统核心家庭之外生活，同时两者比例都在升高。外于传统家庭脉络的欲望越发影响人际关系，而终于成为个人的自我表征。就算有艾滋病的阴影，在新文化模式中成长且社会化的青少年，远比前一代（甚至是60年代的自由斗士）更有自由的性欲。

由于大量投身信息化劳动市场，妇女开始反抗自身处境；而性欲认同的社会运动也对父权式核心家庭提出质疑。父权家庭面临的危机是，以往由体制统合的诸多面向现今一一拆解、拉开距离：配偶之间的人际关系、家户个体的工作生活、家户成员的经济联系、家务工作的操持、育儿、性欲及情感支持等等。而以家庭为基础的稳定的社会关系之所以困难，便是因为要在同一时刻扮演这么多角色并不容易；但若无法在正式的、体制内的结构维持长久固定的关系，便会面临问题。因此，期待家庭制度持续运行，就得配合性别关系的转型，发展出拥有新社会关系的制度。

虽然家庭原本具备个人与社会性的种族延续的功能，但生物复制技术在科技上的突破，却取代了家庭为个人或族群繁衍的社会性功能。人工受孕、精子银行、代理孕母、基因工程宝宝，虽为社会开拓了全新领域，却也因其对人类道德、法律有潜在的威胁，而使社会尽力控制。在不知道小孩生父的状况下，女性可以拥有自己的孩子；男性也可经由代理孕母留下遗腹子。这些事例，正是生物学与社会学在人类种族繁衍上揭示的最基本的关系：社会化过程是可以与亲职相互分离的。而这种历史情境正重新定义着家庭与人类生活。

<sup>①</sup> 黑格与包尔斯 (Hage and Powers, 1992)。

由于人格系统中最基本的决定因子便是家庭与性欲身份，因此，质疑既定的家庭结构与拥有较为开放的性欲，两者同时带来了新的人格类型。黑格与包尔斯便认为，在个人层次上对当前社会变化作出的关键反应，便是涉人并重新定义角色。这也是他们所称的“后工业社会中最关键的微观过程”。<sup>①</sup>

我非常赞同他们二人深具洞见的分析，也愿意再补充一些假设使各位更加了解何谓涉人性的人格系统。心理分析认为，个人对于欲望的认知，是以非常迂回的方式进入社会文化中而引起体制内的欲望脱轨。由于欲望通常联系着逾矩，所以承认家庭外的情欲将带来极大的社会张力。长久以来，背德逾矩总（仅）存在于家庭领域之外的性欲上，因此只消引导社会大众朝向道德情境的脉络进行思索，社会便可以轻易地应付娼妓、性骚扰、特定的同性恋等等，这便是傅柯所指出的性欲正当化的世界。然而，现今的社会已经不同了。若父权家庭不存在，逾矩便是个人反抗社会的行为，而不是对父权家庭的背叛。因此，家庭的缓冲作用消失了。这也开启了以非工具形式的暴力来表达欲望的新路。就像解放运动受到广大的欢迎，父权家庭（迄今惟一的历史存活者）的毁坏也促成性欲的标准化（譬如在黄金时段播出色情片）；且经由狂野欲望的暗巷，助长了社会中无意义的暴行。可谓性欲正当化的误解滥用。

自家庭中解放的个人，必须面对自己的负担与压抑。奔向自由、网络社会，也会引发个人的焦虑与社会暴行。直到我们找到使妇女、男性、儿童，在人人平等的家庭中共同生活与分摊责任的新形式，才可能有合适于自由女性、聪明孩童与多变男性的家庭。

---

① 黑格与包尔斯（Hage and Powers, 1992）。

译注 [u] 指被父权主义或其他领土包围的一块激进女性主义领土





## 第六节 父权制度的终结？

不懈地与父权制度对抗，无法允诺我们任何历史的预测，因为历史没有事先决定的预定方向。我们不要为了解放胜利而欢欣鼓舞，反而更要注意看着这亮丽的大道终将通往何方。生命既混乱又不确定，基本教义派试图以神的律法恢复父权制度，很可能扭转父权家庭逐渐崩解的劣势。而这崩解是由信息化的资本主义所引发，并由文化社会运动致力完成。

恐同者的强烈反弹的确摧毁了人们对于同志权力的认知，1996年7月美国国会便以压倒性胜利的票数宣布“同性恋是合法婚姻的前提”。同时，父权制度虽然面临危机，但是仍然勇健地活跃在世界各地。不过，保卫父权制度的浩大声势，就像许多宗教基本教义派所做的那样，也同样反映了反对父权制度的挑战强度。以往被视为天生、神性、永恒的价值，现在则必须大声疾呼召唤众人，这不仅降低了这些性质的基础，也失去了它们在大众心中的正当性。

女性主义与性认同社会运动是否能够将她们深信的价值系统体制化，大部分有赖于运动与国家政府的关系。虽然国家政府一向是父权制度赖以存活的最最终手段，但是社会运动对政府提出的特殊要求，总会攻击最重要的支配系统，并在政府自身面临结构性危机时显现。而这结构性的危机，在今天，正是由政府未来企望的全球化与过去所持认同之间的矛盾所致。

## 第五章 权力衰落的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性”，尼可斯·波兰札斯（Nicos Poulantzas）在1978年写道：“在于它吸纳掌控了社会的时间和空间，建立起时空轴线的矩阵，并且垄断时空的组织架构；在国家力量的介入下，时空组织成为一种控制的网络和权力，这就是为何现代民族（modern nation）是国家的产物的原因”。<sup>①</sup>然而，随着全球资本、货物、服务、技术和信息的流通，国家对时空的掌控却越来越弱。国家通过对于传统的独占以及民族认同的建构或再建构而俘虏了历史时间，如今却受到具有自主性主体的多元认同的挑战；国家试图通过设置超国（supranational）组织来确保它在全球层级的能力的企图，进一步削减了它的主权；而国家试着下放行政权力到区域和地方以重振正当性的努力反而因为人民更接近于政府、却对民族国家更冷漠，而强化了离心的趋势。因此，在全球资本主义兴盛、而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各地爆发开来之际，“民族国家”——这个现代的历史产物，它的权力似乎正在衰落当中，更精确的说，是权力而非影响力（influence）的丧失。<sup>②</sup>在本章中我所要阐释的就是：为上述过程提出可能的原由并说明其发展之基础和脉络；而我也将引用当代一些

---

① 波兰札斯（1978：109）；作者译。

② 提利（1975）；吉登斯（1985）；赫尔德（1991，1993）；史开莱尔（1991）；开米勒力与佛克（1992）；古汉诺（1993）；赫斯曼与马歇尔（1994）；杜罕（1994）；卡德伦等（1996）。



国家为实例——虽然其中也有一些变化和差异——来见证并说明这是一个系统性和全球性的现象。而事实上，全球都可看到的对于国家主权的挑战，其原因正在于现代民族国家无法在全球化网络的权力和单一认同的挑战二者之间未知的暴风雨中，进行海上航行。<sup>①</sup>

## 第一节 全球化与国家

民族国家操作能量的衰退，其决定性因素是核心的经济活动全球化、媒体和电子通讯全球化以及犯罪的全球化等。<sup>②</sup>

① 对于民族国家危机的分析，一般都需预设一些民族国家相关的定义与理论。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是奠基在已经发展完成的社会学理论之上。从诸多理论中我愿引用安东尼·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The Nation - state and Violence) (1985: 121) 中的定义：“民族国家，存在于其他民族国家的复合体中，乃是一组治理的制度形式，保有具特定边界的领土的行政垄断，并通过法律以及对内和对外的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以确保其统治。”然而，正如吉登斯所言：“一般而言，只有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家机器方可成功地诉求对于暴力工具的垄断；也只有在这种国家中，国家机器的行政范围直接与前述诉求所声称的领土界线一致”（第 18 页）。确实，正如其所论证的那样，“民族国家乃是一有疆界的权力载体，现代年代中的卓越的权力载体”（第 120 页）。因之，当界线崩解，当载体本身成为被载时，国家究竟怎么了？而我们又将如何将国家概念化？就理论的延续性而言，我的考察始自吉登斯所概念化的民族国家显现出因历史转化而被取代之处。

② 关于全球化的定义与分析，就我所理解者，参见第一卷第二章。而对全球化的简化观点者的批评，参见贺司特与汤普森（1996）。经常有人论辩全球化并非新现象，而是一直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伴随资本主义的扩张的 19 世纪末期。或许真的是这样，虽然认为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基础设施，引发全球过程在真实时间中的操作之后，却仍然没有引起社会与经济的质变的这种说法并不能说服我。但我确实对于这个论辩没有异议；而且它也与我的疑旨无关。我的企图是从文化、经济、政治脉络，分析并解释身处 20 世纪末期的我们的社会。因此，我的知识贡献必须被放在其自身的关心的问题上。

### 一 国家经济体的跨国核心

相互依存的国际金融和货币市场，在真实时间被操作成为一个统一体，借此将各国的通货连结起来。如在美元、日币和欧元三者之间的流通和兑换，所形成一个强力的系统性通货合作体——这也是在全球性的投资和贸易中，能够使货币市场达到一定程度之稳定的惟一措施和方法。而在现实的考量下，其他国家的货币也必须和这财富三角紧密扣连在一起。如果汇率是系统性的互相依赖，那么，货币政策亦势必如此。而若货币政策在跨国层次上某种程度地合作无间，基本利率亦势必如此，最后，预算政策亦将如此。于是，个别的民族国家正在丧失、也终将丧失对其经济政策的基本元素的掌控。<sup>①</sup>事实上，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真实经验，同时也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欧洲。芭芭拉·史达林斯（Barbara Stallings）已经指出，20世纪80年代当国际金融制度与私人银行被视为国际投资与贸易的先决条件，以用来稳定发展中经济之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如何地被国际压力所形塑。<sup>②</sup>在欧盟，德国央行（Bundesbank）宛如已是欧洲中央银行。例如，当德国政府为求统一而不负责任地决定以1西德马克兑换1东德马克的汇率后，为了控制其所导

（接第284页注释②）来讨论，即本书三册所观察并加以理论化的当代过程。无疑地，学者所思往往从比较历史得益良多，亦即，将当前之技术、经济与通讯全球化、政治、政治制度之间的互动过程，与过去相类似的转变经验作一个对比。我会希望我的其他同僚，基本上是历史学者，来挑此重任，而我则乐于以基于此种研究所得到的涵意来修正我的一般性理论叙述。眼前，在我看来，我所见到的这个研究方向的少数尝试，尚未投入足够的关注于这个技术、金融、生产、通讯与政治的全新过程，因此，尽管它们可能是与历史的记录一样的事物，我们却仍不清楚如何能够超越“现在仍只是过去经验的重复”这样的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的老生常谈。

① 德发拉奇（1993）；《商业周刊》（1995a）；莫勒（1995）；柯罕（1996）。

② 史达林斯（1992）。



致的通货膨胀，德国央行在不考虑国家经济的表现的情况下紧缩利率，导致了整个欧洲的通货紧缩。1992年，德国央行更是对媒体泄漏其对英国货币政策的批评，以期促使英镑贬值，而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日本的经济政策基本上取决于它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平衡和汇率波动，而对最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美国来说，即使是在其实质贸易赤字的20世纪80年代，它依然能够经由大量的国外融资来促成政府支出面的金融扩张等策略来维存；但是这做法却迫使形成经济大黑洞，因此紧缩减低庞大的政府预算赤字，成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不得不为的经济政策。所以，美国的经济独立性是一个幻象，并即将在反映了生活水准的全球性经济竞争的未来中幻灭，因为作为经济防护垫的政府外债在里根时代业已失控，且外债在持续攀升之中。<sup>①</sup> 我们可以说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自由度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大大减低。<sup>②</sup>

政府越来越难以掌控其经济（这是某些经济学家乐见其成的事），此趋势肇因于蓬勃发展的跨国生产，但并不是只是指那种跨国企业的生产本身所带来的冲击，而是说此跨国生产和贸易网络所代表的无国界性质而言。<sup>③</sup> 它所伴生的是政府在其领域内对基本生产课征税收能力的衰退，因为企业或有钱人可以在国际上寻找其他的财税天堂，而要从跨国企业多压挤出一些利益也越来越难；国家的税赋新困境和矛盾就是在两难情况下日益冲突，一方面是跨国的投资、生产与消费，另一方面则是以国家为基础的税赋系统。<sup>④</sup> 因此，从国民所得来看，卢森堡和瑞士成为世界两大首富国是偶然吗？极可能民族国家的最后的立足点，就要看兢兢业业的

① 梭罗（1992）；柯罕（1993）。

② 切斯耐（1994）；努南卡普等（1994）。

③ 拜克理（1994）。

④ 古汉诺（1993）。

税务调查员与诡辩的跨国律师在虚拟会计空间中的胜负来决定。

## 二 全球经济中国家的新财政危机的统计估算

以下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看到在逐步经济全球化的 1980 -- 1990 年各国政府的财政变化和调整。为了作比较分析和研究,我选定了下列六个国家:包括三大市场经济体(美国、日本、德国)、欧洲经济体中最开放的英国、另一个欧洲国家西班牙——这个作为世界第八大市场经济体但其经济/技术发展又落后于七大工业国的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发展国家中重要的经济体——印度。在珊卓·穆格(Sandra Moog)精心制作的统计表(表 5-1 和表 5-2)中,已经建构并表现出一些国家财经政策的重要指标,但我不会仔细去说明这些指标的意义,而是利用此表来帮助扩展以及准确说明我前几页对全球化和国家之论证。

让我们先来检视这个从广义上来说似乎沿着相似路线发展的群组,包括美国、英国、德国和西班牙等 4 个国家(而其中的一些差异将会特别说明)。在表 5-1 和 5-2 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支出都增加了,约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或甚至超过了 40%。另外,政府部门工作机会大幅减少,且政府部门消费所占的比例,除西班牙是递增外,其他 3 个国家都是递减的。政府部门资本的形成在美国增加,而在德国则是减少的。中央政府的税收在美国是减少的,而在其他国家则是增加的,特别是西班牙。政府的赤字都是增加的,特别是美国和德国,而英国政府的负债正在减少,虽然还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4%,而其他国家如西班牙和德国则是递增的,尤其美国在 1992 年呈现戏剧性的增加,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52.2%。政府的财政赤字导致这 4 个国家必须扩大其对外债和国外净贷款的依赖,某些个案尤其如此。整体而言,从政府的外债以及 GDP 中的净借贷、中央银行的货币储量、政府支出与国家出口等角度来看,各国政府对全球资金市场的依赖程度正在不断增加之中。以美国来说,1980 ~

1993 年间政府的外债占 GDP 的比重增长了 2 倍多，占货币储量

表 5-1 经济与公共财政的国际化：1980~1993 年的比率  
(以 1993 年的比率显示，其他年份则另外加注)

	美国	英国	德国	日本	西班牙	印度
政府外债	104.2	31.8	538.5(p)	0.0	1066.7	-25.3
/GDP %	(9.8)	(5.8/1992)	(16.6)(p)	(0.3/1990)	(10.5)	(5.9)
政府外债	20.1	44.7	325.3(p)	9.9	674.5	16.5
/货币储备 %	(998.6)	(168.1/1992)	(368.4)(p)	(12.2/1990)	(121.6)	(149.4)
政府外债	133.0	50.5	590.8(p)	9.5	795.5	-55.6
/出口 %	(134.0)	(32.2/1992)	(75.3)(p)	(2.3/1990)	(79.7)	(70.7)
政府外债	92.2	17.5	423.5(p)	—	586.8	-40.7
/政府支出 %	(41.7)	(13.5/1992)	(44.5)(p)	—	-(36.4)	(35.4)
政府净外贷	203.0	787.5	223.4(p)	—	—	10.3
/政府支出 %	(6.12)	(14.2/1992)	(15.2)(p)	—	—	(4.3)
直接对外投资	52.8	44.4	52.2	57.1	183.3	—
/国内投资 %	(5.5)	(17.9)	(3.5)	(1.1)	(2.8)	—
直接外资流入	-35.5	-8.9	-50.0	—	236.7	—
/国内投资 %	(2.0)	(10.2)	(0.1)	—	(8.6)	—

(p) 表示是原始资料

注：关于资料来源的图表、细节以及计算方法，请参见方法附录。

资料来源：珊卓·穆格从下列资料加以组织及制表：《政府财政统计年报》，第 18 期（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IMF），1994）；《国际金融统计年报》，第 48 期（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1995）；《欧罗巴世界年报》（伦敦：欧罗巴出版社，1982、1985、1995）；《国家会计帐：详表》（1980-1992）第二期（巴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1994）；《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经济展望》，第 58 期（巴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1995）；《世界年表》，1994（世界银行，巴帝摩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1994）。

表 5-2 经济与公共财政中的政府角色：1980~1992 年的变动率与 1992 年的比例（若非 1992 年，则另加年份以说明之）

	美国	英国	德国	日本	西班牙	印度
政府支出	9.1	13.1	19.7	--	49.4	29.3(p)
/GDP %	(24.0)	(43.2)	(34.6)		(25.1)	(17.2)(p)
中央政府税收	15.6	8.0	11.6(p)	18.2	64.2	17.3(p)
预算/GDP %	(10.8)	(27.0)	(13.5)(p)	(13.0/1990)	(17.4/1991)	(11.2)(p)
政府预算短缺	42.9	8.7	44.4	78.6	16.2	20.0(p)
/GDP %	(4.8)	(5.0)	(2.6)	(1.5/1990)	(4.3)	(5.2)(p)
政府债务	91.9	26.0	78.1	30.1	160.8	28.2(p)
/GDP %	(52.2)	(34.1)	(28.5)	(53.2/1990)	(39.9)	(52.8)(p)
政府就业	4.7	3.1	0.6	20.9	--	
/总就业 %	(16.2)	(22.2)	(16.4)	(7.2)	--	
政府资金形成/粗	21.2	--	-7.0	--	--	--
固定资本形成%	(16.0)		(27.9)			
政府消费	-6.9	-2.7	-8.1	66.3	33.8	40.2(p)
/私人消费 %	(27.2)	(34.5)	(32.7)	(16.3)	(26.9)	(19.0)(p)

(p) 表示是原始资料。

注：关于资料来源的图表、细节以及计算方法，请参见方法附录

资料来源：珊卓·穆格从下列资料加以组织及制表：《政府财政统计年报》，第 18 期（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994）；《国际金融统计年报》，第 48 期（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5）；《欧罗巴世界年报》（伦敦：欧罗巴出版社，1982，1985，1995）；《国家会计帐：详表》（1980~1992）第二期（巴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1994）；《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经济展望》，第 58 期（巴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1995）；《世界年表》，1994（世界银行，巴蒂摩尔）。

的比重则增加了 20%，而且 1993 年几乎是货币储量的 10 倍。从其占出口比例来看，则增加了 133%。同时，在占政





府支出比例方面，则几乎成双倍增长达到了总支出的41.7%。至于美国的政府外债在这14年间则惊人地增长了456%，占政府支出的比重则增加了203%，也就是相当于6%的政府支出。由于美国对外的直接投资减少了35.5%，因此我们可以说，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大大地依赖全球资本市场和外国贷款。

英国、德国和西班牙虽有其各自的发展，但和美国几乎大同小异。必须特别注意的是，英国看来似乎能较少依赖，但德国依赖外国资金的情形看来比美国还日趋严重，这一点可以由以下几个指标来看：外债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增加了538.5%）、外债和通货准备的比值（增加了325.3%）以及出口的比值（增加了590.8%）等。而德国政府在1993年的净外债占政府支出的比例高达15%，其外债相当于政府支出的44.5%，二者的比重都比美国来得高。因此，虽然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有很强的出口表现，然其对国际的依赖却显著增强（这和日本则不相同）。

有趣的是，虽然印度的政府支出、消费以及负债不断地增加，然其对外债的依赖程度却大为减少：确实，其财政依赖的所有指标都显示了这时期的负增长仍然很低，除了政府外债占政府支出比之外。略有增加的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是过去10年印度经济增长加速的一部分原因而已。然而我应强调，尽管这段时间印度政府的财政依赖指标变化率呈现负值，但是其依赖性仍是属于高的层级（政府外债占出口比超过70%，几乎占货币储备的150%）。

正如在多数的研究个案的情形中那样，日本的表现往往是不同的。日本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受到外债的影响。其预算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非常的低，并且在1980~1993年间显著降低。另一方面，政府消费增加，政府公债亦增加，而日本的政府公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与美国一样高（超过50%）。这些观

察显示了日本政府的财政乃是依赖国内的借贷。这也反映了日本经济较强的竞争力,以及这个国家由贸易及顺差所积累的剩余。因此,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日本国家更具有自主性,但由于日本的资本以从其竞争力的获益给予政府融资,日本的经济也就更依赖于贸易表现。因此,日本不能算是解释政府依赖规则与政府赤字增加的一个例外。日本公司挑起世界经济,而其竞争力给予国家融资(日本政府消费远较本研究中的其他国家还快)。伴随着这种“关系企业”(keiretsu)式的发展而来的繁荣,日本政府通过与关系企业同兴荣的日本银行借贷,而显现出对国际经济运动的二级财政依赖。

在此我提出与本章论证有关的三个主要趋势:

①尽管国家某种程度地不介入经济,特别是在直接就业、管制方面,然而国家仍有显著的经济角色,它仍需要税收以外的额外融资,因而增加了国家的财政依赖,除了英国之外(见图5-1);

②除了日本以外,政府的借贷越来越依赖外债,这个程度已经危及了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且使出口表现蒙上阴影。这反映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现象:相对于全球贸易的增长,全球金融市场有着更快速的增长,而两者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

③日本政府成功地建立了相对于外资的财税自主。然而,它所以能如此,乃是基于国内借贷,从借着保护主义与出口表现而获利的日本企业来获取融资。因此,日本经济与日本政府,也就沉湎于贸易剩余与国内的利润循环。这种情况导致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泡沫经济”,终于,当泡沫破灭时,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不景气。

总之,国家经济的纠缠以及政府财政对全球市场与外贷的依赖,创造了民族国家的国际财政危机的产生条件,甚至最富裕与最有权力的民族国家亦不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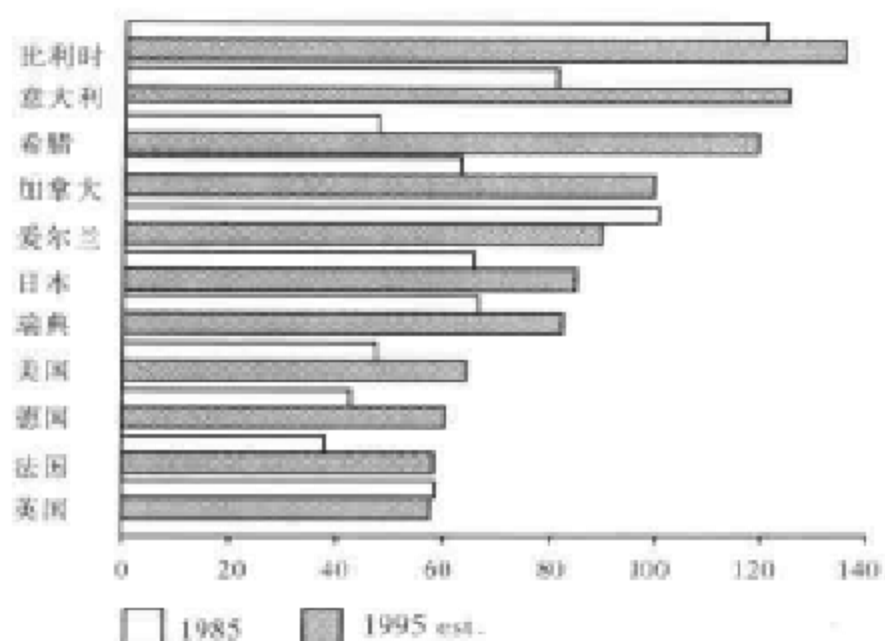


图 5-1 一般的政府总财政负债(占 GDP%)

资料来源: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经济学人》所制(1996年1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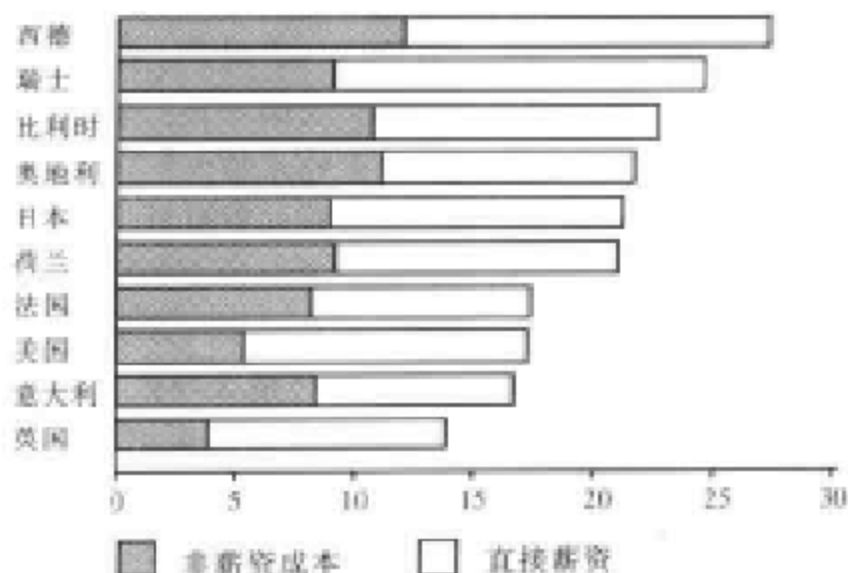


图 5-2 制造业劳动成本(1994年)(美元/小时)

资料来源: 瑞典雇主联盟。《经济学人》所制(1996年1月27日)

### 三 全球化与福利国家

生产与投资的全球化也威胁着福利国家，而福利国家是这半个世纪以来民族国家政策中的关键元素，也可能是工业化国家正当性的主要基石。<sup>①</sup>而此威胁肇因于厂商在面临不同国家分殊的社会利益和管制层级带来主要成本的差异时，全球性整合市场操作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也就与日俱增。但这不只是南北半球国家之间的差异而已，也同样地发生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之间：例如，与获益相关的社会性劳动成本这一项目上，美国要远低于德国（参见图 5-2）。但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实施后，美国相对于德国的区位优势，却相对于墨西哥成为比较劣势。因为，由于信息科技，厂商可设置于许多不同的基地与全球生产网络及市场相联结（参见第一册第六章）。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成本的低价竞争。过去对这种“恶性竞争”的限制有两个：一方面相对于先进经济国家，低度发展国家的所保护的劳工在生产力与品质上有一定的落差；另外，因应国内压力引发保护主义，可以通过关税增加进口商品的价格使其失去其比较优势。而今这两个限制正在萎缩中，新的世界贸易组织正在建立监督系统来检查与处罚自由贸易的障碍。尽管国际贸易的政治对这种控制造成的实际冲击有所约制，然而似乎除非全球经济整合过程发生戏剧性逆转，否则那些旗帜鲜明、大规模的保护主义者将逐渐成为其他国家的报复目标。至于国家之间品质与生产力落差的问题，哈雷·谢肯（Harley Shaiken）对美国在墨西哥的汽车工厂的研究显示了墨西哥工人生产力的急速提升，约只要 18 个月就能够追上美国劳工的生产力。在亚洲也观察到类似的过

---

<sup>①</sup> 威兰斯基（1975）；加兰维兹（1976）；纳瓦洛（1994，1995）；卡斯特（1996）。



程。<sup>①</sup> 美国劳动生产力仍是世界上最高者（在此应提醒欧洲人），因此与仍负担慷慨的福利国家的欧洲相比较，两者并没有潜在的竞争力的差距。在一个以资本、商品、服务为核心市场，且越来越在全球尺度上整合的经济中，若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品质程度相当，则没有什么机会发展路线迥异的福利国家。只有连结上国际关税协定的全球性社会契约（以不必然使社会条件等同于劳动条件的情形下来缩小差距），能避免最慷慨的福利国家走上终点。然而，由于在新的自由化、网络化的全球经济中，这种遥不可及的社会契约实不可能，福利国家遂保持低调并矮化至最小公约数。<sup>②</sup> 这么一来，福利国家正当性与稳定性的基本元素遂渐行渐远，不只在欧洲如此，而是遍及全世界，从中产阶级福利国家，如智利或墨西哥，到计划福利国家的残余，如俄罗斯、中国或印度，或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社会抗争所产生的都市福利国家，如美国等。

由此可见，民族国家对于货币政策的控制、预算的决定、生产与贸易的组织、公司税的课征、实现提供社会利益的承诺，都越来越无力了。总的来说，虽然民族国家仍然具备某种管制能力及对于目标的相对控制，然而它大部分的经济权力却已经消失了。

#### 四 全球通讯网络、地方受众、不确定的管制者

在国家权力的其他重要的领域方面（例如媒体与通讯）国家管制与控制的前景也不看好。信息与娱乐的控制，以及经此而来的、长期以来国家权力之所系的意见与意象的控制，在此大众媒体的年代被修正。<sup>③</sup> 在这个国度里，民族国家面临三个主要的、彼此相关的挑战：所有权的全球化与连锁关系、技术的弹性与普及、媒体的自主与多元性（参见第一册第五章）。事实上，大部

① 赛肯（1990）；罗杰斯（1994）。

② 莎根博与坎贝尔（1994）；纳瓦洛（1995）；卡斯特（1996）。

③ 马特莱特（1991）。

分国家已对此弃械投降了。<sup>①</sup>除了美国这个主要的特例之外,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前,世界上大部分的电视仍由政府控制,广播与报纸也受到政府意志的严厉的潜在钳制,即便民主国家亦然。例如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对电子媒体实施严密控制,它也不总是能够超脱特定带有利益的成见,<sup>②</sup>三个主要的电视网独占了90%的受众,框架了(如果不算形塑)公共意见。然而所有的事在10年之中改观了。<sup>③</sup>技术驱动了这个变化。通讯模式的多元化、所有的媒体在数字超文本(hypertext)中的互相连结、互动式多媒体的开启,以及对于卫星讯号跨边界、计算机媒介通讯超越电话线的无力控制,爆破了管制防卫的传统界线。远传通讯的突飞猛进与有线电视的发展,为前所未见的广电力量提供了运输工具。企业看到了此趋势并攫取了机会。大规模的并购案发生,资本绕着世界移动以在媒体产业(一种可与经济、文化、政治领域中的权力相连结的产业)中占位。<sup>④</sup>20世纪80年代民族政府以不同的形式承受压力:<sup>⑤</sup>公开发表意见、对媒体自由与多样性的渴望;经营困难的国营企业被买下;专栏作家协会为持平的沟通辩解;人人有权或近期可望如此的政治满意(若非政治支持)的承诺;以及,尤其重要的是,老道官员的个人利益。象征政治,吸收了媒体自由化与技术现代化,而在倒向迎合新媒体系统的精英意见中,扮演重要角色。<sup>⑥</sup>除了中国、新加坡以及伊斯兰基本教义派世界之外,几乎每个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期间,媒体的制度与企业结构都经历

① 布鲁曼斐德(1994);布莱拿(1994);钟(1994);格莱富(1995)。

② 柯罕(1986)。

③ 杜尔(1992);艾文等(1994);尼瓜彭(1995);史考特等(1995);维达(1996)。

④ 麦当劳(1990)。

⑤ 盖博等(1993);维达(1996)。

⑥ 维达及多顿(1990)。



了戏剧性的转向。<sup>①</sup> 电视与广播大量地私有化，留下来的政府网络也因为必须要遵守收视率与/或广告收入守则，而经常变得与私营电视台没什么区别。<sup>②</sup> 报纸则集中在几个多半有财团为后盾的公会手中。以及最重要地，媒体企业走向全球化，以资本、才能、技术与法人所有权绕着地球跑，而不再是民族国家所能控制。但国家在媒体方面并非就完全没有筹码。政府仍然控制重要媒体，持有股份，且在媒体世界的盛大阵容中掌握影响工具。而企业则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犯潜在市场的守门员：当默多克的星空卫视（Murdoch's Star Channel）因其对中国政治的自由派观点而受到中国政府的斥责后，卫视频道善意回应新的限制，从该频道的中国节目表中取消英国国家广播电台（BBC）的新闻服务，且投资于《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网络版。但是，如果说政府对于媒体仍有影响力，除了对于那些威权国家直接控制下的媒体之外，他们却已失去大部分的权力。甚者，媒体需要建立他们的独立性，当作其可信度的关键成分——不仅是关系到公共意见，也关系着权力掌有者与广告客户的多元性，因为广告业是媒体业的经济基础。如果某一媒体特别倾向某种鲜明的政治选择，或系统性地压制某类讯息，将会使它的听众限制在一个相当小的部门中，而很难在市场获利，也无法迎合多数顾客的利益。另一方面，媒体越独立、宽广、可信，它便越吸引讯息以及来自各处的买方、卖方。独立与专业主义不仅是鼓舞媒体的意识形态：它们转化为好的商机，当机会来时，有时候，良好商机也包括将这种独立性以较高的价格卖掉的可能性。一旦媒体的独立性被认知，一旦民族国家默许这种性质是其民主特征的基本证明，这种循环就会结束：任何要削弱媒体自由的企图都要付出很高的政治

① 麦当劳（1990）；杜尔（1992）；培瑞兹泰博纳诺（1993）；丹佐人文研究中心（1994）；经济学人（1994, 1996）。

② 培瑞兹泰博纳诺等（1993）。

代价，因为公民在新闻的正确性上虽不见得是挑剔的，却小心翼翼地守卫他们从未经国家认可的消息来源接收讯息的特权。这是为什么即使是权威国家也在信息年代中逐渐失去了其媒体的战场。信息与意像通过卫星、录像带或国际网络扩散的能力，戏剧性地扩张了，因此在权威国家的主要都市中心，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另类精英所住的地方，新闻管制越来越无效。进一步地，由于全世界的政府都想“走向全球”，而全球媒体是它们的可及性管道，因此政府往往还是走入双向通讯系统的谈判中，尽管这种进展缓慢而谨慎，然而最终亦将危及它对通讯的掌握。

伴随着媒体的全球化运动，由于新通讯技术之故，在许多国家中出现了例如卫星传送成本的负担降低，以及特别是在广播与有线电视方面，地方媒体的杰出成长的现象。大部分的这些地方媒体，它们分享节目的制作，并与特定的、普遍的受众之间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连结，而能避免大众媒体的标准化观点。如此一来，它们逃出了传统上民族国家经由电视网络与主要报纸所建立的控制管道（直接或间接）。利用弹性的通讯技术，地方与区域媒体的政治自主性日益增长的趋势，正如形塑公共态度方面中的媒体全球化一样重要。甚且，随着全球媒体公司为了收购具有特定利益的市场而接受以地方媒体为主的阅听者的前提下，这两个趋势在许多方面逐渐结合。<sup>①</sup>

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通讯也同样地逃避民族国家的控制，指引出跨领域通讯的新纪元。<sup>②</sup> 大部分的政府似乎被这种前景吓坏了。1996年1月法国信息技术部长宣告：法国政府试图在欧盟提出一系列限制免费上网的提案。这个事件催生了法国的技术检

① 李文（1987）；亚伯森等（1988）；席尔（1994）；史普莱根（1995）；法洛可（1996）。

② 康恩（1994）；金融技术国际告示版（1995）；库特南（1995）；乌拜司（1995）。





查的大型计划，成为密特朗（Mitterrand）的最后战役。而法国却是欧洲自由的革命理想以及迷你电讯（Minitel）的发源地。在密特朗死后，密特朗的医师出版了一本书，揭露了密特朗罹患前列腺癌长达14年的整个总统任期。在密特朗家属的要求下，那本书在法国成为禁书，但每个人都可在网络上读到它。法国政府的震怒超过了这个特定议题。很明显地，政府或法庭对于信息的决定再也无法执行。信息年代之前的漫长历史中，信息的控制一直都是国家权力的基础。<sup>①</sup>与此同时，相似的情况也开始发生在中国、德国与美国政府，从中国的金融与政治信息，到美国的儿童色情。<sup>②</sup>此事的核心乃是跨界信息流动的问题，跨界信息流动导致了起诉信息来源的困难，即便它已被侦测到。人们仍在论战：究竟有没有真正的技术可能以截断上网而不致关闭整个国家与网络的连结。似乎，事后检查与刑罚，以及自动监视设计，比阻断通讯来得容易。但是就算外部监视测量变得有效，它们也会使网络缩水，因而削弱有用信息的可及性，也削减互动的范围与深度。而且，为了选择性地削弱网络，所有连上网的国家必须要对哪一项是要查禁的议题达成共识，然后设置一个联合的监测系统，然而这在民主国家势必会被挑战而认为是违宪的。事实上，在美国，1996年1月，宾夕法尼亚州联邦陪审团已宣称：大部分企图管制网络色情的新联邦法律是违宪的。在一个具有强制性的决定中，三位法官写道：“正如国际网络的力量杂乱无章，我们的自由的力量也是依赖在宪法第一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所保护的自由言论的混乱与杂音上”。<sup>③</sup>因此，对于未来的日子，民族国家将会继续努力，为了对全球互连的电讯网络中流通的信息进行控制而奋战。我打赌这是一个必输的战

① 考区（1990）。

② 伯曼与维兹南（1995）；发尔森（1996）；路易士（1996a）。

③ 路易士（1996b）所引述。

场。同时，随着这个最后的挫败，国家权力的基石也将丧失。

总之，媒体以及电子通讯的全球化/地方化，就等同于信息的去民族化与去国家化。这两个趋势在此时已是不可分的。

### 五 法律失效的世界?

犯罪全球化，大大地改变了治理过程，且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把国家架空，因而进一步地摧毁民族国家。这个重要的趋势，它的状况很容易被认知到，然而它的结果却同样容易地被忽略。<sup>①</sup>第三册第三章整章分析了我们世界的最关键的趋势是什么，并说明了它与其他时期的独特性。在这点的论证上，我们必须在这种趋势中加入对于民族国家当前危机的理解。犯罪的蔓延及其对政治的冲击，并不新鲜。新的是，组织性犯罪的全球串连，因为基于犯罪经济的尺度与动力，而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对国际关系的调控。新的是，各个不同背景的民族国家，在国际犯罪的影响下，所造成的深层穿透与最终导致的不稳定化。尽管毒品走私是新犯罪经济的最重要产业部门，然而通过所有犯罪之本——洗钱，各种走私也都在这个触角及权力扩及了全世界的阴暗系统中集结起来：无论是武器、技术、放射性物质、艺术珍品、人口、人类器官、杀手以及所有有利可图的东西的偷渡，通通连结了起来。要是不靠洗钱，犯罪经济不会是全球性的，也不会有高利润。同时，通过洗钱，犯罪经济与全球金融市场连在一起，成为全球市场的可观成分以及投机的无情来源。根据1994年10月在那不勒斯(Naples)召开的联合国全球犯罪经济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Global Criminal Economy)，<sup>②</sup>一个合理的估算认为，每年在全球金融系统中洗钱的非法来源的资金，大

① 阿瑞塔(1991);罗斯及福瑞(1992);史密斯(1993);拉达托(1994);史特林(1994);高登(1995);汉登曼(1995);强森(1995);伍登(1996)。

②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委员会(1994)。



约是7500亿美元。这些资金的流动较任何从其他产业而来的资本需要更具移动力与弹性的处理，因为，不断地转动正是使它避免被执法单位追踪的原因。

这些趋势对民族国家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①在许多案例中，国家的整体结构，通常还包括权力最高层级，不管是经由腐败、恐吓或不法的政治贿赂都被犯罪连结所穿透，因此对于公共事务的处理上也形成了混乱；

②在许多国家中，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已经多多少少有赖于联手打击犯罪经济的合作或对抗的方式。迄今，典型的案例是美国与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墨西哥、巴拉圭、巴拿马）之间的关系，但随着犯罪经济的多元化，它已经变成越来越广泛的现象 [例如，德国关注俄罗斯黑手党的放射性物质的生产运送；或是俄罗斯政府担忧俄罗斯黑手党（Russian Mafiya）与西西里黑手党及哥伦比亚的企业走得越来越近]；

③有着犯罪源头的金融流动的重要性逐渐升高，乃是刺激整个民族经济或使民族经济不稳定的关键因素，因此，许多国家若不把这个高度不可预测的因素考虑进来，那么就不能制订出适当的经济政策。

过去，被犯罪经济的风波与处理严重影响的民族政府仅限于少数那些常见的嫌疑犯，例如意大利或哥伦比亚。今天不再是这样。这个现象的重要性，其全球触角、财富与影响力的规模、以及与国际金融的稳固连结，在主要国家中已经使政治腐败的犯罪连结成为经常的属性。例如，日本黑社会（Yakuza）最近已将网络加以国际化。日本黑社会与政府领袖之间的公开或半公开的结合已经广为人知，长久以来，建设省（Ministry of Construction）被视为自民党为了黑道赞助的企业的高额献金而在公共工程上交换政府契约的管道——这个系统与涉及到黑手党的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的梅泽佐诺（Mezzogiorno）发展计划相去不远。或者，当1996年一连串的银行危机打击日本，导致数以千亿的未偿还

贷款，人们开始严重地质疑黑社会在左右银行经理允许这些贷款上的角色（还包括两位银行家的死亡）。<sup>①</sup> 在其他的情况下，一个值得担忧的发展是，国际性的俄罗斯犯罪组织，可能已经渗透到全世界强国中政府的不同部门（包括军队）。20世纪90年代撼动世界各地政府的一连串政治丑闻中，则有许多的案例是关于全球犯罪结构与民族国家结构两者之间的持续性权力角力（我将在第六章分析这个主题）。进一步地，一些主要国家自认由于其较高位阶而能免疫于犯罪的渗透，最后也经历到犯罪政治权术的余震。例如，当1994~1995年墨西哥经济崩溃，虽有大量的美国贷款，却因毒贩渗透了墨西哥执政党的最高层，某个程度地触动了政治危机（我将在下面进一步解释此种说法），而导致美元暴跌，德国马克在货币市场狂飙，而造成欧洲货币系统的不稳定。这乃是因为投资者害怕美国政府赤字将因其致力于将墨西哥从其潜在崩溃中拉拔出来而攀高。在这个犯罪、资本、权力紧紧纠缠的旋风中，没一处安全之地。或者，就民族国家而言，没一个安全的国家制度。

因此，全球化，在其不同的方面，削弱了民族国家的自主性与决策权力。而它产生的关键时刻，也正是国家权力在国际范围的操作屈从于国防、外交政策、全球公共政策（例如环境政策）的多边主义的限制之时。

## 第二节 多边主义时代的民族国家

后冷战时期的特征是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多边相互依

① 伍登（1996）。



赖。<sup>①</sup>基本上，这是由于三个原因：围绕着两大超级强权所建立的军事集团的瓦解或松动、新技术对战事的戏剧性冲击、知识与信息的增加使人类所要面临的主要挑战的全球性特征（例如环境安全的案例）成为社会认知。

随着苏联解体，姑且不论将来俄罗斯、中国与北约之间可能的张力，围绕着两大超级强权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策略结盟的主要稳定机制也跟着瓦解。<sup>②</sup>尽管北约仍是以美国为首组织起来的西方联盟，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因为要与多个国家联盟完成安全任务，它的功能也被重新界定，只要可能，它也与联合国合作。这个全球的、集体安全的新概念，<sup>③</sup>首次发生在为了因应从中东石油供应国而来的共同威胁而引发的海湾战争（the Gulf War），引发了最强大军力（美国与英国的专业军队）与战事出资者（战争初期的日本、德国、阿拉伯王子）的共生关系，以及为了文明世界的说词（通常由法国领袖发动）。如同在波斯尼亚，以北约为班底的联盟刻意将俄罗斯卷入战事，就像是把军事联盟从强权支配转化为对这个倾覆中的世界秩序的联合整肃，以对抗对这个系统的潜在的、不可预测的威胁。新的安全体系正在建立，基本上，以对抗外面那些尚未被命名的野蛮人。<sup>④</sup>这么一来，民族国家（也包括最有权力者）深陷利益与谈判纠结的网中，而对于每个议题的处理又将自身重新塑造为不同的形式。不像在冷战核子年代中超级强权及其联盟的潜在对抗，有着生死情势的截然不同的结果，现在多角关系的外交政策所形成的混乱，已经转译为任何国家在国际领域中不可能单独行动。外交政策，基本上，在这个千禧年的尾声已

① 拜理斯瑞邱（1992）；麦克鲁（1992）；佛克（1995）；莫勒（1995）；查迪瓦（1996）。

② 查迪瓦（1996）；麦克鲁（1992b）。

③ 麦克鲁（1992a）；莫客塔利安（1994）。

④ 罗森南（1990）；波多（1993）；古汉诺（1993）。

成为多边关系。<sup>①</sup> 两个主要的保留看法，乃是关于苏联（仍是核超级大国）与中国（形成中的超级大国）被编整入这个集体安全系统的程度。<sup>②</sup> 然而，为了它们的利益，二者都不会去组织一组永久的联盟（除了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因此它们的相对孤立，以及彼此之间的高度猜疑，并不违背新安全体系的多边特质，只不过增加其复杂性而已。

军事技术的快速变迁也同样地削弱了民族国家单独立足的能力。<sup>③</sup> 正如海湾战争所证明的那样，如今，电子与通讯技术乃是军事之所赖。透过导弹与轰炸，由长程射击所造成的大破坏，足以在几个小时内摧毁掉规模庞大的军队，特别是，如果射击目标被千里外的卫星定位及计算机指挥的真实战火所执行，以及防卫系统被反制系统搞成失灵之际。传统的战事是，而且向来就是，依赖于技术的。现在不同的是，一方面，技术的速度改变了，导致武器一下子就过时无用。<sup>④</sup> 这使得武器系统需不断升级，如果军队理应真的与其他军队作战而不是用来控制自己的人民（很多地方仍是这样）的话。低技术军队再也不是军队，但却成了伪装的警力。另一方面，新军事技术的特色导致了专业军队的必要性，它的人员必须具有先进知识以操控半自动化的武器装备与通讯系统。这使得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具有优势，而无关乎军队规模的大小，以色列与新加坡都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技术角色的重要，想要建立有执行暴力能力的民族国家，则变成了永远依赖技术供应者，这不只是硬件方面的依赖，也是人力资源方面的依赖。然而，这种依赖必须被放在传统战争武器随着国家工业化与技术扩散而越来越多样化的背景中。<sup>⑤</sup> 因此，巴西和以色列可以

① 法兰克（1988）；麦克鲁等（1992）。

② 波德曼（1994）；查迪瓦（1996）。

③ 麦克因斯（1992）。

④ 麦克因斯及谢斐尔德（1988）；格理安（1995）。

⑤ 麦克鲁（1992b）。



说是先进战争设备的有效供应者。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中国，与美国和俄罗斯一起作为世界军队的供应者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随着中国向俄罗斯购买先进的战机、向美国购买通讯技术，法国出售飞弹给任何想要的人并附赠训练与维修的售后服务，越来越复杂的合作与竞争模式由此诞生。此外，从雄蜂导弹到爱国者导弹，从神经毒气到电子拦截设备，当任何一项技术变得可得而其广泛扩散成为可能，武器（无论何种武器）的非法全球市场遂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接着，不同于其他的历史时期，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战争设备的生产中自给自足，除了美国这个根本的例外（因为如今俄罗斯对微电子与通讯仍有技术依赖）。但这并不指涉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将沦落为美国的殖民地。甚至相反。由于缺乏明显的对手，美国国防部放松其技术控制，因而大部分的基础技术与传统武器遂随处可见。由于民族国家不能控制最精良的设备的供应来源，它们遂在这个发动战争的权力的潜在操演中，永远地依赖，不是依赖于美国，而是依赖于多元的、全球的供应网。那么，对美国而言，这个现象也没有转化为其外交政策上的完整主权，乃因其软弱的金融与政治地位（相对于其致力于武力放洋）之故。<sup>①</sup> 甚且，正如麦可因斯（McInnes）所论证的那样：“现代战事的特征导致军事思想家质疑：一个密集冲突是否值得投入这么多成本（不管是否用到核武器），而就算战争真的发生，又能维持多久（已知高科技武器是多么的昂贵，却又是多快地被摧毁）。”<sup>②</sup>

技术演进为国际关系加入了新旋风而使之朝向多边主义。这个新领域的工业化、科学与技术知识的扩散，以及所有东西的非法贸易，全都向前推进了，也正推向核子战、化学战、生物战能

① 麦克鲁（1992b）。

② 麦可因斯（1992：156）。

力的大量进展。<sup>①</sup> 因此, 尽管民族国家在传统战事中越来越依赖关键技术, 它们仍可拥有我所谓的“否决科技” (veto technology), 也就是大量破坏的武器, 其存在可阻挠较强一方的胜利。这种全球“恐怖平衡”乃正处于分散为许多个地方“恐怖平衡”的情况中。这个趋势一方面导致主要权力开始采取协力的、多边的行动, 以避免被新的国家、政治力量或恐怖团体控制这些武器; 另一方面, 一旦某些国家无论如何拥有这些武器, 全球安全体系也就不得不介入与支持每一个地区的破坏的平衡力量, 以避免危险的地方战斗。<sup>②</sup> 随之而来的是不同层次的破坏力所组成的复杂的、纠缠的网, 而惟有以协议以及裁武与撤军的谈判过程来控制彼此。在这样的网中, 再也没有一个民族国家 (甚至美国) 是自由的, 因为误判或过度使用优势权力, 将可能触发一场地方的核子或细菌浩劫。人类将会与我们所发明的破坏怪兽一起生活很久, 民族国家 (不仅仅是冷战时期的超级强权) 的最基本课题, 于是变成限制其真正使用所拥有的军事权力, 从而削弱其原来的存在根基。

至于对这个星球的环境的全球管理, 民族国家也面临其正当性的限制, 遂终将面临其权力的限制。<sup>③</sup> 由于计算机能力的增加, 科学与技术正在制造破坏自然的空前新知, 也同时制造自然破坏对我们这种物种所造成的后果的新知。在一个相关的发展上, 如第三章所言, 通过对政府遏止大灾难的责任一再施压, 环境运动在世界各地提升了社会的生态意识。然而, 个别的民族国家是没有能力单独地对诸如全球暖化、臭氧层、森林采伐、水源保护区污染、海洋生物枯竭等这些

① 麦克鲁 (1992b)。

② 丹尼尔及汉斯 (1995)。

③ 罗兰斯 (1992); 威格勒 (1992); 莫林及克恩 (1993); 华布纳 (1995); 汉培尔 (1996)。





议题采取行动。几个国家联手动作，与其说是真正执行联合行动计划，倒不如说是进行国际政治秀以及发表严正的修辞。李普舒（Lipschutz）与柯卡（Coca）在他们对于环境合作政策的全球调查的总结上写道：

就环境议题而言，要出现一个具有领导权的取向或是核心的整合单位的可能性似乎还很遥远。有效的多边整合的可能性也似乎很小，主要是因为环境保护与管理的成本与效益的不确定性。在这些障碍与条件之外，我们应加入国家自身本质的种种因素：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其所涉入的破坏过程、有效的政策杠杆的匮乏，以及为了关键的国家—社会联盟而榨取关键性的资源（因而破坏环境）。<sup>①</sup>

这不必然是因为忽略了政府的这个部分或对它失去信心，而是因为每一个民族国家一直是基于其自身利益、或基于其最看重的选民的利益而采取行动。<sup>②</sup> 这么一来，多边主义成为论坛与谈判桌，而不是为了实现集体责任的工具。顺着哈贝马斯（Habermas）的“危机转移”（crisis displacement）逻辑，“基本的、全球性的环境—经济矛盾”，如黑（Hay）所论述的，“变成被转移至民族国家的层次”。<sup>③</sup> 这个结构性地产生的民族国家的僵化，矛盾地导致了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有能力的政治体制的弱化，因为全世界的公民也已了解这些既昂贵又沉重的国家机器已经无能处理这个挑战人类的大议题。因此，为了克服民族国家的越来越渺小的趋势，民族国家越来越键结在一起，方向转移至一个新的超民族治理秩序。

① 李普舒与柯卡（1993：332）。

② 卡斯特（即将出版）。

③ 黑（1994：87）。

### 第三节 全球治理与超民族国家

“如果你想要一个简洁的解释来说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欧洲整合的再生动力”，如史崔克（Streeck）与施密特（Schmitter）所述：“你大概会说这一方面是欧洲大厂努力克服其感受到的日本与美国资本的竞争优势、以及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精英重寻（至少部分地）由于国际互赖的强化而在国家层级逐渐流失的政治主权这两者结合的结果。”<sup>①</sup> 对两者而言，无论是企业利益与政治利益，所寻找的并不是超民族性，而是在更高的层级上（在一个对于财富、信息与权力的全球流动能进行某种程度控制的层级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权力的重构。欧盟的形成（如我在第三册将论述的）并不是一个为未来建立欧洲联邦政府的过程，而是一个政治同盟——布鲁塞尔联盟（the Brussels cartel）的建立，使欧洲的民族国家仍可从新的全球失序中集体地创立某种程度的主权，然后在永无止境的谈判规则下分配不同成员的利益。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超级民族国家的诞生，是国家以不同权力组合表现出其成员的个别利益的加总，而不是超民族以及全球治理的指引的原因。<sup>②</sup>

一个相类似的说法则是对世纪末世界经济、安全、发展与环境的共同管理的国际制度的多元性的解释。<sup>③</sup> 世界贸易组织（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建立，系通过控制与谈判的无干扰

① 史崔克及施密特（1991：148）。

② 奥勒（1995）。

③ 波顿（1993）；罗切斯特（1993）；巴切以及高登可（1994）；丹纳何（1994）；佛克（1995）；克鲁斯及耐特（1995）；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的失察（1995）。



机制形成贸易限制，以促成相容的自由贸易。联合国也竞相建立其新的、双重角色，它既是和平与人权行动的正当性警力，也是世界媒体中心，每六个月召开人类头等事件——环境、人口、社会排斥、妇女、城市等——的全球会议。全球七大工业国（G-7）将其本身指定为全球经济的督导，让俄罗斯站在窗外看（如果真是如此），并指示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需确保全球与地方金融市场与货币保持纪律。后冷战的北约以可信赖的军武核心之姿出现，以整肃新世界的失序状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强化了西半球的经济整合，虽然挂着北方的标签，智利却是潜在的成员之一。另一方面，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主张通过与欧洲（而非美国）的贸易增加以形成南美的独立。各种太平洋合作国际制度试着建立经济利益的共同性，跨越亚太主要成员（日本、中国、韩国、俄罗斯）之间的历史性猜忌。全世界的国家都在使用旧的制度，例如东南亚国协（ASEAN）或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甚或后殖民制度，例如大英共同财富（the British Commonwealth）或法国合作体系，以作为一个平台来操作合作事业，往多样性目标前进，而这是个别民族国家很难做到的事。大部分对于国家政策逐渐国际化的评估，似乎对于主权平等共享的可能性抱持怀疑态度，尽管这个概念在理论上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此外，全球治理通常被视为是各国中央政府的利益被协商后的结果。<sup>①</sup> 民族国家及其精英，太汲汲于他们的特权以至于无法放弃主权，除非这个承诺有实质的回馈。同时，根据民意调查，在可见的未来，要任何国家的多数市民会接受整合的、超民族的联邦政府，还是非常不可能的事。<sup>②</sup> 美国的联邦国家的经验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因此尽管有强大的吸引力，仍不能作为这个世界的其他地区的世纪末联邦主义

① 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

② 莫勒（1995）。

者的模型。

此外，国家对于冲击公共意见（从世界各地的鲸鱼的命运到政治异议者的刑求）的全球问题越来越束手无策，导致市民社会越来越将全球公民权的责任拿到他们自己的手上。因此，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绿色和平（Greenpeace）、无国界医师（Medecins sans frontieres）、乐施会（Oxfam），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人道主义的非政府组织，遂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舞台的主要力量，而经常比政府主办的国际行动吸引更多的基金、展现得更有效以及更具有正当性。这种全球人道主义的“私部门化”逐渐削弱民族国家必要性的最后合理性。<sup>①</sup>

总之，我们所见证的是，对于主要的经济、环境与安全议题的管理的主权的共同承担已是不可逆转的；以及另一方面，同时是作为政治制度相互纠结的网的基本元素——民族国家——的已经被穿透。然而，这个过程的结果并非民族国家的强化，反而因为要换来长久维系而带来的权力的系统性侵蚀。首先，这是因为冷酷的冲突、结盟与谈判过程使得国际制度更加无效，因此国际制度的大部分政治能量都消耗在过程上，而不是消耗在结果上。这严重地拖累了国家的干预能力，国家无法自己行动，却又在尝试进行集体行动时瘫痪掉。此外，国际制度，或是为了逃离这种瘫痪，或是基于任何大型官僚的天生逻辑，倾向于只管自己。如此一来，他们界定自身的诉求乃是在取代个别国家的权力——组成实质的全球官僚体系。例如，如左翼的批判者经常主张的，国际货币基金会是美国帝国主义（或者，就这点，是任何帝国主义）的经纪人，这基本上是错的。它是它自己的经纪人，它基本上受新自由经济教条的意识形态所影响，同时又坚信在这个建立在非理性期望之上的危险世界中，它必须要作为政策与理性的防护罩。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技术官僚在1992~1995年的转型关键

<sup>①</sup> 古汉诺（1993）；维多斯（1994）；佛克（1995）。

时刻中协助摧毁俄罗斯社会的冷血行为（我的亲身观察），与资本主义的宰制毫无关系。而是，犹如曾在非洲、拉丁美洲发生过的那样，要教导全世界人民什么是金融理性、把金融理性当作是建立新社会的惟一重要地基这样一种深厚的、诚实的、意识形态的承诺。资本主义的自由巨轮声称获得了冷战的胜利（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对抗苏维埃共产主义的严酷战斗的历史污蔑），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专家并不是听命于任命他们的政府或付钱给他们的市民而行动，而是就像那些自以为是的外科医师，很技巧地把加在市场力量上的政治控制的渣滓给切除掉。于是，这些专家可能触发了全世界市民的深层愤懑，因为这些全球的机构绕过了已作废的民族国家而直接对市民的生活产生冲击。

因此，在全球政策中国际组织以及超越国家的商会所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民族国家的衰退并不能说是同一件事。但是民族国家为了要在国家的网络成为一员并小心地存活的代价就是它们越来越不重要，这也危及了它们的正当性，最后也促使它们失去权力。

## 第四节 认同、地方政府以及 民族国家的瓦解

---

1632年12月25日，欧立瓦尔斯（Olivares）的下院公爵致函其主——菲利普四世：

阁下的君主政体中最重要之事，是使陛下您成为西班牙之王；吾人意指，陛下，您不应仅满足于葡萄牙、阿热干（Aragon）、瓦伦西亚（Valencia）与巴塞罗纳下院的国王，而应致力并秘密计划使这些组成西班牙的王国降级为卡斯泰

(Castile) 的形式与律法, 使得边境、海关驻守、需要时就可以召集卡斯泰、阿热干及葡萄牙议会的权力、以及对于各处的不同国家的官员的无限制性的任命……等, 都没有差别。倘若陛下达成此事, 您将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王储。<sup>①</sup>

国王依此建言作为, 所引发的过程终导致卡泰隆尼亚 (Catalonia) 的收割者之反抗 (Revolt of Reapers) ——这个暴动是为了反抗巴斯克 (Basque Country) 的盐税, 最后导致了葡萄牙的独立。同时, 它也在过程中为现代的、集权的西班牙民族国家打下了基础, 虽然是在如此不安定 (它造就了将近三个世纪的夺权、镇压、内战、恐怖主义与制度性的不稳定) 的条件下。<sup>②</sup> 虽然西班牙政府直到 1977 年前, 都一直呈现出一种被迫性的同质性的极端现象, 然而大部分的现代民族国家, 特别是法国革命政府, 在国家的初始阶段则是建立在一种历史/文化认同的否认上, 因为这是有利于在国家出现时就占主导位置的社会群体的利益的。如第一章所论证者, 是国家而非民族 (以文化或领土、或二者共同加以定义), 在现代年代 (the Modern Age) 创建了民族国家。<sup>③</sup> 一旦民族在特定的国家领土的控制之中被创建出来, 共同的历史的确就会产生社会与文化的键结, 以及经济与政治利益。然而, 民族国家的社会利益、文化与领土的不均等的再现, 使民族制度偏颇地朝向开国精英的利益及其联盟成员之间的关系, 因此, 当被压抑的认同, 不管是已在历史中成为根深蒂固的、或是经由意识形态地再生的, 能动员历史民族契约的重新谈

① 引自艾略特与德拉潘纳 (1978: 95); 艾略特译。

② 齐迪瓦与卡斯特 (1992)

③ 诺曼 (1940); 东海 (1969); 提利 (1975); 盖纳 (1983); 纪登斯 (1985); 维图斯 (1994)。

判时，也就开启了制度危机之路。<sup>①</sup>

民族国家的结构是被地域所分化的，而这种地域分化及其权力的分享与不分享，表现了组成国家的社会利益、文化、区域与民族性等的结盟与对立。诚如我在别处所仔细说明的那样，<sup>②</sup> 国家制度的地域分化绝大部分地解释了一个清楚的奥秘——何以国家的统治经常能够只对少数人有利，然而却不需要寻求镇压。次等社群，以及文化的、民族的、区域的少数民族，确实在政府的较低层级（他们所生活的领域）具有权力的可及性。因此，在国家、社会阶级、社会群体与公民社会所表现的认同等之间，产生了一个复杂的几何关系。在每个社区与每个区域，因为回应了既有的地方/区域权力关系、地域史及其特定的经济结构，因此社会联盟及其政治表现乃各有不同。这种依据不同区域与社区而分化的权力结盟，总体而言，是一种使不同的精英利益（共同从国家政策获利）保持平衡的基本机制，尽管份量不同、向度不同、地域不同。<sup>③</sup> 地方与区域领导人，为了他们对民族层次的支配结构（国族或全球精英更有权势）的忠诚，在他们的领域内进行权力交易。地方领导人是地方社会与民族国家的中介者：他们同时也是政治掮客与地方头家。由于地方政府层级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协议，并非经常与民族层级的不同社会利益之间的政治联盟一致，地方权力系统不易沿着严格的政党规则发展，即使在政党支配民主的欧洲亦然。地方与区域的社会联盟经常就是围着地方领导权所组织的安排。因此，同时，地方与区域政府是分散化的国家权力的展现，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最接近的接触点，也是文化认同（虽在整体领域内具有霸权，却以零零落落的方式被民族

① 霍布斯帮（1990）；盖理欧（1994）。

② 卡斯特（1981）。

③ 都隆（1978）；塔洛（1978）。

国家的统治精英纳入) 的表现。<sup>①</sup>

我在第一章已经讨论过, 对于网络社会不断分歧和片断化的社会趋向终归会整合在一种(再)建构的认同形式之上。因此, 一个多元的认同将对民族国家传达公民社会的主张、要求和挑战。而民族国家在同时回应这些庞大纷陈的需求时所渐增的无力感也就是哈贝马斯<sup>②</sup>说的“合法性危机”, 或是理查·森涅特(Richard Sennett)分析的“公共人(public man)的衰落”,<sup>③</sup>而公共人是民主主义的公民权的基础。为了要克服这种合法性危机, 国家开始将权力分散到地方或区域性的政治机制。而这个过程肇因于两种相互汇聚的趋势, 其一是因为国家机制的地域性分化, 区域性及全国性的少数群体发现他们的认同在地方或区域层级上更容易彰显; 其二是因为政府部门逐渐聚焦于处理来自全球的财货、交流和权力所造成的重大挑战, 因此, 逐渐赋予较低层级的政府担负起和社会连结并处理日常生活议题的责任, 并经由去中心化来重建政府的合法性。然而, 一旦这种权力去中心化情形产生之后, 地方和区域政府将会以为民牟利之名争取主导权, 并且投身于回应全球系统的发展性策略, 最后将与自己的国家产生竞争性。

这种趋势普遍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 在美国, 和对联邦政府渐增的不信任同时发生的是地方和州政府作为公共意向基地的复苏, 事实上, 根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民意调查,<sup>④</sup>当“郡权”(county right)运动或是共和党重生运动危及联邦政府并建立其自身的合法性时, 政府的再地方化以超保守的民粹主义形式

① 葛瑞米恩(1976); 法拉莱斯与开马尼(1977); 洛肯及欧文(1982); 波哈(1988); 奇卡地(1995); 波哈与卡斯特(1996)。

② 哈贝马斯(1973)。

③ 森涅特(1978)。

④ 洛波公共意见及民意调查(1995)。





为政治的再正当化提供了最直接的渠道。<sup>①</sup> 在欧盟，当许多主权的实质区域转移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时，在多数国家里，许多关于日常生活事务的责任归属也转移到了区域和地方政府，包括教育、社会政策、文化、住宅、环境与都市生活设施等。<sup>②</sup> 更进一步，欧洲的许多城市和区域直接跳过民族国家而成立制度性网络并连结在一起，建立起一个巨大的交涉空间，同时对欧洲和他们各自的国家起作用。此外城市与区域也积极投身于多国合作关系的直接交涉，并且成为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作用者，因为国家的政府部门的行动往往会受限于欧盟的约制。<sup>③</sup> 在拉丁美洲，公共政策为因应 20 世纪 80 年代的危机所产生的结构性改变，给了州和市政府一个新的冲击，因为这些政府部门在传统上是依赖在国家的庇护之下（巴西是特别的例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20 世纪 90 年代，墨西哥、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阿根廷和智利都受惠于权力和资源的去中心化，并且肩负起许多改变拉丁美洲传统地理的社会和经济改革。<sup>④</sup>

一个例子可以从前苏联共产社会得到观察。在苏联经济混乱期间，莫斯科和地方及区域精英为权力平衡与相对稳定，就像西伯利亚联邦政府和“石油大王”（oil generals）之间的权力和利润分配的争夺。<sup>⑤</sup>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一旦国家的认同没有得到适当的认可或妥善处理，例如车臣的例子，接踵而至的战乱将会导致俄罗斯转型的出轨。<sup>⑥</sup> 因此，地方/区域政府以及领域的认同对人民未来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并作用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之间，以及形塑着民族国家的未来。有一项对政治去中心

① 波兹布朗史登（1996）。

② 莫勒（1995）。

③ 波哈等（1992）；高德史密斯（1993）；葛拉汉（1995）。

④ 奇卡地（1991、1995）；拉舍纳（1992）。

⑤ 寇斯优瓦以及卡斯特（1997）。

⑥ 开查诺瓦（1995）。

化的比较研究结果支持这个相当流行的看法，意即信息时代的中央政府要面对全球的力量时，规模过小，但在管理人民的生活事务时，又显得大而无当。<sup>①</sup>

## 第五节 国家的认同化

国家对认同的选择性制度化 (selective institutionalization) 对整体社会和国家的动力有着非常重要而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并非每一种认同都能够在地方或区域的政府部门的制度机构中找到避难所。事实上，地方领域分化的功能之一，是使国家在运用领域分化而组织个别的不均等状况时，同时遵守整体性的公平原则；举例来说，美国地方政府强大的自主性其中也有着这个规范不同的以及不平等的状况。<sup>②</sup> 地方政府为了拥有自主性而减低公共资源取得的层级，使得美国大城市或法国郊区的贫穷人和少数民族等社会问题逐渐局限于空间的范围内；地方/区域的自主性加强了其领域内的主要的精英和认同，同时却削弱了此自主性的政府机制中不具地方代表性或被隔离的社会群体。<sup>③</sup> 在此情况之下，发生两个不同的社会过程，一方面，认同趋于涵化包容，以其对地方制度的控制来扩充认同的社会和人口的基础；另一方面，地方社会防卫性地退缩，并以社会排斥的机制来建立其地方自主性。上述第一个社会过程的例子就是民主的加泰隆尼亚 (Catalonia)：由加泰隆尼亚人在加泰隆尼亚所推动，虽然，加泰隆尼亚妇女生育率远不及该区人口的社会增加，20 世纪 90 年代

① 波哈及卡斯特 (1996)。

② 布雷克利及高德史密斯 (1993)。

③ 史密斯 (1991)。



该区大部分成年的人口都不是出生于加泰隆尼亚，但是，他们推动文化整合和社会融合的过程却相当顺利，来自南西班牙的移民自然成为文化上的加泰隆尼亚人（见第一章）。这个例子重要之处在于其展现了在既定的文化/民族的认同下的加泰隆尼亚人，如何运用其对地方/区域政府的掌控来产生其自身的认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借由加强其对西班牙的民族国家之谈判战略位置的功能，一方面则是借着其对区域/地方政府机制的掌控来整合其他非加泰隆尼亚人，以及通过代理家庭（surrogate family）来再生产加泰隆尼亚人。

但是当地方制度中主导的认同和利益拒绝了整合的概念，例如一个有着种族划分的社区，则会产生一个全然不同的情境。而拒斥了官方文化所提出来的回答，却往往是该排斥性认同中所建立的排斥性的骄傲，就像许多在美国城市中的拉丁美洲人社区的情形，或者是北美法裔区的年轻人的聚集区。<sup>①</sup> 这类被排斥的少数民族的目标并非地方政府而是在挑战民族国家，借此要求权利被承认、利益被保护，并以此对抗或凌驾地方或州政府；就像美国一些少数群体所要求的《弱势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他们要求弥补过去数世纪以来在制度上和社会上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因此，民族国家在此相对是“多数”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其本身的合法性，逐渐将权力和资源转移到州政府或地方政府手上。如此一来，也就越来越不能以广泛的国家之名分配不同群体或认同的各种利益了。逐渐攀升的社会压力威胁着整体国家的均衡，而民族国家却越来越无能回应这种社会压力，因为其权力分散化、而对照于少数群体，国家自身的保护性和代表性角色逐渐丧失了合法性。最后的结果是这些少数群体以一种自我依赖的非政府结构，在社区的团体中找寻避风港。<sup>②</sup> 因此，一开始是以将

① 珍高斯基（1991）；威佛卡（1993）。

② 威宽特（1994）；特莱多（1996）。

权力从中央转移到地方的过程来重建国家的合法性，最后结果却可能加深国家合法性的危机，以及社区中建立在原初认同基础上的社会部落化 (tribalization)，正如我在第一章提过的那样。

在此发展的限制下，当一个国家并不能代表强而有力的认同、或是无法为社会中各种利益联盟提供空间，使它们能在(再)建构认同时强化自身的力量，那么，一种被特殊认同(如种族、领域或区域)所定义的社会/政治的势力将会取代国家，并使这种认同具有排斥性的特色。这就是基本教义派政府形成的过程，例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或在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由基督教联盟提倡的管治制度。乍看之下，基本教义派的做法似乎是以合乎潮流的历史观点，为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强而有力的空间。但是，事实上它却是国家消亡最深刻的表现形式，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提过的那样，伊斯兰教国家并不能称为民族国家(一个世俗的机制)，而是一种优玛 (umma)，意即信仰的社区。优玛的定义是跨国的，并且延伸到宇宙的。就像天主教会 (Catholic Church) 是一种跨国的基本教义派的运动，尽可能地利用国家所可能提供的各种支持，欲使全世界改宗到惟一的真神之下。在此观点之下，从国家和世界的关系、以及国家和领域中的社会生活的关系此方面来看，基本教义派的国家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在面对世界时，基本教义派国家必须决定是否联合其他信仰者或国家来达成其信仰的扩张，在信仰的基础上，形成社会制度、地方、国家乃至国际：基本教义派的计划是一种全球性的神权统治，而非民族的或地域性的国家。另外，在面对由国家领土所界定的社会时，基本教义主义的国家的目的不在于代表全民利益或领域中出现的各种认同，而是致力于让有这不同认同的全体人民都能够发现上帝的真理，且是惟一的真理。因此，基本教义主义的国家在释放出国家的最后一波绝对权力的同时，事实上是否定了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及持久性。

因此，在认同的死亡之舞潮流中，一方面，国家或民族只剩



下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性空壳，飘摇在全球势力流窜的大海上；另一方面，基本教义派的认同，则加强社区内线防御或是对身陷战场的民族国家发动毫不妥协的掳掠攻势。在这夹缝之中，地方政府则努力通过跨国社会网络的联合和公民社会的整合重建权威合法性和制度机构。

在此让我以实例来说明此论述的充分的意涵，我将聚焦在当代两个主要民族国家墨西哥和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所面临（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问题一样）的结构性危机。

## 第六节 民族国家的当代危机： 20 世纪 90 年代的墨西哥制度 革命党政府和美国联邦政府

在本章中所分析的民族国家的危机，也许可借着对特定危机的简要说明来作出例证，并加以澄清。但是读者应该要认识到，因为篇幅所限，以下的观察及解释并不是想作为民族危机的完整研究，就算我的研究是以经验之事为基础。从世界上许多的可能性之中，我选择了两个重要的案例，选择的原因有部分是因为我个人的熟悉程度。第一个是墨西哥制度革命党政权，这是因为它在 60 余年来作为世界上最稳定的政权之一，在近几年已逐渐解组，以下我将作进一步说明它所面临的冲击事实上是纠结了全球化、身份认同以及公民社会的转化等问题；第二个例子是美国联邦政府在面临以上问题时的实质反应，我想这是相当有意义的，即便美国因其经济规模、政治弹性以及国家结构高度去中心化等特质与其他国家并不相同，然而，正是这个例外主义<sup>①</sup>使得对

<sup>①</sup> 李普赛 (1996)。

美国民族国家的观察成为分析的对照。同时也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已经立足在弹性化的联邦政府上并向全球伸出触角,也都会被本章所强调的全球化潮流包围而陷入困境,那么这个分析将会为我们带来相当的价值。

### 一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恰帕斯 (Chiapas, 墨西哥的一个省份) 与提哇那 (Tijuana, 墨西哥的一个省份) 与制度革命党政权的困境<sup>①</sup>

经历了革命后动荡的 20 年,墨西哥建立了世界上最有效率(如果不是说最民主)的政权之一,也就是被称为制度革命党(改革制宪党)所组织创立的政府。其政治主张恰如其名是强调要将 1910~1917 年的各项改革理想和成员进行体制化并朝制度化发展。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军队与天主教会通常势力高涨,但在墨西哥,制度革命党政权却能够压制住这个与其竞争的权力中心。墨西哥又技巧性地维持它与美国之间不可避免的、亲密的关系,在享有与美国强邻的良好关系的同时,墨西哥的民族主义者得以维系、并且也保障了墨西哥政治自主权。它有意去建构一个强大的土著性格的民族认同,将此认同联系到前哥伦比亚时期文明的记忆,而让 10% 的印第安人口维持在一种模糊的边缘位置。它也成功地带动了 1940~1974 年间的经济的实质增长,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成为世界排名第

<sup>①</sup> 此墨西哥的分析资料来源基于下列三组资料:(a)来自墨西哥和一些国家的报刊杂志,例如《墨西哥社会学》(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b)还有许多出版的书籍,包括:巴李尔等 (Meja Barquera, 1985); 克理尔 (Berins Collier, 1992); 吉尔等 (Gil et al., 1993); 库克 (Cook et al., 1994) 等;还有改革制宪党 (1994), 德拉布拉 (Trejo Delarbre, 1994a, b); 阿吉尔等 (Aguirre et al., 1995), 《商业周刊》(1995c); 高登 (1995), 《经济学人》(1995b, c), 泰莱多及鲁纳 (Tirado and Luna, 1995); 华丹伯格 (Woldenberg, 1995); 奇卡迪 (1995); 托斯卡诺 (1996); 以及 (c) 我个人对墨西哥 25 年来长期的研究和认识。



12 位的经济强国。除了一些地主或地方酋长 (Caciques) 的计划性暗杀事件、偶发的政治屠杀 (举例来说 1968 年的泰拉罗卡屠杀) 以及一些左翼游击队的零星活动, 暴力对墨西哥政治而言是少见的。事实上, 总统与接班的权力交接也是有秩序的、可被预期的、且未受到挑战 and 质疑的。每一位总统都会指定其接班人, 并在卸任后永远退出政坛, 而每一个总统也都会背叛前一位总统, 但是却从来不会批评他, 而且也不会调查他所做过的事。系统性且广泛的贪污舞弊都井然有序地遵循这游戏规则, 而且事实上这是墨西哥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 每一个新上任的总统重新安排整个政府结构的政治任命, 每六年就能腾出近万个政治职位。在位期间他们有机会运用职权以各种方式为己牟利。这种政治精英的集体轮替是一个相当有利可图的系统, 为了维护集体公约, 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游戏规则才能等待到他的 (通常是“他的”) 职位。一旦打破了上述的集体默契以及沉默等待等游戏规则时, 得到的惩罚是整个官僚系统将把他永远排除在与这个国家的权力和财富相关的职位之外, 包括在媒体露脸或是有意义的学术职位等。在制度革命党之内, 不同的政治派系 (camarillas) 的权力竞争相当激烈, 但是从未打破这个集体的默契, 或是在任何纷争当中质疑总统或决策者的权威。然而, 在墨西哥, 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则在于制度革命党 (制度革命党) 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巧妙关连体系, 此体系有赖于大众部门的有机组合, 主要是通过贸易联盟 (如墨西哥贸易联盟 Confederacion de Trabajadores Mexicanos, 简称 CTM) 来控制工人阶级, 国家农民联盟 (Confederacion Nacional Campesina, 简称 CNC) 来控制佃农和农场经营者, 他们大部分都在合作农场 (ejidos) 的国家土地上共同使用和工作, 这是农业革命所建立的成果。另外, 国家人民组织联盟 (Confederacion Nacional de organizaciones populares, 简称 CNOP) 本来是要组织都市中的各个部门, 但是并没有前两者那样成功。大致上来讲, 这种政治的侍从主义 (political

clientelism) 大部分都不是靠巧饰操纵或是高压统治,而是在一种整体人民的架构之中,给予实质的物资,如工作、薪资、社会利益、财货(包括土地)以及服务(包括都市设施)。墨西哥的布尔乔亚以及外资,基本上是在外在于这个势力的,虽然制度革命党当然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党,也经常代表了他们的利益,但它却是一个民族的民粹主义的版本。事实上,除了蒙特里(Monterrey)自治团体之外,大部分的商业团体都是墨西哥政府的衍生物。因此,选举在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可以系统性地舞弊或要胁。但是大多数的状况下,制度革命成为党赢家(虽说不是每次的选举或每个项目),都是因为人民组织的效率。借由社会网络、家族系统以及个人的效忠度,一个垂直的互惠的网络涵盖了整个国家,而能够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以此来看,制度革命党系统并不仅是一个政权,而正是墨西哥实存在于20世纪的国家结构。

然而,这一切在最近不到10年的时间已经走下坡路了,也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就算21世纪的墨西哥第一任总统仍是制度革命党的候选人当选(虽然这不太可能),他将执掌的也将会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国家,因为我们上述的政治系统已经瓦解。在1994年,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的经济已经完全全球化的制度性表现——正式生效的那一年,发生了下列事件:在该年的第一天,札巴提斯塔(Zapatistas)革命分子在墨西哥东南边的恰帕斯省(Chiapas)叛变,而制度革命党的总统候选人卡罗斯欧(Luis Donaldo Colosio)被暗杀(上一次的暗杀事件是50年前的事)、墨西哥比索崩盘。虽然有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空前的支持,但是墨西哥还是几乎破产,震荡波及全球。另外,制度革命党秘书长马沙欧(Jose Francisco Ruiz Massieu)(他的前妻是总统萨立南的妹妹)被暗杀,而他哥哥的职务是代理首席检察长,在此次暗杀事件中被怀疑暗中护航,所以潜逃到国外去。当时总统卡罗·萨立南(Carlos Salinas)的胞





兄罗尔·萨立南 (Raul Salinas) 以及总统身边的一位商务助理被控以主谋上述的总书记暗杀事件之罪名, 并成为阶下囚。因此总统胞兄为贩毒集团洗钱达上亿美元的关系终于曝光, 卡罗·萨立南总统在 1994 年 8 月下台后, 他拒绝承认任何错误, 并矫饰地进行了 24 小时的绝食, 而获得继任总统柴迪罗 (Zedillo) 的礼遇和默许, 在该年 12 月离开了他的国家, 而他的离开也掀起了墨西哥史无前例的政治控诉风暴和各派系的内斗。虽然, 1994 年 8 月的这次选举依然是制度革命党获胜, 然而这次选举相当注意选风, 使得制度革命党在动荡不安和一蹶不振的担忧中赢得非常辛苦。但在随后的州、省、市的选举结果中, 保守政党国家行动党 (Partido de Accion Nacional, 简称 PAN) 的得票率明显升高许多, 左翼政党民主改革党 (partido de la Revolucion Democratica, 简称 PRD) 的得票率也有小幅的增长。柴迪罗总统对选举机器有相当程度的松手, 延揽无党籍和国家行动党成员进入其行政体系并给予相当高的职务, 他似乎要为其作为一个政府甚或是国家转型的总统作准备。但是制度革命党并不这么想, 1996 年 11 月制度革命党拒斥了其他政党在法律或政治改革方面的任何安排。

我在撰写此关于不同的政治势力以及不同党派的意识形态将如何投身新的政治领域时 (1996 年), 墨西哥的政治走向尚未明朗, 但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制度革命党政权应该已经走到其历史任务的尽头。<sup>①</sup> 真正的问题和重点是这些重要的政治事件与我们通篇所阐述的由全球化和身份认同的矛盾所引起的斗争和民族国家危机的论证为何有关? 其关系为何?

墨西哥现在的转变以及其民族国家的消退, 始于 1982 年墨

---

<sup>①</sup> 在 1996 年 11 月, 墨西哥州 (Mexico) 和西达哥州 (Hidalgo) 的地方选举由反对党大获全胜。而预定在 1997 年 7 月举行的墨西哥市和蒙特理市的选举预期也将给制度革命党带来重击。

西哥因为无法支付外债的利息，虽然墨西哥的石油生产曾在1974年和1979年世界性石油供给和油价上涨危机中承接买气。在罗帕斯·波地罗（Lopez Portillo）政权（1976~1982年）最后突然以将墨西哥银行收归国有来收场，以此铤而走险地宣示国家对经济快速国际化的控制之后，墨西哥的政治和商业精英、美国以及跨国公司的利益不知为何地决定（其中原因我并不是太清楚）墨西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因此不能再交给一个传统的民粹政党来执政。因此新一代的科技精英接掌了权力，他们多是接受过美国训练的经济、金融和政治学者，而非传统的墨西哥国立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exico，简称UNAM）法政学院的毕业生。而新时代的政治精英则仍须受业于墨西哥大学，且须和传统的制度革命党政治家族有关连才能出头。就像前述1994年下台逃亡海外的萨立南总统就是通过其父亲（1958~1964年担任商务部秘书长）和叔父欧提斯·曼那（Ortiz Mena）（1982~1988年担任财政部秘书长）进入其前任总统的网络关系中。曼理德（Madrid）（1982~1988年）则是一位过渡性的总统，他和天主教核心团体有密切关连，为了要使墨西哥的财政步入轨道，并且在制度革命党政府中培植年轻、有科技才能且有政治担当的领导人才成为创造新政府和新国家的工作团队；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卡罗·萨立南任审计部长，普林斯顿的曼威·卡曼周（Manuel Camacho）担任都市发展局长等都是其中重要的人物。然而这个由麦格·阿拉曼（Miguel Aleman）总统在20世纪80年代推动的大胆的计划使墨西哥陷入经济紧缩，而为了各种现实理由，打破了原有的劳动或都市大众部门的社会契约。工会领导人小心地不使自身的特殊利益受损，然而工业部门的劳工、政府部门的受雇者以及人民团体等都对此重构过程感到相当痛苦。继而，在1985年的墨西哥地震中，房屋和商业活动严重受毁，因此触发了社会的各种不满。一个由可沙麦克·卡迪那斯（Cuauhtemoc Cardenas）（卡迪那斯将军的儿子，卡迪那斯将军是



制度革命党在 20 世纪 30 年代民粹主义的领袖) 组织而成的新的政治联盟 FDN, 趁此情势吸引了所有制度革命党政党中的左派加入。1988 年的总统选举, 制度革命党政权几乎不保: 在墨西哥市、瓜达拉哈拉 (哈里斯可 Jalisco 省之首府)、瓜达华瑞兹等城市都失掉了选票。制度革命党为指派的总统候选人萨立南动了点手脚才获胜, 而这也是这次险胜的关键因素。萨立南知道该怎样做, 他是一个聪明而教育程度高的人。他指派他的旧友曼威·卡曼周 (Manuel Camacho) 为墨西哥市的市长, 并尽量放手让他发挥潜能: 社会方案、和市民沟通以及民主化等。新任的总统 [得力于被喻为“墨西哥的拉斯普丁 (Rusputin)”的法籍西班牙裔国际顾问荷西·卡多巴 Jose Cordoba 的帮助] 致力于将墨西哥全力整合进全球经济体系。萨立南直截了当的观点认为: “我们亲眼看到市场正激烈而快速地全球化、技术和知识的革命创造我们的生活, 以及一个较以往更统一而普遍的历史”<sup>①</sup>。而事实上, 他对总统卸任后的生涯目标是要成为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的首任秘书长。因此, 他勒紧了墨西哥人民的裤带, 大幅减少公共支出, 将通讯和电讯设备现代化, 将银行国际化, 以及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奖励外商投资等。虽然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仍感到紧迫, 但是通货膨胀下降、墨西哥经济实质快速增长、出口快速增加, 而投资也源源不绝注入, 所以, 1993 年墨西哥成为发展中国家里的国外直接投资量最高的国家。货币存量快速累积, 外债的利息支出也获得了控制。这代表成功的全球化正在发挥作用。萨立南也给腐化的劳工领袖史无前例的重击 (事实上是给所有组织化的劳工的警告), 并誓言要打击贪污腐化和毒品运送等, 虽然在这些事情上历史很快就会说明他真正的行动。在这过程当中, 他戏剧性地降低了劳工的实质薪资并使得大部分的人民陷入贫穷。他也推动一

① B 克理尔所引述 (1992: 134)。

个慈善计划，也就是所谓的 Pronasol，由其亲密伙伴路易士·当那多·卡罗西欧（Luis Donald Colosio）执行。后者曾大力帮助卡曼周市长平抚了骚动的墨西哥市民，也协助了恩士多·几迪欧（Ernesto Zedillo）推动教育体系的民主化。在众民的苦难之上，墨西哥的经济确实在几年内转变，以至于美国或国际投资者所认定的是该将墨西哥升级的时候了，也就是欢迎这拥有 9000 万人口的国家进入第一世界的俱乐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即使这个国家之内有 50% 以上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甚至有 30% 的人是赤贫的。在 1993 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 NAFTA）象征着墨西哥加入全球经济的最高峰时期，也是萨立南总统的全盛时期，同时也是指派下任总统的时候了，他舍弃了墨西哥市长卡曼周，这位在他圈内最有势力和人气的人，而选择了卡罗西欧（Colosio）——另一位年轻的科技新贵，虽然他不是来自于制度革命党的守旧势力，却担任党主席职位，并被认为对党机器比较能够妥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市长卡曼周在改革制宪党中的最好朋友鲁斯曼西欧（Ruiz Massieu），也是党秘书长，却直接挑战保守势力，欲击败这巨龙。虽然，卡曼周基于个人或政治理由，对于未获提名都相当不满，但是这也是他首次在墨西哥政坛中了解到他自己对总统选举和公共政治等事物的想法。在 1993 年末之前，一切似乎都在掌控之下，看起来萨立南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似乎已经获得成功，而成功的原因从萨立南自己的想法来解释，就是他准确地避免了戈尔巴乔夫所犯下的错误：在经济改革之前即实行政治改革。

在 1994 年 1 月 1 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第一天，恰帕斯（Chiapas）省的革命组织札巴提斯塔叛变。我已经在本书第二章中分析过札巴提斯塔运动的前因后果、当时的环境和意义，所以我在此只简要地说明该运动对墨西哥政府的影响。此影响可以说是致命的一击，但并不是说它在军事武力上真正危及国家的权力，而是说它快速结合号召了民间社会中大多数经济窘迫



者和政治异议分子的热烈响应。接着，以印地安人及农民为基础的暴动也摧毁了改革制宪党所吹嘘的神话。贫困者、农民以及印地安等少数民族在革命后并未成为顺从、心存感激的受益者，而是被排除在利益分享之外，因此他们才展开反击。因此墨西哥数十年来所建构神话的伪善面纱毫无保留地被揭开，制度革命党政府像是穿着新衣的国王陷人赤裸展现的窘境。

接着前述，萨立南总统的后续动作是他非常担心墨西哥市长卡曼周末获总统提名的反应，于是萨立南再度借用调度他的职位（其用意和目的我并不是很清楚），前往弭平受创的恰帕斯省。卡曼周是以总统和平特派员的身份出任，他精巧的沟通协调能力以及在札巴提斯塔反动分子中的人气，掀起了1994年制度革命党中的另一波的阴谋和计划。在总统内定接班人卡罗西欧（Colosio）阵营尚未准备就绪，以及总统的决定尚有转圜余地时，提名卡曼周取代卡罗西欧的呼声和耳语传遍全城。总统候选人卡罗西欧是一个有能力且有野心的科技新贵（普林斯顿大学区域计划训练出身），但他并不是制度革命党保守势力中的一员，党政机器事实上早已经对这个派任而显现紧张局势。但卡曼周就又是另一个极端：他有很高的政治领悟力、政党内的人脉、来自基层的支持以及较好的民意调查和不能妥协的强势态度等。不论是卡罗西欧还是卡曼周成为总统都将会给该党带来许多问题和困扰。

分析至此，我必须引进一个新的元素，我所说过的观点，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虽然我还没有有力的证据：**墨西哥在新的犯罪组织中所扮演的新角色**。在20世纪60年代，墨西哥种植和出口的大麻并不多于（事实上是少于）美国的一些地区，如北加州或肯塔基州等地。而海洛因的生产在20世纪70年代也只是小规模的生产。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因全球毒品网络的转变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加勒比海和美国中部的通运渠道产生迫切的压力，使得哥伦比亚的公司必须将与美国相关企业的部分利润同墨西哥分享，方法是将相当数量的古柯碱交给墨西哥的公司，让

他们来帮哥伦比亚的公司服务。因此走私大量兴起，强大的墨西哥贩毒组织成立：包括在坦玛利普司（Tamaulipas）和海湾（Gulf）等地以哥哈阿贝哥（Garcia Abrego）为首的组织、在卡达华瑞兹（Ciudad Juarez）地区以阿曼多卡利（Amado Carrillo）为首的组织，以及提哇那（Tijuana）的安兰菲力克斯（Arellano Felix）兄弟等等……他们更进一步种植并走私高利润的海洛因，接着是安非他命，以及其他相关事业。百亿美元的利润让他们安静且专业地跟随着加立（Cali）的模式而非莫德林（Medellin）的模式，也就是谨慎而低调且避免不必要的残杀。强调要冷酷而有效率，买通任何需要买通的人：包括警察、药检人员、法官、检察官、地方政府官员以及改革制宪党的层峰，越高层越好。而投注在贪污中的每一块钱都可期望由获利中被回收，因为它创造了一个自我扩展和自我支撑的贪污网络，而此贪污网络越大则越能保持沉默。因此当墨西哥的新科技官僚正忙于和全球经济作整合和联系的工作时，在制度革命党中传统的一些重要部门则忙于和其中央、地方等政府相关官员共同建立他们的“另种型态的全球经济”（other global economy）。直到1994年以前，这种新的“黑帮政体”（mafocracy）强盛到足以保护其自身的利益和利润，但却尚未能够以金钱货币形式自由流通，所以必须进入金融体系洗钱和漂白。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一段可预期的时间。但是前段所言的总统候选人却都不是他们所预期的人，甚至会危害到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决定杀掉此二人：卡罗西欧以一颗子弹，卡曼周则是以组织化的舆论造势来谴责他，说他必须在道德上为卡罗西欧的死负起责任。他们成功了。卡罗西欧在提哇那被刺杀身亡。卡罗西欧阵营的总干事几迪欧（是萨立南的四大核心成员之一，还有一个是财政部长派多·阿司贝 Pedro Aspe）接替了他的位置出马竞选。他是一个能干的出身耶鲁的经济学者。但是他的政治人脉相当脆弱，而且他的政治伎俩有待磨炼。从这个例子来看，犯罪组织并不是全然能够通行无阻，但是在关键时刻他们可



以改变游戏的规则，任何人入侵了他们的领域都是非常危险的。

接下来就是制度革命党的秘书长荷西·弗兰西斯科（Jose Francisco），他表现得太热衷于调查卡罗西欧被杀的事件，而这个事件到我写这本书时仍尚未解决。刺杀秘书长弗兰西斯科的鲁兹·麦西欧（Ruiz Massieu）背后却牵涉到是一个知名的制度革命党国会议员、坦利玛普司贩毒集团以及当时总统的心腹也是他的哥哥罗尔·萨立南。更离谱的是麦西欧的哥哥是政府部门缉毒的特别检察官，曾经被以名列在贩毒集团的薪资账册当中的罪名而被正式起诉。要确切地说谁做了哪些事或牵涉其中都还太早，而且也超出了我知识和能力的范围。但是，值得分析的相关问题是1994年墨西哥的重大政治危机中，贩毒集团与制度革命党之连带关系，在暗杀、威胁恐吓和掩护等行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破坏了传统的政治游戏规则，并且导致了制度革命党政权的式微。在此要特别强调这并不是传统或典型的暴力介入政治的例子。这是犯罪网络全球化的触角的伸展、美墨关系的意涵以及政府高层的涉入，使得此危机成为说明犯罪的全球化如何危及有权力的、稳定的民族国家的最好范例。

政治暗杀显示犯罪因素明显渗入了政府组织、札巴提斯塔党人的暴动又受到大部分民意的支持、加上制度革命党本身存在的内部冲突等事件，震惊了国外投资者对非常时期的墨西哥市场稳定性的信心。于1994年3月23日卡罗西欧被暗杀事件之后资本开始外流。虽然如此，总统萨立南和财政部长阿司贝仍决定固守汇率，用墨西哥丰富的货币存量补足流失的外资。他们想要稳住这趋势，但是却没有成功。当几迪奥在1994年12月1日接手掌控全局时，他为秘密账册中所反映的真实情境感到忧心。他迅速调降币值使事情变得很糟。引起资金迅速抽离濒临破产的墨西哥，并且震撼了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和圣保罗（Soa Paulo）的市场。为履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义务，美国总统也参与援助计划，并尽量避开国会从联邦政府的口袋里

带来了 200 亿美元作为担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融资 80 亿美元（从未有过的庞大数目）。并且作了一些分配和处理，所以墨西哥能够在 1995 年中以丧失历来的经济独立性为代价，凭借着 500 亿美元得到了缓冲。

除了付出了很高的社会成本的经济在解构、与全球犯罪集团的新连结这两个因素之外，造成墨西哥政府瓦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墨西哥民间社会的动员，特别是几个都市中心。这些动员是相当暧昧性的，因为它是由各种不同的社会兴趣、文化甚或政治议题组合而成。它将专业中产阶级中的几个重要部门的人结合在一起。这些中产阶级受益于具有动力的经济所带来的前景，但是他们也渴求民主、廉明政府以及减少官僚作风。但是加入这场战役的其他诉求还包括了反对制度革命党政府、公共部门的受雇者感到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广大的都市群众开始担心分配土地和服务的政府机制的瓦解。学生的动员则是社会变迁的改革象征。而在都市和乡村地区数以万计贫穷的人则以各种方式在为生存而努力。虽然各种政治怀疑论开始产生，但是并没有多少墨西哥人真正相信会有其他的替代性的政党来转变他们的命运，但人民却有共识：这种改变不会是由制度革命党所带来的。民粹基础的正当性崩解相当于民粹主义系统核心的有机连结也瓦解了。

在萨立南任内推动民主的努力所采取的形式是将权力和资源转移到地方和州政府，同时也容忍在一些重要的州和城市反对阵营的胜选者，特别是北部区域。在阿赖西亚·奇卡迪（Alicia Ziccardi）所编辑讨论 20 世纪 90 年代的自治政府的系列论文中，<sup>①</sup> 显示了一些地方行政的重要进展，特别是其中的墨西哥的里昂市（Leon）、杜蓝戈市（Durango）、托安列市（Torreon）以及墨西哥市等。而这些相关的成果的政治冲击也将进一步侵蚀制度革命党的根基。因为这些个案中的自治城市之间已经建立起了

① 奇卡迪（1991，1995）。





更强大的连结，而且当中有许多是在反对党或民间社会的手中，甚至是墨西哥市，由总统所指派的自治市首长卡曼周最后也是建立在群众对他的选举结果之上，而不是靠制度革命党传统的党机器运作。整体而言，萨立南和他的科技官僚在驾驭全球经济时，所进行的民主化以及将权力去中心到地方，最后在各民间部门和总统高层之间创造出更大的距离。因为墨西哥这个国家基本上对国家元首有无限的崇敬，但是萨立南没有受到普遍的敬意，即使是在为本世纪最稳定持久的政权之一敲响胜选钟声的时刻。

在新的历史阶段里，墨西哥的民族国家形式将继续存在，因为民族主义根植在墨西哥的深处，但是它将不会再像制度革命党所创立的民族国家一样，虽然它仍丰富多元且有影响力，但我敢说，它的权力将会越来越削弱。

从经济方面来说，墨西哥和全世界都已经进入一个新纪元，其中墨西哥可能是先驱者，赖利·苏默思（Larry Summers），世界知名的金融专家，同时也是墨西哥援助行动中的重要人物，在1995年以一种事后的观点评论道：“墨西哥1994年的危机，是近年来金融投资所造成的：而先进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使它毫无前例地扩散开来，难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麦可·康登斯（Michel Camdessus）会认为这是21世纪的第一个危机”。<sup>①</sup>用这段话来解释墨西哥未来经济政策时，说明了其任何经济政策与美国的经济政策及国际金融市场将密不可分。

在政治上，墨西哥从现在起就必须开始注意在各种层面上全球犯罪集团对其国家的渗透。我们很难相信在此渗透中墨西哥自己的警察和司法体系能够置身事外，因此在而对犯罪时的国家自主性就更难恢复了。而事实上，在大部分毒品联系和司法体系之间的关系中，包括罗尔·萨立南事件在内，调查工作都是委由美国的情报局，这使得墨西哥的领导者相当依赖美国的情报单位。

① 苏默思（1995：46）。

在国内政治方面,一个较高教育与动员性的市民社会正尝试以新的方式组织和扩展,并和制度革命党政权产生直接矛盾,且通常在地方层级发展。不断地全球化和公众化的媒体,使传统上由和制度革命党有内在连结的多媒体大企业——电传护照(Televisa)所掌控的信息娱乐事业逐渐松绑。

而在符号表征方面,正如札巴提斯塔革命分子所宣称的那样,认同的力量除了揭开墨西哥意识形态上的自我欺瞒,而且更进一步:它已经在真正贫穷者、印第安少数民族与都市各部门之间建立起了桥梁,并共同追寻一个新的动员梦想。在这过程中,墨西哥上下已经被统一起来,而且这次是以制度革命党政府为对立面。

## 二 人民 vs. 国家:美国联邦政府合法性的衰落<sup>①</sup>

20世纪9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所面对的危机是一种合法性的危机,我认为此危机并不是来自美国政治中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张力,而是来自民间社会的底层,表达他们对一些特定议题的不满和愤怒并汇聚成了对联邦政府权力、角色和功能的质疑,自1810年及1819年起由高等法院的重大决定所确认的美国联邦政府的合法性在此受到了挑战。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在政治上的影响,从清楚地倾向于右派的、重新打造过的共和党的势力日渐壮大这一点可以看出,1994年国会及政府组织的选举结果即证明

<sup>①</sup> 波兹及布朗史登是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政治发展较好的评论之一,我在此则运用更多资源。美国的反政府运动文化的历史观点,可参阅李普赛(1996)和开辛(1995)。关于本节的其他相关的信息和分析资料,可参阅倪尔密(1992);莫瑞及贺姆斯丹(1994);伍德瓦德(1994);巴诺及乌吉佛萨(1995);坎贝尔及洛克曼(1995);格林伯格(1995);西麦法尔(1995);帕干诺及包曼(1995);洛波公共意见及民意调查中心(1995);第欧尼(1996);法洛斯(1996);对莫瑞论文观点的严谨社会学批评,可见费雪等编辑(1995)。



了此现象，1996年的选举结果仍是共和党势力掌控参众两院。这股反政府的情感甚至超越了共和党的候选人而感染了独立的选民，例如罗思·裴洛（Ross Perot）的选民甚至还一并拒绝了现有的政党制度；此潮流甚至还包括越来越多的民主党员，克林顿总统在1996年的施政报告中因此宣布了“终结大政府”。<sup>①</sup>

事实上，克林顿1996年再度当选大部分要归功于他采用了许多共和党的主轴：例如，反对福利国家、反对庞大政府支出、强调严峻法制，并且保障中产阶级的利益，因此而有效地掌握了中间偏右的政治势力。史达·史盖区波（Theda Skocpol）对1996年总统选举结果曾作过如下的评论：“虽然目前呈现党派平衡的状态，但1994年引发的议题仍然存在，这只是一种感觉，人们觉得即使全国性的问题是大问题，也不能用联邦政府来做大的动作”。<sup>②</sup>再者，1996年的选举显示了选民对于各党的候选人越来越不满，只有49%的投票率，而克林顿的得票率仅是这49%中的49%。行政与立法权落入不同政党手中似乎是选民潜在的、集体意愿的表现，想要强化监督和制衡体系，并否定任何形式的政府有过度的权力。

虽然，目前这股反联邦政府的强大势力深深地影响着政治，但并不影响政府的结构，但是它似乎就要改写美国的管治的制度基础以及政治目的。如果1995年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提案或修正版获准或成为可能的话，那么在公元2002年前，联邦政府的权责将转移到州政府，州政府将取得资金和权责来掌理社会福利、医疗救助、职业训练、环境保护等。预计总共有2000亿美元的年度预算，同时，这些经费将以奖助的方式给予，这意味着：虽然有些规定，然而对这些钱的最后使用的决定最后是在州的手上，而这些规定的内容也将会是国会激烈的冲突的对象。克林顿

<sup>①</sup> 引自多纳（1996）。

<sup>②</sup> 《商业周刊》（1995）。

政府也计划将交通政策、社会福利等多项事务的管辖权责逐渐转移到州政府。此外在最近7年共和党和克林顿正努力地削减预算赤字,这将造成联邦州政府支出的大幅缩减。例如医疗救助在1995~2002年间将减少30%的费用(约等于2700亿美元)。而联邦政府在其中扮演部门协调等重要角色的环境保护协会(EPA)和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将是最可能会被大幅削减资金和权力的部门。事实上基于经济原理,减少预算赤字是减缩联邦政府功能的有效方法,因为1995年的联邦政府的赤字就高达2030亿美元。因此这波削减国家和政府能力的运动,包括削减和分散社会福利权责,强力要求减低政府开销和外债以及减少税收(未来将有真正的财政改革,或许将采行目前再度引发辩论的单一所得税制(Flat income tax),这些措施的共同运作正是要重新审视联邦政府甚至是美国国家本身的权力及目标。

而这股要求美国联邦政府角色重新定位的力量,是来自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对联邦政府的深层和强烈的不满(见图5-3)。波尔兹及布朗史登(Balz & Brownstein)综合民意调查及政治研究的资料作了下列的分析:

如今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可以分为下列两大态势:一方面,有相当多的美国民众采取一种民粹主义的批判观点,责难华府是浪费、无效率的政府,罔顾民意,充斥着只顾自己利益,为获取选票而开空头支票的政客(持此意见的民众以劳工阶层的白人居多——而他们正是过去20年承受最大的经济压力的一群人);另一方面,有一些为数较少但也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民众则是从意识形态的观点出发——他们认为政府是管得太多的巨兽,不仅损及个人自由及自食其力,不鼓励宗教,而且偏爱少数民族和穷人。上述这些对华府的不信任,成为民主党的新施政获取民心对的最大阻力,甚至诸如推广职业训练以对抗经济的不稳定、或是健康医疗保险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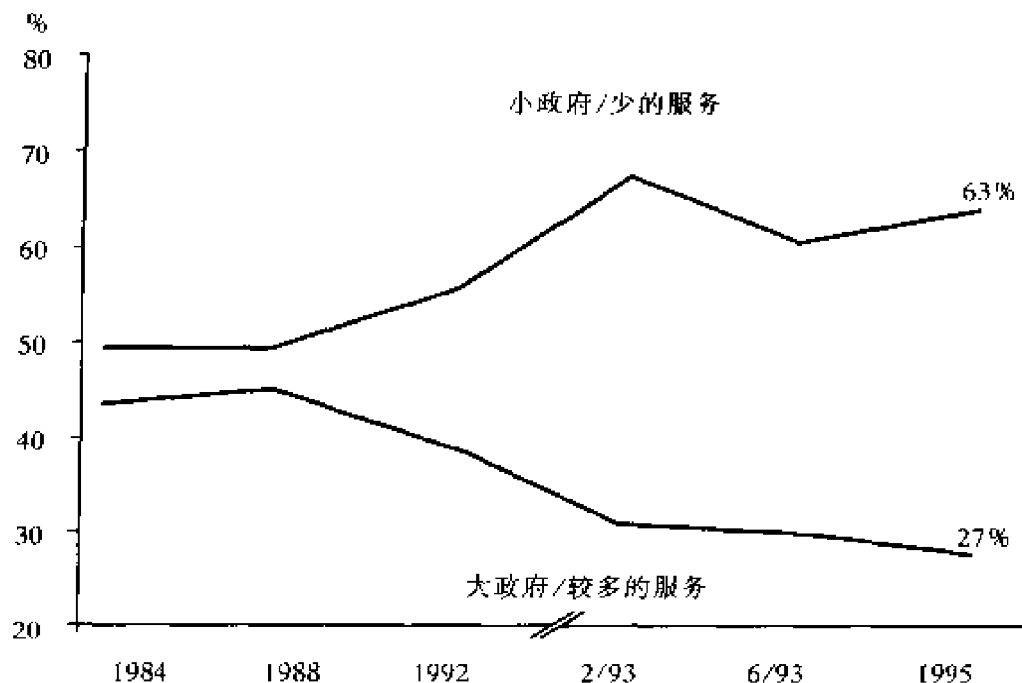


图 5-3 1984~1995 年美国人民对政府规模和服务的意向和态度调查  
(根据问卷的题目:“您较喜欢小而服务少的政府还是大而服务多的政府?”所询问的结果)

资料来源:1984、1988、1992 年,以及 1993 年 2 月的美国广播公司调查/《华盛顿邮报》,还有 1993 年 6 月、1995 年 1 月的《洛杉矶时报》

策也是这样。敌意之于华府,现在就像尊敬之于国旗一般,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sup>①</sup>

这两股背道而驰的力量,一个是对国家象征(国旗)的忠诚势力的推进,一方面是对国家机制(华府)反抗意识的抬头,正好说明了美国联邦政府合法性的危机。

在第二章讨论社会运动的主题时,我曾简要地分析在美国对抗全球新秩序的几个现象,例如美国民兵(militia)、郡权

<sup>①</sup> 波兹及布朗史登(1996:13)。

(county rights)、明智运用运动 (wise use movement) 以及各式各样的“爱国主义”反政府运动。在这一章，我主要讨论这些社会运动以及其对国家和政治等公共意向之影响。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的反联邦政府意识不能被归纳为只是激进的示威抗议活动，虽然这些爱国主义运动确实反映社会广大部门的价值观和愤怒，就像在电台脱口秀中鲁西·林波 (Rush Limbaugh) 对政府的谩骂所引起的广大回响。这股反政府的潮流汇集了意识形态、社会、经济等趋势，并且深植于全球化、身份认同和政治等相互关系之上。因此，可预测在公元2000年的选战中，无论是哪个党派获胜，共和党或是革新的民主党，都必须在21世纪来临之际，对美国的政府组织进行通盘检讨。而对20世纪90年代保守的民粹主义之重要因素进行全面回顾，将有助于我们在政党变动和循环的视野之外了解反对联邦政府的意识的形成和危机的全景。

第一波强而有力的声浪是来自一个全新的经济民粹主义，主要是响应在全球经济重组下美国部分劳工权益受损的情形。在1996年，虽然每当产生工作机会的实质数目宣布时，道琼斯 (Dow Jones) 指数便急剧滑落，但各公司的营利及股票市场仍一直维持高点。而科技以缓慢但坚定的步伐刺激生产力的增加；大部分女性投入职场，工作机会则创纪录地增加（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增加了1000万个工作机会），虽然如此，民众对政府深表不满，令其不满的原因是大部分民众的生活品质降低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弹性工作、公司连结及越来越多的跨国投资、生产、贸易都是造成劳动力市场不稳定的因素（见第一卷）。当然，这是一种反公司 (anti-corporate) 情结，而不是反联邦政府的意识。事实上，反公司情结隐隐地希望政府能主动介入，并且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然而华府却被视为全球化的主导者，尤其是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更彰显了美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于是这就点燃了反联邦政府的怒火。因着这一波经济趋势，政策可能导向经济保护主义，限制移民移入或歧视移民，这就意



味着和公司利益的正面冲突，因为公司的着眼点是贸易和资金流动，并且亟需技术劳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 1996 年总统大选时爆发了共和党内的冲突，同时共和党的领导阶层也正式面对布坎南（Buchanan）的民粹主义候选席位初次告捷的挑战的原因。在民主党内也有类似的冲突，大部分的劳工工会及少数民族组织也反对由共和党领袖和克林顿所支持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们都不赞成开放及全球化经济所主导的资金和工作自由流通。

另一波的公共意见某种程度是巧合地呼应了上述的经济保护主义，也就是提倡政治的孤立主义。他们普遍反对美国对外出兵，并认为若不是直接或清楚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就不须派兵援助，例如索马里和波斯湾战事等。随着苏联势力的衰微，在一般人民的中心国家动员已经丧失了理由；虽然国家军事超强状态对政治、经济或科技精英仍具吸引力，但也似乎不能为战争的苦难和代价提出辩护。反对美国军队服从在联合国的旗帜之下已经成为最具号召力的口号，用来对抗多边关系主义以及后冷战时期复杂国际组织的关系网，例如世界贸易组织中暧昧的美国主权。

第三波人民的声音则是普遍地拒绝政府干涉私人、家庭及社区事务，以下我们可以看到结合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家庭学校运动（home school movement）”，家长拒绝将小孩送到学校受教并反对文凭等学位认证。挟着“郡权（county rights）”及“明智运用”（wise use）及地方自主权等潮流反对环境保护法，特别是在西部，利益相关的伐木及采矿工的公司反对最强烈。此外，人们普遍意识到计算机化的国家将侵犯到隐私权，也引发不同教育程度、社会背景的自由主义拥护者各式各样的愤怒。

强调家庭价值、反对堕胎运动、反同性恋的造势活动以及宗教的基本教义派（大多来自白人福音教派）形成一股庞大、多样化的社会潮流的基础。本书第一、二章所提过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就是其中最有力和组织化的团体的表现，它在全美 50 个州拥有 1500 万信众、1200 个分会。事实上，在

90年代中期,基督教联盟形成共和党内最重要的票仓,同时在地方、州及联邦各阶层的选举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过去民主党内的劳工组织扮演相同的角色。基督教基本教义派基本上并不是一种反联邦政府潮流,事实上,他们的梦想是一个神权国家、依附于上帝律则的政府,就像他们在加州控制的几个教育委员会,或是于1996年2月田纳西州议会通过的要求政府单位及学校的墙上都必须贴上十诫,以示遵守。然而,在当今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的社会制度之下,要重建一个基督教国度首先必须要废除当今这个世俗的国家。美国过去10年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特殊发展并转变成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组织,与它对认同的不断重建以及抵抗传统家庭价值瓦解等历程有关。它反对女性主义、男同性恋的解放以及终结父权主义,同时也反对政府致力有利于女性选择、两性平等的实质法案,或各种文化上的包容政策。除了上述的反应,深植于他们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造成一种强烈的企图希望以被理想化的过去为基础来重构意义和认同。这个过去是和谐社会中的家庭和社区,如今在一个新的郊区社区中、或是一个逐渐丧失乡村生活的小镇之中被重新打造。为了对抗美国父权主义的瓦解,这些活动的发展特别地戏剧化(见第四章)。反抗父权主义遭受危机所引发的暴动,和反对全球经济新秩序对自由主义价值和政治建构的挑战一样,二者对政府执行力量的反抗都很强大,使得联邦政府失去合法性。

对联邦法律或制度的批判一旦和与贫穷及少数民族的问题相关的阶级和种族仇恨连结上,就会变得很尖锐,这就是已经被卷入经济潮流战场的福利国家,它选择性地进行去合法性,说明了其中的大众情绪、政治选举以及反政府的敌意。我说选择性是因为社会安全和医疗照顾(总共占美国福利国家大约三分之二的预算)仍然持续得到大部分人民的支持,并使得此系统很难改革(见图5-4)。另一方面,社会福利计划、贫穷补贴、训练计划等照顾少数族群的行动遭到多数人的责难,因为这些相对于少数





的多数不愿付税补贴“他者”，并将贫穷污名化，将他们的贫穷归罪为他们自身行为等原因，例如，将社会福利支出的指数增长归因为是青少年怀孕生子（babies born to babies）的原因。在反政府运动的学术顾问发表的“理论”中，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及其严厉的道德变成模范，而贫穷和少数族群则以智商的生物决定论而被判定为永远是较差的身份阶层。<sup>①</sup> 此种打破社会团结之更激进例子是另一个由“愤怒的白种男人”（angry white males）所发动的特殊的风潮，反对将平权法案扩大到女人，因此在这些不满的市民中引发出更多潜在的分化。在美国，这个能够动员市民社会中一定比例、进而反对福利国家的行动，同时也造成社会的分裂和国家的衰微。而此渐增的压力逐渐变成一种强势的压制机制来抵制他们认为会坐享社会福利的“危险阶级”的（dangerous classes）出现。强调社区志愿主义以及由慈善团体替代福利国家的说法虽然也非常强调市民社会的重要性，但是在本质上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视角，因为他们并没有面对以强调个人责任为借口而将社会集体的责任犬儒式地抛弃的事实。

上述这些市民反叛的各个层面通常伴随发生的是组合式资本主义对利润肆无忌惮的追逐（例如，对社会福利主义、环境主义的批判），但有时候却又是反对它们（例如，对全球化和弹性化劳动的批判）。然而，即使这两种现象全然不同，甚至发生的原因也不相同，但是二者却同时强烈反对联邦政府的角色的扩展，但联邦政府的权力扩展却正是美国在过去半个世纪民族国家得以建立的重要特色。

让我在此将这个疑点澄清，整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保守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自由主义运动，而且也并不是响应了反政府的共和主义的传统。如前所述，事实上，它最重要的因素构成的一部分是非常国家主义式的政策，要求借由国家的力量将

<sup>①</sup> 莫瑞及赫姆史丹（1994）；西麦法尔（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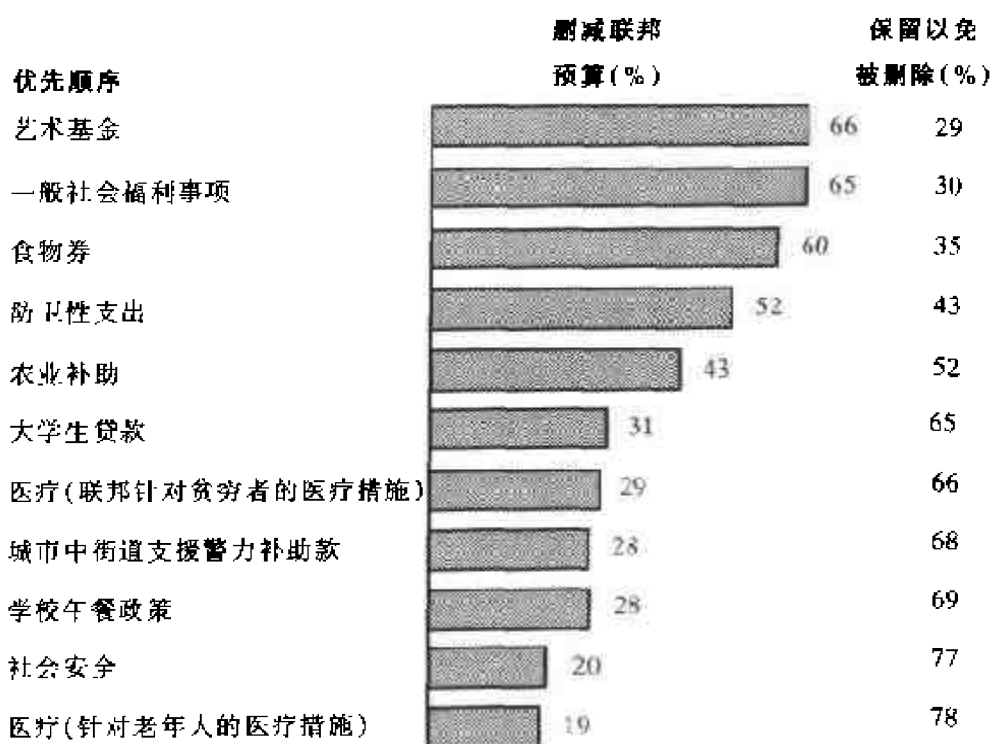


图 5-4 1995 年美国人民对联邦政府的政策措施和缩减联邦政府预算赤字  
的看法(根据问卷题目“针对下列各项政府政策您认为必须删  
减联邦政府的预算的优先顺序或是应特别保留以免被删除的优  
先顺序”的结果)

资料来源: 1995 年 2 月 24 - 26 日盖洛普公司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今日美国  
所做的调查。

一些社会组织价值强加于个人和家庭之上。这很明显的例子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派, 它在地方和州政府的影响力逐渐庞大, 并将地方及中央政府看成是能够将神意的行为施行于整个领域的整体社会的手段。这情形从经济保护政策的角度看来也是这样, 其贯彻施行也有赖于联邦政府决断性地对整个美国经济的掌控和调节。因此, 若只就反政府的文化价值霸权来说, 并不能说民族国家有危机, 其危机是各种意识形态和利益的挑战汇聚在一起, 并质疑美国联邦政府的历史性建构: 有些是直接要求减低其角色功能(如传统的自由主义), 或是强制赋予其重建美国在神的领导



下之疆域的新任务，以及至少自我隔绝于全球新秩序之外。这也说明了1994年的“共和党的革新”虽然隐藏着这类合法性危机，但性质却不完全相同。此合法性危机跨越党派、选民，而且其对劳工和对农民的影响一样多，而纳税人和白种男人的愤怒是一样的。

这些分歧而有力的潮流通常会围绕着两个议题并且成为一种他们之间共同的标语：拒绝缴税、拥有武器。因为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的财政税被削减，国家的行动力变得越来越衰弱。在一个不是要求公共政策而是不断增加各种需求的经济体与社会中，削减税基迫使国家必须将权力集中在其核心和策略性的功能之上，特别是维持法律和秩序，以及为新的信息化全球性经济体提供基础设施，同时也要支付自冷战时期起里根总统留下的外债的利息。因此，国家变得无法施展其他的功能，真正地沦为“被人民背弃”（off people's backs）的地步。

另一方面，在相当高比例的人民心中，认为拥有武器的权利是美国立宪精神之下人民自由最终的基础。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同意这样的说法，然而真实的情形是美国所有家户共拥有3亿把手枪，且战备武器在开架的超级市场就可买到。

强而有力的组织和游说的议员，例如全美税务改革、全国独立商务联盟，以及传奇般的全国来福枪协会，都致力于瓦解国家对钱和武器的控制并成功地获胜了。我的上帝、我的家庭、我的社区、我的钱、我的枪，似乎变成一整组价值观，形塑越来越多美国人的想法和行为，他们直接反对联邦政府的规章、制度计划乃至其工作成员，他们也逐渐敌视全球性的合作主义或制度性多边主义。

在美国社会中这些态度和意向的散播和普及有赖于越来越地方化、片段零散化的媒体以及互动式的电子媒介的扩散沟通。其中最重要的发展是影响力日增的地方电台、联播节目、如脱口秀等夸张的谈话表演、叩应（call-in）访谈等电台。1988~1995

年间此类以谈话性的节目为主的电台数目加倍增长，达到 1200 个之多。新的卫星科技、对扭曲的煽动性言论的管制的松绑，都助长了这些节目的增长和影响。鲁西·林波，这位脱口秀中的明星拥有全国各地 600 个电台每周 2000 万听众，并借此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1994 年，新共和党在公开的餐会中对林波致意，因为他的极端保守主义和反政府立场在全国拥有无人能及的魅力并广受欢迎。除了广播电台，这波民粹主义的草根运动，如我在第二章中提过的那样，也运用各种新的通讯传播技术，包括国际网络、甚至传真等，来整合他们的行动和理念，并且能够将讯息散布给特定接收者或政府官员。传播媒体本身的多元化和去垄断性打破了原本间接控制在政治性建制和观众手中的频道限制，使得各种形态的信息、甚至包括各种惊世骇俗、偏激、不公正的思想都能不受限制地散布在千百万的人群中。过去几十年来由出版者在内容的合适和不合适的界定上，精心建立对出版自由责任的普遍通则已经彻底被瓦解了。

尽管偏激言论是因为不满和愤怒而起，但是此社会潮流并不只是民意的暂时性情绪发泄。一份 20 世纪 90 年代的有效民意问卷调查说明了这种表述的顽强及厚度（见第六章）。此思想潮流根植于主要社会结构的转变，也就是我在书中不断讨论的社会变迁，以及在美国社会本身的制度和特殊文化下的社会历程，如波尔兹及布朗史登所说的那样：

在日益复杂和扩展的右派运动的背后是一种害怕无法掌控对世界快速变动的恐惧心理……因为经济结构必须面临全球化和科技革新等压力，而社会的文化架构也因双亲家庭瓦解而面临崩溃。这就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大多数的美国人觉得在这个他们所不能理解和控制的社会变迁和发展之下，生活将被彻底改变或连根拔起）。共和党的民意测验专家弗兰克·鲁兹（Frank Luntz）说：“人们觉得他们无法掌控他们



自己的生活”，“人们不再能够想像或规划他们的未来”。<sup>①</sup>

人们将此归罪于过去半个世纪他们所建立的国家之上，他们渴求能够重新掌控他们自己的社区和家庭生活，并将控制其上的政府移除。这时，在此过程中他们得益于共和党。在过去30年未能在国会掌权的共和党在这里看到它未来几十年可将获得施展权力的机会。这次共和党的诉求可以说是搭了反政府和反建制等心理潮流的便车，然而此举却似在玩火。正如波尔兹及布朗史登对此所下的论断：“目前共和党所有的智能和精力都必须集中在寻找各种减低联邦政府规模和影响力的渠道和方法”。<sup>②</sup>然而，因为共和党亦代表各种深植于全球经济和跨国机构等团体的强大利益，在它变成一个反政府和国家的民粹机制时，同时也创造出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内在矛盾，此矛盾存在于其反政府的激进民意基础与其代表资方及捍卫既有制度的传统角色等二者之间。而这矛盾的冲突即将展开，接踵而至的可能是跨越党派界线的民粹潮流的强大不满，并将造成美国政治系统的根本危机，并且危及开国立宪以来所历史性地建构并小心维系的地方和联邦、政府和社会等之间的平衡，并很有可能因此引爆美国民族国家的危机。

### 三 国家危机的过程与结构

在此我要重申在上述简要的国家危机个案研究中所抽离出相关分析的要素，在墨西哥和美国两个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对国家合法性的直接影响和冲击。这些影响和冲击的过程包括：福利国家岌岌可危以及传统生产关系解组、工作形态日趋不稳定以及社会的不平等的加剧等。还有全球网络联系上有价值的社会和经济实体的部门，但使得大部分部门的人口及

① 波尔兹及布朗史登 (1996: 173)。

② 波尔兹及布朗史登 (1996: 295)。

领域脱离了有动力的、全球化的体系。这些过程都是我在第一册中提过的，也证明这些过程是要国家付出其反映社会需求的能力为代价、并最终危及国家的合法性。更进一步来说，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所制度化的墨西哥和美国经济的亲密关系，以及墨西哥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及时性的电子网络连结所造成1994~1995年的比索崩盘，和往常的经济危机并不相同，而且验证了我们前述的“21世纪的第一个金融危机”。除此之外，墨西哥的案例中也看出犯罪经济集团的渗透，加速了政治结构解组和国家合法性的危机。

在美国的案例中（墨西哥的案例中尚未出现这个现象），由于信息社会以及来自社会运动的挑战，父权主义（patriarchalism）产生危机，而这在大众社会里掀起不安和恐惧，进一步使得人民从可能刺激女权运动的政治事务或制度中抽身，并和世俗的国家事务保持距离。使得很大部分的人从原本肯定上帝、家庭和社区可以超越社会挑战和质疑的永恒价值中，退阵下来。在此两个案例中，侵蚀着国家合法性的结构性的危机，伴随着各自社会的社会运动特色，如另觅替代性认同或断然否定联邦政府的合法性的社会运动的发展相互作用着。虽然这些以认同为基础的运动并不多，但其要求和呼吁却都一一被纳入政治系统，并得到民众相当大的扭曲和回响。不可否认，1994年札巴提斯塔在墨西哥东南边的恰帕斯叛变事件具有象征性意义，以及后来在墨西哥社会中的反对制度革命党的声浪已经将当今世界上最稳定持久的政权之一划上了句号。

对美国来说，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只是一种象征而非奋斗的理想，合法性的危机随着对政府的不信任的扩大而加剧，特别是对联邦政府、以及那些和主流政治相关的政治家或政党。保守的共和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受到欢迎，在很大的程度上和其政治上的强烈的竞选主张有关，他们所反对的正是这个他们想要掌控的政府机制。



在墨西哥和美国两个案例中，新的选举人脉系统受到相当小的公共意见运动扩大影响受到媒体传播和他们水平的不受约制的网络。

在此，在全球化、信息化与资本主义重建、身份认同为基础的社会运动，以及墨西哥和美国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之间，存在着一个具有经验观察和分析意义的关连。虽然对每个社会而言有其不同形式和特殊之处。从方法论上来说，要归纳出前后因果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危机是在结构和过程二者不可分离的相互作用下而形成的。我们很难想像札巴提斯塔暴动对墨西哥的影响和冲击不会对其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化造成影响。但是札巴提斯塔暴动却不是经济危机的结果：因为暴动发生在经济危机之前，其性质是天主教教士所支持的印第安人和农民的抗争，是20世纪70年代激进左派运动革命意志的延伸。在美国，自由主义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我们可以说对势力强大的大陆型国家而言，孤立主义永远都是一种诱惑，而且正可用来对抗扩张的帝国主义。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里不论是这种理由还是另一种理由都不能事先被拼凑，因为我在前面所提及的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在过程和结构上发生作用，而且其结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未有定论。所以，即使共和党改革发生在1994年，民主党的克林顿依旧在1996年的选举中获胜，其原因相当清楚地是因为共和党选举动员时的内部矛盾——同时既代表财团的利益又代表右派人民党的政策。但是，克林顿为了要赢得选举，也必须快速地离开传统共和党的列车，以便将共和党人和政治现实之间的距离拉开。

为何对新的全球性失序的反应在墨西哥是来自“左翼”而在美国是来自“右翼”，部分是因为他们有各自的政治作用者，而另外部分则是因为他们必须处理的危机的特色并不相同。换句话说，因为在此两案例中的国家已经不能够再承担其允诺和保护责任，反而变成是全球化/再结构过程中的主动经营者。对政府的反对意见并非来自传统的支持以政府为主导的改造基础：例如在美国站在联邦政府这边的共和党，以及墨西哥制度革命党的民粹

主义系统。这并不排除拥护福利国家者、拥护政府者以及左派运动等在未来会在此二国家中发展，但是它们都远离政治性建构的长廊，这正是因为合法性的危机。

此开放的政治过程并不会减低了解和分析的深度，因为我们所揭示的事物，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正是发生在我们的时代中的政治结构和过程之真实材料。为了要分析国家危机的原因以及政治抗争的新形式之间的关系，我必须先探索新的信息典范下的政治行动者之动态——在第六章中我将作这个尝试。

## 第七节 国家、暴力及监控： 大哥大变成小妹妹

在网络社会里国家的权力真的衰落了吗？这和我们所目睹的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暴力和压制的澎湃汹涌的状况不是正好相反吗？因为新的信息科技普及，个人隐私是不是正面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危机呢？乔治·欧威尔预言像“大哥大”的国家有没有在1984年出现呢？为何国家掌控了强大的科技力量和前所未有的信息，而却要说它权力丧失正在呢？<sup>①</sup>

这些最根本也常被提及的问题，混杂着矛盾的证据及令人疑惑的理论观点。但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却是了解国家危机的核心。首先，当我们把欧威尔式预言和现存的社会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大哥大”的意象就在经验上说不通。事实上，如果欧威尔预言的对象是斯大林式而非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的话，如果过去半世纪政治发展的历史轨迹是朝斯大林式而非现况的话，那他可能会是对的。但国家主义面临新的信息科技时将会分崩离析，而

<sup>①</sup> 巴汉（1993）；里昂（1994）。





非全面掌控信息科技（见第三册）。新的信息科技将会松动权力网络并使权力分散化，事实上打破了单向结构、垂直监控的集权逻辑（见第一册）。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囚狱，而是杂乱无章的丛林。

尽管如此，力量强大的新信息科技真的也有可能被运用在监视、控制和压抑的国家工具之上（例如警政、税收、人口调查、打压政治异议等诸如此类），但是，相同的也可以被运用在人民对其国家的掌控上，例如精确地由公共数据库获得信息，或与民意代表在线上展开互动、或观看政治议庭和时事评论的实况转播等。<sup>①</sup>而新的信息科技也能提供人民录像存证，采集弊端的视觉证物，就像全球性的环保组织将录像带分送到世界各地的分会揭发环境犯罪事实，对生态的破坏者施压等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科技力量会特别加深根植于原社会结构和制度的趋势：一个压制型的社会运用新的科技力量会更加压制，而民主参与型的社会借科技力量将政治权力分散化，并增加其社会的开放性和代表性。因此，新信息科技力量对权力和国家的直接影响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经验事实。但是，还有一个更深更根本的趋势正在发生，并对民族国家的力量造成真正的破坏：在国家边界和国家制度之外，其他的监控能力和暴力倾向正在不断扩散发展。

个人隐私渐受威胁的相关报告显示，威胁较少直接来自国家，而多是来自商业组织和个人信息网络或政治科层体系，且是依循其自身作为一种工具的逻辑而非代表政府的利益。在历史上，国家通常通过相当原始而残暴的手段来汇集对手的资料。计算机确实在本质上改变了相互援用各项资料的能力，它能够综合社会安全、医疗、身份、居住以及受雇情形等相关的信息。除了在央格鲁萨克逊民族的少数国家因根植于自由主义的传统而有某些限制和例外，从民主的瑞士到共产党的中国，全世界人民的生

<sup>①</sup> 安席斯（1993）；贝斯（1995）；葛林森（1995）。

活不论是居住还是工作都非常依赖计算机档案资料与其和政府相关的各领域。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行政工作能够因新的科技而促进效率,那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犯罪组织也可以运用此项新科技(例如干扰中断警方通讯、通过电子网络获得电子资料等)。即将面临的重要课题是:通过私人企业来收集个人的各种资料并加以整合,已经创造了此类资料的市场。个人信用卡比身份证更暴露个人隐私,运用此工具可达到个人的生活资料成为市场(或勒索)的掌握和分析的目的。信用卡作为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记录,此概念可以扩充到飞航的频率和行程以及各种消费服务项目,以及形形色色的关系或会员记录等。在个人基础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不是一个强大压迫型的“老大”(big brother),而是许许多多关心可人(well-wishing)的“小妹妹们”(little sisters),因为她们知道我们是谁,且她们已经入侵了我们生活的全部领域。而事实上计算机所做的是尽可能将大量的个人信息搜集整理并为特定目的加以程序化分析,以便我们的名字被打印出来,和数以千计的个人资料被大量订购寄出。另外,最能说明新科技逻辑的生动案例是美国在1997年电视机中植入的V芯片,让家户可以通过站台发射讯号来完成各项调查。如此看来,监控的方式更为离散化而非集中控制。

大卫·里昂(David Lyon)在其深具见解的书中论及此事,他强调此全面监控方式的重要发展是超越国家疆域之外的。<sup>①</sup>他所谓的“电眼”(the electronic eye),事实上是一个全面监控的“社会”而非“全面监控的国家”(surveillance state)。而这也是福柯(Foucault)的微观权力理论的核心,虽然他使得很多肤浅的读者将其误称为“国家”,事实上以他的观点是说“系统”,指的是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权力来源的网络,包括在家庭中的权力等。如果从韦伯的观点来看,我们将国家的概念限定为一组拥有

---

① 里昂(1994)。

合法性来垄断暴力工具的机构和制度，而民族国家则是此种权力的领土和界定，<sup>①</sup>那么，我们似乎看到的是（形式上或实质上）暴力和监控的力量在社会中不断扩散的事实。

这种趋势在国家和媒体的新关系中益发地明显，随着媒体在财政和法律层面的独立性不断增强，媒体手上拥有的科技力量，可以为了社会以及（或是）特定利益集团的目的而监督国家（见第六章）。在1991年，西班牙的电台播放了两个社会主义官员用移动电话通话的交谈内容，他们对社会主义部长的严厉批评触发了政治危机。或者是当英国的查尔斯王子以及他的朋友正陶醉于对卫生棉条以及其他事情的后现代诠释时，刊载出这些对话的小报动摇了英国的皇室。可以确定的是，媒体的披露或是八卦，向来都是对国家的一种威胁，或是人民的防卫。但是，新的科技或是新的媒体系统，使国家在面对媒体时更是难以招架，而这使得国家面对企业、面对社会时更是这样。用历史性的相对的角度来看，今天的国家不再是那样地具有监视性的国家，反而比较是被监视的国家。

更进一步来说，虽然民族国家还持有暴力的能力，<sup>②</sup>但是它正丧失垄断性，因为它主要的挑战不是恐怖主义的跨国组织，就是诉诸残暴的地方势力。就前者而言，恐怖主义（政治的、犯罪的，或二者皆是）的全球化以及信息、武器和资金的供给网络需要和各个民族国家的警政进行系统性的合作，所以这个武力体系变得越来越具跨国性。<sup>③</sup>就后者而言，一旦社区团体或地方帮派拒绝承认其民族国家的身份地位，国家将变得越来越难防范根植于社会结构中的暴力，而且国家将长期陷入游击战当中<sup>④</sup>。这正

① 古登斯（1985）。

② 提利（1995）

③ 福纳（1989）

④ 威佛卡（1988）。

是国家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如果不使用暴力，国家将丧失其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若是使用暴力，它将需要一个充沛的资源 and 合法性作为其准永久性（quasi-permanent）的基础，因为这意味着国家将处于永无止尽的戒备状态。在此情况之下，国家也只能以民族和国家的存续为赌注和这些持续存在的暴力共存亡了。除了一些特殊的状况之外，社会越来越抗拒国家长期使用暴力，因此，国家在诉诸大规模暴力的有效运用时遇到许多困难，并导致运用此能力的机会变小，甚至渐渐丧失使用暴力的这项特权。

综上所述，全面监控的力量遍及社会，国家的暴力垄断性受到跨国的和不具国家性质的社会网络所挑战，而其镇压抗争的能力则受到各自为政的社区主义和部落主义所腐蚀。尽管目前民族国家外表看来依然光鲜亮丽，但全世界人民身心依然受到禁锢，信息的力量穿梭其间并凌驾在国家之上；恐怖主义的战争跨越了国界，划地为王的地方势力划破了法律和社会秩序的防线。国家虽然仍需借用暴力和全面监控的力量，但却不再是全面的垄断或是以国家之名来操弄这些权力了。

## 第八节 民族国家和国家理论的危机

大卫·赫尔德（David Held）在其关于民主、民族国家和全球系统的启发性论著中，总结其分析并写道：

今日的国际秩序特色是主权国家体系的坚持与多元权力结构的发展二者并存，而这混血的体系所面对的挑战是相当严苛的。它是否能为向来以秩序及容忍、民主与问责性（accountability）和合法性原理原则思考的当代政治基本问



题提供解决之道，仍未有定论。<sup>①</sup>

虽然赫尔德接着提出了后国家再生期 (postnational reincarnation) 的国家再合法化 (re-legitimizing) 等乐观看法，但这是他前面几页中所提到的否定国家仍将维持主权的有力论证，这也正好说明了他踌躇不定的结论：“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对结果保持乐观——但也是悲观的”。<sup>②</sup> 在这脉络下，我并不清楚作者乐观或悲观的意思，我对 20 世纪热衷于将人民陷入人类历史上最大杀伐的当代民主国家也没有好感。<sup>③</sup> 但我的意见是这样的。真正重要的是我同意如大卫·赫尔德所说的，新的权力系统的特征是新的多元权威（在此我加上权力），而民族国家只是其来源之一而已。事实上，这似乎一向都是历史性的规律而非例外。正如史布拉特 (Spruty) 所说的当代民主国家有许多“竞争者”（如城市国家、贸易联盟、帝国等），<sup>④</sup> 以及我愿意再加上军事和外交联盟，他们在当代并未消失，而是和民族国家并存发展。然而，如今逐渐浮现的问题正是本章所要阐释的，也就是当今世界政治现况的特色是民族国家在这权力竞逐中逐渐去中心化。赫斯特及汤普森 (Hirst 和 Thompson) 对那些强调国家持续的相对地位等简化的全球化观点有犀利的批判，他们认为国家将会扮演新的角色：

在国际市场和经济过程当中出现新的统理形态意味主要的中央政府将有新的角色，政府的功能变成越来越不是一个主权的实体，而比较接近为国际“政体” (polity) 中的一份

---

① 赫尔德 (1991: 161)。

② 赫尔德 (1991: 167)。

③ 提利 (1995)。

④ 史布拉特 (1994)。

子。民族国家主要的功能将只是为超国家 (super-national) 或次国家 (subnational) 的统理机制提供合法性基础及背书而已。<sup>①</sup>

更进一步来说,除了各式各样政治权力的表现或再现所产生的复杂关系,民族国家正逐渐降服于一种更微妙而麻烦的竞争之中。而且,此竞争对手是一种尚未被定义甚至未能被定义的权力来源,它们是资本、生产、信息、犯罪、跨国组织、超国家军事集团、非政府部门组织以及跨国的宗教性或公共意见运动等等所组成的网络。而在国家之内则有社区团体、教派、部落、地方集团或帮派等。因此,在可见的未来,只要民族国家存在,这些势力也都会作为一个更广大的权力网络来运作。他们也与遭到网络中其他与他自身的权威运作相矛盾的一些权力流动的对抗,正如中央银行面对全球资金的流动时,抱持着必须以一既定货币回应的幻想而遭逢的困难,就是眼前所见最好的例子。另外一个具体的例子是过去20年来无论在何处(新加坡除外),当一个国家或联合几个国家决定要扫荡毒品的制造、走私或消费时,防线总是再三地失守。如果以16世纪法国政治学家巴登(Bodin)对“国家主权”的定义来说,国家主权是建立在不能有“一丝”(a little bit)被侵犯的基础上,那么,现在的民族国家事实上已经丧失了主权这个概念的涵义。民族国家可能还拥有决定决策的能力,但是他们已经变成正面或负面权力网络的一部分,而他们权力式微的主要原因正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必须依赖多重的权力来源的扩张来加深自己的权力和影响。我相信国家权力的式微和我在本章中所举证的实际的观察和论述,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而言都是必须严肃面对的课题。

国家理论长期以来被制度论 (institutionalism)、多元论

<sup>①</sup> 赫斯特及汤普森 (1996: 171)。



(pluralism) 和工具论 (instrumentalism) 等各自不同说法和版本充斥和主宰。<sup>①</sup> 制度论的观点在韦伯主义传统下强调国家制度的自主性和主权，国家依循历史所命定的疆域以及在此逻辑上民族得以立基并获得主权。多元论解释国家体系和演化是国家受到众多影响力作用而不断地产生（再）形构，这是因着多元的市民社会的动态变化而产生的立宪过程的结果。

工具论者，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历史主义，都视国家为追求自身利益和实现统治的社会行动者的表现，不管是否在国家之内有着挑战（“中产阶级执行委员会”），或是由那些抗争、联盟或协商所产生动荡的结果。但是，就像吉吉斯（Giddens）、古汉诺（Guehenno）、赫尔德（Held）或是许多学派思想，他们讨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或所谓的国家理论，都是放在民族的背景下并将民族国家视为其主要的参考架构。然而，我们要如何想像当赫尔德的说法中的“民族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不再是一个可供参考的“相关共同体”（relevant community）？<sup>②</sup> 我们要如何想像以非国家的、而是公众的社会利益来彰显自己，或追求国家自身？或是全世界？而且对于资本流动的相关的单位，也不同于劳工或社会运动或文化认同。那么，要如何在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之下，不管是从全球还是地区性的角度，以多种的几何关系连结起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表现？因此，从一种理论的视域来说，我们必须重新建构了解权力关系的范畴，做法是不再预设民族与国家（政府）之间有必然的重合，也就是要将认同与工具性两者分开来。在权力衰落的民族国家之上，新的权力关系必须被理解为以特殊的认同为基础来掌控全球工具性网络的能力。或是，从全球网络的观点来看，它是一种能够征服充斥全球的各种工具性目的之能力。民族国家的掌控之道变成只是一种伸张权力

① 卡诺伊（1984）。

② 赫尔德（1991：142 - 143）。

的方法而已，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灌输既有的意志/利益/价值的能量，不管是否有人民对它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理论将会替代国家理论，这些我将在本书的结论再深入讨论。

然而，这并不是说国家将会消失或是变成毫不相干，从多数现实的例子来看，至少这种情形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不会发生。而这些也是我强调要多研究社群主义而非国家主义的一个看似矛盾的理由。事实上，就如同我在前而的章节中所提过的，在一个跨国的全球性和文化性的网络中，社会是以身份认同的根基上发展，并且会建构或再建构出新的制度机构来彰显这些身份认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国家危机发生的同时也爆发出许多民族主义风潮<sup>①</sup>。这些民族主义所揭示的目标大多数都是为了建立或重建新的民族国家，但是是以身份认同为基础而不是以控制在国土领域下的历史遗产为基础。如此一来，从许多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若是建立在历史性的联盟基础之上，或其选民结构的身份认同遭到部分或整体质疑时，来自民族主义者的挑战将会为这些既存的国家带来危机。因此，当代的民族主义事实上是催化国家成为历史性建构之危机的重要因素，例如近年来苏联、南斯拉夫以及非洲等实例，以及在未来可见的亚洲（如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尼等），还有没有人会知道是否有可能在欧洲（如西班牙、英国、意大利、比利时等）。但是当这些新的、以认同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者达到国家形态的阶段时，他们也会遇到现在民族国家而临全球权力流动时的局限和困境。但是，他们的建构毕竟不是在维护国家主权，而是在对抗其他国家的主权，并且在无止尽的协商和调适中掌握全球系统。有作者用“新中世纪式（neo-medieval）的全球政治秩序”一词来形容这种局势。<sup>②</sup> 虽然因为任何有“新”的字汇，都会让我从历史角度

① 柯罕（1996）。

② 布尔（1977：254），引自赫尔德（1991）。





去怀疑它，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传递着自主权观念的有趣的想像，权力式微的国家只残留着政治的最初工具性目的，以及有条件限制的权威的来源。

在历史的风暴当中依然强大有力的民族国家如日本和韩国，也必须以社会的统合和文化的认同为基础。然而即使像日本和韩国这样的例子，都发现跨国企业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为了真正变成全球性，它们的商业利益与国家的政治利益和主权之间已经萌生了一股矛盾的力量，并且正在暗地里腐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建构的历史根基。<sup>①</sup>

因此，地方自治主义确实能够在新的全球社会中建构/维系着国家，但是毫无疑问地在这过程中也将削弱民族国家在现代时期所建构的权力，而且甚至会以一种特别认同出现的方式来质疑国家这个概念。<sup>②</sup>

## 小结 宇宙之王、孙子兵法及民主危机

推论至此，正如历史实践所关切的，民族国家是否会丧失权威呢？马丁·卡诺伊（Martin Carnoy）清楚响亮地给予了否定的回答。<sup>③</sup>而我也相当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依然是一种国家政策的功能，对于国际经济的投资的吸引力也是地方经济的前提，跨国公司仍强烈地依赖其母国直接或间接的保护；而有关全国的人力资本的政策自然是以经济生产单位所在地的国家为主要考量。支持着这种观点，赫斯特及汤普森在多国公司以及国

① 强森（1982）；卡斯特（1992a）。

② 占汉诺（1993）。

③ 卡诺伊（1993：88）。

家的关系之外，还另外指出，民族国家可以使用其规范性的权力来减缓或阻止资本、劳动、信息以及商品的流动。很显然地，在历史的这个点上，说民族国家将消失无踪根本是一种荒谬的看法。<sup>①</sup>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民族国家确实已经从拥有主权的主体转变成只有战略性的地位和角色，在全球体系的互动中扮演他们自己的或是其他作用者假设它所代表的利益，并且在一定的条件限制下系统性地和其他权力团体瓜分主权。民族国家仍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因为它孤立于超国家的规矩的力量以及次国家的微观过程，因此民族国家自己的手上几乎没有权力。再者，民族国家在国际领域的策略性地行动，却会遭受到来自国家内部的压力。一方面，为了要扶植他们国家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他们必须和全球经济利益展开密切的联系，并且遵守有利于全球资本流动的规则，而他们的社会则被要求要耐心等待这种组织精心设计所带来的下滤效果。同时，要在多边的国际秩序中成为好公民，民族国家必须相互合作并且臣服在这个政治空间中生成的权力顺序之下，不能考虑该区人民的真正想法，并且有义务制裁那些背叛信条的国家以及潜在的不法分子。而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在这历史间隙里得以继续存在下去，却是因为其国土内的民族和人民，为免在全球化的狂风巨浪中失去避难所，而展开以国家为疆界的保护性的社群主义。因此，当一个国家越强调社区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它在全球权力瓜分系统中就越无法施力；而当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越得意且与左右逢源，则它们就越不能代表该国的人民利益。在世纪末世界各地的政治到处都充满了上述这种深层的矛盾。

因此，从好的方面来说民族国家可能已经达到了宇宙之王圣爱克苏佩里的地位，他能够全权掌控每日太阳升起的秩序，但是

<sup>①</sup> 赫斯特及汤普森（1996）。



由东渐西、日升到日落，主权也逐渐丧失。在诡谲多变的国际舞台上，民族国家只扮演着中介的角色，就像在 2500 年前《孙子兵法》中广为人知的一则中所记载的：

作为一个将领最重要的是要静默并严守秘密、刚毅正直才能维持秩序。他必须能够作假欺蒙他的文武官员使他们毫不知情，在安排战略布局时要让敌方无法看出任何迹象。而在拔营或行军时也要故布疑阵误导敌方获悉军情。但在最关键的时刻，这些所做所为就会像登高的梯子，在攀爬上高处完成任务之后被一脚踢开。<sup>①</sup>

这就是权力衰落的国家 (states) 如何在“踢掉”由民族 (nations) 所做成的阶梯的条件，仍能持续以胜利之姿存在，并能持续增强他们的影响力的原因，但这也开启了民主的危机。

---

① 孙子 (c.505 - 496BC, 1988: 131 - 133).

# 第六章 信息化政治与 民主危机

## 导论 社会的政治学

---

在过去，权力是王储、寡头政治与统治精英的囊中物；权力被界定为一种可将某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修改其行为的能力。然而这种权力的意象再也不适用于当今的现实。权力无所不在，却也难觅形影：它存在于大量生产中、金融流通中、生活方式中、医院中、学校中、电视中、意象中、讯息中、技术中……由于客体世界往我们之心灵世界逃窜，我们的身份遂不再由我们的所为来界定，而是被我们的所是所界定，因此导致了我们的社会多少较接近所谓的传统社会经验，搜寻着平衡而非进步。这正是政治思考与政治行动所必须回应的中心问题：如何在空间过于开放的经济以及过度封闭、分裂的文化世界两者之间，还保留一个连结？……其基本情况并非在于获取权力，而在于创造社会、在于重新发明政治、在于避免开放市场与封闭社区之间的盲目冲突、在于克服社会（这个社



会的特征是：被网罗与被排除、正热门的与被淘汰的两者之间的距离增加了)的瓦解。

——阿兰·杜罕 (Alain Touraine), 《致莱恩涅尔的信》(Lettre a Lionel) 第 36-38、42 页; 作者译。

民族国家界线不清, 因而混淆了公民权的定义。缺乏明确的权力基地, 使社会控制被稀释, 而政治挑战也产生分化。社群主义以不同的形式兴起, 削弱了民主政治所倚赖的政治分享原则。国家越来越没有办法控制资本流动、确保社会安全, 它对于市民大众的重要性因此降低了。对于地方治理制度的强调, 拉长了政治控制机制与全球问题管理之间的距离。资本、劳动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契约的失效, 把每个人送回原点, 而使人完全依赖其个人力量为其利益打拼。诚如古汉诺 (Guchenno) 所论:

自由民主乃是以两个如今已成问题的基本论点为前提: 其一为一个政治领域的存在, 它是社会共识以及共同利益的场域; 其次为具有自身动力的行动者的存在, 甚至在社会构造他们为自主主体之前, 他们即已实现其权利、彰显其权力。如今, 这些人也不再是自主主体, 而只是在犹如昙花一现的情境中, 为每个临时议题所支持的临时结盟而进行动员。政治空间也不再是一个集体团结的基地, 它们只是一些支配性认知, 如同操弄人们的利益一般地短暂。原子化 (atomization) 与同质化 (homogenization) 同时发生。社会无止境地片段化, 没有记忆也没有团结, 社会只在意象的连续剧中 (媒体每周回顾一次) 重寻其一体性。这是一个没有市民的社会, 且最终是一个非社会 (non-society)。这个危机不是——如同欧洲人希望幸免的——特殊模型 (美国模型) 的危机。美国显然将利益对抗的逻辑推向极致而瓦解了共同利益的想法; 集体认知的管理, 在美国达到了一个微妙

复杂的程度，而与欧洲截然不同。然而，极端个案帮助我们理解一般状况，美式危机透露了我们的未来。<sup>①</sup>

政治与民主过程的转化，在网络社会中，甚至比上述分析更为深刻。因为对于前述过程，我该进一步说明新信息技术在政治论战与权力追求策略上的直接结果，以之为衍生这个转化的主要因素。这个技术向度与网络社会特性的广泛趋势互动，也与对这个社会结构所形成的支配性过程的共有反应互动，而对这个转化加诸一个强大的扭转，产生了我所谓的**信息化政治** (Informational politics)。因此，尽管博比奥 (Bobbio) 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全世界政治右翼与左翼之间的永远差异（基本上是因为他们对于社会公平的截然不同的关注），<sup>②</sup> 右翼、左翼及中间路线，如果希望接近社会以确保得到足够的市民支持而赢得走向国家之路，都必须经由一个雷同的技术媒体，进行他们的计划与策略。我在本书中论述，这个技术共享导致新的游戏规则，而在社会、文化与政治转化的脉络下，强烈地影响政治的主要内涵。重点是，电子媒体（不只是电视与广播，而是所有的通讯形式，例如报纸与国际网络）已成为政治的特权空间。并非所有的政治都可降为意象、声音或象征操控。但没有它，便没有机会赢得或操练权力。因此，人人都卷入了相同的游戏，虽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也不具有相同的目的。

为了清晰起见，让我从这个分析的起点，警告读者需抵抗两个简化的、谬误的理论观点，这两个观点认为电子媒体支配了政治。其一是，有的论证说媒体将其政治选择强加在公共意见上。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我将在下文仔细讨论），媒体是极端多元的。媒体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连结是高度复杂以及被中介的，尽

① 古汉诺 (Guehenno, 1993: 46); 作者译。

② 博比奥 (Bobbio, 1994)。



管有些明显的例外，这个程度要视国家、时段与特定媒体而定。事实上，在许多案例中，媒体造势可能支持公众对抗统治者，如美国水门危机案中所显现的状况，或如 20 世纪 90 年代的意大利，当时大部分的媒体支持司法反贪污行动，既对抗传统政党，又对抗柏鲁斯康尼（Berlusconi），哪怕柏鲁斯康尼拥有 3 个私人的国家电视频道；其二是，公共意见多半被认为是讯息的被动接受者，很容易被操控。这又是被经验记录所蒙骗。如我在第一册第五章所论证的，媒体与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关系着信息的真实冲击——扭曲、攫取以及偶尔地被听众颠覆。在美国的脉络中，贝奇（Page）与夏普洛（Shapiro）从一长期的观点分析市民对于政策议题的态度，指出集体公共意见在大多数情况下的独立性与常识判断。<sup>①</sup> 总之，媒体乃根植于社会，其与政治过程的互动非常不具决定性，而系于脉络、政治行动者的策略以及社会、文化与政治特性的排列间的特定互动。

在指出电子媒体在当今政治中的关键角色之后，我要说些不同的：也就是，由于传统政治体系危机汇聚的效果以及新媒体戏剧性的普及化，政治沟通与信息遂根本地被媒体空间所掌握。若外在于媒体领域，那么就只剩政治的边际性了。这个被媒体支配的政治空间并非被媒体所决定；而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与政治过程。但电子媒体的逻辑与组织，框架并结构了政治。我必须在某些证据的基础上，在大量的跨文化例证的辅助下，来说明这个在媒体空间被电子媒体的逻辑与组织所掌握的政治框架过程（信息化时代的趋势特征），它不仅冲击选举，也冲击政治组织、决策与治理，最终修改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本质。同时，由于现存政治体系仍奠基于工业年代的组织形式与政治策略，于是在政治上就变得过时，它所依赖的信息流动也使它不再具有自主性。这就是信息时代的民主危机的基本来源。

---

<sup>①</sup> 贝奇与夏普洛（Page and Shapiro, 1992）。

我将以不同国家的数据与例证呈现这个轮廓。美国是第一个以非常开放、无结构的政治体系达到这个技术阶段的民主政体，因此它较适于说明较广泛的趋势。然而，我当然反对那种世上其他国家将追随“美国模型”（American model）的想法。没有什么东西比政治制度与政治行动者更特定地根植于历史。但我将论证，民主习性与程序发源于英国、美国与法国，在过去2个世纪扩散至世界各地；而信息化政治（如其在美国的实践，例如，电视的支配性、计算机化的政治行销、作为政治领航工具的即时民意调查、以抹黑作为政治策略等）也以同样的方式，伴随所有必然的文化的/制度的转译，成为检证新时代的有用指标。同时，为扩展分析视野，我将举证讨论英国、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日本的近期政治过程，并致力于触及欠发达国家（less-developed countries）的新民主政体，而聚焦于玻利维亚的个案。在这些观察的基础上，我将试着在网络社会的民主危机的根源上，把社会的、制度的与技术的转化过程连结起来。总之，我将探察“信息民主”的新形式的潜力。

## 第一节 信息化时代作为 政治空间的媒体

### 一 政治与媒体：市民的连接

我应在实证详述之前先阐明我的观点。在民主政治的脉络中，国家制度的可及性乃基于动员市民多数选票的能力。当今社会，人们基本上是通过媒体（大多是电视）接收讯息、形成政治意见（表6-1、表6-2）。并且，至少在美国，电视是最可信赖的新闻来源，且其可信度与时俱增（图6-1）。因此，为了要影响人民的



思考以及意志、政党与候选人所代表的冲突的政治意见便会利用媒体作为其沟通、影响与说服的基本工具。如此一来，只要媒体相对自主于政治权力，政治行动者便必须遵守媒体的规则、技术与利益。媒体框架了政治。且由于治理有赖于改选或选举而向上层移动，治理本身变得依赖于决策对公众意见的潜在冲击的日常评估，而以民意调查、焦点团体、意象分析度量之。此外，在信息越来越充斥的世界中，最有效的讯息乃是最简单、最模棱两可者，因为它可为人们的主观投射预留空间。意象最吻合这种特征化。当视听媒体关连上公共事务，它便成为最基本的思想喂养者。

表 6-1 美国的新闻来源 (1959~1992)

单位：%

日期	电视	报纸	广播	杂志	人们
1959年12月	51	57	34	8	4
1961年11月	52	57	34	9	5
1963年11月	55	53	29	6	4
1964年11月	58	56	26	8	5
1967年1月	64	55	28	7	4
1968年11月	59	49	25	7	5
1971年1月	60	48	23	5	4
1972年11月	64	50	21	6	4
1974年11月	65	47	21	4	4
1976年11月	64	49	19	7	5
1978年12月	67	49	20	5	5
1980年11月	64	44	18	5	4
1982年12月	65	44	18	6	4
1984年12月	64	40	14	4	4
1986年12月	66	36	14	4	4
1988年11月	65	42	14	4	5
1990年12月	69	43	15	3	7
1991年2月	81	35	14	4	6
1992年11月	69	43	16	4	6

注：调查问题是：“关于今天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您通常从哪里获得大部分的新闻——报纸、广播、电视、杂志、与人讨论或哪里？”（可复选）

资料来源：劳波电视信息服务调查组织（Roper Organization Surveys for the Television Information Service）（历年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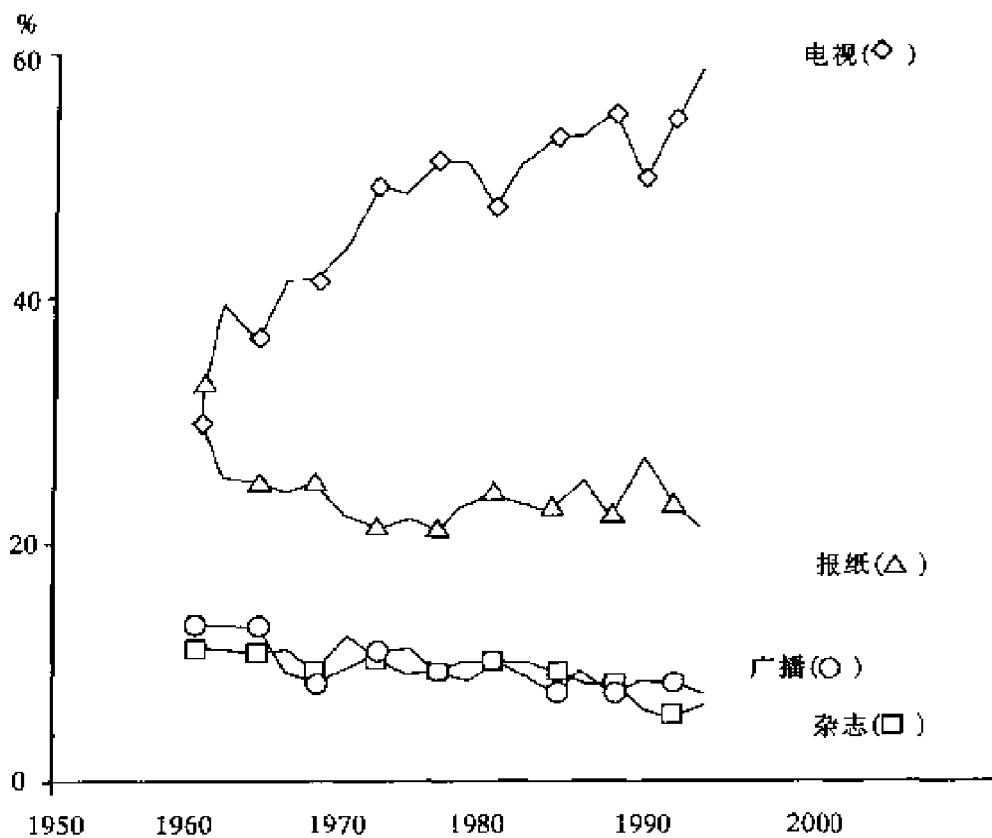


图 6-1 1959~1991 美国新闻来源的可信度

资料来源:劳波组织,《美国观察:对电视的公共态度》(纽约:1991)

表 6-2 玻利维亚科卡邦巴居民政治信息来源(1996 年)

信息来源	声称主要信息来源 (%)	表达来源偏好 (%)
报纸	32.0	8.7
广播	43.3	15.7
电视	51.7	46.0
其他	4.7	-

资料来源:科卡邦巴居民信息来源调查报告 (Survey of Information Sources of Cochabamba Residents), 现实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 (Centro de Estudios de la Realidad Economica y Social), 科卡邦巴 (Cochabamba), 1996



但谁是媒体？其政治自主性来源为何？它如何形塑政治？在民主社会中，主流媒体，基本上就是企业群体，越来越集中、越全球地互连，虽然它们同时也是高度多样化并针对区隔化的市场（参见第五章及第一册第五章的内容）。过去10年中，官方电视台与电台的行为越来越接近私人媒体，以便在全球竞争中求生存，因此变得同样地依赖收视率。<sup>①</sup> 收视率是基本必要的，因为媒体事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广告。<sup>②</sup> 收视率的表现要求一个能吸引人的媒体，就新闻来说，是它的可信度。没有可信度，新闻就没有价值，不管是从金钱的角度还是从权力的角度而言。对照于特定的政治选择，在主流政治与道德价值的参数内，可信度要求相应的距离。甚至，只有从可信的独立立场，这个独立才能有时成功地转换为公开的、投机的政治背书，有时成功地转换为以散布或封锁信息来交换支持的金钱暗盘。这种根源于企业利益的媒体自主性，也与专业意识形态以及记者的正当性和自我期许相符。他们只有报道，没有偏袒。信息是至高无上的，新闻分析必须要有充分根据，意见必须被管制，而客观则是规则。这种加诸于独立的双重约束，来自于企业体与专业，而被媒体世界所臣服的无情竞争的现象所强化，尽管趋势已经越来越朝向寡占竞争。对于任一给定的电视网或报纸来说，任何的可信度受损与竞争将会削弱其听众（市场）之占有率。因此，一方面，媒体必须靠近政治与政府，近到对信息有可及性并且从管制中获利，以及在许多国家中能够接受可观的补助；另一方面，媒体又必须够中立、保持距离以保证他们的可信度，而在公共意见形成、投票与政治决策的根本，成为信息之流与意象的生产与消费下的市民与政党之间的中介者。

一旦政治被媒体空间所捕获，政治行动者本身遂围着媒体组成政治行动，来接近媒体政治的场域：例如，透露讯息以嘉惠某

<sup>①</sup> 普列兹-泰柏尼洛等 (Percz-Tabernerio et al., 1993)。

<sup>②</sup> 麦当劳 (MacDonald, 1990)。

一特定个人或政治议程。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反泄漏，使媒体成为战场，在战场中，政治力量、政治人物以及压力团体试着搞倒对方，以从意见调查、投票所、议员选举、政府决定中获利。

当然，媒体政治并不排除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动。近年基层选战已证明其活力，如美国的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德国的绿党（Green party）、俄罗斯的共产党（Communist party）之所示。群众集会与游行示威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或巴西的政治选战中，仍是重要的仪式。而候选人仍必须造访、现身、握手、与会、亲吻儿童（但小心翼翼），以及对学生、警员以及每一可能的族群（但在法国不如此）演讲。然而，除了募款活动外，这些各式各样的接近群众式的政治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媒体上营造形象或讯息，而必须是焦点电视新闻、广播脱口秀或是有影响力的报纸上的特别报道。在西班牙的政治选战中（我推测其他国家亦然），当现场电视报道（1—2分钟）进行时，在公共集会上发言的先导候选人会被麦克风中的红灯警告，于是他/她会自动转向选好题目的、事先录制好的讲词，而不管他/她正在向现场观众说些什么。在美国的选举中，城镇会议、学校学童集会、候选人的巴士、火车、飞机航线的停靠站，都是配合着可能的媒体报道的时间与地点来安排。欢呼者与揶揄者则在舞台上提供有趣的镜头。

然而，让我再次重申：说媒体是政治空间并不表示电视对人们的决定发号施令，或表示花钱买电视广告或操弄意象的能力本身就是一个压倒性的因素。所有的国家，特别是美国，有许多的例子显示电视广告的疲劳轰炸并不足以选出候选人，或是差强人意的媒体效果并没有阻止候选人赢得选战 [虽然也有许多例子显示电视亮相对于使一个政治人物出头并维持声势而言，有强化效果；例如，美国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或罗斯·菲勒（Ross Perot）、西班牙的非力普·冈萨雷兹（Felipe Gonzalez）、意大利的伯鲁斯康尼（Berlusconi）、1993年俄罗斯的日里诺夫斯基（Jirinovsky）、1995年东京的青岛（Aoshima）]。20世纪90年代



的巴西，卡勒·米勒（Collor de Mello）跌破眼镜地因为绝佳的电视表现而赢得总统大选，但一旦人民弄清他是一个掠夺国家的骗子，便走上街头强迫他下台。3年后，费南多·汉瑞克·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他在电视上并非缺乏技巧却显然不喜欢媒体花招）压倒性地赢得总统选举，因为他在财政部长任内降低了数十年来最重要的超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而西方全球电视（O Globo Televisao）对他的竞选支持确有帮助。不论是电视还是其他媒体，都无法随其自身决定政治结果，特别是因为媒体政治是一个矛盾的国度，那里不同的行动者与策略以不同的技巧、各式各样的结果（有时出乎意料）持续上演着。媒体统治（mediacracy）与民主并不矛盾，因为它与政治体系一样地多元与竞争。是有矛盾，但不多。同时，倘若我们比较先前由政党主导的民主系统，在那里政党组织大半与多数市民隔绝却完全决定了政治计划与候选人，那么到底是哪个系统提供了更广泛的市民参与遂成为一个可讨论的话题，至少我们现在已经跨越了公社式的城镇集会的神话年代。

然而，关键在于，不在媒体上积极亮相，政治提案或候选人便没有一丝机会可得到广泛的支持。媒体政治不是所有的政治，但所有的政治必须通过媒体影响决策。如此一来，政治被根本地形塑，在其内涵、组织、过程与领导权上，被媒体系统的内在逻辑（特别是新的电子媒体）所形塑。至于这个形塑过程到底如何发生，美国过去30年的经验有助于看到媒体政治的真实演变过程。

## 二 作秀政治与政治行销：美国模型

20世纪最后10年的美国政治的转化来自于三个互相关联的过程：（1）政党的衰颓，以及在候选人的选择上政党角色的衰颓；（2）复杂的媒体系统的出现，主要是电视，但有越来越多样的弹性媒体，彼此以电子互连；（3）政治行销的发展，这是伴随

着下列现象而来：如常态性的意见调查、调查与政策调整之间的回馈系统、媒体炒作、计算机化的直接邮寄与电话银行以及将候选人与议题机动地调整为获胜形式。<sup>①</sup>

虽然美国政治体系的转化深深地根植于社会与文化趋势，这些转化最直接显示在由麦高文-弗瑞泽委员会（McGovern-Frazier Committee）所推动的选举改革上，该改革是为因应1968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政党机器选出韩福瑞（Humphrey）为总统候选人而不是更受欢迎的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一事。在新的系统下，通过总统候选人竞选者的直接初选，以多数选出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sup>②</sup> 因此，20世纪50年代40%的代表是用这种方法选出的，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比例达到了80%。<sup>③</sup> 此外，一连串的选战财务改革，强迫候选人更加依赖他们的募款技巧，而直接与社会接触，并大为降低对政党支持的依赖。利益团体与市民大多将政党组织推到美国政治的后台。<sup>④</sup> 这两个趋势都格外地强化了媒体的角色：媒体成为候选人与公众之间的特权媒介，必然影响了总统初选，以及国会与被选出的政府官员的选举。同时，由于媒体广告与媒体取向的选战非常地昂贵，候选人必须仰赖外于政党系统的私人捐助者与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sup>⑤</sup>

过去30年媒体的政治角色明显地发展，既是技术上的，也是组织上的。专家认为媒体、民意调查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关键点，乃是20世纪60年代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的选

① 爱布拉森等（Abramson et al., 1988）；派特森（Patterson, 1993）；罗柏特与麦孔斯（Roberts and McCombs, 1994）；拜尔兹与布朗森（Balz and Brownstein, 1996）。

② 派特森（Patterson, 1993: 30-33）。

③ 安森拉贝海尔等（Ansolzbehere et al., 1993: 75）。

④ 麦可来比与尼尔森（Magleby and Nelson, 1990）。

⑤ 盖柏（Garber, 1984, 1996）；高李克斯（Gunlicks, 1993）。



战。<sup>①</sup> 肯尼迪的胜利不仅在于他将选战立基于民调与电视策略且视为最要，亦多归功于其与尼克松（Nixon）的电视辩论（这种活动类型的第一次），肯尼迪在那场电视辩论取得主导性，尽管同一场辩论的广播听众选出尼克松为赢家。<sup>②</sup> 结果，电视成为美国政治的议程设定的装置。尽管有影响力的报纸，例如《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是调查报道与意见趋势的关键来源，只有在电视上持续上演的事件才会接触到够多的观众，以设定或翻转公众意见的趋势。因此，电视、报纸与广播以一种系统般地运作，报纸多半报道事件并详尽说明之，电视消化之，并把它扩散到广大观众，而广播脱口秀则提供市民互动机会，也提供被电视升温的议题的新解的或死命拥护的辩论机会。<sup>③</sup> 电视的政治角色越来越核心化，形成两个主要特性。一方面，投在电视的政治支出急剧攀高：20世纪60年代早期，约9%的国家政治选战预算花费在电视广告上，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预算变大，其比例也增大到约25%；1990年，估计约有2.03亿美元花在广播或电视的政治广告上；<sup>④</sup> 而1994年，3.5亿美元花费在电视政治广告上。<sup>⑤</sup> 这个数目对于1996年的选举来说，可能会超过8亿美元。另一方面，政治顾问对政治候选人所建议的政治炒作（political spinning）已成为政治选战的基本要素，同时也是政府决策得到支持或反对的基本要素。真正要紧的不完全是原先被报道的事件，而是围着它的那些辩论，怎么辩、谁在辩以及辩多久。胜利，而非解释或阐明，成为最关键的事。例如，1993~1994年，克林顿的健康计划改革提案吸引了大量的媒体注意力，数月尖锐的辩论之后，民

① 雅可布与夏普洛（Jacobs and Shapiro, 1995）。

② 安森拉贝海尔等（Ansolabehere et al., 1993: 73）。

③ 傅利兰（Friedland, 1996）。

④ 安森拉贝海尔等（Ansolabehere et al., 1993: 89）。

⑤ 傅利曼（Freeman, 1994）。

调指出大多数美国人搞不清楚也不确定该提案的内容及其批评内涵，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媒体争辩的战线，由保险公司、医疗协会与制药工业所支持，成功得甚至在提送国会表决之前就扼杀了该提案，更别说有留给市民讨论的空间。<sup>①</sup> 媒体已然成为主要的政治场域。

技术改变了媒体的政治角色，不只是因为技术之于媒体本身的影响，也因为技术在重要时刻将媒体系统与政治行销连结起来。<sup>②</sup> 20世纪60年代末期起，将计算机引入制表化的民意调查，导致“策略民调”（strategic polling）的产生，以针对特定的潜在投票团体试探不同的政治策略，便于随着选战的发展修改那些策略、格式、甚或讯息内涵。<sup>③</sup> 接下来的20年，派区克·柯德尔（Patrick Caddell）、彼得·哈特（Peter Hart）与劳勃·提特（Robert Teeter）等民调专家，显著地影响了选战策略，且成为候选人、市民与媒体之间的重要媒介。通过意见趋势与媒体报道之间的反复相互回馈，他们与意象塑造者、政治广告商一起打造选战、舞台、议题与形象。<sup>④</sup> 随着技术加速媒体报道、增加信息系统的速度与弹性，回馈效果与来回炒作已成为日常活动，所以在大部分的高级政治办公室中，始自白宫，沟通策略顾问们每天一大早聚会，基于主要新闻来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电视新闻网、主要的早报）的报道监测国家脉动，随时准备在关键时刻介入，早上发布的讯息与日程安排甚至到下午就要作修改。<sup>⑤</sup> 媒体本身有能力在任何时间、通过不中断的报道发布新闻的事实，表示传播斗士必须经常处于备战状态，将政治决定编写或转译为媒体政治语言，并用民调或焦点团体来评估效果。民调

① 费劳斯（Fallows, 1996）。

② 卫司特（D. West, 1993）。

③ 摩尔（Moore, 1992: 128-129）。

④ 麦尔（Mayer, 1994）。

⑤ 费劳斯（Fallows, 1996）。





专家与意象塑造者成为有决策影响力的政治行动者，能够通过信息技术、媒体学、政治智慧与自信术，造就（或不造就）总统、参议员、众议员与统治者。且即使他们失策，例如民调有所误差，他们仍然具有影响力，因为他们的错误改变了政治趋势，如同1996年新汉普夏共和党（New Hampshire Republican）初选会，以前几日民意调查中错误地高估来计算佛伯斯（Forbes）将会得到的选票，这个民意调查的失误于是搞砸了他的表现。<sup>①</sup>

20世纪90年代，媒体的领域更加多元化与分散化，媒体对于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的掌握，也变得更具有全面性。<sup>②</sup>地方有线电视与广播脱口秀受到听众欢迎并使得政治人物能更有效地定期成为讯息传送的对象，而利益集团与具有意识形态的组成分子则更能不经由主流媒体的层层过滤而传送出他们的观点。通过直接邮寄，录像带成为在城镇会议与私人家庭中散播分装好的影像讯息的主要工具。C幅（C-Span）与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全天候报道，使得政治包装新闻与信息得以及时递送。在某个案例中，共和党领袖纽特·金格瑞奇（Newt Gingrich）能播映（通过C幅）国会里的激情的、反自由的演讲，而无须顾虑干扰性的敌意反应，因为，摄像机所及之处根本空无一人。将讯息通过地方电台定向地投送到某特定地区或社群，是将民族政治切成片段，并削弱电视网的影响，尽管在电子媒体世界中拥抱政治表达的更大部分。此外，国际网络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选战宣传的载体，它控制着辩论论坛，并将支持者连结起来。<sup>③</sup>电视节目或广告上经常会出现能找到信息或辩论发展的网址，因为计算机媒介通讯能就特定媒体事件或电视化的政治广告，为关心的市民设立一个电子连线。

① 蒙地（Mundy, 1996）。

② 盖柏（Garber, 1996）；海克（Hacker, 1996）。

③ 克林柏格与皮琳（Klinenberg and Perrin, 1996）。

通过将政治纳入其电子空间，媒体决定性地框架了过程、讯息与结果，无关乎特定讯息的真实目的或效果。媒体并不是讯息，因为政治选项确实彼此不同，而那些差异确实发生作用。但经由进入媒体空间，政治计划与政治人物便被特殊的方式形塑。<sup>①</sup>然而我们要问的是，哪一种方式？

要理解被媒体逻辑所框架的政治，我们必须指出治理新媒体的、牵动着全局的原则：以娱乐及竞争的方式来较量收视率；对政治保持必要疏离以形成可信度。这些导致新闻报导的传统假设，如吉特林（Gitlin）所界定的那样：“新闻关切事件，而非其背后的条件；关心个人，而非群体；关心冲突，而非共识；关心能够将‘情节加温’的事实，而非解释故事的事实”。<sup>②</sup>只有关系到冲突、戏剧性、不法交易或不良行为的“烂新闻”，才是有趣的新闻。之所以有如此的逻辑，是因为新闻越做越像是（或与之竞争的）娱乐节目或体育事件。它需要戏剧性、悬疑性、冲突、竞赛、贪婪、欺瞒、赢家与输家，以及，假如可能，性与暴力。沿用体育报道的节奏与语言，“赛马政治”（horse race politics），得助于媒体自身的内部信心与常态的民调，被报道得犹如野心、谋划、用计与计中计的无止境游戏。媒体降低人们对政治人物必须说些什么的注意力：政治演说节录从1968年的42秒缩减为1992年的10秒不到。<sup>③</sup>当字面上每件事都被解译为纯粹的策略游戏，媒体的疏离态度导致犬儒主义。新闻报道提供这些分析的基础，但这些分析显然被万事通秀[例如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火线交叉（Crossfire）]所强化，这些秀建立于犀利的对立、无礼而喧嚷的实况转播者，而他当然总在结尾时微笑摆手，因而强调了每件事都是一个秀。另一

① 派特森（Patterson, 1993）；拜尔兹与布朗史丹（Balz and Brownstein, 1996）；费罗斯（Fallows, 1996）。

② 吉特林（Gitlin, 1980）。

③ 派特森（Patterson 1993: 74）。



方面，如詹姆斯·费劳斯（James Fallows）所论证的那样，通过越来越受欢迎的电视万事通，快步的、强力的、即时的政治评估，直接冲击电视与报纸新闻的事件报道。<sup>①</sup>换言之，随着每周宣布政治竞赛的赢家、输家，媒体对政治的陈述被其自身演变为政治事件。如珊卓·穆格（Sandra Moog）所写的那样：

新闻报道越来越转向为仅是讨论公众对最新新闻报道的反应。新闻讨论上个月、上周、昨天的政治事件所造成了哪些人是输家、赢家，又是谁的支持率升高、谁的支持率下降。新闻机构的经常性公众意见调查，使得这种高度作用成为可能，通过提供假设性客观基础给记者在不同政治人物的公共评估上、对于政治行动的冲击与新闻界对这些行动的反应作臆测。<sup>②</sup>

政治新闻报导额外的、有力的框架是事件的个人化。<sup>③</sup>戏剧的演员是政治人物，而非政治。且由于他们可能在领航政治之海时改变他们的节目单，留在大部分人心中的乃是作为政治起源的个人动机与个人形象。因此，人格问题成为政治议程的最前线，正如信差成为讯息一样。

当策略专家在媒体内玩媒体以影响选票时，政治新闻的格局也就延伸为政治本身的格局。因此，由于只有烂新闻是新闻，政治广告集中在负面消息，它的目的是要摧毁对手的方案，而以非常一般性的语汇来提出自己的说法。事实上，实验证明负面消息非常容易持续下去且影响政治意见。<sup>④</sup>同时，由于在意象制造与

① 费劳斯（Fallows, 1996）。

② 穆格（Moog, 1996: 20）。

③ 安森拉贝海尔等（Ansolabehere et al., 1993）；费劳斯（Fallows, 1996）。

④ 安森拉贝海尔与爱雅格（Ansolabehere and Iyengar, 1995）。

肥皂剧的世界上，政治是个人化的，抹黑遂成为最有力的武器。<sup>①</sup> 政治计划、政府提案与政治生涯的削弱或毁灭，可因不当行为被揭露（尼克松的水门事件揭开了新世纪）；因脱离严格道德标准的私生活与藏匿的信息曝光 [盖瑞·哈特 (Gary Hart)]，或因一连串的各种控诉、传闻、勾结，在前次指控的冲击才正要淡化时便一个接一个地在媒体上轮番上映 [就像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 与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Clinton)]。在某些个案中，未经证明的指控导致巨大的个人结果，例如目标政治人物的自杀 [例如 1993 年的法国社会主义财政部长皮耶·贝尔格佛伊 (Pierre Bérégovoy)]。因此，对于基于日常基础的人身攻击或以类似的指控反击、威胁的监视，已成为政治生活的根本部分。的确，在 1992 年的总统大选中，克林顿的顾问威胁着要对布什被指控与白宫前实习生有染一事仔细调查，以强迫共和党降低他们对克林顿外遇的注意：他们找到了另一个珍妮佛。<sup>②</sup> 沟通策略专家与发言人乃处于信息化政治的中心。

媒体揭露政治提案的内容越来越局限（除了那些远离大众听众的片段媒体，例如公共电视或报纸的长篇特论），导致政治讯息的极端简化。复杂的竞选政见被检视，最后以极分歧的语汇——赞成生命 (pro-life) 或赞成选择 (pro-choice)、同志权 (gay rights) 或围堵同性恋 (gay bashing)、社会安全与预算短缺相对于平衡预算与减少医疗补助——为广大的听众检选一些能被强调的重要议题。公投政治模仿电视游戏节目，以选举蜂鸣器公布赢家与输家，并以初选铃 (民调) 发出警告。意象、译为电码的讯息、以及英雄与狗熊（他们周期性地转换角色）之间的赛马政治，在虚矫的激情世界中，隐藏野心并背后中伤：这是美国政治被电子媒体框架在电子媒体中，因而转化为政治的实质，决定

<sup>①</sup> 格拉蒙等 (Garramone et al., 1990); 费劳斯 (Fallows, 1996)。

<sup>②</sup> 史温 (Swan, 1992)。



了靠近国家的方式。这个“美国模型”会成为刻划出信息时代的广泛政治趋势的先兆吗？

### 三 欧洲政治正在“美国化”？

非也，是也。非也，因为以特殊的历史、文化与社会为根基所发展的长久及建制化的传统，使欧洲的政治更密切地依赖政党。非也，因为事关民族文化，以及在美国被认可者在欧洲多不被认可，且事实上会让意图进攻者得到反效果：例如，一知名事件是，法国政治圈的前任总统密特朗（Mitterrand）长年有着婚姻外的关系，并育有一女。这事件从未被用来对抗他，尽管他的敌人人数众多；就算有，大部分市民会觉得干预总统的隐私是很不名誉的（对于尊重政治领导人的私生活的关注一事，英国媒体乃介于美国与大部分欧洲国家之间）。同时，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大部分的欧洲电视仍被政府控制，因此电视的政治的可及性仍被管制，付费广告仍被禁止。尽管电视自由化与私有化，私人网络〔例如英国的ITV或西班牙的天线三号电视（Antena-3 TV）〕皆遵循政治平衡的自我管制模式，以保持可信度。因此，美国与欧洲的政治系统与媒体之间的关系，确实有根本的不同。<sup>①</sup>

但另一方面，当候选人与方案是由政党挑选与决定，在决定政治喊价的结果时，媒体在欧洲变得和在美国一样重要。<sup>②</sup> 媒体（特别是电视）是政治信息与民众意见的基本来源，且是信息化政治（如在美国所见者）的主要特点，就如在美国所彰显的，欧洲政治的特性同样也有这种特性：简化讯息，以专业广告与民调作为政治工具，泄漏破坏性的信息以作为政治武器，以意象塑造与炒作控制作为攫取权力与维系权力的基本机制。且让我们简短

<sup>①</sup> 索恩与崔倪斯乐（Stune and Trunetzschler, 1992）；凯德与豪兹巴可（Kaid and Holz-Bacha, 1995）。

<sup>②</sup> 古汉诺（Guehenno, 1993）；凯德与豪兹巴可（Kaid and Holz-Bacha, 1995）。

地回顾一些比较性的证据。

在英国，20世纪80年代58%的民众的政治新闻的主要来源是电视，在20世纪90年代增加到80%，<sup>①</sup>而其他的20%则以报纸为主要来源。然而，付费电视广告在英国不合法，而政党则在选战期间与其他时候可获得免费播送。然而，解除管制、私有化与电视播放渠道的多样化，已经将受众带离正式的政治广告，而趋向政治报导。<sup>②</sup>常态性节目中对政党广告的评价，变得比广告本身更有影响力。例如，1992年，工党播出关于珍妮佛的带子——由于医疗系统的危机，这位小女孩需等上一年才能动耳朵手术。当她的身份（应保持匿名）被泄漏时，这真实的议题于是变成是工党没有能力保护机密信息，因此损及了人们对其执政能力的信任。<sup>③</sup>负面广告，特别是来自保守党员者，成为1992年的选战焦点，且在保守党的胜利中扮演一定的角色。<sup>④</sup>依赖于即时民调、锁定目标投递信件、使用专业广告与公关公司、倾向意象塑造与录音播出的事件与演讲、起用演员与影像蒙太奇的滑头的专业广告、关注意象而非政策等，乃是20世纪90年代英国政治的主要成分，就跟在美国的状况一样。<sup>⑤</sup>政治个人化在英国已有悠久传统，而有像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或玛格瑞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等强而有力的领导人。然而，个人化的新浪潮与历史的、领袖气质的领导人无关，而与任何一个应征总理宝座的人有关。因此，1987年，工党将其选战聚焦于“年轻与迷人”的拍档——尼尔与葛雷妮斯·金那克（Neil and Glenys Kinnock），并

① 穆格（Moog, 1996）。

② 贝利（Berry, 1992）。

③ 史凯莫与尚马可（Scammell and Semetko, 1995）。

④ 贝利（Berry, 1992）；史凯莫与尚马可（Scammell and Semetko, 1995）。

⑤ 爱克斯福特等（Axford et al., 1992）；费罗（Philo, 1993）；法兰克福林（Franklin, 1994）。



以之为其主要的政党选举广播 (Party Election Broadcast, PEB), 名之为《金那克》 (Kinnock) 的播映传记, 由《火战车》 (Chariots of Fire) 导演休·赫得森 (Hugh Hudson) 制作。<sup>①</sup> 1992年, 五部保守党的 PEB 中的两部聚焦于约翰·梅杰 (John Major) [《梅杰的旅程 (Major - The Journey)》, 由《午夜牛郎》 (Midnight Cowboy) 的导演许列辛格 (Schlesinger) 制作, 描写梅杰崛起自布列松 (Brixton) 劳动阶级]。<sup>②</sup> 个人化导致以抹黑为政治策略见于最近英国政坛的个案: 1992 年的选战中, 金那克被保守党小报的报道攻击 (后来被电视新闻采用), 攻击他的私生活与黑手党有牵连 [所谓的“伯忧事件” (Boyo affair)]。自由民主党 (Liberal Democrat) 领导人培迪·爱许当 (Paddy Ashdown), 因性生活而被公开攻讦。尽管爱克斯福特 (Axford) 等人认为 1992 年大选后, 英国媒体显得已能节制他们自己对于“脏手段”的使用, 这个新建立的场子似乎没有饶过皇室家庭。<sup>③</sup> 确实, 我对于我在 1996 年写下的对英国下次普选的预测感到安心: 该次选举标志着工党的可能胜利, 而将针对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领导权的崛起, 爆发“抹黑”的企图。

俄罗斯民主的出现也显示了美国风格的引人, 它始自 1993 年 12 月议会选举以来的电视取向的政治选战。<sup>④</sup> 在 1996 年具决定性影响的俄罗斯总统大选中, 叶利钦 (Yeltsin) 冒着导致久加诺夫 (Zyuganov) 走出绝望的危险, 在选战的最后几周, 通过媒体连续播放, 且首次在俄罗斯使用计算机化的直接邮寄、目标民调与区隔宣传, 再次取得对选民的控制。叶利钦的选战结合了媒体使用的新旧策略, 但在两种做法中, 电视都是焦点。一方面, 政府和

① 费罗 (Philo, 1993: 411)。

② 史凯莫与尚马可 (Scammell and Semetko, 1995: 35)

③ 爱克斯福特 (Axford et al., 1992)。

④ 休斯 (Hughes, 1994)

私人电视频道与叶利钦同一阵线，以新闻与节目作为反共产主义广告的载体，包括选前一周播出一些关于斯大林恐怖主义的影片；另一方面，叶利钦的政治广告乃经精心设计。一家名为尼古拉权谋 [Niccolo M, M 指权谋政治 (Machiavelli)] 的政治顾问公司，在媒体策略的设计中扮演要角，他们使叶利钦规律地出现在电视新闻中，但电视政治广告则将焦点放在真实的民众身上（我认识他们之一），而民众则会说明他们对叶利钦的支持。该广告之片尾字幕是：“我相信、我爱、我希望”，并附有叶利钦的签名，他那只用于广告的签名。尼古拉权谋公司的经理叶卡捷琳娜·叶戈诺娃 (Yekaterina Yegorova) 了解这一点，她自己的说法是：“他不在画面上露脸的含义是，叶利钦作为总统，已如此经常地出现在屏幕上（在规律的新闻中），如果在广告中也如此，人们将会厌倦他。”<sup>①</sup> 因此，通过不同媒体讯息形式的组合，“缺席的个人化” (absent personalization) 成为被视听宣传充斥的新的、机巧的策略。部分加州共和党的顾问也在叶利钦选战中扮演政治技术的咨询角色（尽管较之他们所宣称的份量要少得多），他们与各种媒体和政治顾问将俄罗斯推向了信息化政治，甚至是在它有足够的时间成为信息社会之前。这招真的行得通：因为没钱没权力又不够聪明的共产党员是仰赖大规模的本地运作，它的沟通方式过于原始，以至于无法跟采用电视、广播及主要报纸进行选战的叶利钦的联盟相对抗。虽然其他因素在俄罗斯选举中扮演要角 [拒绝共产主义、恐惧失序、选举煽情、技巧性地在最后一分钟下达总统决策，尤其是关于车臣 (Chech' nya)，在第二轮选举之前叶利钦行政当局招安列别德 (Lebed)]，在早期的四个月拼命追踪民调之后，新旧政治系统达到一面倒的叶利钦胜利的局面。

西班牙的年轻民主也很快地学习着信息化政治的新交易。<sup>②</sup>

① 《莫斯科时报》(Moscow Times, 1996: 1)。

② 阿隆索左德尔与卡斯特 (Alonso Zaldivar and Castells, 1992)。





在1982年的普选中，媒体与个人化围着不凡领导人的图像巧妙运用，将菲力普·冈萨雷兹（Felipe Gonzalez）描述为领导社会主义者（PSOE）迈向空前选举大胜。结果，1986年与1989年，冈萨雷兹的社会主义党员（Socialist）两度以绝对多数获选，甚至1985年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赢得进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国家公投。除了社会主义党的政策本身的优点，社会主义党在20世纪80年代的压倒性政治支配归功于三个主要因素：首先是菲力普·冈萨雷兹的领袖特质。他在媒体上的强势表现，尤其在电视上，无论是面对面辩论、记者访问还是播映的政治事件；其次是社会主义党政策所采用的战术。这是西班牙第一次以一致的、持续的政治宣传策略，并运用焦点团体、常态民调、意象分析/设计、在时间与空间中设定议题，这个做法在选后仍持续下去；第三个因素是政府的电视垄断。这造成媒体明显偏袒政府，这一点一直被反对党不断地批评，加上冈萨雷兹所具有的民主信念，20世纪90年代中，终于进行了电视台的自由化与部分私有化。然而，20世纪90年代媒体战争的失败，使得西班牙的社会主义党首先在1993年失势，随后在1996年更导致中间右翼政府的掌权。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会仔细讨论丑闻政治（scandal politics）与腐败政治（politics of corruption）乃是信息化政治的基本策略且被一再使用，在所有个案中，西班牙的例子最为显著。不过在这里要附注的是，尽管探讨美国风格政治可能扩及欧洲，但是在媒体政治化、抹黑以及经由民调调整报导角度的回路等方面的技巧上，当今西班牙根本不输于美国。

虽然是以较不戏剧性的方式（总的来说，西班牙是个高戏剧性的国家），政治在大部分欧洲民主国家已被相类似的过程所支配。因此，当其他人着重于“真正民主”的降临时，<sup>①</sup> 法国观察

---

① 席尔（Scheer, 1994）。

家却正起而反抗电视统治 (telecratie)。<sup>①</sup> 意大利的伯鲁斯康尼 (Berlusconi) 的权力的突然崛起, 乃直接关系到媒体在意大利政治中所扮演的新角色。<sup>②</sup> 20 世纪 90 年代的其他欧洲国家的比较分析,<sup>③</sup> 描述了一个媒体主宰信息传播其复杂且正转变中的情况, 与此同时, 政党却没有准备, 财力不足同时又被严格管制, 因而难以适应新的技术环境。结果似乎是, 一方面, 相对于媒体, 政党多半在国家的支持下保有自主性; 另一方面, 由于限制政党对于媒体的可及性, 人们越来越从政治体系之外的来源形成他们的政治意见, 因此加深了政党与市民之间的距离。<sup>④</sup> 因此, 尽管制度、文化与历史使得欧洲政治十分特别, 技术、全球化与网络社会激励了政治行动者去参与技术驱动与信息化的政治。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趋势, 它因接二连三的风潮而影响整个世界, 尽管是在导致政治竞争与政治行为之基本不同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玻利维亚提供了一个试验这个假说的特殊机会。

#### 四 玻利维亚的选举民粹主义：“男伙伴”巴林科与洁卡·乌鲁的来临<sup>⑤</sup>

如果我们必须选出世上拒绝文化全球化、坚持本土政治的国

① 精神 (Esprit, 1994: 3~4)。

② 戴马尔可 (Di Marco, 1994); 圣东尼拉格尔 (Santoni Rugiu, 1994); 华特 (Walter, 1994)。

③ 凯德与豪兹巴可 (Kaid and Holz-Bacha, 1995)。

④ 戴马可 (Di Marco, 1993)。

⑤ 我感谢在拉巴兹 (La Paz) 的费南多·卡得容 (Fernando Calderon) 与在科卡邦巴 (Cochabamba) 的劳伯多·雷司马 (Roberto Laserna) 协助我推论这节的玻利维亚的媒体政治。这个分析乃是基于下列玻利维亚学者的研究: 马沙 (Mesa, 1986); 阿加诺 (Archondo, 1991); 巴司尼帕罗 (Contreras Basnipeiro, 1991); 撒为雅以及山多瓦 (Saravia and Sandoval, 1991); 雷色那 (Laserna, 1992); 阿尔波 (Albo, 1993); 马雅佳 (Mayorga, 1993); 普列兹爱拉巴恩 (Perez Ibarne, 1993a, b); 阿达雅与维迪司多 (Ardaya and Verdesoto, 1994); 加德隆与拉色纳 (Calderon and Laserna, 1994); 维加戴兹等 (Bilbao La Vieja Diaz et al., 1996); 祖克乐 (Szmukler, 1996)。

家，那么玻利维亚将是最明显的候选者。在其人民的集体记忆中（即使 67% 的人认为他们自己是西班牙人与印地安人的混血），印地安认同仍极端显著，且普遍说着阿玛拉语（Aymara）与奎曲阿语（Quechua）。民族主义是所有政党的无限上纲的意识形态。1952 年革命以来，玻利维亚的矿工与农民工会是拉丁美洲觉醒程度最高、最组织化、最强悍的社会行动者、主要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政党，民族革命运动党（Movimiento Nacionalista Revolucionario, MNR），已成为过去 40 年的权力故事，而在 1996 年左翼民族主义者——自由玻利维亚运动党（Movimiento Bolivia Libre）与卡塔（本土）运动党 [Kartarist (indigenist) movement] ——的支持下仍握有总统权。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前，该国的社会张力与政治战斗推动了经常性的军事政变，却并非总令美国大使馆讨厌。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高层军队在毒品交易的开放参与，卡特修改美国态度的政策改变，促进了 1982 年的稳定民主的恢复，并以左翼团结取得权力。从那时起，尽管社会张力仍然升高，由于民族革命运动党在 1985 年引进结构调整政策（后来被别的政府跟随），民主似乎已被稳健建立。一个极活络的政治斗争发展开来，政党组成、分裂与改革，打造了达到国家权力的最不可能的政治联盟。因此，玻利维亚的社会动员与民主政治过去、现在皆生动而良好。而且，1989 年以来，拉巴兹—艾尔阿突（La Paz—El Alto）（玻利维亚首府及其常民聚落边陲）的政治，被卡罗斯·巴林科（Carlos Palenque）所建立的政治动员所支配。巴林科是一位底层出身的前民谣音乐家，后来成为广播与电视节目主持人，然后又是媒体网络大众广电（Radio Television Popular, RTP）的所有权人，最后成为祖国觉醒党（Conciencia de Patria, Condepa）的领袖。祖国觉醒党在 1988 年 9 月 21 日成立于缙华那蔻（Tihuanaco）——阿玛拉世界的占都。虽然这故事似与拉丁美洲民粹主义的古老传统觉醒般地耳熟能详，它确实不寻常、复杂、

具启示性。

巴林科的事迹始自 1968 年，当时在他的民谣乐团，步行者 (Los Caminates) 开辟了一个广播节目，而逐渐以大众语言与听众直接接触，他所使用的大众语言包括西班牙语及阿玛拉语的混用，以使穷困都市阶层的民众的沟通不因为媒体的形式主义而胆怯。1978 年，他开辟了一个电视节目，提供一个舞台给民众表达不满。他介绍自己是听众的男伙伴，也将他的对谈者指涉为男伙伴与女伙伴 (compadres and comadres)，因此提高了沟通层面，且引入了根植于阿玛拉与天主教传统的共有共享 (communality) 的基本想法。<sup>①</sup> 1980 年，他成功地买下大都会电台 (Radio Metropolitana)，随后又买下在拉巴兹 (La Paz) 的电视台四频道 (Chanal 4)。这电台与电视台很快地成为拉巴兹地区收听最众的媒体，且确实维持有 25% 的广播听众指称他们只收听大都会电台。

巴林科的沟通策略中有五个关键元素。第一个是节目个人化，以有力的男伙伴与女伙伴代表各种拥护者，例如以女伙伴芮咪迪奥斯·罗撒 (comadre Remedios Loza) 代表一个寻常女子 [坚毅的女人 (mujer de pollera)]，一种在电视上前所未见的人类类型，尽管正是拉巴兹多数家庭的形象；或是男伙伴巴柯 (compadre Paco)，其意较接近中产阶级；或是他自己的妻子，前西班牙裔吉普赛芭蕾舞者莫妮卡·梅蒂那·巴林科 (Monica Medina de Palenque)，以她为最重要的角色，代表智慧的女人。与听众互动的个人化并没有因现场节目而停止，反而扩展为节目的主要部分。例如，尽管四频道播出相同的拉丁美洲肥皂剧 (该剧吸引了整个西班牙语系世界的注意)，男伙伴巴林科及其团队对各种连续剧集的事件与剧

---

① 男伙伴与女伙伴 (Compadre and comadre) 这两个字眼用以指涉社会中的成员关系，系将阿玛拉传统与天主教庆典 (例如，受洗儿童的天父、天母) 的元素放在一起。因此，男伙伴与女伙伴 (compadre and comadre) 被认为能了解、贡献、分享与设定彼此间的相互性。



情，提出个人看法，并与其听众共同将肥皂剧情与拉巴兹原住民（Pacenos）的日常生活关连起来；其次是女人（尤其是社会阶级低的女人）的目标锁定，及在其节目中的女人的卓越表现；第三，以节目与民众的关注、喜悦直接连结，例如人民周末（People's Saturdays）的现场转播有数百位都市民众参与；或是人民讲坛（The People's Tribune），现场转播人们严厉批评他们所遭受（不论来自于什么人）的不当待遇；第四，他愿意倾听民众的抱怨，张开耳朵倾听拉巴兹凌乱分布的都市边缘、来自农村与印地安生活的痛苦整合的叹息；第五，宗教理念，以洁卡·乌鲁（Jach'a Uru）来临的保证，将希望正当化如上帝的意志，根据阿玛拉传统，洁卡·乌鲁来临的那天，所有的痛苦都会结束。

然而，巴林科异军突起的途径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他对威权的批判，被以访问了毒品贩子头目的罪名，大众广电（RTP）媒体网络在1988年6月与11月两度被政府关闭。但民众的抗议与高等法院的判决，使它在数月后重新开张。巴林科以创立政党〔祖国觉醒党（Condepa）〕作为回应，并争取总统宝座。在他所参与的1989年5月的第一次选举上，祖国觉醒党成为该国第四大政党，且是首都的第一大党。在地方自治选举中，它赢得艾尔阿突（Al Alto，玻利维亚第四大都市）的市长席位，且进入拉巴兹的市议会。在第二次的地方自治选举中，莫妮卡·梅蒂那·巴林科成为拉巴兹的市长，她一直在位直到1996年。祖国觉醒党也出现在国会上：在其他的议员中，女伙伴芮咪迪奥斯在推动玻利维亚女性的合法地位上，扮演了领导角色。尽管有着民粹主义的取向，祖国觉醒党并没有发展出对各级政府的攻击态度。1989年，它的选票帮助了詹·培兹·札莫拉（Jaime Paz Zamora）赢得国会主席的选举，尽管札莫拉在大众选举中位居第三。当1993年民族革命运动党选出新总理桑却斯·罗撒达（Sanchez de Losada），祖国觉醒党并没有参与到政府中，而是与政府合作某些立法催生的工作。

男伙伴巴林科的成功，并非是在社会真空状态下发生的。他

有特定的讯息而不只是扮演中介，这些讯息似乎与拉巴兹的都市大众的真实经验相契合。他以语言、对阿玛拉传统的强调以及民俗与宗教的观点，披露了拉巴兹晚期移民的文化认同。在对于经济调整与整合入全球经济的政策的反抗上，他彰显被迫离家劳工与都市穷人的日常痛苦，以及那以经济理性为名而加诸在他们身上的折磨。男伙伴巴林科成为无声者的声音。男伙伴巴林科推行多项社会计划以媒体为平台，而与祖国觉醒党所在的地方制度连结，其中最成功的是去帮助被经济再结构与私有化所替代的产业劳工。为了抵抗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全球化，男伙伴巴林科基于玻利维亚本身的资源以及人民的共产精神，提出（虽然以相当含糊的字眼）“本土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的模式。因此，祖国觉醒党的影响并非只是媒体操弄：它的主题指涉了拉巴兹民众的真实痛苦，它的语言直接与拉巴兹和艾尔阿突的大众阶层的文化及地方认同沟通（就这点而言，其运动大半保有地方性，某些分析家称为“都会共同体”（metropolitan ayllu））。<sup>①</sup> 然而，若没有媒体的力量以及混合了娱乐广播与电视的知觉沟通策略，来创造公开抱怨空间并且创造领导人与听众之间的领袖魅力信任，祖国觉醒党将降为配角，如同玻利维亚的其他民粹运动一般，例如麦克斯·佛南蒂斯（Max Fernandez）的公民团结统一党（Unidad Civica Solidaridad）。事实上，1996年玻利维亚人对媒体的信任超过了他们对政治代表的信任（表6-3）。

因此，媒体政治不必然成为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的专利品，或利用技术力量使权力技术趋于完美，而成为既有政党的专利品。当男伙伴巴林科的权势似乎指向基于认同的共产主义，而穷人运动（有时在宗教的千年至福说的形式下）能经由媒体的使用而靠近政治主流。经此，他们使得其他政治行动者玩着相似的游戏（如20世纪90年代的玻利维亚），因此导致政治在媒体空间

<sup>①</sup> Ayllu是阿玛拉传统中领域/文化社区的传统形式。

的逐步开放，尽管特定特色符合玻利维亚文化传统、经济条件与

表 6-3 玻利维亚公民对于何种制度代表其利益的意见

制度	赞成意见百分比%
国会	3.5
任 政党	3.4
总统	3.3
市长	6.9
邻里委员会	11.3
工会	12.6
大众媒体	23.4

注：被问的问题是：“您认为下述制度代表您的利益吗？”（相对于所有被问公民的百分比；国家代表样本）

资料来源：集体作者（Collective Author, 1996）。

政治动态。此外，尽管祖国觉醒党有共产取向，我们发现在男伙伴巴林科的经验中，有一系列的特性与信息化政治的更广泛的趋势相去不远，如上所述的有：极端个人化的领导；二元分化的讯息简化：善与恶；在公共与个人生活的形塑中，道德与宗教判断的优越性；在动员与政治决定中，电子广播语言、讯息与符号的必然重要性；民众情绪善变，而在失控的感受世界中迷失；将这些新政治表达与传统政治领域相接合的困难〔就这点，某些玻利维亚分析家指出“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的出现系伴随着“非正式经济”（informal economy）而来〕<sup>①</sup>；同时，最后，我们也发现，这些男伙伴与女伙伴（compadres and comadres）也以他们的财务能力支持媒体政治，于是形成了权力、媒体与金钱之间的回馈回路（或恶性循环）。尽管“复兴都会共同体”<sup>②</sup>限制了全球化，其仍通过媒体流动空间的设置而进行，而彰显传统

① 阿达雅与维德所多（Ardaya and Verdesoto, 1994）。

② 阿加诺（Archondo, 1991）。

文化与大众利益的权力。如此一来，他们存活了下来，但也同时转化了自己，而进入一个新世界，那里充满了声音与影像、由电子调控的节奏（charangos）、环境保育的大兀鹰以及由电视描绘的洁卡·乌鲁。

## 第二节 行动中的信息化政治： 丑闻的政治学<sup>①</sup>

过去10年，全世界的政治系统都动荡不安，政治领导人毁于一连串无情的丑闻。在某些个案中，稳固掌权了半世纪的政党，随着以其利益所建的政权的末日而崩解。这个演变中的重要例证有：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s），在20

① 本节部分基于不同国家的主流报纸与杂志的报导，以及对于某些事件的个人知识。我认为无须为众所周知的事件一一提出参考来源。一个政治丑闻的国际回顾文件是朗文（Longman）（1990）的《1945年来著名的政治丑闻与导因》（Political Scandals and Causes Celebres since 1945）。其中一个主要的学术性、比较性章节是海登海莫等在1989年所撰述者〔Heidenheimer et al.（1989）〕。美国丑闻政治的历史统计可在菲克勒与林〔Fackler and Lin（1995）〕以及罗丝〔Ross（1988）〕的研究中找到。美国国会丑闻的近期统计在巴兹与布朗司坦〔Balz and Brownstein（1996：27ff）〕的研究中。美国政治腐败的加注书目见约翰生（Johansen，1990）。其他用于本节的资料来源有：金镍科（King Neckel，1989）；包梭（Bouissou，1991）；莫里斯（Morris，1991）；菲利普司（Phillips，1992）；萨巴多（Sabato，1991）；巴可（Barker，1992）；CQ研究者（CQ Researcher，1992）；曼尼（Meny，1992）；菲利普司（Phillips，1992）；史温（Swan，1992）；特拉法格利雅（Tranfiglia，1992）；巴柏（Barber，1993）；巴可（Buckler，1993）；德里昂（DeLeon，1993）；格拉比（Grubbe，1993）；罗曼（Roman，1993）；精神（Esprit，1994）；甘伯（Gumbel，1994）；华特（Walter，1994）；阿拉治（Arlachi，1995）；法可尔以及林（Fackler and Lin，1995）；贾西雅加脱莱洛（Garcia Cotarelo，1995）；强森（Johnson，1995）；赛加（Sechi，1995）；汤普森（Thompson，1995）。



世纪 90 年代彻底解体；日本的自民党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在 1993 年首度分裂且下台，虽然该党仍存活下来，且仍以联合政府或以少数党的方式参与政事；而印度的国民大会党 (Congress Party)，在印度独立的 48 年中统治了这个全世界最大民主政体有 44 年之后，也遭受了羞愧的挫败，在一个涉及国会领袖那拉西哈·饶 (Narasimha Rao) 的丑闻之后，让印度教民族主义者 (Hindu nationalist) 在 1996 年的大选中得利，似乎是替不具争议性的尼赫鲁 (Nehru) 之继任者所建立的政治支配系统划上句号。除了斯堪的那维亚民主政体与一些其他小国家，我无法想到在北美、拉丁美洲、东西欧、亚洲、非洲中，有哪些国家没有在最近几年爆发重大的具有严重后果的、有时或有戏剧性后果的政治丑闻的。<sup>①</sup>

在一些例子中，丑闻指涉了领袖的个人道德（通常是男人不当地被性或酒醉所驱使）。但在大部分的个案中，事关政治贪污，也就是，依据卡尔·福雷德瑞奇 (Carl Friedrich) 的定义是：“当被要求做某些事的掌权者（亦即，具有事责的行为者或官员）被非法地提供金钱或其他奖赏，而致采取有利于奖赏供应者的行动，且因此伤害大众及大众利益。”<sup>②</sup> 在某些个案中，政府官员只是拿钱受贿，甚至无需去运作它。或说人们如此相信。从韩国总统卢泰愚 (Roh) 到巴西总统卡勒·米勒，以及从俄罗斯军方或美国国会的某些成员，到西班牙与法国社会党行政官员的高级成员，一波又一波与贪污相关的政治丑闻已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全世界的公众生活的主要成分。何以至此？难道说我们的政治系统是史上最为贪污腐败的吗？我怀

① 海登海莫等 (Heidenheimer et al., 1989)；朗文 (Longman, 1990)；加曼 (Garment, 1991)；CQ 研究者 (CQ Researcher, 1992)；曼尼 (Manly, 1992)；格拉比 (Grubbe, 1993)；罗曼 (Roman, 1993)；甘伯 (Gumbel, 1994)；华特 (Walter, 1994)；汤普森 (Thompson, 1995)。

② 福雷德瑞奇 (Friedrich, 1966: 74)。

疑。为了私人利益而使用与滥用权力，乃是一种可界定为“人类本性”的特性之一，如果说这种本质的确存在的话。<sup>①</sup>这正是民主为何发明、且尽管它不见得是一个完美的却是最可被追求的治理形式的原因之一。在表象的背后，在信息被国家控制的情况下，政治精英在远古时代亦如在近代，任意地对某些人与利益集团建立起收取私人利益的渠道，而古今之主要不同系在于收贿的强制程度，以及这种秘密捐献引导公共事务时其影响力的各种形式。因此，对于这个事实首先可以观察到的重点是对贪污的举发正可以是一个民主社会与新闻自由的合适指标。<sup>②</sup>例如，西班牙在佛朗哥（Franco）的独裁之下，蒙受着独裁者的亲信对国家的直接掠夺，始自佛朗哥夫人有名的珠宝店造访之旅，而珠宝店店主从不敢把账单寄给他。没有一位严肃的观察家会说西班牙的政治贪污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主义政府比在佛朗哥时代更普遍。<sup>③</sup>然而在独裁时代贪污只是可信赖朋友之间的闲聊题材，在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生活，却由于对政府贪污与违法行为的揭发与辩论而重新塑造了西班牙的民主。而在建立已久并具有新闻自由的民主中，例如美国，被新闻界报道的政治贪污的发生数，出现起伏不定而没有清楚的长期趋势，如图6-2 [菲克勒与林（Fackler and Lin）为过去100年制表] 之所见。<sup>④</sup>然而，在尼克松水门案时期前后，出现了最澎湃的政治贪污报道，也特别引起了记者与政客的有力想像——通过破坏性信息的取得与扩散，把最有权力的政治在位者拉下马的可能性。金（King）对19世纪英国政治贪污的历史研究，<sup>⑤</sup>显示了这种现象的扩散推动了1867年的改革法

① 雷斯（Leys, 1989）。

② 马可维兹与席维史登（Markovits and Silversein, 1988）。

③ 阿隆索左德尔与卡斯特（Alonso Zaldivar and Castells, 1992）。

④ 菲克勒与林（Fackler and Lin, 1995）。

⑤ 金（King, 1989）。



案 (Reform Act), 以便约束这种行为, 这是一种民主的进步。同时, 包梭 (Bouissou) 报告了 1990 年日本新闻界揭发普遍的选举欺诈, 《朝日新闻》(Asahi) 指出: “贿选的人, 一旦当选也出卖自己”。<sup>①</sup> 此外, 在一个最有洞见的分析中, 巴克 (Barker) 指出当政客的不法行动不足以成为导致名誉扫地的弹药, 其他类型行为 (例如, 不当的性) 便成为政治丑闻的原材料。<sup>②</sup> 因此, 朗文 (Longman) 国际政治丑闻系列<sup>③</sup> 计算了所有国家的不法与不属非法的政治丑闻的比例 (73 : 27), 这相当接近美国或法国的比值, 但却与英国 (41 : 59) 非常不同, 所以说在英国, 性与间谍活动遂相当于其他国家的贪污与行贿。贪污本身却似乎没像丑闻 (即被揭发的贪污或不法行为) 及其政治冲击那么严重。<sup>④</sup>

那么, 为什么是现在? 如果并非是贪污正处在历史高峰, 为何它在媒体上全面地爆发开来, 且为何它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严重影响政治系统与政治行动者? 这有许多削弱政治系统的结构性因素, 与宏观政治趋势, 导致政治系统更容易受创于公众意见所产生的骚动。政治竞争, 以及试图影响政治光谱中的主要选民的竞争, 已经降低了政党以及联盟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比在确保了它们的死忠支持者之后, 剩下的就是尽可能瓢窃对手的主要诉求与立场。于是带来的结果是政治位置的模糊以及市民更注意于政党与候选人的可信任度, 而不是对议题的专业程度。政治的人格化也将注意力集中在领导者及其特质上, 因此开启了以攻击人格品质赢得选票的方式。效力惊人的全球犯罪经济的兴起, 穿透了许多国家的国家制度, 而通常都在政府最高层级, 因此提供了制造丑

---

① 包梭 (Bouissou, 1991: 84)。

② 巴克 (Barker, 1992)。

③ 朗文 (Longman, 1990)。

④ 罗为 (Lowi, 1988)。

闻的弹药，并利用信息以黑函促使政治人物屈从。地缘政治因素也扮演要角：因此，意大利与日本政治系统（各自以基督教民主党与自民党组成，而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余波中）相当程度地得自美国的协助与影响，以便在这两个处于冷战脉络中位置极为关键、国内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政党都很强大的民主国中，建立一个对抗共产主义的防线。<sup>①</sup> 基督教民主党领袖与黑手党 (Mafia)<sup>②</sup> 之间的，以及某些自民党领袖与日本黑社会 (Yakuza)<sup>③</sup> 之间的长期的、众所周知的连系，并不阻碍国际与国内力量对这些政党的坚定支持，只要取代他们的运作会充满风险的话。在后冷战环境中，政党乃将自身取决于国家政治市场的动员；政党内部的党规变得较不严格，因为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是比较有条件进行激烈的竞争的。古汉诺 (Guehenno) 也指出，在民族国家淡出及不再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承诺的世界中，作为政府中的掌权者所得到的回馈与社会所提供的一般的回馈不再有太大的差别，也就是说，到最后，金钱，成为私人的生涯或组织事业的关键，可用来享受生活，供养家庭或促进人性的目标。<sup>④</sup>

所有这些因素似乎都造成了政治系统面对贪污时更不具抵御能力。但就我的观点来看，有另外一件事改变了近代社会的政治系统的本质。我认为丑闻政治是信息化政治下为了斗争与竞争而选择的武器。论证如下：政治一般说来是被媒体的空间所包围。媒体变得比往常更有力量，无论是从技术、财务还是从政治的观点而言。媒体的全球触脚与网络，使得他们得以逃脱严格的政治控制。媒体的调查报道能力，以及他们的相对于政治权力的相对

① 强森 (Johnson, 1995)。

② 特拉法格尔 (Tranfaglia, 1992)。

③ 包梭 (Bouissou, 1991)；强森 (Johnson, 1995)。

④ 古汉诺 (Guehenno, 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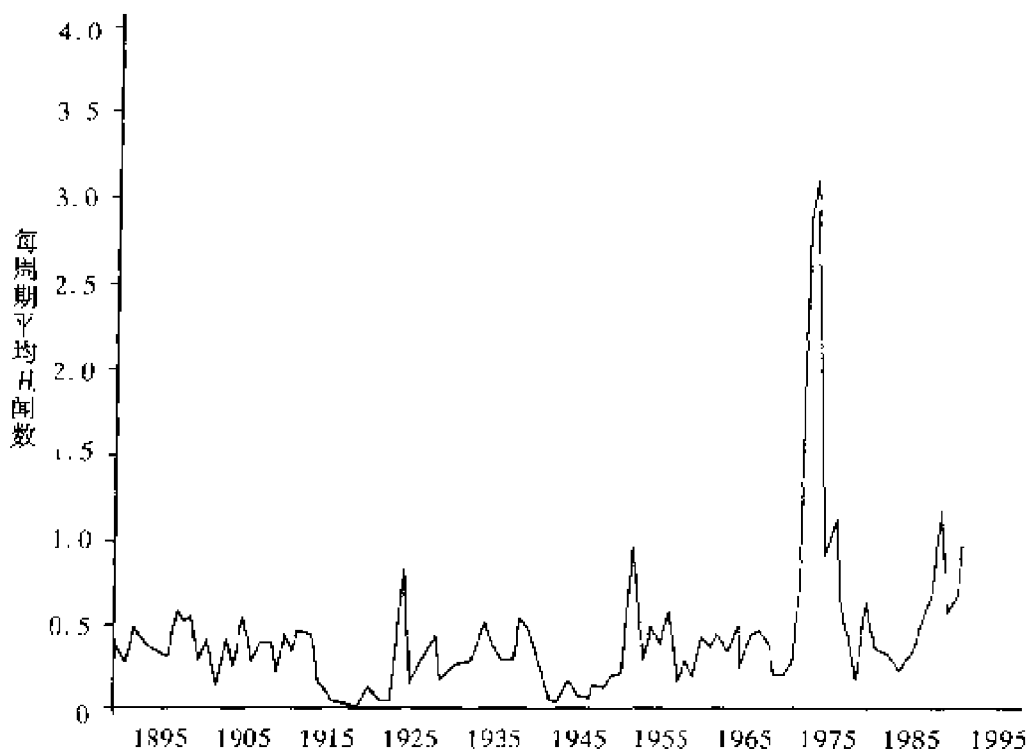


图 6-2 1890~1992 年美国每个周期发生的贪污事件的平均数字

资料来源：非克勒和林(1995)

自主性，使得他们大体成为社会上的信息与意见的主要来源。政党或是候选人必须进入媒体或借助媒体才能够接触到社会。媒体不是所谓的第四权；而是，他们是进行权力斗争的基地。媒体政治是一种越来越昂贵的操作，以信息化政治的全部行头来看甚至更贵：民调、广告、行销、分析、形象塑造与信息处理。目前政治财政来源的制度系统并没有办法应付这样的任务。政治行动者是长期财政短缺的，而必要支出与合法收益之间的差距明显拉大，且趋势在持续之中。<sup>①</sup> 因此，耗光所有合法资源、个人献金

<sup>①</sup> 温伯格 (Weinberg, 1991); 傅利曼 (Freeman, 1994); 派地等 (Pattie et al., 1995)。

与企业交易后，政党与政治人物通常寻求惟一真实的金钱来源：从企业与利益集团而来的台面下献金，显然是为了交换对其有利的政府决策。<sup>①</sup>这正是系统性的政治贪污的发源地，从这发展出前线企业与中间人的影子网络。一旦腐败变得普遍，在一些人把他们个人所拿取的加到政治捐献的渠道上后，政治中的每个人以及媒体中的每个人，都知道（或认为他/她知道），如果看得够仔细或够久，则每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到杀伤性的信息。因此，狩猎开始，始于政治顾问为了准备攻击或防卫的弹药；始于记者为了完成他作为调查报道者、找到资料以完成他们的工作并对受众以及广告商吹嘘；始于自由作家和骗子，以找到可被用于黑函或卖给有兴趣的政党的信息。事实上，大部分的媒体披露的有杀伤力的材料，是政治人物自己或合作的企业利益所泄漏的。最后，一旦杀伤性政治信息市场被创立，如果没有足够的清除材料，那么辩解、暗讽、甚至捏造势必基于政治人物、记者与媒体的个人伦理而来。事实上，丑闻政治学的策略不一定是对某一丑闻的根基给予立即的打击。它是各种不同形式丑闻的无情流动，具备不同层次的可能性，从对小小事件严谨信息到对重要议题的耸动辩论，这些织成丝线使政治企图被扼杀、而政治的梦想也丧失——除非能形成某种约定，且因此回馈到该系统。重要的是针对丑闻的种种不同描写笔触累积下来而最后对于公众意见所形成的冲击。<sup>②</sup>正如俄罗斯的一句老话：“我记不得是她偷了一件外套，还是她的一件外套被偷了。”

丑闻政治之最高段是司法调查或议国会调查，导致了起诉书，以及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领导人的下狱。<sup>③</sup>法官、检察官与调

① 曼尼 (Meny, 1992)。

② 巴克 (Barker, 1992); CQ 研究者 (CQ Researcher, 1992)。

③ 盖蒙特 (Garment, 1991); 嘉西雅高特罗 (Garcia Cotarelo, 1995); 汤普森 (Thompson, 1995)。

查委员进入一种与媒体共生的关系。他们保护媒体（确保他们的独立），且经常以精算过的泄漏来喂养媒体。为了交换，他们被媒体保护，成为媒体英雄，并且在媒体的支持下有时成为成功的政治人物。他们一起为民主奋斗，清扫政府，他们控制政治人物的过分言行，并且，最终，他们攫取权力，使权力远离政治过程，而扩散到社会中。尽管如此，他们也可能使政党、政治人物、政治、最后乃至目前这种模式的民主失去合法性。<sup>①</sup>

丑闻政治，20世纪90年代对执政的西班牙社会党（Spanish Socialist party）的反对历程，为这个分析提供了有趣的例证。在1989年西班牙普选中社会党胜利（排名第三）后，一个利益集团幕后结盟（可能政治反对党领袖并没有参与其中）决定，这是终止社会党在独揽西班牙政治生活的时候——原本这种状况被认为可以稳当进入21世纪的。<sup>②</sup>在当时，爆炸性的政治档案被泄漏、发现、操弄或发明并且在媒体上发表。由于西班牙主要报纸〔《国家报》（El Pais）、《新闻报》（El Periodico）、《领先报》（La Vanguardia）〕的自我约束，大部分潜伏的反社会党“丑闻”是一开始在《世界报》（El Mundo）——一份创办于1990年的专业老练的报纸上被登出的。从此，周刊与广播脱口秀的万事通先生（主要来自于基督教教会所拥有的广播网络）不断炮轰听众直到其他媒体（包括电视）附和该新闻。丑闻在1990年1月开始揭露，是因为当时的副总统的弟弟将他所持有的政治影响力出卖给了诸多的商人。虽然这小骗子做的不法事情没什么大不了，且法庭也澄清了副总统没有任何不当，这档事却占据西班牙媒体的政治头条几乎两年之久，并且真正导致了这位副总统的辞职——尽

① 巴勒斯（Bellers, 1989）；阿莱奇（Arlachi, 1995）；嘉西雅高特罗（Garcia Cotarelo, 1995）；费劳斯（Fallows, 1996）。

② 卡周（Cacho, 1994）；嘉西雅高特罗（Garcia Cotarelo, 1995）；代码斯（Temas, 1995）。

管他是社会党的第二号重要人物，并且他拒绝公开谴责他的弟弟。一旦这丑闻开始消散，新的媒体战便又开始，在某位政党会计师脱党并对媒体透露讯息后，媒体遂聚焦于社会党的不法资金来源，这显然是出于个人报复。司法调查于是展开，导致某些社会党领袖被起诉。尽管有这些控告，当社会党仍保有足够的席位以在 1993 的选举中主政，丑闻政治遂在西班牙媒体与司法场景上加速：西班牙银行总裁涉嫌暗盘交易，且承认逃漏税。负有盛名的瓜地亚市民守护党（Guardia Civil）第一位平民党魁被逮到索贿，潜逃出境、在曼谷被捕、被遣回西班牙入狱，一连串事件令人目瞪口呆；更严重的是，西班牙军情局的一位忿忿不平的军官，将载有对西班牙领袖（包括国王）不法监听的文件泄漏出去；以及，为进一步促进公共士气的瓦解，西班牙警察的前秘密警察，因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抗巴斯克（Basque）恐怖主义者的“龌龊战争”（dirty war）（仿效撒切尔对抗爱尔兰共和军的伎俩）中安排刺杀而下狱，将其战袍转向对抗政府，且将内政部长与数位高级官员牵扯进该阴谋之中。这个政治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西班牙法官的态度，在那里存在着使社会党最不尴尬的可能性。通过劝进这些狂热法官中名气最旺者在 1993 年选举中作为社会党的独立代表，且任命他为司法部的高级官员，菲力普·冈萨雷兹展开了这所谓的辉煌操练。那是一个灾难：不管是因为那官职不够高（社会党的说法），还是该法官对他所见感到失望（该法官的说法），他辞官且与一位最好斗的检察官一起对抗社会党政府最高阶层的任何可能的不法行为。在议会与司法的调查曝光后，有些导致了起诉，有些因为缺乏实质内容而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政治丑闻成为西班牙媒体的每日头条达 5 年之久，瘫痪了政府的行动，毁灭了一大堆政治与企业形象，动摇了西班牙最有权势的政治力量。社会党终于在 1996 年败北，尽管领袖的个人领导魅力使其在这突击猛攻后仍能幸存。

这个发生在西班牙的司法/媒体反社会党的强势攻击，其原



因及过程十分复杂而迄今仍未被以公众的形式加以讨论。总的说来有诸多因素彼此连结并相互强化：社会党的非法资金的来源，将数位领袖成员卷入影子事业网络的建立中；诸多高级社会党行政官员与地方社会党头头的实际贪污与非法行为；某些反政府团体（某些偏激商人，包括被社会党征用的金融大亨；某些极端保守力量；或许是某些天主教教会整合派分子；某些特殊利益集团；觉得被社会党的权力边缘化的忿忿不平的记者）的愤怒；社会党的内斗，从菲力浦·冈萨雷兹（上述争吵之无庸争议的领导者）的眼光来看，有些领导人泄漏讯息以反对彼此来削弱其对手的可信度；两大主要金融集团之间的争斗，其一代表传统西班牙金融，与社会党经济团队关系密切；另一以外来者组成，试图入侵该系统，并尝试与某些反对其他派系的社会党派系结盟；媒体团体之间的战争，无所不用其极地争相取得西班牙新媒体系统的控制权；个人仇恨，正如同那最好斗的反社会党报纸编辑的仇恨，他确信他的失业是政府施压的结果；以及在媒体世界中、在西班牙生活的其他环节中，一个更复杂、更分散的意见，依此社会党的支配是过度的，而某些社会党领导人的傲慢是无法忍受的，以至于指示了社会精英应该反映与揭示社会党诱惑选民（其大部分选民连续四次选举都投票给社会党）的真实面目。因此，最后姑且不论个人动机与特定商业利益集团，媒体宣称他们的权力集体地、与司法结盟地确保了西班牙政治阶级，包括保守派（大众党 Partido Popular），为未来学到教训。尽管社会党行政与社会党的不法行为和严重贪污已无需争辩，对于我们分析真正有意义的是，媒体中以及被媒体使用的丑闻政治，乃成为政治行动者、商业利益与社会团体相互争战所利用的基本武器。如此一来，他们因使西班牙政治依赖媒体，而永远转化了西班牙政治。

丑闻政治的特征，就是所有的政治人物在实践它的时候也就被该系统套住，通常是连环套：今天的猎人是明天的猎物。有关这一点有一个意大利的柏鲁斯康尼政治冒险个案。该事件颇为入

知：他将他所控制的三家私人电视网，连本带利地押注在建设一个反意大利贪污政治系统的毁灭性选战。<sup>①</sup>不久，3个月后，他创设一个特别“政党”[强大意大利（Forza Italia），以意大利国家足球队球迷团的呼号而命名]，而且与新法西斯党（neo-Fascist party）及北方联盟（the Northern League）结盟，而赢得1994年普选并成为总理。理论上，政府的控制赋予他超过其他那三个政府拥有的电视网的权威。然而，媒体与记者的自主性，被强烈地主张。尽管他在媒体事业（报纸、杂志以及电视）中的压倒性出现，一旦柏鲁斯康尼成为总理，司法与媒体，再次一起进行一个对柏鲁斯康尼的财务诈骗与贿赂计划的全力以赴的攻击，削弱其事业，提审他的某些伙伴，起诉柏鲁斯康尼本人，且最终以议会检查其政府而破坏其形象。然后，1996年选民拒绝了柏鲁斯康尼，取而代之地选出艾尔·优力佛（Il Ulivo）的中间偏左联盟，这个联盟的主要成员是前共产党、现在的社会党[左翼民主党（Partito Democratico di Sinistra）]，过去未曾进入国家政府，因而能保有声誉。

这个意大利政治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教训是，在媒体中的压倒性企业影响力，在信息化政治中，不等于是政治控制。媒体系统，以其与民主的司法制度和检察制度的共生连结，来建立自己的脚步，并从整个政治系统光谱中接收信号，将之转化为销路与影响力，而不顾政治冲击的源起与目的。其黄金定律是：能导致既定状况更大冲击者，即是较有价值者。一旦一个政治人物或政党变成无关紧要——他们就再也不是新闻事件。政治系统被卷入媒体报道、泄密、反泄密及丑闻制造的无止境的纷扰中。为了有把握，某些斗胆的政治策略专家通过将其自身投入媒体事业，通过结盟，通过设定信息打击目标与时机来斗胆“骑虎”。这正是柏鲁斯康尼所尝试的。他的命运就像是那些金融投机客的命运，

<sup>①</sup> 华特（Walter, 1994）。



他们假装了解在不可测的全球金融市场的领航途径。在丑闻政治中，如在网络社会的其他领域，流动之权超越了权力之流。

### 第三节 民主危机

让我们将上述这些已经被指出的、关系着民族国家以及当代社会之政治过程的转化的各种线索收拢一起来看。当这些线索被编织在一个历史架构中的时候，它们显现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知的民主危机。<sup>①</sup>

民族国家，界定了领域、程序以及市民权的客体，已失去甚多主权，被全球流动的动态，以及财富、信息和权力的跨组织网络所侵蚀。对其合法性危机特别关键的是，国家无能实现其作为福利国家的承诺，因为生产与消费已经在一个全球的相互依赖情境中以及资本主义再结构的相关过程中进行整合。福利国家的确曾基于每个社会的历史以不同的形式，作为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制度重建的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来源。<sup>②</sup> 凯恩斯主义 (Keynesianism) 的被放弃与劳工运动的衰退，可能因合法性的削弱而加重主权民族国家的消亡。

基于特定认同的政治意义的 (再) 建构，正根本地挑战着公民权的概念。国家通过自身对社群主义的认同，排除了其他价值和少数人的认同，而将其合法性来源从代表人们意志与提供人民福祉，转移为呼吁集体认同。这就是基本教义派的民族主义的，

<sup>①</sup> 明克 (Minc, 1993); 古汉诺 (Guehenno, 1993); 派特森 (Patterson, 1993); 金斯宝 (Ginsborg, 1994); 杜罕 (Touraine, 1995b); 卡兹尼尔森 (Katznelson, 1996); 韦斯伯格 (Weisberg, 1996)。

<sup>②</sup> 纳维罗 (Navarro, 1995)。

种族性的、领土性的以及或宗教性的国家的根源，而这似乎是当前合法性的政治危机所造成的。我承认它们不能且不会维系民主制度（也就是自由主义式的民主），因为这两个系统（民族公民权、单一认同）之间的再现原则是相互矛盾的。

对民族国家合法性危机而言，我们必须加上以政党的开放竞争为基础的政治系统的可信度的危机。它被媒体领域所俘虏，被简化为个人的领导权，并倚赖于技术上的复杂操弄，被推向不法的金援，被丑闻政治推着走并越来越接近丑闻政治，政党系统已失去其诉求吸引力及可信度，同时，对所有的现实目的而言，它是一个不再具有公众信心而仅剩官僚的残余物。<sup>①</sup>

公共意见、市民的个别的和集体的反应，作为以上三个加总的互动过程的结果，显现了对于政党、政客与专家政治的渐增的、根本的不满。因此，在美国，根据1994年9月时报明镜中心（Times Mirror Center）的问卷调查：“在这个夏天所进行的对数千美国选民的访谈发现，除了对当前的系统深感挫折，以及对于替代性的政治方案及诉求有热烈反应外，群众的政治思考中没有其他什么清楚的方向。”<sup>②</sup> 1994年一项全国性的哈瑞斯民调（Harris Poll）中，有82%的受访者不认为政府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对照于1980年的72%），72%的受访者认为事实上政府代表着利益集团（68%的受访者认为这些集团是商业集团）；沿着相同的线索，一项1995劳坡民调（Roper Poll）发现，68%的受访者认为共和党与民主党并没有太大的差别，82%的受访者希望能有一个新政党被创建出来。<sup>③</sup> 图6-3如民意调查所反映的，显示了七大工业国中的六个国家的人民对于各种政治组成形式的

① 卫斯特（West, 1993）；安德森与高米乐（Anderson and Comiller, 1994）；摩非（Mouffe, 1995）；Navarro（1995）；萨尔瓦提（Salvati, 1995）；巴兹与布朗史登（Balz and Brownstein, 1996）。

② 引自巴兹与布朗史登（Quoted by Balz and Brownstein, 1996: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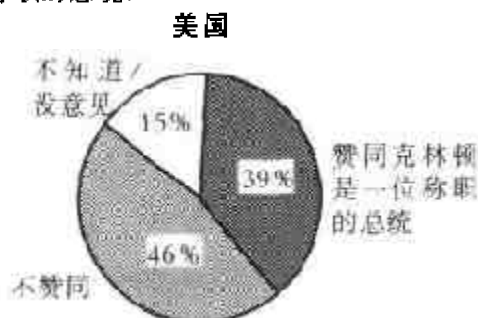
③ 引自纳维尔（Cited by Navarro, 1995: 55）。



政府的普遍不满。

然而，这种对于主流政党与政治的怀疑论，不必然表示人们不再投票，或不关心民主制度。因为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在人们付出极大的努力，以血汗及泪水作战之后，好不容易才在近年来获取民主，所以人们不是那么容易就会放弃希望。确实，当人们察觉到有意义的政治行动的机会时，他们狂热地动员，正如在1994年费南多·汉瑞克·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参与巴西总统选举时人们的表现一般。甚至在老资格的民主政体中，自由选举的仪式已实践了200年（虽然一半的人口——女人不包括在内），政治参与也是起起伏伏。在美国，人们投票率并不高（从1968年总统大选的68%，下滑至1996年的49%、1992年的54%以及1984年的51%），但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及大部分欧洲国家中，参与率一直相当高（介于65%~80%之间）（见表6-4）。然而，欧洲人比美国人更不信任他们的政治人物。<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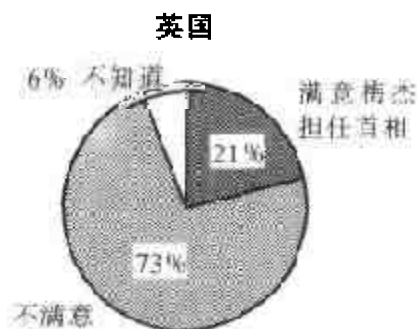
问题：您是否赞同比尔·克林顿是一位称职的总统？



注：在一项于1992年11月大选前进行的CBS新闻/纽约时报之问卷调查中，37%的受访者说他们赞同说布什是一位称职的总统，56%不赞成。

资料来源：CBS新闻/纽约时报所做的问卷调查，1993年6月21~24日

问题：您是否满意梅杰先生担任首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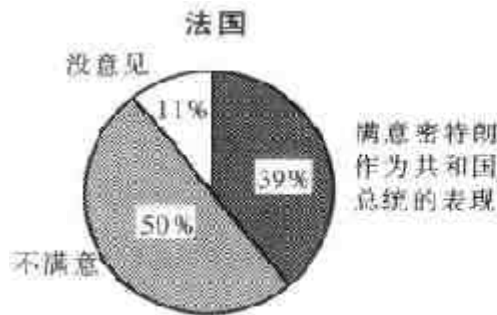


注：这个百分比中说满意的比例是有史以来英国首相民意调查满意度中最低的一次。

资料来源：社会问卷调查（盖洛普民调（Gallup Poll））有限公司的问卷调查，1993年5月26~31日

① 欧洲气压计（Eurobarometer）（各年度）。

问题：您是否满意弗·密特朗 (Francois Mitterrand) 先生作为共和国总统的表现？



资料来源：法国民意与行动研究机构 (the Institut Francais d'Opinion Publique et d'Etude de Marches (IFOP)) 为《周日期刊》(Le Journal Du Dimanche) 做的问卷调查, 1993年5月6-13日

问题：您是否同意布莱恩·穆若尼 (Brian Mulroney) 是一位称职的总理？



注：布莱恩·穆若尼在 1993 年 6 月之后由金·坎贝尔 (Kim Campbell) 继任总理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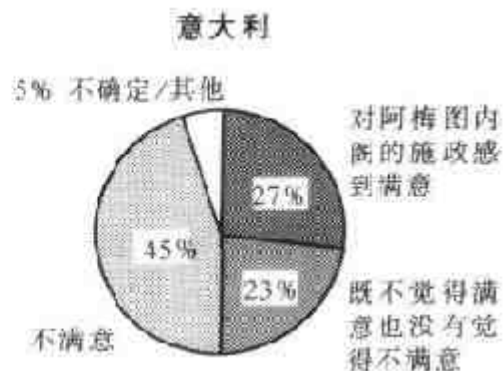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加拿大盖洛普的问卷调查, 1993年1月13-18日。

问题：您支持宫泽内阁吗？



资料来源：《读卖新闻》的问卷调查, 1993年5月

问题：您对上个月奎利安诺·阿梅图 (Giuliano Amato) 内阁的施政感到满意或不满意？



资料来源：DOXA 的问卷调查, 1993年1月19日

图 6-3 对于各个政府的赞同率

资料来源：由劳坡公众意见与民调中心 (Roper Center of Public Opinion and Polling) 汇整制表 (1995)

表 6-4 众议院选举的投票率：近期与 20 世纪 70 年代、  
80 年代的比较

单位：%

	20 世纪 70~80 年代		
	平均投票率	最高及最低的投票率	20 世纪 90 年代(一次选举)
法国(第一次投票)	76.0	66.2~83.2	68.9 (1993)
德国	88.6	84.3~91.1	79.1 (1994)
意大利	91.4	89.0~93.2	86.4 (1992)
日本	71.2	67.9~74.6	67.3 (1993)
西班牙	73.9	70.6~77.0	77.3 (1993)
英国	74.8	72.2~78.9	75.8 (1992)
美国	42.6	33.4~50.9	50.8 (1992) 36.0 (1994)

资料来源：20 世纪 70 年代与 80 年代：《选举史国际年鉴》(The International Almanac of Electoral History, rev. 3rd edn, Thomas T. Mackie and Richard Rose, Washington, DC: Macmillan Press, 1991); 近年的选举：1994~1995 年与 1995~1996 年的《政治家年报》(Statesman's Yearbook, Brian Hunter,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1995); 美国：《美国政治重要统计》(Vital Statistics on American Politics, 4th edn, Harold W. Stanley and Richard G. Niemi, Washington DC: CQ Press, 1994)、珊卓·穆格(Sandra Moog) 汇整。

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理由，似乎是个人主义而不是政治不满。<sup>①</sup>

尽管如此，当人们观察到国家没有能力解决他们的问题，又从专业政客那里体验到愤世嫉俗的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时，结果是带来世界性的政治异化现象。这些表现之一对于各种“第三党”(third party)势力以及区域政党的越来越高的支持率，因为在大部分政治系统中，攫取国家行政权力的最后决

<sup>①</sup> 李普塞(Lipset, 1996)。

战，乃发生在代表两大阵营的两位候选人之间。因此，投给第三者，成为一种对整个政治系统的抗议票，它也是可能有助于发展成替选案的一种尝试，而这种替选案通常是以地方或区域为基础的。珊卓·穆格和我已为几个州的主要民主政体的主流政党建立了一个投票索引，以度量其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几个时间点上的演变。<sup>①</sup>如图6-4所示，整个趋势似乎证实了主流政党的得票率在下跌中。然而，这个趋势中也会产生转折，例如当政党成功地动员其选民（如西班牙保守党在1996年大选中所做的）时。特定的政治节奏为整体趋势带来变异。然而，在宏观的层次上，被预测的趋势似乎明显地出现了。尽管多数选民仍被驱使向工具性投票——也就是，以真正被选上的可能性来支持候选人——这种支持的侵蚀正会影响选举机会的可预测性，因此强化了主要联盟的可信度危机，而最终迅速导致其消亡，正如意大利政治中出现的（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以及1994年美国政治中出现的（民主党国会）。然而，撒勒（Zaller）与杭特（Hunt），在他们对洛斯·菲勒（Ross Perot）在1992年总统选举战的精湛分析中，对“第三党”政治的限制提出了警告：如其所著：即使是在美国这种大众民主中，作为沟通者的伟大技术仍不足以赢得国家最高职位。候选人仍必须通过层层的权利的考验。纵使提名过程最后的权威仍是在无法预测的、而且通常是在对政治冷漠的大众的手里，因而有些不稳定性，然而选出总统的美国系统仍具有强大的制度性权力，强制候选人遵循，而没办法走捷径。<sup>②</sup>问题是：在媒体政治可于数小时内打造（与消灭）新明星的情况下，选民对于另类政治选择的渴求要多久才能从主流政治制度中逐渐成形？又能维持多久？直到什么时候？

① 关于计算的来源、定义及方法，参见方法学附录。

② 撒勒与杭特（Zaller and Hunt, 1994: 3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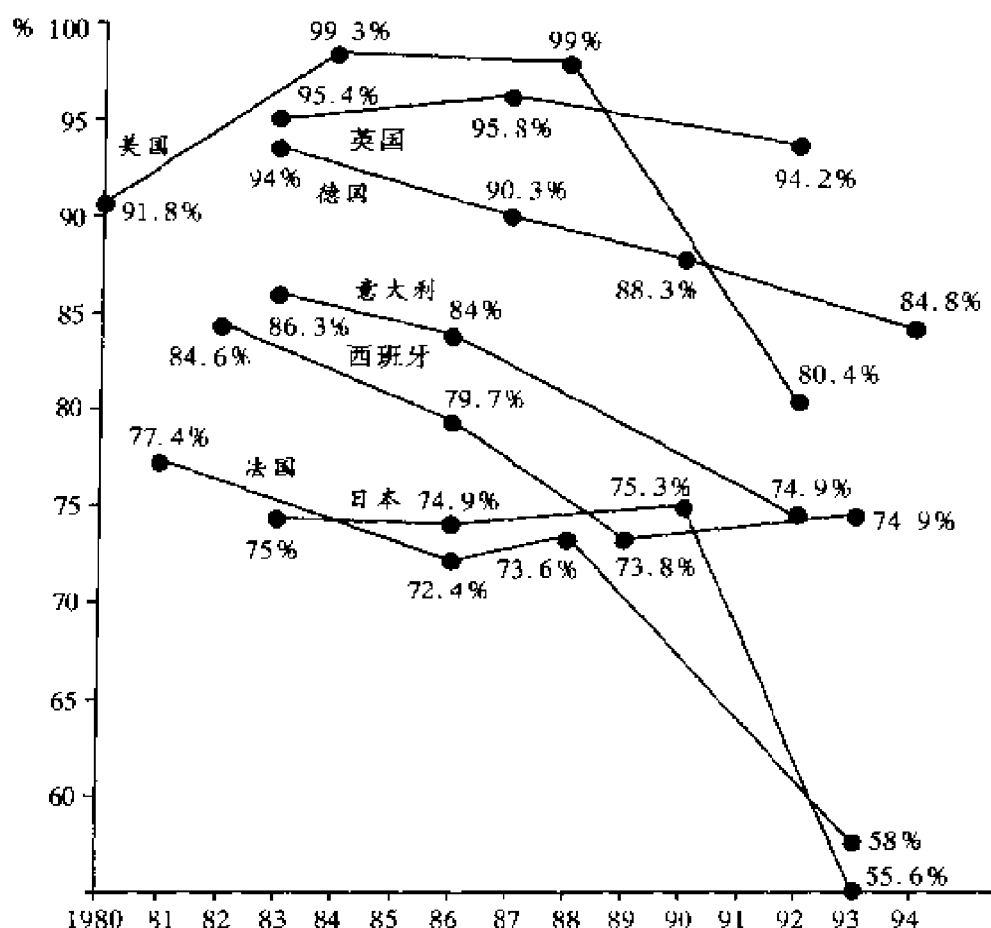


图 6-4 全国选举中对于主流政党的支持程度(1980~1994年)(美国的  
部分是关于总统大选;所有其他则是众议院的投票结果)

资料来源:参见方法论附录的图与资料来源。珊卓·穆格(Sandra Moog)汇整制表。

而且,眼前大部分国家中大多数人民的选择仍受制于制度、政治机器与传统。在这些情况下,传统政党系统之政治不满的额外指标,就是世界性的选民变天、拉下执政党以及加快政治轮替的速度。在1992~1996年间,选民在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从共和党转向民主党,在1994年的国会选举中从民主党转向共和党,并在1996年又转回到克林顿(在他强调他的“新民主党”观点之后),但没在1996年回到国会的民主党;法国的总统大选

从社会主义转向戴高乐主义 (Gaullist)；意大利从中间转向右派，然后又转向中间偏左；西班牙从社会主义加民族主义，转向保守派加民族主义；日本从保守派转向多党联盟，然后转向少数党政府的保守派；希腊从社会主义转向保守派，然后回到社会主义；巴西则从什么都不是到费南多·汉瑞克·卡多索；俄罗斯议会选举从民主党转向共产党，然后在总统大选中回到叶利钦。因此，人民，不满与沮丧，加快速度地从一个选择转向另一个选择，在大部分的时候，体验着连续的失望。在每一个新的选择里，士气逐渐消沉、犬儒主义开始发酵，而希望则逐渐消逝。

上述趋势的结果是，另一个主要现象正在发生：政治系统的断裂正在增长。因此，倘若 1996 年印度选举可能标志着国大党 (Congress Party) 支配纪元的结束，赢得选举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仅有三分之一的席位，而无法掌控政府。一个混杂的“联合阵线”在 1996 年 5 月被建立起来，而将一个不确定的左派政党、区域政党与低阶层人民政党的联盟带进政府之中，而这个联盟在选举中的出现，就是这个政治体制危机的主要原因。印度，其民主政治的稳定性曾是发展中国家所羡慕的对象，如今可能已进入了结构性政治断裂与政治区域化的情况。

在主要的民主政体中间，20 世纪 90 年代只有德国，在全球竞争压力、德国福利国家紧缩及产业劳资合营改革下，似乎在德国政治共识的核心上维持着政治稳定 [但这是在 1996 年科尔 (Kohl) 掌政之前]。

这些发展的结果是，一般而言，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人们从政治场景中退出，却是政治系统被象征政治、单一议题动员、地方主义、公投政治，以及最重要的，对个人化领导的特别支持等所穿透的景象。随着政党的远离，这是救世主时代 (time of saviors)。这导致了系统性的不可预测性。它可以转化为政治再生，就像是费南多·汉瑞克·卡多索，或像是柯林·鲍威尔 (Colin Powell) (相当讽刺却又具历史般启示地看到，一个共和党非裔



美国人，牙买加移民的儿子，重新合法化美国政治)；或者，另外，它可能走人煽情的火焰，而使政治制度分裂，危及世界稳定，或对理性展开新的攻击。

不管将来如何，当前的观察似乎指出的是，在不同的形式下，经由我在本章与前面章节所勾勒的各种过程，我们正目击国家的片段化、政治系统的不可预期性以及政治的单一化。政治自由可能仍然存在，因为人们将会继续为它奋斗。但政治民主，如18世纪自由革命所筹划的，以及如在20世纪扩散至全世界的，已变成一个空壳。非说它只是“形式民主”(formal democracy)：民主制度正就出于这些“形式”(forms)，例如秘密的、普遍性投票以及对市民自由的尊重。<sup>①</sup>但正如网络社会的政治代议的适当机制，民主操演的新的制度性的、文化的及技术的条件，已使既存政党系统与现行竞争政治体制变成空壳。人们知道，也感觉得到这些。但他们也知道，在他们的集体记忆中，避免独裁者占据消失中的民主政治空间，是多么的重要。市民们仍是市民，然而他们不确定自己属于什么样的城市及谁的城市。

## 小结 重建民主?

我的确有一些警告性的字眼要说。此刻它使我想把握机会对你讲述我个人的信息民主制度模式。不过，别担心。为了某些我在本书(第三卷)的总结论中已经说明过的原因，我在这里将不允许自己提出规范性处方与政治警告。然而，若以谨慎的公平态度来看待政治的希望的话，我将以评论民主制度重建路径为总结——正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可以从一些社会中的实践所

<sup>①</sup> 卡兹尼尔森(Katznelson, 1996)。

观察到的那般，姑且先不论我个人对其优劣的看法。然而，幸运地，由于世界上新民主政治的雏形数量不少且兼具多样性，我在此仅将把我的评论限定在三个我认为与未来信息化政治特别相关的趋势上。

首先是地方政府再造。世界上许多社会中的地方民主，由于那些在第五章中所阐释过的理由，现正蓬勃发展，至少相对于民族政治民主来说是如此。当区域及地方政府彼此合作、并且将触角延伸到邻里分权与市民参与时尤其如此。当电子工具（计算机媒介通讯，或地方电台与电视台）被用在扩大市民的参与与商议时〔例如，阿姆斯特丹或福冈县（Fukuoka Prefecture）〕，新技术有助于强化地方政府中的参与。地方自我管理的经验，例如巴西西南部大区域玛土哥罗索（Mato Grosso）的科依阿巴（Cuiaba）地方自治所发展者，显示了有可能重建地方代议的连结，以分担（假如不是控制的话）经济全球化与政治不可预期性的挑战。地方主义（localism）显然有限制，因其加速民族国家的分裂。但仅就观察而言，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主正当化的最有力趋势，是全球性地发生在地方层级。<sup>①</sup>

第二个通常在文献<sup>②</sup>及媒体中<sup>③</sup>所讨论的观点，是电子通讯提供了强化市民之间的政治参与水平沟通的机会。的确，线上信息通路与计算机媒介通讯，促进了信息的扩散与搜寻，也绕过媒体的控制，提供了在自主的、电子的论坛上的互动与辩论的可能性。当被小心运用而不变成公投政治的过度简化架构时，各种议题上的指标性公投能作为一个有用的工具。更重要的，市民们可以形成、并且也正在形成他们自己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群体，牵

① 库克（Cooke, 1994）；葛拉汉（Graham, 1995）；兹卡迪（Ziccardi, 1995）；波札与卡斯特（Broja and Castells, 1996）。

② 甘里（Ganley, 1991）。

③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1995a）。



制建制化的政治结构，因此创造一个有弹性的、有适应力的政治场域。然而，可能会有一些，或说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对于电子民主的严肃的批判出现。<sup>①</sup>一方面，一旦这种民主政治的形式的出现作为一种辩论、代议与决策的重要工具，它就会在民族与国际层面上，将一种“雅典式民主”（Athenian democracy）加以制度化。也就是说，当一些国家与城市中的相对小的少数的、受过教育的、富裕的精英，拥有能接近信息与政治参与的特殊工具，并真正地强化了他们的市民权，而世界上或一个国家中那些未受过教育的、被漠视的百姓大众却仍将被排除在新民主核心之外，正如古典希腊民主初期中的奴隶与蛮族；另一方面，一旦瞬间潮来潮往的政治态度取代了政党与制度的理性化权力，中间选民的反复无常，将会导致强调带有流行与神话狂热的“表演政治”。换言之，网络政治可将政治个人化与社会个人化的情境推向一个难以获取整合、共识及制度性的建设之状况。

为了探索这事，1996年春季在柏克莱信息社会的社会学硕士班研讨课程中，我的学生进行了国际网络的线上观察。他们的分析结果显示出一些有趣的趋势。因此，克林尼柏格（Klinenberg）与皮琳（Perrin）观察到，在1996年共和党的美国总统初选中，在传播有关候选人的信息（如杜尔）、寻求支持（例如布坎南）以及捐赠（所有候选人）等事项，国际网络的使用扮演了要角。<sup>②</sup>然而，通讯渠道仍被监视与紧密控制，因此事实上成为单向通讯系统，它比电视更有力、更有弹性，却并没有对市民参与更开放。这在将来可能会有改变，但信息化政治的逻辑似乎限制了系统开放性，因为候选人必须控制他们的网络上的讯息，而不必为有成见的、或偏离选举的立场或主张负责。严密的政治控制与电子开放在现行系统中似乎是相互排斥的。因此，

① 高级专家团体（High Level Experts Group, 1996）。

② 克林尼柏格与皮琳（Klinenberg and Perrin, 1996）。

只要是政党与有组织的选战控制政治程序，电子式的市民参与就会在信息化政治中位居末席，因为它涉及正式选举与决策。

然而，另一方面，史提夫·巴兹（Steve Bartz）观察环境运动，以及马修·祖克（Matthew Zook）观察美国民兵运动，他们找到以国际网络作为信息、沟通及组织的工具，而为基层团体注入力量的过程。<sup>①</sup> 这显示对于象征政治的领域，以及外在于主流政治系统中的个人或群体所进行的议题取向的动员的发展而言，新电子通讯可能具有最戏剧性的效果。此种发展对于民主的冲击尚不清楚。一方面，容许议题动员而不遵循形式民主的模式，可能甚至更进一步削弱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假如政治代议制度与决策制定过程，可以连结上这些来自热心市民的所投入的新的资源，而不是只听从于技术精英，那么一种新形式的市民社会就可能被重建，并产生民主的电子基层化。

象征政治的发展，以及环绕着“非政治”（non-political）因素的政治动员的发展，不管是否限于电子层面，是网络社会的民主重建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第三个趋势。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例如那些由世界上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无国界医师（Medecins sans frontieres）、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乐施会（Oxfam）、粮食第一（Food First）以及世上成千上万的地方的、全球的活跃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所支持者，是信息化政治中最积极、最强力动员的因素。<sup>②</sup> 这些动员围绕着具有广泛共识的议题而发展，而不必然要与任何政党联合。事实上，从官方立场来看，大多数政党显然支持这些团体大部分的诉求。而大部分人道组织刻意回避对某一特定政党的支持，除非在特定时刻的特定议题上。这些动员大部分是介于社会运动与政治行动之间，因为他们诉诸市民，要求人们对公共机构或私人

① 巴兹（Bartz, 1996）；祖克（Zook, 1996）。

② 古汉诺（Guehenno, 1993）。



厂商施压，以使动员的目标议题有所不同。在其他的案例中，它们直接呼吁人们的团结。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对政治过程产生作用；也就是说，去影响社会中代议士所进行的社会管理。但他们不必然、且事实上不常运用政治代议渠道与决策渠道，例如推举他们自己的候选人进入政府。这些政治动员的形式，可被界定为议题取向、非政党取向的政治，似乎在所有的社会中赢得越来越多的合法性，并且主导了形式化的政治竞争的规则与结果。他们使人们心中与生活中对公共事务的关注重获正当性。在促使正等待被发现的信息民主早日出现之际，这些新的动员形势透过了带人新的政治过程及政治议题，终究加速了古典的民主政治的危机。

## 结论 网络社会的 社会变迁

在信息时代破晓之际，合法性危机（a crisis of legitimacy）正在掏空工业时代的意义与制度性的功能。因为与财富、权力及信息的全球网络产生脱节，现代民族国家（modern nation - state）已经失去了它的主权（sovereignty）。因为试着在这个全球景象中进行策略性的干预，国家已经失去了代表其领域性的地方选民的能量。在一个多边主义成为规则、民族（nation）与国家（state）分离、议会代表政治与调停干涉政治分离的世界里，自由主义的民主建造其上的政治估量单位以及在过去两个世纪操作的结果是组织被毁坏。公共机构之私人化以及福利国家之寿终正寝，而将社会给技术官僚的负担减轻，公民中多数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坏，资本、劳动与国家之间历史性的社会契约破裂，大部分的社会安全网、正当的政府照顾普通人民的基本细节被撤销了。因为劳工运动被金融与生产的国际化所撕裂，不能调适于公司网络化与工作个人化以及受就业无性别化所挑战，而消退为社会凝聚与工人代表的主要力量，越发变成整合在公共制度领域内的政治作用者。主流教会，不是仰赖于国家就是仰赖于市场，以一种世俗化了的宗教形式实践，提供慰藉人心、出售“天堂不动产”为交换，而失去了强化行为的能力。父权家庭之危机，扰乱了世代之间行为传递符码有秩序的序列，以及摇撼了个人安全的基





础，迫使男人、女人与孩童由他们自己去寻找生活的新方式。政治意识形态在这些不同的制度与组织中扩散，从以国家为基础的民主自由主义到以劳工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脉络中寻找它们自己被剥除了的真实意义，以及因此失去了他们的诉求，从事一系列无止尽的修正与调适，落后于新社会，像被遗忘了的沾满灰尘的战旗。

这些汇聚过程的结果，我在第一章中所称之合法化认同 (legitimizing identities) 的根源枯竭了。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的制度与组织是围绕着民主政体之国家，以及围绕着资本与劳工之间之社会契约而建造的，大体而言，已经变成了空壳，在许多社会中越发不能关连上人们的劳动与价值。这实在是一种悲剧性的嘲讽，当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最后终于争取达到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 (以我的观点看，是所有政治民主的基础)，这些制度却是离真正的有关系的结构与过程如此遥远，对大部分的人民而言似乎是一个讽刺的鬼脸。在这个世纪结束之际，王与后，国家与公民社会，两者都浑身赤裸，他们的孩童——公民，正在众多寄养家庭之间徘徊流浪。

认同的分解，相当于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社会系统的社会之分解，正是我们历史时期的情境。这并未意味着新的认同必须浮现，新的社会运动必须重建社会，以及新的制度朝着“歌颂明天” (lendemains qui chantent)<sup>①</sup>之重建。乍看之下，除了当他们射杀邻人、强暴小女孩，或是在地铁中散放神经毒气之外，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市场、网络、个人与策略性组织的世界之浮现，这个世界明显地为“理性预期” (rational expectation) (新的支配性的经济理论) 的模式所指导。在这个新世界中不需要认同：基本直觉、权力欲、自我中心的策略性计算，以及在更宏观的层次，

① 意味对快活与美好未来之期望与许诺，这也是法国的革命与社会运动对未来的 一种古典提法。——译注

“一种野蛮游牧动力的明显品质，如狂欢节人流威胁要泛滥过所有的边界，使国际政法律与文明规范蒙上阴影”（Panarin, 1994: 37）。这世界的“多声部音乐”可能是，就像我在许多国家中已经看到的，作为国家结构残余的民族主义老调重弹，放弃任何正当性的佯装，又爬回为权力而权力的原则之历史，有时以一种不再能欺骗任何人的民族主义的修辞进行包裹。在本书已越过的头两卷之地景中，我们已经觉察到一颗社会的种籽，它的文化中心世界观（Weltanschauung）在强权（Macht）的老逻辑与自我中心世界观（Selbstanschauung）的新逻辑之间历史地分裂。

然而，我们也已观察到强有力的抵制认同（resistance identities）浮现出来，它在社区天堂里面已不多见，拒绝被全球流动与激进的个人主义所冲走。他们围绕着神、民族及家庭等传统价值建造其社区，以及他们以族群之徽记纹章与领域之防御设施安营扎寨。抵制认同不限于传统价值。他们在积极赞成型的社会运动中被打造，只要他们力量不够对其对立的压迫性制度发动攻击，他们则以社区共同体抵抗建立其自立性。大体而言，这是妇女运动的情境，营造妇女之空间，此处一种新的反父权意识升起；它肯定也是性解放运动的情境，它们的自由空间，由酒吧至邻里，是自我认识的基本设计设置。即使环境运动，它极端的视域是宇宙哲学的，经常不只是由后院与社区发动而及于世界四处，在从事时间征服之前先保护空间。

因此，网络社会的抵制认同，像从前曾经构成工业时代公民社会的合法性认同瓦解时产生的个人主义方案一样，到处可见。然而，这些认同相互抵制，它们很少沟通。除了为了他们特殊的利益/价值而抗争与谈判之外，他们不与国家沟通。他们很少彼此沟通，因为他们围绕着尖锐不同的原则营造，界定“内”与“外”。因为社区逻辑是他们生存的关键所在，个人自我定义是不受欢迎的。这是为何在大部分例子中，栖息于流动空间中的支配



性的、全球精英的倾向是认同较少的个人，而大部分的人则抵制其在经济、文化与政治上被褫夺公权状态，而为社群认同所吸引。

我们应该加上网络社会动力的另一层次。连同国家机器、全球网络及自我中心的个人，还有围绕着抵制认同而形成的社区，然而，所有的这些元素并未粘合在一起，它们的逻辑彼此互相排斥，它们不可能和平共处。

然后，主要的课题变成计划认同（project-identity）的浮现（见第一章），能有潜力重构一种新的公民社会，以及，明显地，一种新的国家。在这个主题上，我不会预先规定或是预言，但是，我倒不如详细说明我对社会运动与政治过程观察之暂时结果。所以，此处之分析并不妨碍与此处考量有所不同的社会运动，将不会在建构未来社会中扮演主要的角色。但是，在1996年，在我承认是不完全的以及可能是错误的对世界的扫描中，并没有侦测到它们的信号。

详细说明我所见，以及某个程度在本卷所传达给读者的是，新的计划认同似乎并未自先前的工业时代之公民社会的认同中浮现，而是来自当前抵制认同之发展。我相信，有理论的理由，如同经验的论证，支持这样一个新的历史主体形构的轨道（trajectoty）。但在针对此主题提出某些观点之前，让我澄清计划认同如何由我们已观察到的抵制认同浮现。

一个初步的评论是，事实上，以抵制认同而建立的社区并非意味着就可能开展营造一种计划的认同。它可能是一个维持得很好的防卫性社区。要不然，它可能变成一个利益团体，参加个人化计划的逻辑以及无显著特点的协议，实际上是网络社会的支配逻辑。然而，在其他的情形下，抵制认同产生计划认同，以社会整体之转化为目标，延伸产生在抵抗社区之内的利益与价值以对抗资本、权力与信息全球流动所设定的支配利益。

宗教的社区可能发展出宗教的基本教义派运动，以社会的伦理重建，重建神的永恒价值，以及拥抱全世界，或者至少邻近地区，以信徒的社区共同体，建立新的社会。

按照最近经验之观察，信息时代民族主义的轨道是更被破坏了。一方面，它导致民族国家的重构，代表民族（nation）而重新正当化，而不是国家（state）；另一方面，它替代了现代民族国家，由肯定民族胜于国家，以及在分享主权的不同几何形势下营造政治制度之多重网络。

族群性，既作为压迫又作为解放的基本要素，似乎经常塑造为支持其他社区认同（宗教的、民族的、领域的），而并非导致要么是抵制要么是族群本身的新计划。

领域的认同是地方与区域政府世界性浪潮之根源。地方与区域政府在代表制与干预制两方面都对全球流动无穷变化的调适能力方面，扮演更有意义、更重要的角色。当它关系着现代起源的贸易的国际经济时，城市国家（city - state）的再发明是这个全球化新时代之显著特性。

妇女社区，以及性认同自由的空间，由减弱家长式父权主义投射其自身于全体的社会，以及经由在一种新的平等主义基础上重建家庭，意味着社会制度的无性别化，对抗父权资本主义与父权国家。

环境主义者由防卫某人的环境、健康及人类，转移在宇宙自我架构下物种的社会生态学认同之基础上，整合人类与自然的生态计划。

这些认同性计划（identity - projects）由社群抵制中浮现而非来自公民社会制度之重建，因为这些制度的危机，以及抵制认同的浮现，精确地源于网络社会新的特征，它减弱了公民社会之制度，以及诱发了网络社会。即全球化、资本主义重构、组织的网络、真实虚拟的文化，信息时代社会结构的主要特色，正是工业时代中建构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危机的根源。它们也是社区抵抗



组织起来的力量，围绕这些抵抗，浮现新的认同计划。经由参加保卫性的与攻击性的抗争，抵抗与计划反对网络社会支配性逻辑，这些抗争围绕三个新社会结构之基本领域：空间、时间与技术。

抵抗的社区防守它们的空间、它们的区域，对抗信息时代中表现社会支配特性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的无地方性逻辑（第一卷第六章）。他们要求保留其历史记忆，以及/或肯定他们的价值永久不变，在永恒的时间中对抗历史的分解，庆祝真实虚拟文化中的短暂寿命（第一卷第七章）。他们用信息技术使人们之间能水平沟通，为社区祝祷者服务；同时拒绝对技术的偶像崇拜，保存超越物质世界之价值以对抗自动调节的计算机网络解构逻辑。

生态主义者代表人民与自然，声言对空间使用的控制，反对流动空间的非自然与抽象逻辑。他们将冰河时间的宇宙观向前推进，将人类物种整合进其进化的环境中，用非时序性的、孕育于永恒时间中的逻辑对抗时间的绝灭（见第一卷第七章）。以及他们反对为了生活使用科学与技术、却造成生活有被科学与技术支配的危险。

女性主义与性认同运动，确信对其最直接的空间与身体的控制要胜过对于流动空间中的肉体脱离，受父权主义的影响，重建女性形象及性崇拜，分解了其人性，也拒绝了其认同。她们也为争取对其时间之掌控而战，因为网络社会无时间性之逻辑堆起角色与功能未能调适女人对新时间的新生活；因此异化了的时间变成在未解放的社会组织中，作为已解放了的妇女家庭杂务最具体的表现。女人与性认同运动也以利用技术强化其权力为目标（例如，她们的再生产权利与控制其身体的权利），对抗科学与技术的父权化，如在妇女服从武断的医学仪式与偏见中，或者是在对抗艾滋病时，只要艾滋病仍被认为是一种同性恋的疾病，科学机构往往是缺乏意愿的。当人类到达物种的生物再生产之社会控

制的技术边境时刻，在自主认同之身体与社会造物之身体之间，有一场根本的战斗。这就是为什么认同的政治由我们的身体开始的缘由。

因此，网络社会的支配逻辑，在每个特殊的制度与文化的脉络所造成的条件之下与经历的过程之中，以社区抵制认同之形式，以及，有潜力由这些空间浮现的计划性认同的形式，引发了它自身的挑战。产生矛盾的动力在历史过程的核心，一个新的社会结构，我们社会的血与肉，正被建构着。在这个社会结构中权力何在？在这些历史条件下，权力是什么？

权力，如我们所讨论的，在本书之上一卷与这一卷中所显示的，某个程度上不再集中于制度（国家）、组织（资本主义公司）或象征的控制者（法人媒体、教会）。它扩散在财富、权威、信息与意象的全球网络中，在不同的几何形势与非物质化的地理系统中传输与变形。然而，它却未消失。权力仍旧统治社会，仍旧塑造以及支配我们，因为不同类型的机构仍然能够驯训身体以及使心灵沉默。权力的形式是永恒的，同时它也在消退。它是永恒，因为人类是掠夺者，并且总是掠夺者。但是以它现今存在的形式而言，权力的确是在消退之中。因为权力的施展，对权力所要服务的利益而言是已经越来越失效了。国家能够开火，但是因为它们的敌人之形貌以及挑战者之行迹越来越模糊，国家往往展开随机的扫射，这使得有可能在开火过程中打到自己。

新的权力在于信息的符码（codes of information）与再现的意象（images of representation），社会据此组织其制度，人们据此营造其生活并决定其行为。这个权力的基地是人们的心灵。这就是为什么信息时代的权力是可认明的，同时又是扩散的原因所在。我们知道它是什么，然而我们却不能捉住它，因为权力是围绕社会的文化符码无止尽战斗的功能。不管是谁，或不管怎样，赢得了人们心灵的战斗才能统治，因为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对



弹性的另类网络的权力所动员的心灵而言，巨大的、严格固定的机器将不是对手。但是胜利可能是短暂的，因为信息流动的狂热骚乱会使符码在漩涡中打转。这就是为什么认同是如此的重要与根本，在这个永远变迁的权力结构中是如此的有力量的原因。因为它们围绕经验营造利益、价值和计划，以及拒绝经由自然、历史、地理与文化间建立特殊的连结而分解。因此，认同在社会结构的某些地方扣牢权力使人觉得稳定，以及认同由此营造，在信息抗争中，它们抵抗或者攻击关于建造行为的文化符码，以及因此建造新的制度。

在这些条件下，谁是信息时代的主体？我们已经知道，或者至少我暗示我们知道，什么是它们可能浮现的来源。我也愿意加上，我认为我们知道它们不可能由何处发展。例如，劳工运动似乎历史地被替代了。它们并未完全消失（虽然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减少了），或是失去了关联。事实上，工会在许多国家是有影响力的政治行动者。以及在许多的例子中，它们是主要的、或是工人保卫他们自己对抗来自资本与国家的虐待时的仅有的工具。然而我在本书之两卷中已经试着传达，因为结构性的来源与历史性的过程，在信息时代中，劳工运动似乎并未能适于独自靠它自己以及由它自己创造计划认同，而得以重构社会控制以及重建社会制度。劳工的强悍态度无疑是新的、转化性的社会动力之一部分，而我却不确定工会想要什么。

政党作为社会变迁的自主性作用者之潜力也已经耗竭，为信息政治的逻辑所羁绊，以及考量其主要目标，民族国家的制度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确当性。然而，以社会运动作先锋，进入国家的、国际的与跨国的领域，政党仍然是社会需求以特种方法处置中的必要工具。实际上，当社会运动必须提供在此机会重思与重建下的新符码，经由征服人们的心灵，某种政党（可能在新的信息化身之下）仍然是社会转化制度化中的关键作用者。他们是有影响的掮客而非有力量的创新者。

因此，社会运动经由社区抵制而浮现，抵制全球化、资本主义重建，组织网络化，不受抑制的信息主义，以及父权主义等，即，生态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宗教的基本教义派、民族主义者及地域主义者，目前都是信息时代有潜力的主题。什么是他们的表现？我这里的分析必然是更思辩性的，虽然我觉得不得不提出一些假说，尽可能立足于本卷的观察报告之上。

为认同计划发言的作用者以改变文化符码为目标，必定是象征的动员者。他们应该对真实虚拟的文化产生影响，在网络社会中设定沟通，代表另类价值而颠覆文化，引介由自主性的认同计划中浮现的符码。我已经观察到两种主要的潜在的作用者，第一种，我称它为预言家（Prophets）。他们是象征人物，他们的角色并非是具有能引起大众狂热拥护而有非凡领导气质的领袖，亦非精明干练的策略家，而是给予象征性叛乱面目（或面具）的人，以致他们代表叛乱而发言。因此，无声的叛乱有了声音，他们的认同可以进入象征抗争的领域，而对可以夺权的机会——在人们心中。当然，这是沙伯康曼丹特·马克士（Subcomandante Marcos），墨西哥的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军领袖的情况；以及，也是在拉巴斯（La paz）—艾尔阿托（El Alto）的竞技场同伴（Compadre Palenque）的情况；或者是，麻原（Asahara），杀人的日本宗教教主；或者是，强调圣经表现多元化潜力，加泰隆尼亚（Catalan）民族主义领袖乔迪·普约（Jordi Pujol）的情况，他的温和、理性与策略性机智，经常隐藏了他有耐心的决心，将加泰隆尼亚（Catalunya）在其他欧洲民族中间，作为一个民族而嵌入，代表其利益发言，以及为加泰隆尼亚（Catalunya）重建一种卡罗林津（Carolingian）之认同。它或许是新的、原创性的、无国家旗帜的、信息化欧洲的民族主义标签之声音。要不然，流行摇滚歌手所再现的生态意识，像在拯救亚马逊河流的活动的史汀（Sting），或者是（历史的极度嘲讽）代表动物权的碧姬巴杜布





里吉特·巴多 (Brigitte Bardot)<sup>①</sup>或者, 美国的新强烈反对机械化或自动化的大学炸弹客 (Unabomber), 将无政府主义传统联系上以暴力防御本质来对抗技术恶魔。或者, 在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运动中, 许多宗教领袖 (我不点名) 诠释圣经, 在将到达、接触的希望中, 在准备要做信徒的心灵与灵魂中, 重述神的真理。人权运动也经常有赖于象征性的、不妥协人格的作用者, 像沙卡诺夫 (Sakharov) 历史地所代表的, 以及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为塞杰·柯瓦诺夫 (Sergei Kovalov) 所放大的俄国异议分子传统。我慎重地选择例子, 混合类型, 按个人的喜好, 包括我自己的, 说明他们是“好的”与“坏的”预言家。但是, 他们都是预言家的意思是, 他们宣示道路, 断言价值, 如同象征的使者, 他们本身变成象征, 以致信息与信使不分。历史之过渡, 经常作用在制度崩溃与政治形式的耗竭之中, 也总是预言家施展作用的时刻。而在向信息时代的过渡中, 应更是如此, 这就是一个围绕着信息流动 (information flows) 与象征操弄 (symbol manipulation) 而组织的社会结构。

不管怎么说, 在我们穿越社会运动栖息地的旅程之中, 另一主要的力量被发现了, 那就是, **网络化、组织与干预离心形式、新社会运动的特性**, 反射和对抗信息化社会中网络化的支配逻辑。在环境主义运动中, 这情形很清楚, 以离心化的活动围绕国家与国际网络而营造。但是我曾说明这也是妇女运动中间的情形, 冲击全球秩序以及宗教的基本教义运动。这些网络确实超过了组织活动与分享信息。他们实际上是文化符码的生产者与分配者。不仅仅在网络之上, 而且是在他们交换与互动的多重形式之

---

① 可参考: Peter Singer, (1990). *Animal Liberation*, 孟祥森、钱永祥译, (1996), 《动物解放》, 台北开怀生命协会, 第 26 ~ 33 页。彼得·辛格在 1990 年新版序中对动物解放运动的“暴力”与“正义”议题的讨论。——译注

中。他们的社会影响很少来自协调一致的策略，为中心所运筹帷幄。他们最成功的活动，他们最引人注意的主动性，经常来自多层沟通的互动网络中的“狂烈骚乱”。如同以普同的论坛，将保存自然的经验与残存的资本主义一同融化在“绿色文化”之生产中。或是来自女性团体、女性杂志、女性书店、女性电影、女性诊所以及支持培育小孩的女人网络之间女性经验之交换所造成的父权主义终结。这个社会变迁网络的离心化的微妙特性，造成觉察和辨明新的认同计划进入上的困难。因为我们的历史视野已经变得如此习惯于有秩序的战线、富有色彩的旗帜，以及有脚本的宣言来看待社会变迁。当我们面对远离权力的衙门，经由网络的多重形式处理的象征之零星变迁的微妙渗透，我们迷惑了。它在这些社会的后巷之中，在另类的电子网络之中，或是在社区抵抗的基层网络之中，在这里我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新社会的萌芽，而认同的力量，正在历史的领域中起作用。



## 参考文献

- Abelove, Henry, Barale, Michele Aina and Halperin, David M. (eds) (1993)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 Abramson, Jeffrey B., Artertone, F. Christopher and Orren, Cary R. (1988) *The Electronic Commonwealth: The Impact of New Media Technologies in Democratic Polit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 Adler, Margot (1979) *Drawing Down the Moon: Witches, Druids, Goddess-worshippers, and Other Pagans in America Today*, Boston: Beacon.
- Aguirre, Pedro et al. (1995) *Una reforma electoral para la democracia. Argumentos para el consenso*, Mexico: Instituto de Estudios para la transición democrática.
- Akhmatova, Anna (1985) *Selected Poems*, trans. D. M. Thomas, London: Penguin.
- Al-Azmeh, Aziz (1993) *Islams and Modernities*, London: Verso.
- Alberdi, Ines (ed.) (1995) *Informe sobre la situación de la familia en España*, Madrid: Ministerio de Asuntos Sociales.
- Albo, Xavier (1993) *Y de Kataristas a MNRistas? La sorprendente y audaz alianza entre Aymaras y neoliberales en Bolivia*, La Paz: CEDOIN-UNITAS.
- Alexander, Herbert E. (1992) *Financing Politics. Money,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Reform*, Washington, DC: CQ Press.
- Allen, Thomas B. (1987) *Guardian of the Wild. The Story of the 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 1936-1986*,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 Alley, Kelly D. et al. (1995)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a grass-roots environmental group", *Human Organization*, 54 (4): 410-16.
- Alonso Zaldivar, Carlos (1996) *Variaciones sobre un mundo en cambio*.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 and Castells, Manuel (1992) *España fin de siglo*,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 Ammerman, Nancy (1987) *Bible Believers: Fundamentalist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read in the 2nd edn, 1991).
- Anderson, P. and Comiller, P. (eds) (1994) *Mapping the West European Left*, London: Verso.
- Ansolabehere, Stephen and Iyengar, Shanto (1994) "Riding the wave and claiming ownership over issues: the joint effects of advertising and news coverage in campaign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8: 335–57.
- et al. (1993) *The Media Game: 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Television Age*, New York: Macmillan.
- Anthes, Gary H. (1993) "Government ties to Internet expand citizens' access to data", *Computerworld*, 27, (34): 77.
- Anti-Defamation League (1994) *Armed and Dangerous*, New York: Anti-Defamation League of B'nai B'rith.
- Anti-Defamation League (1995) *Special Report: Paranoia as Patriotism: Far-Right Influence on the Militia Movement*, New York: Anti-Defamation League of B'nai B'rith.
- Aoyama, Yoshinobu (1991) *Riso Shakai: kyosanto sengen kara shinri'e (The Ideal Society: from Communist Manifesto to Truth)*, Tokyo: AUM Press.
- Appiah, Kwame Anthony and Gates, Henry Louis, Jr (eds) (1995) *Identit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rchondo, Rafael (1991) *Compadres al microfono: la resurreccion metropolitana del ayllu*, La Paz: Hisbol.
- Ardaya, Gloria and Verdesoto, Luis (1994) *Racionalidades democraticas en construccion*, La Paz: ILDIS.
- Arlachi, Pino (1995) "The Mafia, Cosa Nostra, and Italian institutions", in Sechi (ed.): 153–63.
- Armond, Paul (1995) "Militia of Montana meeting at the Maltby Community Center", *World Wide Web*, MOM site, February 11.
- Armstrong, David (1995) "Cyberhoax!",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 Arquilla, John and Rondfeldt, David (1993) "Cyberwar is coming!", *Comparative Strategy*, 12 (2): 141–65.
- Arrieta, Carlos G. et al. (1991) *Narcotrafico en Colombia. Dimensiones politicas, economicas, juridicas e internacionales*, Bogota: Tercer Mundo Editores.
- Asahara, Shoko (1994) *Metsubo no Hi (The Doomsday)*, Tokyo: AUM Press.
- (1995) *Hi Izuru Kuni Wazawai Chikashi (Disasters Come Close to the Nation as the Rising Sun)*, Tokyo: AUM Press.
- Astrachan, Anthony (1986) *How Men Feel: Their Response to Women's*

- Demands for Equality and Power*, Garden City, NY: Anchor Press/Doubleday.
- Athanasίου, Tom (1996) *Divided Planet: The Ecology of Rich and Poor*, Boston: Little, Brown.
- Awakening* (1995) Special issue, no. 158–1961, Taipei (Chinese language).
- Axford, Barrie et al. (1992) "Image management, stunts, and dirty tricks: the marketing of political brands in television campaign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4 (4): 637–51.
- Azevedo, Milton (ed.) (1991) *Contemporary Catalonia in Spain and Europ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Gaspar de Portola Catalonian Studies Program.
- Bachr, Peter R. and Gordenker, Leon (1994) *The UN in the 1990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Badie, Bertrand (1992) *L'état importe: essai sur l'occidentalisation de l'ordre politique*, Paris: Fayard.
- Bakhash, Shaul (1990)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1979–1989", *Middle East Focus*, 12 (3): 8–12, 27.
- Balta, Paul (ed.) (1991) *Islam: Civilisations et sociétés*, Paris: Editions du Rocher.
- Balz, Dan and Brownstein, Ronald (1996) *Storming the Gates: Protest Politics and the Republican Revival*, Boston: Little, Brown.
- Barber, Benjamin R. (1993) "Letter from America, September 1993: the rise of Clinton, the fall of democrats, the scandal of the media",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8 (4): 433–43.
- Barker, Anthony (1992) *The Upturned Stone: Political Scandals in Twenty Democracies and their Investigation Process*, Colchester: University of Essex, Essex Papers in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 Barnett, Bernice McNair (1995) "Black women's collectivist movement organizations: their struggles during the 'doldrums'", in Ferree and Martin (eds), pp. 199–222.
- Barone, Michael and Ujifusa, Grant (1995) *The Almanac of American Politics 1996*, Washington: National Journal.
- Barron, Bruce and Shupe, Anson (1992) "Reasons for growing popularity of Christian reconstructionism: the determination to attain dominion", in Misztal and Shupe (eds), pp. 83–96.
- Bartholet, E. (1990) *Family Bonds, Adop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Parenting*,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 Bartz, Steve (1996)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evolv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published seminar paper for SOC 290.2, May.
- Baylis, John and Rengger, N.J. (eds) (1992) *Dilemmas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Issues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Beccalli, Bianca (1994) "The modern women's movement in Italy", *New Left Review*, 204, March/April: 86-112.
- Bellah, Robert N., Sullivan, William M., Swidler, Ann and Tipton, Steven M. (1985)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ited in the Perennial Library edition from Harper and Row, New York, 1986).
- Bellers, Jurgen (ed.) (1989) *Politische Korruption*, Munster: Lit.
- Bennett, David H. (1995) *The Party of Fear: the American Far Right from Nativism to the Militia Moveme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Bennett, William J. (1994) *The Index of Leading Cultural Indicators: Facts and Figures on the State of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Touchstone.
- Berdal, Mats R. (1993) *Whither UN Peacekeeping?: An Analysis of the Changing Military Requirements of UN Peacekeeping with Proposals for its Enhancement*, London: Brassey's f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 Berins Collier, Ruth (1992) *The Contradictory Alliance. State-Labor Relationships and Regime Changes in Mexi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 Berlet, Chips and Lyons, Matthew N. (1995) "Militia nation", *The Progressive*, June.
- Berman, Jerry and Weitzner, Daniel J. (1995) "Abundance and user control: renewing the democratic heart of the First Amendment in the age of interactive media", *Yale Law Journal*, 104, (7) 1619-37.
- Bernard, Jessie (1987) *The Female World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Berry, Sebastian (1992) "Party strategy and the media: the failure of Labour's 1991 election campaign", *Parliamentary Affairs*, 45, (4): 565-81.
- Betts, Mitch (1995) "The politicizing of cyberspace", *Computerworld*, 29 (3): 20.
- Bilbao La Vieja Diaz, Antonio, Perez de Rada, Ernesto and Asturizaga, Ramiro (1996) "CONDEPA movimiento patriótico", La Paz: Naciones Unidas/CIDES, unpublished research monograph.
- Birnbaum, Lucia Chiavola (1986) *Liberazione della donna: Feminism in Italy*,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Black, Gordon S. and Black, Benjamin D. (1994) *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Discontent: How a New Party Can Make Democracy Work Again*,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 Blakely, Edward and Goldsmith, William (1993) *Separate Societies: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American Citi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Blas Guerrero, Andres (1994) *Nacionalismos y naciones en Europa*,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 Blossfeld, Hans-Peter (ed.) (1995) *The New Role of Women: Family Formation in Modern Societi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Blum, Linda (1991) *Between Feminism and Labor: The Politics of the Comparable Worth Move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lumberg, Rae Lesser, Rakowski, Cathy A. Tinker, Irene and Monteon, Michael (eds) (1995) *EnGENDERing Wealth and Well-being*,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Blumenfeld, Seth D. (1994) "Developing the 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Law Journal*, 47(2): 193-6.
- Blumstein, Philip and Schwartz, Pepper (1983) *American Couples: Money, Work, Sex*,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Boardmann, Robert (1994) *Post-socialist World Orders: Russia, China, and the UN syste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Bobbio, Norberto (1994) *Destra e sinistra: ragioni e significati di una distinzione politica*, Roma: Donzelli editore.
- Borja, Jordi (1988) *Estado y ciudad*, Barcelona: Promociones y Publicaciones Universitarias.
- and Castells, Manuel (1996) *Local and Global: The Management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Earthscan.
- et al. (1992) *Estrategias de desarrollo e internacionalización de las ciudades europeas: las redes de ciudades*, Barcelona: Consultores Europeos Asociados, Research Report.
- Bouissou, Jean-Marie (1991) "Corruption à la Japonaise", *L'Histoire*, 142, March: 84-7.
- Bramwell, Anna (1989) *Ecology in the 20th Century: A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4) *The Fading of the Greens: The Decline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We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renner, Daniel (1994) "In search of the multimedia grail", *Federal Communications Law Journal*, 47 (2), pp: 197-203.
- Broadcasting & Cable* (1995) "Top of the week", May.
- Brown, Helen (1992) *Women Organising*, London: Routledge.
- Brown, Michael (1993) "Earth worship or black magic?", *The Amicus Journal*, 14 (4): 32-4.
- Brubaker, Timothy H. (ed.) (1993) *Family Relations: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 Bruce, Judith, Lloyd, Cynthia B. and Leonard, Ann (1995) *Families in Focus: New Perspectives of Mothers, Fathers, and Children*, New York: Population Council
- Brulle, Robert J. (1996)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and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a historical and rhe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 of US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Sociological Inquiry*, 66 (1): 58-83.
- Buci-Glucksmann, Christine (1978) *Gramsci et l'état*, Paris: Grasset.



- Buckler, Steve (1993) *Dirty Hands: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Morality*, Brookfield: Averbury.
- Buckley, Peter (ed.) (1994) *Cooperative Form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Activ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Buechler, Steven M. (1990) *Women'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Bull, Hedley (1977) *The Anarchical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 Burgat, Francois and Dowell, William (1993) *The Islamic Movement in North Africa*, Austin,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 Burnham, David (1983) *The Rise of the Computer State*, New York: Vintage.
- Business Week* (1995a) "The future of money", June 12.
- Business Week* (1995b) "Hot money", March 20.
- Business Week* (1995c), "Mexico: Salinas is fast becoming a dirty word", December 25: 54-5.
- Business Week* (1995d) "The new populism", March.
- Business Week* (1995e) "Power to the states", August: 49-56.
- Buss, David M. (1994) *The Evolution of Desire: Strategies of Human Ma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 Butler, Judith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 Cabre, Anna (1990) "Es compatible la proteccion de la familia con la liberacion de la mujer?", in Instituto de la Mujer (ed.), *Mujer y Demografia*, Madrid: Ministerio de Asuntos Sociales.
- and Domingo, Antonio (1992) "La Europa despues de Maastrich: reflexiones desde la demografia", *Revista de Economia*, 13: 63-9.
- Cacho, Jesus (1994) *MC: un intruso en el laberinto de los elegidos*, Madrid: Temas de hoy.
- Caipora Women's Group (1993) *Women in Brazil*, London: Latin American Bureau.
- Calabrese, Andrew and Borchert, Mark (1996) "Prospects for electronic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polic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8: 249-68.
- Calderon, Fernando (1995) *Movimientos sociales y politica*, Mexico: Siglo XXI.
- and Laserna, Roberto (1994) *Paradojas de la modernidad*, La Paz: Fundacion Milenio.
- et al. (1996) *Esa esquiva modernidad: desarrollo, ciudadania y cultura en America Latina y el Caribe*, Caracas: Nueva Sociedad/UNESCO.
- Calhoun, Craig (ed.) (1994)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 Camilleri, J.A. and Falk, K. (1992) *The End of Sovereignty*,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Campbell, B. (1992) "Feminist politics after Thatcher." In H. Hinds, et al. (eds) *Working Out: New Directions for Women's Studies*,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3–17.
- Campbell, Colin and Rockman, Bert A. (eds) (1995) *The Clinton Presidency: First Appraisals*,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 Campo Vidal, Manuel (1996) *La transición audiovisual*, Barcelona: B Ediciones.
- Cardoso de Leite, Ruth (1983) "Movimientos sociales urbanos: balanço crítico." In *Sociedade e política no Brasil pós-64*, São Paulo: Brasiliense.
- Carnoy, Martin (1984)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3) "Multinationals in a changing world economy: whither the nation-state?", in Carnoy et al. (eds), pp. 45–96.
- (1994) *Faded Dreams: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Race 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Castells, Manuel, Cohen, Stephen S. and Cardoso, Fernando H. (1993) *The New Global Econom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University Park, P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Carre, Olivier (1984) *Mystique et politique: Lecture révolutionnaire du Coran by Sayyed Qutb*, Paris: Editions du Cerf-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 Carrere d'Encausse, Helene (1987) *Le grand défi: Bolcheviks et nations, 1917–1930*, Paris: Flammarion.
- (1993) *The End of the Soviet Empire: The Triumph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original French edition 1991).
- Castells, Manuel (1981) "Local government, urban crisi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A Research Annual*, Greenwich, CT: JAI Press, 2, pp. 1–20.
-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d London: Edward Arnold.
- (1992a) "Four Asian tigers with a dragon hea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in Appelbaum, Richard, and Henderson, Jeffrey (eds) *Stat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33–70.
- (1992b) *La nueva revolución rusa*, Madrid: Sistema.
- (1992c) "Las redes sociales del SIDA." Keynote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Social Sciences Symposium, World Congress on AIDS research, Madrid, May 1992.
- (1996) "El futuro del estado del bienestar en la sociedad informacional", *Sistema*, 131, March: 35–53.
- and Murphy, Karen (1982) "Cultural identity and urban structure: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San Francisco's gay community", in

- Fainstein, Norman I., and Fainstein, Susan S. (eds) *Urban Policy Under Capitalism*, Urban Affairs Annual Reviews, vol. 22,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237–60.
- , Yazawa, Shujiro and Kiselyova, Emma (1996) "Insurgents against the global orde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Zapatistas in Mexico, the American Militia and Japan's Aum Shinrikyo",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40: 21–60.
- Castells, Nuria (forthcoming)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Economics Department,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 Chatterjee, Partha (1993)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esnais, François (1994) *La mondialisation du capital*, Paris: Syros.
- Cheung, Peter T.Y. (1994) "Rela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Guangdong", in Y.M. Yeung and David K.Y. Chu (eds), *Guandong: Survey of a Province Undergoing Rapid Chang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p. 19–51.
- Cho, Lee-Jay and Yada, Moto (eds) (1994)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the Asian Famil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Chodorow, Nancy (1978)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9)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tical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4) *Feminities, Masculinities, Sexualities: Freud and Beyond*,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Chong, Rachele (1994) "Trends in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musings on our futur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Law Journal*, 47 (2): 213–19.
- Choueri, Youssef M. (1993) *Il fondamentalismo islamico: Origine storiche e basi sociali*, Bologna: Il Mulino.
- Coalition for Human Dignity (1995) *Against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American Militia Movement*, Portland, Oregon: Coalition for Human Dignity Publications.
- Coates, Thomas J. et al. (1988) *Changes in Sex Behavior of Gay and Bisexual Me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AIDS Epidemics*,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AIDS Prevention Studies.
- Cobble, Dorothy S. (ed.) (1993) *Women and Unions: Forging a Partnership*, New York: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Press.
- Cohen, Roger (1996) "Global forces batter politics", *The New York Times*, Sunday November 17, s. 4: 1–4.
- Cohen, Stephen (1993) "Geo-economics: lessons from America's mistakes", in Carnoy et al. (eds), pp. 97–148.

- Cohen, Jeffrey E. (1986) "The dynamics of the 'revolving door' on the FCC",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 (4).
- Coleman, Marilyn and Ganong, Lawrence H. (1993) "Families and marital disruption", in Brubaker (ed.), pp. 112–28.
- Coleman, William E. Jr and Coleman, William E., Sr (1993) *A Rhetoric of the People: the German Greens and the New Politics*, Westport, Conn.: Praeger.
- Collective Author (1996) *La seguridad humana en Bolivia: percepciones políticas, sociales y económicas de los bolivianos de hoy*, La Paz: PRON-AGOB-PNUD-ULDIS.
- Collier, George A. (1995) *Restructuring Ethnicity in Chiapas and the World*, Stanfo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Research Paper (published in Spanish in Nash et al. (eds), pp. 7–20).
- and Lowery Quaratiello, Elizabeth (1994) *Basta! Land and the Zapatista Rebellion in Chiapas*, Oakland, California: Food First Books.
- Conquest, Robert (ed.) (1967)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y in Practice*, New York: Praeger.
- Contreras Basnipeiro, Adalid (1991) "Medios múltiples, pocas voces: inventario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de masas en Bolivia", *Revista UNITAS*, pp. 61–105.
- Cook, Maria Elena et al. (eds) (1994)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Regime Change in Mexico*, La Jol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 Center of US–Mexican Studies.
- Cooke, Philip (1994) *The Cooperative Advantage of Regions*,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 Cooper, Jerry (1995) *The Militia and the National Guard in America since Colonial Times: a Research Guide*,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 Cooper, Marc (1995) "Montana's mother of all militias", *The Nation*, May 22.
- Corn, David (1995) "Playing with fire", *The Nation*, May 15.
- Costain, W. Douglas and Costain, Anne N. (1992) "The political strategies of social movements: a comparison of the women's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cy*, 19 (1): 1–27.
- Cott, Nancy (1989) "What's in a name? The limits of 'social feminism'; or, expanding the vocabulary of women's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6: 809–29.
- Couch, Carl J. (1990)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state structures",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7, (2): 111–28.
- CQ Researcher* (1992) Special Issue: "Politicians and privacy", 2 (15), April 17.

- Dalton, Russell J. (1994) *The Green Rainbow: Environmental Groups in Western Europ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and Kuechler, Manfred (1990) *Challenging the Political Order: New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Daniel, Donald and Hayes, Bradd (eds) (1995) *Beyond Traditional Peacekeeping*,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Davidson, Osha Grey (1993) *Under Fire: the NRA and the Battle for Gun Control*, New York: Henry Holt.
- Davis, John (ed.) (1991) *The Earth First! Reader*, Salt Lake City: Peregrine Smith Books.
- Dees, Morris, and Corcoran, James (1996) *Gathering Storm: America's Militia Network*, New York: Harper-Collins.
- Dekmejian, R. Hrair (1995) *Islam in Revolution: Fundamentalism in the Arab World*,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Delcroix, Catherine (1995) "Algeriennes et Egyptiennes: enjeux et sujets de sociétés en crise", in Dubet and Wiewiorka (eds), pp. 257–72.
- DeLeon, Peter (1993) *Thinking about Political Corruption*, Armonk, NY: M.E. Sharpe.
- Delphy, Christine (ed.) (1984) *Particularisme et universalisme*, Paris: Nouvelles Questions Feministes, n. 17/17/18.
- D'Emilio, John (1980/1993) "Capitalism and gay identity", in Abelove et al. (eds), pp. 467–76.
- (1983) *Sexual Politics, Sexual Communities: the Making of a Homosexual Mino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Mont, John (1991) "Frontline fighters", *Mclean's*, 104 (50): 46–7.
- Dentsu Institute for Human Studies (1994) *Media in Japan*, Tokyo: DataFlow International.
- Deutsch, Karl (1953)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Nationality* (consulted in the 1966 edi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De Vos, Susan (1995) *Household Composition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Plenum Press.
- Diamond, Irene and Orenstein, Gloria (1990) *Reweaving the World: the Emergence of Ecofeminism*,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 Diani, Mario (1995) *Green Networks: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Itali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Dickens, Peter (1990) "Science, social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Ecological movements as the recovery of human natur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Swansea, August.

- Dietz, Thomas and Kalof, Linda (1992) "Environmentalism among nation-stat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6: 353–66.
- Di Marco, Sabina (1993) "Se la televisione guarda a sinistra", *Ponte*, 49 (7): 869–78.
- (1994) "La televisione, la politica e il cavaliere", *Ponte*, 50 (2): 9–11.
- Dionne, E.J. (1996) *They Only Look Dead: Why Progressives Will Dominate the Next Political Er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Dobson, Andrew (1990) *Green Political Thought: an Introduction*, London: Unwin Hyman.
- (ed.) (1991) *The Green Reader: Essays toward a Sustainable Society*, San Francisco: Mercury House.
- Doyle, Marc (1992) *The Future of Television: a Global Overview of Programming, Advertising, Technology and Growth*, Lincolnwood, Ill.: NTC Business Books.
- Drew, Christopher (1995) "Japanese sect tried to buy US arms, technology, Senator say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1: A5.
- Dubet, François, and Wiewiorka, Michel (eds) (1995) *Penser le sujet*, Paris: Fayard.
- Duffy, Ann and Pupo, Norene (eds) (1992) *Part-time Paradox: Connecting Gender, Work and Family*, Toronto: The Canadian Publishers.
- Dulong, Rene (1978) *Les regions, l'état et la société loca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Dunaher, Kevin (ed.) (1994) *50 Years is Enough: the Case against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MF*,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Ebbinghausen, Rolf and Neckel, Sighard (eds) (1989) *Anatomie des politischen Skandals*, Frankfurt: Suhrkamp.
- Ehrenreich, Barbara (1983) *The Hearts of Men: American Dreams and the Flight from Commitment*, Garden City, NY: Anchor Press/Doubleday.
- Eisenstein, Zillah R. (1981/1993) *The Radical Future of Liberal Feminism*,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1994) *Documentos y comunicados*, Mexico: Ediciones Era (with preface by Antonio Garcia de Leon, and chronicles by Elena Poniatowska and Carlos Monsivais).
- /Subcomandante Marcos (1995) *Chiapas: del dolor a la esperanza*, Madrid: Los libros de la catarata.
- Eley, Geoff, and Suny, Ronald Grigor (eds) (1996) *Becoming National: a Rea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lliott, J.H. and de la Pena, J.F. (1978) *Memoriales y cartas del Conde Duque de Olivares*, Madrid: Alfaguara.
- Epstein, Barbara (1991) *Political Protest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Nonviolent Direct Action in the 1970s and 198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5) "Grassroots environmentalism and strategies for social change", *New Political Science*, 32: 1–24.

- Ergas, Yasmine (1985) *Nelle maglie della politica: femminismo, istituzione e politiche sociale nell'Italia degli anni settanta*, Milan: Feltrinelli.
- Espinosa, Maria and Useche, Helena (1992) *Abriendo camino: historias de mujeres*, Bogota: FUNDAC.
- Esposito, John I. (1990) *The Iranian Revolution: its Global Impact*, Miami: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Esprit* (1994) "Editorial: face à la telecratie", 5: 3–4.
- Etzioni, Amitai (1993) *The Spirit of Community: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Communitarian Agenda*, New York: Crown.
- Evans, Sara (1979) *Personal Politics: the Roots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New Left*, New York: Knopf.
- Eyerman, Ron and Jamison, Andrew (1989)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s an organizational weapon: the case of Greenpeace",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28 (1): 99–119.
- Fackler, Tim and Lin, Tse-Min (1995)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s, 1929–1992",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7 (4): 971–93.
- Faison, Seth (1996) "Chinese cruise Internet, wary of watchdog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 p. A1.
- Falk, Richard (1995) *On Humane Governance: Towards a New Global Politics*,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Fallows, James (1996) *Breaking the News: How the Media Undermine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Pantheon.
- Faludi, Susan (1991) *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on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Crown.
- Farnsworth Riche, Martha (1996) "How America is changing – the view from the Census Bureau, 1995", in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6: 382–83.
- Fassin, Didier (1996) "Exclusions, underclass, marginalidad: figures contemporaines de la pauvreté urbaine en France, aux États-Unis et en Amérique Latin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37: 37–75.
- Ferraresi, Franco and Kemeny, Pietro (1977) *Classi sociali e politica urbana*, Rome: Officina Edizioni.
- Ferrater Mora, Josep (1960) *Les formes de la vida catalana*, Barcelona: Editorial Selecta.
- Ferree, Myra Marx and Hess, Beth B. (1994) *Controversy and Coalition: the New Feminist Movement across Three Decades of Change*,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 and Martin, Patricia Yancey (eds) (1995) *Feminist Organizations: Harvest of the Women's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Ferrer i Girones, F. (1985) *La persecucio politica de la llengua catalana*, Barcelona: Edicions 62.
- Financial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Bulletin* (1995) "A lawless frontier", 12 (12): 10.

- Fischer, Claude S. (1982) *To Dwell among Friends: 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t al. (1995) *Inequality by Desig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isher, Robert and Kling, Joseph (eds) (1993) *Mobilizing the Community: Local Politics in the Era of the Global City*, Thousand Oaks, CA: Sage.
- Fitzpatrick, Mary Anne and Vangelisti, Anita L. (eds) (1995) *Explaining Family Interac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Fooner, Michael (1989) *Interpol: Issues in World Crime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New York: Plenum Press.
- Foucault, Michel (1976) *La volonté de savoir: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vol. I, Paris: Gallimard.
- (1984a) *L'usage des plaisirs: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vol. II, Paris: NRF.
- (1984b) *Le souci de soi: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vol. III, Paris: NRF.
- Frankel, J. (198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ankland, E. Gene (1995) "The rise, fall, and recovery of Die Grunen", in Richardson and Rootes (eds), pp. 23–44.
- Franklin, Bob (1994) *Packaging Politic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 Britain's Media Democracy*, London: Edward Arnold.
- Freeman, Michael (1994) "Polls set spending record", *Mediaweek*, 4(44): 6.
- Friedland, Lewis A. (1996) "Electronic democracy and the new citizenship",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8: 185–211.
- Friedrich, Carl J. (1966) "Political pathology", *Political Quarterly*, 37: 74.
- Fujita, Shoichi (1995) *AUM Shinrikyo Jiken [The Incidents of AUM Shinrikyo]*, Tokyo: Asahi-Shinbunsha.
- Funk, Nanette and Mueller, Magda (eds) (1993) *Gender Politics and Post-Communism: Reflections from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New York: Routledge.
- Fuss, Diana (1989) *Essentially Speaking: Feminism, Nature, and Dif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 Ganley, Gladys G. (1991) "Power to the people via personal electronic med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5–22.
- Gans, Herbert J. (1995) *The War against the Poor: the Underclass and Anti-poverty Policy*, New York: Basic Books.
- Garaudy, Roger (1990) *Intégrismes*, Paris: Belfont.
- Garber, Doris A. (1984) *Mass Media in American Politics*, 2nd edn, Washington DC: CQ Press.
- (1996) "The new media and politics –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9 (1): 33–6.



- Garcia Cotarelo, Ramon (1995) *La conspiracion*, Barcelona: Ediciones B.
- Garcia de Leon, Antonio (1985) *Resistencia y utopia: memorial de agravios y cronica de revueltas y profecias acaecidas en la provincia de Chiapas durante los ultimos quinientos anos de su historia*, vol 2, Mexico: Ediciones Era.
- Garcia-Ramon, Maria Dolors and Nogue-Font, Joan (1994) "Nationalism and geography in Catalonia", in Hooson (ed.), pp. 197-211.
- Garment, Suzanne (1991) *Scandal: the Culture of Mistrust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New York Times Books.
- Garramone, Gina M. et al. (1990) "Effects of negative political advertising on the political proces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34 (3): 299-311.
- Gates, Henry Louis, Jr (1996) "Parable of the talents", in Gates and West (eds), pp. 1-52.
- and West, Cornel (eds) (1996) *The Future of the Race*, New York: Alfred Knopf.
- Gelb, Joyce and Lief-Palley, Marian (eds) (1994) *Women of Japan and Korea: Continuity and Chang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Blackwell, Oxford).
- Gerami, Shahin (1996) *Women and Fundamentalism: Islam and Christianity*, New York: Garland.
- Gerbner, George, Mowlana, Hamid and Nordenstreng, Kaarle (eds) (1993) *The Global Media Debate: its Rise, Fall, and Renewal*, Norwood, Nj: Ablex.
- Giddens, Anthony (1985)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II: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l, Jorge et al. (1993) "La red de poder mexicana: el caso de Miguel Alema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ia*, 3/95: 103-20.
- Ginsborg, Paul (ed.) (1994) *Stato dell'Italia*, Milano: Il Saggiatore.
- Giroux, Henry A. (1996) *Fugitive Cultures: Race, Violence and Youth*, New York: Routledge.
- Gitlin, Todd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leason, Nancy (1995) "Freenets: cities open the electronic door", *Government Finance Review*, 11 (4): 54-5.
- Godard, Francis (ed.) (1996) *Villes*, Special issue of *Le Courrier du CNRS*, Pari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 Gohn, Maria da Gloria (1991) *Movimentos sociais e luta pela moradia*, Sao Paulo: Edicoes Loyola.
- Golden, Tim (1995) "A cocaine trail in Mexico points to official corruption", *New York Times*, April 19, pp. 1, 8.
- Goldsmith, M. (1993) "The Europeanis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Urban Studies*, 30: 683-99.
- Gole, Nilufer (1995) "L'emergence du sujet islamique", in Dubet and Wiewiorka (eds), pp. 221-34.
- Gonsioreck, J.C. and Weinrich, J.D. (1991) *Homosexuality: Research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Newbury Park, CA: Sage.
- Goode, William J. (1993) *World Changes in Divorce Patter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Gottlieb, Robert (1993) *Forcing the Sp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 Graf, James E. (1995) "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first principles", *Telecommunications*, 29 (1): 72-3.
- Graham, Stephen (1995) "From urban competition to urban collabo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urban telematic network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13: 503-24.
- Granberg, A. (1993)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commodity markets in the USSR: trends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72: 1.
- and Spehl, H. (1989) *Regionale Wirtschaftspolitik in der UdSSR und der BRD*, Report to the Fourth Soviet-West German Seminar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Kiev, 1-10 October 1989.
- Greenberg, Stanley B. (1995) *Middle Class Dreams: The Politics of Power of the New American Majority*, New York: Times Books.
- Gremion, Pierre (1976) *Le pouvoir peripherique*, Paris: Seuil.
- Grier, Peter (1995) "Preparing for the 21st century information war", *Government Executive*, 28 (8): 130-2.
- Griffin, Gabriele (ed.) (1995) *Feminist Activism in the 1990s*, London: Francis and Taylor.
- et al. (eds) (1994) *Stirring It: Challenges for Feminism*, London: Francis and Taylor.
- Grosz, Elizabeth (1995) *Space, Time, and Perversion*, London: Routledge.
- Grubbe, Peter (1993) *Selbstbedienungsladen: vom Verfall der Demokratischen Moral*, Wuppertal: Hammer.
- Guehenno, Jean Marie (1993) *La fin de la democratie*, Paris:

- Flammarion. Read in the Spanish translation, Barcelona: Paidós, 1995 (quotations are my own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 Gumbel, Andrew (1994) "French deception",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7, 328: 24.
- Gunlicks Arthur B. (ed.) (1993) *Campaign and Party Finance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Habermas, Jurgen (1973)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 Hacker, Kenneth L. (1996) "Missing links and the evolution of electronic democratizatio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8: 213–323.
- Hadden, Jeffrey and Shupe, Hanson (1989) *Fundamentalism and Secularization Reconsidered*, New York: Paragon House.
- Hage, Jerald, and Powers, Charles (1992) *Postindustrial Lives: Roles and Relationships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Sage.
- Halperin, David M., Winkler, John J. and Zeitlin, Froma I. (eds) (1990) *Before Sexu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Erotic Experienc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lperin Donghi, Tulio (1969) *Historia contemporanea de America Latina*,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 Handelman, Stephen (1995) *Comrade Criminal: Russia's New Mafiy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ay, Colin (1994)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state legitimacy",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 83–98.
- Heard, Alex (1995) "The road to Oklahoma City", *The New Republic*, May 15.
- Heidenheimer, Arnold J., Johnston, Michael and Levine, Victor T. (eds) (1989) *Political Corruption: a Handbook*,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Held, David (1991) "Democracy,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global system", *Economy and Society*, 20 (2): 138–72.
- (ed.) (1993)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eller, Karen S. (1992) "Silence equals death: discourses on AIDS and identity in the gay press, 1981–1986",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Helvarg, David (1995) "The anti-enviro connection", *The Nation*, May 22.
- Hempel, Lamont C. (1996)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Global Challenge*,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 Herek, Gregory M. and Greene, Beverly (eds) (1995) *HIV, Identity and Community: the HIV Epidemic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Hernandez Navarro, Luis (1995) *Chiapas: la guerra y la paz*, Mexico: ADN Editores.
- Hester, Marianne, Kelly, Liz and Radford, Jill (1995) *Women, Violence, and Male Power: Feminist Activism, Research and Practice*,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Hicks, L. Edward (1994) *Sometimes in the Wrong, but Never in Doubt: George S. Benson and the Education of the New Religious Right*,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 High Level Experts Group (1996)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n Europe*, Report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 Himmelfarb, Gertrude (1995) *The De-moralization of Society: from Victorian Virtues to Modern Values*, New York: Alfred Knopf.
- Hirkett, Mervyn (1992) *Some to Mecca Turn to Pray. Islamic Values in the Modern World*, St Albans: Claridge Press.
- Hiro, Dilip (1989) *Holy Wars: The Rise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 Hirst, Paul and Thompson, Grahame (1996)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obsbawm, Eric J.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2) *Naciones y nacionalismo desde 1780*, Barcelona: Critica (expanded and updated version of original 1990 English publication).
- (1994)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Hochschild, Jennifer L. (1995) *Facing up to the American Dream: Race, Class, and the Soul of the N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olliman, Jonathan (1990) "Environmentalism with a global scope" *Japan Quarterly*, July–September: 284–90.
- hooks, bell (1989) *Talking Back: Thinking Feminist, Thinking Black*,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1990)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1993) *Sisters of the Yaw: Black Women and Self-Recovery*,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Hooson, David (1994a) "Ex-Soviet identities and the return of geography", in Hooson (ed.), pp. 134–40.
- (ed.) (1994b)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 Horsman, M. and Marshall, A. (1994) *After the Nation Stat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 Horton, Tom (1991) "The green giant", *Rolling Stone*, September 5: 43–112.
- Hsia, Chu-joe (1996) Personal communication.
- Hsing, You-tien (1996) *Making Capitalism in China: the Taiwan Conne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ghes, James (1994) "The 'Americanization' of Russian politics:

- Russia's first television election, December 1993", *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10 (2): 125–50.
- Hulsberg, Werner (1988) *The German Greens: a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file*, London: Verso.
- Hunter, Robert (1979) *Warriors of the Rainbow: a Chronicle of the Greenpeace Movemen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Issues, candidate image and priming: the use of private polls in Kennedy's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 (3): 527–40.
- Inoguchi, Takashi (1993) "Japanese politics in transition: a theoretical review",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8 (4): 443–55.
- Irigaray, Luce (1977/1985) *Ce sexe qui n'en est pas un*, read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1985),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4/1993) *Ethique de la difference sexuelle*, read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1993),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Irving, Larry et al. (1994) "Steps towards a 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Law Journal*, 47 (2): 271–9.
- Ivins, Molly (1995) "Fertilizer of hate", *The Progressive*, June.
- Jacobs, Lawrence R. and Shapiro, Robert Y. (1995) "The rise of presidential polling: the Nixon White Hous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9: 163–95.
- Janowitz, Morris (1976) *Social Control of the Welfare Sta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aquette, Jane S. (ed.) (1994) *The Women's Movement in Latin America.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Jarrett-Macauley, Delia (ed.), (1996) *Reconstructing Womanhood, Reconstructing Feminism: Writings on Black Women*, London: Routledge.
- Jelen, Ted (ed.) (1989) *Religion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America*, New York: Praeger.
- (1991)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Religious Belief*, New York: Praeger.
- Johansen, Elaine R. (1990) *Political Corruption: Scope and Resourc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Garland.
- Johnson, Chalmers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5) *Japan: Who Governs? The Rise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New York: W.W. Norton.
- Johnston, R.J., Knight, David and Kofman, Eleanore (eds) (1988) *Nationalism, Self-determination,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London: Croom Helm.
- Jordan, June (1995) "In the land of white supremacy", *The Progressive*, June.
- Judge, David, Stokes, Gerry and Wolman, Hall (1995) *Theories of Urban Politic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Juergensmayer, Mark (1993) *The New Cold War?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Confronts the Secular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Jutglar, Antoni (1966) *Els burgesos catalans*, Barcelona: Fontanella.
- Kahn, Robert E. (1994)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37 (8): 15–19.
- Kahne, Hilda and Giele, Janet Z. (eds). (1992) *Women's Work and Women's Lives: The Continuing Struggle Worldwid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Kaid, Lynda Lee and Holtz-Bacha, Christina (eds). (1995) *Political Advertising in Western Democrac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Kaminiecki, Sheldon (ed.) (1993)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Movements, Parties, Organizations, Polic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Kanagy, Conrad L. et al. (1994) "Surging environmentalisms: changing public opinion or changing public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5 (4): 804–19.
- Katznelson, Ira (1996) *Liberalism's Crooked Circle: Letters to Adam Michnik*,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azin, Michael (1995) *The Populist Persuasion: a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 Keating, Michael (1995) *Nations against the State: the New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in Quebec, Catalonia, and Scotl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Keen, Sam (1991) *Fire in the Belly: on Being a Man*, New York: Bantam Books.
- Kelly, Petra (1994) *Thinking Green: Essays on Environmentalism, Feminism, and Nonviolence*, Berkeley: Parallax Press.
- Kepel, Gilles (1995) "Entre société et communauté: les musulmans au Royaume-Uni et au France aujourd'hui", in Dubet and Wieviorka (eds), pp. 273–88.
- Khazanov, Anatoly M. (1995) *After the USSR: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Khosrokhavar, Farhad (1995) "Le quasi-individu: de la neo-communauté à la necro-communauté", in Dubet and Wieviorka (eds), pp. 235–56.
- Khoury, Philip and Kostiner, Joseph (eds) (1990) *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im, Marlene (1993) "Comments", in Cobble (ed.), pp. 85–92.
- King, Anthony (1984) "Sex, money and power: political scandals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lchester, University of Essex, Essex Papers in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 King, Joseph P. (1989)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rrupt

- campaign practices in England", in Heidenheimer et al. (eds), pp. 233-50.
- Kiselyova, Emma and Castells, Manuel (1997) *The New Russian Federalism in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Eastern European and Slavic Studies/Center for German and European Studies, Research Paper.
- Klanwatch/Militia Task Force (KMTF) (1996) *False Patriots. The Threat from Antigovernment Extremists*, Montgomery, Alabama: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
- Klinenberg, Eric and Perrin, Andrew (1996) "Symbolic politic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1996 presidential campaign in cyberspa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Research Paper for Soc 290.2, unpublished.
- Kolodny, Annette (1984) *The Land before Her: Fantasy and Experience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s, 1630-186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Kozlov, Viktor (1988) *The Peoples of the Soviet Union*,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Kraus, K. and Knight, A. (1995) *State, Society, and the UN System: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is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 Kuppers, Gary (ed.) (1994) *Companeras: Voices from the Latin American Women's Movement*, London: Latin American Bureau.
- Kuttner, Robert (1995) "The net as free-market utopia? Think again", *Business Week*, September 4, p. 24.
- Lamberts-Bendroth, Margaret (1993) *Fundamentalism and Gender: 1875 to Presen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angguth, Gerd (1984) *The Green Factor in German Politics: from Protest Movement to Political Part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Lasch, Christopher (1980)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London: Abacus, 1980.
- Laserna, Roberto (1992) *Productores de democracia: actores sociales y procesos políticos*, Cochabamba: Centro de Estudios de la Realidad Económica y Social.
- Lash, Scott and Urry, John (1994)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London: Sage.
- Laumann, Edward O. et al. (1994)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 Sexual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venc: Revista d'Historia* (1996) Special issue: "Catalunya- Espanya", no. 200, February.
- Lavrakas, Paul J. et al. (eds) (1995) *Presidential Polls and the New Medi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Lawton, Kim A. (1989)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Religious Right?",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15: 44.
- Leal, Jesus et al. (1996) *Familia y vivienda en Espana*, Madrid: Universidad Autonoma de Madrid, Instituto de Sociologia, Research Report.
- Lechner, Frank J. (1991) "Religion, law, and global order", in Robertson and Garrett (eds), pp. 263–80.
- Lesthaeghe, R. (1995)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an interpretation", in Mason and Jensen (eds), pp. 17–62.
- Levin, Murray B. (1987) *Talk Radio and the American Dream*, Lexington, MA: Heath.
- Levine, Martin (1979) "Gay ghetto", in Martin Levine (ed.), *Gay Me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Lewis, Bernard (1988) *The Political Language of Isla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wis, Peter H. (1996a) "Judge temporarily blocks law that bars indecency on Internet",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6, pp. C1–C16.
- (1996b) "Judges turn back law to regulate Internet decency", *New York Times*, June 13, p. A1.
- Leys, Colin (1989) "What is the problem about corruption?", in Heidenheimer et al. (eds), pp. 51–66.
- L'Histoire* (1993) Special dossier "Argent, politique et corruption: 1789-1993", May, 166: 48 ff.
- Li, Zhilan (1995) "Shanghai, Guandong ruheyu zhongyang zhouxuan (How did Shanghai and Guandong negotiate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Nineties Monthly*, December, 311: 36–9.
- Lienesch, Michael (1993) *Redeeming America: P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New Christian Righ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Lipschutz, Ronnie D. and Coca, Ken (1993) "The implications of global ecological interdependence", in Ronnie D. Lipschutz and Ken Coca (eds), *The State and Social Power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ipset, Seymour M. (1996)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Norton.
- and Raab, Earl (1978) *The Politics of Unreason: Right-wing Extremism in America, 1790–1970*,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Lloyd, Gary A. and Kuselewicz J. (eds.) (1995) *HIV Disease: Lesbians, Gays, and the Social Services*, New York: Haworth Press.
- Lodato, Saverio (1994) *Quindici anni di Mafia*, Milan: Biblioteca Universale Rizzoli.
- Longman (1990) *Political Scandals and Causes Célèbres since 1945*, London: Longman's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Compendium.



- Lowi, Theodore J. (1988) "Foreword", in Markovits and Silverstein (eds), pp. vii–xii.
- Luecke, Hanna (1993) *Islamischer Fundamentalismus – Rueckfall ins Mittelalter oder Wegbereiter der Moderne?*, Berlin: Klaus Schwarz Verlag.
- Lyday, Corbin (ed.) (1994) *Ethnicity, Federalism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Russia: A Conference Report*, Report of a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the Berkeley-Stanford Program in Soviet and Post-Soviet Studies held at Berkeley on November 11–17, 1993.
- Lyon, David (1994) *The Electronic Eye: the Rise of Surveillance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MacDonald, Greg (1990) *The Emergence of Multimedia Conglomerates*, Geneva: ILO,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Program, Working Paper 70.
- McDonogh, Gary W. (ed.) (1986) *Conflict in Catalonia*,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 McGrew, Anthony G. (1992a) "Global politics in a transitional era", in McGrew et al. (eds) pp. 312–30.
- (1992b)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the dynamics of global militarization", in McGrew et al. (eds), pp. 83–117.
- Lewis, Paul G., et al. (1992) *Global Politics: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McInnes, Colin (1992) "Technology and modern warfare", in Baylis and Rengger (eds), pp. 130–58.
- and Sheffield, G.D. (eds) (1988) *Warfare in the 20th Century: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Unwin Hyman.
- McLaughlin, Andrew (1993) *Regarding Nature: Industrialism and Deep Ecolog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Macy, Joanna (1991) *World as Lover, World as Self*, Berkeley: Parallax Press.
- Magleby, David B. and Nelson, Candice J. (1990) *The Money Chase: Congressional Campaign Finance Refor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Maheu, Louis (1995) "Les mouvements sociaux: plaidoyer pour une sociologie de l'ambivalence", in Dubet and Wieviorka (eds), pp. 313–34.
- Mainichi Shinbun* (1995), May 1.
- Manes, Christopher (1990) *Green Rage: Radical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Unmaking of Civiliz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Mansbridge, Jane (1995) "What is the feminist movement?", in Ferree and Martin (eds), pp. 27–34.
- Markovits, Andrei S. and Silverstein, Mark (eds) (1988a) *The Politics of Scandal: Power and Process in Liberal Democracies*,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 and — (1988b) "Power and process in liberal democracies", in Markovits and Silverstein (eds), pp. 15–37.
- Marquez, Enrique (1995) *Por que perdio Camacho*, Mexico: Oceano.
- Marsden, George M. (1980)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the Shaping of the 20th Century Evangelicalism, 1870–192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ez Torres, Maria Elena (1994) "The Zapatista rebellion and ident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ogram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research paper (unpublished).
- (1996) "Networking global civil society: the Zapatista movement. The first informational guerrill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eminar paper for CP 229 (unpublished).
- Marty, Martin E. (1988) "Fundamentalism as a social phenomenon",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42: 15–29.
- and Appleby, Scott (eds) (1991) *Fundamentalisms Observ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snick, George, S. and Ardle, Nancy M. (1994) *Revised US Households Projections: New Methods and New Assump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 Working Papers Series.
- and Kim, Joshua M. (1995) *The Decline of Demand: Housing's Next Gener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 Working Papers Series.
- Mason, Karen O. and Jensen, An-Magritt (1995) *Gender and Famil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ss, Lawrence (1990) *Dialogues of the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Haworth Press.
- Massolo, Alejandra (1992) *Por amor y coraje: Mujeres en movimientos urbanos de la Ciudad de Mexico*, Mexico: El Colegio de Mexico.
- Mattelart, Armand (1991) *La communication-monde: histoire des idées et des strategies*, Paris: La Decouverte.
- Matthews, Nancy A. (1989) "Surmounting a legacy: the expansion of racial diversity in a local anti-rape movement", *Gender and Society*, 3: 519–33.
- Maxwell, Joe and Tapia, Andres (1995) "Guns and Bibles", *Christianity Today*, 39 (7): 34.
- Mayer, William G. (1994) "The polls – poll trends: the rise of the new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8: 124–46.
- Mayorga, Fernando (1993) *Discurso y politica en Bolivia*, La Paz, ILDIS-CERES.
- Mejia Barquera, Fernando et al. (1985) *Televisa: el quinto poder*, Mexico: Claves Latinoamericanas.

- Melchett, Peter (1995) "The fruits of passion",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April 28: 37–8.
- Melucci, Alberto (1995) "Individualisation et globalisation: au-delà de la modernité?", in Dubet and Wieviorka (eds), pp. 433–48.
- Mény, Yves (1992) *La corruption de la République*, Paris: Fayard.
- Merchant, Carolyn (1980)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Mesa, Carlos D. (1986) "Como se fabrica un presidente", in *Cuarto Intermedio*, pp. 4–23.
- Michelson, William (1985) *From Sun to Sun: Daily Obligations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in the Lives of Employed Women and their Families*, Totowa, NJ: Rowman and Allanheld.
- Mikulsky, D.V. (1992) *Ideologicheskaya kontseptsiya Islamskoi partii vozrozhdeniya (Ideological Concept of Islamic Revival Party)*, Moscow: Gorbachev-Fund.
- Minc, Alain (1993) *Le nouveau Moyen Age*, Paris: Gallimard.
- Misztal, Bronislaw and Shupe, Anson (1992a) "Making sense of the global revival of fundamentalism", in Bronislaw and Shupe (eds), pp. 3–9.
- and — (eds) (1992b)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evival of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in East and West*, Westport, Conn.: Praeger.
- Mitchell, Juliet (1966) "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40, November/December.
- Miyadai, Shinji (1995) *Owarinaki Nichijo of Ikiro (Live in Endless Everyday Life)*, Tokyo: Chikuma-Shobo.
- Moen, Matthew C.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ristian Right*,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 and Gustafson, Lowell S. (eds) (1992) *The Religious Challenge to the Stat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Mokhtari, Fariborz (ed.) (1994) *Peacemaking, Peacekeeping and Coalition Warfare: the Future of the U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 Monnier, Alain and de Guibert-Lantoine, Catherine (1993) "La conjoncture démographique: l'Europe et les pays développés d'outre-mer", *Population*, 48 (4): 1043–67.
- Moog, Sandra (1995) "To the root: the mobilization of the culture concept in the development of radical environmental though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Seminar Paper for Anthro. 250X (unpublished).
- (1996) "Electronic media and informational politics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Research Paper for Soc 290.2 (unpublished).
- Moore, David W. (1992) *The Superpollsters: How They Measure and*

-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in America*, New York: Four Walls Eight Windows.
- Moreau Deffarges, Philippe (1993) *La mondialisation: vers la fin des frontieres?*, Paris: Dunod.
- Moreno Toscano, Alejandra (1996) *Turbulencia politica: causas y razones del 94*, Mexico: Oceano.
- Morgen, Sandra (1988) "The dream of diversity, the dilemmas of difference: race and class contradictions in a feminist health clinic" in J. Sole (ed.), *Anthropology for the Nine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 Morin, Edgar and Kern, Anne B. (1993) *Terre-Patrie*, Paris: Seuil.
- Morris, Stephen D. (1991) *Corruption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Mexico*,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 Moscow Times* (1996), "Style beats substance in ad campaigns", May 30, p. 1.
- Moser, Leo (1985) *The Chinese Mosaic: the Peoples and Provinces of China*, London: Westview Press.
- Mouffe, Chantal (1995) "The end of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the radical right", *Dissent*, Fall: 488.
- Mundy, Alicia (1996) "Taking a poll on polls", *Media Week*, 6 (8): 17–20.
- Murray, Charles and Herrnstein, Richard (1994)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 Nair, Sami (1996) "La crisis argelina", in *Claves*, April: 14–17.
- Nakazawa, Shinichi et al. (1995) "AUM Jiken to wa Nandatta no ka (Was AUM an incident?)", in *Kokoku Hihyo*, June.
- Nash, June et al. (1995) *La explosion de comunidades en Chiapas*, Copenhagen: 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on Indian Affairs, Document IWGLA n. 16.
- Navarro, Vicente (1994) *The Politics of Health Policy: The US Reforms, 1980–1994*, Oxford: Blackwell.
- (1995) "Gobernabilidad, desigualdad y estado del bienestar. La situacion en Estados Unidos y su relevancia para Europa", Barcelona: Paper deliver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overnability, Inequality, and Social Policies,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 d'Estudis Socials Avancats, 23–25 November (unpublished).
- Negroponte, Nicholas (1995) *Being Digital*, New York: Alfred Knopf.
- Norman, E. Herbert (1940) *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Meiji Period*,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 Nunnenkamp, Peter et al. (1994) *Globalisation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s*, Tübingen: Kieler Studien, J.C.B. Mohr.
- OECD (1993–95) *Employment Outlook*, Paris: OECD.
- OECD (1994a) *The OECD Jobs Study*, Paris: OECD.

- OECD (1994b) *Women and Structural Change: New Perspectives*, Paris: OECD.
- OECD (1995) *Labour Force Statistics*, Paris: OECD.
- Offen, Karen (1988) "Defining feminism: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pproach", *Signs*, 14 (11): 119-57.
- Ohama, Itsuro (1995) "AUM toiu Danso (AUM as an attempt to disconnect themselves from history)", in *Seiron*, July.
- Orr, Robert M. (1995) "Home-grown terrorism plagues both the US and Japan", *Tokyo Business*, July.
- Orstrom Moller, J. (1995) *The Future European Model: Econo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Cultural Decentralization*, Westport, Conn.: Praeger.
- Osawa, Masachi (1995) "AUM wa Naze Sarin ni Hashitakka (Why did AUM use sarin)?", in *Gendai*, October.
- Ostertag, Bob (1991) "Greenpeace takes over the world", *Mother Jones*, March-April: 32-87.
- Oumlil, Ali (1992) *Islam et etat national*, Casablanca: Editions Le Fennec.
- Oversight of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 (1995) *A Meeting of a Multinational Group of Parliamentarians Involved in Oversight of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Page, Benjamin I. and Shapiro, Robert Y. (1992) *The Rational Public: Fifty Years of Trends in American's Policy Prefer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agano, Michael A. and Bowman, Ann O'M. (1995) "The state of American federalism, 1994-95", *Publius: The Journal of Federalism*, 25 (3): 1-21.
- Panarin, Alexander S. (1994) "Rossia v evrazii: geopolitisichie vyzovy i tsivilizatsionnye otvety", *Voprosy filosofii*, 12: 19-31 (read from *Russian Social Science Review: A Journal of Translations*, May-June 1996: 35-53).
- Pardo, Mary (1995) "Doing it for the kids: Mexican American community activists, border feminists?", in Ferree and Martin (eds), pp. 356-71.
- 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 (1994) *La reforma del PRI y el cambio democratico en Mexico*, Mexico: Editorial Limusa.
- Patterson, T. E. (1993) *Out of Order: How the Decline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Growing Power of the News Media Undermine the American Way of Electing Presidents*, New York: Alfred Knopf.
- Patte, Charles et al. (1995) "Winning the local vot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stituency campaign spending in Great Britain, 1983-199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 (4): 969-85.

- Perez-Argote, Alfonso (ed.) (1989) *Sociologia del nacionalismo*, Vitoria: Argitarapen Zerbitzua Euskal Herriko Unibertsitatea.
- Perez Fernandez del Castillo, German, et al. (1995) *La voz de los votos: un analisis critico de las elecciones de 1994*, Mexico: Miguel Angel Porrúa Grupo Editorial.
- Perez Iribarne, Eduardo (1993a) *La opinion publica al poder*, La Paz: Empresa Encuestas y Estudios.
- (1993b) "La television imposible", *Fe y Pueblo*, 3: 67–84.
- Perez-Tabernero, Alfonso et al. (1993) *Concentracion de la comunicacion en Europa: empresa comercial e interes publico*, Barcelona: Generalitat de Catalunya, Centre d'Investigacio de la Comunicacio.
- Phillips, Andrew (1992) "Pocketbook politics: Britain's Tories face a tough fight against Labour Party rivals in an April election", *Maclean's*, 105 (12): 22–25.
- Philo, Greg (1993) "Political advertising, popular belief and the 1992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5 (3): 407–18.
- Pi, Ramon (ed.) (1996) *Jordi Pujol: Catalunya, Espana*. Madrid: Espasa Hoy.
- Pinelli, Antonella (1995) "Women's condition, low fertility, and emerging union patterns in Europe", in Mason and Jensen (eds), pp. 82–104.
- Pipes, Richard (1954)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1917–2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iscatori, James (1986) *Islam in a World of Nation-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i-Sunyer, Oriol (1991) "Catalan politics and Spanish democracy: the matter of cultural sovereignty", in Azevedo (ed.), pp. 1–20.
- Plant, Judith (1991) "Ecofeminism", in Dobson (ed.), pp. 100–4.
- Po, Lan-chih (1996) "Feminism, identity, and women's movements: theoretical debates and a case study in Taiw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 research paper (unpublished).
- Poguntke, Thomas (1993) *Alternative Politics: the German Green Part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Pollith, Katha (1995) "Subject to debate", *The Nation*, 260 (22): 784.
- Porrit, Jonathan (1994) *Seeing Green: the Politics of Ecology Explained*, Oxford: Blackwell.
- Portes, Alejandro et al. (eds.) (1989) *The Informal Econom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Poulantzas, Nicos (1978) *L'état, le pouvoir, le socialism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Politiques.
- Prat de la Riba, Enric (1906) *La nacionalitat catalana*, Barcelona: Edicions 62, republished in 1978.
- Price, Vincent and Hsu, Mei-Ling (1992) "Public opinion about AIDS

- policies: the role of misinformation and attitudes towards homosexual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6 (1).
- Puiggené i Riera, Ariadna et al. (1991) "Official language policies in contemporary Catalonia", in Azevedo (ed.), pp. 30–49.
- Putnam, Robert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 65–78.
- Reigot, Betty Polisar and Spina, Rita K. (1996) *Beyond the Traditional Family. Voices of Diversity*,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 Rich, Adrienne (1980/1993)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in Abelove et al. (eds), pp. 227–54.
- Richardson, Dick and Rootes, Chris (eds) (1995) *The Green Challenge: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Parties i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 Riechmann, Jorge and Fernandez Buey, Francisco (1994) *Redes que dan libertad: introducción a los nuevos movimientos sociales*, Barcelona: Paidós.
- Riesebrodt, Martin (1993) *Pious Passio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oberts, Marilyn and McCombs, Maxwell (1994) "Agenda setting and political advertising: origins of the news agend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1: 249–62.
- Robertson, Roland and Garrett, William R. (eds) (1991) *Religion and Global Order*, New York: Paragon House.
- Rochester, J. Martin (1993) *Waiting for the Millennium: the UN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Rodgers, Gerry (ed.) (1994) *Workers,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Genev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Labour Studies.
- Rojas, Rosa (1995) *Chiapas: la paz violenta*, Mexico: Ediciones La Jornada.
- Rokkan, Stein and Urwin, Derek W. (eds) (1982) *The Politics of Territorial Identity*, London: Sage.
- Roman, Joel (1993) "La gauche, le pouvoir, les medias: à-propos du suicide de Pierre Berégovoy", *Esprit*, 6: 143–6.
- Rondfeldt, David (1995) "The battle for the mind of Mexico", electronically published in June 1995 at RAND Corporation home page. Available at: <http://www.eco.utexas.edu/homepages/faculty/cleaver/chiapas95/netawars>.
- Roper Center of Public Opinion and Polling (1995) "How much government, at what level?: 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American ideas", *The Public Perspective*, 6 (3).
- Rosenau, J. (1990)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 Ross, Loretta J. (1995) "Saying it with a gun", *The Progressive*, June.

- Ross, Shelley (1988) *Fall from Grace: Sex, Scandal, and Corrup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from 1702 to present*, New York: Ballantine.
- Roth, Jurgen and Frey, Marc (1992) *Die Verbrecher Holding: das vereinte Europa im Griff der Mafia*, Piper and Co. (read in the Spanish translation, Madrid: Anaya/Mario Muchnik, 1995).
- Rovira i Virgili, A. (1988) *Catalunya: Espanya*, Barcelona: Edicions de la Magrana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2).
- Rowbotham, Sheila (1974) *Hidden from History: Rediscovering Women in History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1989) *The Past is Before Us: Feminism and Action since the 1960s*, London: Pandora.
- (1992) *Women in Movement: Feminism and Social A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Rowlands, Ian H. (1992)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world politics", in Baylis and Rengger (eds), pp. 287–309.
- Rubert de Ventos, Xavier (1994) *Nacionalismos: el laberinto de la identidad*, Madrid: Espasa-Calpe.
- Rubin, Rose M. and Riney, Rose (1994) *Working Wives and Dual-earner Families*, Westport, Conn.: Praeger.
- Ruiz-Cabanas, Miguel (1993) "La campana permanente de Mexico: costos, beneficios y consecuencia", in Smith (ed.), pp. 207–20.
- Rupp, Leila J. and Taylor, Verta (1987) *Survival in the Doldrums: the American Women's Rights Movement, 1945 to the 196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bato, Larry J. (1991) *Feeding Frenzy: How Attack Journalism has Transformed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 Saboulin, Michel and Thave, Suzanne (1993) "La vie en couple mariée: un modele qui s'affaiblit", in INSE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onnées sociales*, Paris: INSEE.
- Salaff, Janet (1981) *Working Daughters of Hong Ko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8) *State and Family in Singapore: Restructuring a Developing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2) "Women, family and the state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Singapore", in Richard Appelbaum and Jeffrey Henderson (eds), *Stat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 Salmin, A. M. (1992) *SNG: Sostoyanie i perspektivy razvitiya*, Moscow: Gorbachev Fund.
- Salrach, Josep M. (1996) "Catalunya, Castella i Espanya vistes per si mateixes a l'edat mitjana", *L'Avenc*, 200: 30–7.
- Saltzman-Chafetz, Janet (1995) "Chicken or egg? A theory of relation-



- ship between feminist movements and family change", in Mason and Jensen (eds), pp. 63–81.
- Salvati, Michele (1995) "Italy's fateful choices", *New Left Review*, 213: 79–96.
- Sanchez, Magaly and Pedrazzini, Yves (1996) *Los malandros: la culture de l'urgence chez les jeunes des quartiers populaires de Caracas*, Paris: Fondation Humanisme et Developpement.
- Sanchez Jankowski, Martin (1991) *Islands in the Street: Gangs and American Urban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antoni Rugiu, Antonio (1994) "La bisciopedagogia", *Ponte*, 50 (2): 20–5.
- Saravia, Joaquin and Sandoval, Godofredo (1991) *Jach'a Uru: la esperanza de un pueblo?*, La Paz: CEP-ILDIS.
- Savigear, Peter (1992) "The United States: superpower in decline?", in Baylis and Rengger (eds), pp. 334–53.
- Scammell, Margaret and Semetko, Holli A. (1995) "Political advertising on television: the British experience", in Kaid and Holtz-Bacha (eds), pp. 19–43.
- Scanlan, J. (ed.) (1990) *Surviving the Blues: Growing up in the Thatcher Decade*, London: Virago.
- Scarce, Rik (1990) *Eco-warriors: Understanding the Radical Environmental Movement*, Chicago: Noble Press.
- Schaeffer, Francis (1982) *Time for Anger: the Myth of Neutrality*, Westchester, Ill.: Crossway Books.
- Scharf, Thomas (1994) *The German Greens: Challenging the Consensus*, Oxford: Berg.
- Scheer, Leo (1994) *La democratie virtuelle*, Paris: Flammarion.
- Scheff, Thomas (1994) "Emotions and identity: a theory of ethnic nationalism", in Calhoun (ed.), pp. 277–303.
- Schlesinger, Philip (1991) "Media, the political order and national identit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3: 297–308.
- Schneir, Miriam (ed.), (1994) *Feminism in our Time: The Essential Writings, World War II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Scott, Allen (1995) *From Silicon Valley to Hollywood: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media Industry i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s Lewis Center for Regional Policy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 13, November 1995.
- Scott, Beardsley et al. (1995) "The great European multimedia gamble", *McKinsey Quarterly*, 3: 142–61.
- Sechi, Salvatore (ed.) (1995) *Deconstructing Italy: Italy in the Nine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Research Series.
- Sengenberger, Werner and Campbell, Duncan (eds) (1994) *Creating Economic Opportunities: The Role of Labour Standards in Industrial*

- Restructuring*, Geneva: IL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Labour Studies.
- Sennett, Richard (1978)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1980) *Authority*, New York: Alfred Knopf.
- Servon, Lisa and Castells, Manuel (1996) *The Feminist City: a Plural Bluepri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 Shabecoff, Philip (1993) *A Fierce Green Fire: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Shaiken, Harley (1990) *Mexico in the Global Economy: High Technology and Work Organization in Export Industries*, La Jolla,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 Center for US-Mexican Studies.
- Shapiro, Jerrold L. et al. (eds) (1995) *Becoming a Father: Contemporary Social, Developmental, and Clin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 Sheps, Sheldon (1995) "Militia – History and Law FAQ", World Wide Web. September.
- Shimazono, Susumu (1995) *AUM Shinrikyo no Kiseki (Trajectory of AUM Shinrikyo)*, Tokyo: Iwanami-Shoten.
- Simpson, John H. (1992) "Fundamentalism in America revisited: the fading of modernity as a source of symbolic capital", in Myszal and Shupe (eds), pp. 10–27.
- Singh, Tejpal (1982) *The Soviet Federal State: Theory,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New Delhi: Sterling.
- Sisk, Timothy D. (1992) *Islam and Democracy: Religion, 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 Siune, Karen and Truetzschler, Wolfgang (eds). (1992) *Dynamics of Media Politics. Broadcast and Electronic Media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Sage.
- Sktair, Leslie (1991) *The 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 London: Harvester/Wheatsheaf.
- Slezkine, Yuri (1994) "The USSR as a communal apartment, or how a Socialist state promoted ethnic particularism", *Slavic Review*, 53 (2): 414–52.
- Smith, Anthony D. (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 (1989) "The origins of nation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2 (3): 340–67 (quoted from Eley and Suny (eds) (1996), p. 125).
- Smith, Michael P. (1991) *City, State and Marke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 Smith, Peter H. (ed.) (1993) *El combate a las drogas en America*, Me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omica.

- Sole-Tura, Jordi (1967) *Catalanisme i revolució burgesa: la síntesi de Prat de la Riba*, Barcelona: Edicions 62.
- Spalter-Roth, Roberta and Schreiber, Ronnee (1995) "Outsider issues and insider tactics: strategic tensions in the women's policy network during the 1980s", in Ferree and Martin (eds), pp. 105–27.
- Spence, Jonathan D. (1996)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New York: Norton.
- Spitz, Glenna (1988) "Women's employment and family relations: a revie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0: 595–618.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1990) *The Postcolonial Critique: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ed. Sarah Harasym), New York: Routledge.
- Spragen, William C. (1995) *Electronic Magazines: Soft News Programs on Network Television*, Westport, Conn.: Praeger.
- Spretnak, Charlene (ed.) (1982) *The Politics of Women's Spirituality: Essays on the Rise of Spiritual Power within the Women's Movement*, New York: Anchor.
- Spruyt, Hendrik (1994) *The Sovereign State and its Competito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acey, Judith (1990) *Brave New Families: Stories of Domestic Upheaval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 Staggenborg, Susan (1991) *The Pro-choice Move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allings, Barbara (1992)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n economic policy: debt, stabilization, and structural reform", in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Kaufman (eds),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djust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41–88.
- Standing, Guy (1990) "Global feminization through flexible labor", *World Development*, 17 (7): 1077–96.
- Stanley, Harold W. and Niemi, Richard G. (1992) *Vital Statistics on American Politics*, 3rd edn, Washington DC: CQ Press.
- Starovoytova, Galina (1994) "Lecture at the Center for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23 February.
- Stebelsky, Igor (1994) "National identity of Ukraine", in Hooson (ed.), pp. 233–48.
- Sterling, Claire (1994) *Thieves' World: the Threat of the New Global Network of Organized Crim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Stern, Kenneth S. (1996) *A Force upon the Plain: the American Militia Move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Hat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Stevens, Mark (1995) "Big boys will be cow boys", *The New York Times Sunday Magazine*, November 19: 72–9.
- Streeck, Wolfgang and Schmitter, Philippe C. (1991) "From national corporatism to transnational pluralism: organized interests in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Politics and Society*, 19 (2), pp. 133–63.

- Strobel, Margaret (1995)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 the Chicago Women's Liberation Union", in Ferree and Martin (eds), pp. 145-64.
- Summers, Lawrence (1995) "Ten lessons to learn", *The Economist*, December 23, pp. 46-8.
- Sun Tzu (c.505-496 BC) *On the Art of War*, trans. with critical notes by Lionel Giles, Singapore: Graham Brash, 1988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10).
- Suny, Ronald Grigor (1993)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usser, Ida (1982) *Norman Street: Poverty and Politics in an Urban Neighborho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The separation of mothers and children", in John Mollenkopf and Manuel Castells (eds), *Dual City: Restructuring New York*, New York: Russell Sage, pp. 207-24.
- (1996) "The construction of poverty and homelessness in US cities", *Annual Reviews of Anthropology*, 25: 411-35.
- (forthcoming) "The flexible woman: re-gendering labor in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 Swan, Jon (1992) "Jennifer",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31 (4): 36.
- Szasz, Andrew (1994) *EcoPopulism: Toxic Waste and the Movement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zmukler, Monica (1996) *Políticas urbanas y democracia: la ciudad de La Paz entre 1985 y 1995*, Santiago de Chile: ILADES.
- Tanaka, Martin (1995) "La participación política de los sectores populares en América Latina",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3: 41-65.
- Tarrow, Sydney (1978) *Between Center and Periphe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ello Diaz, Carlos (1995) *La rebelión de las canadas*, Mexico: Cal y Arena.
- Temas* (1995) Special issue "Prensa y poder", 5: 18-50.
- The Economist* (1994), "Feeling for the future: special survey of television", February 12.
- The Economist* (1995a)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June 17: 13-14.
- The Economist* (1995b), "The Mexican connection", December 26: pp. 39-40.
- The Economist* (1995c) "Mexico: the long haul", August 26: pp. 17-19.
- The Economist* (1996) "Satellite TV in Asia: a little local interference", February 3.
- The Gallup Poll Monthly* (1995) April, 355: 2.
- The Nation* (1995) Editorial, May 15.
- The New Republic* (1995a) "An American darkness", May 15.
- The New Republic* (1995b) "TRB from Washington", May 15.

- The New York Times* (1995) "Where cotton's king, trouble reigns", October 9: A6.
- The New York Times Sunday* (1995a) "The rich: a special issue", November 19.
- The New York Times Sunday* (1995b) "The unending search for demons in the American imagination", July 23: 7.
- The Progressive* (1995) "The far right is upon us", June.
- The World Almanac of Books and Facts, 1996* (1996) New York: Funk and Wagnalls Corporation, World Almanac Books.
- Thompson, Dennis F. (1995) *Ethics in Congress: from Individual to Institutional Corruption*,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Thurman, Joseph E. and Trah, Gabriele (1990) "Part-time work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29 (1): 23–40.
- Thurow, Lester (1992) *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between Japa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orrow.
- Tibi, Bassam (1988) *The Crisis of Modern Islam: a Pre-industrial Culture in the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Age*, Salt Lake City: Utah University Press.
- (1992a) *Die fundamentalistische Herausforderung: der Islam und die Weltpolitik*, Munich: Beck Press.
- (1992b)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and Ethnicity in the Crisis of the Nation-state in the Middle-East: Superordinate Islamic and Pan-Arabic Identities and Subordinate Ethnic and Sectarian Ident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German and European Studies, Working Paper.
- Tilly, Charles (ed.) (1975) *The Formation of Nation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95) "State-incited violence, 1900–1999",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9: 161–79.
- Time* (1995) "Hell raiser: a Huey Long for the 90s: Pat Buchanan wields the most lethal weapon in Campaign 96: scapegoat politics", November 6.
- Tirado, Ricardo and Luna, Matilde (1995) "El Consejo Coordinador Empresarial de Mexico: de la unidad contra el reformismo a la unidad para el Tratado de Libre Comercio (1975–1993)",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4: 27–60.
- Toner, Robin (1996) "Coming home from the revolution", *The New York Times*, Sunday November 10, s. 4: 1.
- Tonry, Michael (1995) *Malign Neglect: Race,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ouraine, Alain (1965) *Sociologie de l'action*, Paris: Seuil.
- (1966) *La conscience ouvrière*, Paris: Seuil.
- (1988) *La parole et le sang: politique et société en Amérique Latine*, Paris: Odile Jacob.

- (1992) *Critique de la modernité*, Paris: Fayard.
- (1994) *Qu'est-ce que la démocratie?* Paris: Fayard.
- (1995a) "La formation du sujet", in Dubet and Wieviorka (eds), pp. 21–46.
- (1995b) *Lettre à Lionel, Michel, Jacques, Martine, Bernard, Dominique . . . et vous*, Paris: Fayard.
- et al. (1996) *Le grand refus: réflexions sur la grève de décembre 1995*, Paris: Fayard.
- Tranfaglia, Nicola (1992) *Mafia, Politica e Affari, 1943-91*, Roma: Laterza.
- Trejo Delarbre, Raul (1994a) *Chiapas: la comunicación enmascarada. Los medios y el pasamontañas*, Mexico: Diana.
- (ed.) (1994b) *Chiapas: La guerra de las ideas*, Mexico: Diana.
- Trend, David (ed.) (1996) *Radical Democracy: Identity, Citizenship, and the Stat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Trias, Eugenio (1996) "Entrevista: el modelo catalan puede ser muy útil para Europa", *El Mundo*, June 30: 32.
- Tsuya, Noriko O. and Mason, Karen O. (1995) "Changing gender roles and below-replacement fertility in Japan", in Mason and Jensen (eds), pp. 139–67.
- Twining, David T. (1993) *The New Eurasia: a Guide to the Republic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estport, Conn.: Praeger.
- Ubois, Jeff (1995) "Legitimate government has its limits", *Midrange Systems*, 8 (22): 28.
- United Nations (1970–1995) *Demographic Yearbook*, various year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1995) *Women in a Changing Global Economy: 1994 World Survey on the Role of Women in Developmen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1995)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1994) "Problems and Dangers Posed by Organized Transnational Crime in the Various Regions of the World", Background Document for World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Organized Transnational Crime, Naples, 21–23 November (unpublished).
-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4) *Diverse Living Arrangements of Children*, Washington DC: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6) *Composition of American Households*,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the Census,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the Census:
- (1989) *Singleness in America: Single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Married-couple Families with their Children*.

- (1991) *Population Profile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1*, Series P23, no. 178.
- (1992a) *Households, Families, and Children: a 30-year Perspective*, P23-181.
- (1992b) *When Households Continue, Discontinue, and Form* by Donald J. Hernandez, P23, no. 179.
- (1992c) *Marriage, Divorce, and Remarriage in the 1990s*, by Arthur J. Norton and Louisa F. Miller, P23-180.
- (1992d) *Population Trends in the 1980s*, P-23, no. 175.
- Vajrayana Sacca (1994), August, no. 1. Tokyo: Aum Press.
- Valdes, Teresa and Gomariz, Enrique (1993) *Mujeres latinoamericanas en cifras*, Madrid: Ministerio de Asuntos Sociales, Instituto de la Mujer.
- Vedel, Thierry and Dutton, William H. (1990) "New media politics: shaping cable television policy in Franc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2 (4): 491-524.
- Vicens Vives, Jaume (1959) *Historia social y economica de Espana y America*, Barcelona: Ariel.
- and Llorens, Montserrat (1958) *Industrials i Politics del Segle XIX*, Barcelona: Editorial Teide.
- Vilar, Pierre (1964) *Catalunya dins l'Espanya Moderna*, Barcelona: Edicions 62.
- ed. (1987-90) *Historia de Catalunya*, Barcelona: edicions 62, 8 vols.
- Vogler, John (1992) "Regimes and the global commons: space, atmosphere and oceans", in McGrew et al. (eds), pp. 118-37.
- Wacquant, Loic J.D. (1994) "The new urban color line: the state and fate of the ghetto in postfordist America", in Calhoun (ed.), pp. 231-76.
- Walter, David (1994) "Winner takes all: the incredible rise – and could it be fall – of Silvio Berlusconi", *Contents*, 23, (4/5): 18-24.
- Wapner, Paul (1995) "Politics beyond the state: environmental activism and world civic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April: 311-40.
- (1996) *Environmental Activism and World Civic Politic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Weinberg, Steve (1991) "Following the money",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30 (2): 49-51.
- Weisberg, Jacob (1996) *In Defense of Government: the Fall and Rise of Public Trust*, New York: Scribner.
- Wellman, Barry (1979) "The community ques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 1201-31.
- WEPIN Store (1995), "Michigan Militia T-shirt", World Wide Web, West El Paso Information Network.
- West, Cornel (1993) *Race Matters*, Boston: Beacon Press.

- (1996) "Black strivings in a twilight civilization", in Gates and West (eds), pp. 53–112.
- West, Darrell M. (1993) *Air Wars: Television Advertising in Election Campaigns, 1952–1992*, Washington DC: CQ Press.
- Whisker, James B. (1992) *The Militia*, Lewiston, NY: E. Mellen Press.
- Whittier, Nancy (1995) *Feminist Generations: the Persistence of the Radical Women's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Wideman, Daniel J. and Preston, Rohan B. (eds) (1995) *Soulfires: Young Black Men on Love and Violence*, New York: Penguin.
- Wiesenthal, Helmut (1993) *Realism in Green Politics: Social Movements and Ecological Reform in Germany*, ed. John Ferri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Wieviorka, Michel (1988) *Sociétés et terrorisme*, Paris: Fayard.
- (1993) *La démocratie à l'épreuve: nationalisme, populisme, ethnicité*, Paris: La Decouverte.
- Wilcox, Clyde (1992) *God's Warriors: the Christian Right in 20th century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Wilensky, Harold (1975) *The Welfare State and Equality: Structural and Ideological Roots of Public Expenditur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illiams, Lance and Winokour, Scott (1995) "Militia extremists defend their views", *San Francisco Examiner*, April 23.
- Wilson, William Julius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nerip, Michael (1996) "An American place: the paramilitary movement. Ohio case typifies the tensions between Militia groups and law",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3, p. A1.
- Wittig, Monique (1992) *The Straight Mind*, Boston: Beacon Press.
- Woldenberg, Jose (1995) *Violencia y politica*, Mexico: Cal y Arena.
- Woodward, Bob (1994) *The Agenda: Inside the Clinton White Hous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WuDunn, Sheryl (1996) "Uproar over a debt crisis: does Japan's mob bear part of the blame?",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4, p. C1.
- Yazawa, Shujiro (forthcoming) *Japanese Social Movements since World War II*, Boston: Beacon Press.
- Yoshino, Kosaku (1992)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Japan*, London: Routledge.
- Zaller, John and Hunt, Mark (1994) "The rise and fall of candidate Perot: unmediated versus mediated politics, part I",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1: 357–90.
- Zaretsky, Eli (1994) "Identity theory, identity politics: psychoanalysis, marxism, post-structuralism", in Calhoun (ed.), pp. 198–215.
- Zeskind, Leonard (1986) *The Christian Identity Movement: Analyzing its*



- Theological Rationalization for Racist and Anti-semitic Violence*, Atlanta, GA: Nation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the Christ in the USA, Center for Democratic Renewal.
- Ziccardi, Alicia (ed.) (1991) *Ciudades y gobiernos locales en la America Latina de los noventa*, Mexico: Miguel Angel Porrúa Grupo Editorial.
- (ed.) (1995) *La tarea de gobernar: gobiernos locales y demandas ciudadanas*, Mexico: Miguel Angel Porrúa Grupo Editorial.
- Zisk, Betty H. (1992) *The Politics of Transformation: Local Activism in the Peace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Westport, Conn.: Praeger.
- Zook, Matthew (1996) "The unorganized militia network: conspiracies, computers, and commu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eminar paper for SOC 290.2 (unpublished).